



列宁

中外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列 宁

高敬增 刘彦章 刘文涛 编著

目 录

第 一 章	童年时代	(1)
第 二 章	品学兼优	(18)
第 三 章	兄长就义	(28)
第 四 章	投身革命	(38)
第 五 章	建立小组	(52)
第 六 章	组织群众	(73)
第 七 章	爱情与友谊	(99)
第 八 章	筹建政党	(112)
第 九 章	流放边疆	(129)
第 十 章	捍卫真理	(145)
第 十 一 章	创办党报	(168)
第 十 二 章	在欧洲	(190)
第 十 三 章	党的二大	(206)
第 十 四 章	革命爆发	(232)
第 十 五 章	党的四大	(258)

第十六章	国际大会	(280)
第十七章	理论研究	(298)
第十八章	独立建党	(308)
第十九章	移居波兰	(323)
第二十章	世界大战	(338)
第二十一章	返回祖国	(354)
第二十二章	四月提纲	(366)
第二十三章	准备起义	(385)
第二十四章	攻占冬宫	(397)
第二十五章	保卫成果	(410)
第二十六章	退出大战	(424)
第二十七章	最初构想	(451)
第二十八章	饥荒笼罩	(460)
第二十九章	陷入合围	(474)
第三十章	镇压叛乱	(482)
第三十一章	狠毒女人	(489)
第三十二章	揭露叛徒	(506)
第三十三章	共产国际	(517)
第三十四章	党内争论	(527)
第三十五章	决胜千里	(543)
第三十六章	战时共产主义	(561)
第三十七章	反对腐败	(572)
第三十八章	反对迷信	(585)

第三十九章	兵败华沙	(595)
第四十章	文化建设	(614)
第四十一章	共运壮大	(636)
第四十二章	重心转移	(656)
第四十三章	酝酿改革	(671)
第四十四章	历史转折	(689)
第四十五章	商贸外交	(717)
第四十六章	与斯大林绝交	(735)
第四十七章	最后岁月	(767)
尾声	列宁永生	(796)
附录	列宁年谱	(803)

第一章 童年时代

列宁是为革命而诞生的。

——斯大林

1870年初春，广袤寒冷的俄国大地慢慢苏醒了。俄罗斯民族的母亲河——伏尔加河上厚重的冰层开始解冻，封闭了一个冬天的河水又轻快地涌动起来，融化了的冰块发出“噼噼啪啪”的断裂声，拥挤在一起向下游漂去。

4月22日（俄历4月10日）是个十分平静的日子，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偕弗拉基米尔大公出去打猎，他们每人打死了一头熊，这件事刊登在重要报纸《莫斯科新闻》上。同一天，在伏尔加河边的辛比尔斯克城，一个男婴诞生了，他就是后来改变了俄国命运和世界历史发展方向的列宁。

列宁和其他革命者后来也打死了两头熊。一次是在1917年2月革命中打碎了沙皇统治；另一次是

在十月革命中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列宁诞生在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家庭。他原来的姓名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爱称是沃洛佳、沃洛久什卡。1901年他第一次用笔名列宁写文章，列宁使用过的笔名和化名还有：彼得罗夫、迈耶尔、自由人和弗·伊林，等等，但他本人最喜欢这个列宁，广大群众也喜欢，因此，这一名字就沿用下来了。

列宁的家乡辛比尔斯克是沿河地区的一个港口。相传400多年前有一个保加利亚公爵辛比尔在这里居住过，因此人们使用他的名字称呼这个地方。17世纪中叶，沙皇下令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内城，并构筑了坚固的堡垒，使它成了一座军事要塞，其使命是抵御来自南部游牧部落的侵袭。到了列宁生活的这个时代，辛比尔斯克已经变成一座商港，是粮食、鱼、羊毛和硝石的贸易集散地。滚滚的伏尔加河从中间穿过，一座铁路桥把两岸连接在一起。全城大约有3万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工人和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因此，这座城市里很少有高质量平房，只有少数房屋有顶楼。

列宁的父亲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乌里扬诺夫是一位知识分子。他出生在一个小手工业者家庭。于1843年进入阿斯特拉罕中学，先后两次获得各为

25 卢布的助学金，1850 年中学毕业时获得银质奖章和荣誉公民称号，同年进入喀山大学学习，毕业时获得物理数学候补博士的学位。1855 年 5 月他到奔萨贵族学院担任高年级班的物理和数学教员，因在数学和科研上勤奋努力、成绩突出，受到学院的表扬。

1863 年伊·尼·乌里扬诺夫同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勃兰克—乌里扬诺娃在奔萨结婚，然后迁到下诺夫哥罗德城，在这里进行教学工作，一直到 1869 年被任命为辛比尔斯克省国民教育视察员，才搬到辛比尔斯克城去住。

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虽然不是一位革命者，但他是一位具有进步倾向的知识分子。厌恶沙皇俄国的专制暴政，崇敬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革命民主主义者。尼古拉耶维奇热爱教育事业，希望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子女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为此，他经常到农村去，一去就是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不管严冬酷暑、乱风下雨，都从未停止过。他策划建立新学校为旧学校的修缮筹备资金，组织教师的培训。

他担任省国民教育视察员时，全省仅有 20 所设备简陋的学校，到 1886 年他去世时，全省已有 434 所初级学校，在校学生已有 2 万多名，还有几所中学和上千名中学学生。

由于工作成绩显著，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被

升为第四级文官，获得世袭贵族称号。他在晚年晋升为该省国民教育总监。

列宁的父亲为教育事业奔走的热情给孩子们以很大的影响。列宁的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叶里札罗娃回忆她父亲说：“他的孩子们，在他出去视察时，常常几星期见不到他，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领会到，事业高于一切，为事业可以牺牲一切。他生动地讲解在他的活动范围内所取得的进步，在农村涌现出来的新学校以及因此需要同上（当权人物和地主）下（人民的愚昧和偏见）进行的斗争——这些都使他的孩子们如饥似渴的倾记在心里。”

列宁长得很像父亲，气质也深受父亲的影响。列宁的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说：“在体格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极像他父亲。他继承了他父亲的身材、高颧骨、脸型、蒙古型的眼角、略为向上的眼睛和宽阔的前额。他有父亲的活泼气质和同样诚恳感人的笑。他们有许多相同的品质和脾气——有毅力、有精力、能全心全意献身于工作、有高度的责任感、远大的民主眼光和对别人的体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甚至继承了他父亲发声时的轻微喉音。”

列宁的母亲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勃兰克——乌里扬诺娃是一位医生的女儿，早年丧母。她在农

村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她没上过正规学校，由姨母在家里教她学习弹钢琴。姨母对她严格要求，按照她父亲的规矩，用斯巴达的教育方式教养她，她和姐妹们无论冬夏只许穿短袖敞领的印花布连衣裙，也不许她们喝茶或咖啡，认为这些饮料对人有害。

由于姨母的严格教诲和她本人的辛勤努力，她通过了学校的考试，获得了当小学教师的资格。她聪明好学，经过自学学会了英语和法语，还能讲标准的德语和俄语。她能阅读原文版的《莎士比亚全集》和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阿道夫·梯也尔写的多卷本著作《法国革命史》。在这种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身体结实、意志坚强、吃苦耐劳，又贤慧温柔，会关心人和体贴人，是一位具有大家风范的贤妻良母。

列宁那宽阔的脑门和高颧骨表明他有亚洲血统。列宁的祖母安娜·阿列克谢耶夫娜·斯米尔诺娃是属于蒙古族的加尔梅克人。加尔梅克人过着游牧生活，信奉佛教。他们脸盘圆大、较平，呈黄褐色，体魄强健，性格勇敢刚毅。安娜·阿列克谢也夫娜·斯米尔诺娃，这位不识字的加尔梅族姑娘嫁给了一位 50 多岁的俄罗斯裁缝（以前当农奴）尼古拉·瓦西里也维奇·乌里扬诺夫，当时他们住在位于伏

尔加河进入里海的入口处的阿斯特拉罕城，这是一个渔业和手工业发达的小城市。

列宁的父亲伊里亚·尼古拉也维奇·乌里扬诺夫是这对夫妇生下的第四个儿子，生他时，父亲已经 67 岁，母亲 43 岁。五年之后，尼古拉·瓦西里也维奇·乌里扬诺夫病逝。伊里亚的哥哥瓦西里比弟弟大 12 岁，为了维持家庭生活，供弟弟上学，放弃了求学的念头，先是赶大车，后到一个商店里当伙计，并且终生未婚。伊里亚长大成人后一直感激哥哥为他念书作出的重大牺牲。

列宁还从母亲方面继承了德国血统。列宁母亲的祖父是一位叫约甘—戈特利布·格罗斯科普夫的德国商人，他的妻子是瑞典人，叫安涅·别列捷·埃尔什捷德特，他们的女儿名叫安娜·格罗斯科普夫，这就是列宁的外祖母。列宁的外祖父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勃兰克于 1824 年在彼得堡医学院毕业，在斯摩棱斯克、彼尔姆省和喀山省当过医生。1835 年这位医生的女儿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勃兰克（即列宁的母亲）出生，早年丧母。这位医生在其德国妻子病逝后，他回到自己在科库什基诺的庄园，继续行医。

列宁出生时，全家人居住在城市边缘斯特列尔茨街的一座木板结构的小屋里。这座小木屋是房东

普利贝洛夫斯基院内的一座厢房，院子周围有大片的空旷地带，长满迷离的野草和低矮的灌木丛，阴森得有些令人畏惧。这里的街道是崎岖不平的土路，一到下雨天就变成了泥泞的沼泽。人行道是用木板铺成的，上面有一层厚厚的青苔。

为了使儿女们有一个比较舒适安宁的生活环境，在列宁半岁时，父母把家搬到了临街的 17 号房子的二楼上。1878 年，尼古拉耶维奇狠了狠心，用全部的积蓄买下了莫斯科街 58 号的一幢木制的带有阁楼和回廊的平房。列宁兄妹们的童年和青少年有大约九年时光是在这里度过的。

列宁家的这所新居面对着莫斯科大街，一年四季尘土飞扬，人声喧嚷。环境虽不算太理想，但房间却十分宽敞明亮。下层有五个大房间，分别作为父亲的书房、母亲的卧室、餐室、厅堂和客厅，东西还各有一间前室以及厨房。阁楼上面有四个小房间，这里是孩子们的天地，列宁居住在朝东的一个房间里，与哥哥萨沙相邻。

这幢房子的近邻是一个幽深的大院落和一座花园，长满了绿油油的细草和色泽绚丽缤纷的花卉。园内还有各种各样生长得十分繁茂的树木：榆树、欧洲山杨、丁香树、山楂树、金合欢树、银白杨以及许多苹果树，等等。每到夏秋季节，这里便呈现出一片郁

郁葱葱、果实累累的景象，充满了大自然旺盛原始的野趣。

列宁的全家是一个和睦的爱国的家庭。有五个兄弟姐妹：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乌里尼奇娜·叶里札罗娃（生于1864年），哥哥亚历山大·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生于1866年）、妹妹奥丽加·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生于1871年）、弟弟德米特里·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生于1874年）、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生于1878年）。1873年出生的弟弟尼古拉不幸早年夭折。家里的老保姆最喜欢瓦洛佳和奥利娅这对兄妹，小时候经常一边一个把他们放在自己的膝上，因此在兄弟姐妹中，列宁一直与妹妹奥利亚的关系最好。

列宁的父亲和母亲和睦相处，从不争吵，在培养和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意见一致，这非常有利于孩子们的成长。

列宁的父亲在工作之余经常同孩子们一块玩，他给孩子们讲生动而风趣的故事，要求孩子们不要吹嘘、说假话，孩子们提出的问题，他都耐心通俗地予以解释，孩子们感到父亲和蔼可亲，在父亲面前也无拘无束。

列宁的父亲为了开发孩子们的智力，培养他们活泼可爱的性格，甚至作了某些妥协。有一年夏天他

们全家住在柯库什基诺村，小列宁想抄近道从窗户上直接到街里去玩，他的父母不但没打骂他，反而做了个梯子放到窗户外，使小沃洛佳出入方便，免于受伤。

父亲经常与列宁和萨沙（亚历山大·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的爱称）这两个儿子打门球，还教他们下国际象棋，他自己专门给他们旋制一副棋子，这两个儿子棋艺进步很快，父亲不久就成了儿子的手下败将。父亲经常给孩子朗颂爱国诗人尼·阿·涅克拉索夫的诗篇。

他时常给孩子们唱为阿·恩·普列舍耶夫诗歌谱写的歌曲，歌词唱道：

“我俩是精神上的弟兄。
我相信这一切都要偿还。
我们都满怀着仇恨，
仇恨那抽打祖国的皮鞭。”

七八岁时候，列宁最喜欢的一首诗是《穷人的歌》，

他有时高声朗颂道：

“财主大混蛋，

拽着钱柜净失眠，
穷人贫如洗，
唱唱多欢喜。”

列宁的母亲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同那些上流社会妇女不同，不追求穿着打扮，把全身心倾注于家务和对孩子们的抚养上。父亲的薪金并不多，只是由于母亲的精打细算，才能维持俭朴的生活。

对于孩子们的过失，母亲从不大声训斥和体罚，而是耐心地说服。她用“辛格尔牌”缝纫机给孩子们做衣服，样式虽然并不怎么新颖，但孩子穿起来都很合身。她还指导孩子们办了一份以家庭趣事为内容的手抄杂志《星期六》，父母和孩子们一起兴致勃勃地阅读。这份杂志引起了孩子们的极大的兴趣，列宁用笔名“库贝什金”在上面发表了一些关于小故事的短文。

母亲喜欢音乐，钢琴弹得很好，会几种外语，因此教孩子们音乐与外语，便成了她的一项重要工作。她常教列宁弹钢琴，孩子们习惯在悠扬的钢琴乐曲声中读书和入睡。母亲很注意培养孩子们爱劳动、讲卫生的美德。她经常组织孩子们清扫卫生，打水浇花，使家里永远保持清洁和优雅。列宁家有个果园，有苹果、梨、樱桃、草莓、刺李、醋栗等，孩子们只

许拣落地的水果，大家分着吃，其他水果，有的要等熟了择下来吃，有的要冬贮，有的做果浆。孩子们虽然非常喜欢水果，但都严格遵守父母定下的纪律。父母同孩子们在花园中的一个小亭子里喝完茶，让女孩子端走茶具，男孩子们搬走椅子。母亲常嘱咐孩子要保持服装整洁。孩子们对母亲十分敬爱。

列宁小的时候就显得非常聪明，他的智力和精力要比同龄的孩子们高出一筹。但同所有的男孩子一样，他也很淘气，总是蹦蹦跳跳地闲不住，有时还会做出一些令大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来。

有一次，列宁的一位表姐到他家来玩。表姐是个医生，坐在客厅里同大人们一起聊天，把小列宁冷落在了一旁。列宁很希望能同这位表姐玩一会儿，于是他想到一个妙主意。他走进客厅，大胆地对表姐说：

“它纽达表姐，我生病了，请给我治治吧！”

“你有什么病？”表姐看出了列宁在淘气。

“我怎么都吃不饱：不管吃多少东西还是饿。”

“那你到厨房去，切一块黑面包，多撒些盐，使劲地吃。”

“我已经试验过了，没有用。”

“那就给你开一种药吃，一定有效。”

一听说要吃药，小列宁扭头就跑掉了。

还有一次，全家人坐轮船到喀山乡下去度夏。这

是列宁生平第一次出远门旅行，兴奋得不能自己，在船上又喊又唱。

“在轮船上是不许这样大声喊叫的。”妈妈对列宁说。

“可是轮船自己也在大声喊叫呢！”列宁调皮地回答道。

列宁的回答显得既幼雅又滑稽，引起了大人们的一阵欢笑。但是他们也已逐渐发现，这个活泼伶俐的小男孩虽然顽皮，但他的身上却具有一种十分罕见的才智和纯冶真挚的品格。

列宁从小就不撒谎，并且勇于承认错误。5岁时，他把姐姐一把心爱的尺子弄断了，就立即拿着断了的尺子跑去告诉姐姐：“我在膝盖上这样折断了。”说着还模仿着做了个动作。8岁时，他不小心打碎了姨母家的一个花瓶，姨母问是谁打的，列宁当时未敢承认。回到家里后他却睡不着觉了，他告诉母亲是他犯的错误，并请求母亲赶快把这件事情转告姨母。

列宁小的时候非常喜欢玩玩具，但好玩具一到他手里就算遭了秧，很快就会被弄得面目全非。

有一年列宁过生日，保姆送给他一匹非常漂亮逼真的玩具马，小列宁高兴得跳了起来，抱着马溜烟就跑没了影。当人们再看到他时，马儿已经“粉身碎骨”了——马腿已被拧掉，尾巴折断了，小列宁正

在抠它的玻璃眼珠。

“你为什么要把好端端的玩具给毁了呢？”大人们生气地责备他。

“我是想看看这是不是一匹真马，它的肚子里到底有什么。”列宁十分认真地回答道。

在玩耍的时候，列宁还特别喜欢动脑子，想方设法组织大家做一些十分新奇有趣的游戏。所以只要有他在场，兄弟姐妹们都玩得非常开心快乐。例如，他曾经组织大家玩过“赶马”、“抓怪物”和“士兵战”的游戏。他和妹妹奥丽娅看了关于印第安人的书后，又创造出了“印第安人打猎”的游戏。

据列宁的弟弟德米特里回忆，他有一次看见列宁与妹妹奥丽娅玩过家家的游戏。奥丽娅坐在用干树枝搭成的窝棚里，窝棚外面放着一堆折得很短的干树枝，上面撒了一层红叶子，表示篝火熊熊燃烧，火上面放着一瓦罐，在做饭。奥丽娅头上插着一块很大的绿色牛蒡草叶子作为头饰。奥丽娅正等待着猎手回来。过一会儿，列宁打猎回来了，他一手拿着弓箭，一手拖着被打死的“野兽”（一颗大树根）列宁向奥丽娅详细讲述他同野兽搏斗的经过，他一箭射中野兽之后，野兽咬他，抓他，使他失去了知觉。列宁一面讲，一面学着被打死的野兽大声咆哮。最后说打死这只野兽后，他又累又饿，命令弟弟米佳去厨房

里取来两块撒上盐的面包。

有时候，顽皮的列宁也喜欢搞恶作剧，戏弄弟弟妹妹。有一回，他和妹妹奥丽娅作“赶马人”游戏。沃洛佳扮演赶马人，妹妹当马，他用绳子套着马，用鞭子抽打马，马很驯服。而当列宁扮马时，他挣脱绳子撒腿就跑了。妹妹坐在草地上说：“这样玩不行，我不玩了。”列宁做了个鬼脸说：“马总比人力气大，赶马人应爱惜马，喂给马点好吃的，比如带盐的黑面包，那马就会乖乖地听使唤了。”

在父母的抚育呵护下，列宁的童年生活是愉快的，也是丰富多彩的。

每到夏季，父亲经常领着孩子们到伏尔加河的支流斯维亚加河洗澡，有时也去公共浴场游泳。列宁特别喜欢这项活动，从小就练就了一身好水性，敢于去水流湍急的深水区搏浪遨游。在他的带动和指导下，弟弟德米特里学会了游泳。有时，列宁还和一些小伙伴在这条河的河岸上垂钓嬉戏。冬季到来后，这条河宽阔的冰面又成了他们滑冰的好场所。

在和小伙伴作游戏时，列宁很讲公平竞争，反对打架。谁一动手打架，他就阻止说：打架是胡闹，不是游戏，我不玩了。”但他认为有裁判在场的摔跤不是打架。

有一次在姨母家和表兄弟摔跤，由于他比表兄

年龄小，体质差，列宁结果被表兄摔倒了。

“看啊，我把沃洛佳摔倒了。”列宁表兄拍着手说。

“不，别看你这次把我摔倒了，但我总要摔倒你，咱们再来吧。”

他们商量好，由另一小孩当裁判，一方摔倒后，裁判数完一百个数，还爬不起来，就算失败了。列宁好几次被摔倒，但都很快爬起来，最后终于把表兄摔倒了。

列宁小的时候就乐于助人。一年夏天，他们全家来到姨母家避暑。列宁和一些孩子去河里划船玩。船板漏水，三四个男孩子坐在船上，边划船边往外泼水。列宁脱下靴子放在浴棚里，劝别的孩子也这么办。但有的孩子不听话，把靴子放在了船头上。一会儿，船沉底了。孩子们忙着去抓漂在水面的靴子。有个孩子只找到一只右脚的靴子，左脚的靴子沉到了河底。大家把衣服挂在河边的小树上，一个接一个钻到河底去捞靴子，但只是捞到的只是淤泥、树根、石头，却不见那只靴子。缺少一只靴子的孩子直哭，怕回家去父母打他。列宁说：“别哭，我再试试。”他再次跳进水里，很快钻了出来，手里拿着一只靴子。

列宁从小喜欢下国际象棋。他不仅喜欢同父亲和哥哥萨沙交战，有时还与妹妹奥丽娅、弟弟德米特

里对弈。为了打好开局和收拾残局，他时常翻阅一些有关国际象棋的书籍。德米特里回忆起哥哥列宁同他下国际象棋时说：“对我来讲，他是老师，而且是一位非常严格的老师，所以我比较喜欢同父亲下，因为父亲态度随和，允许我走回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立了一条规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走回棋——拿起哪个子，就走哪个子，他自己任何时候都遵守这条规矩，也要求自己的对手严格遵守。”

除了跟母亲学习弹钢琴之外，列宁还学习唱歌。这时，他经常请母亲或妹妹弹钢琴为他伴奏。他曾演唱过德国作家海涅的抒情歌曲和法国作曲家查理·法朗莎·古诺的《浮士德》歌剧中的瓦连京咏叹调。列宁十三四岁时学会拉手风琴，会拉几个曲子，拉的最好曲子是《一辆跑得飞快的三套马车在大道上奔驰》。

小的时候，列宁的家乡有买鸟放生的习惯，列宁很喜欢这种风俗，他常向妈妈要钱买鸟再放生。有一次，他笼子里养的一只红雀，这只小鸟的羽毛好看极了，美丽而鲜艳，叫声婉转动听，列宁实在舍不得放它。可是没过几天小鸟就变蔫了，羽毛蓬乱不堪，不久就死掉了。这件事使列宁难过了好几天，他把小鸟埋葬后说：“以后我永远不把鸟关在笼子里了。”童年时代的列宁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他聪明伶俐，天

真活泼，为人真诚善良，遇事善于开动脑筋，具有极其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和组织才能，浑身散发出一种蓬勃向上、令人振奋的朝气。这是一株难得的好苗子，如果加上精心的培育和本人的勤奋努力，经受一番暴风骤雨的洗礼，必将能长成一棵树繁叶茂的参天大树。

第二章 品学兼优

他之所以成为优等生，除了卓越的天资外，还在于他专心致志地学习。

——安·伊·叶里札罗娃
(列宁的姐姐)

列宁五岁时就开始学识字了。

1877 年秋至 1878 年冬，父母先后从辛比尔斯克教区学校请来三位教师（瓦·安·卡拉什尼科夫、伊·尼·尼古拉也夫、弗·普·凯维奇）教列宁学习小学课程。由于他天资聪颖，所以学习成绩一直很好，进步得非常快，许多问题老师一讲他马上就理解了，并常常向老师提出一些十分新奇有趣的问题。在认识了一部分字后，列宁就开始阅读书籍了。他不仅阅读家中父亲的藏书，而且时常去卡拉姆金图书馆借阅各种图书和杂志。

从童年时代起，列宁在兄弟姐妹中就显得不同

凡响：他活泼健壮，意志坚强，精力充沛旺盛，具有极高的天赋和颖悟力。大概正是由于这些缘故，他成了家中的宠儿。

特别是当教育官员的父亲，对儿子过人的才智和忘我的探索求知精神感到欣喜不已，他希望列宁发扬锲而不舍的精神，继续发愤攻读，将来成为一个富有理性和博爱精神的杰出的学者和教育家。因此，父亲非常关心列宁的学习和思想品行的发展。一方面对他进行严格的管束和教育，另一方面又不过于束缚他的个性。父亲常常以一个好朋友的身份同儿子进行交往，向他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理想情操，介绍各类有益的知识 and 经验。在列宁身上，父亲寄托了无限美好的希望，倾注了绵绵不尽的舐犊深情。

超人的天资和勤奋的攻读使列宁获益匪浅。他轻松地跳过了预备班的学习，1879年夏秋之季，只有九岁半的列宁经考试顺利升入中学。从这时到17岁，列宁一直在辛比尔斯克古典中学读书。

从中学低年级起，列宁几乎每一门功课都是优秀，并且年年都被评为优等生。第一学年结束时，他就获得了印着“品学兼优”烫金大字的证书和精美的奖状。回到家后，他骄傲地将这些奖品送给了敬爱的父母。

除了天资过人等条件外，列宁学习成绩优秀的

主要原因来自于他的勤奋努力和讲究科学的学习方法。

他上课聚精会神地听讲，回家认真做作业。父母经常检查列宁的作业。在写作文时，他总是先列出大纲，再把纸一折两半，左边写草稿，右边留着修改和补充，都改完后，再誊写清楚。列宁的作文不仅写得出色，而且题材相当广泛。有描写自然风光的，如：秋天时节的伏尔加河，冬日的傍晚，春风送暖的农村；有写人物的，如：罗蒙诺索夫怎么学习的，骑士生活；有写动物的，如：马和地给人带来的好处，鸟和鱼的生活环境；有论述性的，如：文字的作用，农业的益处等。还有政论性很强的题目，如：真正的爱国主义在哪里？当时辛比尔斯克中学的校长弗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克伦斯基，（著名的社会革命党人亚·费·克伦斯基的父亲）是列宁的语文老师，给列宁的作文不仅是5分，而且是5+5分。他不止一次地当着列宁母亲的面，夸奖列宁作文结构严谨，内容充实，文字精练。

从童年和少年时代起，列宁就养成了良好的生活和工作习惯，干什么事情总是有条不紊，井井有序。还在中学低年级时，列宁每天早上不到七点就起床，收拾好床铺后就去冲冷水浴，然后就坐下来读，直到母亲叫他吃早饭上学为止。他还很讲究个人卫

生，衣服穿得很整洁，书桌上的文具也摆放得整整齐齐。

少年列宁还很富有同情心，不仅关心体贴同学，而且乐于助人。

列宁的外文水平很高，为了帮助其他同学学习外文，在上课之前，他时常在讲台上讲解如何翻译拉丁文和希腊文。有时候，他还给语文成绩差的同学讲如何做作文。

列宁同班有一位高个子同学叫德·安德烈夫，他的父母双双故去，由姨母抚养他。有一次，安德烈夫十分思念父母，在课堂上流了泪。这时列宁走到他跟前，极力安慰他。列宁说：

“我知道你父亲去世了，你别难过！”

列宁看他眼里充满了泪水，就补充说：

“你愿意吗？我替你削一支铅笔。”列宁把他用的铅笔给削好。

母亲给列宁书包里放的食物和水果，他从来不光是自己吃，而是分给大家一起吃。铅笔、钢笔尖、练习本也常给同学们用。

由于列宁读书多，知识面很广泛，所以低年级时他基本上用不着在家里复习功课。有一段时间，他做完作业后就在家淘气，又是翻筋斗，又是打虎跳，影响了在同屋学习的兄弟姐妹们。看到这种情况后，

父亲认为列宁虽然学习成绩很好，但还不够努力刻苦。于是，他把列宁叫到自己书房里，严厉地批评了一顿。最后，父亲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孩子，你要想成为一个真正对民族有用的人才，就必须付出比别人高得多的代价，具有比别人坚强的毅力！”

列宁牢牢记住了父亲的教诲。从此以后，他的学习自觉性大大提高了，总是把学习时间安排得很紧凑，生怕浪费每一点时光。他还很注意学习别人的长处，鼓励和鞭策自己。有一次，他听到妹妹在隔壁房间里练钢琴。妹妹弹得好极了，但她仍不满足，专心致志地把练习曲弹了一遍又一遍。列宁深受感动和启发，他对姐姐安娜说：“妹妹学习的劲头真让人钦佩呀！”打这儿以后，列宁更加注意锻炼提高自己的意志力了。

由于列宁学习非常认真刻苦，学习方法也很灵活得当，因此，他中学时代的学习成绩在全校一直是名列前茅的。

有一次上拉丁文课，教师让学生口译一段话。第一名学生翻译了一半，遇到生字，翻译不下去了。教师叫第二个学生，这个学生站起来，一声不吭。叫第三个学生，这个学生红着脸站着，不说话，一直叫了十几个学生，都说不会。最后轮到列宁，他站起来，

简洁明快地把这段话翻译过来，教师惊喜地怔住了，同学们都投过敬佩的目光。

由于列宁学习很扎实，又乐于助人，所以同学们每遇到功课中不懂的地方、作业难题、希腊文和拉丁文不会翻译时，都愿意问列宁，而他总是耐心地给同学们讲解。据列宁的姐姐安娜回忆，1886年冬季，列宁不满16岁的时候，曾帮助她学习拉丁文，使她顺利通过了高等女子学校的毕业考试。列宁在念中学七年级时，还曾经义务地给楚瓦什学校小学教师尼·米·奥霍特尼科夫上拉丁文课，每周三次，持续了一年半的时间，终于帮助这位教师通过了中学毕业考试，升入大学学习数学。

列宁在1887年6月中旬中学毕业，在他的毕业证书上的考试成绩，只有一门功课4分，其余十门功课都是5分。他的毕业鉴定书上写了如下评语：“乌里扬诺夫很有天才，学习一贯努力、认真，在各年级都是第一名。毕业时由于他品学兼优而获得金质奖章。”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中学时代已初步形成了革命的人生观。受家庭环境的熏陶，父亲以办教育救国的执著追求，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其他进步书籍，深入到社会中广泛地体察工人和农民的悲惨生活，都为他革命世界观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十五六岁的时候，列宁就已经不再信教了。他的父亲是一位虔诚的教徒，每逢星期天，都去教堂作礼拜。1885 年底的一天，父亲同一位教师谈到孩子们不按时去教堂作礼拜时，那位教师狠狠地说：“打，该打！”这时列宁正好在场，气得脸都发青了。他撅起小嘴跑到院子里，把戴在脖子上的十字架摘下来，狠狠地扔到草丛里。

童年时，每逢暑假，列宁全家都要到喀山省科库什基诺村去度假，在这里，列宁对俄国的农民阶级有了初步的了解。他结识了许多农民朋友和他们的孩子，亲眼目睹了他们贫困悲惨的生活，并时常听他们向他介绍地主压迫农民的事实和农民们英勇的抵抗斗争。有一次，他看到有人在电线杆上贴出了“杀死沙皇！”的标语，使年幼的列宁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振奋和激动”。所有这些，都在这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仇恨地主和沙皇的种子。

在中学时代，列宁最大的生活乐趣是读书。他涉猎的知识范围相当广泛，特别喜爱阅读古典文学名著和诗歌。但他最愿意读的还是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里，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萨尔梯柯夫谢德林、托尔斯泰等俄罗斯优秀作家的文学作品，不仅对书中的人物和细节了如指掌，而且能够大段大段地背诵他们的著作中的精彩篇章。这些优秀的人类文化

遗产无疑对列宁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列宁不仅读书多，而且喜欢就书中的问题与同学们展开讨论，并互相交换书籍。因此，他常常喜欢询问别的同学读过什么书。有一次，他问同学尼古拉·维列金尼柯夫读过某一本书没有，对方说没有。他又问读过没读过另一本书，回答仍然是没有。后来列宁问道：

“你一定读过屠格涅夫的《烟》吧？”“读过。”维列金尼柯夫很勉强地回答道。

列宁听出对方是在说谎，于是换了一个问法：“你读过中篇小说《李特文诺夫》吗？”

“没有，没读过。”

维列金尼柯夫只好老实地说：

瞧，你说谎了，如果你读过，你就会知道李特文诺夫是长篇小说《烟》里的人物！屠格涅夫根本没写过叫做《李特文诺夫》的小说。”

列宁还喜欢读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皮萨列夫和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论著。这些论著进一步激发了他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信念。1886——1887年认真地认真拜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他还很喜欢哲学讽刺杂志《火星》上发表的革命民主派的诗歌。

进入中学高年级后，列宁对唱歌又有了兴趣，特

别喜欢唱那些优秀的俄罗斯民歌和一些内容进步的流行歌曲，如《哥白尼》、《像浪涛一样飞奔》和《来自遥远的国度》，等等。有一次，同学们教会了他一首新歌，列宁对这首歌的内容和激动悦耳的旋律都很喜欢，经常在宿舍冲着小伙伴们放声大唱：

“一个年轻的铁匠，
在作坊里来回徜徉，
他抄起一把铁锤，
招呼伙伴们帮忙。
丁当！丁当！丁当！
同心协力，同心协力，
弟兄们，
让我们大干一场！”

在这一时期，列宁的言行中时常表现出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和一种倨傲抗上的情绪，这些在他写的作文中也有所流露。1887年4月27日，他在一篇题为《人民生活富裕的原因》的作文中批评了俄国的社会制度，并指出社会中存在着压迫阶级。教语文的校长弗·米·克伦斯先生是一位思想开明的人士，但仍对列宁的这种思想倾向感到恐慌，他警告列宁说：“你写这些东西干什么，它与你有何相干？”但校长对

于列宁生动犀利的文笔和雄辩严谨的表述十分钦佩，仍然给这篇作文打了最高分。

青少年时代的列宁学习勤奋，善于思考，胸怀大志。为了将来从事对全人类有益的事业，他在刻苦地努力着，奋斗着。这时他十分喜欢一句古老的格言：“滴水穿石，不在于力，而在于功。”

第三章 兄长就义

不，我们不走这条路，应当走的不是这条路。

——列宁

列宁童年时代的生活虽不算富裕，却是幸福愉快的，但在他中学时代的最后两年中，他接连遭遇到两次巨大的不幸。

1886年1月24日，列宁崇敬的父亲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乌里扬诺夫因脑溢血去世，享年55周岁。父亲的去世给全家人的生活蒙上了一层巨大的阴影，全家人精神上 and 物质上的支柱倒了，从此以后，他们只能依靠当局发放的抚恤金度日。

全家还没有从悲痛中解脱出来，另一场灾难又降临了。

1887年3月，列宁的大哥亚历山大·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又因参加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事件败

露而被捕。正在彼得堡念大学的列宁的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也因此事牵连而同时被捕。

列宁在童年时代就是一个善于思考、严于律己、讲究礼貌的孩子，弟弟妹妹们都很敬重他。但列宁所崇拜的偶像却是比他大四岁的哥哥，他的一举一动都模仿他，他的口头禅是“跟萨沙一样”。甚至别人把稀饭端到餐桌上问列宁：“沃洛佳，你要什么稀饭，加牛奶的，还是加黄油的？”他总是回答说：“跟萨沙一样。”他们哥俩有共同的爱好，都喜欢博览群书，独立地安静地思考问题。每当暑假全家到喀山省库什基诺村避暑时，兄弟俩总是形影不离，一起游泳，下象棋，谈论政治经济问题。

亚历山大·伊里奇在念中学时就确立了为社会服务的理想，在保存下来他中学时代的作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篇题目为《怎样才能成为对社会和国家有益的人》的文章。他在这篇作文的开头写道：“一个人从事有益的活动时，需要做到：一、诚实，二、热爱劳动，三、性格坚强，四、智慧，五、知识。”1883年夏天，亚历山大·伊里奇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彼得堡大学数理系博物专业学习。由于学习刻苦，他的各科成绩都十分突出。大学三年级时，因写出一篇题为《淡水生物分裂器官构造研究》的优秀论文而获得金质奖章，校方决定毕业后聘他为学校教授。但就是从

这时起，亚历山大·伊里奇走上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参加民意党。

当时俄国沙皇政府实行残酷的专制统治，沙皇的官吏、警察和宪兵肆意欺压鱼肉百姓。工人为了糊口，每天不得不工作 12 到 14 个小时，忍受资本家残酷的剥削压迫。农奴制虽被废除了，但农民还得受大地主的剥削奴役，被沉重的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来。人民没有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一切书报须经过沙皇政府的严格检查。

19 世纪 60—70 年代，在俄国出现了反对沙皇制度的小资产阶级派别——民粹派。这个派别反对沙皇专制制度，但否认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认为知识分子领导的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村社是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他们认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是具有“批判的思维的個人”，即“英雄人物”，而群众只不过是盲目跟着他们的“群氓”。这种理论称之为民粹主义。

信奉这种理论的一些自命为“人民的精粹”的革命知识青年，脱下了西服革履，换上农民服装，组织起来深入农村，发起“到民间去”发动农民进行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反抗运动。这些人被称之为“民粹派”。

1879 年革命民粹派的组织“土地和自由社”分裂为民意党和土地平分社两部分，其中民意党是小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秘密恐怖团体。由于民粹派分子在农村的活动失败了，民意党人对农民失去信心，幻想通过密谋组织暗杀沙皇，达到推翻沙皇制度的目的，把土地交给农民，把工厂交给工人，公民享有普选权，实行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民意党人于1881年3月刺死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在1885年—1886年期间，亚历山大·伊里奇阅读了许多革命书籍，其中有马克思的《资本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普列汉诺夫的《社会主义与政治论争》，等等。1885年夏季，列宁读到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著作《资本论》就是哥哥放暑假从大学里带回来的。因此，此时的亚历山大·伊里奇虽然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已经受到革命思想的深刻影响和熏陶，对沙皇封建专制制度无比痛恨。为了铲除暴政，解放俄国人民，他愿意从事最危险的革命斗争，甚至毫不犹豫地舍弃自己所钟爱的科学事业和宝贵的生命。

1886年11月29日亚历山大·伊里奇参加了大学生在沃尔科夫墓地前纪念杜勃罗留勃夫逝世二十五周年的集会和游行，受到警察的野蛮镇压。列宁的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也参加了这次游行。亚历山大·伊里奇是这次游行的组织者之一，事后他在起草传单中写道：“对于政府所持的暴力，我们将用实

力给以回答；这种力量是凭自觉团结的精神组织和联合起来的。”1887年1月他参加了由十个大学生组成的民意党人小组，制造了炸弹，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但不幸事泄被捕。

为了掩护战友，亚历山大·伊里奇在审讯中从不向当局提供证词，把一切所谓的犯罪事实都揽到自己的身上。

他把法庭变成了宣传阵地，利用这个讲坛揭露沙皇专制制度，宣传民意党人的纲领。他在法庭上说：“我可以说，对整个制度的模糊感觉起源于我的少年时代，这种感觉愈来愈成为我的自觉，并增强了我的信念，而这种信念当前指导着我的行动。但是，只是在研究了社会学和经济学之后，这种对制度不满的信念才完全在我身上巩固下来。因而我对于自由、平等、博爱的憧憬形成了严格科学的，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形式。”他在法庭上义正严词地指出谋杀沙皇的行动是专制制度逼出来的。他说：“恐怖手段是19世纪创造的一种斗争形式。少数人所以强大，只是由于他们具有精神上的力量，只是由于他们认识到自己比多数人要正确。俄国社会恰恰是处在只有同政府进行决斗它才能够捍卫自己的权利这样的情况下……在俄国人民中，任何时候都能够找到十来个无限忠于自己的思想、痛切地感到自己的祖国处于

灾难之中的人，对他们来说，为自己的事业而死不是什么牺牲。这样的人是任何东西都吓不倒的……。”

亚历山大·伊里奇被捕的消息是由一位亲戚写信告诉列宁一家的好友、女教师维·瓦·卡什达莫娃的，列宁从她那里看过这封信后，心情极为深重，沉默了许久才说：“事件相当严重，对萨沙说来，结局可能很坏。”

这一消息很快传遍了辛比尔斯克城。辛比尔斯克的一些人同乌里扬诺夫一家断绝了往来，列宁由此看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市民的怯懦性。

听到儿子被捕的消息后，列宁的母亲万分焦急，急忙来到彼得堡。经沙皇批准，4月11日母亲到什吕谢尔堡要塞同儿子见了面，他当时的最大心愿是能使儿子免除死刑。

亚历山大抱着母亲的双膝放声痛哭。要塞官员告诉母亲，亚历山大如果给沙皇呈交悔过书，沙皇是可以赦免，保住性命的。母亲把这些话转诉给儿子亚历山大。亚历山大耐心地对母亲说：“我真可怜你，妈妈，请原谅我吧。”他告诉母亲，如果写悔过书，就得讲出谋杀的细节，那就是说，会株连到更多的民意党人。母亲后来回忆道：“既然这样，我就不再坚持了，不打算再要他回心转意了。我知道要他做到这一点是困难的。”

4月27日母亲出席了法庭对亚历山大·伊里奇的审判，儿子在法庭上的慷慨陈词使她很满意。母亲后来回忆说：“我十分惊奇，萨沙讲得多好啊！既令人信服，又娓娓动听。我没有想到他竟这样会讲。我在听他演说时，心中万分沉痛，甚至无法坚持到他讲完就不得不离开大厅。”法庭最后对15名被告作出宣判，包括亚历山大在内的5人被判处死刑，两人被判处终身监禁，其余的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和萨哈林岛服苦役。

法庭判决后，母亲承受不住这一深重的打击，再次劝说儿子写一份悔过书，请求沙皇免于死刑。他婉言谢绝了母亲的要求，对母亲说：“既然我在法庭上讲了那些话，我就不能再这样做了。因为这样做是不坚贞的。”他表示，愿为自己的祖国而捐躯。他请求母亲再来探望他时，把海涅的诗集给他带来。母亲最后一次来探望儿子时给他带来了海涅的诗集，告别时她吻了儿子，并鼓励他要“坚强些”。

5月6日亚历山大再次被叫去会见亲友。当他见到来人是表姐夫马特维·列昂季耶维奇·佩斯科夫斯基，而不是母亲的身影时，他有些吃惊。表姐夫告诉亚历山大，母亲重病在床，神智不清，她再次希望亚历山大上书沙皇，免除死刑，以减轻对她和家庭的打击。亚历山大心神不定，为了给母亲和家庭一点安

慰，提笔上书沙皇，写下这样一段话：

“我完全懂得，由于我的行为的性质以及我对这些行为的态度，我无权，也无道义上的理由向陛下恳求宽赦。但是，我有母亲，近日来她的健康吉凶未卜；因而，我的死刑判决将是对她生命的最严重威胁。为了我的母亲和幼年丧父的兄弟姐妹（他们把母亲视为唯一的依靠），我决定请陛下赦免我的死刑而改为其他刑罚。这一宽恕将使我母亲恢复健康和体力，使珍惜她生命的家庭得以团圆；将使我摆脱这种令人痛苦的意识：即我将成为我母亲去世和家庭不幸的祸根。”

亚历山大这封信是为帮助母亲和家庭而写的，在信中并没有任何悔改的表示，署名前也未写上“忠实臣民”字样，可见他未放弃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保持了忠贞的气节。”1887年5月20日清晨，亚历山大·伊里奇和他和战友们走上了绞刑台。他神态自若，正气凛然，用鲜红的热血实践了自己生前立下的壮烈誓言。此时，他年仅21岁。

一个卓越的生命就这样殒落了，许许多多正直善良的人们都为之感到悲痛。驰名世界的俄国化学家德·伊·门捷列夫为他这位高足的夭折发出了深深的悲叹，认为俄国失去了一位杰出的科学人才。而亚历山大亲密战友米哈伊尔·瓦西里也维奇·诺沃

鲁斯基则把他比作一颗从俄罗斯天空坠落的殒星。他说：“他还没来得及长大成人，就离开了人间。这个品德高尚、才华出众的人还没有最后成熟，就被剥夺了生命。还在我国社会生活初露曙光，即 1905 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之前 18 年，在我国无产阶级革命之前 30 年他就像一颗殒星，在历史的天陲一闪而过。”

听到亚历山大·伊里奇·乌里扬诺夫被处死的消息后，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大叫一声就昏过去，半天才苏醒过来。母亲因悲痛过度而大病一场，日夜不停地哭泣。全家人沉浸在一片悲哀凄苦的气氛中。

这个意外的消息对列宁的打击是异常深重的，手足兄弟的遭遇深深地刺痛了他那颗还十分稚嫩的心。但是他没有哭。得到噩耗的那一天，他一个人来到了一座陡峭的山崖边，遥望波涛汹涌的伏尔加河，苦苦地思索冥想——哥哥的死使他开始严肃地考虑自己的终身事业问题。

列宁知道，哥哥是为了反抗专制暴政而献身的。但是，单凭几个热血男儿的勇敢行为就能达到目的吗？此时列宁初步意识到压在俄罗斯人民身上的是一座深重的大山，要搬掉它必须唤醒千百万人民群众，共同起来斗争，个人恐怖行动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不！我们要走的不是这条道路！”这就是列宁面对残酷的现实和哥哥的血所得出的结论。

列宁的妻子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在谈到列宁对哥哥被处死的态度时，回忆道：“毫无疑问，哥哥的遭遇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深刻的影响。同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已经在独立思考许多事情，已经给自己解决了必须进行革命斗争的问题，这种情况也有很大的关系。……哥哥的遭遇只是使他的思想工作更加紧张，把他锻炼得非常冷静，善于正视真理，一分钟也不为漂亮的词句和空想所迷惑，对待一切问题都极其认真。”

在亚·伊·乌里扬诺夫英勇就义之后，他的兄弟姐妹先后参加了反对俄国专制制度的斗争。除奥丽娅在念大学时病逝外，他们后来都成了布尔什维克，列宁是他们兄弟姐妹中的佼佼者，后来成长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群众的英明领袖。但亚·伊·乌里扬诺夫的兄弟姐妹走的同他不是一条路，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宽广的革命大道。

第四章 投身革命

应当了解伊里奇是怎样下苦功把自己锻炼成一位革命家的。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

1887年列宁中学毕业了。由于哥哥刚刚被处决，学校里有人主张取消他本应获得的金质奖章和上大学的权利。但思想开明的校长与列宁的父亲有较深厚的私交，也非常欣赏列宁的才华和品格，因此他决定帮助这个有远大前途的学生。在校长的主持下，校务会议决定授予列宁全体毕业生中唯一一枚金质奖章，并在鉴定书说明他是一位非常有才华、一贯努力认真的学生，“无论在校内和校外，乌里扬诺夫的一言一行，从不使学校领导和教师对他有过不好的意见”。

这个毕业鉴定后来扫除了大学校方对列宁这位国事犯弟弟的疑虑，无疑成了列宁走进大学校园的

通行证。8月10日，列宁向父亲的母校喀山大学提交了入校申请书，25日，喀山大学正式录取他为该校法律系学生。接到消息后，列宁很快就赶往学校领到了期盼已久的学生证。

母亲不放心儿子单独一人去喀山读书，当然，也是出于对辛比尔斯克的厌恶，她毅然卖掉了房产和家俱，向丈夫的墓地告别后，携全家迁到了离喀山40俄里的科库尔基诺村的一所房院里，这所房院是列宁的外祖父病逝后留给女儿们的。8月底，乌里扬诺夫全家经当局批准，迁住喀山第一山街罗斯托娃家的房子。11月全家又迁入新委员部街索洛维约娃家的房子。

喀山是一座兼欧亚两大洲风情特色的城市。市内到处可以看到操不同语言和穿着不同民族服装的人们，有大大小小几十座东正教教堂和清真寺，还有数座巨大的贸易市场，显得喧闹嘈杂，熙熙攘攘。喀山大学是这一地区唯一的一所综合性大学，高大坚固的校舍和美丽的校园里骤集着上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莘莘学子。

列宁决心在大学里认真地研究社会科学，以完成他改造社会、拯救人民的美好愿望。他兴奋地说：“现在是应该研究法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时候了。”入学后，他一下子选修了许多课程，例如：法学原理、

罗马法、神学、法学通论和外语，等等。这一时期，列宁显示了极其强烈的求知欲望和刻苦奋斗的精神，全身心地科学知识的浩瀚海洋之中搏击翱翔。这一年，他只有 17 岁。

由于学习生活十分紧张，也是因为受到环境的影响（这里的大部分学生都抽烟），列宁入学不久就学会了吸烟。列宁的母亲是医生的女儿，懂得吸烟对人体有害，因此她极力劝说儿子戒烟。可是列宁只是微笑着回答：“不要紧，我很健康，这对我害处不大。”

母亲十分疼爱儿子，于是动脑筋对列宁说：“我们光靠你父亲死后的抚恤金生活的。这笔钱不多，我们必须节省用。如果你吸烟，买烟钱给全家用，不是更好吗？”

列宁听了母亲的话就说：“呵哈，对不起，妈妈！这一层意思我没想到。好吧，从今天起我不再吸烟了。”

说完话，列宁把烟从衣袋掏出来放在桌子上，从此以后，一直再未吸过烟。

列宁进入喀山大学之后，一直非常刻苦，学业进步的也很快，但他并没有钻到图书馆里一心读书而不闻窗外之事。俄国的政治风云变幻时刻在牵动着他的心。

因 1887 年发生了刺杀沙皇的事件，政府对学校采取了严密的恐怖统治。大学设立学监，时刻监视着学生的活动，解聘具有进步思想的教授，开除、逮捕和放逐反对沙皇政府的学生，禁止成立任何学生组织。1884 年学校章程规定，参加同乡会的学生就要被开除学籍。1887 年 9 月列宁参加了一个革命学生小组，这个小组常在索巴契巷阿盖也夫房子的菲拉托娃的住所等地方进行活动。警察局通过调查认为：“此小组之倾向极端有害”。列宁还加入了萨马拉—辛比尔斯克同乡会，并成了同乡会中的活跃分子，这个同乡会常在一个食堂内进行活动。

1887 年 11 月底莫斯科发生了学潮，很快波及到其他大城市。12 月 13 日，喀山大学和兽医学院同乡会，列宁作为萨马拉—辛比尔斯克同乡会的代表参加了会议。莫斯科学生代表在会上作了关于 11 月学潮情况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告喀山全体大学生书，同时确定：12 月 16 日为学生行动日。

12 月 16 日，大学生们纷纷来到喀山大学礼堂，参加集会。列宁和其他几位同学第一批涌入会场，他站在人群的最前列，双手提紧拳头，激动地同周围同学谈论时局。这次学生集会的目的是要求废除 1884 年大学生章程和 1887 年 7 月 1 日国民教育部长颁布的关于禁止“车夫、仆役、厨师、洗衣工人、小商贩

以及此类人等”的子女进入完全中学和初级中学的规定，允许建立学生组织，恢复被开除的学生的学籍，惩办镇压学潮的魁首。下午4时集会结束，列宁带头把自己学生证退还给学校当局，以示抗议。

喀山市政当局对学潮十分恐慌。前后调集了一个营的军队隐藏在邻近喀山大学的院子里严阵以待，伺机镇压学生运动。

12月16日深夜，警察当局奉喀山省省长的命令采取突然行动，逮捕了列宁，由警察局长亲自押往监狱。

在马车上，警察局长看到眼前的罪犯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生，感到十分纳闷，于是问道：

“你还是一个毛孩子，为什么要犯法呢？是受了别人的影响，还是要为哥哥报仇？要知道，挡在你面前的是一堵墙，你为什么要往墙上撞呢？”

“是的，”列宁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是一堵墙，不过是一堵腐朽的墙，只要一推就会倒了！”

面对这个年轻人坦然的回答，这个自认为经验老到的警察局长竟然无言以对了。

喀山学潮是列宁革命生涯的开端。在这场运动中，他经受了第一次战斗的考验。

12月17日，列宁被喀山大学开除了学籍。在监狱的牢房里，被捕的学生相互交谈今后的打算。列宁

坚定地表示：在他面前只有一条路了，这就是进行革命斗争。

在警察的严密监视下，监狱里一片死寂。但是在这可怕的寂静之中却蕴藏着强烈的仇恨和巨大的怒火，随时都有可能暴发骚动。于是，市政当局决定分批把这些政治犯流放出去。在列宁母亲的再三请求下，列宁被流放到了喀山省拉伊舍沃县科库尔基诺村，受到了当地警察的严密监控。12月下旬，列宁在母亲和妹妹的陪同下乘骑来到了这个小村子，姐姐安·伊·叶里扎罗娃也被流放到了这里——她因受到哥哥萨沙的牵连被流放西伯利亚，经母亲申请，改判流放到这个村子。

科库什基诺庄园位于乌申河的岸边。这里人烟稀少，地域广袤空旷，到处是茂密的杂草，稀疏的林木以及一眼望不到边的肥沃农田，充满了大自然醇厚古朴的气息。庄园中有一幢古老坚固的大房子，还有一座带有晾台和阁楼的厢房。房子旁边是一座大花园，长满了紫丁香、铁彬、刺槐、白桦、常青藤和密密的灌木丛。外祖父生前在这里设所行医，死后这些房产便留给了女儿们。

流放地的生活是清苦孤寂的。列宁一家几年没有什么邻居和朋友，只有表哥偶尔前来探望，再就是当地警察前来检查工作——看看列宁是否还在当

地，有没有搞违法活动。特别是到了寒冷漫长的冬季，朔风劲吹，冰天雪地，道路阻塞，大地一片白茫茫，连窗户上也结满了冰凌，时常能听到野狼阴森恐怖的嗥叫。

在这极其艰苦恶劣的环境中，列宁没有半点沮丧和颓唐，而是满怀信心地迎接命运的挑战。在长达一年的村野生活中，他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远大志向，虚掷时光，而是夜以继日地刻苦攻读，勤奋思考，不断充实增长自己的才华学识，准备迎接未来真正的战斗。

已故的姨夫是一位饱学多才之士。一个偶然的机 会，列宁在他留下的书柜中找到了大量珍贵的藏书和旧报刊，其中许多杂志上载有大量有价值的文章，列宁兴奋得简直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他立即把这些书刊整理出来，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同时，他还不断向喀山图书馆借书，并订了好几份报刊。这一时期，列宁最喜欢的是政治、经济和统计学等方面的社会科学著作。他回忆说：“后来在我的一生中，即使在彼得堡的监狱里，在西伯利亚，也从来没有像从喀山放逐到乡下的那一年读那么多的书。这简直是从早到晚手不释卷地读。”

列宁这一时期，经常阅读的报刊杂志有《同时代人》《祖国纪事》《欧洲通报》、《俄国财富》、《俄罗斯

言论》等。他还非常喜欢读俄国革命民主主义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涅克拉索夫、萨尔蒂柯夫——谢德林、乌斯宾斯基的作品，充满这些作品中的反对专制制度、颂扬农民革命斗争精神给列宁以很大鼓舞。他特别喜爱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中为人民自由和幸福而斗争的革命者形象，甚至在几个星期中，他把这部小说一口气连续读了五遍。1888年9月列宁给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可惜未得到回音。

列宁和母亲曾向国民教育大臣、内务大臣提出申请，允许他去喀山大学和其他高等学校继续完成大学学业，但遭到了断然拒绝。

1888年6月26日，喀山学区监学根据国民教育司的要求，在给列宁及其家庭做的详细的鉴定中书中写道：“尽管他有杰出的才能和丰富的知识，但从道德方面或是从政治方面来说，暂时都还不能认为也是一个可靠的人。”国民教育司长在这个鉴定写下了如下批语：“上报，他是否就是那个乌里扬诺夫的兄弟？他也是从辛比尔斯克中学毕业的？是的，这从公函的末尾已经看出。绝对不能收他。”

虽然面对生活的逆境和权势者的专横，但列宁仍在顽强地自学大学的课程，有时还抽时间帮助弟弟德米特里·伊里奇学习中学高年级课程。他被流

放到科库什基诺村后，仍在为 1887 年 12 月喀山大学学生集会的盛况激动不已。他到这个村子后，立即提笔给一位在南方一所大学上学的中学同学写信，信中绘声绘色地描绘了喀山学潮的壮举，辛辣地讽刺警察和学监的所作所为。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劝说弟弟不要这样办，她认为如果这封信落到警察手里，会给收信的那位同学带来麻烦。列宁最初笑姐姐胆小怕事，经姐姐再三劝说，他明白了姐姐的一番好心和人世的险恶，终于把已经写好的信从准备送到邮局的筐子里拿了回来。

除了读书学习外，列宁也很善于调剂生活，尽力使枯燥乏味的流放生活丰富充实起来。这一年，他经常外出打猎，漫山遍野地奔波，追逐猎物。但由于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活动活动筋骨，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而且他是初次与猎枪打交道，所以整整一个冬天他都一无所获。第二年夏天，一次散步回来，他对姐姐说：

“今天我们在小路上散步时，一只兔子从我的身旁跑过去了。”

“不用说了，沃洛娃，”姐姐跟他开玩笑说，“这是你一个冬天一直在追的那只兔子。”

列宁还很喜欢外出散步、下象棋和聊天。1887 年夏天，几位表哥来探望列宁的母亲，在庄园里住了一

段时间。列宁经常陪着他们散步和下棋，闲下来就一起聊天。但由于表哥们对社会问题都不甚了解，大家谈得不很投机。在比他们小几岁的列宁面前，他们只能自愧不如。

1888年9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母亲及弟弟德米特里·伊里奇一起，获准迁居喀山第一山街的奥尔洛夫的住宅，在这所住宅里租了一幢独立的房子。

这幢房子有个阳台，附近有一个景色诱人的小花园。居室设在楼上，楼下有两个厨房，列宁把一间不用的厨房作为书房，每天大部分时间埋头在这里读书。他开始系统地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于1872年春在彼得堡出版了第一个俄文译本，印刷3000册，此时已在俄国革命者中间广泛传播。列宁的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回忆说：“记得每天晚上我下楼来跟他谈天时，他就热情洋溢地给我讲解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原理和这一学说所开拓的新天地。他坐在厨房里堆满报纸的炉灶上起劲地做着手势，那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他那朝气蓬勃，信心十足的表情，也使谈话的对方受到巨大的感染。他还善于用自己的话说服人，吸引人。在那个时候，他就善于把自己研究的某个问题，发现的新的道理同别人交流，团结拥护自己的人。他很快就在喀山物色

到了那些也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并怀有革命情绪的拥护自己的青年人。”

在喀山，列宁利用大量时间认真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同时还研究俄国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英国古典政治学家大卫·李嘉图、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亨利·布克尔、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等人的著作。

1888 年秋，列宁参加了尼·叶·费多谢耶夫组织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开始从事革命活动。

自 70 年代起，俄国无产阶级在反对地主和资产阶级斗争中迅速成长，在罢工斗争中建立了第一批自己的组织。1875 年南俄工人协会成立，1878 年俄国北方工人协会组成。1883 年秋，格·瓦·普列汉诺夫在瑞士日内瓦创建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同年冬季，布拉戈耶夫建立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尼·叶·弗多谢耶夫是俄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也是俄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小组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被喀山中学开除后，就投身于革命运动了。

1888 秋天，列宁参加了以弗多谢耶夫为首的马克思主义中心小组领导下的一个小组，经常出席小组会议，参加对一些报告的研究讨论。中心小组有藏禁书的图书馆和简易的印刷所。小组成员秘密地学

习和讨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特别是普列汉诺夫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等著作。

出于保密的需要，这些小组内的成员彼此单线联系，因而相互谁也不认识谁。阿·玛·高尔基也是这个小组的成员，他负责各个小组同喀山工人之间的联系，他见过弗多谢耶夫。但是，当时列宁却没有见过弗多谢耶夫，也未见过高尔基。

在喀山期间，列宁非常注意继承和发扬俄国老一辈革命家的斗争精神和革命传统。1888年冬季列宁到彼得堡罗巴甫洛夫斯克拜访了女民意党人玛·切特维尔哥。他虽然反对民意党人个人恐怖的斗争战略，但很赞赏民意党人不怕死的革命斗争精神，特别是他们善于同警察和密探周旋的地下斗争艺术。

列宁向这位女民意党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们是怎样躲避密探的，怎样在狱中结交朋友的？”这位女民意党人详细地介绍了自己的亲身经验。列宁还同其他民意党人进行了类似的谈话。这些谈话对初出茅庐的列宁学会秘密斗争是很有教益的。列宁后来说：“我们比我们的父辈斗争得好。我们的儿女们斗争得更好，因此，他们一定全取得胜利。”1888年冬季，列宁还经常参加在喀山大学被开除的学生叶·契里科夫住所召集的革命进步青年的集会。

下象棋是列宁一大业余爱好。由于不断潜心钻研，他的棋艺进步很快。1888年冬季，列宁常同表哥阿·亚·阿尔达舍夫一起到俱乐部下棋。有一次，他要检验一下自己的棋艺水平，就找来弟弟德米特里·伊里奇下盲棋。他坐在床上，口授自己的棋步。弟弟设下各种圈套，想把他杀得大败。虽施展了种种手法，但最终还是列宁技高一筹，凯歌高奏。

就在这年冬天，由姐夫马尔克·季莫菲也维奇·叶里札罗夫出面协调安排，列宁同萨马拉象棋大师、律师安·尼·哈尔金用通信的方式进行了一场象棋比赛。他们把下一步棋的下法，写在明信片上，寄给对方。哈尔金棋艺水平很高，在80年代曾经击败了莫斯科的许多优秀棋手，在全国都很有名气。列宁把明信片寄出后，开始摆弄棋局，他自言自语地说：“我倒要看看现在他怎么对付，怎么摆脱这个困境，至少我目前还找不到令人满意的办法……。”等了几几天，哈尔金的明信片寄来了。列宁又摆开棋局进行研究。起初，他和弟弟都认为哈尔金这步棋走得很荒唐，经过反复琢磨，后来列宁看到这步棋的高超之处，他说：“是啊，这是一位非常厉害的棋手。”通信棋赛以列宁的战败而告终，但他感到自己获益匪浅。

列宁从童年起就非常喜欢音乐。在喀山，他有时去看歌剧。1888年11月，他和妹妹奥丽加·伊里尼

奇娜一起去看查·古诺的歌剧《浮士德》，他很欣赏剧中人瓦连廷的下述唱词：“在那浴血的战场，在决战的时候，我宣誓，我将厮杀在前头……。”看完这出戏后，列宁时常怀着战斗的激情高唱这段歌词。

这一年的12月，列宁和弟弟德·伊·乌里扬诺夫去喀山剧院看法国作曲家雅克·哈勒维创作的歌剧《红衣主教之女》，他们为这出歌剧所深深地陶醉了。他们兄弟俩从剧院步行回家，一路上列宁不断哼着：“拉希尔，我给了你……”等歌词。但他最喜欢的还是这段歌词：“我憎恨基督教徒，见了他们就把口水吐，但现在我看到了好处——可以获得金钱的收入！”回到家吃晚饭的时候，列宁仍然翻来复去地轻声哼着这段歌词。此时他高兴得像小孩子一样天真，笑个不停，几乎要笑出了眼泪。

投身于火热的革命之后，列宁立即着手创立马克思主义小组，开始进行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

第五章 建立小组

列宁为了把党组织起来，为了把各个革命小组联合起来，进行了整整一年的艰巨工作。

——克鲁普斯卡娅

长子遇害的创伤还未痊愈，警察又像恶狼一样盯上了心爱的次子——列宁。而列宁仍在积极地参与革命组织的活动，这些情况使得母亲时常感到惶惶不安，于是她决定赶紧从喀山迁走。1889年一二月间，母亲用卖掉辛比尔斯克房子所得的钱，在萨马拉省买了一处小田庄，不久全家迁居到这个小田庄。7月25日弗多谢耶夫和他在喀山的马克思主义小组成员被捕，列宁因已经搬迁而幸免于难。

在萨马拉，列宁虽仍受到警方的监控，但因阿拉卡耶夫村十分偏僻安静，列宁能够安心地在这里学习思考，一方面积极准备大学考试，另一方面系统地

形成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在萨马拉，列宁居住了四年。这是他埋头苦读，认真思考的一个重要时期。一位当时见过他的人这样形容他：“这个青年人个子不高，但身体结实，面庞红润新鲜，刚刚长出一点胡髭，一小绺红须和稍微卷曲的头发。……最惹人注目的是他的大脑袋和白而宽的前额。一双略小的眼睛仿佛总是眯缝着。目光严峻、沉思而凝重。薄薄的嘴唇上挂着一丝略带讥讽味道的微笑。”

迁居萨马拉之后，列宁攻读大学的心愿总算有了一线希望。1890年5月，国民教育司准许列宁以校外生资格参加大学毕业考试。列宁立即开始全力以赴地复习功课，力争和喀山大学的老同学们同时拿到毕业文凭。

夏天，列宁在一条长着茂密的椴树的安静的林荫小道上，放上一条长橙和一张桌子。在桌子旁边不远的树林里，立着一副单杆。每天吃完早饭后，他就抱着一堆书到那里去，独自一人在那里做功课，直到下午3时吃午饭，吃完午饭又坐在他那所别致的“书斋”里。为了保证他集中精力去学习，兄弟姐妹谁也不到他那里去。只有妹妹乌里扬诺娃有时去那里找他补习外语。

晚上为了不让蚊子飞进他房间，母亲在门廊里

点一盏灯，年轻人都集在灯下看书学习。大姐安娜·伊里尼奇娜写了一首诗，对当时的情景作了生动细腻的描述。诗中写道：

“夜色正浓，万籁俱寂，
周围一片沉静。
黑暗笼罩着大地，
村野睡得正香。
月亮躲在乌云身后，
看不见天上的繁星。
只有一颗孤独的小星，
不断地眨着眼睛。
只有在那田庄的门廊里，
灯火依旧通明。
围坐在灯光周围的，
是一些用功的年轻人。
大家都一声不响，
专心致志地读书。
玛尼亚莎的那双眼睛，
早已睡意浓浓。
而那些飞蛾和甲虫，
却愉快地飞个不停。
这不知困倦的一群，

围绕着灯光漫舞，
它们多么渴望啊，
从黑暗奔向光明。

.....

列宁的学习虽然很紧张刻苦，但他还是拿出了许多时间帮助弟弟妹妹学习。有一次小妹妹作地理课的作业，画一个欧洲地图，是用“目测”画的。列宁告诉她要用圆规，掌握好比例尺，妹妹又画了一张就比较好，这件事使小妹妹养成了认真做作业的习惯。妹妹有一次拿黑线订本子，遭到哥哥的批评，妹妹又找来白线把本子订好。

1891年3月，列宁获准参加彼得堡大学法律系课程考试。从4月到11月，他先后参加俄国法历史和国家法、政治经济学和统计学、法学通论和法哲学史、罗马法历史、法学、刑法和刑事诉讼、民法和民事诉讼、商法和商事诉讼、警察法和财政法，教会法和国际法等课程的考试。苍天不负有心人，列宁各门的考试成绩均获优秀。

1892年1月，列宁领到彼得堡学区管理处颁发的彼得堡大学法律系的甲等毕业证书。列宁在萨马拉期间，学业上收获巨大，除了取得了大学学位，学会了几种外国语，特别是德语，这为他继续研究科学

知识和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创造了优越的条件。

列宁不仅学习勤奋，而且善于休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不善于休息的人就是不善于工作。除了下棋散步和做体操之外，学习之余，列宁常常喜欢在妹妹的钢琴伴奏下唱歌。妹妹乌里扬诺娃比哥哥小一岁半，但同他一样聪明，18岁时就掌握了德语、法语、英语和瑞典语。她读过很多书，包括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并且爱好数学。兄妹俩从童年起就非常要好，休息和玩耍时常常形影不离。妹妹钢琴弹得好，嗓子出众，唱歌委婉动听。

列宁兄妹喜欢唱《我们的海洋空荡荡》、《婚礼歌》、《奇妙的眼睛》等歌曲。他们特别欣赏《我们的海洋空荡荡》的歌词，认为歌词生动表达了革命者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有时兴奋起来他们便情不自禁地引吭高歌：

乘风破浪到达彼岸，
全靠意志坚强！……
勇敢些，兄弟们！在狂风巨浪中，
咱们勇往直前，
驶向远方！

列宁不仅爱唱具有战斗鼓动精神的革命歌曲，也很喜欢那些优美动听的抒情歌曲，其中《婚礼歌》和《奇妙的眼睛》他唱得最熟。《婚礼歌》的歌词大意是：

我们结婚不在教堂，
没戴花冠，没点蜡烛，
没有人为我们把赞美诗唱，
结婚的仪式全没用上！
我们半夜在黑松林里结成一对！

以海涅诗为歌词的歌曲《奇妙的眼睛》表达了年青人对爱情的向往。歌中唱道：

你有宝石盈筐，
珍珠满囤，
这一切，人们都要找寻；
你更有一双迷人的眼睛，
亲爱的人儿，
这才最叫人倾心……
这双奇妙的眼睛，
使我的心蒙上灾难的阴影，
它将毁掉我的一生，

亲爱的人儿，
还有什么，值得我找寻。

每逢唱到“毁掉”这个词时，列宁总是提高音调，边唱边说：“已经毁掉了，完全毁掉了。”

有一次列宁跟别人学会了一首歌曲，歌词大意是：“心儿急着跳出年轻的胸膛，对自由和另一种生活它无限向往。”当他弄明白“自由和另一种生活”是指同心爱的人相会时，他噗哧一下笑了起来：“喔，原来心儿跳到那里去了。”

一天上午，大妹妹乌里扬诺娃在弹钢琴，她刚弹完《马赛曲》，小弟弟德·伊·乌里扬诺夫要求她再弹一次。这时，正在学习的列宁听到琴声兴冲冲地赶来了，他建议大家齐唱《国际歌》。乌里扬诺娃边弹钢琴边用法语轻轻地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德·伊·乌里扬诺夫建议哥哥译成俄语。列宁立即用俄语高声唱道：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然后他又用法语唱：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列宁不仅喜欢唱歌，而且还喜欢给歌曲填写新词，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他给《哥白尼》这首歌

曲就填上了一段新词：

“修道士去敲天堂的门，
圣徒彼得来答应：该死的混蛋快滚开，
这里没有你的份。”

他还向弟弟学唱过一首新歌，由于这支歌词控诉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所以列宁很喜欢，不仅经常在高兴时唱，有时也用口哨吹这首曲子。这首歌的歌词是：

“财主自夸有黄金，
对穷人刻薄凶狠；
穷人从早干到晚，
一天吃不上三顿。

萨马拉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孤寂和寒冷，但在这儿生活期间，列宁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却过得十分充实快乐。在这里，列宁充分地利用一切时间和精力，全面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经典著作，在思想上已经成了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而最终确立了自己的人生座标。他决心要一辈子献身于为劳苦大众的解放而奋斗的宏伟事业，即使粉身碎骨、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但在萨马拉，列宁一家也有自己的烦恼，其中最

大的不幸是妹妹奥丽加·乌里扬诺娃患病去世。

在兄弟姐妹中，要数列宁与大妹妹奥丽加的关系最好，两人从小就脾气投和，喜欢在一起嬉戏玩耍，互相帮助。从 1890 年夏天起，奥丽加去了彼得堡高等女子学校读书，她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性格温柔和蔼，愿帮助同学。列宁去彼得堡参加校外生大学考试时，妹妹常常去看望他，而列宁也经常去女子学校看望妹妹。兄妹还时常在星期日结伴外出游玩，或者到涅瓦河去溜冰。

1891 年 4 月末，奥丽加突然得了肠伤寒症，列宁立即把她送进了亚历山大医院治疗，并按时去看望照顾她。开始时，奥丽加的病情有所好转，列宁在给母亲的电报里说：“奥丽加患肠伤寒已住院，护理很好，医生认为，结果可望良好……。”但没过几天，5 月初，妹妹的病情日益加重了，于 5 月 20 日去世。

妹妹的死给列宁的精神以沉重的打击，心理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埋葬了妹妹之后，他陪同母亲返回了萨马拉。由于担心母亲因思念妹妹而伤心过度，列宁没有立即返回彼得堡，而是陪母亲在萨马拉整整住了一年。

1892 年 1 月 16 日，安·尼·哈登律师向萨马拉地区法院提出报告，请求批准列宁注册为他的助理。2 月 11 日，报告被批准，列宁 3 月正式走马上任。

哈登是萨马拉地区法院律师，他是列宁的老棋友，是一位业余象棋大师，其高超的棋艺受到了列宁的交口称赞。自 1891 年起，列宁就常到住在萨马拉托夫街的哈登律师家借书看。由于早有交往，二人工作配合得也十分默契。

出于对沙皇专制的痛恨和对人民的热爱，列宁在从事律师工作时经常为贫苦农民辩护。从 1892 年至 1893 年，他在萨马拉法院出庭辩护过 15 次。这些农民为生活所迫，有时偷了地主的粮食和衣物或辱骂沙皇而“犯罪”，列宁竭尽全力为他们辩护，因而，他在农民中获得了很高的威信。

列宁当律师助理时敢于同富人恶霸作斗争，为老百姓撑腰伸张正义。1892 年 5 月，他和姐夫叶里札罗夫一起去塞兹兰和别斯图热夫卡村。叶里札罗夫的哥哥住在那里务农，因此要摆渡到伏尔加河的左岸去。那时塞兹兰富商阿烈菲耶夫承包下了伏尔加河渡口的经营权。他用一条轮船拖着一条舢舨给行人、马匹、车辆摆渡。这位富商用钱买通了官府，以为自己根子硬，朝中有人，就禁止别的船夫摆渡，任意抬高渡河费，谋取暴利，当别的船夫用小船摆渡时，这位商人就命令轮船追上小船，把所有乘客拉回，强迫重新坐他的船，有时还殴打船夫和乘客。

为了赶时间，也是出于对恶霸势力的痛恨，列宁

不愿等轮船，劝说姐夫乘小船过河。船夫们惹不起富商，都不敢送他们，他们苦苦劝说，一名船夫才勉强答应送他们过河。当他们乘坐的小船起航后，富商阿烈菲耶夫正坐在码头上的凉棚里喝茶，他阴阳怪气地向列宁乘坐的小船的船夫大声喊叫：

“马尔克·季莫弗耶夫，别胡闹！您知道这个渡口是我花钱买的，我决不允许别人把乘客摆渡到对岸去。赶快把您的那位熟人带来同我一起喝茶吧。反正他们得乘轮船过去，我要吩咐人把你们弄回来。”

列宁不理富商这一套，让船夫继续把船向前行驶。船夫信心不足地说：“反正要给拉回去的，白费劲。轮船很快就赶上来了。他们会用篙子把我们的小船挂在他们的船舷上，叫你们到轮船上去的。”

听到船夫的话，列宁更明白了，信心百倍地表示：“您要知道，他没有权利这样做。如果他强迫我们回去的话，他就会因为这种不法行为而坐牢。”

“他已经这样干过多次了，从来没有坐过牢。谁会跟他打官司呢？他在塞兹兰神通广大，大概那些法官都是他的熟人。你不是听说了，他从城里买下了伏尔加河，付了钱，对我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小船刚开到河中心，轮船就响着汽笛飞快地向小船追来。“现在不得不回去了。什么法庭都不管事，他总是有理的。”船夫沮丧地说。

轮船很快就追上小船，两三个水手用篙子把小船钩在轮船的舷上，要乘客坐到轮船上去。列宁对船员们解释说：“你们虽然租了渡口，但无权阻拦乘客乘别的小船渡河，否则就有坐牢的危险。”

船长蛮横地反驳说：“我们不管这一套。我们必须服从船主的命令。轮船把列宁等人拉回到塞兹兰河岸上等待摆渡。列宁当场把参与拦船的船员，乘坐小船的船夫和其他证人的姓名都记在笔记本上。

回到萨马拉后没过几天，就向法院控告富商阿菲烈耶夫的不法行为。案子是在离萨马拉 100 公里以外的塞兹兰县二区行政长官审理，由于富商买通了官吏，审理案件一拖再拖，列宁为此案去那里两次。1892 年隆冬第三次开庭，列宁为此事深夜去车站等车，母亲心疼儿子，劝说他不要再管这件事。母亲说：“别去管这个商人的事啦，他们又会想法拖延审理的，你只会使自己吃苦受累。另外，注意，他们在恨着你呢，他们都是心狠手辣的人。”

列宁安慰母亲说：“不，既然已经开了头，那就得必须坚持到底。这一次他们再也拖不过去了。”

经过列宁的艰苦努力，这次审判中，地方行政长官不得不判富商阿烈菲耶夫监禁一个月，富商的船长监禁一周。列宁这件事做得大快人心，当地的人们奔走相告，他们都知道弗·伊·乌里扬诺夫是一位

为民说话、主持公道的了不起的律师。

在萨拉马列宁开始和民粹分子交往。他认真研究了民粹派的著作，深入了解农村经济情况，批判民粹派的错误观点。

从 70 年代末起，民粹派就开始在萨马拉省阿卡耶夫卡地区进行革命活动。杰出的俄国作家、政治家和革命民主主义义者格列勃·伊万诺维奇于 70 年代后半期就住在斯科尔科沃村，一边当小学教师，一边从事研究和写作工作。他在这里创作出著名的小说《三个乡村》，生动地描写了斯科尔科沃札、格利亚季诺、格瓦尔杰伊齐三个村庄的农民生活，对俄国的农村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虽然有民粹主义观点，但在揭露农民受压迫和剥削的悲惨境遇时，也描写了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的发展和村社的瓦解。

民粹派分子相继在此地建立移民区，以实现他们所勾画的理想社会。例如：奥尔洛夫小组建立的高加索人移民区，阿·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沙尔涅尔田庄建立的移民区。为了办好这些移民区，他们还创建了一些农场和学校，购买新式农具。由于民粹派的社会改造方案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俄国的国情，这些努力最终都失败了。

在一个时期里，列宁经常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会面。交谈移民区的情况，讨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

民状况，他们对民粹派的理论和观点进行分析争论。他们的讨论非常热烈深入，往往谈到深夜时才分手。在列宁影响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后来参加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成长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

在萨马拉还有一些从西伯利亚流放回来，或从其它地方流放到这里的民粹派分子和有民粹派思想的革命者。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民粹政治家瓦西里·瓦西里也维奇·沃多佐夫，当时就住在萨马拉。他以前被流放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省，著有《欧洲人民的生活》一书。沃多佐夫有大量的藏书，一度经常到列宁家里来讨论研究政治理论，等等，后因列宁多次批评了他的观点，他也就不常来了。

1891年12月初，列宁曾去沃多佐夫住所听取他做的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告，并在会上发言，对报告中的观点再次提出了异议。

列宁到萨马拉之后，此地存在着几个仍保持着民粹倾向的革命小组，其中最活跃的是阿列克塞·巴甫洛维奇·斯科利亚连柯为首的小组。为了使这个革命小组接受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列宁做了大量的工作。

这个小组经常秘密地印刷和散发革命书刊和传单，在青年和工人中进行宣传，因此具有较广泛的影响。1889年9月，列宁经过姐夫叶里札罗夫认识了斯

克利亚连柯。斯克利亚连柯高高的个儿，体魄十分强健有力，戴着一副深色夹鼻眼镜，经常拄着一个瘢节很多的手杖。列宁经常参加这个小组的活动，详细地向小组成员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评价厄什里的著作《英国经济史》，批判民粹党的理论。后来这个小组的一些成员，包括斯克利亚连柯都放弃了民粹派理论，转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立场上来，斯克利亚连柯后来也成了一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1890年5月，列宁和斯克利亚连柯小组一些成员作了一次远途旅行，目的是为了进行一次深入的学术讨论和理论的研究。他们坐小船顺伏尔加河而下，到了萨马拉河湾的尽头，向北渡过流入伏尔加河的乌萨河。在这里，他们躲过了警察的监视，自由自在地畅谈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远大志向，深入地讨论各种理论和社会问题，还有人做了专题学术报告。例如，被开除的大学生威·阿·布赫霍尔茨作了题为“幸福的伦理学基础”的报告。这种旅行先后搞过多次，每次需几天时间。小组成员高兴地把这种活动方式称之为“环球旅行”。

列宁对民粹主义思想的研究批判是非常全面深刻的，下了很大的功夫的。例如1889年9月，他研读了自由主义民粹派思想家、经济学家瓦西里·巴甫维奇·沃龙佐夫的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

对该书划出重点，作出了许多批语；1890年夏，他读了自由主义民粹派思想家和经济学家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俄国的经济发展》一书，并作了摘录；1893年春季读了丹尼尔逊的《我国革命后的社会经济概况》一书，并给尼·叶弗多谢也夫写信批判了书中观点。同年春天，列宁还研究了赞同自由主义民粹派的观点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尼·亚·卡雷舍夫于1892年发表的博士论文《农民非份地的租佃》，划出重点，做了批注。后来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文中对该书进行批判。

对民粹主义思想的研究和清算是萨马拉时期列宁在理论研究工作中取得的一项重要成就。但是，他在这一时期的首要工作仍然是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建立马克思主义小组，为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做好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在1889年末和1890年，列宁进一步深入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系列经典著作，对《资本论》一书进行了反复的研读，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他还经常在当地的革命组织中发表演说和学术报告，向持各种政治观点的人们讲解《资本论》的理论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在斯科利亚连柯小组就发表过多次演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使这个小组的许多成员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这说明，在这个时期，

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在这一时期，列宁还把《共产党宣言》一书译成了俄文。这部译稿在萨马拉和塞兹兰等地秘密革命组织中广泛流传，对于宣传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起了重要的作用。后来，这部手稿传到了塞兹兰一位教师手中。这位教师的母亲怕警察发觉后会将儿子治罪，就把它烧掉了。这部珍贵的手稿没有能够公开发表，也未能流传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但它那时确实提高了一大批革命者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为科学共产主义在俄国的广泛传播和马克思主义革命组织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1889年末到1893年9月，列宁还认真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的贫困》、《反杜林论》、《德意志意识形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1892年9月至1893年9月，列宁阅读了作为俄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之一的尼·叶·弗多谢耶夫的著作《关于1861年前收买的农民土地》和《文学作品中农奴制改革后的生活》等，并在著作上做了批示。此书是弗多谢耶夫让他的助手玛·格·霍普芬豪斯带到萨马拉送给列宁的，从此二人建立起通信联系。后来列宁又看了弗多谢耶夫的《论农奴制崩溃的经济原因》一文的手稿，并且详细地提出了修改意见。

列宁同弗多谢耶夫的通信持续了多年。1898年

弗多谢耶夫在西伯利亚流放地病逝，对此列宁感到十分惋惜，并给予他极高的评价。列宁说：“弗多谢耶夫当时在伏尔加河流域和俄国中部的某些地区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群众在那个时候转向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受了这位非常有才能的，对自己事业无限忠诚的革命家很大的影响。”

在列宁领导下，萨马拉于 1892 年成立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参加这个小组的有：阿·巴·斯克利亚连柯、伊·赫·拉拉杨茨、马·伊·谢苗诺夫、阿·阿·别利亚科夫、火车司机助手伊·阿·库兹涅佐夫、医护学校女学生玛·伊·列别捷娃等。小组定期组织学习和讨论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普列汉诺夫的著作，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在小组做过关于马克思著作《哲学的贫困》一书的报告。1893 年春，列宁研究统计经济学家弗拉基米尔·叶菲维奇·波斯特尼柯夫的著作《南俄农民经济》一书。该书对农民分化的问题论述得非常透彻，列宁对此书划出重点，进行了批注和数学统计。他引用此书资料在萨马拉马克思主义小组做了题为《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论弗·叶·波斯特尼柯夫〈南俄农民经济〉一书》的报告，以后又用同一题目写了一篇论文，这是保存下来的列宁的第一篇著述。这篇论文的写成，标志着列宁已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列宁原打算把这篇文章在《俄国思想》杂志发表，杂志编辑尼·阿·卡布鲁柯夫未发表此文章，把文稿退给了谢·伊·米茨凯维奇。1894年12月，这篇文章被官方没收了，直到十月革命后才在档案中发现，1923年，才公开发表刊印。

斯大林曾说：“相信群众的创造力——这就是列宁活动中的一个特点。”他又说：“列宁总是不倦教诲我们：要向群众学习，要理解群众的行动，要细心研究群众斗争的实际经验。”这确实是列宁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他能在理论研究和革命斗争中不断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从青年时代起，列宁就利用一切机会深入工农群众，了解他们的疾苦，了解他们的要求，学习他们的高尚品质和革命精神。

1890年5月20日列宁和他的同志来到叶卡特林诺夫卡商业村，访问亚·巴·聂恰也夫一家，听聂恰也夫的父亲介绍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村社的瓦解和农民破产等情况。5月22日列宁和阿·巴·斯克利亚连柯小组成员一起，访问了老货栈村的农民阿莫斯·普罗科菲也维奇和柯别里玛村的农民彼得叶弗烈莫夫等。1893年6—8月，列宁经常同阿拉卡村附近的田庄的农民德·雅·基斯利科夫等人交谈。这位农民多才多艺，30岁开始学习文化，会写诗，善于发表自己的见解。这位农民在1905年革命中向

农民宣传社会民主主义观点。1905 年列宁给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写信，还惦记着这位农民。信中说：“你领来与我结识的那位激进的农民还活着吗？他现在怎么样？”

同年 8 月列宁同阿·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一起编制了一份萨马拉县一些乡的农户调查表。印刷了 200—250 份。后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把调查的结果寄给了在彼得堡的列宁。

列宁在萨马拉时还经常拜访老民意党人，除了了解他们的观点外，主要是为了向他们学习从事秘密革命斗争的经验，因为他知道，老民意党人在这方面都是行家里手。1889 年末至 1893 年 8 月，列宁去拜访民意党人亚·伊·李瓦诺夫和维·尤·维亭，还常去拜访老民粹主义者尼·斯·多尔果夫，细心地听取他们讲述警察局和法院对民粹派分子和民意党人的审讯过程、监狱中的生活以及他们被捕前后进行秘密斗争的策略和方法。

萨马拉是列宁革命人生旅途中重要的一站。在这里他终于形成了科学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成长为一位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他后来毕业从事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萨马拉地方偏僻狭小，工业不发达，工业无产阶级的人数很少，没有发动革命斗争的条件。为了施展自己推翻沙皇专

制制度、解放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宏图大略，列宁决心到当时俄国的政治中心彼得堡去。

1892年11月，列宁和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叶里札罗娃一起阅读了作家安·巴·契诃夫的小说《第六号病室》，列宁很喜欢这篇小说，称赞这位大作家的构想奇特，想象力丰富。他对姐姐倾诉了自己的心声：“当天晚上读完这篇小说时，我简直觉得可怕，我无法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就起身走了出去。我感到好像我自己也是被禁锢在第六号病室里的一样。”对列宁来说，萨马拉已成了“第六号病室”，像契诃夫笔下那个急于离开医院的病人一样，列宁非常迫切地希望离开萨马拉。当时弟弟德·伊·乌里扬诺夫即将进入莫斯科大学，全家将迁居莫斯科。但对于列宁来说，莫斯科同彼得堡相比仍是大乡村，他执意要到首都彼得堡去闯一闯。

第六章 组织群众

列宁总是不倦地教诲我们：要向群众学习，要理解群众的行动，要细心的研究群众斗争的实际经验。

——斯大林

1893年9月1日，列宁同母亲、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弟弟德米特里·伊里奇一起坐轮船去下新城，然后从下新城转乘火车去莫斯科。

9月4日轮船到下新城后，列宁的母亲和兄弟姐妹继续乘火车去莫斯科，而他则在下新城逗留了两三天。在这里，列宁在下新城拜访了弗多谢耶夫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成员巴·尼·斯克沃尔佐夫、米·格·格里哥耶夫，还有从莫斯科刚来到下新城的谢·伊·米茨凯维奇。他们谈到弗多谢耶夫、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民的状况、同民粹派的斗争以及西方工

人运动的发展状况。列宁重点谈了建立工人阶级的组织的问题，并且特别强调了各城市工人组织之间要建立起联系，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把他们武装起来。他们一连交谈了几个钟头，气氛十分热烈融洽。列宁把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在莫斯科的住址告诉米茨凯维奇，以便各大城市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加强联系，列宁渊博的学识和果断、准确的判断能力给所有的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时莫斯科大学五年级学生、以后成为布尔什维克的谢·伊·米茨凯维奇回忆说：“我们交谈的时候情绪十分兴奋。当时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还很少，我们只有几个人，但是我们明白，马克思的伟大学说一定会教给我们解决‘老大难问题’的方法，未来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他又说：“我们觉得年轻的列宁学识非常渊博，他的论断特别有根据，也特别深刻。值得指出的是当时已经可以看出他是我们党未来的组织者：他非常注意同聚集现有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力量，也非常注意分散同在各城市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建立联系。”

在下新城，列宁听说弗多谢耶夫已经被保释出狱，他感到十分快慰和兴奋，为同这位马克思主义小组领导人的会面，他于9月5日去莫斯科途中顺路去弗拉基米市城拜会弗多谢耶夫。但到达弗拉基米市

城后才知道，他所得到的只是一种误传，弗多谢耶夫仍然在监狱当中。

9月7日前后，列宁来到莫斯科。他在莫斯科逗留时期，广泛结识了该城的马主克思主义者，并且经常到鲁勉采夫博物馆读书写作。

列宁住在彼得堡时，曾经几次来莫斯科探望母亲。他在莫斯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街道上没有门牌号码，只是写着“某某商人之寓”、“彼得罗夫公园，茅草岗棚附近”等，他取笑道：“天晓得这是什么地址，跟欧洲的不大一样。”1894年夏天，列宁和母亲住在柳勃利诺车站附近。在弟弟德米特里·伊里奇的帮助下，列宁利用家附近的一百米左右的坡道学骑自行车。虽然摔了不少交，但他很快就学会了。他认为骑自行车为自己从事革命工作带来很大方便。他和弟弟德米特里·伊里奇一次去莫斯科河边的彼烈尔瓦散步，弟弟问他：

“我们有这么多熟悉的革命同志，为什么不着手建立一个恐怖主义的组织呢？”德米特里·伊里奇的头脑中还残存着民意党人的某些思想意识。

列宁猛然停住脚步说：“为什么要建立这种组织？就算谋刺成功，杀死了一个沙皇，这又有什么作用呢？”

“怎么没有作用，这将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对这样的社会？你指的是什么样的社会？是那个打打牌，吃吃洋姜鲟鱼，对残缺不全的宪法抱有幻想的自由派社会吗？你不应该对这种社会发生兴趣，我们对它不感兴趣，我们应当想到工人，考虑工人阶级的利益。马克思在西欧起来领导工人运动，正是因为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最革命的因素。”

德米特里·伊里奇看到列宁的态度这么严肃，就再也不提这件事了。弟弟此时还不太清楚，列宁的思想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他的同时代的人，他所考虑的是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把俄国的工人阶级和进步知识分子武装起来，为了彻底推翻旧世界的伟大社会革命作准备。

1893年12月列宁到达彼得堡。他第一件事就是去沃尔科公墓，去他妹妹奥丽加·伊里奇娜的墓前吊唁。他永远忘不了这位天资卓越、聪颖活泼与他关系最好的妹妹。

9月末，列宁拿着下新城马克思主义者给彼得堡大学一年级学生米·西尔文的信去见西尔文。这是首次同西尔文会面。通过西尔文，列宁同彼得堡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

列宁在社会上的公开身份是律师助理，但他主要精力集中在从事革命工作上面，即建立马克思主义小组，深入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行政治活

动，支持工人的罢工斗争，尽快把工人组织起来，建立工人阶级政党。这是列宁在彼得堡时期担负的中心任务和主要内容。

在彼得堡，列宁的社会活动范围比以前更大了，结识的朋友也更为广泛。但是此时已经是一位比较老练的革命家了，做事谨慎。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亚历山大·伊里奇的弟弟，政府时刻都在监视着他，如果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失去在社会上行动的自由。所以，他从不务空谈，他所做的一些有关实际意义的重要工作的中心意图，是把俄国的革命者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他所结交的也决不是旧式起义中的游侠好汉和喜欢单枪匹马地搞密谋恐怖活动的人。而是那些跟自己一样相信无产阶级是俄国革命的主力军和领导力量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10月，列宁参加了由彼得堡工艺学院学生组成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这个小组的主要成员有：斯·伊·拉德琴柯、瓦·瓦·斯塔尔科夫、彼·库·扎波罗热茨、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阿·亚·瓦涅也夫、米·亚·西尔文、格·波·克拉辛、亚·马尔琴科等。其主要活动是在先进工人中间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宁参加小组之后，首先成立了中心小组，中心小组的每位成员分别领导一个或几个小组，各小组分布在各个工厂，这样就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宣传扩大到广大工人群众中。这些小组不仅从事理论宣传，而且结合缩短工时、增加工资、争取民主权利等活动内容，进行有力的政治鼓动，因而各个小组的活动都空前的活跃。

列宁的到来给彼得堡的无产阶级事业增添了巨大的活力。此时的列宁虽然只有 23 岁，但已经初步展示了无产阶级无比的革命领导才能。尤其令人惊异的是他具有渊博深厚的学识、饱满的革命热情和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他以忘我的工作态度、火一样的革命激情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去，勇敢机智地战斗在革命斗争的第一线，在实践中逐渐成为工人阶级的朋友和领袖。

1893 年秋天，列宁很快和彼得堡的各个工人小组的领导人都建立起了联系，其中比较著名的人物有：瓦·安·舍尔古诺夫、伊·瓦·巴布什金、弗·阿·克·涅采夫、恩·叶·美尔库洛夫、弗·伊·博德园夫、伊·弗·科斯亭、伊·雅柯夫、勃·伊·季诺维也夫等。列宁重点联系的工厂有：普梯洛夫工厂、谢勉尼柯夫工厂、奥布霍工厂、托伦顿纺织厂、拉菲尔姆烟草厂等。

列宁经常参加工人小组的会议，拜会工人小组的领导人，广泛找普通工人谈话，详细地了解工厂制度，工人做工的情况和生活状况，用通俗易懂的方式

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政治教育和阶级教育。

1893 年深秋，在彼得堡工艺学院马克思主义小组成员格·波·克拉辛的住处，列宁第一次会见了波罗的海工厂工人瓦·安·舍尔古诺夫。由于还有别的安排，这次见面，他们谈的时间不多，谈到了有关工人阶级的状况和新出版的一本书，最后列宁热情地邀请舍尔古诺夫到他那里去。

过了两三个星期，舍尔古诺夫到哥萨克胡同去看望列宁。列宁对舍尔古诺夫说：“来得正巧，我有一本很有意思的书。”说着，他拿来一本布鲁诺·舍恩兰克著的德文书《工业卡迪加·卡特尔和托拉斯》递给舍尔古诺夫。舍尔古诺夫说自己不懂德文。列宁解释说：“没关系，我可以用俄文读给你听。”列宁用俄语边读边解释了三个小时。读完，列宁向舍尔古诺夫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像您这样的工人在彼得堡您的熟人中有多少”等，舍尔古诺夫把马克思主义小组中工人的姓名一一说给了列宁，列宁要求舍尔古诺夫把这些人介绍给他。

这对于他了解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和制订无产阶级革命策略都是大有裨益的。在以后的日子里，列宁同其中的许多人都有过较深的交往。

儿行千里母担忧。1893 年深秋，列宁的母亲在莫

斯科把家安顿好之后，便在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的陪同下到彼得堡看望列宁，母亲想给他买一件冬天穿的大衣。像父亲一样，列宁在购买日常生活用品方面是个外行，所穿衣服通常是由母亲，后来是由姐姐来购置。即使列宁后来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之后，在她们眼中，他永远是一个需要得到照顾的男孩。

1894年秋季，涅瓦关卡工人小组经常集中在涅瓦机械厂工人巴布什金的房间里，由列宁结合《资本论》第一卷宣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小组一共有6个人，列宁是由瓦·安·舍尔古诺夫请来的。一段时间以来，列宁一直致力于对优秀工人进行重点教育，希望把他们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及政党的组织者和领导人。

列宁讲授时，没有提纲，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已有了全面深刻的理解，他用深入浅出的工人语言把深奥的道理讲解得非常清楚，并引导大家发表意见，有时还用激将法使持不同意见者展开辩论。课上得生动、有趣，听课者在讨论时都成演说家，结果使他们对一些重大理论都有了全面深刻的了解。工人们都称赞演讲者才智超人，具有高超的理论精神和深邃的洞察力。有一个人还开玩笑说，讲课人是由于太聪明才秃顶的，惹得大家笑个不止。

在讲《资本论》的同时，列宁还组织大家作好调查研究。他列出具体的调查提纲和调查的项目，请小组的成员在本厂和到外厂去同工人们聊天，把调查来的材料记录下来。巴布什金在吃午饭的时候，用纸条记下了他所在工厂工人的工时和工资情况，他的工具箱里塞满了记载着各种调查结果的纸条。

通过讲课和做调查研究，列宁设法使工人们逐渐熟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了阶级觉悟，工人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得到了很大提高。

随着工人群众政治积极性的增长，他们对马克思的信念和学习的自觉性也进一步提高了。有的工人常常主动抽出时间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讨论各种社会问题，所有这些都是俄国共运中出现的可喜现象。巴布什金回忆说：“这段时间我们在智力发展上是非常紧张的。每一分钟对于我们都十分珍贵。空余的每一小时事先都有规定和安排，甚至整个星期也同样严格地分配好了。现在回忆起那段时间，简直会感到惊奇，究竟哪儿来的那么多精力对付如此紧张的生活。”

1894—1895年期间，列宁同札波罗热茨和斯塔尔科夫一起为彼得堡区、瓦西里岛、维堡区及科尔诺镇的几个工人小组制定了一个学习计划，组织一些知识分子来讲课。列宁当时化名为尼古拉·彼得罗

维奇。工人小组的中心组的人对这几个工人小组的负责人之一弗·亚·克尼亚泽夫说：“我们会派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到你们那里去的。他是我们当中最出色的一位同志，因此小组的成员应该是可靠和正派的人。”弗·亚·克尼亚泽夫挑选了伊林、阿斯塔菲也夫、克雷洛夫、尼良杰尔和本人在他的住房等候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来讲课。

到了约定的时间，有人来敲门。克尼亚泽夫开开门，看见来者是一位 20 多岁的男人，圆圆的脸，宽阔的前额，有一撮浅红色小胡子，目光炯炯有神，一顶便帽几乎要盖住了眼睛，虽是夏季，却穿着秋季大衣，领子高高翻起。他一进门就问：

“克尼亚泽夫住在这里？”

克尼亚泽夫回答说：

“是住在这里，请进。”

他说：“我是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因为我不能直接到这里来……所以耽误了。人都到齐了吗？”

他边脱大衣边问，脸色显得很严峻。克尼亚泽夫说人已到齐，可以上课了。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走到出席会议的人面前，与他们一一相识。然后他就坐到早已安排的座位上给大家讲课。他讲课的中心内容是：只要团结起来，工人阶级就会形成一股无坚不摧的巨大力量。只要

掌握了知识，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工人们就能摆脱奴隶的处境，创造美好光明的未来。同一般知识分子不同，彼得罗维奇的讲话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没有那种艰深晦涩的书卷气，但都揭示出了许多深刻的大道理，既逻辑缜密，又生动活泼，具有极强的说服力。虽然他只是讲了两个小时，但大家都听得很激动，毫无困倦的感觉，他们对于这位年轻人的学识和口才简直佩服极了。

参加听课的人还回答他提出的下列问题：你在什么工厂工作？做什么工作？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如何？工人们最关心什么？他们读什么书？他们能不能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等等。当这位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离开大家的时候，听课者纷纷问克尼亚泽夫：“这位是谁？讲得真好。”这位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还常到其他工人小组去讲课，也常到中心小组成员克尼亚泽夫住处主持中心小组和其他小组会议。

后来克尼亚泽夫的祖母病逝了，为继承祖母的遗产，他接受朋友建议，去哥萨克胡同七号第13号找一位愿帮助家人的助理律师弗·伊·乌里扬诺夫。按响铃后，女房东开门告诉克尼亚泽夫说乌里扬诺夫不在家，但很快就会回来，让克尼亚泽夫在乌里扬诺夫的房间等候。克尼亚泽夫一看，这个房间有两个窗户，家具只有一个铁匠床，一张写字台，三四把

椅子，一个有五抽屉的厨柜。克尼亚泽夫一边打量家具一边寻思：“这恐怕是一位穷律师，他会办好案子吗？”

门铃响了，一位男人走了进来。

“啊，让您久等了”他说着，迅速脱下大衣，整理一下他那有点皱了的燕尾服，说：“您请坐，我换好衣服马上就来和您谈问题。”

克尼亚泽夫看了看这位律师的面孔愣住了，这不是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吗！

彼得罗维奇换好了衣服后，指着椅子让他坐下，并对克尼亚泽夫说：“您从头给我讲起。”克尼亚泽夫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出来：克尼泽夫的祖母是在一位将军家里做奴仆时病逝的，这位将军虽有一幢三层的石砌楼房，但还要强占这位奴仆的遗产。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有时打断克尼亚泽夫的谈话，问清楚每一个细节。最后他搓搓手，加重语气说：“如果我们胜诉的话，就能把房子要回来。困难只在于很难找到户口册，因为死者是农奴。”说完，他拿出一张纸，写了一份借阅纳税人口花名册的申请书。他告诉克尼亚泽夫把申请书送去，并且嘱咐克尼亚泽夫有关案件一但有消息，就立刻告诉他。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接着把话题一转，：“好，现在我们来谈另一个问题。工人小组的情况怎样？工

厂里的情形怎样？”

克尼亚泽夫回答了列宁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您作为各小组的直接联系人，应该经常了解工厂里发生的事情，工人有什么不满，是谁的过错造成的，等等。您应该了解工人的需求，要知道他们关心什么，怎样去接近他们。”

克尼亚泽夫知道完成这些任务需克服许多困难，但看到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那坚定、自信的神情，自己也增强了信心。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继续叮嘱说：“现在，您领导着一个小组。您自己要在知识上超过组员，才能起到领导作用。您应该多读些书，提高自己，同时也提高别人。我听说您喜欢跳舞，暂时抛弃这个爱好吧，应该全力以赴地工作。您应当在政治上提高充实自己，到那时候，您就会把它看成是一种享受了……。”

克尼亚泽夫牢牢地把彼得罗维奇的话记在心里，并努力像他说的那样去工作，学习。他还定期到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即列宁那里去，把工厂的情况告诉他，听他讲述下一步工作的打算。列宁对克尼亚泽夫工作和思想上的进步感到非常高兴，他不只一次地对克尼亚泽夫说：“必须使工人们了解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这样的话，我们就能获得力量，就能按照我们的意愿安排我们的生活。”

在工厂里，克尼亚泽夫把从列宁那里听来的一切讲给工人们听，工人们逐渐喜欢克尼亚泽夫了，有更多的工人群众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列宁对克尼亚泽夫取得的成绩表示满意，但希望他能成为更坚定的革命战士。有一次，列宁对他说：

“如果您被捕了，您知道在法庭上应该怎么办吗？”

他回答说：“不出卖组织和同志。”“那您就向所有的同志说一说。你们有互助储金会吗？有图书馆吗？都有些什么书？我们要建立一个图书馆，制定一个有效率的读书计划。你们还应该知道怎样帮助被捕的同志和被流放的同志，要责成党员必须缴纳党费，要举办一些抽彩活动，要利用一切可行的办法筹集经费。”

对于克尼亚泽夫来说，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是他革命生涯中的启蒙老师。他的谆谆教诲和悉心指导给他指明了革命的方向，帮助他排除了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使他逐渐成长为一位坚强的革命战士。但直到后来他才知道，这位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就是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伟大领袖和苏联的缔造者——列宁。

在列宁之前，革命的宣传活动仅仅局限于在小范围的工人研究小组内部。到了列宁，情况发生了根

本性的转变，变成了根据群众要求进行的广泛的宣传鼓动。在这方面，列宁付出了艰巨的努力。1894年冬天，他召集了一次工人运动领导中心小组会议，到会的有西尔文、克鲁普斯卡娅、格·波·克拉辛、斯塔尔科夫、札波罗热茨、拉德琴柯、雅库波娃、舍尔古诺夫、马布什金等。列宁就开展群众性的宣传鼓动问题作了说明。有人朗读了维尔诺社会民主小组印行的《论鼓动》小册子的片段。不同的观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最后在只有克拉辛、拉德琴柯反对的情况下，以多数票通过了决议，决定把小组内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变成对工人群众的广泛的宣传鼓动，根据工人迫切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进行口头鼓动，撰写和散发传单。会上，列宁还编制了一套调查工人状况的表格，发给各个小组，深入到各个工厂进行深入调查。

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从事革命活动的社会实践当中，彼得堡的工人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迅速地增长。在运动中彼得堡还成长起了一批无产阶级的职业革命家，他们忠于革命事业，立场坚定，勇敢顽强，在革命斗争中做出了巨大贡献。舍尔古诺夫和巴布什金就是他们中间的佼佼者。瓦·安·舍尔古诺夫是这一时期在列宁领导下成长起来的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后来把自己的

一生都奉献给了俄国的革命事业。1910 年前后，他参加了《明星报》和《真理报》的创建工作，曾多次遭到被捕和流放，被折磨得双目失明，但仍未放弃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信念。1917 年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在莫斯科从事党的领导工作。伊·瓦·巴布什金也是列宁在彼得堡结识的有觉悟的工人积极分子，在列宁的帮助和培养下，后来成长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优秀活动家，是列宁《星火报》的首批代办员和通讯员，也曾多次被捕和流放。巴布什金积极参加了 1905 年俄国革命，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伊尔库茨克委员会和赤塔委员会委员，在运送武器时被讨伐队逮捕，未经审讯，即被杀害。列宁在为巴布什金写的讣告中写道：“伊·瓦·巴布什金是先进工人中间的一个，这些先进工人在革命前 10 前就开始创立工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没有这样的先进分子在无产阶级群众中进行不断的英勇顽强的工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别说存在 10 年，就是存在 10 个月也不可能。只是因为有这样的先进分子的活动，只是因为他们的支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到 1905 年才成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党，它并且通过第二届和第三届黑邦杜马的工人代表保持了这种联系。”

列宁在彼得堡继续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从 1893 年起，他对 1872 年和 1885 年版的《资本

论》第一卷和第二卷俄文版进行了校订。1894 他又认真地研读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并将其中的某些段落的德文译成俄文。从 1894 年 12 月，他又开始研读《资本论》德文版第三卷。他在该书划出重点，写出了批语和大量的读书札记。

在彼得堡建立工人组织的同时，列宁还努力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结合俄国的实际，对自由主义民粹派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理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民粹派在 19 世纪 70 年代刚登上历史舞台时，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虽然理论是错误的，但因其能够坚决反对沙皇制度，还是一个革命的派别。但到 80 年代后，由于民粹派遭到沙皇政府的严厉镇压，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的发展，使村社社员分化为多数雇农和少数富农，使得民粹派由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变成富农的卫道士，放弃了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他们上书沙皇，建议沙皇采取改良主义措施，以缓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这样一来，革命民主主义的民粹派就堕落成为自由主义的民粹派了。

1893 年秋天，在一位工人小组成员拉德琴柯的住所举行彼得堡工艺学院马克思主义小组会议。列宁坐在一个靠窗户旁边不显眼的地方。做报告的人

是波·格·克拉辛，报告题目是《市场问题》。他拿着一个笔记本，照本宣科地念了自己的发言。他的口才极差，理论上杂乱无章，没有系统性，因此使与会者感到枯燥乏味。

等克拉辛讲完后，列宁站起来做了一个长篇发言。他首先科学地阐述了自然经济被商品经济取代的历史进程，然后用有力的事实说明由于农民的分化和商品经济向农村的渗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增长，他还揭示了 19 世纪俄国正在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的矛盾，从而批判了那种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没有市场，所以不能发展的民粹主义理论。列宁滔滔不绝地侃侃而谈，有理有据，直截了当，因此很快就征服了在座的每一个人。

“他才是我们的领袖，我们的领头人，我们的理论家，跟着他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参加会议的人都这么说，他们都为拥有列宁这位出类拔萃的领袖而欢欣鼓舞。

列宁后来把这次讲演内容整理成文章《论所谓市场问题》，该文引用大量统计资料证明，资本主义已成为“俄国生活的基本背景。这篇文章表明，列宁已经成为当地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

这篇文稿在各马克思主义小组中间广泛流传，但由于种种原因，该文稿直到 1937 年才被苏联政府

找到，并正式发表。

1894年1月，列宁又一次到莫斯科探亲。此时正值放寒假，进步的大学生们经常举办一些联欢会，借机进行秘密集会。

在1月21日举办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与会者们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俄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民粹派思想家，瓦·沃龙佐夫出席了会议。他个头不高，但身材结实，长着一头淡黄色的头发，举止端庄稳重。他先作了一个报告，竭力宣扬俄国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的陈旧观点，并美化农村的村社，鼓吹与沙皇制度妥协。

由于沃龙佐夫是一位老练的演说家，与会者中又有许多民粹派分子，因而他的讲话受到了部分人的热烈欢迎。沃龙佐夫发言以后，虽然有几个学生站出来驳斥了他的观点，但都因理论准备不足和缺乏经验而被沃龙佐夫驳得无言以对，十分尴尬。

正当主持人要宣布散会时，列宁站出来了。他的情绪有些激动，但精神十分专注，声音高亢而坦然。他先说几句逗笑的开场白，然后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了沃龙佐夫。

“……其实非常清楚！我们这一代人什么都要详细地知道，这里面也包括确已过时了的、很不像样的、十分荒谬的……整个民粹主义的陈腐的理论，尤

其是它的经济理论……为避免重蹈覆辙，我奉劝诸位认真研究一下《资本论》作者的全部思想……我认为尊敬的学术报告人对这种辩证法是‘一窍不通的’。”

说到这里，全体与会者都感到十分愕然，一些民粹派分子纷纷指责列宁出言不逊。对此列宁并没有进行辩解，也没有被沃龙佐夫反驳时咄咄逼人的傲慢态度所吓倒，而是凭借自己惊人的记忆力援引了大量生动翔实的例文、数据和书籍，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逐渐地，全体与会者都被他精彩的演说说服了，就连沃龙佐夫也从心里佩服这个年轻人的勇气和才学。

列宁最后讲道：“……先生们，让我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样我们就会懂得更多的东西，在理论和实践中就不会走弯道，不会像过去那样总是犯错误。”

列宁的讲话在疾风暴雨般的掌声中结束了。经过这场唇枪舌剑的辩论，一些原来信仰自由主义民粹派观点的人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真正的革命道路。

这次会议之后，列宁又去下新城，为当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讲演，批判了瓦·马·沃龙佐夫的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

为了系统批判自由主义民粹派，列宁于 1894 年写《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马克思主义？》这部重要著作的第一编，5 月完成该书第二编，6 月又完成了该书第三编。

此书是回击自由主义民粹派在公开出版的刊物《俄国财富》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而写的，也是对民粹派理论的一次全面的公开批判。

在当时，处于秘密状态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在非法刊物上载文批判自由主义民粹派已不能适应反对自由主义民粹派斗争的需要，因为，一部分青年和工人只能看到公开刊物，仍相信民粹主义理论。因此有必要出版一部著作系统地清算自由主义民粹派理论。列宁的这部著作便应运而生了。

该书第一编主要是批判自由主义民粹派理论家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特别是他在 1892 年第 6 期《俄国财富》杂志上发表的《文艺与生活》一文。

该书第二编批判了自由主义民粹派思想家谢·尼·尤沙柯夫。

该书第三编批判了自由主义民粹派分子谢·尼·克利文柯。

1892—1893 年，列宁在萨马拉马克思主义小组内宣读了一些批判自由主义民粹派的论文，为此书的写作准备了丰富的材料。该书第一编于 1894 年 6

月在彼得堡用胶印版秘密印刷出版，只印 50 本。同年 7 月，第一编又用胶印版印了第二版。同年 8 月，阿·阿·甘申在哥尔克把第一编和第二编用油印机秘密印刷了各 100 本。同年 9 月，安·亚·瓦涅也夫在彼得堡用胶印版把第一编和第三编各刊印 50 本。为保守秘密，该版封面上印上“外省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印行”的字样。由安·亚·瓦涅也夫和米·亚·西尔文等负责，在彼得堡工艺学院和莫斯科同时秘密发行。阅读这本书以后，彼得堡工艺学院马克思主义小组成员非常高兴，米·亚·西尔文主张寄一本给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本人。列宁不赞成这一主张，他对西尔文说：“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给米哈伊洛夫斯基，而是为了：第一，向尽可能多的读者解释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第二，揭露民粹主义的资产阶级性质，指出这是小市民思想，是为小生产者辩护的。”

因此，该书第一编给包括《俄国财富》杂志在内的报刊编辑部寄去几本。该书出版后很快就销售一空，广泛流传于俄国各大中城市，有手抄本，也有打印本，还有用胶版印刷的。该书的第一编和第三编于 1923 年在柏林社会民主党档案馆和列宁格勒大众图书馆被发现，第二编至今未找到。

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

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一著作中，批判了米哈伊洛夫斯基的主观社会学的历史唯心主义，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清算了尤沙柯夫的经济理论，做出了俄国资本主义必然发展和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推翻它的科学结论；剖析了克利文柯的政治观点，指明 90 年代民粹派不同于 70 年代的民粹派，它已由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派，堕落为富农阶级利益的代言人。90 年代民粹派冒充是“人民之友”，实际上是人民之敌。真正的“人民之友”不是民粹派，而是马克思主义者。

列宁在这部著作里阐明了俄国无产阶级的先进性、革命性及其历史使命，规定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现阶段的革命任务，指出工人阶级俄国被压迫阶级的代表是革命斗争中的当然领袖。他说：“社会民主主义者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工人阶级身上。当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领会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领会了关于俄国工人的历史使命的思想时，当这些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并在工人中造成一种把他们现时分散的经济战变成自觉的阶级斗争的坚固组织时，俄国工人就能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并排地）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立工农联盟，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制度，进而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为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就必须建立自己的政党。他说：“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政治活动是要促进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和组织，使它脱离目前这种试图分散地、缺乏领导思想地进行抗议、‘骚动’和罢工的状态，而转变为整个俄国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斗争，其目的在于推翻资产阶级制度，剥夺剥夺者，消灭以压迫劳动者为基础的社会制度。这种活动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信念：俄国工人是俄国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唯一和天然的代表。在这里列宁已经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

列宁的这部著作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篇宣言，它出版后，受到国内外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欢迎。“劳动解放社”也熟悉这部著作，莫斯科马克思主义小组成员谢·伊·米茨凯维奇回忆说：“这本书问世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威信更高，更为人们所公认了。年轻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感到，从他身上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力量和理论力量。”

列宁在批判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同时，也同俄国

最早的修正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展开了斗争。

随着封建经济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打出马克思主义旗号，在公开出版的报刊上宣传其理论观点，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应该让资本主义在俄国充分地发展下去。但他们由此得出取消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错误结论，一味美化资本主义制度。这些人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自由派，被称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

1894年秋季，彼得堡一部分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在亚·尼·波特列索夫的住所召开了一次辩论会。出席会议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有：列宁、瓦·瓦·斯塔尔科夫、拉德琴柯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有彼·伯·司徒卢威、波特列索夫、罗·爱·克拉桑等。

列宁发表了题为《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的演说，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理论家司徒卢威的《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一书中的错误观点。

列宁这篇演说的基本论点纳入了他后来写的文章《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中。由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也批

判自由主义民粹派，列宁同他们达成共同进行反对自由主义民粹派斗争的协议，但有权在文章中对暂时的同路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进行批判。

1895年4月，列宁同斯塔尔科夫、拉德琴柯、司徒卢威、波特列索夫、克拉桑一起编辑了论文集《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在彼得堡出版。该文集上刊载了列宁以克·士林署名的文章《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论文集印出后，被沙皇书报检查机关扣留了，因为他们认为该文集包含有“动摇现存社会制度的有害倾向”，而克·士林的文章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坦率、最完整的纲领”。

沙皇书报检查机关决定销毁该文集，已印成的2000册中，只保留下100册，秘密流传在彼得堡等城市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中间。

第七章 爱情与友谊

对生活的目标和意义的最真挚的共
同一致的看法，使她和列宁结合起来。她
是列宁的得力助手，是他首要的也是最
好的秘书，是他在思想上最可靠的同志。

——克拉拉·蔡特金

在列宁的革命生涯中，彼得堡是他战斗过的第一个主要战场。在这里，他深入到工人群众之中，观察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与他们亲切地交流思想，和他们并肩战斗。在这一过程中，他深深地理解了马克思的一个传统思想：工人阶级是全体劳动者最先进的队伍，领导未来的社会革命、解放被压迫阶级和全人类，是他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这一思想引导他整整一生的政治活动。

在彼得堡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列宁已经锻炼成为一个成熟的共产主义战士和有威望的无产阶级革

命领袖。在这期间，他还有幸结识了一位杰出而又十分可爱的革命女性——他未来的妻子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

列宁与克鲁普斯卡娅相识是在1894年2月末的谢肉节那天。当时列宁出席了在罗·爱·克拉桑的住所举行的一次马克思主义者集会。大家一边吃香薄饼一边交谈，场面十分友好热烈。但当谈到俄国的解放应该走什么道路这一词时，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大家争吵起来。有一个叫舍弗利亚金的人一再强调识字委员会的工作十分重要，认为可通过教育来拯救俄国。听到这种论调后，列宁发出了辛辣无情的嘲笑，他说道：

“好吧，不是想通过识字委员会救国吗？就让他去干吧，我们决不阻拦！”

克鲁普斯卡娅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她对列宁早已有所耳闻，听说一位学识渊博的马克思主义者弗·乌里扬诺夫从伏尔加河流域来到彼得堡，她还阅读了列宁写的《论所谓市场问题》一文，为其严密的逻辑性、充分的论证和精彩的文字所折服，所以非常渴望能早日见到这位作者。这一次她终于见到了列宁，他那极富魅力的音容笑貌和誓为人类幸福奋斗终生的革命意志给她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克鲁普斯卡娅是一位身材修长、皮肤白皙的姑

娘。她平时的穿着十分素雅，常常喜欢把头发盘在脑后，不是那种艳丽妩媚的女人，但却具有一种优雅娴淑、清纯可爱的高贵气质。此时她年方 25 岁，虽然出身于彼得堡的一个贵族世家，但早已于 1889 年就参加了米·伊·勃鲁斯涅夫建立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从 1891 年 9 月起开始在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工人夜校教书，夜校坐落在涅瓦关卡外这个工人区的中心。她在这里教书没有任何报酬。

克鲁普斯卡娅是星期日夜校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教师。过了一年，她把三位志同道合的女朋友——季·巴·涅甫佐罗娃、阿·亚·雅库波娃、耶·阿·嘉科诺娃介绍来做女教师。于是，这里成了革命者的一个秘密汇集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在这所学校里听过课的人都很喜欢这所学校。当时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成员，后来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巴布什金也是这所学校的学生。他在谈到这所学校时说：“人们向我谈了这所学校的许多好处，在这里，可以很好地造就人才，主要的是能够学到知识。在这里工作的所有女教师都不要报酬，她们唯一的目的是在人民中间传播知识，为此她们情愿为人民忍受政府的各种迫害。”

克鲁普斯卡娅教工人们学习文化，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她工作勤奋，一心扑在教学上。她讲课简

明易懂，生动活泼，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工人们都乐意听她讲课。女教师们的工作条件十分的苦，她们为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给工人，想尽了各种办法。克鲁普斯卡娅后来回忆说：“那时，我们不使用‘沙皇制度’、‘罢工’、‘革命’这些可怕的字眼……尽量做到既不提马克思的名字又能向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令我惊奇的是只要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来说明问题，即使是最难懂的问题，也很容易向工人解释清楚。因为他们的生活和处境使他们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

工人们都由衷地尊敬克鲁普斯卡娅这位女教师。当一位纺织工人学生卡拉谢夫学会写字时，端端正正地写了这样一句话：“你教我学会识字，我送给你一件女式无袖长衣，并且祝愿你找到一个好丈夫。”

克鲁普斯卡娅同列宁第一次会面之后，从同事那里听说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因谋刺亚历山大三世而被处以绞刑。后来她同列宁熟悉之后，列宁详细地向她讲述了哥哥的悲壮的故事，谈了自己的家庭和他非常敬爱的慈祥的母亲。由于列宁与克鲁普斯卡娅在一个区工作，接触比较多，所以不久他们就相爱了，建立起完全信任的亲密关系。每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工人小组上课回来，经常到

涅瓦大街克鲁普斯卡娅住处去看望她。当时他们俩谈论的话题十分广泛，涉及到学校、学生、工厂以及生活和美好的未来，克鲁普斯卡娅高兴得忘了吃饭。四年以后，这两位具有共同理想情操和事业的年轻革命者正式结合为夫妻。

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女活动家克拉拉·蔡特金在谈到克鲁普斯卡娅时写道：“对生活的目标和意义的最真挚的共同一致的看法，使她和列宁结合起来。她是列宁的得力助手，是他首要的也是最好的秘书，是他在思想上的最可靠的同志。”

这一结合是幸福美满的，也是经受得住时代和风浪考验的。列宁才智超群，胸怀大志，一生为俄国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事业而奔波操劳。他是国家和民族的栋梁和擎天柱；克鲁普斯卡娅温柔娴雅，品格高尚，对革命事业忠贞不贰，对丈夫则体贴入微，关心备至。二人珠联璧合，伉丽情深，在长达 26 年的夫妻生活中，他们的夫妻生活既未受到性格不和的困扰，也未因政治风云的突变而出现裂痕。无论命运驱使着列宁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起落沉浮，还是在凶吉莫测的革命风浪中搏击奋进，克鲁普斯卡娅都勇敢地追随着他。

为了加强俄国国内外社会主义民主主义者的联系，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宣传与国内工人运动的结

合，为建立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创造条件，也为了让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了解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列宁想出国拜会以格·瓦·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劳动解放社”。

1895年3月初，在彼得堡召开了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和维尔诺社会民主主义小组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列宁、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雅·马·利亚霍夫斯基、叶·伊·斯庞蒂、季·莫·柯培尔宗（格里申）。会议讨论议题有：把原来在狭小范围内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转变群众性政治鼓动；为工人出版通俗读物；同流亡国外的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劳动解放社”取得联系。

但是维尔诺和莫斯科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主张只进行经济鼓动，认为根据俄国工人阶级状况，目前进行政治鼓动条件尚未成熟。列宁严厉批评这种错误观点，认为必须把经济鼓动与政治鼓动结合起来，才能适应进一步发展的革命形势。他的建议得到多数人的赞同，在会议上被通过。

会议原打算派一名代表出国与“劳动解放社”建立联系，但由于意见分歧未取得一致意见，结果派了两名代表出国：彼得堡的代表列宁，莫斯科的代表叶·伊·斯庞蒂。

不巧的是3月下旬列宁得了肺炎，卧病在床，虽

然他已经拿到护照，但因卧病在床而不能立即出国。于是，莫斯科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斯庞蒂先来到了日内瓦，会见了普列汉诺夫和巴·波·阿克雪里罗得等人。但斯庞蒂的出访未能获得预期的效果，他只是向“劳动解放社”转交了一笔用于出版书籍的款项，并没有达成任何具体协议。

4月下旬，为了商量出国的具体行动计划，在彼得堡近郊皇村西尔文的住宅，列宁召集了彼得堡社会民主主义者小组会议，4月底，列宁又召集了星期日夜校女教师会议。

5月7日，列宁以治疗肺炎为名启程出国。他乘坐火车来到瑞士日内瓦去找原民粹分子、熟人阿波隆·亚历山大罗维奇·舒赫特，请他出面安排同普列汉诺夫会面。普列汉诺夫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为了躲避沙皇密探的监视，他建议与列宁在兰多利特咖啡馆会面。

列宁早已熟悉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尤其是对1895年1月刚出版的《论一元历史观之发展》一书赞扬备至。“劳动解放社”的成员们，也很了解列宁1894年春天和夏天写的批判民粹派的论著《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和普列汉诺夫都为这第一次会面而心潮澎湃。

年已39岁的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

诺夫和刚刚 25 岁的年轻的列宁终于依约在咖啡馆里会晤了。这是一次巨人之间的会晤。他们亲切热烈地交流了国内外革命活动的情况和经验，商讨了有关俄国革命的许多问题。在交谈中突然发现咖啡馆里有一个顾客在旁边窃听，机警的普列汉诺夫立即建议列宁去苏黎世巴·波·阿克雪里罗的家里谈。

在苏黎世经过几次交谈，普列汉诺夫对列宁及其政治思想有了深刻的了解，从心底意识到这是一位能给俄国革命事业带来巨大转机的新一代职业革命家。

结束了同普列汉诺夫的会谈后，列宁来到巴黎逗留了近一个半月。在这里，他有幸结识了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马克思的学生和女婿保尔·拉法格，就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等问题与他全面交换了意见，并深入考察了法国的工人运动。经过调查研究他发现法国工人宣传员的文化水平高，接受能力强，待人亲切热情，而这些正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及时需要解决的问题。他在巴黎还阅读了弗郎赛著的《1871 年巴黎公社运动的研究》一书，并作了详细的摘抄。

7 月份，列宁又到了瑞士。他在一家疗养院休息了几天，以便继续同普列汉诺夫和刚从俄国来的波特列索夫会谈。对哲学问题感兴趣的阿列克赛·米

哈伊洛维奇也参加了谈话，他当时是俄国社会主义小组成员，后来成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

列宁来到日内瓦湖畔蒙特勒市近郊的克拉伦，同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沃坚汇合，然后，徒步爬过一座小山来到奥尔蒙特的小村子。在这里，大家在一起食宿，没有人监视，因此可以无拘无束地就各种问题进行全面的交谈。列宁详细地谈了彼得堡社会主义小组的活动情况，普列汉诺夫则向列宁全面介绍了民粹派在19世纪70年代的活动，双方都感到谈话很投机，不仅收获大，而且兴趣盎然。

列宁这位俄国工人运动年轻的领导人同普列汉诺夫这位老一辈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会晤，使他们有机会就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工人运动的实际问题充分交换看法，这对于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俄国的斗争实践结合起来是大有裨益的，因此，也增强了他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于在瑞士的会谈感到十分惬意，对“劳动解放社”也有了全面深刻的了解。

普列汉诺夫也对会谈感到满意，因为他从列宁身上看到了年轻一代俄国社会主义者正在茁壮成长，这使他对俄国革命的胜利更加充满了信心。经过这次同列宁交谈，他还进一步了解了国内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后来，在给亲友的几封信中，普列

汉诺夫多次谈到列宁给他留下极其深刻而良好的印象。

他在致司徒卢威的信里写道：他在国外这么多年，俄国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去过，但是，可以说他对任何人都没抱过像对年轻的弗·伊·乌里扬诺夫那样大的希望。据当年了解此信内容的老布尔什维克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回忆：“我还记得，他在这封信里提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惊人的学识、完备的革命世界观和用之不尽的精力。”

普列汉诺夫当时还写信告诉彼得堡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说他从未见过像弗·乌里扬诺夫这样一个青年革命家的杰出代表人物，说这位青年在理论蓄养上以及对当时俄国现实情况的熟悉上都要远远地胜过其周围所有的人。深知普列汉诺夫为人的克尔日札诺夫斯基为此颇为感慨，因为他知道普列汉诺夫一生从不轻易给人以好评的。

在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交谈中，双方除了在大部分问题上观点一致外，在有些问题上也存在着原则分歧。例如，列宁认为，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是领导力量，农民则是它的主要同盟者，工农联盟是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而普列汉诺夫对农民的革命作用估计不足，他认为自由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主张无产阶级应当与自由

资产阶级结成联盟。这是他们两人存在的重大原则性分歧之一。

列宁把《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一书赠送给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读完其中的文章之后对他说：“您把背转向自由主义，而我们却面向着他们。”

但是，这些意见分歧在当时并未把他们隔开，相反，共同的理想、一致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和相互投合的情趣把他们结合成为亲密的革命战友。列宁在离开瑞士时，给普列汉诺夫的助手、“劳动解放社”印刷所排字工人萨乌勒格林弗斯留下了通信地址，表示要继续向普列汉诺夫请教，并同他交换意见。

列宁同普列汉诺夫会谈的一个具体成果就是“劳动解放社”采纳了列宁关于联合出版工人通俗读物的建议，决定由国内提供稿件和资金，由“劳动解放社”负责编辑和出版《工作者》文集，共同致力于加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以促进革命高潮的早日到来。

1895年7月下旬至9月初，列宁返国途中在德国柏林做了短暂的停留。在这段时间里，他大部分时间在普鲁士国立图书馆阅览室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或者深入社会了解德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和工人运动的情况，有时也出席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人的

集会。如8月3日，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会议上听了阿·施塔特哈根作的关于该党土地纲领的报告。他还于9月在柏林附近的沙洛顿堡拜会了马克思的朋友、德国社会民主党老资格的领导人威廉·李卜克内西，向他虚心讨教了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理论问题。他还想去拜会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这是他多年来的一个美好愿望。但他到柏林时，这位老人已经身患重病，所以未能会面。

1895年8月5日恩格斯病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悲痛万分，他立即在柏林写了题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悼念文章。他在文章开头引用了尼·阿·涅克拉索夫《悼念杜勃罗留波夫》一文中的诗句：

“怎样一盏理智的明灯熄灭了，怎样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他在文章中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都懂俄文，读过俄文书籍，对俄国情况异常关心，抱着同情的态度注视俄国的革命运动，同俄国的革命家保持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清楚地看到，俄国政治革命对于西欧的工人运动将会有巨大的意义。”“俄国的革命者因恩格斯的逝世而失去了最好的朋友。”

9月7日，列宁越过国境线，回到俄国。在接受国境检查时，警察拿起了他的带有夹底的皮箱，还用手拍了拍箱子底部，列宁以为警察看出了什么破绽，

惊出了一身冷汗。侥幸的是警察未发现任何违禁物品，予以放行，列宁这才放了心。

原来，在他皮箱的夹层里藏了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列宁没立即回彼得堡，而是先后访问了维尔诺、莫斯科和奥烈哈沃—祖耶沃，会见当地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向他们诉说了出国的观感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情况，同他们商量支持在国外出版《工作者》文集之事，同时还向他们介绍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的一些收获。

10月11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到了彼得堡，受到了当地各个工人小组和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热烈欢迎。当时在彼得堡工人小组中进行革命活动的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后来回忆说：“你们很容易想像这次出国对我们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我们又是多么急切地等待着他归来。盼望着的一天终于来到了。我们的‘老头’（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引者注），这个像水银一般不停地活动着的人，又回到我们中间来了。他向我们生动地讲述了他怎样同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和查苏利奇相识，他们给他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列宁十分清楚地知道，他的革命事业在俄国，而当前俄国革命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

第八章 筹建政党

给我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过来。

——列宁

回到彼得堡之后，列宁又投入到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组织，开展工人革命斗争的工作之中。

他刚回到彼得堡，就受到了警察局的严密监视。克鲁普斯卡娅的一位堂妹在住址询问所工作，列宁回来两天以后，她来告诉克鲁普斯卡娅，夜间她值班时，来了一个暗探，翻阅着登记住户地址的簿子，并夸口说：“我们发觉了国家要犯乌里扬诺夫的踪迹，他的哥哥已经被绞死了，他是从国外回来的，现在已在我的控制下了。”克鲁普斯卡娅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告诉了列宁，他才得以转危为安。

列宁在1902年出版的《怎么办？》一书中回忆在彼得堡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活动时，说：“我曾在一个

负有广泛的包罗万象的任务的小组中工作，——所有我们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常常感到痛苦的，就是我们认识到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在这样一个可以把一句著名格言改成‘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过来’的时候，我们却表现出是一些手工业者！”列宁认为，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把分散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组织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为了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列宁开始日夜奔忙起来。

10月中旬，在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住宅召开了彼得堡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小组和马尔托夫小组的联席会议。由列宁主持会议，主要讨论了把各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合并为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和开展群众性活动政治鼓动问题。此后不久，列宁又主持召开了彼得堡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决定成立全市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这个组织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和严格纪律的原则创建。根据列宁的提议，领导这个组织的是一个中心组，大家一致推举列宁为中心组成员。进入中心组的还有马尔托夫，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斯塔尔科夫，瓦涅也夫等人。彼得堡市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在各个区设立了小组，通过参加小组的革命工人与各个工厂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各个工厂都设有专人负责了解工厂情况和分

发报刊。在大的工厂企业直接建立了工人小组。各小组的主要任务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宣传鼓动，组织工人斗争。这些小组实际上就是相当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基层支部。

1895年12月27日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彼得堡市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被正式命名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这是俄国人民革命斗争历史上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创举。在俄国历史上，这个组织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进行罢工，斗争，编写和印发革命传单，把工人改善生活条件与劳动条件的日常经济斗争同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从而推动了俄国无产阶级斗争日益蓬勃地开展起来。因为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扎根于俄国本土、同工人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雏型。

11月初，在市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领导下，彼得堡的托伦顿工厂的500名组织工人开始罢工，市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还印发了“纺织工人要求什么”的传单。为了分析研究罢工斗争情况，制定斗争策略，召开了社会主义小组和先进工人的代表会议，托伦顿工厂、普梯洛夫工厂和其他工厂的工人参加了会议。列宁认真地听取了工厂的情况，收集了关于工资、罚

款、生活条件待遇等方面的具体资料。在托伦顿工厂罢工期间，列宁还同斯塔尔科夫一起访问了尼·叶·美尔库洛夫，给他一笔钱，请他转交给被捕工人的家属。

不久，市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又印发了列宁撰写的传单《告托伦顿工厂男女工人》，这是“协会”印发的第二张传单。在写这份传单的时候，列宁感到资料不足，于是派遣星期日夜校女教师克鲁普斯卡娅和阿·亚·雅库波娃打扮成女工模样，去工厂作调查，获得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材料。这份传单向社会展示了工人过悲惨生活的事实，要求厂主增加工资，减低房租，并且号召工人们团结起来，并指出：“要记住，只有大家共同努力才能改善我们的处境。”这份传单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广大工人增强了斗争信心。11月下旬，列宁在各工人小组特派代表会议上，提出了罢工工人对当局的要求，并做出了具体说明。这次罢工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11月彼得堡“拉弗尔姆”制烟厂也举行了罢工。列宁和西尔文曾去了解斗争情况。

彼得堡托伦顿工厂工人罢工斗争的胜利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它充分表明彼得堡市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已经担负起了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责任。

为了广泛地开展政治鼓动，列宁于 1895 年秋天写成小册子《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并于 12 月初，由彼得堡“民意府”名叫拉赫塔的秘密印刷所印刷了 3000 册。

为了迷惑警察，在此书封面上刊印了随便编造的字句：“阿·耶·瓦西里也夫书局出版，克·恩·苏鲍金印刷厂印行”，“经书报检查局许可”等。在小册子中，列宁明确指出：工厂主利用工厂法压迫工人，工人只有起来同资本家和政府制定的法律进行斗争，才能改善自己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他还告诉工人：“工人将认识到，只要工人对资本家的依赖关系还存在，法律根本不会改善工人的处境，因为法律总是偏袒厂主资本家的，因为厂主总会想出一些诡计来规避法律。工人既懂得了这一点，也就会明白，他们只有一种自卫的方法，就是联合起来反对厂主，反对法律所规定的那些不合理的制度。”

为了在工人中间广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彼得堡市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加强报刊的编辑和出版工作。11 月末，列宁主持了彼得堡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成员会议，会议通过决议，决定尽快筹备出版该组织的秘密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报》。根据列宁的意见，这决不是一个狭隘的地方性的报纸，更不是“经济主义”性质的“报纸”，而是要办一个想把“罢工斗争

同反专制制度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的报纸”。他号召该组织成员积极地为该机关刊物写稿，而他本人则身体力行，为该刊物创刊号撰写了《告俄国工人》（社论）、《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1895 年雅罗斯拉夫里的罢工》等文章，并亲自编辑了该报创刊号的全部稿件。

另外，列宁还动员“协会”会员和各小组成员为“劳动解放社”出版的《工作者》文集募捐资金和撰写稿件。他也于 11 月份给普列汉诺夫寄去了几篇文章。1896—1899 年，《工作者》文集在国外出版，先后出版六期（三册），在 1896 年春出版的第一、二期合刊上刊登了列宁悼念恩格斯的文章《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在彼得堡建立和壮大工人政治组织的时候，列宁排除了宗派主义的干扰，捐弃前嫌，尽力把放弃了错误观点的民意党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例如，同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在星期日夜校担任女教师的莉迪娅·米哈伊洛夫娜·克尼波维奇，70 年代末在赫尔辛的福斯的民意党小组中开展活动，后来在克鲁普斯卡娅影响下信仰了马克思主义。1895 年夏在彼得堡市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和民意党的秘密的拉塔印刷所就印刷“协会”书刊问题谈判中，她充当了中介人。由于她的努力，彼得堡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传单和

列宁的一些著作的印刷都由这个印刷所承担。克尼波维奇是“协会”和拉赫特印刷所的联络员，她用篮子把书稿送到印刷厂，又取回运送到熟人那里，组织大家把书散发给工人们。这个印刷所先后印刷了小册子《工作日》、《靠什么活着》、列宁的著作《对工厂工人罚款的解释》、《沙皇——饥饿之魔》等。后由于叛徒的出卖，克尼波维奇于1896年被捕流放到了阿斯特拉罕，列宁写的《谈谈罢工》小册子的原稿也被警察搜去销毁了。后来克尼波维奇成了一位坚定的布尔什维克。

在彼得堡从事秘密革命斗争中，列宁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他常向他所在的小组成员，包括克鲁普斯卡娅讲述怎样巧妙地愚弄暗探，怎样穿过有过道的院子，怎样用化学药水在书上写字，怎样与战友用暗号交谈联络，等等。为联系方便，他还给小组的每个成员都起了绰号。

列宁曾向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饶有兴味地讲述了他在彼得堡智斗暗探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逗得姐姐笑个不停。1895年的一天，一个密探死死地盯住了列宁。列宁不能让密探跟踪到他要去的住宅，可是这个尾巴怎么也甩不掉。他冷静地观察着这个密探的一举一动，后来发现密探躲进了一幢房子的深深的门洞里。于是他迅速饶过大门，跑进了这幢房子

的入口处的门卫室，一屁股坐在看门人的圈椅上，透过玻璃窗看着密探因找不到跟踪目标而东张西望的狼狈相，禁不住一个人哈哈大笑起来。

彼得堡“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成立和它所开展的卓有成效的斗争，有力地推动了俄国其他城市工人运动的开展和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成立。莫斯科、基辅、土拉、雅罗斯拉夫里、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等城市先后建立了类似彼得堡“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社会民主主义组织，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工人运动中的影响日益扩大。

1895年12月18日，以列宁为首的彼得堡“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中心领导小组连续召开了几次会议，集中讨论了即将付印的《工人事业报》创刊号的印刷和发行问题。创刊号有两份原稿，一份由安亚·瓦涅也夫拿去作最后一次审阅，然后送去付印，这份手稿原来是由列宁撰写的，为了不暴露列宁的笔迹，彼库扎波罗热茨征得列宁同意，由他再抄写一遍。创刊号另一份原稿由克鲁普斯卡娅保存。

《工人事业报》创刊号还未来得及问世，于12月20日深夜至21日凌晨，列宁和彼得堡“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大部分战友瓦涅也夫、扎波罗热茨、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斯塔科夫等人先后被捕了。警察

在逮捕瓦涅也夫时，搜查到了即将付印的《工人事业报》创刊号的原稿。另一份原稿，由克鲁普斯卡娅迅速转交给了她的中学同学、司徒卢威的未来妻子尼娜·亚历山大罗夫娜·海尔德手里保存。

被捕后，列宁被关入彼得堡拘留所第 193 号单人牢房内。在这里，他被关了 14 个月。

从列宁被捕到 1896 年 10 月，警察局在彼得堡先后逮捕了 128 人，有 700 人被驱逐出彼得堡。克鲁普斯卡娅也于 1896 年 8 月和 11 月两次被捕。列宁在狱中时刻惦记着狱外战友的安危。

列宁是通过克鲁普斯卡娅与狱外的战友和组织建立联系的。列宁第一次被审讯之后，列宁让克鲁普斯卡娅去莫斯科家里会见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请她买一只同国外带回来的一样的箱子，因为在审讯中他说国外带回来的箱子放在莫斯科家里。列宁的意思是避免因这件事牵连更多的人被捕。姐姐安娜按照弟弟的嘱咐买了一只箱子。

到莫斯科列宁家里来的第二个人是西尔文，他带来了列宁于 1896 年 1 月 14 日写给亚·基·切博塔娃的信。他在这封信中说明他打算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并开列出所需书籍的清单。清单中的书，有的是写作需要的参考书，有些书名则是作为暗语询问彼得堡“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成员是否

被捕的事情。如：“维·维：《俄国资本主义命运》指的是斯塔尔科夫，因为斯塔尔科夫叫“维·维”。信中写道：“请把《混乱时期英雄传》寄来，是询问绰号“米宁（地雷）”的瓦涅也夫，绰号叫波扎尔斯基（“烈火”）的西尔文的情况，答复是“只有第一卷，没有第二卷”，或者“地雷取走了，烈火仍在燃烧”就指明瓦涅也夫已被捕了，西尔文安然无恙。信中要求寄一本布勒姆的《论小啮齿动物》，就是探问化名为苏斯利克（“黄鼠”）的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情况，信中说要借一本麦因·李德写的书《鳗鱼》，就是打听化名“鱼”的克鲁普斯卡娅的情况。西尔文在把信送给安娜·伊里奇娜的同时，说他已把现在的情况转告了列宁。

列宁在狱中还为工人们撰写许多小册子和传单，让彼得堡“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去出版和发行。1896年4月，他撰写了纪念“五·一”劳动节的传单。5月他为工人们写了通俗小册子《论罢工》，这本小册子在“民意党”的拉赫塔印刷所印刷被警察搜去销毁了。12月初，彼得堡“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印发了他写的传单《告沙皇政府》。

列宁创造了一些十分独特的与亲友、战支进行联系的方法。一种办法是在书刊上就某一行字，用黑点与短线标出一些字母，并用事先约定的记号标出

写有秘密书信中的报刊页码，找出从狱中送出的有关报刊一读便知。另一种办法，是用牛奶当墨水把文稿和书信写在报刊的行文中间，只要用火一烤或热水一烫，字迹就会清楚地显现出来。为了防止暴露，书写时把牛奶放在用面包制成的“墨水瓶”里，一旦被看守发现，就把“墨水瓶”吞下去。

有一次，看守从窗户外看到列宁正在写字，开门走进牢房问列宁：“您在写什么？让我看看。”列宁一点也不紧张，从容不迫地把墨水瓶放到嘴里，开始吃起来。

看守惊讶地说：“你怎么吃墨水瓶呢？”

列宁十分镇静地回答说：“这是面包，不是墨水瓶。”

看守仔细一看的确是面包，无可奈何地走开了。

有一天，列宁风趣地对前来看望他的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说：“今天真不走运，一连吃下了六个墨水瓶。”

利用在院子里放风的机会，列宁还经常按照事先约定的密码同被关押的战友进行交谈。有一次，他带着特别愉快而又紧张的神情对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打着带密码的手势说：“霍霍尔就在你下面！”霍霍尔是指被逮捕的拉德琴柯。于是，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立即通过楼上楼下暖气管的楼头空隙与拉德琴柯进行

了联系。监狱做了一件蠢事，未把这两个同案犯用一间牢房隔开。结果审判时，这两位犯人的口供简直一模一样，而且他们对案件的诉讼进程也了若指掌。

有时候，列宁把便条用黑面包贴在给犯人放风的院子里围栏的木板条上，鼓励狱中战友坚定斗争信心。列宁通过秘密书信，让“未婚妻”来看望某位犯人，让“亲友”来探监，“时常”给某位犯人送衣服和鞋子来。这些犯人的“未婚妻”和“亲友”。往往是革命战友装扮的。他还用敲打墙壁的暗号与隔壁的战友交谈，甚至用这种方法同斯塔尔科夫下象棋。有时还用这各种方法给关押在同一监狱的战友传递书信，给他们带来了同志的温暖和斗争的信心。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回忆说：“关于我们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狱中频繁通信的内容，我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了，但有一点是记得很清楚的：收到他的信，读完以后，等于服一种特别有效的强身提神的饮料，这就是说，精神立刻就振作起来了。这个人拥有巨大的精神财富，善于用适当的方式从必要的方面去影响缺少这种财富的其他人的情绪。单是这些品质，就使他在任何情况下，特别是在监狱里，成为一个无法代替的人。”

列宁被关押在拘留所期间，亲友每周可探两次监。一次是星期一，单独会见半小时，往往是母亲和

玛丽娅·伊里尼奇娜来看望他。一次是星期四，一般性会见只能隔着铁栏说话，一小时，常常是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来看望他。探监时，有两个看守在场监视，一个站在关着犯人的铁栏后面，一个站在探监者的前面。在探监时，由于声音嘈杂，加之看守大都愚蠢无能、厌倦腻烦，列宁只要略施小计，在看守面前就可以做到无话不谈。

列宁同前来探望的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会面时，谈话内容十分丰富。他隔着铁栏同姐姐用暗语交谈，当遇到“罢工”、“传单”等不便于明说的词语时，便说外语。双方都动脑相互交换信息。有时候，当对方终于听懂一段十分复杂的话时，常常乐得大笑起来。有一次，姐姐说外语单词太多，站在列宁背后的看守便厉声训斥道：

“不许用外语讲话，只许用俄语。”

“不许吗，”列宁一边朝看守转过身去，一边脱口回答说，“好吧，我就说俄语。那么，你这位金人……”继续同姐姐交谈下去。姐姐笑着点了点头，知道金人讲的是戈尔德曼语。

监狱还允许亲人每周给列宁送三次饭，送两次书。往监狱里送书刊，不是由看守检查，而是由拘留所附近的法院检察官检查，以防止“有害”书籍进入监狱。拘留所还有一个由各方捐赠建立的图书馆，犯

人也可以从这个图书馆里借阅书刊。列宁已做好长期住牢的准备，所以想利用这段时期写作《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一书，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起草党纲，因此他需要翻阅大量的书刊。姐姐接到列宁开列的书单后，从科学院、大学和自由经济学会的图书馆借来了各种著作和统计资料，及时地送给弟弟，因此列宁的牢房里时常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

列宁在狱中很思念自己的未婚妻和战友，他给克鲁普斯卡娅写了一个密码便条，请她和雅库波娃于每天下午 2 时 15 分放风时，到什帕列尔街来，站在一个地方，以便使他够能从走廊上的一个窗子里看他们一会儿。不知为什么，雅库波娃没有去，只有克鲁普斯卡娅去了好几次。

在列宁的牢房里，靠近墙边固定着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条方凳。他每天主要时间就是坐在方凳上看书和写作。他在狱中为撰写《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一书，认真读了大量的著作和统计资料汇编，作摘录，进行资料整理。

为筹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大会，列宁于 1895 年底在狱中写出了《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这份文件的草稿用牛奶写在一本公开出版的书籍的字里行间。安娜·伊里尼奇娜在第一次去监狱房取这本书时，看守十分干脆地对她说：“没有您的书。”前次探

监时，列宁告诉她还的书已交给监狱管理人员。安娜·伊里尼奇娜感到万分焦急，一怕监狱管理人员检查这本书时发现破绽，二怕写字的牛奶太浓，时间一长，文字会显现出来。回到家里她一夜都没睡好，一直等到第二天天亮，她终于从监狱里取回了那本书，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1896年6—7月，列宁写了《社会民主党纲说明》，他把这份草稿与用工整的字抄写的统计数字表格和读书摘录笔记放在一起。一个宪兵军官来到他房间，进行了例行检查。他来到墙角，翻了一会儿堆在那里的书籍、表格和抄录，非常不耐烦地说：“今天天气太热了，不适宜研究统计数字。”敷衍一下就走了。列宁对这种检查方式很放心，因为在一大堆书籍和报纸里，宪兵军官是很难看出疑点的。他笑着说：“我的条件比其他人都优越得多，反正已经坐牢，已经不会有再逮捕的危险了。”1896年冬天，在一次大逮捕后，姐姐未能按时去探监，在最后一班才赶到。列宁以为姐姐已经被逮捕，于是就把已写成的一份文稿毁掉了。

列宁在狱中写的文稿，一般都转交给克鲁普斯卡娅显影，誊写，克鲁普斯卡娅被捕之后，便改由他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来誊写。列宁写的党纲草案和说明的一部分是由克鲁普斯卡娅誊写的。克鲁普

斯卡娅被捕后，安娜·伊里尼奇娜继续誊写了党纲草案说明的另一部分。克鲁普斯卡娅为了保存列宁的文稿，还请了一位会做木工活的战友，按照列宁的设计制作了一张小圆桌。这张桌子有一个粗的独腿，下面有个旋出来的大底盘，底盘上有可以拧开的螺丝口，桌子腿中间挖空了，可以放许多卷纸。克鲁普斯卡娅把誊清的列宁文稿放在这条桌子腿里保管，把原稿小心地处理掉了。

监狱里的环境十分恶劣，警察当局想方设法残酷地折磨这些被捕的革命者。扎波罗热茨坐牢不到一年，精神就失常了。瓦涅也夫也得了严重的肺结核病，出狱后到流放的西伯利亚，不久，就惨死在那里。列宁在监狱里也被折磨得面黄肌瘦，脸色很难看，但他的胃病比入狱前有所好转。母亲遵照医师的意见，给他调理了膳食，每周送三次饭，列宁在狱中还订了牛奶。列宁在狱中除看书和写作外，还注意锻炼身体，保证足够的睡眠。1896年1月24日，他在给姐姐的信中说：“我的身体很好。我在这里也能得到矿泉水，因为他们可按照我定购的日期，当天从药房里给我取来。我每天睡眠9个小时左右，并且梦见了未来著作的各个章节。”他后来在回忆这段狱中生活时说道：“每天临睡前做体操是很愉快很有益处的。即使在最冷的天气，在整个囚房里寒气袭人的时候，只

要活动，也会感到温暖，过后睡觉也舒服得多。”接着他介绍了他创造的奇特的做体操的方式：“行 50 次鞠躬礼。我给自己规定的就是这种课程。看守从窗洞中望进来，看见一个从来不肯到拘留所教堂里去的人，突然变得如此虔诚起来，使他不胜惊异，而我并不感到难为情。但是，至少我连续 50 次，每次手要碰地，同时腿不能弯曲。”在临睡前，列宁用阅读小说来进行消遣，调节神经。

列宁在狱中高兴地得知：彼得堡 3 万多纺织工人于 1896 年夏天举行了大罢工，在一个月的罢工期间，彼得堡“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雏型，在这次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先后印发了 13 种传单，其中有《纪念五·一》、《告俄国政府》等。列宁后来回忆说：“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写作活动是无产阶级发动的斗争，即 1896 年举行的有名的彼得堡罢工的直接序幕。这些罢工为后来整个革命中最强大的因素即工人运动的不断高涨开辟了新纪元。”

就在这时，列宁在狱中的斗争生活即将结束了，他将要被流放到荒凉的西伯利亚，和已被流放在那里的战友们生活在一起，共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大事。

第九章 流放边疆

列宁是我们党的山鹰。

——斯大林

1897年2月25日，沙皇政府向列宁宣读了把他流放西伯利亚、受警察监视、为期三年的最高“命令”。同时，他被释放出狱。列宁对此不以为然，并稍带遗憾的口气说：“要是在监狱里能再蹲上一段时间，我就可以彻底完成我的著作了……。”他指的是已着手写的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此时还未写成。

经母亲各处奔走，获准不必以从一个监狱押送到另一个监狱的方式被遣送到西伯利亚，而自费乘车前往西伯利亚，这可以大大地减少旅途奔波的痛苦和精力的消耗。同时列宁还获准可以在彼得堡逗留5天，在莫斯科逗留4天。

在列宁获释的那天。彼得堡“无产阶级解放斗争

协会”会员们感到欢欣鼓舞，雅库波娃则跑到列宁的住处，热烈地亲吻列宁，悲喜交加，又哭又笑。

列宁利用彼得堡“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被判流放的会员在首都逗留几天的机会，两次召集“斗争协会”会员开会。在会上，和列宁一起被捕的“老年派”会员瓦涅也夫、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扎波罗热茨等，同狱外的青年派会员发生热烈的争论。青年派会员具有浓厚的经济主义倾向，反对建立政党，组织与领导工人进行争取政治自由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主张建立工人基金会，只组织工人进行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经济斗争，重蹈英国工联主义的道路。列宁也参加了这场争论，并同与他观点对立的雅库波娃争吵起来。雅库波娃一直很看重列宁，为他的获释而感到欣喜若狂，因此她为发生这场争吵而难过得哭了起来。

列宁是3月1日从彼得堡启程的。在启程前几天，他同即将出发去流放地的彼得堡“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会员瓦涅也夫、扎波罗热茨、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亚·列·马尔琴科、马尔托夫、斯塔尔科夫一起照相留念，自己也单独照了相。经允许，列宁在母亲这里住了几天，除陪伴母亲外，他还会见革命战友，并到鲁勉采夫博物馆图书馆阅览室查阅书刊，继续收集、整理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资料。

3月17日下午2时30分，列宁在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姐姐安娜·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和姐夫的陪同下乘坐火车去西伯利亚流放地。火车到达图拉站之后，母亲、妹妹、姐姐和姐夫下了车，同伊里奇依依惜别。剩下的漫长的旅途是列宁自己走完的，他从鄂毕车站给母亲写信说：“我刚走完的西伯利亚铁路所经过的整个地区（从车里雅宾斯克到克里沃舍夫1300俄里，3昼夜行程），没有城市，村庄很少，偶而看到一片森林，其余全是草原。3天以来，整日看到的就是白雪和天空。”

3月16日，列宁到达了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他在此滞留二个月，为的是等待当局指定流放地点，等待河道积冰融化才可坐轮船前往西伯利亚。列宁住在大卡钦斯要街克·加·波波家，结识了一些流放在这里的社会民主主义者。4月16日他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站迎接被流放在这里的彼得堡“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战友瓦涅也夫、克尔扎诺夫斯基、马尔托夫和斯塔尔科夫。

在这期间，政府机构的拖拉作风使列宁迟迟未接到有关流放地的指令，因此使他有了许多空闲时间。经人介绍，列宁经常步行到当地商人、藏书家格·瓦·尤金私人图书馆去，查阅书刊，做研究工作。

这个私人图书馆距市区二俄里左右，有各类图书 8 万册，藏有自 18 世纪以来的各种杂志的合订本。1907 年尤金以 10 万卢布把 8 万册书卖给了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图书馆。能在这个地区看到如此丰富的图书不能不使列宁感到异常惊喜。此外，列宁还时常到市图书馆去阅览图书杂志。

列宁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会见了十分崇敬的马克思主义者弗多谢耶夫。弗多谢耶夫当时被关押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等待流放到西伯利亚。会见是这样安排的：有几位战友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监狱释放出来要前往流放地，因把东西忘在了监狱，第二天坐马车回监狱去取。列宁装扮成马车夫。这几位犯人来到监狱库房，要求见一见政治犯的“班长”弗多谢耶夫。在往车上装东西时，列宁设法同弗多谢耶夫进行会面和谈话，列宁终于见到了这位他早年加入的马克思主义组织的负责人，了却了他梦寐以求的一桩心愿。

最终，列宁的流放地点被确定为叶尼塞省米努辛斯克州的舒申斯克村。5 月 12 日，他和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斯塔尔科夫一起乘“圣尼古拉”号轮船启程前往米努辛斯克，路上整整走了一个星期。然后，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斯塔尔科夫去捷辛斯克村，列宁则在两个宪兵押送下骑马去舒申斯克村。尽管列宁

此时也处在困顿潦倒的境地，但在旅途中还是尽力给同行的流放者们关心和照料，特别是那些流亡者。他那充满信心和蔼可亲的声音和笑容深深地感染了与他在一起的每一个人。5月8日，列宁到达了舒申斯克村，被安置在一个农民房子里。

舒申斯克村是一个偏僻荒凉的村庄，离村子600俄里之外才有铁路，19世纪30—50年代，十二月党人曾被流放在这里，从那以后，这里就成了被世界遗忘了的角落。在给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的信中，列宁细致地描绘了舒申斯克村，他写道：“村子很大，几条街道都非常脏，尘土很多——完全是通常所想象的那样的农村。它在草原上，没有果木，甚至可以说是一片不毛之地。村子四周……堆满了牲口粪；这里的人不把牲口粪运到城里去，就那样堆在村子周围，所以要出村子，总得经过粪堆。村边有一条名叫舒什的小河，现在河水已经变得很浅了。在离村子（确切地说，是离我住的地方，因为村子很大）大约一俄里到一俄里半的地方，舒什河流入叶尼塞河。叶尼塞河在这里形成了许多小支流，所以没有通往叶尼塞河主流的通路。我常在一条最大的支流里游水，但是这条支流现在也很快变浅了。村子的另一边（与舒什河相反的方向）大约一俄里半的地方，有一片‘森林’，农民们郑重地称它为‘森林’，而实际上只

不过是一片很不像样的、横遭砍伐的小树林；那里就连一片比较大的树荫也找不到（但是草莓却很多），这和西伯利亚原始森林毫无共同之点。……谈到山……所以你问我‘爬过什么山？’我只能回答说：爬过所谓‘森林’里的小沙丘，说实在的，这里沙土真是不少。”

列宁住房里的设施非常简陋，只放着一张木床、一个桌子和四把椅子。他每个月的津贴是 8 个卢布，是他的全部生活费用。他对物质生活没有过高的要求，对精神食粮的缺乏却很恼丧。因为俄国中心地区到这里，邮件在路上要走十几天，村子里没有一个人订报纸，而他订的《俄罗斯新闻》直到 6 月中旬才收到，他如饥似渴地读起来。这种情况使他感到这里似乎是一片文化的荒漠。

在舒申斯克村被流放的只有两个工人，一个是波兰的社会民主党人、制帽工人伊·卢·普卢敏斯基，他带有妻子和 6 个孩子；另一位是普梯洛工厂的工人、芬兰人奥·亚·恩格贝尔格，他因在罢工期间反抗警察而遭流放。列宁同他们处得很好，他还同恩格贝尔格一起把德文版《共产党宣言》译成俄文，共同读《资本论》。列宁给家里写信，请他们把所有的带插图的儿童读物寄来，送给普卢敏斯基的孩子。他在流放期满时，分别送给每位工人一张有签名的照

片。

列宁来到舒申斯克村不久，就同村子里的农民交上了朋友，同他们打成一片。他有两个最要好的朋友，一位名叫茹拉夫廖夫，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独立思考精神，敢于反对富豪，仇视任何不公平的现象。另一位农民朋友叫索斯巴迪奇，列宁常同他一起打猎，给他讲一些革命道理，而他则常给列宁送来野鸭、松籽等山货。在舒申斯克村列宁同当地的农民兄弟们处得很好，农民给了他许多帮助，而他也尽自己的所能帮助他们。比如，列宁是当过律师的，他就利用这项专长，为农民们进行法律咨询，以便同当局和地主老财做斗争。有一次，列宁帮助一名被金矿开除的工人打赢了官司，金矿主被迫给这名工人如数地照发工资。这个消息一传开，附近许多的农民都来找列宁，请他帮助打官司，或者向他倾诉心中的委屈，农民们对列宁也更加尊重了。1922年3月17日他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说：“我想起25年前流放在西伯利亚时我当律师的事情。那时我是个黑律师，因为我是被放逐的国事犯，不准当律师，可是没有别的人，大家只好到我这里来陈诉某些事情。”

通过广泛地与农民交朋友，列宁更全面深刻地了解了当时俄国农村的经济状况与阶级关系。有一次，一个农民兄弟告诉他这样一件事：舒申斯克村一

个富裕农民家的一张皮子被一个雇农偷去了，他在河边抓住了那个雇农，并把他活活打死了。列宁通过这件事，深深地认识到小私有者的自私自利和对雇农的残酷剥削压迫。

1898年5月19日，克鲁普斯卡娅同她的母亲一起来到了舒申斯克村。

克鲁普斯卡娅在1896年11月第二次被捕后，与列宁关在同一个拘留所里，他们通过探监的亲属彼此通信。当列宁流放时，克鲁普斯卡娅仍关在狱中。在动身去西伯利亚之前，列宁用“化学药水”给克鲁普斯卡娅写了一封信，正式向她求婚。列宁的母亲对克鲁普斯卡娅很熟悉，见过多次面，很喜欢这个忠诚贤慧的姑娘，非常支持儿子的选择。

1897年3月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克鲁普斯卡娅的命运——被关在彼得——保罗要塞特鲁茨监狱的年轻女学生薇特罗娃，因不堪宪兵侮辱，身浇煤油自焚。这件事震动了社会各界，为安抚舆论，政府当局不得不释放了包括克鲁普斯卡娅在内的9名女政治犯。1897年12月克鲁普斯卡娅被判决流放乌法省3年，她立即给当局写信，申请去舒申斯克村，理由是她要嫁给流放在该村的弗·伊·乌里扬诺夫。自从与列宁相识以来，克鲁普斯卡娅深深地爱着列宁，列宁动身去西伯利亚之前，她用一句简短而幽默的话

回答了列宁的求婚说：“那好吧，作妻子就作妻子吧！”后来漫长的生活岁月里，夫妻俩常常幸福地回忆起这句简短而又情谊深重的回答。4月中旬克鲁普斯卡娅要求得到批准后，她立即和母亲启程，先后乘火车和轮船，在路上颠簸了一个多月，才到达舒申斯克村。她给列宁带来大量的书籍，还有一个读书用的一盏有绿色灯罩的灯。

克鲁普斯卡娅和母亲来到舒申斯克村时已是黄昏了，列宁打猎还未回来。主人把她们领到一间木房子里，地板上铺着当地自制的地毯，墙壁粉刷得干净洁白，屋子里还点缀着银松和冷杉。列宁住的房间虽然不大，但显得十分干净整洁——这是他从小养成的生活习惯。邻居们都来了，挤满了屋子，他们仔细地打量着这母女俩，特别对克鲁普斯卡娅修长匀称的身材和蓬松的长辫子赞赏不已，他们还亲切地询问她们许多有趣的问题。过了一会儿，列宁回来了，他看到自己的房间里亮起了灯，感到很奇怪。列宁很快跑上台阶，克鲁普斯卡娅和母亲赶紧走出屋来迎接。鲁普斯卡娅眼里噙满了泪水，紧紧地抓着列宁的手，既兴奋又激动，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在异地他乡，久别重逢心里话儿说也说不完。克鲁普斯卡娅向列宁谈了她母女俩路过莫斯科去看望列宁的母亲及姐妹的情形，详细介绍了彼得堡和全国各地革命组

织开展活动情况以及 1898 年 3 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喜讯。

克鲁普斯卡娅来到舒申斯克村不久，地方当局向她提出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警告：如果不立即结婚，就把她送回乌发省。可是，当局因为找到列宁的个人档案，又不允许他们马上结婚。

事情拖到了 1898 年 7 月 22 日，列宁同鲁普斯卡娅终于在教堂举行了结婚仪式，村民斯·阿·叶尔莫拉也夫、斯·恩·茹拉夫廖夫等作为证婚人。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虽然都不信教，但在当时只有履行宗教手续的婚姻才被认为是合法的。就这样，这对患难之交结成了美满的伴侣。他们决心终身相爱，相守到老，为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奉献出自己宝贵的一生。

他们结婚后，列宁和鲁普斯卡娅把家搬到寡妇彼得堡罗娃的家里，每月房租 4 个卢布。他们有一个菜园，菜园里种着黄瓜、胡萝卜、甜菜、南瓜等各种蔬菜，还有一个长着蛇麻草等各种花卉的小花园。后来，他们还雇了一个小女孩巴莎帮助料理家务。巴莎只有 13 岁，但干活非常干净利落，列宁夫妇很喜欢她，经常教她读书识字。克鲁普斯卡娅刚到农村时，不会用俄罗斯式的炉子做饭，有一次用火筷子把面片汤弄洒了。但她很快就习惯了，母亲伊丽莎白·瓦

西里也夫娜也帮助料理家务，她很疼爱女儿和女婿，列宁也非常尊重这位勤劳善良的岳母。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互敬互爱，婚后生活过得十分美满。

舒申斯克村的东西很便宜，一个人的时候，列宁用 8 个卢布就可以租到一间干净的房子，而且有饭吃，有人洗补衣裤。主人一个星期还给他宰一只羊，吃完为止，吃完羊肉而且又给买牛肉，只是不太卫生——主人习惯于在喂牲畜的木槽里把牛肉切碎成肉饼。为了打猎和看这护院，列宁还养了一只名叫“荏卡”的漂亮的哥尔顿种狗，列宁教它学会了叼物、直立等动作。结婚后，列宁夫妇月津贴为 16 个卢布，比他一个人时生活得更好些。

列宁夫妇婚后的生活是愉快和丰富的。休息时候，他们喜欢去田野或林间散步，夏天去河里游泳，冬天则去溜冰。列宁一直酷爱打猎，他请母亲给他寄来了一只猎枪，他用粗劣的皮子做了一条皮裤，泥里雪里，他都穿着这条皮裤去追逐猎物。有时他还用树枝自制的棋子下象棋。他给弟弟德·伊·乌里扬诺夫的信中写道：“目前我对于滑冰非常热心。格列勃（指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编者注）在来努萨给我表演了各种花样（他滑得很好），我学得很起劲，有一回竟跌伤了手，有一两天不能写字，可是老本领总是忘不掉的。滑冰运动远比冬天打猎好得多，冬天打猎往

往陷入没膝的雪中，把猎枪搞坏……而野鸟却不常看见！”

列宁夫妇的蜜月生活是浪漫而富有情趣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因美满幸福的婚姻生活而忘记他们身负的艰辛使命。列宁虽然被流放到了祖国寒冷的边陲，几千公里的荒漠和密林把他同中心城市火热的革命斗争分离开来，但是他的心仍在时刻牵挂着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他决心在流放期间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完成他正在撰写的关于俄国经济状况的著述，并为俄国无产阶级的建党工作做准备。

列宁在这一时期读的书很多，也非常系统。他认真地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理论著作和几十本关于哲学、政治经济学的书，其中有黑格尔、康德和法国怪物思想家的哲学著作。在闲暇和困倦的时候，他还喜欢读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列夫·托尔斯泰等优秀古典作家的作品，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更是爱不释手。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相片簿里，除了亲人和流放的老战友的相片之外，有马克思、恩格斯及皮萨列夫、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艾·左拉的相片。

列宁通过书信、走访、集会等方式，同流放在西伯利亚的战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共同学习革命理

论，讨论国家的重大问题，为同志们排忧解难。

列宁常去看望被流放在周围地区的战友，时常以庆贺新年、婚礼、生日等为名举行聚会，讨论一些重要问题。1897年10月9—10日，列宁去米努辛斯克，在那里会见了1863年波兰起义参加者、华沙工人姆·符·勃热耶夫斯基、著名革命工人运动活动家弗·雅·柯思及著名的民意党人阿·弗·梯尔柯夫等，回来顺路来到捷辛斯克村，同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斯塔尔科夫一起，住了五天，进行了亲密的交谈，还一块儿去打猎。11月，列宁未经批准，又去了一次米努辛斯克，结果受到了当局的训斥和处分。1898年9月列宁去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住了几天，同流放该地的政治犯会面，讨论了有关国内革命斗争的情况和流放地的一些新闻。

列宁想去捷辛斯克看望流放在那里的战友，但想不出适当的理由，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说该地有一座有地质价值的山可进行考察，于是列宁立即向米努辛斯克警察局长提出申请，结果获得了批准，警察局长派人给他送来了许可证。列宁夫妇在捷辛斯克住了几天。随后他们又去了米努辛斯克专区伊万诺夫卡村，看望了流放在这个村并担任糖厂化学工程师的社会民主党人维·康·库尔纳托夫斯基，顺便参观了他所在的糖厂。在这里，列宁亲眼目睹了糖厂

工人的悲惨处境，工人们的劳动条件极为恶劣，生活水平低下得令人吃惊。

1899年，列宁夫妇同流放的工人奥·亚·恩格别尔格、伊·卢·普罗敏斯基一起，愉快地欢度了“五·一”劳动节。

“五·一”劳动节早晨，普罗敏斯基换上了干净的衣服，来找列宁，高兴得像过圣诞节一样。列宁夫妇也受到了这种情绪的感染，带着小狗“荏卡”一起到恩格别尔格那里去。他们一行顺着河边走，小狗跑在前边，不停地高兴地叫着。河水里漂浮着许多冰块，小狗在冰冷的水里游着，向村子里许多毛茸茸的看家狗示威地狂吠，那些看家狗不敢到这样冷的河里去。恩格别尔格见来了三位朋友，非常兴奋，四位流放者一起用俄语唱起了欢乐的革命歌曲：

五月快乐的一天来到了，
忧愁的影子躲开道！
响起来吧，勇敢的歌声！
我们要在这一天来罢工！
警察干着下贱的勾当，
累得汗流满面，
想把我们捉住，
投进监狱。

我们根本没把这个看在眼里，
庆祝五月，我们勇敢大胆，
大家齐心协力，
干吧，干吧！”

他们用俄语唱了一遍，又用波兰语唱了一遍。大家又到野外，爬上一个干燥的小土丘，普罗敏斯基的两个儿子也来了。普罗敏斯基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红色的手帕，铺在地上，来了一个倒立，孩子们高兴地拍手欢呼。晚上，大家又到列宁家里跳舞唱歌，普罗敏斯基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的母亲也参加了进来。夜里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兴奋得久久不能入睡，他们渴望有一天能够参加工人阶级政权组织的庆祝“五·一”劳动节的示威游行。

列宁同流放的战友们在一起有欢乐，也有忧愁。1898年7月流放在维尔霍连斯克的弗多谢耶夫因不堪迫害、贫困用左轮手枪自杀了。列宁流放到西伯利亚后经常和他通信，两人私交甚笃，因此列宁对他的死深感悲痛。弗多谢耶夫临死前的全部手稿交给好友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并叮嘱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转告列宁：他是对生活充满了坚定的信心“而死去的，并不是由于绝望”而自杀。

过了一年，被流放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想捐款为

弗多谢耶夫建一座纪念碑，但商议此事的来往信件被警察查获。1899年5月14日，警察来列宁家里搜查。列宁给警察搬来了一把椅子，请他们先从书厨的搁板上边搜查，那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统计资料。警察搜查累了，问书厨下层搁板上放的是什么东西？列宁说是一些教育书籍，这样他们连看也没看就走了。其实列宁的重要文稿与书信就放在书厨的下层搁板上。

1899年9月22日，列宁在斯科耶夫参加了彼得堡“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成员瓦涅也夫的葬礼，并在他墓前发表了演说，他是因肺结核病而死的。

流放时期，列宁继续为在俄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为了实现这一重要目标，他与国际上的伯恩施坦主义、国内的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进行了艰苦激烈的斗争。

第十章 捍卫真理

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旗帜。

——列宁

1898—1899 年期间，列宁同流放在西伯利亚的弗林格尼克进行了长时间的通信，就休谟的怀疑主义和康德的哲学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刻的讨论，但十分可惜的是这些珍贵的信件后来都丢失了。弗林格尼克以后回忆说：“我至今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回信中，总是以休谟怀疑主义、康德唯心主义的坚决反对者的身份，拿马克思、恩格斯朝气蓬勃的哲学同它们作比较，非常委婉但又十分明确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在列宁的巨大影响下，弗林格尼克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后来成了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西伯利亚流放中，列宁从克鲁普斯卡娅那里得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

开的消息。1898年1月13日—15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明斯克市郊的一所木房子举行。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来自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待市的“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工人报》（基辅）编辑部和“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崩得），共9人。列宁和马尔托夫被彼得堡“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推举为出席大会的代表，但因流放在西伯利亚未能出席。大会通过了由司徒卢威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该《宣言》指出：“俄国无产阶级将摆脱专制制度的桎梏，用更大的毅力去继续同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作斗争，一直斗争到社会主义全胜为止。”

会后不久，出席代表大会的9名代表中有5位被捕，其中包括党中央委员爱杰尔曼。这样一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被破坏，党没有了中央领导机构，只存在一些互不联系的分散的地方党组织。

为了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真正建设成为俄国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必须正确地认识俄国国情，正确地规定俄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革命任务。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列宁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列宁认为，民粹派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

派别，它的理论对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有巨大危害性，它会解除附近工人阶级的思想武装，涣散革命队伍。因此，只有把它的理论彻底摧毁，才能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扫除障碍。于是，早在彼得堡的监狱之中他就着手了这件工作——写作《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一书。列宁力图在这本书中证明：为了建立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和进行反对封建专制的胜利斗争，俄国已经具备了一切前提条件。

流放到西伯利亚之后，列宁继续从事这一研究工作，委托亲友从彼得堡和莫斯科借阅和购置了大量的书籍与资料。列宁的妹妹按照他的委托，从莫斯科鲁勉采夫图书馆的各种书籍中作了摘录，列宁于1897年5月收到这些摘录。由于掌握的资料很丰富，流放生活也有充分的时间，所以写作的进度很快。1898年8月列宁写完《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稿。接着对初稿进行了修改，同年11月寄给住在波多尔斯克的母亲，请姐姐转交给出版社。1899年2月11日，列宁修改完该书的最后两章和附录，2月15日寄给母亲，请她转交出版社。该书手稿曾在流放在米努辛斯克地区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中间传阅和讨论，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1899年4月5—12日，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在彼得堡出版了，署名为“弗拉基米尔·伊林”，印数2400册，

很快销售一空，成了当时俄国革命者的一本必读书。

列宁的这部著作不仅是写给专家看的，更主要是写给知识分子和工人看的。关于此书的书名，他原来主张用“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不同意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认为这个书名太宽泛，口气也太大。但出版社认为用后一个标题，书销路会更好一些，列宁只好同意，但他又加上一个副标题“大工业国内市场形成的过程”，书名虽长，可是通俗易懂，容易让读者理解。

列宁这部著作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分析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的产物，是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思想在俄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他运用大量事实和数字指明资本主义经济已在俄国得到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已经形成，村社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冲击下，已经解体。农民分化成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两个对立的阶级。他认为，改革后的俄国已因由木柄犁和链枷、水磨和手工业织布机开始成为铁犁和脱谷机、蒸气机织布机的俄国。但俄国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水平还很低，速度还很慢。列宁认为，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是缓慢的，“因为没有一个是资本主义国家内残存着这样多的旧制度，这些旧制度是与资本主义不相容的，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是使生产者状况

无限制地恶化的，而生产者‘不仅苦于资本主义，并且苦于资本主义不够发达’。”

列宁既驳斥了否认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事实的民粹派，也批判了美化资本主义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并指出，俄国的无产阶级队伍已经空前地壮大起来，工人阶级反对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日益发展，他们是俄国革命事业的领导者，而广大的农民阶级则是他们可行的同盟者。列宁写道：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活状况“……便要人去思索，把一种空泛的迟纯的不满，转变成一种自觉的抗议，把细小琐碎的以及没有什么意义的闹事，转变成为一种争取全体劳动人民解放的有组织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正是从这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的生存条件中汲取它的力量的，因而可以有把握得到一定的成功。”

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列宁以翔实的资料和科学的论证，正确地阐明了俄国经济发展所要走的道路，为俄国革命运动制定正确的纲领和策略提供了依据。

列宁在流放西伯利亚期间还写了一些文章，集中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革命任务和加强党的建设的计划。

1897年末，列宁写成小册子《俄国社会主义者的任务》，1898年由“劳动解放社”在日内瓦第一次出

版。在这本书中，列宁详细地论述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所面临的基本任务，即社会主义革命和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俄国的革命者应该深入到产业工人中间开展工作，因为他们最容易接受社会主义。但同时决不能忽视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工人阶级必须支持农民反对封建压迫的革命斗争。书中，列宁还明确指出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

1898年9月21日—27日在彼得堡出版了列宁的第一本论文集《经济评论集》，署名也是“弗拉基米尔·伊林”，印数1200册。文集收入了他在1897——1898年流放时写的几篇文章：“弗拉基米尔·伊林”的频繁活动引起了当局的高度关注，警方着手进行了秘密调查，他们在1898年11份的一份报告中写道：“知道他的真实姓名的人不多，因为社会民主党人对此极为保密，保护这个作者就是保护他们的首领之一。实际上，他是政治流放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是1887年被处死刑的恐怖分子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的亲兄弟。”

1899年秋天，列宁接受崩得中央委员会的邀请：参加俄国社会工党中央机关报《工人报》的编辑工作，并为该报撰稿。他先后为该报写了三篇文章《我

们的纲领》、《我们的当前任务》、《迫切的问题》，另外，还有一封《给编辑部的信》。在这些文章里，列宁再一次阐明了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计划。

列宁在《我们的纲领》一文中指出，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无产阶级政党才能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担负领导起革命的任务，正确引导人民进行反对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最终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起社会主义美好的制度。

列宁特别强调了一个重要的原理：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以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他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以为，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理论，而这些原理的应用，部分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不同于俄国。”

然而，就在列宁潜心研究和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加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时候，国际工人运动出现了一股修正主义的思潮，它来势凶猛，对各国的工人运动都产生了消极影响。

1895 年恩格斯逝世之后，国际社会主义党人的右翼分子，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肆意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德国社会主义党人爱德华·伯恩施坦是其典型代表，他于 1896—1898 年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问题》的一组文章，兜售其错误观点。1899 年 3 月，他出版了系统阐述其观点的著作《社会主义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他在这本修正主义的代表作中，自命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叫嚣马克思主义某些重要原理已经“过时”，要对它进行系统的“修正”。他否认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社会发展规律，鼓吹改良观点，诱使工人阶级放弃革命斗争，放弃无产阶级专政，认为只要进行斗争取得胜利。他提出的臭名昭著的口号就是：“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出现之后，在俄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但欧洲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并没有立刻认识到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危险性。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威廉·李卜克内西说，伯恩施坦主义是“儿童的愚蠢”和“无害的哲学说”，没有必要化费时间去批判它。法国工人党领导人保尔·拉法格认为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修正”是“理智和疲劳过度”

的结果。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弗兰茨·梅林则说：“修正主义在工人群众中从来未能站稳脚跟，它对工人群众实际运动根本没有产生丝毫影响。无产阶级斗争十分顽强，不会因为单纯的思潮而停止不前。”当时作为《新时代》杂志主编的卡尔·考茨基，甚至一度只允许该杂志刊登伯恩斯坦贩卖修正主义理论的论文，不许发表批判伯恩斯坦的文章。

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劳动解放社”的领导人普列汉诺夫开始对伯恩斯坦的批判也表现得谨小慎微，犹豫不决。但当他看清了伯恩斯坦主义造成的巨大危害后，便于1898年春末夏初先后在日内瓦和罗马作了《论所谓马克思主义危机》的讲演，第一次正式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公开宣战。接着他在1898年7月《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论文《伯恩斯坦与唯物主义》；同年10月在该杂志上发表第二篇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论文《康拉德·施米特反对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9年2月，他又在该杂志上发表他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论文《唯物主义还是康德主义？》。

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出现引起了列宁的关注和愤怒，他开始搜集有关书刊和资料，其中包括伯恩斯坦本人的著作和对他的一些批判文章，准备向伯恩

施坦修正主义宣战。当他收到亲友寄来的刊登普列汉诺夫批判伯恩施坦的《新时代》杂志后，立刻认真地阅读研究。1899年，他又阅读了发表在同年《法兰克福报》上的对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程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的几篇评论文章。1899年9月列宁先后收到姐姐寄来的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程和民主党的任务》和弗·梅林的第一、二卷《德国社会民主党史》。1899年夏季，列宁重读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其目的是为弄清新康德主义的实质，进而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

列宁坚决支持普汉诺夫对伯恩施坦的批判。在1899年7月2日给兹德·伊·乌里扬诺夫的信中，他谈到1896年出版的普列汉诺夫《唯物主义史论丛》一书时，说：“《唯物主义史论丛》的作者完全正确，他认为新康德主义是反动资产阶级的反动理论，并且起来反对伯恩施坦。”同年7月9日，列宁在给亚·尼·波特列索夫的信中谈到普列汉诺夫批判伯恩施坦的文章时指出：“我非常满意地一再阅读了《唯物主义史论丛》，谈了这位作者发表在《新时代》上的那些反对伯恩施坦和康拉德·施米特的文章（1898—1899《新时代》第5期，以后各期没有见到），谈了我们的康德主义者（彼·司徒卢威和布尔加柯夫）所称赞的认识论的经院哲学，我坚决站在一

元论者这边。”

列宁是把修正主义的泛滥当作一种国际现象来看待的。他决定翻译一些著作，让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了解国际上的机会主义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1898年3月—8月，列宁把英国工联主义和弗边主义理论家悉·维伯和比·维伯夫妇合著的《英国工联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一书的第一卷翻译成俄文，并在译稿中加了一些脚注。

从1899年下半月至12月初，列宁从波特列索夫那里借到了考茨基的著作《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反批注》一书，阅读之后于年底写了一篇书评。他在书评中肯定了考茨基对伯恩施坦的严厉批判，驳斥了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辩证法和《资本论》的攻击。

1899年11月下半月—12月初，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利用两周时间，把考茨基的著作《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反批注》自德文译成了俄文。列宁的书评和译稿曾经在米努辛斯克等地的流放者中传阅，对于批判伯恩斯坦主义的斗争起了巨大推动作用。

在流放生活中，列宁继续进行反对经济派的斗争。1899年，经济派的首领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等人发表了由库斯柯娃起草的宣言

——《信条》。《信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歪曲成为仅仅主张进行政治斗争的理论，从而断定这种理论不适用俄国，马克思主义“关于独立工人政党的议论，无非是把他人的任务和成绩搬到我国国土上来的结果”。《信条》歪曲西欧工人运动的历史，声称：“在研究工人运动时所得出的基本规律就是阻力最小的路线。”《信条》认为俄国工人阶级同西欧工人阶级不同，身受深重的政治压迫，缺乏有组织精神的传统，因而“我们这里阻力最小的路线，绝对不在政治活动方面”。“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出路只有一条：参加，也就是帮助无产阶级进行活动斗争，并且参加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活动。一句话，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经济派的这种观点充斥在其喉舌——《工人思想报》、《工人事业》杂志上，他们打着反对“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的旗号，主张“批判自由”，宣传修正主义货色在报刊上公开表示支持伯恩斯坦的观点。经济派的这些主张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俄国的伯恩斯坦主义，若任其自由泛滥，只能使俄国的无产阶级丧失斗志。

1899年7月，列宁收到了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寄来的用化学药水抄写的经济派的《信条》，立即进行了反复的阅读研究，并草拟了对它的批判文件。同年9月1日—3日，列宁在叶尔马柯夫斯基科

耶村先后两次召集在米努辛斯克州流放的社会民主党人开会，讨论他起草的批判经济派的文件《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第一次讨论会是在潘·尼·勒柏辛斯基、奥·波·勒柏辛斯卡娅夫妇的住所召开的。第二次讨论会议是在瓦涅也夫的住宅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 17 名流放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列宁被推举为会议主席，会上争论不多，一致通过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大家并在上面签了名。

《抗议书》批判了经济派主张只进行经济斗争、反对政治斗争的谬论，指出：“关于统一的阶级必须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的信念，早已深入到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血液之中了。另外，历史经验确凿地证明，当无产阶级没有自由或政治权利而受压制的时候，始终必须把政治斗争提到首位。”

会后，列宁等人把他们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迅速寄往各个政治犯流放地，土鲁汉斯克和奥尔洛夫（维亚得卡省）的流放者很快就作出了响应，表示同意这个《抗议书》。列宁同时还把《抗议书》寄给国外的“劳动解放社”。1900 年初，普列汉诺夫在他的《为‘工人事业’编辑部所写的指南》这本批判经济主义的论文集中，转载《抗议书》。抗议书在俄国社会党人组织中广泛传播，沉重地打击了经济主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一直到流放期满之后，列宁非常关心俄国的建党问题。他认为必须首先创办一份全国性质的地下报纸，这是能够把全体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唯一有效的方法。因为列宁必须注意克服一个重要问题是“地方工作的狭隘性和手工业性”。如果有一份全俄地下报纸，就能够把各个地方小组紧密地联系起来，把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并使其成为全俄工人阶级的斗争。否则的话，党的领袖和理论家们不能在重大问题上发表意见，不能指导革命运动，这样全国性的革命斗争是不可能开展起来的。

后来，列宁在流放地时的亲密战友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在回忆时写道：“流放期快要结束了。还在流放期满之前，我获准去西伯利亚铁路局工作。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宽广的叶尼塞河边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后一次散步的情景。这是一个严冬的月夜，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西伯利亚一片冰雪覆盖着的辽阔无垠的大地。他雄心勃勃地跟我讲述了回到俄国后的计划和设想。创办铅印的党报，把它迁移国外出版，利用这张中央机关报来建党，这样，这个机关报将成为建造整个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大厦的特种脚手架——这就是他的论据的要点。应该承认，开始我感到他过高地估计了这种党报的作用，而这只是因为，在漫长的生涯中，他身不由己，只好单一地把重点放

在写作活动上。实践证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确定要走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在西伯利亚，列宁度过了三年异常艰苦的流放生活。对于列宁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来说，这三年时光或许并非毫无益处。在这期间，列宁一直以充沛的精力和锲而不舍的精神认真系统地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大大提高了他的理论水平和革命斗争能力。他写下了一部理论性著作和大量论文，给了经济派以致命的打击，为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提供了指南和纲领。他还团结了一大批先进的革命战士，为未来的革命高潮准备了干部队伍。

在当时，西伯利亚是一个人迹罕至的荒蛮之地，是历代沙皇残害革命志士的刑场，撒下了无数有志青年的热血。然而人们惊奇地发现，经过三年的流放，列宁的精力和革命斗志不仅丝毫没有衰减，反而更加蓬勃旺盛了，而他的全部热情和力量则来自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仰。

1900年2月10日，列宁流放期满，可以返回内地了，但是官方节外生枝地作了一个规定：不准他在两个首都、有大学的城市和大的工业中心居住。他同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商量后，决定选择普斯科夫城这个同彼得堡联系最方便的小城市为居住地。列宁要走的消息传开后，舒申斯克村的农民们都感到

依依不舍，纷纷怀着伤感的心情前来向他告别，有的人甚至流下了眼泪。三年来，列宁为这里的乡亲们做了许多事情，特别是充当了他们的法律顾问，使当地的地主恶势力不再敢随意欺负他们了。动身之前，好友奥斯卡尔·亚历山大维奇也赶来与列宁话别，但由于心情沉重，他从而在椅子上一直默默无语。他给克鲁普斯卡娅送来了自制的胸饰作为礼物，胸饰像一本书，以表示感谢克鲁普斯卡娅帮助他学习《资本论》。

2月10日，列宁同妻子和岳母乘坐马车离开了舒申斯克村。当地的流放者和农民们亲切地给他们送行。到达米努辛斯克时已经很晚，他们在那里住了一宿，第二天又继续赶路。他们在米努辛斯克同流放期满的斯塔尔匀夫、奥·亚·西尔文娜相会之后，改乘马拉雪橇，日夜兼程行进了350俄里，来到阿钦斯克车站，乘上了西去的火车告别了天寒地冻、大雪纷飞的西伯利亚。

列宁在流放期满之际，思考最多的问题仍然是如何创办一份党报。他希望通过报纸的宣传教育作用，尽快结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政治动摇、思想混乱、组织涣散的状态，而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此时，俄国革命的状况是非常复杂的。

1898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结束后，由于沙皇政府的严厉镇压，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已不复存在了。于是经济派随即趁机在各地工人组织中大肆活动，妄想把追求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经济斗争当作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任务。由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也十分活跃，妄图把俄国工人运动纳入沙皇政府允许的轨道。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以什么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和奋斗目标？她应该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政党？

在这些重要的问题上，俄国各地的工人小组和团体，没有取得一致的正确的认识。它们如同一盘散沙似地分散在全国各地，彼此没有组织上的联系，更没有统一的组织纪律。列宁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要想迅速结束这种思想混乱、组织涣散和纪律松弛的严重状态，就必须创办自己的全俄政治报纸和刊物。以便通过编辑、出版党的报刊，从政治思想上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机会主义思潮，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统一全党的思想，从组织上加强各地工人小组和团体的联系。只有这样做，才能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逐步建设成为一个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和严密的组织原则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克鲁普斯卡娅后来回忆说：“在流放的最后一年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有了一个组织计划；后来他在《火星报》上，在《怎么办？》里，在《给某同志的一封信》里发展了这一计划。应当从组织全俄性的报纸着手，把它设在国外，使它尽可能地同俄国的工作密切联系起来，同俄国的组织密切联系起来，尽可能地搞好运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时已夜不成寐，异常消瘦。他在失眠的夜里，周详地考虑着自己的计划，同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我讨论，同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通信商量，并同他们谈好到国外去的问题。愈住下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愈加着急，愈加渴望工作。”

2月18日，列宁和妻子、岳母到达了乌发。列宁在乌发逗留两天，会见了当地的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向他们详细地介绍了拟在国外出版全俄秘密党报的计划，希望他们支持该报，并且商定了彼此加强联系的密码和通讯地址。列宁同时还向他们提出了特殊的请求：希望他们关照妻子和岳母两人的生活。这是由于克鲁普斯卡娅的流放期还有一年，经列宁申请，当局允许她在乌发继续服刑。

列宁到达乌发的当天，还亲自去拜会了老民意党人切特维尔哥娃。列宁与这位老资格的女民意党人相识已有多年了，此时她在乌发开了一个书店。列

宁同她谈话时声音柔和、态度和蔼，敬重之情溢于言表。列宁尽管不同意民意党人的错误理论，但十分赞赏他们同沙皇专制制度作斗争的坚强革命精神。

同心爱的妻子告别后，列宁乘车继续前行。途中经过彼多尔斯克，与被流放在这里弟弟德·伊·乌里扬诺夫汇合。然后，两人改乘火车一同前往莫斯科，去看望他们朝思暮想的亲爱的妈妈。

几天以后，列宁兄弟俩来到了莫斯科巴赫美齐也大街 25 号。他们乘坐的马车还没停稳，就看见了从楼房里跑出来迎接他们的母亲和姐姐、妹妹，他们立即紧紧地抱作了一团。

母亲看见多年未面的儿子伤心地流下了热泪：“你在信里总是说长胖了，瞧！你有多瘦啊！”

列宁安慰母亲说：“我真的长胖了，只是在动身之前才瘦下来的。”

母亲从小就非常疼爱列宁，这大概是由于列宁是孩子中间最聪明顽皮的一个，即使列宁长大成人后，母亲也没少为他操心。1895 年，列宁在彼得堡生病了，母亲立即从家里赶来亲自照料他。列宁被捕入狱后，母亲不顾年迈体衰，总是按时探监送饭，为营救她而四处奔波。列宁也非常尊敬、爱戴这位养育了他，并且已经失去了一双儿女的母亲，并为自己拥有这样一位慈祥善良、深明大义的好妈妈而感到骄傲。

在流放地时，为了减轻母亲的挂念，他常给母亲寄去平安家信，说自己生活得很愉快，身体非常健康，并请求她老人家多多保重。有一次，列宁从报纸上看到一条仆告：“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乌里扬诺夫在莫斯科逝世”，他的脸色刷的一下就变白了，嘴唇擅抖，泪流满面。他对妻子说：“我的母亲去世了，我没有妈妈了！”难过得连续几天彻夜未眠。后来弄清楚报上登的是另一位同名字的妇女。

“尤利（指马尔托夫——引者注）到了吗？有信来过吗？有电报吗？”在互相问候之后，列宁刚脱下衣服，走进餐厅，就向家人提了一连串问题。

马尔托夫同列宁一起因同一案件被流放在西伯利亚，同时流放期满。姐姐回答说，没有得到马尔托夫的任何消息，这使列宁变得更加焦急不安。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我跟他约好了的嘛。不会出什么事吧？”他一边说，一边在屋里来回走动。“赶快拍个电报给他。米佳（指弟弟），请你跑一趟。”列宁立即起草电报稿，并派弟弟去拍电报。

最初家人都为列宁异常关心马尔托夫是否到达莫斯科感到迷惑不解。在西伯利亚和列宁关系好的社会民主党人很多，马尔托夫过去并不是列宁最亲密的朋友，为什么他唯独如此关心马尔托夫呢？经列宁一再解释，家里人才明白：他已选择马尔托夫作为

创建全俄秘密党报的骨干之一，共同回内地创办党报。他未按时返回莫斯科，就为创办党报带来很大困难。

由于列宁一直惦记着马尔托夫，所以在休息时他给家人唱了一支马尔托夫在流放土鲁汉斯克时作词的《土鲁汉斯克歌曲》，用的是乌克兰的老曲调。歌词很长，其中唱道：

苦难的岁月使我们的心力交瘁，
又何必长命百岁；
只要让勇敢的年轻一代，
放射出奇迹般的光辉。
我们耗尽精力，
白白地吃苦累；
这西伯利亚，
终究要埋葬我辈。
朋友们，
我们要满怀胜利的
信心去完成这艰辛的历程；
那时候我们将多多感谢，
制造这一切苦难的人。
在欢庆胜利的日子里，
我们再来补情：

造一个出色的断头台，
向他们致敬……。

这首歌曲好听，列宁也唱得动情投入，大家激动得鼓起掌来，都要求他再唱一首。于是，列宁从餐厅的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入迷地唱起从西伯利亚带回的另一首革命歌曲《千年的基础》：

千年的基础在动摇，
古老的制度要垮掉，
我们觉醒在今朝，
把旧世界的锁链全抛掉。
起来吧，起来，
工人兄弟们！
起来与敌人斗争，
饥饿的人群。
怒吼吧怒吼！
复仇的呼声！
前进，
前进愤怒的人们！……

接着，在妹妹钢琴伴奏下，列宁唱了几首波兰革命歌曲，如《红旗歌》，《华沙革命歌》等。这是他跟

流放的波兰工人学来的，歌词一部分用波兰语歌唱的，一部分是用俄语歌唱的，俄语是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翻译的。

几天后列宁见到了萨马拉时的老朋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和《南方工人日报》的代表克拉茨扬米。他在列宁家中住了两三天，两人认真商谈了准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创办党报等重要问题。休息时，他们还一起去艺术通俗歌剧院观看了格·豪普特曼的话剧《亨什尔》。

第十一章 创办党报

《火星报》为以后的党的全部工作奠定了基础。

——克鲁普斯卡娅

1900年3月，列宁从彼得堡来到普斯科夫。此时的列宁虽然获得了一定的自由，但是还处在警察的严密监视之下。为了活动方便，列宁在省统计局做了一名职员。3月末4月初，列宁在普斯科夫同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讨论他起草的《〈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声明草案》。不久，他又主持召开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杜冈巴拉诺夫等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并在会上宣读了关于出版《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编辑部声明草案》，解释了草案的重要原则。在讨论国外编辑部的组织问题、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参加报刊工作问题时，他再次作了重要发言。最后，同意了列宁起

草的声明草案。

当时，拉德琴柯也住在普斯科夫，他时常带着孩子们到列宁家里做客。孩子们非常活泼可爱，喜欢与大人们作各种有趣的游戏，但他们最喜欢的还是与列宁一起玩耍，听他讲各种有意义的故事。孩子们还喜欢模仿大人的动作。有一次，拉德琴柯的两个女儿仁妞卡尔和留达看到了列宁与波特列索夫的一次谈话的情形后，便模仿了起来：她们背着手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一个扮演列宁，一人扮演波特列索夫，表演得惟妙惟肖，令在场的人都捧腹大笑起来。

为了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建立联系，列宁于4月15日秘密来到里加，会见了里加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雅·奥佐尔和克·祖提斯。列宁向他们介绍在国外出版秘密政治报刊的计划，他们欣喜若狂，表示坚决支持，双方还商量的联系地址与联系办法。

1900年4月末5月初，沙皇政府对俄罗斯南方的民主党人进行大逮捕，拉拉扬茨也被捕了。鉴于这种情况列宁清醒地认识到在国内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已不可能。他对姐姐说：“既然仅仅是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就招致这样的失败，几乎使组织遭到彻底破坏，使最重要的工作人员遭到逮捕，因此，在专制的俄国，召开代表大会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奢望。必须用其他方式来统一党。比如

说，在国外出版的全俄报纸可能就是这样一种方式：“像搭在新建筑物四周的脚手架一样，党将以这个报纸为脚手架建立起来。”

考虑到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的其他成员在马克思主义宣传上已有丰富经验并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俄国工人运动和革命家之中有较高的威望和影响，所以列宁认为：办党报一定要想法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和密切合作，这样才有利于推进俄国工人运动。

于是，列宁同波特列索夫商量决定波特列索夫出国为出版《火星报》和《曙光》杂志作技术准备，并请他把列宁起草的《编辑部声明草案》带给“劳动解放社”。5月中下旬，列宁草拟出《火星报》小组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接到代表“劳动解放社”参加代表大会的委托书。另外，列宁还会见专门来普斯科夫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的代表，共同商谈了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问题。

5月18日，列宁设法领到德国的护照。但他还不能马上出国，因为此时出版党报的秘密报刊和召开党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还未完全就绪，另外他还要去看望流放在乌发的妻子。

6月1日，列宁同前来普斯科夫的马尔托夫讨论

了编辑出版党的报刊问题，并拜访了恩·弗·洛帕廷，从洛帕廷那里取得了出版报纸的经费。办妥了这些事情之后，列宁便与马尔托夫乘晚车秘密去彼得堡。他们随身携带了一箱子的书刊，列宁的衣服口袋里还装着出国护照、1300 卢布办报经费和用化学药水书写秘信的传单等。为了躲避警察的监视，他们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卡娅站下了车，换乘另外一次列车去彼得堡。

到彼得堡后，他们住在彼得堡“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会员亚·列·马尔琴科母亲的住处（大哥萨克巷 11 号室）。不料，6 月 3 日清晨刚一出门，他们就被警察逮捕了。

当时，几个警察狠狠地拧住了列宁的胳膊，使他一动也不能动，目的是防止他处理掉身上藏的东西。列宁和马尔托夫被分别押上了两辆马车，送进了拘留所。列宁后来才知道：他们在选择行车路线时犯了错误，他们选择的是当局监视最严密的一条线路。

此时，列宁最担心的是一封用化学药水写给普列汉诺夫的信。信中谈的是编辑出版全俄党报的计划，时间一长，字迹就会显现出来，党的机密就会暴露。列宁心里焦急极了。

万幸的是警察未能识破这封信。在 6 月 5 日进行的审判中，列宁一再申辩自己无罪。经过坚决的斗

争，几天以后，他终于获得了释放。但警方节外生枝，想扣留他的出国护照。列宁非常愤怒，他立即严厉地警告他们：这种行为是违法的，他们将受到控告。警察局长怕丢掉乌纱帽，只好乖乖地把护照还给了列宁。

在波多尔斯克逗留几天之后，列宁和母亲、姐姐一起启程去乌发看望克鲁普斯卡娅。他们先乘火车在这里，在下新城会见了当地的社会民主党人，然后又乘船前往乌发。6月河水白浪滔滔，河面上百船竞渡，渔歌荡漾，轮船沿伏尔加河、卡马河、白河航行，令人心旷神怡。白天母子三人在甲板上度过，列宁心情乐观而又愉快，他舒畅地大口呼吸着河水和沿岸的森林里散发的新鲜空气，尽情地浏览着大自然的美景。

当小轮船沿卡马河和白河行驶时，姐姐同列宁站在空荡荡的甲板上谈话，一直谈到深夜。此时，两岸进入梦乡，河面一片寂静，列宁向姐姐介绍了创办全俄党报的秘密计划，并说明由于5月末6月初南方大逮捕，包括卡特林普斯拉夫《南方工人报》编辑部在内的社会党组织遭到了严厉的破坏，已无法在国内召开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了。

姐弟俩还谈到“劳动解放社”同经济派的《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的矛盾冲突问题。当说到有的人指

责普列汉诺夫盛气凌人、“劳动解放社”对编辑出版政治书刊消极怠工时，列宁开始为他们抱不平，他认为“劳动解放社”的一些成员年老有病，不能担任更多的实际工作了，青年人应分担他们的工作，但在行动上还要接受他们经受考验的正确理论的指导。姐弟还谈到经济派的《信条》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抗议书》，谈到了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等等。

6月28日，列宁和母亲、姐姐到了乌发，他们在这里呆了两个星期。在返回波多尔斯克的路上，列宁先后到当地的萨马奇，顺路去塞兹兰，会见了社会民主党人，寻求他们对创办全俄党报的支持。

7月中旬，列宁自波多尔斯克启程出国。

8月初，他来到了瑞士苏黎世，利用两天时间，会见“劳动解放社”成员巴·波·阿克雪里罗得，同他讨论了列宁起草的《〈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声明草案》以及其他有关这两份报刊的问题。

随后，列宁来到了日内瓦，住在日内瓦附近的捷纳村，直到8月28日离开瑞士为止。他先去找波特列索夫，从他那里初步了解了“劳动解放社”对创办全俄党报的态度。

8月初，列宁和波特列索夫等人，专程来到日内瓦会见普列汉诺夫。接着，在日内瓦郊区的科尔斯耶和维津，列宁、波特列索夫同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

巴·阿克雪里罗得，就党报的编辑、出版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磋商和热烈的讨论。最初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的其他成员对创办党报、党刊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后来，他们又在如何办党报的问题上同列宁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在谈判结束一个星期以后，列宁追忆了谈判的情况，写了比较详细的笔记；后来，列宁对娜·康·克鲁斯卡娅进述了谈判的经过。为了维护革命者内部的团结，列宁关于谈判过程的笔记，在他生前未公开发表，直到列宁逝世之后，才以《‘火星’怎么差一点熄灭了？》为标题公布于世。根据他的记载，我们可以真实而生动地了解到谈判的曲折过程和产生不同看法的原因。

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主要在以下四个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第一，关于如何对待经济派。早在1900年春在国内拟定的《〈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声明草案》中，列宁就严厉地批评了经济主义的思潮，指出了它给工人阶级带来的严重后果，与此同时，列宁考虑到某些工人革命者虽然暂时处在经济主义思潮的影响之下，但他们还是真心实意为使工人摆脱经济贫困而斗争；只要对他们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还是可以使他们改正错误，团结在党的周围，这样做有

利于俄国工人运动的团结。所以列宁主张对那些处于经济派思想影响之下的工人运动的实际工作者，“决不放弃还有可能共同工作的希望”，主张在各种不同观点可以论战的基础上，“保留和平结束同‘经济派’争论的可能性，等等”。由于“劳动解放社”受到经济派的疯狂攻击，并且在1900年4月因被经济派把持领导权而造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的分裂，所以普列汉诺夫非常痛恨经济派，并且耽心列宁会迁就经济派。这说明普列汉诺夫对经济派的斗争是坚决的，但对于讲究斗争艺术，把受经济主义影响的工人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则考虑甚少，远不及列宁深谋远虑。

第二，关于如何对待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主张彻底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自由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他早在1895年出版的《评述我国经济发展资料》中就已经开始反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但在此以前，列宁曾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团体达成协议，共同批判沙皇专制制度，反对民粹主义。鉴于这个历史经验，列宁打算在国外出版党报时，要利用“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在财政上和物质上的帮助。于是，列宁、马尔托夫和拉德琴柯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团体的代表司徒卢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于1900年4月在俄国普斯科夫举行会晤，商

谈了这个问题。普列汉诺夫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比列宁晚，长期对之持缄默态度，但现在却突然无条件地反对起列宁这个打算来了。尽管列宁再三对普列汉诺夫解释，可是普列汉诺夫不听劝告，仍猜疑“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是奸细，他宣布将继续坚决地向这些“叛徒”开火。他甚至错误认为，列宁不愿同司徒卢威进行无情的斗争，想“调和一切”，等等。普列汉诺夫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本质有深刻的认识，但他不懂得在不放弃革命原则的条件下，应该团结一切力量反对沙皇专制制度这个非常现实的道理。

第三，关于如何对待崩得（“犹太工人总同盟”）。普列汉诺夫对这个组织一向很厌恶，他宣称：崩得只不过是一个剥削俄国人的剥削者的组织；犹太人全都是沙文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俄国的政党就应该是俄国人的党”；我们的目的就是把崩得驱逐出党，等等。列宁等人坚决反对这些不成体统的主张，然而普列汉诺夫一味固执己见，并且说列宁对犹太人根本不够了解，没有同犹太人打过交道，等等。这实际上反映了普列汉诺夫自己存在沙文和民族主义情绪，并且不善于对犹太人进行科学的分析。

第四，关于是否要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批判考茨基的问题。普列汉诺夫建议约请他的“盲目崇拜者”

柳·伊·阿克雪里罗得，写一篇哲学论文批判考茨基。普列汉诺夫说：考茨基已经在“批评”马克思主义者，他只允许他的杂志上刊登批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而不给马克思主义者提供充分的篇幅（普列汉诺夫是指不刊登他的长篇大论），所以他要批评考茨基。但列宁认为，虽然有错误，但考茨基当时基本上还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所以公开发表文章批判考茨基是不合时宜的，这是一种泄私怨的报复行为。

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这些不同看法给谈判带来了争论的火药味。在开始讨论创办报刊的策略问题时，普列汉诺夫顽固坚持对经济派分子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偏激态度，既不认真听取别人的意见，又不亲自动手处理一些问题。例如，普列汉诺夫看了列宁起草的《〈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声明草案》以后，未能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只表示在文字上要进一步修饰润色。可是他自己又不动手修改，便退还给列宁。列宁修改后，他仍不亲自修改，又让查苏利奇去推敲。当列宁提出有条件地邀请司徒卢威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在财政上和物质上支持党报的工作的问题时，普列汉诺夫冷冰冰地坚决表示反对，后来他提出了最后通牒：或者是他参加编辑部，或者是司徒卢威参加编辑部，二者必居其一。但列宁

始终以大局为重，对普列汉诺夫一再作出让步，表示希望他能够参加编辑部。

8月25日晚上，普列汉诺夫再一次提出了请柳·伊·阿克雪里罗得写批判考茨基的哲学文章的问题。列宁和波特列索夫坚决反对这种错误做法。普列汉诺夫的脸绷得紧紧的，十分生气，在讨论崩得问题时，争论也毫无结果，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8月26日，在普列汉诺夫的住宅里，会议继续进行谈判。普列汉诺夫一心想掌握编辑部的大权，可是当他发现在诸如上述一些重要问题上与列宁等人看法大相径庭，难以合作共事时，他就表示由列宁等人做编辑，他只当撰稿人。但列宁等人还是尽力争取普列汉诺夫参加编辑部。经过他们苦口婆心地说服，普列汉诺夫终于同意担任编辑，要求他要拥有两票的表决权。这充分显示了普列汉诺夫想自己控制党报的企图，使列宁、波特列索夫非常生气，因为这打破了他们原来的计划。列宁在俄国国内时曾设想，由他、波特列索夫、马尔托夫等担任编辑，同时吸收普列汉诺夫等人参加《火星报》的工作。列宁之所以这样设想，是因为他和波特列索夫考虑到普列汉诺夫这些“老头子们”太执拗，况且他们不能担负起繁重的编辑工作了。但是列宁和波特列索夫当时仍表示愿接受他们的思想领导。

后来，列宁生动地描述了和波特列索夫在 8 月 26 日晚上回家去的心情：“我们刚一下轮船单独在一起的时候，简直愤慨极了。我们真的发火了，沉闷的空气终于爆发了雷雨。我们在村子中来回走着，一直走到深夜，夜是膝黑的，雷雨交加，电光闪闪。我们一边走一边发脾气。……现在我们已经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普列汉诺夫早晨的不愿共同编辑的声明，不过是为天真的‘少爷们’设下的圈套，预先想好一着棋，一个陷阱。这已经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因为，假如普列汉诺夫真的怕共同编辑，怕妨害事业，怕在我们之间发生不必要的冲突，那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够转眼就暴露出（毫无顾虑地暴露出）他所说的共同编辑完完全全等于他一个人编辑。我们想同一个人密切地共事，同他亲密无间地交往，而这个人却用预先想好的一着棋来对待同志，这个人无疑不是好人，实在不是好人，他的个人的渺小的自尊心和虚荣心很强烈，他是一个不老实的人。这个新发现——这在我们看来真是一个新发现！——对我们是一个晴天霹雳，因为在以前我们两个人都很爱慕普列汉诺夫，像对待宠爱的人那样原谅他的一切缺点，故意不去注意缺点，竭力使自己相信，这些缺点是不存在的，这都是一些小节，只有那些不重视原则的人才来注意这些小节。而现在我们不得不深沉相信，这些‘微不

足道的’缺点能够使人离开最忠实的朋友，任何对正确理论的信念都不能使人忘记他的恶劣品质。我们无比愤怒：理论人物被打垮了，我们愉快地践踏他这个被推倒的偶像，最尖锐的责难无休无止。我们认为这样是不行的！我们不愿、不会、也不能够在这种条件下一起工作。别了杂志！我们要抛开一切回到俄国去，去那里再从头做起，只办一个报纸。我们不愿在这个人手下当卒子；他不允许有同志的关系，而且也不懂得同志的关系。”

列宁和波特列索夫一直散步到很晚的时候，才怀着沉重和不安的心情回到房间去睡觉，他们决定第二天把到别处去办报纸的决定告诉普列汉诺夫，并且和普列汉诺夫永远断绝私人关系。

8月27日，列宁和波特列索夫先把自己想法告诉了巴·阿克雪里罗得和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认为列宁和波特列索夫对普列汉诺夫的看法不公平，并说普列汉诺夫对此也很难过，如果现在就分手，双方都会感到遗憾和内疚的。查苏利奇则恳求列宁和波特列索夫不要离开去。

当列宁和波特列索夫把自己的打算告诉普列汉诺夫时，他显然有些不高兴，责备列宁和波特列索夫凭感情办事。列宁和波特列索夫由双方共同出版一些小册子，普列汉诺夫赌气地说：“我没想过要搞小

册子，不要指望我了。你们就是走了从来我也不会没有事做，我可以做别的事情。”实际上，普列汉诺夫还是愿意在国外办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报纸的。经过了几天的谈判，他逐渐感到列宁、波特列索夫对他还是很尊重的，他也乐意同他们合作。但是他骄傲自大，不相信别人，唯恐即将创办的报纸为别人挖掘，所以在讨论中几经反复。当他看到列宁、波特列索夫真要同他分手，酝酿中的报纸将要流产时，他终于回心转意了，表示愿同列宁、波特列索夫合作。他们对他们解释说，同他们分裂，无异于放弃政治活动，而钻入学术的象牙之塔，他不愿这样做。

8月28日列宁、波特列索夫同普列汉诺夫进行了最后一次商谈。普列汉诺夫同意出版文集，而列宁和波特列索夫则提出了关于编辑工作的三个方案：一、列宁、波特列索夫、马尔托夫是编辑，普列汉诺夫是撰稿人；二、大家都是编辑；三、普列汉诺夫是编辑，列宁、波特列索夫、马尔托夫是撰稿人。普列汉诺夫表示赞同前两个方案，因为这时他已经不想独揽大权。于是，大家暂时决定，在提出新的编辑制度草案以前，仍保留旧的制度：六人都是编辑，而普列汉诺夫拥有两票表决权。为了达成团结，列宁已经做出了最大的让步。

后来，在报刊机构设在何地的问题上，双方又发

生了争论。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竭力主张报纸和杂志在瑞士编辑出版，这样一来他们掌握报纸的编辑的发行工作，而且报纸同国内的一切联系也都得经过他们。列宁考虑到，“劳动解放社”领导的报纸和杂志不可能同国内的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保持血肉的联系，很可能缺少战斗气息，充满迂腐空洞的议论，对俄国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都是不利的。因此，列宁决定把报纸与杂志的编辑、出版机构设在他和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居住的慕尼黑城，而不设在“劳动解放社”的所在地——瑞士日内瓦市。

当时，普列汉诺夫已经 44 岁了，而列宁刚满 30 周岁。普列汉诺夫有些瞧不起这个年轻的革命家，因此在会谈中表现得傲气十足，想控制编辑部的领导权。作为一个老资格的革命家，普列汉诺夫的这种做法是极为错误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他缺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阔胸怀。由于长期侨居国外，普列汉诺夫不太了解国内工人阶级的状况和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在研究创办党报刊的问题时，他对经济派、“合法的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在实质上是正确的，而他对于当时社会民主党人创办报刊的困难认识不足，认识不到列宁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主张的正确性。

在这些方面，列宁都要高出普列汉诺夫一筹。在

谈判的整个过程中，列宁始终注意顾全大局，他首先做出了重大让步，并耐心地说服、劝导普列汉诺夫，使普列汉诺夫对自己的错误有所觉察，逐渐接受了列宁的主张。于是，创办报刊的协议终于达成了，“火星”又重新燃烧起来。这样一来，创办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报刊《火星报》和理论刊物《曙光》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肩上。

1900年12月24日，第一份全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火星报》的创刊号，在德国莱比锡城出版了。《火星报》创刊号上发表了列宁的文章：《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社论），《中国的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的分裂》。在《中国的战争》一文中，列宁谴责了包括沙皇俄国在内的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疯狂侵略。

《火星报》自第二期移到慕尼黑出版。后来由于警察的迫害，委托的印刷所不敢承担印刷任务，又必须另选新地址。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主张开往瑞士，而多数人赞同迁往英国，于是该报从1902年4月起在伦敦出版。后因“劳动解放社”又提出把《火星报》移到瑞士，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只有列宁一人反对，所以《火星报》自1903年5月起迁到日内瓦继续出版。

在编辑部的六个编委中，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实

际上是主编。编辑部长期分设两处：慕尼黑或后来的伦敦分部由列宁领导，日内瓦分部由普列汉诺夫领导。在前期，列宁是第一把手，普列汉诺夫是第二把手；后期编辑部迁到日内瓦后，尤其是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后，普列汉诺夫成了第一把手。由于他当时的声望比列宁高，所以长期以来，国外一直有人认为普列汉诺夫是《火星报》的主编。但是，从创办和主编《火星报》的全过程来看，列宁起的作用比普列汉诺夫大得多。

由于缺乏有经验的人手，办报中的许多实际工作都要由列宁亲自操办。例如，确立报纸的内容和版面、选择题目、物色作者、校对清样、排版印刷、筹集经费、返回国内，等等。对于这些繁重的工作，列宁都有条不紊地作了妥善的处理。他还经常通过写信的方式与普列汉诺夫和其他编辑交换意见，编辑处理稿件。在《火星报》编辑部工作期间，列宁尽力注意处理好与普列汉诺夫的关系，两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观点也逐渐接近，一般来说，合作得比较好，虽然有时也难免出现分歧。

除了分担《火星报》工作之外，列宁和普列汉诺夫还积极为该报撰稿。从1900年12月《火星报》第1号至1903年11月第51号，列宁在《火星报》上共发表了57篇文章，普列汉诺夫发表了38篇。《曙

光》杂志由《火星报》编辑部主编，在斯图加特出版，先后出版 4 期（3 册）。列宁在这个杂志上发表了 5 篇著作，普列汉诺夫发表了 17 篇论文。

1901 年 12 月 19 日，根据列宁的建议，在瑞士的日内瓦、伯尔尼、苏黎世和法国的巴黎等许多城市，举行集会和其它活动纪念普列汉诺夫参加革命活动 25 周年以《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名义为庆祝普列汉诺夫参加革命活动 25 周年写了贺词。贺词写道：“劳动解放社”为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精湛的理论知识、广阔的政治视野、丰富的革命经验”，“愿这次庆祝能够巩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愿这次庆祝能够巩固年轻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同‘劳动解放社’的联系”。

从这一事实可以进一步看出，在编辑出版《火星报》期间，列宁与普列汉诺夫的合作是成功和富有成效的。

在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中，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等创办的《火星报》和《曙光》杂志起了巨大的作用。列宁把它们称之为集体的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它们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坚决批判各种机会主义思潮，把拾起架子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实基础之上，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广大党员。另外，它们通

过遍布国内各地的通讯员，同广大工人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仅从1900年12月至1902年3月，报上就发表了100多篇反映工人状况的通讯稿。它们还通过各地的代办员，加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地组织之间的联系，使民主工党逐渐摆脱了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的手工业方式的状态，成长为有坚强组织、严格纪律的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前，《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实际上成了党的中央机关报刊，充当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思想的指导者和行动的组织者。

《火星报》的发行推动了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1901—1903年，工人罢工浪潮席卷了俄国全境，彼得堡、莫斯科、巴士姆、罗斯托夫、巴库、梯弗里斯、敖得萨、基辅、叶加特林诺这份《火星报》给许多同志看过，结果把报纸都给弄破了，但它是珍贵的。这里写的都是我们的事情，是关于全国的事情，这种事情不能用戈比来估价，也不能用小时来计算。当读到报纸时，就会明白为什么宪兵警察害怕我们工人和领导我们的那些知识分子。的确，这些人对于沙皇和老板们来说都是可怕的，而不仅仅对老板钱袋才是如此。当然，我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我的觉悟也并不高，但我们深刻感到真理在哪儿，知道工人需要什么。现在工人很容易燃烧起来，下面已经在冒烟

了，只要有一点火星就燃成大火。啊，星星之火可以燃成熊熊之焰，这话说得多么正确！……”工人革命家巴布什金从奥列哈沃——袒也沃给《火星报》来信说：“我们这里大家争先恐后地阅读《火星报》，不论拿来多少，立即销售一空。通过《火星报》可以看到工人身上的高度热情。他们谈论的特别多的是第二号上有关农民问题的文章，因此我们要求得到这一号。”

1901年春，克鲁普斯卡娅从俄国辗转来到了慕尼黑。从此，列宁夫妇俩开始了在国外的共同生活和战斗。

最初列宁夫妇从一个多子女工人家庭租了一间房子，但住起来不方便，也不便于工作，因为做饭虽然是在房东的厨房里，但必须先在自己房间把一切东西准备好。克鲁普斯卡娅做饭时，小心翼翼地不动声色的，生怕影响了列宁写作《怎么办？》一书。列宁写作时非常认真专注，因此并没有造成多大妨碍。

但列宁夫妇仍觉得住在这里很不方便，一个月后，他们就搬到季松弗里德街14号去了。这个地方非常安静，旁边有茂密苍翠的黑松林和一条美丽清澈的小河，是工作和休息的好地方。列宁对这里的环境很满意，写作的进度也更快了。列宁写作时有一种习惯：常常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嘴里念叨着正在思考

的问题。每当这时，克鲁斯卡娅从来不去打扰他。

克鲁普斯卡娅给婆母玛·丽·乌里扬诺夫写信说：“沃洛佳现在工作非常起劲，我为他感到很高兴。当他完全投入某项工作的时候，他总是精神愉快，朝气蓬勃的，这已是他的天性了，他的健康状况非常好，看样子，胃炎一点也没有，也不再失眠了。他每天都用冷水擦身体，此外，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去游泳。

在慕尼黑还住着《火星报》编辑部的其他成员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和查苏利奇。查苏利奇是一位未成家的姑娘，工作起来热情泼辣，常开玩笑说：“《火星报》变成重要报纸了。”列宁很佩服这位一心献身革命事业的姑娘，有一次对克鲁普斯卡娅说：“你会看到查苏利奇，她是一个水晶般的纯洁的人。”

列宁在办《火星报》时很珍惜时间。有一次，10点钟刚过，马尔托夫和《火星报》编辑部的其他人来了，举行编辑部会议。马尔托夫知识广泛，非常健谈，他从一个题目谈到另一个题目，一下子扯了几个小时候。列宁因此感到非常疲倦，他后来说：“马尔托夫是一个典型的新闻记者。他非常有才能，做什么好像都不费力，非常敏感，但对于一切都是轻浮的。”为了集中精力编好报纸，列宁后来让克鲁普斯卡娅出面与马尔托夫商量办报的各种问题。

以前，《火星报》的秘书工作是由斯米多维奇担任的，有时列宁不得不亲自处理各种杂事，十分忙乱。克鲁普斯卡娅来后，很快就担当起来了秘书的工作，她工作起来认真热情，因此把列宁从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她还设法与国内各地的革命者建立起了更加密切的联系，这也为列宁了解国内的社会状况和革命事业的发展动态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材料。

为了提高报刊的质量，扩大其影响和知名度，列宁非常重视邀请一些著名的革命领袖为报刊撰稿。1901年5月，列宁会见了德国无产阶级领袖罗莎·卢森堡，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并约她为《火星报》撰稿。同年7月，他还会见了卡尔·考茨基，向他了解了德国社会党的情况，并邀他为《曙光》杂志写稿。

第十二章 在欧洲

现在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就是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列宁

正当 1900—1902 年，全国一些城市又掀起了学生罢课和工人罢工的高潮，而经济派分子则在彼得堡出版了《工人思想报》，在国外出版《工人事业》杂志，散布经济主义理论，妄图把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引向斜路。1901 年 10 月 5 日在苏黎世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会议。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国外联合会坚持其经济派立场，在列宁的提议下，《火星报》、《曙光》杂志编辑部、“社会民主党人”革命组织发表声明，退出会议，成立了一个新的统一的组织“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为了彻底清算经济主义，列宁于 1901 年秋至 1902 年 2

月写出了著名的著作《怎么办?》，该书于同年3月由德国斯较加特市狄茨出版社出版。

在《怎么办?》一书中，列宁首先指出：经济派者提出所谓“反对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口号的实质，在于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列宁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等于教条主义，相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求革命理论必须同实际相结合。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还批判了经济派崇拜工人运动自发性的谬论，阐明了革命理论对于工人运动和党的建设的伟大意义。

列宁认为，工人运动不能自发地产生科学社会主义，但这并不是说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与工人运动无关。科学社会主义是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级的产物。只有从外部向工人运动贯输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工人运动才能发展成为自觉的革命运动。正如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会有革命运动。”由于在工人中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

经过列宁及其战友的整整三年的斗争，终于铲除了经济主义这一伯恩施坦在俄国的变种。经济派

的主要刊物《工人思想报》和《工人事业》杂志在 1902 年相继停刊。经济派的思想歪风也就此停息了。反对经济派斗争的胜利，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基础。

《火星报》编辑部内部对某些问题一直有着意见分歧。例如，1901 年 7—9 月，列宁写了《地方自治局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一文，对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观点进行了尖锐批判。对此，普列汉诺夫、巴·波·阿克雪里罗得和查苏利奇持有异议，他们对列宁的文章提出修改意见，为此他们之间通信持续一个月之久。但列宁坚持原则立场，只对个别措词作了修改，并未放弃尖锐的批判基调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立场。

在制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的问题上，《火星报》内部的意见分歧最大，争论最激烈，持续时间也最长。

19 世纪 90 年代，俄国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迫切需要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正确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虽然于 1898 年宣告成立了，但是并没有制定出正式的党纲。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者及其在俄国的变种——经济派，竭力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学说，要把无产阶级政党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变成资产阶级的后卫队。因此，当时能否在俄国为无产阶级政党制

定出以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为指导的适合俄国国情的纲领，不仅对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和俄国革命斗争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欧洲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批判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原则、坚持正确的建党路线，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普列汉诺夫虽然早在 80 年代就为“劳动解放社”拟定了两个纲领草案，但是他对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党内思想涣散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所以没有抓紧制定党纲的工作。

列宁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1895 年底和 1896 年初，列宁在彼得堡狱中时，就先后写了《党纲草案》和对党纲草案的解释——《党纲声明》，并转送给国外的“劳动解放社”。1899 年末，在西伯利亚流放时，列宁又起草了第二个党纲草案——《我们党的纲领草案》，并将这个草案转送给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这些党纲草案与文章中，列宁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初步勾画了轮廓。列宁认为，应该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制定一部正式的党纲，它应该以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和恩格斯的《对 1891 年的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的批判》等著作为指导，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纲领为蓝本，它要反映俄国的特点，要科学地分析俄国的社会状况和阶级关系，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最终目的和当前的具体任务，制

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另外，还要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的工农联盟的思想，正确解决俄国的土地问题等。

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为“劳动解放社”拟定的两个纲领虽然存在某些缺点与错误，但却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拟定党纲的可贵尝试。所以这次《火星报》编辑部面临起草党纲的任务时，列宁首先想到了他一向很敬重的普列汉诺夫。为了尽量发挥普列汉诺夫的作用，保证在拟定党纲时做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的实际相结合，根据列宁的建议，《火星报》编辑部委托普列汉诺夫起草党纲的理论部分，列宁起草党纲的土地问题和结尾部分。1901年列宁多次给普列汉诺夫写信，建议普列汉诺夫担当起这项工作，并将刊有恩格斯的文章《对1891年的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的批判》的《新时代》杂志寄给了普列汉诺夫。

由于普列汉诺夫正忙于写批判司徒卢威的文章，直到1901年他才开始起草党纲。1902年1月21日，根据列宁的提议，《火星报》编辑部在慕尼黑集体讨论了普列汉诺夫拟定的第一个党纲草案。普列汉诺夫、列宁和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等都参加了这次讨论会，他们在党纲草案的原则问题上发生了争论。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回忆说：普列汉诺夫

对列宁起草的党纲初稿中的几个地方进行攻击。查苏利奇不十分同意列宁的意见，但也不完全同意普列汉诺夫的意见。阿克雪里罗得在某些地方也同意列宁的意见。会议进行得很沉闷。查苏利奇想反驳普列汉诺夫，但普列汉诺夫摆出一副不可侵犯的样子，交叉着两手注视着她，把查苏利奇弄得不知所措。问题弄到非进行表决不行了。表决之前，在这个问题上赞成列宁意见的阿克雪里罗得声称头痛而要去散步。“对于与普列汉诺夫的争吵，列宁感到非常难受，夜里睡不着觉，焦急不安。而普列汉诺夫则公开大发雷霆”。

为了制定一个双方都能同意的党纲，后来《火星报》编辑部成立了一个负责起草新党纲的协商委员会。为此，通过了“协议案”，它指出在新的党纲草案中要写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由于列宁坚持斗争的结果，1902年4月12日，在瑞士的苏黎世召开的《火星报》编辑部会议上，委员会提出了与以前根本不同的新的党纲草案。列宁先后提出百余条的修改意见。其中大部分被采纳。新的党纲草案明确写上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的思想。这是一部无产阶级政党的彻底革命的纲领，是一个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纲领的新党纲，在1902年8月

第四期《曙光》杂志上发表之后，引起了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普遍重视。

1902年4月12日，因《火星报》编辑部将迁往伦敦，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先期启程英国。途中，他们于4月13日在科伦作了短暂的停留，参观了那里的大教堂和名胜古迹。途经列日时又参观了那里的民众文娱馆。后来，他们又同美舍利亚科夫一起去布鲁塞尔，游览了城市，走访了工人合作社和工人党机关。此时恰逢布鲁塞尔工人举行罢工，正在街上进行示威游行，列宁看到工人示威游行异常兴奋，迈步就要加入到游行队伍中去。美舍利亚科夫死死抱住他，他才未能跑过去。就在这时，前来镇压的警察开过来了，把列宁和游行队伍分隔开来。

4月中旬，列宁夫妇来到了伦敦。尽管天气很冷，但列宁的情绪却高涨极了。脸上充满了惊喜，好奇地浏览着这里的市容。他知道，这是一座驰名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一座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世界大都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度过了他们的后半生，在这里领导了第一国际，写下了《资本论》等科学巨著。列宁决心继承他们的遗志，在这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里努力工作，办好《火星报》，为俄国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做出最大的努力。

列宁夫妇原先都有不错的英文功底，还翻译过

英文原著。但到了英国才发现，他们的听说能力竟然不及格——他们听不懂当地人们的话，当地人也听不懂他们的话。为了尽快地通过语言关，列宁在《埃塔凯乌姆》周刊上刊登了一则广告，说“一位俄国法学博士和他的夫人愿意以教俄语的方式来交换学习英语”。广告登出去不久，来了三位英国人：“乔治——贝尔世家”出版商行的年老职员雷蒙德先生，公司职员威廉斯，工人约恩，三人和列宁夫妇互为师生。这种学习方法十分有效，很快，列宁的英语就说得十分熟练了。

在伦敦，列宁化名为雅科布·李希特尔，在市内金兹一克罗斯路车站不远的地方，租到了两个不带家俱的房间，由于房间里摆设过分简陋，没有挂窗帘，再加上克鲁普斯卡娅手上没戴着订婚戒指，曾引起房东的怀疑和不满。当时侨居伦敦的列宁夫妇的朋友康·米·塔赫塔烈夫及妻子雅库波娃向房东说明列宁夫妇是合法夫妻之后，才消除了房东的疑团。他们还出主意想办法，帮助列宁夫妇把生活安排得既舒适，又省钱。起初，家务事全部由克鲁普斯卡娅料理，如买食品，用火油炉做饭，擦地板等。过了一些日子，克鲁普斯卡娅的母亲来到伦敦，才把她从家务劳动中解脱了出来。

来伦敦的《火星报》编辑部其他人员均住在一

起。他们在离列宁住处不远的西德茅斯街上租了五个不大的房间，分布在两层楼里，一间餐厅，一间会客室，其余三间分别由查苏利奇、马尔托夫及阿列克谢也夫居住。大家用煤气灶轮流做饭，有时也到格雷旅馆路上一家大众化的饭馆里就餐。

来伦敦之前，列宁曾托人同英国社会民主同盟周刊《正义报》的编辑哈咱·奎尔奇协商，希望该报的印刷所借一个地方供印刷《火星报》使用。奎尔奇爽快地答应了这一要求，不仅腾出了一块地方，而且他本人还让出了办公室，自己挤出一个角落里办公。这一情形使列宁非常感动，多年以后仍然念念不忘。

在伦敦时期，列宁夫妇的工作和生活十分有规律。列宁一般上午在伦敦博物馆的图书馆里看书，下午在家里处理编辑出版《火星报》的问题。克鲁普斯卡娅的主要工作是把国内来信解译出来，把寄往国内的信译成密码。工作之余，列宁常同家人一起去博物馆，但他在古代博物馆逗留时间通常很短，他最喜爱看的是 1848 年革命博物馆，看了又看，不愿意离开。他们还多次去海格特公园，在马克思墓前凭吊。偶尔，他们也到市郊樱草山去游览，花 6 个辨士就能玩一趟，站在山上可以鸟瞰被浓雾笼罩的伦敦。

同当年的马克思一样，列宁也把伦敦当作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窗口，因此，他很愿意了解伦敦

各阶层的生活。他常常坐在公共汽车的上层浏览伦敦市容。在宁静的公园旁座落着一幢幢宽大漂亮的公馆，周围是美丽如画的花园和草坪，油漆得发亮的马车经常在这些住宅门口停留。这些住宅旁边是工人居住区的一些肮脏的小巷，巷子里的绳子上挂满了洗晒的各色各样的衣服，面色苍白、体质瘦弱的孩子们在摇摇欲坠的危房前的泥地玩耍。列宁看到这种贫富起来的丑恶现象，咬着牙用英语重复说：“两个国家！”在工人发工资时候的夜晚，列宁就到工人居住区的马路市场上去，访查民情，那里大马路旁边的人行道上摆着一眼看不见头尾的小摊，每个小摊上点着通红的火把，人行道上挤满了男女工人，显得拥挤不堪，熙熙攘攘。

列宁还常去参加工人集会。在英国教堂里，作过祈祷之后，往往有一个人做简短的报告，接着就辩论，普通工人常去参加这种辩论。列宁时常到教堂去听辩论，或到海德公园听演讲，有时也参观一些工人组织的集会。有一天，他听了一场辩论，回来后高兴地对克鲁普斯卡娅说：“报告人胡说了一通，而工人一发言，就击中了要害，把资本主义的本质揭露出来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他们中间萌芽了！”

列宁虽然很珍惜时间，但当有人邀请他给俄国侨民工人小组去讲课时，他总是非常愉快地接受。他

多次和阿列克谢也夫一起去怀特柴泊，给俄国侨民工人小组讲解《火星报》编辑部制订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纲。他逐字逐句地解释，然后又一一回答工人们提出的问题。参加听讲的有：青年钳工罗伯茨，他来自哈尔科夫；来自莫斯科的席勒，他在《火星报》印刷所当排字工人；有从傲德萨来的木雕工人塞尔；有来自彼得堡的加工精密机械的钳工米哈伊洛夫等。这些人以后大都回到俄国，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骨干分子。

列宁虽然身居伦敦，但他的心始终牵挂着俄国国内火热的革命斗争，他一时一刻也未对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的胜利丧失信心。有一次阿列克谢也夫同列宁谈话，他嘲笑了伦敦《正义报》周刊上发表的一篇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就要来临的文章。列宁对他的态度很不满意说：“我倒希望能活到社会主义革命胜利那一天。”列宁的语气非常坚定。

1902 年秋，列宁和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热情接待了从国内来伦敦的列·达·托洛茨基。列宁陪他参观了伦敦的一些重要建筑和名胜古迹，向他详细地介绍了《火星报》的情况和自己对俄国革命的总体看法，同时也向他了解国内工人运动的情况。托洛茨基向列宁谈了西伯利亚政治犯的情况，《火星报》组织在国内的状况以及他个人在西伯利亚阅读了考茨基

同伯恩施坦论战的文章，并表明自己不同意伯恩施坦的观点。1902年12月31日，列宁在写给柳·伊·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中称托洛茨基是“一个年轻的，很有干劲和能力的同志”。后来，托洛茨基参加了《火星报》的编辑工作。

1903年5月初，由于《火星报》编辑部要从伦敦迁往日内瓦，列宁和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离开伦敦去日内瓦。在动身前夕，列宁由于工作过分劳累而病倒了。一路上，克鲁普斯卡娅尽力照顾尚未全愈的列宁。来到日内瓦后，他们在“莫拉尔”公寓住了两周，就移居郊区谢塞伦工人村，在这里一直住到1904年6月底。他们租了一座小房子，楼下是一间铺着石板的大厨房兼会客室，楼上有三个小房间。家具不够，就用装书和装碗碟的箱子凑和。来访者太多，会客室坐不下，就到附近的公园或湖边去谈话。

1902年，俄国社会革命党成立了，其成员大都是来自于一些民粹团体和小组，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切尔诺夫、布列什柯夫斯卡娅、阿列克森齐也夫等。社会革命党坚持左派民粹派的观点，该党机关报是在国外出版的《革命俄国报》和《俄国革命通报》。

列宁认为，该党人“竭力用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时髦‘批评’的补订来修补民粹主义的空调”。社会革命党的理论体系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大杂

烩，他们抹杀无产阶级同小私有者的区别，否认农民内部的阶级分化，反对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社会革命党要求全部土地归社会所有，实行“土地社会化”，由公社和地区性的公社联盟按平均使用的原则来支配。他们鼓吹“英雄史观”，认为个人恐怖是同沙皇专制制度作斗争的主要手段，积极组织暗杀沙皇大臣和省长的秘密恐怖活动。

列宁这个时期认真研究了社会革命党的纲领和策略。

1902年6月27日，列宁在侨居巴黎的俄国政治侨民会议上做评社会革命党人的纲领和策略的报告。6月末—7月，列宁写成《为什么社会民主党应当坚决无情地向社会革命党人宣战？》一文。以后，列宁又连续发表了《革命冒险主义》、《谈当前问题（社会民主党人对社会革命党的态度）》、《社会革命党人所复活的庸俗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一个反社会革命党人的基本观点》等论文和报告，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列宁在这些著作和报告中指出，社会革命党人屈从于在俄国的民粹主义思潮，轻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作用，不承认阶级斗争的革命原则，企图以恐怖手段代替政治斗争。列宁指出：“我国这种以‘社会革命派’著名的社会思潮，实际上正

在离开而且已经离开了只有现在才有的、国际上唯一的革命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列宁认为，社会革命党人的纲领“完全离开了革命斗争的立场，而把自己所谓的社会主义降低到最庸俗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水平”。

1903年2月，列宁在巴黎俄国社会科学高等学校做了四次题为《对欧洲和俄国的土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讲演。这所学校是为侨居国外的俄国大学生开办的，学校的领导虽然同情自由主义民粹派和社会革命党人，但迫于学校教员的压力和《火星报》的巨大影响，不得不邀请列宁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来作报告，列宁的报告赢得了学生们的暴风雨般的掌声，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俄国人们所接受。

1903年春天，列宁的政治活动极为频繁，他先后为旅居英法的俄国人作了几场政治报告，同时还《给农村贫民。向农民讲解社会民主党人要求什么？》一书。该书于同年5月在日内瓦出版，并秘密运回俄国，受到了工人、士兵、教师和大中学生热烈的欢迎。列宁在这部著作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农民讲述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目标，分析了地主、农村资产阶级、中农、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经济状况与政治态度，阐述了建立工农联盟的伟大意义。他向农民

指出：“我们要争取新的、美好的社会制度：在这个新的、美好的社会里不应该分穷富，大家都应该做工。共同工作的成果不应该归一小撮富人享受，应该归全体劳动者享受。机器和其他技术改良应该用来减轻大家的工作，不应该牺牲千百万人民的利益来使少数人发财。这个新的、美好的社会叫社会主义社会。关于这个社会的学说叫社会主义。为这个美好的社会制度进行斗争的工人联盟就叫社会民主党。”他又指出：“俄国的全体工人和全体农村贫民应该左右开弓进行两方面的斗争：一方面同全体工人联合来反对一切资产者；另一方面同全体农民联合来反对农村中当官的、农奴主那样的地主。”

列宁在日内瓦生活得很愉快，星期天常同岳母、妻子一起到郊区去旅游，尽享这里大自然的美好的风光。1904年1月21日，他在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中写道：“最近我在这里和娜嘉（即列宁的妻子）以及另外一位朋友（指弗·维·林格尼克）去萨勒夫山作了一次极为愉快的旅行。山下边日内瓦一片云雾，朦朦胧胧，而在山上（海拔约12000公尺）则是灿烂的阳光、白雪、雪橇，俨然是一个俄罗斯的美丽的冬日。山下是……一片云雾的海洋，除了山峰之外，什么都看不见，而且只有那些很高很高的山峰才浮现出来，连小萨勒夫山（海拔500公尺）也整个淹没在云雾

里。”

在这时期，列宁的居住地成了一个革命的中心，从流放和监狱中逃往到国外的革命战友经常来拜访他，列宁总是热心地为他们安排衣、食、住、行，他家的大门始终对这些革命流亡者敞开着。如1903年5月初，列宁非常高兴地接待了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跑出来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维·巴·诺根和谢·瓦·安德罗波夫，彼此交谈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革命斗争的近况和发展趋势，列宁鼓舞他们继续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做贡献。

在1903年7月30日以前的一段日子里，列宁忙得不可开交。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就要召开了。各地的代表们陆陆续续来到日内瓦，他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纷纷前来拜会列宁，就各种重大问题向他求教，并提出了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宝贵建议。后来，他与这些代表们一起启程去参加党的“二大”。

第十三章 “党的二大”

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思潮和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 1903 年开始的。

——列宁

1903 年 7 月 30 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秘密开幕了。但在开了最初的几次会议之后，由于比利时警察局的干预，大会不得不移到英国伦敦继续举行，直到 8 月 23 日结束。

参加这次大会的有 43 名代表，拥有 51 票表决权，代表着俄国各地的 26 个组织，其中包括：“火星报”组织、“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劳动解放社”、“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崩得”中央委员会和国外委员会、“南方工人社”，14 个地方委员会，4 个社会民主主义同盟以及彼得堡被经济派控制的工人组织。列宁作为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国外同盟的代表出席了大会，拥有 2 票表决权。马

尔托夫则作为《火星报》组织的代表出席大会。

为了领导大会的各项工作，选举了大会主席团。普列汉诺夫因其资历和巨大的声望当选为主席，列宁和彼·阿·克拉西柯夫当选为副主席，轮流主持会议。

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在《火星报》所提出和制定的原则的和组织的基础上建立真正的政党”。由于代表的成分非常复杂，政治倾向不一，决定了在党纲、党章等重大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路线与机会主义实践线必然会展开的激烈斗争。

普列汉诺夫主持大会开幕式，列宁则主持了第十八、二十五、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次会议，列宁被选入代表大会的党纲委员会、党章委员会和资格审查委员会。他几乎就议程上的所有问题发了言，仅仅载入大会记录的发言、批评和答辩就有120多次。他写了关于代表大会的详细日志。在各种会议上，列宁无拘无束地同代表们倾谈，互相探讨要解决的问题，给代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普列汉诺夫摆老资格，孤芳自赏，使人难以接近的举止，两个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在大会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普列汉诺夫旗帜鲜明地坚决同列宁站在一起。在大会期间，经济派分子弗·彼·阿基莫夫曾经想挑拨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之间的合作关系，普列汉

诺夫用开玩笑的口气回答他说：“拿破仑很想使自己的元帅们和他们的夫人离婚；有些元帅对他屈服了，虽然他们爱自己的夫人。阿基莫夫同志在这方面很像拿破仑，他费尽心思想把我和列宁分开，我相信列宁也不打算跟我分开。”听说了这件事后，列宁从心底感谢这位革命家。在这次大会上，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在原则问题上互相支持，工作上彼此配合，这也是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大会最重要的事情是讨论党纲。与会代表们大都同意以《火星报》编辑部提出的党纲草案为基础。但涉及到一些问题时，立即出现激烈的争论。经济派分子弗·彼·阿基莫夫和亚·萨·马尔丁诺夫，崩得分子米·伊·李伯尔等，反对把无产阶级专政条文写入党纲，他们把专政看成是同民主原则不相容的，主张基本民主原则具有绝对价值，要求党的政策服从基本民主原则。托洛茨基也以无产阶级在俄国人口中不占多数为理由，反对把无产阶级专政条文写入党纲。以列宁为首的火星派在会上坚决驳斥了上述错误观点，列宁就这一问题做了多次发言。普列汉诺夫在大会发言中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列宁的观点。

在讨论党纲问题时，经济派首领马尔丁诺夫还断章取义地引用列宁的名著《怎么办？》中的某些章

节，反对此书中所论证的党必须向工人阶级灌输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鼓吹工人阶级会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普列汉诺夫尽管认为《怎么办？》一书的某些论述不能令人满意，但是还是出面维护列宁的著作，驳斥了马尔丁诺夫的攻击。他的发言遭到机会主义者的坚决反对，受到了以列宁为首的坚定的火星派分子的热烈欢迎。

最后，大会除 1 票弃权外，一致通过了《火星报》提出的党纲，并对制定这个党纲的《火星报》编辑部表示感谢。大会所通过这个党纲，是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制定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它第一次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确定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任务。

在讨论有关党中央机关报的问题时，根据列宁建议，代表大会决定确认《火星报》取代《工人报》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

大会的另一件大事是讨论党章。在确定什么样的人可以当党员第一条时，引起了热烈的争论。会上提出了两个互相对立的条文：一个由列宁提出，受到坚定的火星派支持，一个是由马尔托夫提出，受到某些机会主义者的拥护。列宁的条文规定：“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

都可以成为党员。”马尔托夫的条文虽认为党员必须承认党纲和在物质上支持党，但却未把参加党的一个组织作为党员的必要条件，认为不参加组织而只是用某种方式（例如在财政上）帮助党的人也可以成为党员。按照列宁提出的党章条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能够建设成为一个有严密的组织、钢铁般的纪律、坚强战斗力的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部队。马尔托夫的党章条文，只会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变成一个组织涣散、纪律松弛、成分复杂，因而没有任何战斗力的一般工人群众组织。

但是在最后表决时，因为经济派分子、崩得分子、“温和的”火星派分子和中间派都支持马尔托夫，马尔托夫的党章条文以 28 票得以通过，而列宁的党章条文获得 22 票。但是列宁提出的党章的其余条文，均以多数票获得通过。这样，《火星报》编辑部第一次分裂了。“劳动解放社”的成员们也第一次在原则问题上出现了重大分歧：普列汉诺夫支持列宁的党章条文，而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和波特列索夫支持马尔托夫的党章条文。

在选举党的领导机关——党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之前，在代表大会成员中发生了有利于以列宁为首的坚定的“火星派”的显著变化。由于大会否决了崩得分子在组织问题上的民族

主义要求，于是五个崩得分子的代表退出了大会；又因为代表大会拒绝承认经济派分子把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作为党的国外代表机关，两个经济派分子的代表也退出了大会。因此，力量的对比上，以列宁为首的坚定的火星派占据了优势。

在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关时，代表大会又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列宁认为，必须把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选进党中央委员会。马尔托夫等人则竭力想使“温和的”火星派分子和中派分子把持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大权。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在《火星报》编辑部内部查苏利奇和阿克雪里罗得总是站在普列汉诺夫一边，无形中形成为一派；而列宁、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则是另一派。在大会选举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编委前，列宁根据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波特列索夫不经常参加报刊的编辑工作并很少给报刊写文章的情况，为了提高编辑部的工作效率，他提议把《火星报》的编委由原来的 6 人改为 3 人。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对这个计划表示同意。他们认为，这个三人小组的计划是为了对付普列汉诺夫的。列宁也把这个计划告诉了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一句话没有说，读完后默默地放到口袋里去了。他清楚了这是怎么回事，但还是同意了。既然是个政党，那

就需要切实的工作”。

可是到大会要选举《火星报》编委时，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已经完全站在列宁一边，而马尔托夫在编辑部中必然陷于孤立；只有把原来的6名编辑都选上，拥护他的人在编辑部里才能占多数。因此，马尔托夫改弦更张，由原先同意选3名编委，改为提出维持原来6名编委的方案。于是在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8月20日，大会进行了表决，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被选为党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编委，马尔托夫的计谋破产了，但他拒绝担任编委。于是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委托当选的两名编委——列宁、普列汉诺夫，物色一名合适的编委人选。

根据新党章的规定，大会还产生了党的委员会。普列汉诺夫当选为总委员会主席，列宁出任总委员会委员。

就是从这时起，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拥护列宁的人因为在选举党中央领导机关时获得多数，因此被称为布尔什维克（意即多数派）；反对列宁的人在选举党中央领导机关时占少数，被称为孟什维克（意即少数派）。布尔什维克信奉和坚持的理论体系称为布尔什维主义，孟什维克主张信奉和坚持的理论观点称为孟什维主义。布尔什维克派与孟什维克

派的划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在俄国的继续和发展。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列宁做了许许多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为大会召开做了周密的准备，主持了大部分会议，写了几乎所有决议案的草案，做了详细的会议记录。大会期间，他自始至终坚持正确的革命立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原则，为大会的圆满成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俄国制定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党纲，选举了党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以列宁、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坚定的“火星派”取得了对机会主义分子的胜利。

大会结束以后，列宁和多数派代表一起去海格特公墓拜谒卡尔·马克思的陵墓。随后，很快离开伦敦返回日内瓦，立即投入捍卫党的“二大”决议的斗争。

在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和会后一个时期，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的根本分歧主要集中在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建设上。布尔什维克主张把党建设成为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党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孟什维克则主张以西欧社

会民主党为榜样，把俄国社会民主党建设成为一松散的政治组织，党内容许各种思潮和派别组织的存在。这些分歧在党的二大上表现在党纲和党章问题上，在会后则表现在组织问题上。

孟什维克不甘心于他们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遭到的失败，暗中成立了以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托洛茨基为头子的反对派组织。他们以国外同盟为据点，进行分裂破坏活动，最终夺取党中央的领导权。他们明目张胆地攻击布尔什维克，硬要把在党的二大上落选的原《火星报》编委波特列索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等 3 人补选进《火星报》编辑部，并提出要把孟什维克的代表补选为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以便使他们的人在《火星报》编辑部里占据多数，在党中央委员会里与布尔什维克的人数相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权威考茨基也公开支持他们的分裂活动。1904 年 5 月 14 日波特列索夫给阿克雪里罗得写信说：“我急于想告诉您一个消息，我刚刚得到考茨基的口信，他允许我们在《火星报》上发表他给利金（即利亚多夫——引者注）的回信。看来，第一颗炮弹造好了，感谢上帝帮忙，列宁就要飞上天了。我认为制定一项反列宁运动的总计划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要轰炸他，就要把他炸垮，要讲究方法，要按计划行事。如何打击列宁——这还是一个问題。我

认为，首先应让权威们——考茨基、罗莎·卢森堡和帕尔乌斯去反对他。”

为了保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团结，列宁准备在不违背原则的基础上，对马尔托夫等人作一些让步。列宁、普列汉诺夫和新当选的党中央委员诺斯科夫商量，在保证《火星报》编委有两人（其中有一人属于布尔什维克派）参加党的总委员会的条件下，主张把原《火星报》的4名编委‘马尔托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波特列索夫’都补选上。可是这个方案遭到了马尔托夫等人的拒绝。9月25—28日，列宁、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代表唐恩谈判两派缔结和好协定的条件，然而毫无进展。10月4日，谈判继续进行，结果也以失败而告终。列宁、普列汉诺夫又代表《火星报》编辑部邀请4名旧编委为该报撰稿，仍遭拒绝。接着他们又于10月6日给马尔托夫写信，还给《火星报》旧编委及托洛茨基各写了一封信，建议他们参加《火星报》的工作。

为了两派和好，布尔什维克做了极大的努力，但均因孟什维克没有诚意而未奏效。孟什维克胃口越来越大，他们不但想把《火星报》的编辑大权夺到手，而且还想控制党中央委员会。

在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斗争激烈、僵持不下的形势下，1903年10月26—31日，俄国革命社会民

主党人国外同盟在日内瓦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孟什维克企图利用这次会议攻击布尔什维克，进而全面控制同盟。布尔什维克准备在会上揭露孟什维克。而普列汉诺夫则期望：通过这次同盟代表大会，消除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的的意见分歧。

在历史上，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是同经济派决裂的产物，如今却变成为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斗争的战场。列宁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做了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立即发言，诽谤列宁实行“昏聩刚愎的大官的”中央集权制，坚持“官僚主义”，等等。克鲁普斯卡娅描绘了孟什维克在会场上围攻列宁的疯狂情景。她写道：“在‘同盟’代表大会行将召开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骑在自行车上沉思，因而撞到电车上去了，几乎把眼珠撞出来。他扎着绷带、脸色苍白地出席了‘同盟’代表大会。孟什维克怀着仇恨心疯狂地向他进行攻击。我记得一个野蛮的场面——唐恩、克罗赫马尔等人的怒气冲冲的面孔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他们跳了起来，疯狂地敲打着会议桌。”

普列汉诺夫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支持列宁，驳斥了马尔托夫、托洛茨基诬蔑列宁搞“昏聩刚愎的大官的”中央集权制等谬论。他说，“托洛茨基同志建议

不要滥用像‘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等这样的词。无论这个建议可能是坏的或者是好的，他都应当尽量避免像‘昏聩刚愎的大官的’中央集权制、‘官僚主义’和其他等等这样一些说法。这些说法同我使用的那些说法相比，是更不适当的。我不明白，为什么不可以使用‘无政府主义’，而却可以使用‘官僚主义’和‘昏聩刚愎的大官’。哪种说法更坏些、更尖锐些呢？在这种场合不由地使人回忆起这样一个野蛮人，这个野蛮人在回答辱骂谁的妻子好的问题时回答说‘辱骂我的妻子不好。而辱骂别人的妻子才好。’”

由于在同盟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孟什维克占绝对优势，所以大会在孟什维克操纵下，很容易通过孟什维克提出的同盟章程，而这个章程的目的是要把同盟变成了孟什维克控制的一个桥头堡。列宁在会上多次发言，捍卫布尔什维克的建党原则和立场。大会期间布尔什维克代表曾经三次退出了会议。

10月31日晚上，列宁等11个布尔什维克代表集中在兰多利特咖啡馆开会，商量下一步怎样对付孟什维克的破坏党的团结的行动。普列汉诺夫参加了这次会议，但他在这个关键时刻立场发生了动摇，主张进一步与孟什维克实行妥协。一段时间以来，普列汉诺夫虽然在原则问题上支持了列宁，但他的内

心世界一直是充满矛盾的，他并不希望与孟什维克彻底决裂。

在会上，一些人耐心地批评了他的错误想法。但普列汉诺夫以专制制度有时也会让步为由，为他的主张辩解。克鲁普斯卡娅后来回忆了这次会议的情形。她写道：“在布尔什维克的会议上，普列汉诺夫宣称应当让步。他说，‘有时候，专制制度还被迫让步呢。’——‘那时人们也就会说专制制度动摇了’，丽莎·克奴尼安茨反驳道。普列汉诺夫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普列汉诺夫不听布尔什维克的良言相劝，决定向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做出最大限度的让步，他认为，党内两派必须和好。他一再声明：“我不能向自己人射击。”他还威胁说如果不按他的意见办，他就准备辞职，退出《火星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普列汉诺夫已被孟什维克马尔托夫等人的气焰嚣张的破坏活动所吓倒，看不清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分歧是原则性的分歧。普列汉诺夫错误地认为，既然德国等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内容许各种派别合法存在，那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也应允许各种思潮和派别存在。

对于普列汉诺夫这种以让步求团结的主张，列宁等人既惋惜又气愤。尽管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从前

在起草党纲、创办《火星报》时，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甚至为此争论得面红耳赤，但这些意见分歧通过谈判、协商，都正确地解决并消除了隔阂，继续团结战斗，为什么今天不能通过推心置腹的商谈，心平气和地消除分歧呢？想到这些，列宁心潮起伏，决心再次争取昔日的战友，不能眼看着他滚入机会主义的泥潭。列宁于11月1日心情沉重地给普列诺夫写信。信中写道：“亲爱的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我非常非常了解您要向马尔托夫派让步的动机和想法。但是我深信，在目前让步是最下策，它的后果很可能是引起风波和吵闹，而不是和马尔托夫派斗争。这不是奇谈怪论。”“为了统一，为了党的巩固，请您不要承担这一责任，不要离开，不要把一切交给马尔托夫派。”

但通过长期的接触和观察，列宁此时对普汉诺夫也有了较深刻的了解，他已经不再抱大的幻想了，做好了进一步斗争的准备。11月1日，他致函普列汉诺夫，声明退出《火星报》编辑部。列宁试图用这种方式阻止普列汉诺夫与机会主义者妥协。但普汉诺夫并没有听从劝告。11月3日，普列汉诺夫收到波特列索夫交给他的同布尔什维克派和议条件的通知书。其条件十分苛刻：（一）谈判的双方是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二）恢复《火星报》的原

编辑部；（三）补选中央委员，人数在谈判中确定。谈判开始后停止补选中央委员；（四）党的总委员会里占 2 席（指孟什维克占 2 席——引者注）；（五）承认同盟代表大会是合法的。普列汉诺夫接到这个书面通知后，要求党中央委员会让步，否则，他将辞职。

普列汉诺夫对孟什维克作出的原则性让步可能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造成严重后果。列宁于 11 月 4 日给党中央委员会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写信，列宁深感党内局势严重。他在第二天（5 日）又给弗·亚·诺斯科夫和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写信，他呼吁道：“应该让扁角鹿（即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引者注）和尼尔（即诺斯科夫——引者注）尽快到这里来，现在是决定关头，如果中央委员会不准备坚决斗争，不准备斗争到底，倒不如干脆把一切都交给他们。容忍这种败坏行为，参预这些勾当，就是毁灭全部事业。我再说一遍，这是我个人的意见。无论如何请你们立刻来，以便共同决定该怎么办。”

当时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和诺斯科夫正在国内基辅，他们接到列宁的信后很快就来到国外。但令列宁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回国后向党的各委员会发了一封信，信抹杀了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分歧的实质，主张对孟什维克持调和主义立场。列宁对此感到很惊讶。

11月5日，普列汉诺夫为了给马尔托夫分子补选进党的总委员会创造条件，要求中央委员加尔佩林辞去党的总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他扬言，否则他就辞去党中央领导职务。克鲁普斯卡娅后来回忆说：“普列汉诺夫的让步使反对派更加嚣张了，普列汉诺夫坚持中央委员会的第二个代表卢（科尼亚加，真姓是加尔佩林）退出总委员会，以便给孟什维克腾出位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个新的让步犹豫了很久。我记得，我们三个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科尼亚加和我——傍晚站在波浪汹涌的日内瓦湖的岸上，科尼亚加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意他的辞职。最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决定了——他到普列汉诺夫那里去说，卢退出总委员会。”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马尔托夫篡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权的野心愈来愈大了。他想先控制《火星报》，再控制党中央委员会，最后逐步占领党的总委员会的席位。

在马尔托夫分子和普列汉诺夫的双重压力下，列宁没有动摇怯懦，而是继续坚持斗争。他一方面揭露马尔托夫分子践踏党代表大会决议、分裂党的破坏行为，另一方面又批评普列汉诺夫的调和主义立场，争取他重新回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在11月1日至18日短短半个月中，列宁就给普列汉诺夫写了3

封信。为了避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走向分裂，列宁曾经设想做一些必要的让步。例如，1903年11月4日他从日内瓦往国内寄了一封给中央委员会的信，针对马尔托夫分子提出的和好条件，提出了两个让步的方案。第一个方案是：（一）补选3人到编辑部；（二）同盟中维持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前的状况；（三）总委员会里有1票。如果马尔托夫分子不接受，还有第二方案：（一）补选4人到编辑部；（二）经过中央委员会选择补选2人到中央委员会；（三）同盟维持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前的状况；（四）总委员会里有1票。但由于马尔托夫分子野心太大，要价太高，党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又都持同孟什维克调和的立场，因而列宁的方案未能付诸实现。

在列宁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党中央委员会里的多数布尔什维克又主张同孟什维克妥协的情况下，普列汉诺夫独掌了《火星报》编辑部大权。为了讨好孟什维克，他不惜违背“二大”的决议，于1903年11月26日擅自把以前落选的孟什维克编委波特列索夫、巴·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和在二大上被选进编辑部、但声明不参加工作的马尔托夫，补选进《火星报》编辑部。后来普列汉诺夫为自己的这种行为辩解说：“我所进行的补选并不违反代表大会的决议，因为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准许编辑部可以根

据自己的考虑补充自己的成员。”这样，《火星报》编辑部和党中央委员会就都被孟什维克夺去了。

在列宁退出《火星报》编辑部之后，普列汉诺夫自己编辑了《火星报》第 52 号。于是，从此开始《火星报》就由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变成了孟什维克鼓吹机会主义的喉舌。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孟什维克在国外占绝对优势，它掌握了活动资金和报纸，而布尔什维克则在国内有相当广大的阵地。但广大党员对党的二大上发生的分裂迷惑不解，因此布尔什维克需要在理论上阐明党的二大分裂的真相，说明孟什维克组织原则的机会主义实质，也要求布尔什维克对国内外的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做说服教育工作，争取他们尽快回到布尔什维克立场上来。

1904 年 5 月 19 日，列宁的新作《进一步，退两步》在日内瓦出版了。这部著名的著作是《怎么办》一书的续稿。在这本书中，列宁详细地分析了党的二大和会后两条路线斗争的全部过程，明确地指出党内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倾向，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政党。他指出，孟什维克分子以前反对过经济派和崩得分子，而如今实际上采取了他们的立场，而一些折衷调和分子则帮了他们的忙。列宁严肃地批判了孟什维克在建党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捍卫和发展

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系统地阐述布尔什维克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观点，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完整理论。

列宁的这部著作立即遭到了孟什维克的猖狂攻击。5月28日，普列汉诺夫在《火星报》上发表题为《现在不能沉默（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的文章，硬说：“列宁出版了一本在我们的内部纠纷史上会起火上加油的作用的小册子。”要求党中央委员会在原则上与列宁划清界限。在文章中，普列汉诺夫还诽谤列宁利用党中央国外代表的权力“继续竭尽全力地把我们党直接推到分裂的边沿”。以他这个极其荒谬的理由，要求党中央委员会撤销列宁的中央驻国外代表的权力。

1904年6月14日，《火星报》第67号的附刊上发表了马尔托夫的文章《前进还是后退？》，副题是“代悼词”，文章攻击列宁的著作《进一步，退两步》无的放矢，因而此著作的发表意味着列宁在政治上死亡。潘·尼·勒柏辛斯基看过马尔托夫的文章之后，画了一幅《老鼠葬猫》的漫画，非常气愤，他立即画了几个老鼠在埋葬被捆住爪子的猫。他笔下的老鼠活像马尔托夫、唐恩、波特列索夫等几个活跃的孟什维克。漫画的说明词借用了茹可夫斯基的童话《老鼠和青蛙的战争》的结尾部分。列宁看到这幅漫

画之后笑得前俯后仰，要勒柏辛斯基把漫画石印出来。列宁又对漫画一个地方提出修改意见，并说政治漫画不要庸俗地讽刺对手的私事。这幅漫画印刷后，在日内瓦广泛传播。

1904年7月，在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缺席的情况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七月宣言》，撤销了列宁的中央国外代表权力。《宣言》还为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观点辩护，规定不经党中央批准不许出版列宁的著作，确认普列汉诺夫把落选的孟什维克的原《火星报》编委塞进编辑部完全合法。由于这次中央委员会强行补选了主张同孟什维克调和的布尔什维克柳比莫夫、卡尔波夫、杜勃洛文斯基，从而使主张同孟什维克调和的人在中央委员会里占据了多数。这样，在帮助孟什维克夺取了中央机关报之后，普列汉诺夫又进而夺取了中央委员会。

1904年7月上旬，列宁为了放松一下，同妻子克鲁普斯卡娅背着背包在瑞士作了一次长途旅行。他们从洛桑向蒙特勒方向进发，登蒙特勒山，下到罗纳河谷，去别列卡拜访克鲁普斯卡娅少年时代的一位女友，然后沿河往上游走，越过格米帕斯来到奥别尔兰德，一直走到布里恩茨湖畔。在伊捷尔特瓦耳德停留了一周之后，又继续旅行。在路上，一位开酒店的社会民主党人告诉他们：“你们不要跟旅行家一块儿

吃饭，跟马车夫、汽车司机、粗工们一块吃，这样就可以节省一半费用，而且吃得更饱些。”他们这样办了，每次午餐都吃得丰盛、便宜。世界旅游胜地瑞士自然风光绚丽多姿，巍峨壮丽的雪山，清澈湛蓝的湖泊，美丽如画的草地，河流和瀑布，使列宁夫妇大饱了眼福，也使他长期以来过度疲劳的身心得到了一次彻底的休息。很快，他又恢复了健康和力量，工作中又充满了蓬勃之气和活力。

1904年7月末，在列宁的领导下，22位布尔什维克分子在日内瓦附近举行了会议。会议讨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危机和布尔什维克应采取的对策等重大的问题。

列宁认为：国内外的布尔什维克当前的任务是团结起来，创办自己的出版社和报纸，同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理论进行坚决的斗争。

7月末至8月初，列宁派年轻的犹太女革命家埃森赴巴黎，找侨居在那里的亚·亚·波格丹诺夫、安·瓦·卢那察尔斯基、奥里明斯基，同他们商量来日内瓦同列宁会面的时间。

埃森临走前问列宁：“巴黎有哪些地方值得去看看？”

你“首先应该到拉雪兹神父墓地去瞻养公社战士墙，还有1789年革命博物馆，后者就艺术造型而

论价值据说不大，但它的内容倒是很有意思的。”

“还有呢？”

“动物园一定得去，参观之后您会觉得仿佛做了一次环球旅行。”

听了这句话，埃森觉得十分开心。当列宁发觉埃森还想知道什么，于是又补充了一句：“喂，有关博物馆、展览会这些事，您去找若尔日（普列夫）好啦，他对这方面很内行，一定会给您有益的指点。”

这时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住在洛桑附近的拉犯—戴—布列湖畔一个偏僻的农村，他们在这里度过了整个8月份。列宁高兴地帮助一位农民房东种菜，头顶烈日劳动，对他来说是最好的休息。列宁在这里同奥里明斯基、波格丹诺夫、彼尔武申一起商定在国外出版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以便为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进行宣传鼓动工作。

9月1日，经过一番紧张忙碌筹备工作，在列宁领导下，有弗·邦契—布鲁也维奇参加的社会民主党书刊出版社开始进行工作了。他们先后组织出版了列宁、奥里明斯基、沃罗夫斯基、利亚多夫、波格丹诺夫等布尔什维克人士撰写的小册子，并将这些小册子秘密地运往国内。

1904年11月至12月，在俄国三个地区（南方区、高加索区、北方区）的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的代表

会议上，成立了由列宁、泽姆利亚奇卡、波格丹诺夫、马·利亚多夫、利特维诺夫、鲁缅采夫等组成的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这个常务局积极开展了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1904年12月初，列宁在巴黎和瑞士的一些城市做了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情况的报告，一来为了宣传布尔什维克的主张，二来要把做报告得到的钱用来创办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列宁来苏黎世做报告的前夕，当地的布尔什维克都高兴极了，社会革命党人则十分紧张。一位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给领导人切尔诺夫写信说：“我们万分地恳求您以列宁的反对者的身份来给我们做专题报告。听说列宁将在日内到达这里。他什么时候来，我们将用电报通知您。我们能不能在这儿存在下去全仗您的舌头了。社会民主党人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他们几乎每一星期都派一个专题报告员来，我们中间有些人因为没有反对者而感到苦恼。”

在巴黎做完报告的第二天，列宁在卢那察尔斯基的陪同下去拜访了久负盛名的雕塑家阿隆松，卢那察尔斯基与阿隆松是好朋友。阿隆松一见到列宁，就请求为列宁至少塑一个头部浮雕像。看到列宁气度不凡，有开阔饱满的前额，一对深邃的眼睛，炯炯有神，富有表现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在阿隆松看

来，列宁的头部形象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头部形象非常相似。

1904年12月12日，在列宁的主持下，在日内瓦举行了布尔什维克会议，会议主题是讨论出版布尔什维克的党报问题，拟定担任编辑的几位同志出席了会议。在会议开始时，列宁一一介绍了出席会议的同志，随后详细地讲了办报的重要意义和计划。他建议报纸叫《前进报》，他说：“这个报纸名称好。”与会者展开了热烈讨论。最后大家一致同意编辑出版《前进报》，这一名称表示，布尔什维克将为巩固无产阶级政党、完成俄国革命大业而奋勇向前。

12月23日，在解决了报纸的出版印刷经费之后，印发了经列宁修改的出版《前进报》的通告。12月24日，列宁给埃森写信，表示为布尔什维克即将有自己的党报而异常兴奋。他在信中写道：“现在我们情绪高涨，大家都拼命干。昨天发表了我们的《前进报》出版的广告。所有的多数派都空前的欢欣鼓舞。令人厌恶的无谓争吵终于被打断了，我们开始同那些愿意干事而不想胡闹的齐心协力地工作。”

列宁要求《前进报》标题鲜明准确，语言简洁易懂，出版及时。他自己用铅笔计算出每版的铅字数目。为节省版面，他要求尽量把废话删掉。对重要的文章他要做反复修改，例如：卢那察尔斯基起草的关

于出版《前进报》的通告，他就修改了三次。但是他对作者个人文章进行修改时，一向十分尊重作者的文风。而且，他还能认真听取编辑部里每位同志的意见。当时在《前进报》编辑部负责校对工作的卡尔宾斯基（加里宁）在校对一篇文章校样时，发现有一处叙述得不妥当，就去找列宁。列宁看了看校样，思索了片刻，说：“我们要讨论一下。”说完，他就走进了编辑部办公室。几分钟之后，他拿着校样走了出来，说道：

“不用改，我们决定还是照原来的样子发表。”

列宁还很注意不断提高编辑人员的素质。当卡尔宾斯基拿着自己写的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文章念给列宁听时，念到一半就感到论述得不清楚，文章逻辑有些混乱，因而十分难为情。列宁鼓励他说：“那么把题目好好考虑考虑。写吧，写下去！您一定会成功的！”

在列宁的鼓励下，卡尔宾斯基发表了《社会革命党人在活动》一文，用的笔名是维·加里宁。以后列宁见到卡尔宾斯基总是说：“嗯，加里宁同志，写了点什么新东西吗？”

在办《前进报》时，列宁非常重视工人写来的每篇稿件，尽管有些稿件的字迹很潦草，但他还是逐字逐行地读。当读到一篇好稿子时，他有时会激动得站

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自言自语地说：

“了不起，这是一篇多么好的文章啊！”

他有时对稿中的某个地方不满意，便亲自动手进行修改，但他尽量保持工人通讯员来稿中的独特的语言、写作风格和论证方式。他有时只在文稿中加上个把词、一二句话，就会使文稿立即变得“文采飞扬”。

列宁常对加里宁等人夸奖工人来稿。有一次他兴奋地对加里宁说：“他们写得朴素，写得好，他们多么会写呀！我们要是也能学会这么写作该多好！”他再三强调：“愈是接近口语，愈好！作者能从这方面来观察问题，运用我和你们都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那些词句和论据，这是很不错的。”

第十四章 革命爆发

俄国正在发生一系列最伟大的历史事件。无产阶级起来反对沙皇制度。

——列宁

1904年2月6日，日本不宣而战，突袭俄国在旅顺口的要塞，一场争夺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帝国主义战争——日俄战争爆发了。不久，驻在旅顺口的俄军向日本投降。战争破坏了俄国经济，暴露了沙皇专制制度的腐朽，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巨大的苦难，加剧了国内阶级矛盾。

列宁认为，一场人民革命风暴就要来临了。

1905年1月14日，《前进报》上发表了列宁的文章《旅顺口的陷落》。列宁在文章中指出：“不是俄国人民，而是专制制度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俄国人民从专制制度的失败当中得到了好处。旅顺口的投降是沙皇制度投降的前奏。”

1905年1月16日，彼得堡最大的普梯洛夫工厂因厂方无理开除4名工人，举行了大罢工，参加者达到1.2万人。1月20日，全市各工厂工人举行总罢工进行声援。沙皇政府立即向彼得堡市调集了4万多名士兵和警察，准备以武力镇压工人。在加邦的煽动和组织下，1月22日，14万彼得堡工人及家属口里念着祈祷文，手里举着圣像和沙皇的相片，由加邦牧师率领，前往冬宫，向沙皇递交请愿书。早已埋伏好的反动军警以武力残酷地镇压了这次和平请愿，结果有1000多人被打死。这个事件5000多人受伤，在俄国历史上被称为“流血星期日”。

彼得堡流血星期日激怒了广大人民群众，俄国立即爆发了规模空前的罢工浪潮，仅在1月份，罢工人数就达到44万，并且由经济罢工发展为政治罢工。彼得堡工人阶级提出“打倒沙皇专制制度！”“不自由，毋宁死！”的革命口号。一些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甚至发生了严重的武装冲突。2月在奥廖尔、沃罗涅什和库尔斯克等省，掀起了农民运动的浪潮，贫苦农民起来夺取地主的土地和牧场，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

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是在“流血星期日”的第二天得知这一消息的。他们激动极了，立即与同志们唱起了革命歌曲：“您为革命而牺牲……”就在这一天，

列宁写出了一篇文章《俄国革命》。在此后的一个多星期里，他一口气写出了一组评论彼得堡流血事件的文章，总标题是《革命的日子》，分别发表在《前进报》的第3、4号上。列宁在文章中指出：“流血星期日”是一场真正的革命，“革命就是战争。它是历史上所有一切战争中唯一合理的、正当的、正义的、真正伟大的战争。它不像任何其他战争那样，是为了维护一小撮统治者和剥削者的自私利益，它是为了人民群众反对暴君的利益，为了千百万被剥削者和劳动者反对专横和强力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

列宁在“流血星期日”事件之后，细致地研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革命战争和武装起义的军事著作，思考了武装起义的组织、战略战术及具体技术等问题。这一时期，他对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发生了浓厚兴趣。他校译了巴黎公社将军克吕泽烈的回忆录《论巷战》的俄文译文。此时，他正在反复思考着一个重要问题：在俄国人民革命斗争中怎样借鉴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

在1905年革命爆发之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策略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分歧。孟什维克认为，这次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革命，那么革命的领导者和主力就必然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参加革命要以不吓跑资产阶级为前提。布尔什维克则认为，这场革命

虽然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无产阶级不仅要积极参加，而且要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及时把它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认为，为了克服孟什维克在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拟定统一的革命策略，必须立即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党的三大开幕前夕，列宁先在日内瓦、后在伦敦会见前来参加大会的代表，广泛地了解了国内党的工作情况，向他们介绍党的三大准备情况。例如，列宁同米·格·茨哈卡雅交谈高加索党的工作情况，又同马·尼·利亚多夫谈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列·波·克拉辛和阿·伊·柳比莫夫所持的立场。

1905年4月25日至5月10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伦敦举行。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24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4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他们分别代表着20个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党的地区委员会。列宁作为敖德萨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了大会。

14个由孟什维克领导的党的地区委员会拒绝参加党的三大，他们派代表在日内瓦召开了第一次全俄党的工作者代表会议。

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由年纪最大的代表茨哈卡

雅宣布开幕，并致了开幕词，开幕词是由列宁起草的。

列宁当选为大会主席，并指导了这次大会的全部工作。他在大会上就武装起义、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党章及其他问题做了大约 140 次发言。大会通过的关于武装起义、关于临时革命政府、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公开的政治活动、关于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等主要决议都是列宁草拟的。

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指出：“组织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来直接同专制制度斗争，是党在目前革命时期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务之一。”

代表大会通过了新党章，列宁提出的党章第一条第一次被党代表大会确认。《党章》第一条写明：“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工作的人，都可以作为党员。”

大会确定了党中央机关报为《无产者报》。

5 月 10 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委员会作为党中央的唯一领导机关，代替了原来并存的三个中央机关——党中央机关委员会、党中央机关报编委会和党总委员会。当选的中央委员有：列宁、波格丹诺夫、克拉辛、德·谢·波斯特洛夫斯基和阿·伊·李可夫。候补中央委员有埃森、彼·彼·鲁缅采夫

和古谢夫。中央委员会任命列宁为《无产者报》主编和中央驻国外代表。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同期召开的第一次全俄党的工作者代表会议制定了两条根本对立的策略路线。布尔什维克主张：革命由无产阶级领导，工人和农民结成联盟，举行武装起义，建立工农民主专政，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孟什维克则主张：革命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用和平的方法改变沙皇制度，召集杜马一类的代表机关作为全国革命力量的中心，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半途而废。在1905年革命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各自坚决贯彻自己的策略路线，并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5月10日党的三大闭幕之后，列宁和出席大会的代表一起去伦敦海格特墓地拜谒马克思墓。

海格特墓地是一个雄伟肃穆的处所，具有维多利亚时代庄重的优雅的文化特色。这里有许多历史名人的墓碑和浮雕，场地宽阔，园林幽深，景物典雅怡人。墓地的主人他们找到了马克思的墓穴。

代表们在马克思墓前肃穆地站立了很久，然后坐下来，不愿意离去。戴着高高大礼帽的墓地主人看到代表们在马克思墓前停留很长时间而不离去迷惑不解时，列宁对代表们说：

“这个可怜的资产阶级分子不会想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切的不朽的、永生的东西我们都继承下来了；这些东西甚至在落后的沙皇俄国我们都要使之实现，这使各国资产阶级都怕得要命。”

离开伦敦前，列宁同茨哈卡雅、克鲁普斯卡娅和罗·萨·捷姆利亚奇卡一起参观了不列颠自然博物馆和动物园。返回日内瓦途经巴黎时，列宁又同他们一起参观了艾菲尔铁塔和罗浮宫，并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拜谒了巴黎公社战士被枪杀的地方——贝尔—拉雪兹公墓“公社战士墙”。

列宁夫妇和茨哈卡雅在到达法国边境城市布伦市接受边境检查时，应沙皇特务法国警察当局的要求，对他们三人进行了特殊检查，名义上检查是否携带走私香烟，在场的还有几名俄国暗探。列宁没有让警察打开装有大会记录的文件夹，他坚定沉着地回答说：

“那里没有什么香烟。我们都不会吸烟，又不是商人。”

警察没有搜到什么，也没有找他们的麻烦。

1905年5月上半月，在日内瓦举行了一次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共同参加的报告会，与会的孟什维克人数比布尔什维克多。第一位做报告的人是孟什维克首领马尔托夫，他驼着背，不停地吸烟，讲话

声音稍微嘶哑。他在报告中为孟什维克的代表会议辩护，攻击党的三大通过的决议是“雅各宾主义的决议”。他的报告冗长乏味。但孟什维克却拼命地给他鼓掌叫好。列宁坐在主席台上，神情镇定，唇边不时地掠过一丝讥讽的笑容。

马尔托夫做完报告之后，列宁立即走上了讲台。他做报告时，把两个大会的决议进行了比较，辛辣地嘲笑了孟什维克代表会议的决议含糊不清、模棱两可，透彻地论述了党的三大的决议内容准确，充满了革命的斗争精神，气得在场的孟什维克几乎要发疯。但由于列宁的讲话不仅论据充分，逻辑严密，而且深入浅出地说明了许多大道理，极具说服力，所以博得了大多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就连一部分孟什维克分子也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代表大会的召开在俄国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党总委员会委员普列汉诺夫拒绝参加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召开的两个会议。三大闭幕后，普列汉诺夫于1905年6月16日给社会党国际局写信，信中完全站在孟什维克的立场上，把党的三大的召开诬蔑为“擅自行动”，把代表大会诽谤成只有“一半左右的‘全权的’组织”参加的“极端集中主义者和泥潭派的结合体”，乞求社会党国际局来干涉俄国党的内部事务。社会党国际局竟然听

信了他的一派胡言，在 1905 年 6 月打着“调停”的旗号，组成仲裁委员会，妄想采取组织干涉的办法，强迫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停止争论”，并接受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策略。与此同时，考茨基在《莱比锡人民报》上著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分裂》，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中派面孔，把党的三大决议说成是“列宁和他的朋友对普列汉诺夫和他的朋友的攻击”，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慕尼黑党内出版社出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企图不让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听到布尔什维克的声音。

党的三大闭幕后，列宁仍想尽力争取普列汉诺夫回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1905 年 5 月 20 日，列宁主持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任命普列汉诺夫为党的学术机关报主编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代表，其前提条件是普列汉诺夫承认和遵守党的三大通过的各项决议。

但是，普列汉诺夫不仅不承认党的三大，而且对三大的决定进行肆意的攻击。于是列宁于 1905 年 7 月两次给社会党国际局写信，逐条驳斥了普列汉诺夫在 6 月 16 日给社会党国际局的信中所散布的谬论，并声明：普列汉诺夫不再是俄国社会民主党驻该

执行局的代表。列宁还断然拒绝了社会党国际局的“仲裁”，用德、法等国文字原原本本地公布了党的三大的通报和决议。

为了捍卫党的三大的决议，捍卫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策略，批判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路线，列宁于1905年6—7月写成名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该著作于同年8月7日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日内瓦出版。

在这部光辉著作中，列宁全面阐释了布尔什维克对革命的性质、前途、动力以及各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和任务等问题的基本观点。他指出：无产阶级能够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工农联盟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人民武装起义是使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手段；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等等。

就在列宁写作《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时候，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烈火熊熊燃烧起来，逐渐燃遍了俄国大地。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立即深入到群众之中，积极组织和领导工人阶级武装起义。4月末，列宁为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和《前进报》编辑起草了的“五·一”劳动节传单，号召党组织工农进行武装起义。他指出：“我们要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沙皇政府，为全体人民争取自由。工人和农民们，拿起武器吧！”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一天全国共有 200 个城市的工人举行了政治罢工。5—6 月间共有 36 万人参加罢工，许多城市的工人还同军警发生冲突。5 月末开始的伊万洛沃—沃兹涅先斯克城的工人大罢工坚持了 72 天，为了领导罢工，他们选出 151 个代表组成工人代表苏维埃。这是俄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的工人代表苏维埃之一。6 月，罗兹的罢工工人同沙皇军警进行了 3 天激烈的街垒战斗。1905 年夏天，俄国欧洲部分 1/5 的县都爆发了农民起义。在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影响下，1905 年 6 月，停留在敖得萨城附近海面上的沙俄黑海舰队“波将金”号铁甲舰上的水兵们，因不堪忍受压迫和虐待，毅然杀死了一些军官，宣布起义，舰上升起了革命红旗。

6 月 28 日，古谢夫从敖得萨给列宁来信，介绍了“波将金”号铁甲舰起义的情况。在认真分析了形势后，列宁立即找来瓦西里也夫·尤任，请他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前往敖德萨，同领导黑海舰队和“波将金”号铁甲舰起义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建立联系。

列宁对瓦西里也夫·尤任说：“根据中央的决议，尤任同志，您应该尽快地，最好是明天去敖德萨。”

——一听说有任务，瓦西里也夫·尤任高兴得眉飞色舞：“哪怕是今天就走，我也乐意！有什么任

务？”

“任务十分重大。您知道‘波将金’号铁甲舰现在停泊在敖德萨。令人担心的是敖德萨的同志们不会好好地利用这次起义。您要设法上铁甲舰去，说服水兵们行动要果敢，迅速。要设法让他们立刻登陆，我们要把城市夺过来。然后立刻把工人武装起来，并且果断地在农民中间进行宣传鼓动。您要组织敖得萨现有的力量投入这项工作中去。你们要通过传单和口头宣传号召农民去夺取地主的土地，同工人联合起来进行共同的斗争。我认为工农联盟对已经开始了的斗争具有巨大的意义。”

列宁谈得很激动。瓦西里也夫·尤任从未见过列宁这种神情，他也兴奋极了，但他对列宁的下一步打算感到十分惊讶。

列宁说：“接下去必须尽力把其余的舰队夺过来。我相信大部分舰艇是会加入‘波将金’号行列里来的。只是行动要果断、勇敢和迅速。”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您真的认为这一切都能做得到吗？”瓦西里也夫·尤任不由脱口而出问道。

“当然能！只是行动要果断、迅速，一定要不失时机地行动。”列宁满怀信心，坚定地重复说道。

第二天瓦西里也夫·尤任就启程了。在动身前，——到敖德萨瓦西里也夫·尤任就同党组负责

人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进行了会晤，可惜的是“波将金”号铁甲舰已从敖德萨驶往罗尼亚了。他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列宁。

列宁在1905年7月10日《无产者报》第7号上著文，高度评价“波将金”号铁甲舰起义的历史意义。

为了平息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沙皇政府急忙于8月19日颁布召开国家杜马的“诏书”。因为起草国家杜马法律的是沙皇内务大臣亚·格·布里根，故称布里根杜马。杜马是个谘议机关，地主代表在其中占有85%的席位，地主资产阶级热烈欢迎布里根杜马，孟什维克也认为它是“解放运动的转折点”，主张积极参加杜马选举，并在选举中同资产阶级自由派合作。当时正处于革命高潮之中，如果支持杜马就会转移人民的革命视线，所以布尔什维克积极抵制这个反人民的杜马，主张建立革命军队，组织武装起义，成立临时革命政府。

8月16日在布里根杜马法律以草案形式出笼之后，列宁立即在《无产者报》第12号上以社论形式发表了《抵制布里根杜马和起义》一文。他提出：“抵制这个杜马，不参加选举。”而布尔什维克的积极抵制策略则是正确的，对推动局势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沙皇政府10月30日公布的宣言中，被迫许诺召集立法杜马，这就意味

着谘议性的布里根杜马不召开了。列宁说得好：“布里根杜马始终没有召集起来。它还没有召集就被革命的旋风刮走了。”

10 月份，总政治罢工的浪潮风起云涌，从莫斯科、彼得堡开始扩展到全国所有的工业中心和城市，甚至蔓延到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参加这次全国总政治罢工的有 2500 多个大工厂，200 多万人，其中工厂工人 100 多万，铁路工人 70 万，另外还有下层职员、店员、学生、律师、医生、工程师等。这次全俄总政治罢工使全部社会生活陷于瘫痪，全国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普遍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有些地方建立了士兵代表苏维埃和工农代表苏维埃。苏维埃这一群众性的政治组织，很快成了领导罢工斗争、准备起义的机关。十月总政治罢工为十二月武装起义的爆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列宁此时虽然侨居国外，但他始终与国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为国内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所鼓舞，并随时向国内的党组织发出重要的指示。10 月 16 日给彼得堡委员会战斗委员会写信，指出必须废除文牍主义和空谈，做好准备和发动武装起义的实际工作。

为了平息即将爆发的人民武装起义，缓和紧张局势，维护专制统治，沙皇于 10 月 30 日发表《立法

宣言》，答应给公民以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和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召开由全体公民选举产生的有立法权的国家杜马。对此，资产阶级表示热烈欢迎，认为通过这种办法可以实现君主立宪。11月1日，列宁写了《革命的第一个胜利》一文，一方面把沙皇答应召集国家杜马看成是人民斗争的结果，另一方面又高瞻远瞩地指出：“沙皇的诏书只是一些空话，一些诺言。现在谁还只是相信诺言呢？”他还进一步指出：“不，沙皇政府还远远没有投降。专制制度还远远没有崩溃。革命无产阶级还要进行一系列重大的战斗”。实际情况正是如此：沙皇政府一方面在颁布“立法宣言”，另一方面则调动大批军警和俄罗斯人民同盟等反动黑帮组织，在全国大肆逮捕和屠杀革命工农。

此时，列宁夫妇居住在日内瓦的一套小公寓里。他时常与来自俄国各地的革命者聚会，或者在书房里阅读寄自国内的大量信件和情况，埋头于研究和写作工作。这个不大的房间成了整个俄国革命的指挥部。但是，此时的列宁非常渴望返回俄国，投身于准备和发动武装起义的火热斗争中去。他在写给彼得堡的埃森的信中写道：“我们俄国的革命真是好极了！我们希望赶快回去，看情况很快就可以如愿以偿。”11月中旬列宁自日内瓦启程，经斯德哥尔摩返

回俄国。

11月21日，列宁到达彼得堡。恩·耶·布勒宁在芬兰车站迎接列宁，并陪同列宁来到他姐姐——弗·叶·伊万诺娃家。列宁在这里停留了几小时，会见了中央委员克拉辛及其他党的工作者。接着迁到中央委员会鲁勉采夫的住宅，在这里住了近两个星期。到达彼得堡的当天，列宁来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墓地，拜谒“流血星期日”殉难者墓，悼念在同沙皇斗争中牺牲的工人和群众。还到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秘密接头点——牙科医生尤·伊·拉甫连齐也娃的住宅，会见了安·瓦·舍尔古诺夫和利亚多夫，并邀请他们出席《新生活报》编辑部的扩大会议。

当天晚上，列宁参加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扩大会议，并作了重要发言，论述了党对工人代表苏维埃应持的态度。他透彻地说明，党应该领导苏维埃，但不能代替苏维埃，党必须在苏维埃中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列宁向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的同志询问他们开展工作的情况，他特别问到：工人的要求、组织工人战斗队的进展情况、战斗队员会不会使用枪枝、能否制造炸弹、布尔什维克在军队和农民中的工作现状，等等。他一边问，一边谈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11月22日，列宁主持召开了《新生活报》编辑

部布尔什维克编辑工作人员和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会议确定了编辑部的成员和办报方针。这个报纸 12 月 15 日被沙皇政府查封，12 月 16 日又秘密地出版了最后一期（第 28 期）。《新生活报》实际上成为党的中央机关报，报纸发行量高达 8 万份，对于指导俄国革命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列宁实际上是《新生活报》的主编，从长篇理论文章到小短评，列宁都要亲自过目。每号报纸上的文章都要拿到编辑部会议上念一遍，然后大家集体讨论决定。连列宁自己的文章也要在编辑部里去念，让大家提修改意见。报纸的一些社论和评论，经常是以某一篇文章为基础，列宁让大家集思广益，集体修改定稿的。列宁在该报上共发表了 14 篇文章。

《新生活报》编辑部位于涅瓦大街上，这里也是党的秘密接头、开会和会见的地点。列宁在这里常常会见来访的战友。他与高尔基的第一次会面就是在这里进行的。

1905 年 11 月，高尔基和夫人玛·费·安德烈也娃自莫斯科启程，坐火车去彼得堡。在火车上，高尔基对夫人说，到彼得堡之后，先去《新生活报》编辑部，然后再到出版商康斯坦丁·皮亚特尼茨基住宅，——高尔基夫妇在这里居住。

高尔基和夫人来到《新生活报》编辑部，列宁立

即从里边的房间迎出来，快步走到高尔基面前，两人紧紧地握手，久久不放开。列宁高兴地笑着，而高尔基似乎有些腼腆，竭力用庄重而低沉的声音不断重复说：

“啊，您是这样的……好啊，好啊！我真高兴，真高兴！”

到了皮亚特尼茨基住宅以后，高尔基仍然很兴奋，过了很久对夫人说：

“是啊！……你看，我们遇到了多么好的事情啊……多好的人啊，是不是？”

当然，安德烈也娃马上猜到他指的是列宁。但是她故意向高尔基开玩笑说：

“你说的是谁呀？”

“是谁？嗯，当然是列宁啊！多好的人啊！……你可别吹，说你早就这样认为，你比我早认识他。”高尔基像个大孩子似地说。

11月中旬，列宁在彼得堡会见了党的莫斯科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委员会常驻莫斯科组织代表维·列·尚采尔（马拉特）和莫斯科苏维埃委员利亚多夫。联系自己写的文章《无产阶级和农民》，列宁谈了党的土地纲领，并详细询问了莫斯科党组织的情况。列宁建议莫斯科党组织越过孟什维克去团结广大工人群众，准备武装起义。列宁说：“莫斯科苏维埃执行

莫斯科委员会的一切决定，你们可通过苏维埃来使委员会影响非党工人群众，而我们彼得堡这里的苏维埃是跟在非常群众后面爬，它竭尽一切努力来诋毁武装起义的思想。你们能够很容易地领导工人，并且建立起在所有工人心目中有威信的真正的战斗的布尔什维克组织。”

1905年1月26日，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主要讨论如何同资本家同盟歇业作斗争的问题。即由于提出8小时工作制的要求，资本家就关闭工厂，以同盟歇业的办法威胁工人，列宁出席了这次会议。托洛茨基、马尔托夫和孟什维克其他领导人先发表演说，他们的演说空洞无物、苍白无力。托洛茨基甚至建议和军事部长、企业主们谈判复工的条件。

列宁发言了，整个大厅里屏息静气地倾听他的演说。列宁首先揭露沙皇政府用同盟歇业的办法破坏革命的卑鄙伎俩，他们想使革命工人屈服，或者挑起公开冲突，以武力镇压工人。他告诉工人，既不怕威胁，也不要是不利条件下仓促应战。应该提出开工的条件，如果遭到拒绝，就举行总罢工进行斗争。他号召大家要团结起来，等到起义对人民有利、而对政府不利时再投入战斗。为了做好起义准备工作，应当和其他城市和地区的工人、农民和士兵取得联系。

列宁的充满革命激情的演说征服并鼓舞了到场的每一个人。列宁演说结束，立即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会议一致通过了列宁就同盟歇业问题起草的决议案。散会后，工人代表们仍然对会议发言议论纷纷，一位代表非常坦率地指出：

“对啊，只有这个人才懂得应该怎样办，应该如何带领工人阶级。而那几个说大话的人，像赫鲁斯塔廖夫、切尔诺夫、托洛茨基，他们光会耍嘴皮子，他们说的漂亮话对我们毫无益处，只有害处。”

克鲁普斯卡娅于12月1日来到彼得堡后，她和列宁想公开住在希腊大街列宁妹妹玛丽娅·伊里尼奇娜的一个熟悉的人那里。但当他们刚登完记，大大小小的特务就马上包围了住所。房东害怕发生意外，整夜带着手枪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决定以武器对付警察。

“哎，算了吧。真是多此一举。”列宁说。

列宁夫妇只好又秘密地公开住，只在秘密接头地点或会议上才能见面。这个时期的俄国正处在武装起义的前夕，反动当局的神经已经极其脆弱了。

1905年11月29日，列宁在自由经济学会召开的彼得堡党的工作者会议上做了题为“批判社会革命党土地纲领”的报告。这是列宁第一次公开在俄国国内为听众面前做报告。大厅挤满了人，等待列宁到

来。列宁的讲话时常被雷鸣般的掌声打断。但是这个报告，由于警察局的干预而被迫中断。在群众的掩护下，列宁迅速地穿过人群，从一扇灰色的门走出了礼堂。12月6日，列宁在奥·克·维特梅尔中学宿舍继续做完这一被迫中断的报告。

1905年12月16日晚，以托洛茨基为主席的彼得堡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正在开会，会议厅的所有通道突然被沙皇的军警封锁住了，全体执行委员会委员和部分苏维埃代表遭到了逮捕。列宁听到这件事后十分震惊，感到忧心忡忡。

同一天，《新生活报》被沙皇政府查封了。就在查封该报时，克鲁普斯卡娅碰巧来到该报编辑部门口，一位卖报人立即走到克鲁普斯卡娅身边，低声说：“正在搜查编辑部！”克鲁普斯卡娅马上离开了这里。晚上，克鲁普斯卡娅把这件事告诉了列宁，列宁十分动情地说：“人民拥护我们。”列宁立即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党的彼得堡委员会和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秘密召开的联席会议，讨论了查封《新生活报》之后的对策问题。

1905年12月24日，沙皇政府又颁布了召集第一届国家杜马的法令，法令中强调这是“立法”的杜马，以区别于“谏议性”的布里根杜马。这个法令是沙皇政府内阁总理大臣谢·尤·维特制定的，故

又称之为维特杜马。根据这个选举法，包括妇女和200多万工人在内的半数以上的居民被剥夺了选举权。选民被一层层地划分成地主选民团、资产阶级选民团、农民选民团和工人选民团。选举是多级的，而不是直接的。这种等级重重、极不平等的选举法，足以保证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在杜马中居优势。

在维特杜马召开的前三天，沙皇政府还公布了一个法令，规定沙皇拥有国家最高权力，有权修改国家的宪法，有权不经过杜马公布重要法令，连杜马通过的法令也要最后经过沙皇批准。可见，这个维特杜马根本不是什么“立法”机关，实际上也同布里根杜马一样是沙皇政府的谄议机构和沙皇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这是沙皇政府为平息革命而玩弄的民主骗局，其目的是使人民脱离革命。

尽管如此，沙皇政府召集第一届国家杜马的法令一出笼就受到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欢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表示拥护这个法令，他们还对工农群众进行欺骗性的宣传，说杜马的建立可以使人民得到所需要的立宪制度，农民可以得到土地。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对第一届国家杜马采取了积极抵制的革命策略，坚持武装起义是俄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手段的正确方针。

1905年12月25—30日，在塔墨尔福斯召开了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会议。由当地的工人组成纠察队在大厦周围巡逻防止警察来捣乱。列宁代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出席了会议，并被选为会议主席。列宁在会上做了关于目前形势的和土地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列宁起草的一系列决议案，例如，土地问题的决议、关于尽快召开统一的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关于积极抵制第一届杜马的决议。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对党的土地纲领作了修改：取消了关于割地的条文，党支持农民没收全部国家的、教堂的、寺院的、皇室的、官府的和私有的土地。

根据列宁的提议，由于莫斯科和其他城市已经爆发了武装起义，代表会议迅速闭幕，以便代表们参加到武装起义的斗争中去。会议开得团结热烈，在休息的时候，代表们还学习了射击，在最后一天，列宁在晚会上致完贺辞后立刻离开了俱乐部。

由于托洛茨基为首的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对武装起义抱消极态度，彼得堡工人的 11 月总罢工未能转变为武装起义。12 月 18 日，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莫斯科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建议苏维埃在 12 月 20 日宣布总罢工。总罢工爆发的当天参加者就达到了 10 万人，第二天发展到 15 万人。政府派遣重兵进行镇压，工人立即构筑起堡垒，同军队武装对峙。12 月 22 日，莫斯科武装起义爆发了，近 8000 名起义的

战斗队员和武装同超过自己数倍的军队进行了 9 天的浴血战斗，给反动当局及其军队以沉重打击。但由于在起义的关键时刻，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委员会遭到破坏，起义失去了领导核心，沙皇政府控制了铁路，从彼得堡调来大批军队镇压起义，轰轰烈烈的莫斯科 12 月武装起义最终失败了。其他城市的工人武装起义也先后被沙皇军队镇压下去。

在 12 月莫斯科武装起义进行期间，列宁如饥似渴地阅读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一字一句地听莫斯科来访的同志谈情况，并且想方设法给起义参加者以指导和帮助。

12 月 23 日，列宁参加了在克拉辛住所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战斗组织的领导人和统一军事组织的领导人的联席会议，专门讨论了支援莫斯科起义的措施问题。会议决定采取一切措施阻止从彼得堡调军队镇压莫斯科起义的工人，特别是全力组织尼古拉也夫铁路工人的罢工，拆毁部分铁轨，但由于沙皇政府已经进行严密的戒备，最终未能阻止谢苗诺夫军团开进莫斯科。

12 月中旬，在彼得堡高尔基的住宅里举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列宁参加了会议。会议认真听取了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委员利亚多夫所做的关于莫斯科武装起义过程的报告。根据列

宁建议，中央委员会指示莫斯科委员会有组织地停止继续武装斗争。中央委员还承认：彼得堡委员会对莫斯科武装起义的支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莫斯科无产阶级 12 月武装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普列汉诺夫立刻在《社会民主党人的同志》第 4 号上发表了《再论我们的处境》一文。他在这篇臭名昭著的文章中教训俄国无产阶级说：“开始得不合适的政治罢工已经引起了莫斯科、索尔莫夫、巴赫姆特等地的武装起义”，“但是，他们的力量还不足以取得胜利。这种情况是不难预料的，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普列汉诺夫被革命的暂时失败吓得惊慌失措，转而诬蔑武装起义，否定革命的群众运动。

针对这种情况，列宁在 1906 年发表《莫斯科起义的教训》一文，斩钉截铁地回答了机会主义者的奇谈怪论：“正好相反，本来应该更坚决、更勇敢和更主动地拿起武器，本来应该向群众说明单靠和平罢工是不行的，必须进行英勇无畏和毫不留情的武装斗争。”他认为莫斯科无产阶级 12 月武装起义的教训告诉我们：单靠和平罢工不行，必须进行武装斗争；把动摇的军队争取到人民方面来；要运用好起义的战术，建立好起义的组织；要吸收农民参加战斗。后来，列宁对 10 月全俄政治总罢工和 12 月武装起义的伟大历史作用，作了充分的阐述，他说：“1905 年

十月斗争和十二月斗争是巴黎公社以后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只有发展这种形式的斗争，才能保证未来革命取得胜利，这些斗争的榜样应当成为我们教育新一代战士的工作中的灯塔。”

第十五章 党的四大

1905 年春天，我们党是地下小组的联合组织，秋天就成了数百万无产阶级的政党。

——列宁

1906 年 1 月 18 日沙皇政府内阁总理大臣谢·尤·维特向内务部彼·尼·杜尔诺沃转交了刊有列宁写的《工人政党及其在目前形势下的任务》一文的《青年俄罗斯报》第 1 号，并附公函。杜尔诺沃在公函上加上了一条批语，建议逮捕列宁。1 月 20 日，警察司向彼得堡法院检察员发送了一份公函，建议逮捕并监禁列宁。1 月 22 日警察局接到了逮捕列宁的命令。就在沙皇政府酝酿逮捕列宁的过程中，列宁正在莫斯科从事革命活动。

他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的领导人一起，总结十二月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分析今后的

斗争形势。他还专门去察看了进行巷战的地方，会见了参加起义的莫斯科工人，目的是想为以后的战斗总结出一些有益的经验教训。列宁又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作家讲演人小组会议，他对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进行了总结。另外，他还同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讨论了积极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的问题。

1月中旬，列宁返回了彼得堡。一下火车他就发现，自己已经处在警察和暗探的严密监视之下，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于是，他们夫妇不断地变换居住和接头的地点。1906年2月末，为了彻底摆脱暗探的盯梢，他们来到了芬兰的考卡拉，住在离车站不远的“瓦查”别墅。这所房子是由布尔什维克加·达·莱特伊仁租下来的。列宁在这里一直住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列宁常常由考卡拉去彼得堡。

沙皇政府第一届国家杜马的法令公布之后，在各阶级和各政党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普列汉诺夫认为：用不着进行武装斗争，只要通过国家杜马就能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因此“全国人民应当齐心协力地支持杜马”。布尔什维克认为，反动的杜马选举制度使人民群众控制不了杜马；即使控制了杜马这个沙皇专制制度的装饰品，也不能触动沙皇的国家机器，

因此解决不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政权问题。要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绝不是靠杜马内的辩论和清谈，而是靠杜马外面工农群众的武装斗争。

在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时，由于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奉行半抵制政策，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抵制策略，结果使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威信下降，使立宪民主党骗到大量的工农选票，成为第一届国家杜马的第一大党。因此，资产阶级欣喜若狂，纷纷表示感谢普列汉诺夫。1906年4月上旬，列宁就第一届国家杜马的选举结果，写成《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一书，批判了立宪民主党人和普列汉诺夫在第一届国家杜马问题上散布的种种谬论。

随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临近，列宁又开始为党的四大的召开积极进行准备工作。

4月上旬，列宁主持召开了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部分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认真全面地听取了地方代表的报告，作简短的发言，并同代表大会代表进行了广泛的交谈。

4月上旬举行了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委员会会议，研究了党组织的工作。在会上，埃森抱怨说，党的干部在走访工人家庭时，往往发现工人的妻子态度冷

淡，有的甚至表示讨厌。列宁在会上听到这个意见，很生气。他追问道，党的干部走访工人家庭时是怎么对待工人的？埃森等承认，对工人的生活条件、家庭状况很少关心。而当孩子们在一旁吵闹，妨碍进行谈话时，党的干部往往显示出不耐烦的态度。

列宁狠狠地批评了埃森等。他说：“哼！要是换了我的话，早就把你们轰出大门了！妇女们的生活多么艰难啊，她们既要去做工，还得承担家务，照料孩子，如果丈夫一旦被捕入狱，又得为丈夫的命运担忧，这一切你们为她想过没有？”

列宁继续说道：“当你们看见她们要喂孩子，洗衣服，还要张罗其它家务，忙得饭顾不上吃，坐下歇一会都不行，在这种时候，你们是否想到去帮帮她们的忙呢？”

听了列宁的一席话，埃森等人茅塞顿开，他们懂得，走访工人家庭时，对待工人的妻子不应该持傲慢冷漠的态度，而应该充分地体谅她们的困难，尊重她们的生活习惯，给她们以必要的帮助，列宁的这些话使埃森等人终身难忘。

1906年4月23日至5月18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是在瑞典社会民主党人提供的民众文化馆举行的，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联合召开的一次

统一的代表大会。本来，这时两派已经各有了自己的中央，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党。但是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广大工人强烈要求把党的力量统一起来，所以布尔什维克在 1905 年 12 月召开的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上倡议召开党的统一代表大会，孟什维克在工人群众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表示同意。

出席这次大会的有 112 名具有表决权的代表，代表着 57 个地方党组织。另外还有 22 名只有发言权的代表。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大会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两个内容：一、如何统一党的组织；二、在当前的革命形势下，无产阶级政党应坚持什么样的革命策略。围绕这两个问题，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由于布尔什维克组织在十二月武装起义时和失败后遭到破坏，孟什维克在 1905 年把大量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拉入党内，所以在这次大会的代表中，孟什维克有 62 名，布尔什维克只有 46 名，孟什维克在人数上占据了多数，还有一部分代表态度暧昧。因此，大会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都通过了具有孟什维主义观点的决议。

列宁作为彼得堡党组织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并被选入大会主席团，他多次主持了会议，参加了大会主席团的各次会议。列宁先后做了关于土地问题、关于目前形势和无产阶级的任务问题、关于对待国家

杜马的态度问题的报告，对武装起义和其他问题作了发言。土地问题是大会的第一项议程。主要讨论土地纲领：会上提出了土地国有化、土地私有化和土地市有化三种方案。列宁代表一部分布尔什维克主线实行土地国有化。另一部分从事地方工作的布尔什维克则认为，农民小私有观念浓厚，土地国有化不易为农民接受，他们主张平分地主土地，归贫苦农民私有。而孟什维克则主张土地市有。

大会在讨论土地问题时，一共有五个人作了报告：列宁，他提出了土地国有化的决议草案。第二个是孟什维克彼·巴·马斯洛夫，提出了土地市有化决议草案。普列汉诺夫是第三个报告人，他表示拥护马斯洛夫的土地市有化决议草案。第四个是彼·彼·鲁缅采夫，他基本上支持列宁的土地国有化方案。第五个报告人是谢·亚·苏沃洛夫，他维护分配土地归农民的方案。普列汉诺夫先后对土地问题作了两次发言，他的发言成了大会争论的焦点。普列汉诺夫的中心论据就是土地市有化纲领能够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而土地国有化则必然导致反动势力的复辟。

由于孟什维克在到会人数上占有明显优势，通过表决最终大会通过了孟什维克的土地市有化纲领。

代表大会通过了新党章——《组织章程》，党章采纳了列宁提出的关于入党条件的党章第一条条文，并写明：“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代表大会还通过了波兰和拉脱维亚、立陶宛和崩得等民族地区的社会民主党作为地区性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决定，这对党的统一具有重大作用。

在选举党的中央机关的前夕，列宁和所有出席会议的布尔什维克都十分关注选举结果。当时，列宁与会议代表卢那察尔斯基谈论了中央机关的选举结果问题。

列宁微笑着对卢那察尔斯基说：“如果我们在中央或中央机关报拥有多数的话，我们将要求有最牢固的纪律。我们将坚决要求孟什维克一切服从党的统一。如果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本质使他们不能跟我们一起前进，那就更糟了。党的统一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才取得的，让他们去承担破坏这个统一的罪名吧。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从这个‘统一的’党里所能带去的工人要比他们带到这个党里来的工人少得多。”

卢那察尔斯基问列宁：“如果我们最后还是处于少数，那该怎么办呢？我们是否准备统一呢？”

面对这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列宁没有丝毫的慌

乱，他的脸上略带着几分神秘的微笑，说：“这要看情况再定。但无论如何我们是不会为了统一而让人束缚我们的手脚，也绝对不会让孟什维克用锁链牵着我们走的。”

果然不出人们所料，代表大会通过了孟什维克提出的由党代表大会分别选举产生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建议。结果被选入了中央委员会有 7 名孟什维克和 3 名布尔什维克。被选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任编委的则全是孟什维克分子。

“四大”闭幕之后，列宁于 5 月 8—9 日撰写了《前“布尔什维克”派出席统一代表大会的代表告全党书》，26 个党组织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在告全党书上签了字。此文件表达了布尔什维克对党的四大的态度。《告全党书》指出：“我们认为代表大会的这些决议是错误的，我们应当而且一定要在思想上同这些决议作斗争。同时，我们向全党声明：我们反对任何分裂行为。我们主张服从代表大会的决议。”

5 月中旬，列宁从瑞典返回了彼得堡，为了躲避沙皇暗探的跟踪，列宁夫妇迁居到了南巴尔干大街 18—20 号。

1905 年 12 月莫斯科武装起义失败之后，革命已走向低潮，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利用国家杜马讲坛

揭露沙皇专制制度，团结和教育工人和人民群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四大”刚刚闭幕，沙皇政府就于1906年5月10日召开了第一届国家杜马。沙皇政府此举的目的是为了平息人民的革命情绪，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但杜马召开后不久，受到了布尔什维主义影响的劳动派（由农民代表组成）就向杜马提出了制定没收地主土地和一切土地实行国有的法令，迅猛发展的农民运动，沙皇一看大事不好，便于7月2日匆忙下令解散第一届国家杜马，并且撤销了内阁总理大臣维特的职务。

5月22日，在帕宁娜民众文化馆召开了讨论第一届国家杜马活动的3000余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参加者大多数是彼得堡工人群众。大会受到了警方的秘密监视。立宪民主党人沃多沃佐夫和奥戈罗德尼科夫先发言，为他们背着人民同沙皇政府暗中勾结的行为辩解。

接下来会议主席请卡尔波夫发言。刚刚走上讲台，许多人就认出了他就是列宁，大家情绪一下子高涨起来，暴风雨般的掌声缓和了会场的紧张气氛。针对奥戈罗德尼科夫只承认立宪民主党人同沙皇谈判，而不承认同沙皇勾结的说法，列宁直截了当地反问道：“按照奥戈罗德尼科夫的说法，没有什么勾结，只是谈判。但什么是谈判呢？谈判就是勾结的准备。

而什么是勾结呢？勾结则是谈判的实际结果。”

列宁用有力的手势和犀利无比的语言揭露了立宪民主党同沙皇专制制度幕后进行谈判的政策，斥责了沙皇政府血腥镇压革命者的罪行，号召工人坚持斗争，取得最后胜利。最后，大会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散会对，工人们把红色衬衣扯开，制成一面面鲜艳的红旗，高唱着革命歌曲走上了街头。克鲁普斯卡娅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她也为列宁精彩的演说所摄服了，感到无比兴奋激动。但散会后她极力劝阻列宁再不要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说，但列宁并没有被危险的形势所吓倒。他认为，这正是需要向广大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布尔什维主义的时候，就是冒一点风险也是值得的。因为这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

5—7月，列宁分别向莫斯科区、圣加利分区、纳尔瓦区、圣哈耳斯克分区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和工人，波罗的海造船厂和机械厂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全俄国民教师大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的工作人员，做了报告，报告的内容是关于党的四大、第一届国家杜马和土地问题。7月初，列宁在彼得堡沙帕沙尔卷烟厂女工集会上发表演说，支持工人的倡议，发动罢工，抗议厂方拒绝满足她们的经济要求。

6月24—25日，列宁领导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彼得堡组织各区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既有布尔什维克，也有孟什维克。孟什维克唐恩发言，他像沙皇将军讲话时一样威风凛凛，常常走到代表中间去。他极力宣扬调和路线，赞成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关于支持立宪民主党内阁的决议草案。唐恩刚刚讲完话，列宁就站起来发言了。既清楚又形象地驳斥了唐恩的发言，阐明了布尔什维克对第一届国家杜马的观点，并提出了他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关于对待国家杜马态度的决议草案和杜马内阁问题的决议草案。列宁的演讲极具说服力和感染力，获得了绝大多数代表的支持。最后，代表会议以 1760 张赞成票通过了彼得堡委员会关于杜马问题的决议，而赞同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决议的仅有 952 票。

7 月 21—23 日，列宁夫妇正在彼得堡郊区萨勃利诺休息，同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和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住在一起。暂时放下紧张的地下工作，放松放松。晚上很热，列宁夫妇就到河边去。有时全家坐在院子里聊天、喝茶。7 月 23 日晨，列宁当看到报纸上登出解散第一届国家杜马的命令之后，马上同妻子、妹妹回到了彼得堡，以便研究国内新局势，为布尔什维克制定相应的斗争策略。

7 月 30 日，斯维尔格要塞爆发了起义。在起义爆

发的前一天，列宁起草的《关于派代表团到斯维阿波尔格去》决议草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获得了通过。7月30日，列宁委派维·鲁·明仁斯卡娅前往芬兰会见军事组织成员亚·格·施利希特尔，向他传达立即赴斯维亚堡领导起义的指示。起义延续三天，于8月2日遭到了镇压。同一天喀琅施塔得的起义也被扼杀了。此后，俄国国内的形势日趋恶化。

9月初，为了筹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躲避警察的搜捕，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等人劝列宁移居芬兰。在临行前的一个晚上，列宁来到了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的住所，精神饱满地谈起了最近的形势。克尔日札诺夫斯基认为，群众的革命情绪受到严重的挫折，革命正在走向低潮。但列宁坚决不同意这种悲观的论调，他认为革命还有进攻的机会，新的革命高潮终还会到来。

离开彼得堡后，列宁来到了芬兰的库沃卡拉，住在一位布尔什维克分子加·达·莱特伊仁的“花瓶”别墅里，占用一间房子。不久，克鲁普斯卡娅和母亲也来到了这里，他们一直居住到1907年12月初。莱特伊仁将家搬走后，列宁一家就占用楼下的全部房间，在楼上住着波格丹诺夫夫妇和1907年搬来的杜勃洛文斯基。

俄国警察不到芬兰来，列宁夫妇生活得很自由。别墅的大门从来没有关过，夜里在餐厅的饭桌上摆上一壶牛奶和一些面包，沙发铺上备有现成的被褥，如果有人坐夜车来了，谁也不用惊动，吃点东西就可以躺下睡觉。每天有专人给列宁传递报纸、材料和信件。列宁在这所住宅里举行党的会议、编辑部会议，会见党的中央委员、彼得堡委员会委员和党的工作人员。在这里，列宁可以安下心来写作和做党的工作。由于工作任务繁重，列宁有时头痛和失眠，挤出时间与莱特伊仁的小孩一起玩，或者同住在这所别墅的其他人一起玩纸牌，他们玩得既认真又起劲，常常玩得着了迷。埃森于1906年夏天，奉莫斯科委员会派遣来库沃卡拉会见列宁。埃森向列宁详细地谈了武装起义被镇压后人们的精神状态，知识分子，工人群众情绪低落，革命正在走向低潮，反动派气焰嚣张，党的工作阵地也缩小了。听着听着，列宁对埃森的悲观情绪有些不满了。

“好吧，”列宁说，“事实果真如此，我也将是最后一个下这样的断语的人。只要斗争还在进行，实际上也正是这样，不管你们说些什么，我都认为不应该泄气，而应该行动。”列宁当时坚信，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不会平息。

9月初，列宁在“花瓶”别墅会见了罗莎·卢森

堡，他们就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现状和前途问题交换了意见。卢森堡对俄国 1905 年革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列宁的这次会见则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在给考茨基夫妇的信中写道：“我留在这里对我来说很有益处，通过与人们的交往来了解运动，这样的了解单靠书籍是办不到的，而在这样的交往中还能得到很多东西。”卢森堡对 1905 年俄国革命经验的评价是十分正确的，这同她深入到革命实践斗争中是分不开的。列宁后来在 1920 年写的《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一文中指出：“现在全世界觉悟工人所注意的那些基本问题（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在 1905 年年底就实际地提出来了。像罗莎·卢森堡那样的革命无产阶级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经过列宁等人的艰苦努力，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和莫斯科委员会的机关报《无产者报》于 9 月 3 日正式出版了。在创刊号上，列宁发表了 5 篇文章，而作为社论发表的《暴风雨之前》一文的结尾引用了高尔基的诗篇《海燕》中的名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该报于 1908 年迁至日内瓦、1909 年迁到巴黎继续出版。它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报，列宁是这个报纸的编辑兼主要撰稿人，他在这个报上共发表了 100 余篇文章与短评。

沙皇政府解散了第一届国家杜马之后，于 1907

年2月至6月又召开了第二届国家杜马。此时革命已经走向低潮，列宁及时总结了布尔什维克抵制布里根杜马和第一届国家杜马的经验教训。列宁认为：抵制布里根杜马是正确的，它有利于打破立宪幻想，促进无产阶级十二月武装起义的成熟；但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却是“一个不算大的、易于纠正的错误，但毕竟已经是一个错误。”因此，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决定参加第二届国家杜马的选举，以便在革命走向低潮的时候，使革命群众有组织地实行退却。

孟什维克也打算参加国家杜马的选举。他们把国家杜马看成是可以限制和削弱沙皇政府的立法机关，主张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选举协议，联合起来，共同在国家杜马中进行“立法”工作，可见孟什维克对第二届国家杜马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虽然都主张参加第二届国家杜马的选举，但出发点和目的却是根本不同的。

但在杜马选举前夕，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4月上旬，孟什维克组织了一个“党的法庭”，对列宁进行“审判”。其矛头主要对准了列宁在2月份写的小册子《彼得堡的选举和三十一一个孟什维克的伪善》。孟什维克们在控告书中写道：“中央委员会认为，把这类指责登在报刊上，特别是在选举的前夜，必然造成无产阶级队伍的混乱，使党员政

治上的忠诚受到怀疑，并且会被无产阶级敌人利用来同社会民主党作斗争。中央委员会鉴于这种言论对党员来说是不能容许的，决定将列宁同志的行为提交党的法庭审查。”法庭人员组成：布尔什维克代表 3 人，孟什维克代表 3 人，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波兰社会民主党和崩得的中央委员会指定的 3 个主席团成员。

在党的法庭上，列宁宣读了辩护词，也是对中央委员会孟什维克委员的起诉书，它揭露了孟什维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的分裂活动。列宁这一反控得到了 234 个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党员所举行的会议的支持，他的这一斗争取得了胜利。

此时，俄国 1905 年革命已明显地走向低潮，许多地方的布尔什维克要求召开新的党代表大会，讨论和研究俄国的新形势，提出新的战斗任务。列宁立即开始着手为即将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做准备工作。2 月底 3 月初，他起草了五大的决议案。

4 月底，列宁为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启程前往哥本哈根，在这里，他召集了出席代表大会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并在会上就战斗队问题发表了讲话。会议进行期间，丹麦警察突然要求代表们在 12 小时之内离境。于是，党的五大被

迫改到伦敦召开。

在伦敦，列宁再次见到了高尔基，两个老朋友紧紧地拥抱握手。列宁亲切地看着高尔基，诙谐地说：

“您来了，真是太好啦！您不是喜欢打架吗？这里将要大干一场。”

列宁领着高尔基和他的妻子安德烈也娃来到离英国博物馆不远的“金币”旅馆下榻。这家大旅馆的房间既简陋又潮湿。列宁知道高尔基正患肺病，为高尔基的房间不够干燥而深感不安。列宁抱怨说：

“我们会使他感冒的！要知道，他已经习惯了温和的气候和舒适的生活条件……”。

说罢，列宁走进了高尔基的房间，摸摸被褥，看看壁炉，亲自帮助料理了一番后才离去。

列宁走后，高尔基在房间里久久地来回踱步，时而用手捻捻胡须，时而习惯地咬咬胡子梢，然后若有所思地轻声说：“这真是位不同寻常的人！”

在高尔基的印象中，列宁与党内的许多领导人不相同。他衣着朴实，为人谦和，学识渊博扎实，头脑异常机敏。他说话办事干练又洒脱自如，却十分平易近人，从来不掺什么“领袖”的架子。

在五天的开会期间，列宁与高尔基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攀谈。当时，列宁紧紧地握着高尔基的手，一双生动有神的眼睛亲切地眨动着。他们谈到了俄

国的社会现状和革命斗争，也谈到了高尔基的小说《母亲》。列宁热烈地夸赞道：“这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接着，他又直言不讳地谈到这本书的缺陷。高尔基解释说这本书是匆忙写出来的，列宁肯定地点了点头，再次强调说：“这是一本好书，很多工人自发地参加了革命，现在读一读《母亲》，对他们会有很大的帮助。”当列宁得知高尔基因为这本书而受到通缉的时候，他把高尔基的手握得更紧了。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07年5月13日—6月1日在英国伦敦召开，共有336名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代表着全国的15万党员。其中布尔什维克代表105名，孟什维克代表97名，崩得代表57名，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44名，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代表29名，无“派别”代表4名。由于争取到了波兰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代表的拥护，而布尔什维克在大会上占据了稳定的多数，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就一些主要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在几个最重要的原则性问题上，如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和工会问题，关于所谓“工人代表会”问题等，都通过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决议议案。

列宁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卡马河上游（乌拉

尔)组织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在大会召开期间,列宁显得十分忙碌,他要主持代表大会的会议,参加主席团和各委员会的会议,就一些问题做报告和发言。作为特邀来宾参加大会的高尔基后来回忆列宁在大会上的发言时,写道:“罗莎·卢森堡讲得漂亮、热情而尖锐,她出色地掌握了讽刺这个武器。接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匆匆地登上讲台,用喉音喊了一声‘同志们’。我觉得他不会讲话,但是过了一分钟,我也像所有的人一样,被他的演说给‘吞没’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能把极其复杂的政治问题讲得如此简单明了。他并不想编造漂亮的词句,他把每个字眼都明白地说出来,毫不费力地表达出其精确的含义。”

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是大会上争论异常激烈的重要问题。列宁在这个问题上做了重要报告。认为必须同黑邦政党(“俄罗斯人民联盟”、“贵族联合会”等)以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十月十七日同盟”、“工商党”等)进行坚决的斗争,对于自由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则应揭露其假民主、真维护沙皇专制制度的本质。孟什维克主张在国家杜马内同立宪民主党建成联盟。列宁认为这是一种投降主义策略。列宁主张对杜马中的劳动派(社会革命党人、人民社会党人、无党派人士),可以在反对

沙皇专制制度和立宪民主党的斗争中同其达成局部协议，但又要揭露其假社会主义性质，使其摆脱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影响。普列汉诺夫在讨论对各资产阶级政党问题时也发了言，他顽固地坚持俄国资产阶级是俄国民主革命动力的孟什维主义观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罗莎·卢森堡在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向大会致贺词时批判了普列汉诺夫这一机会主义谬论，把普列汉诺夫比作“可敬的化石”，结果，代表大会通过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

最后，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委员会。代表大会结束后，布尔什维克代表又召开了会议，选举产生了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

在这次代表大会期间，布尔什维克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列宁在党的威信也空前地提高了。大会结束后，几位工人代表游览了海德公园，他们怀着兴奋的心情畅谈了对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印象。其中一位说得很生动：

“我不知道，也许在这里和欧洲，工人中间还有另外一位同样精明的人，——倍倍尔，或者其他什么人。但是，要说还有另外的人能使我一见就爱，就像爱列宁一样，——我绝不相信！”

另一位工人则说得更简明扼要：

“他是我们的人！”

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普列汉诺夫也是我们的人。”

对此一位工人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普列汉诺夫是我们的师尊、我们的老爷，而列宁是我们的领袖和同志。”

五大结束后，列宁的工作更忙了。

6月初，列宁应邀在拉脱维亚地区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无产阶级在目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并宣读了他提出的决议草案。6月中旬，他又去捷里奥基向来自彼得堡的工人发表了关于党的五大的演说。

由于劳累过度，列宁感到疲倦极了。吃不下饭，也睡不好觉。

为了使列宁好好休息一下，克鲁普斯卡娅给他打点好行装，与他一起来到芬兰内地的提尔苏国灯塔附近的克尼波维奇别墅，作短暂的疗养。这里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到处是绿色的森林和草木，还有一望无际的蓝色的海洋和金色的沙滩，美丽的景色令人心旷神怡。列宁夫妇经常去大森林中漫游，采集蘑菇和野浆果。但他们最爱去的地方还是海滨，他们觉得浩瀚天边的海能使他们的身心得到充分的休息。不久，列宁的身体就恢复了健康。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闭幕的第二天，即 1907 年 6 月 16 日（旧历 6 月 3 日），沙皇政府解散了第二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 65 名代表以“叛国阴谋”的罪名遭到逮捕，经法庭审判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内阁总理彼·阿·斯托雷平对工农革命群众进行了血腥镇压。历史上把这一反革命事件称之为“六三政变”。

“六三政变”标志着轰轰烈烈的俄国 1905 年革命失败了，反动黑暗的斯托雷平统治时代开始了。

第十六章 国际大会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鲜明地对比了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在一系列最重大的问题上的态度，并且本着革命马克思主义精神解决了这些问题。

——列宁

1905 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后，反革命的白色恐怖笼罩着俄国。

在政治上，沙皇政府疯狂地镇压和迫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工农群众，逮捕和监禁革命者，取缔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收买革命的叛徒充当内奸，重新剥夺了工农群众在革命年代争得的政治权利。在经济上，资产阶级采用同盟歇业、集体解雇、降低工资、增加工时等办法，加强对工人的压迫与剥削。地主阶级则对农民实行野蛮的反攻倒算，进一步加速了农

村的阶级分化，加快了广大农民的贫困破产。在这种形势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面临着政治动摇、思想混乱、组织瓦解的严重危机。

1907年6月16日，沙皇政府颁布了更为反动的第三届国家杜马的选举法。11月，组成了第三届国家杜马，共有429名代表，其中右派144人，十月党人148人，立宪民主党人及同它接近的党派104人，劳动派14人，社会民主党人19人。因此，这届国家杜马被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所控制，成了维护沙皇专制制度的得力工具，反革命的白色恐怖进一步加剧。这就要求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低潮时期处理好合法斗争与秘密斗争的关系。

列宁在斯提尔苏甸休息一段时期之后，列宁于7月下旬、8月初先后去参加了在捷里奥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和在科特卡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在这些会议上，列宁就反对抵制第三届国家杜马发表了演说，通过了列宁提出的有关决议。

1907年8月14日左右，列宁和梅什柯夫斯基一起启程前往德国斯图加特参加第二国际第七次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列宁刚来到斯图加特城，就被俄国暗探紧紧地盯住了。他被迫放弃大会给他安排的住处，进入了一座犹太人的寓所中，并立即投入了紧张

的工作。他接连参加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会议，俄国代表团会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团代表会议，并同许多同布尔什维克代表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提醒他们要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倾向以及工会中立派进行坚决斗争。

1907年8月18日至24日，第二国际第七次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在德国斯图加特城召开。这是第二国际各次代表大会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大会，有五大洲25个国家的社会党代表884人出席了大会。列宁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参加了大会，这是他第一次出席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中派和右派占据了多数，而以列宁为首的左派则处于少数地位。出席这次会议的俄国代表包括两个分团：社会民主工党分团有37名代表，社会革命党分团有21名代表，此外还有俄国工会的7名代表。在社会民主工党分团里，又分为以普列汉诺夫、巴·波·阿克雪里罗得为首的孟什维克小组和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小组。

大会开幕那天举行了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会议，列宁在会上发言表示反对执行局把俄国代表团中的一半表决票给社会革命党人。对此，执行局通过表决决定：给社会民主党人10票，社会革命党人7票，工会代表3票。第二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团，内部

对表决票进行了分配：布尔什维克四票半，孟什维克二票半，崩得代表、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代表和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组织各一票。

在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列宁有幸结识了奥·倍倍尔、维·阿德勒、卢森堡、保·辛格尔等人，并一起在“音乐堂”照了相。这是列宁第一次同克拉拉·蔡特金会面，他感到十分兴奋。卢森堡向警察特别介绍了列宁，她用一种艺术家的眼力精确地指出了列宁的特征。她说：“你把这个人仔细看一下吧，他就是列宁。注意他固执倔强的头。”

围绕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大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提交该问题决议起草委员会的有 4 个决议草案。法国代表古·爱尔威在他的草案中，鼓吹无政府主义，主张反对一切战争，并提出以总罢工和起义来回答任何战争。法国社会党多数派饶勒斯和瓦扬提出的草案认为，一旦战争爆发，应该立即用群众性罢工和起义来保卫资产阶级祖国。法国少数派盖得提出的草案认为，没有必要专门进行反对军国主义的宣传，宣传社会主义也就是宣传保卫和平和反对战争。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倍倍尔提出的草案，虽然提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战争才不会发生，但未区分战争性质，也未提出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任务。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代表开会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同意以倍倍尔的草案作为基础，由列宁和卢森堡提出一个修正案。8月20日和21日，俄国代表团召开了会议，经过讨论同意以倍倍尔的草案为基础，并吸收列宁和卢森堡的修正案，提出决议草案。8月22日在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委员会会议上，列宁同卢森堡、马尔托夫一起，以俄国代表团和波兰代表团名义，对倍倍尔的决议草案提出修正案。接着列宁和卢森堡一起同倍倍尔就决议草案的修正案进行长时间交谈，倍倍尔才同意了两个修正方案中的一个方案。8月24日在大会闭幕的那一天，大会才通过了这一修正案。

这一修正案说明：帝国主义是阶级压迫的主要武器，必须进行广泛的宣传，强调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不仅是反对战争，而且是利用战争危机加速资产阶级的崩溃。这里面已经包含了列宁后来提出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的萌芽。

11月9日，列宁参加了在捷里奥基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列宁作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报刊等问题的报告，并在报告中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提出了对待第三届杜马的策略方针。11月18—25日，列宁参加了在赫尔辛福斯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做了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团策略的报告。他指出：俄国无产阶级当前的任务是坚定地捍卫民主事业和革命事业，要利用杜马为革命服务，即广泛地宣扬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观点和社会主义观点。这次代表会议通过了列宁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案。

11月中旬列宁文集《十二年来》第1卷在彼得堡出版了，但立刻遭到了当局的严厉查禁。为躲避警察局的搜捕，列宁从库沃卡拉来到芬兰赫尔辛福斯附近的奥格里比雅小车站，住在一户只有姐妹俩的芬兰人家里。这个房间清洁、舒适，窗户上挂着花边窗帘，房间里家俱摆得井井有条，隔壁不断传来谈笑声和钢琴乐曲。列宁在这里居住了一段时间，生活虽然很孤寂，但他却认为很适合自己，因为此时他正为写作《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而阅读书籍，搜集资料。在这段时间里，他主要阅读了第一届国家杜马和第二届国家杜马的速记报告、全俄农民联合会代表大会记录、亚·芬—叶诺塔也夫斯基的著作《土地问题和社会民主党》资料 and 文件等。

1907年12月中旬，列宁参加了布尔什维克中央会议，会上决定将《无产者报》迁到国外出版。布尔什维克中央委派列宁、波格丹诺夫和杜勃洛夫斯基

出国编辑出版该报。动身去瑞士日内瓦之前，列宁让克鲁普斯卡娅先留在考卡拉，照顾她生病的老母，安排好党的事务，然后再去斯德哥尔摩会面。

列宁从奥格里比雅来到赫尔辛福斯，同来自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开了会，接着乘火车去亚波（土尔库）。列宁在火车里发现有暗探跟踪他，于是便在离亚波 12 俄里的地方悄悄地下了车，冒着刺骨的寒风，徒步走到城里。2 点时分，他按照预定的计划来到芬兰社会民主党人瓦尔特鲍尔格的家里。

列宁由芬兰社会民主党人路德维希·林德斯特廖姆陪同，乘马车自亚波去码头，准备在那里搭乘开往斯德哥尔摩的轮船。但当他们来到码头时，发现轮船早已开走了，码头上有密探在监视着来往旅客，于是，他们只好到附近的一个小岛上去乘船。列宁须在冰上步行三俄里。列宁在两个喝得醉醺醺的农民陪同下在冰面上行走了三俄里。由于冰面冻得不牢固，脚下的冰时常裂开下沉，列宁险些葬身海底。

列宁到斯德哥尔摩后不久，克鲁普斯卡娅也来了。列宁立即对妻子讲述了冰上遇险的经过，并说他在那一瞬间想到：“如果这样死去，唉，死得多么愚蠢啊！”

1908 年 1 月 7 日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到了日内瓦。这座城市显得十分荒凉而又沉寂，虽然没有下

雪，但却刮着凛冽刺骨的寒风。列宁的第二次寄居生活开始了，而这次寄居生活要比上次艰苦得多。

到达日内瓦之后，列宁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以便尽快在国外出版布尔什维克中央的机关报《无产者报》。1月，他同排字工人伊·姆·弗拉基米罗夫谈话，希望他在短期内恢复《无产者报》印刷所。他还给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写信，告诉他们《无产者报》已迁至国外出版，请他们为该报撰稿。列宁委托阿·马·高尔基的妻子安德烈也娃去找意大利轮船职工联合会书记帮忙，以便用轮船把《无产者报》经意大利运往俄国敖德萨。

2月，列宁会见到达日内瓦的《无产者报》编委杜勃洛文斯基，两人详细地商谈了编辑出版该报的计划。列宁还给高尔基写信，请他为《无产者报》撰写政论文章和文学作品。列宁、波格丹诺夫和杜勃洛文斯基三位编委一起发表《无产者报》出刊通告。

出版《无产者报》的经费是莫斯科普列斯尼亚家俱工厂的厂主、23岁的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施米特赞助的。（他在1905年革命中出资支持革命事业，因此被捕并在监狱里被杀害。）这样，《无产者报》就有了出版经费。

经过列宁等人的努力，秘密的《无产者报》第21号（即迁到日内瓦后出版的第1号）于2月26日在

日内瓦出版了。

在日内瓦筹备编辑出版《无产者报》时期，列宁非常关心侨居在日内瓦的革命同志和战友。战友们生活艰苦，吃了上顿没下顿。列宁就千方百计给予资助，把做报告挣来的钱捐给大家，解决大家吃穿住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月列宁想办法把关压在日内瓦监狱的尼·亚·谢马什柯营救释放出狱。

1907年8月，在高加索梯弗里斯的埃里温工厂发生了一起抢银行事件，抢来的钱都交给布尔什维克作活动经费。由于奸细告密，使几个布尔什维克分子被捕。谢马什柯因受此事牵连也在日内瓦被捕，并要引渡给沙皇政府。其实抢银行事件发生时谢马什柯正在斯图加特参加第二国际社会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但马尔托夫等人拒不为谢马什柯作证。列宁立即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说明谢马什柯一直住在国外，以便为他澄清事实。谢马什柯有一次接到狱外送来的三个桔子，他把桔子瓣开，里面塞了一个纸条，纸条上写道：“别害怕，列宁来了，他处理你案件来了。”列宁给他聘请了瑞士一名高级律师。最后谢马什柯被无罪释放。出狱那天晚上，他就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小组会，而第一鼓掌欢迎他的就是列宁。

在2月7日，写给高尔基的一封信中，列宁明确阐述了对当时存在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一些重大

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办好党报是一件十分重大的工作。他在信中说：“我坚信，党现在需要有一个正常出版，并能坚持不懈地执行同颓废消沉作斗争的路线的政治性机关报——党的机关报。政治性报纸。”在信中，列宁还指明必须同 1905 年革命失败后脱离革命、投敌变节、革命意志消沉等现象作斗争。

2 月 26 日，列宁在《无产者报》第 21 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政治评论》，文中深刻总结了 1905 年俄国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为无产阶级政党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列宁指出：“‘三年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是任何力量都不能从各阶级的意识中抹掉的。这些教训非常丰富，不但有很多正面的教训（1905 年工农群众斗争的形式、性质和胜利的条件），也有很多反面的教训（两届杜马的破产，即立宪幻想和立宪民主党领导权的破产）。”

3 月 18 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日内瓦召开了纪念卡尔·马克思逝世 25 周年、1848 年革命 60 周年和巴黎公社 67 周年的国际群众大会，列宁发表了关于巴黎公社的演说。他在演说中高度评价了巴黎公社的伟大意义，同时准确地指出公社犯了两个重要错误——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和对阶级敌人过于宽大。列宁总结历史经验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于现实斗争。他认为，1905 年革命失败后布尔什维克的重大

任务是：在政治上批判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在哲学上批判俄国马赫主义。他还主张把批判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同国际上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

1908年初，波格丹诺夫、巴扎罗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一书。这本书主要修正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甚至把恩格斯的辩证法说成是神秘主义。列宁看过这本书后，感到异常气愤。

列宁在1908年3月24日写给高尔基的一封信中指出，对宣扬俄国马赫主义的论文集《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必须进行批判，决不能采取中立的态度。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别尔嘉也夫主义和僧侣主义。”他对高尔基说：“您必须明白了，也应当明白了：一个党员一旦认识到某种学说是极端错误和有害时，就必须起来反对这种学说。如果我不是绝对相信（我愈是阅读巴扎罗夫、波格丹诺夫之流的著作，就愈相信）他们的著作从头到尾，从叶至根（直到马赫和阿芬那留斯）都完全是荒谬、有害、庸俗、说教的作品，我也不会来争论的。普列汉诺夫反对他们实质上是完全正确的，只是他不会或者不想或者懒于具体地、细致地、简明地说出自己的看法，而是用深奥的哲理来吓唬这些人。我无论如何要按自己的方式说出自己的反对意见。”

应高尔基的多次邀请，列宁4月23—30日来到意大利喀普里岛休息了几天。高尔基一见到列宁感到非常高兴，激动得像个孩子一样。列宁也同样十分兴奋，但他知道高尔基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一书的问题上与自己有原则分歧，所以一见面就微笑着对高尔基说：“我知道，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您始终希望我和马赫主义者有和解的可能，虽然我在信中已预先告诉过您：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您就不要再费心了。”

在去高尔基住宅的路上和到住宅之后，高尔基一直试探着向列宁说明，列宁并不是完全正确的，虽然他本人不相信任何哲学，不了解这场哲学争论，也不打算调解这场哲学争论。高尔基向列宁解释，哲学好像一个女人，长得并不漂亮，甚至很丑，但经过巧妙打扮，却变成了一位妖艳的美人。高尔基的这一说法惹得列宁大笑起来。

“嗯，这是您幽默的表述。”列宁说。

接着高尔基告诉列宁，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巴扎罗夫等人在他心目中的大人物，受过良好全面的教育，在党内还没有人能同他们相比。

“就假定是这样的吧。唔，但由此得出什么结论来呢？”

“归根到底，我认为他们和我们的目的是相同

的，既然大家都深刻认识和领悟到目的一致，那就应该抹掉在哲学上的种种矛盾……。”

“就是说仍旧存在着和解的希望？这是没有用的，”列宁说，请“把这个希望抛开吧，而且尽量抛开得远些，我恳切地劝告您！依您看来，普列汉诺夫也和我们的目的相同的么，但是——这话只能在我们之间说——我认为他的目的和我们的完全不同，虽然他也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形而上学者。”

这几天，列宁和高尔基每天在海上钓鱼，玩得痛快极了。他们边钓鱼，边无所顾忌地聊天，因为在船上只有高尔基的妻子安德烈也娃和几位喀普里岛的渔民。小船在碧蓝而又澄清的海面上划动，列宁学习“用手指”钓鱼——即只用一根钓丝，而不用钓竿。渔民们向列宁传授经验说：当手指觉得线在摆动的时候，就要扯一扯钓丝：

“这样：叮铃—叮铃。懂得了吗？”

列宁很快就钓到了一条鱼，他把鱼拉了起来，大喊大叫，像小孩一样欢天喜地：

“哈哈！叮铃—叮铃！”

看到这一情景，渔民们都欢乐地哄笑起来，并称呼列宁为“叮铃—叮铃先生。”列宁走了以后，渔民们还常常问起：“叮铃先生还好吗？他会被沙皇抓住

吗，不会吧？”

在喀普里岛，列宁详细询问喀普里渔民的生活、他们的收入、牧师们的影响和学校的情况，就连高尔基也为列宁的兴趣广泛而吃惊。当他知道有一个牧师是贫农的儿子的时候，就仔细询问是不是农民一般都把儿子送教会学校念书，是不是念完书后回家乡当牧师？

“你懂吗？如果这不是偶然的话，那就是说，这是梵蒂冈的政策，一种狡猾的政策！”

虽然列宁不会讲意大利语，但喀普里渔民却非常爱戴这位学识渊博，和蔼可亲的人，他们从列宁微笑的面部表情中看出列宁的为人。老渔民乔凡尼·斯巴达洛谈到列宁时说：“只有正直的人能有这样的笑容。”

在聊天时，高尔基向列宁介绍了下新城、伏尔加河，讲述了自己的童年尊敬的外祖母阿库琳娜·伊万诺夫娜，还谈到自己少年时代的流浪生活，回忆了父亲和外祖父。列宁聚精会神地听着高尔基讲，他完全被高尔基那传奇般地经历吸引住了。他那习惯于眯缝的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神情，有一次列宁对高尔基说：

“老朋友，把这一切都写下来吧！这是一项非常有益的工作，非常有益……”

列宁的话给了高尔基很大的启示和鼓舞，高尔基牢牢地记住了这些叮嘱。后来，高尔基实现了列宁的愿望，写成自传体长篇小说：《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在俄国和全世界广泛流传。

在其余的时间里，高尔基陪同列宁参观了庞培废墟、那不勒斯博物馆、维苏威火山，浏览了那不勒斯市市郊。高尔基向列宁详细介绍了意大利风景名胜，他语言简炼，绘声绘色，引起了列宁的高度赞赏。列宁思想锐敏，才智过人，善于胸襟坦率地、真诚地对待人和事，这使高尔基十分钦佩。通过喀普里岛的会晤，列宁和高尔基进一步加深了相互间的理解和友谊。

从此以后，列宁和高尔基不断通信往来，就许多问题进行全面的交流。列宁帮助高尔基克服了对“造神说”和“寻神说”的错误认识，高尔基写出许多真正反映社会现实和革命斗争的进步作品。列宁也从高尔基这里了解到俄国人民群众的心声和党内的动态，这为他制定正确的革命斗争策略有很大的帮助。

5月末—6月初，列宁在《无产者报》编辑部会议上，同杜勃洛文斯基一起拒绝了波格丹诺夫提出的决议草案，这个草案声称经验批判主义同布尔什维克派的观点并没有矛盾。由于哲学观点的分歧，列宁同波格丹诺夫在编辑出版《无产者报》工作中，合

作起来已十分困难。

10月，彼得堡出版了《卡尔·马克思文集（1818—1883）》，但出版不到10天，法院就停止出售该书。这本书中载有列宁写的重要文章《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他在4月16日此文刚写完时，就写信告诉喀普里岛的高尔基，说此文是向波格丹诺夫、巴扎罗夫等人的哲学观点的“正式的宣战书”，实际上这是列宁批判国际和俄国修正主义的战斗檄文。列宁在论文中指出，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影响的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改变了手法，打着“修改”的幌子，从马克思主义内部来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在书中，列宁对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施坦进行深刻的揭露批判。

12月中旬，列宁和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及岳母来到巴黎，受到列宁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的欢迎。他们在城郊包涅街上租了套住宅，紧靠城墙，离蒙苏里公园不远。这套住宅很华丽，房子宽敞，整洁豁亮。三间卧室，一间会客厅。但列宁夫妇的生活方式和家具同这所住宅很不相适应，所以看门人也以非常蔑视的眼光看了看他们白色的桌子、普通的椅子和方凳。把新家安顿下来颇花费一番功夫，为了弄一个煤气供应证就往市中心跑了三次。到国立图书馆借书，需房东担保，而房东则因为他们简陋的家俱

而不愿意出面担保。

列宁顾不上把家安顿好，就到国立图书馆去了，国立图书馆离住处很远，中午停止开放，借阅书的手续也很繁琐，列宁为此很恼火。克鲁普斯卡娅给一位法国教授写信，请他推荐别的图书馆，但这位教授推荐的几个图书馆也不理想，列宁为此还发了一顿脾气。后来，列宁的自行车在国立图书馆存车处被人偷走了，列宁找到看车人，看车人说只允许把车子放在大门口，并不负责保管车子，弄得列宁哭笑不得。但只要能有书读，遇到再大的麻烦列宁也是能够克服的。

1909年1月3—9日，列宁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会议。他是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参加会议的，被选入了主席团。他就“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组织问题和对杜马党团的态度等问题作了报告与发言，严厉批判了取消派和召回派，号召各大党员和各级组织因取消党的企图做斗争。

2月中旬，列宁从1908年11—12月出版的孟什维克取消派报纸《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上得知，普列汉诺夫由于同取消派意见分歧已经退出了该报编辑部。从此，列宁开始酝酿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护党派结成反对取消派的护党联盟问题。

当时，在俄国的彼得堡、莫斯科、巴库、基辅、叶加特林诺斯拉夫、乌法等地的社会民主工党组织中，有许多孟什维克工人。他们虽然不很了解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分歧的实质，但是并不赞成取消党、取消革命，因而纷纷站出来反对取消派，他们便形成了孟什维克护党派的基本队伍。

在普列汉诺夫正式退出取消派的报纸《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之后，在许多孟什维克护党派工人的建议下，公开站出来批判取消派，成为孟什维克护党派的首领，并向列宁建议共同进行反对取消派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集中一切力量反对取消派，为了把工人群众从孟什维克影响下争取过来，在1906年6月21—30日巴黎召开的布尔什维克的《无产者报》编辑部扩大会议上，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不顾布尔什维克少数调和派的反对，提出了在目前的条件下，同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护党派结成联盟，共同进行反对取消派、捍卫党组织的斗争。

第十七章 理论研究

我这样着急出书不仅因为这是一项著书立说的义务，而且还是一项严重的政治义务。

——列宁

1909年5月初，列宁写的批判俄国马赫主义的哲学名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终于由莫斯科“环节”出版社出版了，印数5000册。列宁为写该书历经近8个月的呕心沥血的研究，阅读了几百种哲学著作、自然科学著作，特别仔细地研读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梅林、狄慈根的哲学著作。1908年5月，他还专门去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查阅资料近一个月。他忘餐废寝地从事写作，太累了，就躺在床上读有关法语语法和语言史方面的书，以松弛一下紧张的神经。此书的出版的确是列宁亲友的共同努力的成果，全家人四处为他搜集资料，姐姐叶

利札罗娃还担任了该书的校对工作，此书的出版使列宁异常兴奋，他把此书迅速赠给他的亲友，其中送给妹妹的一本书写道：“作者送给亲爱的玛尼亚莎。”给柏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女活动家罗·卢森堡寄去一本，以作为他们二位战友“最近一次见面时关于马赫的谈话的纪念”。

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精力写这部长篇哲学著作呢？列宁在1909年4月8日给他姐姐叶利札罗娃的信中阐明了写此书的目的，他说：“我这样急着出书不仅因为这是一项著书立说的义务，而且还是一项严重的政治义务。”这就是要清算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出现的修正主义思潮，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武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去迎接未来的革命斗争。

俄国马赫主义者之所以选择经验批判主义，即马赫主义来篡改马克思主义哲学呢？就是因为它要以科学的伪装来掩盖反动的实质。因此，在这部著作中，列宁首先剖析了经验批判主义的所谓科学根据。

经验批判主义者把经验看成是脱离实践的自己主观“感觉的复合”，把世界看成自我感觉的总和。这实际上是以唯心主义。解释经验，否认世界的物质性、可知性和规律性。列宁在著作中揭示出这种哲学实际上是在“经验”的幌子下宣扬极端唯心主义。他

指出：“这种哲学的荒谬就在于：它导致唯我论，认为只有一个高谈哲学的个人才是存在的。”

列宁在著作中说：“马赫关于物即感觉的复合的学说，是主观唯心主义，是贝克莱主义的简单重复。”这就进一步指出经验批判主义的思想来源于18世纪哲学家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贝克莱认为：物质是人的硬、软、热、冷、颜色、滋味、气味等“感觉的组合”，从而否认了物质的客观性。俄国马赫主义则以主观感觉来解释经验，不敢直接否认物质的客观性。列宁在著作中说：“这真是‘跪着造反’。这是典型的哲学上的修正主义。”

另外，列宁在著作中还论证了哲学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同政治上的阶级斗争是和路线斗争密不可分的，从而深刻揭示了哲学的党性原则。

在这部著作中，列宁全面概括了恩格斯逝世以来的自然科学的新成果，继承、捍卫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列宁在关注俄国国内党组织建设和人民革命斗争开展的同时，还时刻关心着世界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1909年夏季，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前往离巴黎

25 公里的德拉维里，拜访了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保·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夫妇。拉法格夫妇殷勤地招待了他们，陪同克鲁普斯卡娅去公园散步。克鲁普斯卡娅仔细端详着站在她面前的这位马克思的女儿，目不转睛，心情激动，不断地用不流利的法语同劳拉交谈。他们谈论的话题十分广泛，其中谈论最多的是妇女参加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情况。列宁则和保·拉法格留在房间读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克鲁普斯卡娅和劳拉回到房间时，看到列宁和保·拉法格……10 月中旬，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参加了巴黎 10 万人的游行示威，抗议处死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弗兰西斯科——费勒尔，他是因为准备 1909 年 7 月巴塞罗那起义、反对政府把军队派往摩洛哥而被判处死刑的。

列宁的工作太紧张了，而且缺乏生活规律，因此时常感到体力不支。为了避免把身体搞垮，他不得不听从亲友和医生嘱咐，去郊外疗养休息。

1909 年 7—9 月，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岳母伊丽莎白·瓦西里也夫娜、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一起，来到距巴黎 50 公里的塞纳—马恩省的博姆邦村休养。他们住在列克列寡妇开创的便宜膳宿公寓里，4 人一天只付 10 个法郎。他们步行去尚波，参观

那里保存着古城墙的遗迹，参观了布兰迪—图尔，此期间还去了厄克连旅行，换一下新鲜空气。并时常到维尔基费尔木阿森林和科拉玛尔森林中去散步，呼吸那里充满复离子气息的列宁夫妇还十分注意观察这里的民俗。他们的这幢公寓楼中住着一些小职员、伯爵的侍仆，还有一个大服装店的女售货员和她的丈夫及女儿。他们发现这些人大都是典型的小市民，虽然家境并不宽裕，但是一方面讲究阔气排场，要求饭菜丰盛，住宿舒服，另一方面还想摆绅士派头，梦想有朝一日成为富豪。

9月中旬列宁从博姆邦村回到巴黎。12月7—8日，列宁自巴黎给他母亲写了一封信，希望母亲在严冬要多保重身体。他在信中说：“听说你们的房间很冷，我非常不安，如果现在都不到12度，那这个冬天怎么过呢？你可别伤风了……能不能想点别的什么办法。是不是装一个小铁炉？这里的人常常这么办（我们不需要，我们有暖气，很暖和），我们在西伯利亚的时候也是这样办的。”12月底，列宁收到母亲寄来的新年礼物象棋，这副象棋是他父亲生前亲手旋制的。由于工作繁重，此时列宁已经很少下棋了，但他却十分珍视这副象棋，把它看做是父母留给他的最宝贵的礼物。

1910年1月15日至2月5日，列宁代表《社会

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工党中央全会，他在全会上多次发言，并提出反对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的决议草案。这次全会是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违背列宁意愿的情况下策划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和各种派别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为了同列宁、普列汉诺夫的孟什维克护党派共同反对取消主义的计划相对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调和派分子要求布尔什维克同取消派和托洛茨基派统一合并为一个政党。调和派代表在会上占多数，列宁处于少数。由于列宁的坚持和斗争，才通过了谴责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的决议，但全会在调和派的把持下，违反列宁的意志，发表了《布尔什维克的宣言》，决定停止出版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无产者报》，解散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把它的财产交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把现金转交给国际社会主义组织的代表，由于列宁的坚持和斗争，这次全会又在决议中补充了一个条文：在取消布尔什维克中央和机关报的同时，也取缔“呼声”派、前进派的中央机关报。

1910年7月1日至3日，列宁应邀来到喀普里岛看望高尔基夫妇。那时，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巴扎罗夫等也住在喀普里岛。在去贝杜斯别墅的路上，高尔基向列宁谈起波格丹诺夫对列宁怀有热

烈的友好感情，谈到卢那察尔斯基和巴扎罗夫是才能出众和聪明过人的党员……。列宁心里明白，高尔基是想使他与这些人重归旧好。但列宁认为：如果这些人改正了错误，和解并不困难。但他们拒不放弃马赫主义立场，在这种情况下和解是毫无意义的。

有一次，波格丹诺夫与列宁谈起了哲学，列宁引用 19 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叔本华的话对波格丹诺夫说：“叔本华说：‘谁的思想清楚，他就说得清楚。’我认为他再没有比这讲得更好的话了。波格丹诺夫同志，您说得不清楚。您能用三言两语向我解释清楚：您的‘代换说’（认为物理的东西是心理的东西的代替）将给予工人阶级一些什么，马赫主义为什么比马克思主义更革命些？”

波格丹诺夫试着解释，但罗嗦半天也讲不明白。

“得了吧，”列宁劝告说，“有一个人，大概是饶勒斯吧，曾经说过：‘说句老实话，强似当部长’，我可以补充一句：强似当马赫主义者。”

有一个夜晚，大家都出去散步了，列宁同高尔基妻子安德烈也娃谈话，列宁深深惋惜地说：

“一些聪明的、有才能的人，曾经为党做了不少事情，本来还可以多数十倍，但是他们不同我们一道走了！他们不行了。成十成百的这样的人都被这个万恶的制度毁坏了，摧毁了。

卢那察尔斯基会回到党里来的，他的个人主义没有那两个多。他真是个少有的聪明人。我对他有些‘偏爱’，——见鬼，多么愚蠢的话：偏爱。您知道，我的确喜欢他，他是个优秀的同志！他有一种法国式的光彩。他的轻率也是法国式的，他的轻率来自他的唯美主义。”

在喀普里期间，高尔基一直想单独与列宁聊一聊。但由于经常有其他人在场，始终没有找到这种机会。几天后，列宁返回了巴黎，高尔基感到十分遗憾。

1910年8月28日至9月3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了第二国际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和普列汉诺夫都出席了这次大会。在共同进行反对取消派的共同斗争中，两个老战友再次会面，格外感到亲切。这与他们在1907年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相见时的心情和景象大不相同，那时彼此只是寒暄几句而已，别有余言。在大会期间，列宁把第二国际左派紧密地团结起来，对社会主义和妥协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列宁的所作所为受到了广大左派人士的赞扬和支持，但机会主义者却对他恨之入骨，甚至诅咒他。当时有人问他们：“为什么把一个人看得这么危险？”他们咬牙切齿地回答道：“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在24小时内全神贯注于革命，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想，甚至做梦也会看到革

命。你去试试对付这样一个人吧。”

在代表大会期间，列宁给母亲写信，约她到斯德哥尔摩会面，并托人在当地租好了房间。大会一结束，列宁就来到斯德哥尔摩，等候母亲的到来。列宁母子已有3年未见面了，母亲已75岁高龄，身体多病，但非常想念儿子，要看看他。9月13日，母亲和妹妹坐的轮船晚点了，9点多钟才到达斯德哥尔摩。母亲和妹妹站在轮船甲板上，手扶栏杆，向远方望去，一眼就看到列宁了，列宁站在码头眼巴巴地等着母亲和妹妹的到来。母亲看到儿子消瘦多了，模样变了，不由地热泪涌出。在这一期间，列宁常常上午忙于工作，去图书馆查阅图书资料，下午陪同母亲和妹妹休息娱乐。他们游览了市区的许多名胜古迹和郊外的风景区，并购买了一些当地的特产。母亲在斯德哥尔摩一共住了12天。

分别的时刻到了。列宁站在码头上眼含热泪，望着母亲登上轮船，母亲也难过得流下了泪水。列宁不能登上这艘属于俄国公司的轮船，他如果上船，就有被捕的危险。他用忧郁的眼光送别母亲，心如刀绞般疼痛，他心里明白，母亲已经75岁了，体弱多病，也许这是同母亲最后一次团聚了。

玛·亚·乌里扬诺娃于1916年7月25日病逝，终年82岁。她未能再见儿子一面，更未能看到儿子

成了苏维埃俄国党政领导人。

列宁送走母亲后，取道哥本哈根，于9月底回到巴黎。

第十八章 独立建党

党同取消派已经完全决裂，党在1912年1月1日已经正式声明：取消派不再属于党。

——列宁

1910年10—11月期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老党员绥拉菲玛·伊里尼奇娜·霍普纳尔风尘仆仆地从俄国国内到巴黎来找列宁。但她心里很不踏实：“列宁是党的著名领导人，能有机会会见她吗？”带着这个疑问，她找到了一位熟悉的老战友。

“娜塔莎（霍普纳尔的党的化名），”这位战友对她说，“您怎么糊涂了，列宁是多么希望会见每一个刚从国内来的人啊！”战友的话说得很明确，但并未完全打消霍普纳尔疑虑，所以她并没有主动去找列宁。

在一次布尔什维克小组会议之后，克普斯卡娅

突然来到霍普纳尔面前，热情地说：“您就是那位不愿意到我们那里去的娜塔莎！伊里奇却要我无论如何把您请去。明天晚上8点钟请您到我们那里去。”

于是，霍普纳尔按时来到玛丽·露丝街4号住宅。列宁、克鲁普斯卡娅和她年老的母亲热情地邀请霍普纳尔到会客室餐厅的房间喝晚茶和吃便饭。

霍普纳尔开始时有点紧张，不知从何谈起，列宁就先讲了几句话，提出了几个问题，很快，霍普纳尔的话匣子就打开了，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俄国国内的情况。列宁十分认真听霍普纳尔讲，有时提一二个问题，把话引向深入。霍普纳尔越讲越起劲，讲述了1909年和1910年在敖德萨、尼古拉也夫和叶行特林诺斯拉夫发生的许多事：筹办党的刊物，警察袭击印刷所，地下小组开展工作，打入保安机关的情探小组开展的活动，布尔什维克战友的几次被捕等。在听到霍普纳尔介绍反动势力猖獗、警察局加强反革命恐怖活动时，列宁三言两语地说明这是反动势力在无产阶级斗争面前虚弱的表现，反动派统治垮台时刻就要到了。列宁在谈话中始终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霍普纳尔还要往下说，见到列宁突然看了一下手表，这才猛然想起，约定的一个半小时的谈话时间快用完了，于是赶快结束了谈话。列宁请霍普纳尔把

谈的情况写一篇通讯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然后和蔼地同霍普纳尔握手告别，霍普纳尔后来写成的这篇通讯，刊登在《工人报》第一号上。

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派别林立，斗争尖锐。取消派和走第三条道路的托洛茨基派、主张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妥协的布尔什维克调和派，都反对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国内由孟什维克取消派担任的中央委员拒绝加入中央委员会俄国局，认为中央委员会存在的本身都是“有害的”。后来中央委员会俄国局中的布尔什维克被捕之后，这个机构就不存在了。为了反对取消派、托洛茨基派和调和派，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必须创办一种适合工人阅读，能够使他们透彻了解党的状况和面临的任务的报刊。

1910年11月12日布尔什维克的秘密的通俗机关报《工人报》在巴黎创刊了，这个报纸一直出到1912年8月12日之前，共出版了9号。列宁是这个报纸的创始人和实际领导者。

11月1日，列宁给高尔基寄去了《工人报》第一号，并请他为该报筹集捐款，并说要在俄国国内创办一个合法的《思想》杂志，同取消派作斗争。高尔基很快回了信，完全赞成出版《工人报》，并为该报寄来了500法郎捐款。

1910年11月20日，俄国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病逝于阿斯塔堡车站站长家中。享年82岁。他是因不满家庭的贵族生活而弃家出走，途中得了肺炎。托尔斯泰逝世后，大学生和一部分工人举行了示威游行，列宁为此写了《游行示威开始了》一文，发表在12月31日《工人报》第2号上，列宁在文中高兴地指出：“无产阶级开始行动了，民主青年跟着行动起来。俄国人民正在苏醒过来投入新的斗争，迎接新的革命。”

12月，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合法报刊《明星报》和《思想》杂志分别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出版了。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护党派曾经为这两个报刊投稿。《明星报》于1912年5月被查封，被查封《涅瓦明星报》于1912年3月创刊。

1911年春，特·弗·柳德文斯卡娅坐牢和流放期满之后，来到巴黎玛丽·露丝街4号拜访列宁。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非常热情地欢迎她的到来。

开始，柳德文斯卡娅说话有些胆怯和腼腆，但在列宁平易近人和纯朴坦诚的风格的感染下，很快就滔滔不绝地谈了起来。她详细地讲述了斯托雷平反动统治时期彼得堡党组织的艰苦斗争、奸细的破坏和动摇分子的脱党行为，还介绍了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是如何学习列宁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

主义》的。在讲述过程中，列宁一再给柳德文斯卡娅鼓动，他说：“没有无用的情节，这些情况都有用。”当她谈到工人们与孟什维克知识分子进行的辩论时，列宁夫妇觉得很有趣，禁不住咯咯大笑起来，列宁说道：

“在革命紧张的时候谁有时间同这些知识分子去辩论，去注意他们的哲学怪论呢！”

接着，他对柳德文斯卡娅说，不能对工人的上层受反动思潮影响的危险性估计不足，必须摧垮所有篡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企图。列宁又把话题转回刚才讲的那件事上来，他满意地继续说：

“这也能证明：在这样复杂的问题上工人能够明辨是非！他们凭着阶级的嗅觉懂得什么是打着纯科学的幌子贩卖奴隶主思想的私货。”

列宁对柳德文斯卡娅讲述彼得堡党组织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斗争特别注意。柳德文斯卡娅讲述了布尔什维克如何把孟什维克取消派分子从瓦西里岛区的五金工会理事会驱逐出去，彼得堡失业工人工会如何在物质上帮助工人，办工人食堂，组织工人发表演说。当柳德文斯卡娅讲到孟什维克不参加工人代表团的的活动，而在投票时却同立宪民主党人合作时，列宁说：“看他们坠落到何等地步！”

列宁称赞党的彼得堡委员会在困难而复杂的条

件下，工作搞得很出色。

最后，柳德文斯卡娅又向列宁介绍了塔里诺耶糖厂工人罢工的事情。

听完后，列宁感到很兴奋，站起来在房间内很快地踱来踱去。

“这很好，这很好。”列宁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

二人的谈话快结束了，分别时，列宁俏皮地对柳德文斯卡娅说：“您说巴黎使您感到惊奇？而我却认为您使巴黎感到惊奇！”

1911年春季，列宁参加布尔什维克巴黎小组会议，会上选举执委会。柳德文斯卡娅是这个小组成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列宁在发言中建议在提各执委会候选人时，要考虑选举那些同国内实际工作有联系、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

在哥白林大街图书馆召开了另一次布尔什维克巴黎小组会议，讨论取消派和联合派的问题。列宁在向小组内具有调和主义倾向的成员做说服工作时说：

“取消派要取消党。我们则要取消取消派。你们是拥护党还是想同取消派站在一起？是拥护专制制度，还是反对它们？要么站在党一边，要么站在取消派一边，第三种可能是没有的，搞调和折中是不可能的。”

经过激烈争论，列宁提出的决议案通过了。原来属于调和派的工人转到列宁的立场上来。几个顽固的调和派分子被开除出小组，但小组的人数减少了。有的同志对此感到不安，便对列宁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您干吗把他们都赶出去？我们以后同谁一起工作？”

列宁笑着回答说：

“我们用不着混乱，就算我们现在人少了，但我们的行动一致了，有觉悟的工人会支持我们，因为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

1911 年春天，列宁和克鲁斯卡娅迁居到距巴黎只有 15 公里的龙寿姆，在这里建立了一所为党培训干部的学校。党校的第一批学员有 18 名，他们是来自彼得堡、莫斯科、基辅等各大城市的党的地下工作者和工人，多数是布尔什维克，也有孟什维克护党派分子和一名“前进派”分子，列宁是学校的领导人和骨干教员。龙寿姆离塞纳河 12 公里，在夏天炎热的时候，他常常和党校一起骑自行车去塞纳河游泳。列宁还组织了一个学员歌咏队，亲自教唱国际歌。

经过 4 个月的学习，龙寿姆党校所有的学员都被派到俄国国内做地下工作，有许多人成为布尔什维克的职业革命家。

格·康·奥尔忠尼启泽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后

来常说：“党派我们来是学习的，而不是让我们来玩乐的。”他学习非常努力，成绩也很优异。课程未学完，奥尔忠尼启泽和施瓦尔茨、勃·阿布列斯拉夫就被列宁派回俄国，进行全俄党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临行前，列宁同他们三个人进行了多次严肃的谈话。

1911年6月10日至17日，在巴黎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鉴于当时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已被孟什维克取消派控制，党的中央委员会俄国局中的布尔什维克已被逮捕，因此，列宁和他的拥护者积极促成了这次会议的召开。列宁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多次发言。经过列宁的斗争，会议最后通过了在最短时期内在国外召开中央全会的决议，成立了筹备召开党全俄代表会议的国外组织委员会，还成立了负责党的出版和运输工作的技术委员会。

1912年1月，列宁为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来到布拉格。

布拉格是捷克的一个安宁、和平的城市，这里也没有俄国侨民，是召开党代表会议的理想地点。在“观景殿”旅馆里住着党彼得堡组织的代表、工人叶·普·奥努弗里也夫。这一天，奥努弗里也夫饭后正在和另一位代表下象棋，两个人观战，突然，耳边响起了熟悉的家乡声音：

“喔唷，白棋要输了……该走王后。”

奥努弗里也夫等人马上站起来，围住了进来的那个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列宁同他们热烈地握手，并提出了许多问题：关于个人的家庭、工资情况、工人的情绪以及他们对代表会议有什么期望，等等。代表们也很快就被列宁异常朴实、和蔼可亲的态度所折服了，同列宁呆在一起，他们感到格外亲热，没有丝毫的拘束感。列宁提醒代表们说，布拉格到处都有奥地利和俄国的暗探，言行要特别谨慎，彼此称呼只能用化名。

一个小时以后，列宁带着一张写满字的稿纸又回到代表们中间。

“同志们，给你们介绍一下代表会议的主要议程。”

大家静静地听着，列宁一面念着文件，一面用铅笔敲着桌子，并且仔细地观察代表们的表情。有一位代表胆怯地提出一点意见。列宁扬起眉毛，迅速地看了看手中的纸条，说道：

“您说得对。如果您不喜欢，那我就把它删掉。”

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嗯，捷克同志很关心我们，他们给我们准备了安全的住所……有一位代表将同我住在一起。”

谁同列宁住在一起呢？大家激动地争辩起来，有人提议抽签。列宁不介入他们争论，只是俏皮地用眼睛斜视他们。

“该是我的份了吧。”一位代表说道。列宁看了他一眼，开玩笑地说：

“哦，您是一位重要的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合不来，还是斯切潘（奥努弗里也夫的化名）跟我去吧。”

列宁和奥奴弗里也夫的住所是一位捷克工人家里的一个大房间，房间里有两张床，还有五斗橱和几把椅子。列宁对待房东非常亲切温厚，彬彬有礼。他还很疼爱房东家的小女孩，常常把她抱在自己的膝盖上，抚弄着她的头发，逗她玩。列宁经常回来很晚，总是蹑手蹑脚地轻轻走进房间，悄悄地脱掉衣服躺下。有时回来早一点，他就坐下喝茶，吃一点夹奶酪和黄油的面包，休息片刻，这时，他通常喜欢把两只手的大姆指插在两腋下的背心里，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如果还有时间，他就要坐下来看书，批写文件。

为了保证来自俄国和地下党组织的代表不在俄国国内被捕，或在国外被沙皇暗探盯梢，列宁建议代表们分乘不同车次的火车，乘一次火车时也不要在一个车厢，到达后由捷克社会民主党负责迎接，并把代表们安排在各个工人家庭里去住。

1912年1月5日至17日，在布拉格召开了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

会场设在吉别恩街 7 号捷克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人民权利报》报社。由于会议是严格保密的，所以就连几个经过审查的招待人员也不知道开什么会。进入会场时，代表们必须经过一个四面由石头房子围住的院子。会议室的陈设很简朴：几张普通的桌子，一个书厨上面放着马克思的半身石膏塑像，一个铁制立式衣架。

与会的有 20 多个党组织的代表，列宁代表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出席了会议。代表中除了两名孟什维克护党派代表外，全部是布尔什维克。列宁向会议致了开幕词。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确定代表会议的性质、关于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及其他问题的报告，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都是列宁起草和校订的。

当各地党组织汇报工作时，列宁恭耳静听，唯恐漏掉代表发言中的每句话。当奥努弗里也夫发言时，有人想打断他的话，列宁果断地说：

“同志们应该让斯切潘把话讲完！”

在会议休息时间，列宁经常深入到代表中间同他们长时间交谈，向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询问每一件细小的事情。

经过列宁等人的努力和斗争，会议通过的《关于

确定代表会议的性质》的决议，决议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全党代表会议是党的最高机关。

代表会议的最主要成果是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取消主义和取消派团》和《关于国外的党组织》两个决议，把孟什维克取消派开除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样一来，布尔什维克党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简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此后，该党这个简称一直用到 1918 年。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该决议严厉谴责了沙皇俄国政府对华的侵略政策，高度评价了 1911 年 10 月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决议》写道：“代表会议指出将给亚州带来解放并使欧州资产阶级的统治遭到破坏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的世界意义，祝贺中国的革命共和派，表明俄国无产阶级怀着深切的热忱和衷心的同情注视着中国革命获得的成就，斥责俄国自由派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的行为。”

会议还决定：在巴黎出版的《工人报》为党中央的正式机关报。另外，会议还通过了出版公开的日报《真理报》的决定。

会议选出列宁等 17 人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其中包括后来被揭发出是沙皇情探的罗·瓦·马林诺夫斯基。在代表会议结束后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上，补选

伊·斯·别洛斯托斯基和斯大林为中央委员。

代表会议还选出了由奥尔忠尼启泽、斯大林等 5 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俄国局。

代表会议闭幕后，列宁途经莱比锡、柏林返回巴黎。根据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列宁在途经柏林时，找倍倍尔和考茨基，要求退还布尔什维克存在蔡特金手中的财产，理由是取消派未停止派别活动。但遭到了冷遇，财产未能取回。

3 月下旬至 4 月上旬，列宁在巴黎会见了前来拜访的高尔基，两人进行了热烈交谈。高尔基告诉列宁：他想建立一个出版社，把国内外的作家团结起来。高尔基还想写一些西方文学和俄罗斯文学史的书，一些关于文化史的书，以便为工人们自修和进行宣传提供资料。

列宁不同意这个计划，他向高尔基说明：大多数同志忙于党的实际工作，没有时间做这方面的工作；一些能写大部头书的知识分子已被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俘虏了；俄国存在着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秘密运到国内十分困难。

因此，只能等到时来运转，才能谈论成立出版社的问题。

列宁两眼炯炯有神。他摆出了许多事实和道理来说服高尔基。他告诉高尔基：战争即将暴发，列宁

站起身来，以他特有的姿势把手指插在腋下的背心里，在狭窄的房间里慢慢踱着，“不仅是一次战争，而是一连串的战斗！”

“战争快要来了。这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世界已经腐烂了，现在人们遭受了沙文主义、民族主义的毒害。我想，我们还会看见一场全欧洲的大战。无产阶级吗？无产阶级未必有力量防止这场流血的纷争。怎样才能防止呢？整外欧洲的工人罢工吗？他们还没有充分地组织起来和觉悟起来。

这样的罢工一定是国内战争的开始，我们是现实的政治家，不能指望这个。”

说到这里，列宁走到高尔基面前，语重心长地说：

“您想一想，吃饱肚子的人逼着饿肚子的人去互相厮杀，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您能说出比这更愚蠢、更可憎的罪行吗？工人们将为此付出非常重大的代价，但是最后他们是会胜利的。这是历史的必然。”

1912年5月5日列宁创办的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日报《真理报》创刊号在彼得堡出版。该报的经费来自工人的集资，在二年半的时间内，就有6000个工人团体为该报捐了款。列宁为该报拟定了办报方针，督促该报同取消派论战，编排重要版面，审阅稿件，几乎每天都在为该报撰稿，先后在《真理报》发表了

近 270 篇文章和短评。1912 年 7 月，列宁在《半年工作总结》的创刊号上高兴地指出：“不管怎样，《真理报》的创刊仍然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它证明俄国工人有觉悟，有毅力和团结一致。”

为了更好地参与彼得堡出版的《真理报》的编辑工作，列宁加强同俄国国内党组织的联系，列宁决定从巴黎迁往波兰的克拉科夫。

第十九章 移居波兰

即将来临的历史时代，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

——列宁

1909年6月22日，列宁和妻子及岳母来到克拉科夫。第二天，在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人谢·尤·巴哥茨基的陪同下，在克拉科夫郊外兹韦日涅茨工人区租了一套房间。

克拉科夫是波兰南部的一个工业和文化城市，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离俄国很近。由于奥匈帝国和德国正在准备对俄国发动战争，因而它不会帮助沙皇俄国政府搜捕俄国革命者。这里同俄国联系很方便，加里西亚地区居民有一种特制的通行证，持这种证件可自由通过国境，而这种通行证用很少的钱就可以买到。许多农妇经常穿越国境去俄国赶集，给她几

个钱就可以把信带到俄国，扔进信筒。列宁住在这里可以及时地指导《真理报》的编辑和出版工作。来到克拉科夫之后，列宁靠着一本城郊地图和一本俄波词典，很快熟悉了环境。一个半月以后，列宁同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人加涅茨基谈话时，对郊区的情况描写得绘声绘色，对郊区农民的生活状况、风俗习惯、思想情绪了若指掌。他甚至十分清楚地了解，农民对苛捐杂税和物价飞涨的抱怨。这一切都使加涅茨基十分惊讶地对列宁说：

“弗拉基米尔·伊时奇，您刚来不久，怎么来得及把这里郊区的情况了解得那么清楚呢？更主要的，您怎么会这样准确的了解农民的特点？”

列宁以一种开着玩笑的方式回答说：

“这是我的秘密……您一直闷在家里，而我则经常骑自行车到郊区去，与农民交朋友。这里的郊区很美，很吸引人。”

接着，列宁描绘起克拉柯夫的郊区来，并详细地讲述他同农民谈话的情形。加涅茨基感到更惊奇，便问列宁：

“这怎么可能呢？您怎样同他们交谈的呢？您不会说波兰话呀？”

但我有词典，依靠词典我能看看波兰报纸。到郊外去的时候，我随身带上词典，靠词典帮忙，我可以

同农民交谈。如果有些波兰话不会说，就用德语代替，因为他们中间有不少人会一点德语。交谈时常常还不得不用手势传意……总之，我们的谈话进行得很顺利，大家能相互了解……这里的农民是相当不错的。可惜，社会民主党没有重视他们，没有在他们中间开展工作。而没有农民，我们是什么事情都办不成的……”。

列宁认为，同西欧农民相比，波兰农民同俄国农民更为相似，由于贫困而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思想。

列宁每天的工作十分紧张。早上起床散步。从8点钟工作到10点钟，阅读从俄国邮来的报刊、书信和报告，并进行处理。来往信件很多，有时每天达几百封。午饭由克鲁普斯卡娅做，往往吃汤和肉丸子，2点钟工作到晚上5点钟。然后开始休息和锻炼，有时骑自行车，有时散步。冬天则滑冰，列宁的滑冰技术很高，在冰上还会表演各种复杂的动作，7点钟工作到9点钟，然后，列宁还要亲自把邮件送到火车站，以便赶上夜间11点开往俄国的火车，尽快把文稿邮到《真理报》编辑部手中。

同年9月2日，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搬到离车站不远的卢博米尔谢戈街47号，从住宅的窗口就可以看到沿着国境线伸展的一片广阔的原野。

列宁在克拉科夫的这座住宅成了党组织工作人

员来往国内外的中转站，秘密穿越国境线的工作由侨居在这里作俄国文学和历史教员的尼·瓦·克雷连柯负责。党中央委员会在列宁住宅举行过各种会议，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文书档案也保存在这里。

1912年7月28日，《涅瓦明星报》第17号上发表了孙中山的文章《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和列宁的文章《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在文章中颂扬了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认为孙中山“是位受过欧洲式教育的人”，是“已经争得了共和制度的、战斗的和胜利的中国民主派的代表”。他在文章中写道：“刚刚从自由保皇派变成自由共和派（能长久吗？）的资产阶级代表袁世凯，将在君主制和革命之间实行随风倒的政策，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正在尽量启发农民群众在政治改革和土地改革方面的主动性和勇敢精神，从中正确地寻找“复兴中国的道路。”孙中山提出通过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节制资本，发展国家资本，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这时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是“主观主义”，但列宁认为，孙中山的主张近似于俄国的民粹主义，因此，他把中国革命的胜利寄希望于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出现，他说：“由于在中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中国无产阶级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

党，而这个党在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反动观点时，一定会细心地辨别、保存和发展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

1912 年秋，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开始了。列宁组织和领导布尔什维克全力投入到竞选斗争中来。同年 3 月中旬，列宁拟定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选举纲领》，并在《真理报》等许多党报党刊上发表文章，为布尔什维克制定了对待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的斗争策略。为了排除孟什维克取消派的破坏与干扰，布尔什维克代表于 1913 年 10 月组成独立的布尔什维克党团。

1912 年 11 月，第四届国家杜马召开了。共有代表 410 名参加，其中，右派黑邦 170 名，十月党人 100 名，立宪民主党人 50 名，社会民主工党和无党派 90 名。

当工人代表集中到彼得堡的时候，列宁积极帮助布尔什维克党团工作。他总结竞选工作的结果，了解选举的情况，弄清代表竞选时的委托书的具体内容。列宁从克拉科夫给每位工人选民团选出的代表寄去了有 192 页内容的特别调查表。他还认真地阅读了代表们寄来的关于选举情况书面资料。每位代表在国家杜马中就重要问题发表演说之后，列宁总要指出成绩和不足。有时，他还要亲自为代表拟好发

言提纲。

有一次工人选民团的代表布尔什维克阿·叶·巴达也夫等人拜会了列宁，他们说：“在大臣和黑帮分子登上讲台的时候，我们就向他们示威。这当然好，但还远远不够。工人会问：你们在杜马中提出了哪些提案？你们制订的法律在哪里？”

列宁爽朗地大笑起来，他说：“黑帮分子的杜马是绝不会通过改善工人状况的法律的。工人代表的任务是利用杜马的讲台，向黑帮分子表明：工人阶级是有力量的，是强大的；革命高潮重新到来的日子里已经不远了；这个革命将把整个黑帮，连同他们的大臣和政府一起扫除干净。当然，也可以对预算提出修正案，甚至还可以提出法律草案，但所有这些行动都应该为了一个目的：痛斥沙皇制度，揭露政府的骇人听闻的专制罪行，宣传工人阶级的无权状态和遭受残酷剥削的事实。这就是工人期待自己的代表做的事情。”

1913年1月8—14日，在克拉科夫列宁的住宅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工作者会议，为了保密，简称为“二月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列宁和斯大林，彼得堡、莫斯科、乌拉尔、高加索等地区秘密的党组织的代表、国家杜马中布尔什维克党团的代表，共14人。

列宁非常高兴地欢迎来参加会议的同志，为了与会者的安全，把大多数同志安排在当地工人的家里居住，只有少数同志住旅馆。开会者在列宁家里吃午餐，午餐主要是由克鲁普斯卡娅准备的。

列宁在会上做了题为《关于革命高潮、罢工和党的任务》和《关于对取消主义的态度和统一》两个报告。他还起草和修改了会议的下述决议：“《革命高潮、罢工和党的任务》、《秘密组织的建设》、《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关于秘密书刊》、《关于保险运动》、《关于取消主义的态度和统一》、《关于“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关于（真理报）编辑部的工作和改组》。

会议指出：俄国已经进入了公开的群众革命斗争时期，应组织进行革命街头示威和其它群众运动，而运动的主要力量是合法与半合法的党组织。

1913年5月初，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迁到波罗宁村，在波罗宁权和白杜纳耶茨村之间的林中空地上租了一处有凉台和阁楼的农舍。

他们迁到这里主要是为了使克鲁普斯卡娅得到疗养。当时克鲁普斯卡娅出现了心率过速和甲状腺肿大的病症，医生建议她去疗养一段时间。波罗宁位于扎科帕奈高山疗养区附近，气候适宜，环境安静，地势也比较低。列宁最耽心的邮寄信件虽不如克拉

科夫方便，但只要早几个小时寄出，也会赶上从克拉科夫寄邮件的那次火车。楼下的两个大房间是列宁的办公室和他岳母的卧室，另一个大厨房是克鲁普斯卡娅的工作室和会客室。

在波罗宁，列宁每天早晨7点钟起床，然后到杜奈耶河去洗澡，岸边有丛生的灌木，可以自由地在这里洗澡和游泳，而路上来往行人却看不见。早饭后，一直工作到晚上7点钟，中间午饭后稍稍休息一下。列宁坐在自己房间的大桌子旁工作，桌子靠近两扇窗户。天气好的时候，列宁有时到附近的小山岗上去工作，在那里可以远眺塔特雷山脉的开阔全景。

“这种美丽的景色不仅不会分散注意力，而且还特别有助于注意力的集中。”列宁这样说。

那时还没有电灯，在小小的煤油灯下工作很吃力，因而列宁总是尽量在天黑之前结束工作。将近7点钟的时候，他把信件送到火车站，然后就步行或骑自行车去山谷里漫游，或者与来访者开会商讨工作。

1913年8月13日凌晨，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奥·倍倍尔因病去世了。列宁悲痛万分，立即给德国社会民主党及其领导人发去唁电，同时列宁还写了悼念文章《奥古斯特·倍倍尔》发表在同年8月21日《北方真理报》第6号上，高度颂扬了倍倍尔为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作出的巨

大贡献，

为了使紧张疲惫的神经轻松一下，7月末—8月初，列宁同巴哥茨基、阿·布采维奇等人一起，进行了一次艰苦而愉快的登山旅游。

列宁是一个非常能吃苦的旅游者，巴哥茨基比列宁年轻10岁，但登山时要想赶上列宁也感到费劲。一个晴朗的早晨，列宁同巴可茨基、布采维奇几个人一起向扎科帕奈进发，没费多大劲就来到了风景如画的哈尔—冈谢尼佐夫山谷。山谷里有一个小小的盆地，四周峭壁环绕，盆地中座落着著名的黑湖。湖水透明如水晶，湖底的一块块石头和丛生的水生植物都看得清清楚楚。

休息了个把小时之后，列宁等几人就向扎夫拉特隘口进发；走完一段小路，就开始攀登陡峭的山崖，费了一番周折之后，他们终于爬到扎夫拉特隘口，在这里，他们不仅可以欣赏哈尔——冈谢尼佐夫山谷和黑湖的全景，而且还能看到迷人的盘绕弯曲的山路，远望塔特雷山脉蜿蜒曲折的崇山峻岭。远远望去山谷里5个小小的湖泊就像5颗璀璨明亮的珍珠一样闪闪发光。

“我们爬上来是值得的！”列宁自豪而兴奋地说：“爬山的艰险使我们懂得一个道理：不要回避困难！要善于克服困难！”1913年10月6日—14日，列宁

在波罗宁村主持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和党的工作者会议，为保密起见简称“夏季会议”。与会者都住在农民古特·莫斯托沃伊的公寓里，会场设在公寓或列宁住宅里。

列宁主持了各次会议，并作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民族问题报告、即将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的报告，还多次发言。列宁起草和修订的各项决议草案都被大会通过了。

1913年10月20日，列宁夫妇离开了波罗宁和白杜纳耶茨村，回到克拉科夫

1913年下半年至1914年上半年，列宁集中精力研究了民族问题理论，先后写出20多篇文章，其中最主要的有：1913年11月—1914年1月在《启蒙》杂志连载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4年5月至7月在《启蒙》杂志发表的《论民族自决权》。

此时，历史发展已把民族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1912年，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门得内哥罗、希腊四个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摧毁了土耳其在巴尔干的民族统治。1907年以后，俄国资产阶级鼓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公开反对俄国境内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崩得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公开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党纲中民族自决权原则，鼓吹“民族文化

自治”。

1913年崩得分子费·李普曼、孟什维克取消派分子谢姆柯夫斯基、乌克兰的机会主义分子列甫·尤尔凯奇分别发表文章，疯狂反对民族自决权，宣扬民族文化自治。面对这股汹汹而来的反动逆流，列宁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结合俄国实际，深刻批判了民族文化自治的谬论，论证了工人阶级对民族问题的纲领和政策。同时，列宁还颇有见地地提出了民族自决权的原则，他说：“所谓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体的国家分离，就是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

1914年1月26日至2月2日，俄国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召开。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大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尖锐地批评了在同取消派作斗争问题上采取机会主义立场的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活动。列宁在报告结束语中阐明，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只有在坚持正确的革命策略和同取消派作斗争的原则基础上，才能实现。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由于列宁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中的布尔什维克对调和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才使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退出八月联盟，无情地打击了托

洛茨基的分裂主义。

5月初，列宁全家从克拉科夫迁往白杜纳耶茨村，居住在捷·斯库宾的家里。

5月21日马林诺夫斯基放弃了杜马代表的职务，而跑到德国，靠沙皇政府津贴生活。这件事引起列宁的警觉，他立即给在维也纳的尼·伊·布哈林写信了解情况。直到后来才弄清楚，原来马林诺夫斯基是沙皇警察机关安插在布尔什维克领导层中的密探。列宁后来在1920年5月写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深刻地总结了这件事的沉痛教训。他说：“最糟糕的就是1912年奸细马林诺夫斯基混进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这一事实。他出卖了我们几十个几百个极优秀忠实的同志，把他们送去作苦役，加速其中许多人的死亡。他所以未能造成更大的祸害，只是因为我们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配合得正确。”他又说：“在许多国家里，其中也包括最先进的国家在内，资产阶级无疑地正在派遣而且将来还会派遣大批奸细到共产党里来。防范这种危险的手段之一，就是要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巧妙地结合起来。”

1914年7月16—18日（俄历7月3—5日），在布鲁塞尔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第二国际领导人王德威尔得、考茨基、胡斯

曼等人安排下召开的，其目的是强迫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取消派实现“统一”。

列宁反对召开这次会议。他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只有在孟什维克取消派放弃其观点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统一，而且由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出面强制实行统一的方法也是不妥的。

列宁知道这次会议召开的消息后，立即物色出席会议的代表。经商量，中央委员会决定派阿尔曼德、弗拉基米尔斯基和伊波波夫参加会议。

列宁为代表们起草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让格·伊·彼得罗夫斯基把从彼得堡带来的材料和报纸寄给参加会议的代表使用。并且为代表拟定了在会议上的斗争策略。加涅茨基曾劝列宁出席这次会议，他认为列宁威信高，可以影响孟什维克改变策略。列宁听后笑着说：“如果孟什维克打算跟我们走的话，那他们就没有必要召开这次会议了。他们想当着国际的面骂我。我是不想满足他们的这个要求。再说，时间也很宝贵，与其胡扯一通，倒不如干点事情……”

阿尔曼德在会议上宣读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提出实行统一的先决条件是：“孟什维克取消派放弃自己的观点，捍卫秘密的无产阶级政党，承认党的纲领。孟什维克代表在会场上狂吼

乱叫：“你们都不是负责人，我们不知道你们讲的是什么！列宁在哪里？他什么时候来他得当着国际的面听取斥责……”

原定会议只局限于交换意见，但开会时却把考茨基鼓吹统一的决议案付诸表决，该决议案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不存在实现统一的分歧。这个荒唐的决议案被通过，只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拒绝参加投票。列宁把这次会议称之为“七月三日联盟”、“拯救取消派的布鲁塞尔联盟”。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经过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反对取消派的斗争，广大工人群众日益团结在布尔什维克党周围，布尔什维克党的影响正在扩大。例如：在第四届杜马选举中，布尔什维克赢得 39 个席位中的 6 个席位，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得到 65% 以上工人签名支持。从 1913 年 10 月—1914 年 6 月，孟什维克 7 个代表组成的党团只收到 215 笔工人小组的捐款，而布尔什维克收到 1295 笔捐款，占总数的 85%。到 1914 年 5 月，当年取消派报纸只收到 671 个工人小组的捐款，而《真理报》则收到 2873 个小组的捐款，占总数的 81%

1914 年下半年，工人罢工斗争掀起了空前的高潮。5 月份巴库石油工人提出改善工人生活条件遭到

拒绝后，举行 5 万人大罢工。7 月普梯洛夫工厂工人举行支持巴库工人罢工的集会，彼得堡各工厂工人也纷纷罢工，最多时达到 15 万人。在莫斯科、里加、哈尔科夫和梯弗利斯等大城市也举行了有 1—5 万人参加的罢工和抗议示威游行。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反动当局惊慌失措，立即进行严厉的镇压。7 月 21 日《真理报》被查封，工会和工人俱乐部被捣毁，一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遭到逮捕。

在这种日益紧张的局势中，列宁已经预感到了一场巨大风暴的来临。1914 年 7 月 25 日以前，列宁给阿尔曼德写了一封信，他明确指出：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可能爆发战争，俄国革命即将到来。列宁的这一预言很快就成了现实，一场世界规模的大战轰然爆发了，俄国发生了伟大的革命转折。

第二十章 世界大战

战争造成的牺牲愈大，工人群众就愈能看清机会主义者背叛工人事业的行为，愈能看清把枪口转向本国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必要性。

——列宁

1914年7月28日，酝酿已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这一天奥国以其皇太子被塞尔维亚人刺死为借口对塞宣战，接着，德国于8月1日对俄国宣战，3日对法宣战，英国于8月4日对德宣战，13日对奥宣战。于是，英、法、俄等组成“协约国”集团，德、奥、意等组成“同盟国”集团大打出手，先后卷入这次战争的包括全世界36个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两个帝国主义强盗集团之间，以重新分割殖民地、瓜分国际市场、争夺世界霸权为目的的非正义性质的战争。后起的帝国主义国

家德国想把英国在近东、法国在北非、比利时在刚果的殖民地据为己有，并占领俄国控制的乌克兰、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奥匈帝国想迅速实现它对巴尔干半岛的扩张，首先占领塞尔维亚。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国则企图打败新对手德国，占领土耳其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法国想乘机收回早被并入德国版图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并进而占领煤产地萨尔，俄国则想击溃德国，称霸巴尔干，夺取奥匈帝国的加里西亚。各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俄国，想借发动战争来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转移革命人民的视线，镇压国内的工人和人民革命斗争。

8月1日，列宁在白杜纳耶茨村得到德国对俄国宣战的消息。住在当地的布尔什维克都来到列宁的家里，热烈而严肃地议论了当前的时局。列宁在房间里默默踱来踱去，他突然停下脚步，说道：

“无论如何要在战争条件下找到继续工作的新办法。必须经过在瑞士和瑞典的同志尽快同国内取得联系。我们今天就给他们写信。无论如何要恢复同彼得堡的经常联系。”

列宁科学地预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展进程。他向在场的人解释说：

“既然日本人在远东打的那场规模比较小的战争在群众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那么这场战争的情

况就要严重得多。它距俄国至关重要的中心地区较近，这就不可能不导致革命。”

列宁接着说：“对日战争以来，俄国的军队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还是那些没有文化的军官，还是当时的将军，军备水平依然很低。尽管俄国士兵英勇顽强，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是无能为力的。”列宁不同意那种认为战争会在几个星期内就可以结束的乐观看法。

他指出：“战争将是持久的，双方都投入了很多战争资源和人力资源。资本家将迫使自己的政府把战争进行到一方完全衰竭为止。”

此时，列宁以异常焦急的心情等待交战国双方社会民主党对战争的态度，特别关注德国民主党人对战争的态度，因为他们在第二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很快，列宁从8月4日报纸上看到了各国社会党对待战争的态度。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党团在会议中投票赞成德国政府的军事预算，支持本国政府战争，法国社会党也在会议中投票拥护法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军事预算，党的领导人茹尔·盖得还出任法国资产阶级“国防政府”的不管部长，英国工党主席阿·韩得逊就任教育部大臣和不管部部长，积极为帝国主义战争作

宣传和组织工作。

“这是第二国际的末日，”列宁说，他接着又补充道：“从今天起我不再是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了，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列宁在密切注意着局势的发展，从理论上深入研究第二国际各国社会党对待世界大战的态度以及应吸取的历史经验教训。

正在这时，恶运又一次降临到列宁的头上。由于当地人的诬陷，8月7日宪兵突然搜查了列宁的住宅，搜出了一支手枪，一些笔记本和统计资料。第二天，列宁就被逮捕了，关押在地方监狱的第五号牢房里。当地的布尔什维克立即四处奔走，想方设法进行营救。后来，奥地利当局认为列宁是俄国沙皇最危险的敌人，而俄国是奥国的交战国，从战争的利益出发，他们于8月19日释放了列宁。

在从监狱回到波罗宁的路上，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目睹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一列火车从克拉斯尼前线返回，许许多多战死者和伤员从车上抬下来，他们的亲属们放声痛哭，这悲惨的声音响彻了火车站，使每一个在场的人都为之心碎。

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不能在波罗宁继续住下去了。经当局批准，他们从波罗宁经克拉科夫前往瑞士。

在克拉科夫，克鲁普斯卡娅正在处理她姨的一笔遗产继承问题。她母亲的姐姐在诺沃切尔卡斯克病逝，留下 4000 卢布遗产，这笔钱存入了克拉科夫银行。为了取出这笔钱，必须同维也纳某经纪人订立一个合同——这个经纪人设法把钱取出来了，但扣掉了一半作为报酬。克鲁普斯卡娅于 1917 年回俄国时，这笔钱还没花完。在 1917 年七月事变的日子，当局在彼得堡搜到这笔存款的单据，以此诬蔑列宁是领取津贴的德国间谍，真是无稽之谈。

9 月 5 日，列宁到达了伯尔尼。第二天，在城外的树林里召开了伯尔尼布尔什维克小组会议，会议到 8 日结束。

在会上，列宁做了关于对待战争的态度报告，他的报告提纲《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作为会议的决议被通过，并分发给国外布尔什维克各个支部。这个决议还由萨莫洛夫带回国内分发给中央委员会的俄国局和杜马党团讨论。中央委员会的俄国局和杜马党团中的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就采取了正确的立场，中央委员曾印发传单，号召：“打倒战争！”“以战争反对战争！”。列宁知道国内布尔什维克赞成这一提纲后，于同年 10 月将这一提纲改写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9 月 27 日，瑞

士卢加诺召开的意大利和瑞士两国社会党人代表会议采纳了列宁转交来的《提纲》中的许多论点，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由于是在战争期间，列宁夫妇的生活十分艰苦，但工作与休息仍安排得有劳有逸，生活充满情趣。列宁全家住在第斯泰维克一条清洁安静的小胡同里，附近是一座绵延达数公里的莽莽苍苍的大森林，女布尔什维克印·弗·阿尔曼德住在列宁家的斜对门，季诺维也夫、什克洛夫斯基两家离列宁家也很近。伯尔尼森林的秋天景色异常美丽，列宁、克鲁普斯卡娅和阿尔曼德常常在落满黄叶的林间小道散步，有时还在灌木丛生的向阳山坡上休息几小时。在这里，列宁潜心思考研究了战争和革命的形势，写了许多政治报告和论文，克鲁普斯卡娅则认真研究了意大利语。晚上，他们常到季诺维也夫家去，大家在一起聊天，研究国内外形势，列宁有时逗季诺维也夫的小女孩玩耍。阿尔曼成了克鲁普斯卡娅的工作助手，经常帮助她为列宁处理来往书信和文稿，把文稿译成法文等。

10月11日，普列汉诺夫应邀出席了由侨居洛桑的孟什维克小组举办的专题报告会，做了宣扬社会沙文主义谬论的专题讲演。列宁和侨居洛桑、伯尔尼、鲍日等地的许多布尔什维克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列宁仔细听完了普列汉诺夫的报告，对他公然宣传的社会沙文主义观点感到义愤填膺。在普列汉诺夫作完报告之后，唯有列宁一个人报名登记，要求讲话。列宁端着一杯啤酒走上讲台发表了简短而精彩的演说。

列宁指出，这次战争是由于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性质准备好了的，社会党人的义务是同本国的沙文主义作斗争，某些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内阁，支持本国政府的沙文主义立场是完全错误的。他还强调指出：工人阶级应该记住马克思的名言“工人无祖国”。

列宁的发言虽然只有短短的 10 分钟，却句句击中了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要害。此后普列汉诺夫虽然进行了狡辩，但显得十分苍白无力。

在报告会的第二天，列宁参加了洛桑布尔什维克小组会，耐心地向同志们解释“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的口号，认为这个口号适用于各个交战国。应当用这个口号动员各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推翻本国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列宁的解释消除了同志们头脑的疑团。

接着，列宁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一个斗争口号，他说“这个口号就是使沙皇制度在这场战争中失败，对我们俄国人来说，从俄国的劳动群众和工人阶级的

利益看来，目前这是损失最小的，对这一点绝不该有任何一点怀疑。因为沙皇制度比凯撒制度坏百倍。”

1915年3月，克鲁普斯卡娅的母亲伊·瓦·克鲁普斯卡娅病逝了。她老人家一直同列宁夫妇住在一起，料理家务，照顾来访的同志，收藏秘密文件，协助女儿抄写书信和文稿。

因此，列宁夫妇对革命事业的贡献中也凝结了她老人家的心血。岳母很关心列宁，虽然有时也因为列宁工作起来不知道爱惜身体而生气。而列宁对岳母一直是非常体贴的，对她生活和各个方面都考虑得很周到。岳母喜欢抽烟。没烟就打不起精神来。有一次她的烟抽完了，由于正赶上到处都买不到烟。列宁就骑上自行车到街上挨个商店去问，终于把纸烟买回来了。老人非常高兴，逢人就夸列宁孝顺。1911年初春天的一天，气候温暖，阳光灿烂，老人很想到附近的大森林里去走走。列宁夫妇虽然工作很忙，但还是抽出时间陪老人去了。这次远足使老人玩得很开心，但回来后就感到身体不舒服，第二天就不行了。弥留之际，她嘱咐死后火化，如有可能把骨灰运回俄国埋葬。3月23日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为这位老人在伯尔尼布雷哈登公墓举行了葬礼，埋葬骨灰盒，在墓旁种了一棵小树。许多年后按照她的遗嘱，将骨灰运回俄国，埋葬在列宁格勒新圣母公墓。

在瑞士居住期间，列宁一直从事紧张的理论研究工作，并且笔耕不辍。1915年8月23日，他的著名论文《论欧洲联邦口号》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4号上发表。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得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理论，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同时在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胜利的结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列宁把这一理论置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基础之上。

战争爆发以后，广大人民群众掀起声势浩大的和平反战运动，革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在人民运动的推动下，1915年9月5日至10日，在伯尔尼郊区的齐美尔瓦得村终于召开了战时第一次有较为广泛代表性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出席的有法、俄、德、意、波、罗、保、瑞典、瑞士等国社会党的38名代表（英、美代表未取得护照，未能到会）。会议主要议程是讨论通过关于反战与和平的宣言，选举国际社会主义者委员会。会上，以列宁为首的左派坚持自己的观点，同中派展开了斗争。

由于左派的努力争取，在会议通过的宣言中包含了某些左派观点，即指出了这次战争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肯定了过去第二国际领导人在反对战争方

面的失败，重申拥护战前斯图加特、哥本哈根和巴塞尔历次代表大会关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总方针，要求交战国双方立即停战，并实现没有兼并的和平。但是，宣言拒绝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而对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表述则含糊其词。

以齐美尔瓦尔得会议为起点，由这次国际会议所建立的国际组织通称齐美尔瓦尔得国际。由于中派势力占优势，尽管这次会议通过的宣言还极不彻底，但毕竟“在同机会主义实行决裂方面前进了一步”。

9月份，列宁的名著《社会主义与战争》以德文出版了，很快就分发给了齐美瓦尔得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的各位代表。

在这部著作中，列宁从战争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原理出发，指出目前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他指出：“社会民主党内的反对派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举起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坚决而明确地向工人说明我们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看法，提出群众革命的口号，即帝国主义战争时代为国内战争时代起点的口号。”

1916年2月中旬，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从伯尔尼来到苏黎世，在这里的图书馆里读书和写作，列宁打算尽快写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一

书，帮助人们认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返回伯尔尼的日期一推再推，最后列宁夫妇决定住在苏黎世不走了。

列宁和妻子原来住在奏提琴者之路七号普莱洛格太太家。这位太太在维也纳一个旅馆里做过很长时间的厨子。列宁住下第二天普莱洛格太太请列宁另租房子，原因是原来的房客要回来住，但她建议列宁夫妇可以在她家吃包饭，价钱非常便宜。列宁夫妇在她那里包了两个月的饭，饭菜简单，但还算可口。吃饭时大家在一起闲聊，主要谈论共同关心的事情。列宁很喜欢从这里了解苏黎世最低层群众的生活状况。有个时期，一名妓女在这里吃饭，她不隐讳自己的职业，但更多的是谈她妈妈的健康状况和妹妹的失业问题。有个护士也在这里吃了几天的饭，列宁从她那里知道了不少医院里医生、护士和病人的情况。后来，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在俄国国内的艺术剧院看演出高尔基的戏剧《底层》时，感到演员的表演缺乏社会底层群众的生活气息，他总是要求剧作者和演员要贴近生活，向群众学习。

列宁夫妇于2月中旬住进明镜巷14号鞋匠季·卡梅雷的家里。明镜巷座落在苏黎世最古老的、中世纪式的城区里。这是一条弯弯曲曲的狭窄小巷，里面挤满了一幢幢两三层的楼房，街道白天也被楼房遮

得不明不暗。列宁夫妇租的房子虽说有两扇窗子，但里边的光线却相当昏暗，古老的房子还散发出一股臭味。楼梯是螺旋形的，拐角多，又窄又陡，即使白天楼梯里也黑咕隆冬，上楼十分费劲。

但这里也有一个好处——离藏书丰富的中央图书馆近在咫尺，那里的民众文化馆内有一个白天和晚间都可以阅读的阅览厅，可以在这里翻阅各种文字的报刊杂志。

这个胡同的每个拐角处都有价钱非常便宜的小饭馆，一天到晚，小胡同里便挤满了工人。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对这个环境感到称心如意，不仅借阅图书和吃饭方便，更主要的是，他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具有革命情绪。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来到苏黎世后，按时参加每月一次的布尔什维克苏黎世支部会议。他们还参加了一个工人自修小组。参加小组的都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有，但布尔什维克是小组的核心。列宁在小组里作了关于帝国主义的报告，列举了许多国际经济与政治领域的鲜明事例来说明帝国主义，同时还宣读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若干章节。列宁的报告引人入胜，很具有说服力。但列宁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讲话激怒了在座的孟什维克，孟什维克怒气冲冲

地指责列宁，为孟什维克辩护。达·梁赞诺夫他们则歇斯底里大发作，一边用拳头敲打桌子，一边叫嚷：“没有考茨基参加，不准成立第三国际！”

“但是要知道，第三国际很快就要建立起来了，而您却视而不见，”列宁带着嘲笑地口吻回答说，“每个国家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而您却没有发觉团结在齐美瓦尔得左派周围的力量正在增长。”

6月初，列宁来到洛桑、日内瓦，先后就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与机会主义派问题，做了两次报告，在布尔什维克日内瓦支部会议上还作了关于国际社会党人昆塔尔代表会议的报告。

6月2日晚8点钟，列宁准时来到日内瓦民众文化馆，听众已坐满。他走上讲台前，一眼看到了会后要与之会面的米·格·茨哈卡雅。列宁与她打了个招呼，随后走上主席台开始作题为“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两派”的报告。列宁的报告一结束，几个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先后上台发言，会场里展开了唇枪舌剑的政治大辩论。列宁有理有据地批驳了各种错误观点，广大群众对列宁的基本观点和讲演艺术交口称赞。

晚上，按预先约定，列宁同茨哈卡雅及一位侨居国外的青年同志乔治漫步在河堤上。此时，月亮皎

洁，固围一片寂静。列宁亲切而激动地谈到俄国形势，说到战争给地下工作带来的困难。后来，列宁与茨哈卡雅并排坐在一条长橙上，乔治用手扶着河堤的栏杆，站在他们二位的前面。

茨哈卡雅突然问列宁：“伊里奇，我们能否等得到下一次俄国革命？”

显然，茨哈卡雅的问题打断了列宁的思路，列宁用奇怪的眼光看了看茨哈卡雅，没直接回答，反过来问道：

“米哈同志，您多大岁数了？”

茨哈卡雅回答说：

“五十多一点。您呢？”

列宁说：“同您相差不多，四十五岁多一点。那又怎么样呢？如果我们等不到革命，那么他们总能等得到的。”列宁指着乔治说，“无论如何，我们总是要把革命工作继续下去的。如果我们来不及，那么他们——我们的青年一代——会把它继续下去的。”

茨哈卡雅回答说：“亲爱的伊里奇！我还是认为，我们也能见到革命，革命可能很快就要来到了，我们就会见到的。”

列宁爽朗地大笑起来，不等茨哈卡雅讲完就接着说：“米哈同志，我很高兴，在目前条件下您能这样自信。这是一种积极的革命乐观主义……”

他们分手时，天色已经微明，他们拥抱并紧紧握手后才告别，并希望一年内再见面，并一起回到俄国去。列宁补充了一句：“回到革命的俄国去……”

7月底，从国内传来不幸的消息——列宁的母亲于7月25日病逝了。有好几天，列宁哭得夜不能寐，他先后给姐姐、妹妹写了两封信，信中回忆了母亲苦难而伟大的一生，并说：“母亲的逝世对他是一个沉痛的损失”。克鲁普斯卡娅担心列宁伤心过度，不停地安慰开导他。

1916年至1917年初，列宁集中精力从事理论研究和写作。他每天早晨9点钟准时来到图书馆，一直看书到12点钟，回家吃过午饭后再到图书馆，一直到下午6点钟回家。每星期四下午图书馆闭馆。列宁从图书馆回来，总是要花30生丁买两块有炒花生的浅兰色的方块巧克力糖，然后带着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到苏黎世别尔格山去。在树林深处有一块草地，常常长时间地坐在那里，一边吃糖，一面读书写作，或者谈论工作。

1916年8月—10月，列宁先后写完《论正在产生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倾向”》、《答波基也夫斯基（尤·波达可夫）》、《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等文章。布哈林、波达可夫等反对列宁提出的民族自决权原则，他们认为民族自决权

是乌托邦式的，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实现，这个口号又是有害的，因为它使人们产生幻想。他们还反对列宁提出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和“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两个革命口号。列宁把他们的观点同经济派的观点相比，称这种观点为“帝国主义经济主义”。

母亲在当时每年领取 1200 金卢布养老金，这是列宁的主要生活来源。母亲去世后，列宁的生活陷入了困难的境地，于是，他把帮助转向了他一向并不太重视的稿酬，希望能自己来养活自己。

1916 年 9 月底 10 月初，列宁给亚·施略普尼柯夫写信说：“至于我自己，很想要稿费，否则，简直活不下去了！物资昂贵，难以为生。应当向‘年鉴’的出版者硬把钱要来，我的两个小册子已经寄给他（让他付钱，马上付而且多付一些！）。”

第二十一章 返回祖国

我们就要赶回俄国，投入我们的工人兄弟和士兵兄弟的斗争。

——列宁

1917年1月22日（俄历1月9日）是1905年俄国革命12周年纪念日，列宁在苏黎世民众文化馆举行的瑞士青年工人大会上用德语作了报告，受到热烈欢迎。列宁在报告中预见到社会主义革命将要爆发，他指出：“毫无疑问，未来的这次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并且这个字的意义会更加深刻：按其内容来说也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革命。”

1月底，列宁多次同从德国战俘营里逃出来的两个俄国战俘谈话。一个叫米海列夫，是沃龙涅什的农民，另一个敖德萨的工人，他们两人是从德国战俘营中游过波登湖逃出来的。米海列夫谈了战俘营中许多有趣的事。他介绍说，乌克兰的战俘被押送到加里

西亚，对他们进行乌克兰独立的宣传，煽动他们反对俄国。后来，他被押解到德国，逼迫给富裕农民干活。米海列夫说德国富裕农民过日子很节俭，连一点面包皮也得吃了，绝不白白扔掉。他说：“等我回到自己村子的时候。我也学他们那样过日子。”通过这几次谈话，米海列夫受到了列宁的深刻影响，后来，他在战争问题上始终与布尔什维克保持一致。

2月11日是哈利东诺夫和哈利东诺娃的女儿两周岁的生日，夫妇俩邀请列宁夫妇来家做客。其他客人都到了，列宁夫妇还没有来，大家有些失望。突然门铃声响了，哈利东诺夫夫妇向走廊奔去，而门外已传来列宁的愉快的笑声。开了门，列宁手里拿着一包东西，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

跟大家一一问好后，列宁放下手里拎着的纸包，开始解捆着纸包的绳子，他恨不得一下子让大家看看他给孩子带来的礼物。他一边解包一边向大家介绍购买礼物的经过：

“在玩具店里我们简直眼花缭乱了：货架上和柜台上各种各样的玩具多不胜数，我们有点不知所措，吃不准挑选哪个好。娜嘉说：‘瞧，我们就买那个漂亮的布娃娃。’我回答说：‘不，这个不适合，再找找有趣一点的东西。’售货员不断地给我们拿来很多玩具：小兔呀、小猫呀、皮球呀，等等。我说：‘不，这

些都不要。’我一个个货架看过去，突然在最上面一层架子上看见了这一只小狗。它的一只小耳朵向上竖着，脖子上系着一条红色带子，上面挂了个小铃铛，它的嘴脸显得挺机灵，看神态，一副狡滑的、拼搏的样子。我对娜嘉说：‘就要这只小狗吧！’嗨，这只狗怎么样？喜欢它吗？”

列宁说到这里便愉快地笑了起来，把玩具调过来转过去，让大家左右前后看个够，自己也爱不释手。大家也都笑了起来。克鲁普斯卡娅很少见到列宁这样高兴过，这件玩具不仅小女孩喜欢，丈夫也高兴，这使克鲁普斯卡娅非常开心的。

小女孩接过列宁送给她的礼物后，就扑到她妈妈的怀里。一会儿，列宁又把小女孩抱过来，让她站在自己的腿上，随着唱的德文歌曲节拍蹦跳着，咧开小嘴笑个不停。过了一会儿，列宁怕累坏了小女孩，就把小女孩放到地板上，自己跑到门后边躲起来，小女孩叫着跑到列宁跟前，扯他的衣服，让叔叔再跟她玩一会儿。

就这样，大家愉快地度过了一天，哈利东诺夫夫妇一直珍藏着列宁夫妇送给自己女儿的玩具——小狗。1960年把它赠给了革命博物馆。

3月15日，列宁吃完午饭正准备去图书馆，克鲁普斯卡娅刚收拾好餐具，勃朗斯基大步流星地走进

来，兴高彩烈地高声说：“你们还不知道吗？俄国爆发革命了！”他把报纸号外上刊登的消息告诉了列宁夫妇。勃朗斯基走后，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立刻赶到湖边，仔细看阅报栏里的各种报纸。

回顾过去，沙皇政府自从参加世界大战那时起，就在经济上加紧了对人民的剥削与掠夺，在政治上进一步加强对人民的压迫奴役，而战争则深刻地暴露了俄国经济的落后和沙皇政府的腐败，这一切加深了人民群众对沙皇政府的愤恨。布尔什维克党通过各种方式，在工人和人民群众中，广泛地开展了反对战争、推进革命的宣传工作与组织工作。从1915年秋天起，全国革命形势逐步高涨，工人罢工、农民骚动、士兵逃跑事件频繁地发生，政局在急剧地动荡。

1917年初，首都彼得格勒工人的罢工和示威游行连续不断，规模也越来越大。布尔什维克党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积极进行组织领导，及时把政治罢工转变为武装起义。3月10日（旧历2月25日）全市工人进行了总罢工，布尔什维克党发出了动员令：立刻举行武装起义。3月11日（旧历2月26日）早晨，武装起义开始了，3月12日彼得格勒驻军参加了武装起义。起义队伍迅速推翻了政府，逮捕了沙皇政府的官吏。当天晚上，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

大会隆重开幕，宣告了二月革命的胜利（3月12日为旧历2月27日，所以历史上称之为二月革命）。俄国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证明了列宁在俄国1905年第一次民主革命时期提出的革命策略的正确性，也充分证实了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提出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口号，是无产阶级争得革命胜利的正确方针，同时，给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放弃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第二国际社会沙文主义者以沉重的打击。

听到俄国二月革命胜利消息后，列宁先后给克拉伦的阿尔曼德、伯尔尼的格·叶·季诺维也夫、日内瓦的茨哈卡雅、克利斯提阿纳的亚·米·柯伦泰写信，把这一消息告诉他们。此时，列宁最关注的是两件事，一件事是如何尽快返回祖国，二是正确地分析二月革命胜利后的国内形势。

列宁仔细地阅读瑞士、英、法、德、意等国出版的报纸，摘录对俄国国内事件的各种报道，然后进行全面的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对国内革命斗争的形势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任务的想法，写成文章寄给《真理报》发表。3月21日列宁给卡尔宾斯基写信说：“目前我既不能去作报告，也不能去参加群众大会，因为每天我都要给彼得堡《真理报》写

文章。”3月中旬至10月初，列宁暂时放弃了其它活动，潜心读书写作，先后为该报写了五封《远方来信》。在这些信里，列宁分析了俄国二月革命的动力和胜利原因，提出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从革命第一阶段转向第二阶段，批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同临时政府妥协的策略，指出无产阶级不应当支持继续进行战争的临时政府，认为无产阶级应当把地主和资本家掌握的国家政权夺过来，交给按苏维埃形式组织起来的工人和贫苦农民的政府，各交战国缔结公正的和约。

此时，列宁的心早已飞回了多灾多难的俄国，他迫切地希望尽快返回国内，投入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一开始，他打算取道英国回国。这一计划落空后，他又开始实施经德国回国的计划。

回国前，列宁于3月中旬写了《告被俘同志书》。列宁在该文件中写道：“我们一定从自由的俄国寄书报给你们，告诉你们国内的消息。我们要求运给你们足够数量的金钱和面包。我们还要对起义的工人和士兵说：你们是可以依靠我们被俘的兄弟的。”4月初，列宁前往伯尔尼出席了布尔什维克侨民会议，会议通过了列宁起草的《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列宁在信中说：“当我们，团结在中央委员会周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跟团结在组织委员会周围的名称相

同的另一个党不同)的党员们,将要离开瑞士返回俄国,到我们的祖国继续进行革命的国际主义工作的时候,我们谨向你们致以同志的敬礼,并对于你们对待外侨的同志态度表示深切的同志的谢意。”在信的结尾,列宁高呼:“正在开始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万岁!”

4月9日,列宁决定立即动身,他对克鲁普斯卡娅说:“我们就坐第一班列车。”此时,离开车只有两个小时,克鲁普斯卡娅怕收拾不完东西,对列宁说:“你先走吧,我明天就赶到。”但是列宁坚决不同意:“不,我们一块走。”列宁夫妇很快把捆好的书归还图书馆,烧毁了不保留的信件,收拾好各类物品。列宁把尚有5法郎5生丁存款的存折交给布尔什维克苏黎世支部负责财务的哈利东诺娃,作为列宁夫妇俩4月份的党费。

接着,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向房东卡梅雷太太和朋友们亲切地告别,皮鞋匠、房东卡梅雷祝福列宁说:

“乌里扬诺夫先生,但愿您回国后不再像在这里那样忙!”

“卡梅雷先生,我想,到彼得格勒后,我的工作就会更多了。”列宁笑着回答。

4月19日15时10分,列宁、克鲁普斯卡娅等32

位俄国政治侨民，从苏黎世坐火车启程回国。到车站送行的有俄国政治侨民、瑞士社会民主党人和许多革命青年。列车在雄壮有力的《国际歌》声中徐徐开出苏黎世车站。

俄国政治侨民被安排在一个车厢，车厢的三个门被打上铅印查封，只有第四个门是敞着的，由德国军事司令部派来的两个军官把守。在车厢的通道上用粉笔划了一条线，把俄国政治侨民与德国军官分开，不经俄国政治侨民允许，谁都没权越过这条线。列车在斯图加特停留时，德国工会委员会委员杨松向列车走来，想向俄国政治侨民宣扬其社会沙文主义理论，被断然拒绝了。

4月12日，列宁等人到达波罗的海沿岸的德国城市萨斯尼茨，当天，他们改乘瑞典客轮“维多利亚女王号”去特雷勒堡。

到达特雷勒堡港后，列宁一行受到加涅茨基和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奥·格里姆伦德的欢迎。加涅茨基激动得流下热泪，他多么希望能与列宁好好地谈一谈啊，但列宁去马尔默的车票已经订好了，火车还有一刻钟就开动，一分钟也不允许耽搁。加涅茨基已同海关人员联系妥，海关人员答应不检查行李，只要求看看俄国工人和革命群众的领袖列宁。

晚上8点41分钟，列宁等人乘火车来到了马尔

默。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在马尔默萨沃伊饭店咖啡馆里举行热烈的晚宴，欢迎列宁等俄国政治侨民的到来。⁴ 天旅行疲劳不堪，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了，这些俄国政治侨民大口大口吃瑞典食品。列宁边吃饭边同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交谈。一位布尔什维克开玩笑说：“我相信，既然如此款待我们，那么俄国国内一定已经发生革命了……”。

在马尔默停留 15 分钟，列宁等俄国政治侨民继续坐火车前行。列宁、克鲁普斯卡娅和几位亲密的同志单独坐在一个包间里，列宁同他们交谈俄国革命的形势，指出布尔什维克在革命斗争中应采取的策略。列宁计划由沃罗夫斯基、拉狄克和加涅茨基在斯德哥尔摩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驻外机构，他还同格里姆伦德交谈了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活动情况。

在从托尔尼欧去彼得格勒的途中，列宁同车厢里的俄国士兵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听取他们对继续进行战争政策的反映。列宁和一个主张护国主义的中尉辩论起来，士兵们慢慢都聚集到列宁这节车厢来，有些士兵还站在长凳上，听列宁怎么分析评价这场战争。列宁的讲话深受士兵们的欢迎和支持，他们全都站在了列宁一边，接连发言批判这次掠夺性的战争。

4月16日晚上9时，列宁乘坐的列车来到了白岛车站。前来欢迎的人有：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局和彼得堡委员会成员为首的彼得格勒工人代表团及《真理报》编辑部的代表，其中有柯伦泰、斯大林、施略普尼柯夫，还有列宁的姐姐。

由400名工人组成的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工人代表团很早就来到了车站，焦急地等候列宁的到来。列车驶近站台，亚·米·阿法纳亚也夫忙着问列车长，列宁乘坐的是哪节列车？当身着灰色服装、外面披着一件大衣的列宁在车厢的平台上出现时，由于灯光昏暗，阿法纳西也夫没有马上认出来。过一会儿，突然看见列宁，兴奋异常地喊道：

“列宁！列宁！”

工人们沸腾了，他们纷纷涌向车厢平台，用手把列宁托起来，高高地举在头上。列宁没有想会受到如此热情奔放的欢迎，激动地对工人们说：

“同志们，安静一些，你们这是怎么啦！”

工人们用手托着列宁进了车站大楼，他们在列宁周围紧紧围成一个圈子，不让无关人员接近他。

一位工人以代表团的名义向列宁致热烈的欢迎词。列宁认真地一字一句地听。然后列宁激动地发表了简短的答词。

接受护照检查后，列宁等人又登上车厢。列车启

动了，站台上的人们高呼“呜啦！”，车厢内外响起了国际歌。

4月16日晚11时10分，列宁乘坐的列车驶往彼得格勒车站。这时，已有几千名工人和士兵等候在车站广场上，仅普梯洛夫工厂就来了两千工人。水兵们派了一个混合部队去欢迎和保卫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喀琅施塔得委员会向所有的舰艇发出了战斗警报。车站广场上，人们高举着红旗，擎着火把，打着“向列宁致敬”的横幅，两架探照灯把广场整个照得如同白昼一样。

列宁刚走出车厢，就有一位大尉军官来到列宁面前行军礼，并做了简短的报告。这种欢迎仪式使列宁感到很意外，他立即给这位大尉回了个举手礼。军队奏起了“马赛曲”。列宁致词，然后与其他俄国政治侨民一起检阅了由水兵和其他兵种代表组成的仪仗队。列宁被请入车站大厅，他发现这里聚集了中央委员会委员、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布尔什维克各区组织的领导人、彼得格勒苏维埃代表团。彼得格勒工兵苏维埃的代表孟什维克斯柯别列夫和尼·谢·齐赫译也来欢迎列宁。列宁讲了话，并向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工人和士兵代表表示致敬。

列宁来到车站广场，伊·德·丘古林把彼得格勒维堡区布尔什维克第600号党证郑重地交给了列

宁。在此起彼伏的“乌拉”声中，工人和士兵把列宁抬到装甲车上。列宁冒着凛烈的寒风，站在装甲车上，他身上的大衣敞开着，塞在口袋里的便帽露出了一角，他把一只手高高地举起来，向俄国工人和革命士兵致敬，祝贺他们完成了推翻沙皇制度的民主革命，并庄严地号召他们为夺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而斗争。他的演说在“社会主义万岁！”的呼声中结束。

在人群欢呼和簇拥下，列宁乘装甲车来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委员会所在地——克舍辛斯卡娅宫。列宁走上了阳台，再次地向聚集在那里的工人、士兵们致意，并和水兵发表了演说。

4月17日上午，列宁安排好住处后，立即前往沃尔科夫公墓祭扫母亲和妹妹的坟墓。他满含热泪在母亲和妹妹墓前默哀，缅怀已经逝去的难忘的岁月，感谢母亲和妹妹对他在革命斗争中的关怀和支持。

第二十二章 四月提纲

把全部政权交给工兵代表苏维埃。

——列宁

列宁出席了 1917 年 4 月 14 日（旧历 4 月 4 日）在彼得格勒塔夫利达宫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工作人员会议和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代表的联席会议。

会场设在二楼，列宁在楼梯上碰见了多年未见的老战友费·尼·萨莫伊洛夫。萨莫伊洛夫告诉他，流放生活总算熬过来了，身体还可以，现在准备着手工作。列宁没等他说完，便说：“不，不，您应该认真治疗一下。我奉劝您找教授们，他们有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当然应给他们一笔较好的报酬，但这是小事。他们会对您有帮助的。”列宁的话，使萨莫伊洛夫心里热乎乎的。分手后，萨莫伊洛夫到会场去听列宁做报告。

在这次会上，列宁做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在返回途中写的，这就是著名的《四月提纲》，后来发表在1917年4月20日（旧历4月7日）《真理报》上，其中系统地提出了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及时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路线这一重大问题。4月27日（旧历4月14日），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表示赞同列宁的《四月提纲》，并把它作为指导革命斗争的纲领性文件。

在《四月提纲》中，列宁首先指出，“这次战争从俄国方面来说，即使在李沃夫之流的新政府的条件下，无疑地仍然是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因为这个政府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在战争问题上，我们绝不能对‘革命护国主义’作丝毫让步。”其次，列宁认为，既然沙皇专制制度已被推翻，政权已经归资产阶级掌握，那末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基本完成了。现在要解决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和平、土地与面包问题，因此必须及时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说：“目前俄国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革命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阶层手中。”为实现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

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列宁认为在政治方面主要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结合俄国无产阶级在 1905 年革命和 1917 年革命中创造出“苏维埃”这种革命政权的新形式，列宁认为在俄国“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而要从下到上由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组成的共和国。”

做完报告后列宁分别出席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召开的各种座谈会、讨论会，在这些会议上进一步解释和宣传了《四月提纲》。

列宁的《四月提纲》遭到孟什维克和少数布尔什维克的反对。普列汉诺夫也专门发表了攻击《四月提纲》的文章，题目是《谈谈列宁的提纲以及为什么有时梦话值得注意》。他认为列宁的《四月提纲》既不符合俄国的实际情况，又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是在说“梦话”。但是，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和广大工人群众很快就理解并且接受了列宁的主张，并投入到新的革命斗争中去。

回国后，列宁担任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编辑职务，每天到设在莫伊卡河沿岸街的《真理报》编辑部工作数小时，夜间也常常

在此工作。他在这里写文章，编辑稿件，同工人通讯员及各地来访者谈话。4月22日，他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论两个政权》，4月底出版了附有《四月提纲》的小册子《论策略书》，6月10日，又写成了小册子《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草案）》。在这些论著中，列宁系统地批判了加米涅夫和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机会主义理论。

4月27日—5月5日，列宁出席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一次代表会议，当选为名誉主席。他在会议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对临时政府态度的报告。在报告中，列宁批判了加米涅夫否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的观点。大多数代表赞同列宁的基本观点，最后，会议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决议。

5月1日早晨，列宁参加了维堡区工人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游行。下午，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在马尔斯校场和宫廷广场的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晚上，列宁又在奥赫塔火药厂有工人和士兵参加的“五一”集会上发表演说，指明俄国革命任务。但就在这一天，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向协约国发出照令，重申临时政府遵守沙皇政府的一切条约，将把战争进行到底。人民群众愤怒。5月3日、4日彼得格勒爆发了有10万工人和士兵参加的游行

示威。

5月5日，临时政府同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把持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达成协议，吸收了一些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参加临时政府，组成所谓联合政府，社会革命党的维·切尔诺夫，孟什维克的伊·莱烈铁里和马·斯柯别列夫等人成了联合政府的官员。

5月7—12日，列宁领导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会议在女子医学院的大楼内举行，参加会议的有151名代表，代表着8万党员。列宁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他以《四月提纲》为基础向会议作了报告，他提出的一些决议草案被会议通过，列宁在这些报告和决议中都坚持了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总方针，既反对左倾冒险主义，也反对第二国际及孟什维克的左倾机会主义观点，即认为俄国是经济落后国家，不能首先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在这次会上，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米柳亭、诺根、斯维尔德洛夫、斯米尔加、斯大林、费多罗夫等九人当选为中央委员。

在会议休息期间，列宁十分注意深入到代表中间去，同他们广泛地交谈。一次休息时，代表们拿着小茶缸，排成长队打热茶水喝。忽然，人们发现在一个地方又岔出两行另外的队伍。走近一看，原来是代

表们都事先想好地与列宁交谈，才排成这样的队。列宁手里拿着小茶缸正是等候打茶水，他时而把头转向左方，时而转向右方，与代表们亲切地交谈。

5月16日，列宁写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决议的引言》，他号召工人们：“不要相信空话。不要被诺言迷惑。不要夸大自己的力量。要在每个工厂、每个团、每个连、每个区组织起来。时时刻刻进行组织工作，亲自动手，决不把这一工作委托给别人。”在列宁的教导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各级组织、党员、先进工人开始做大量地宣传和组织群众的工作。

列宁回国后，资产阶级报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断散布谣言，说列宁是德国间谍。为了粉碎这个阴谋，支持列宁的工作，许多工厂工人不断集会，向列宁发出致敬电。但谣言仍然流行，克鲁普斯卡娅在彼得格勒区也听到妇女们在唠叨：“该怎么收拾那个从德国回来的列宁？把他扔到井里淹死吗？”为了全面澄清事实，克鲁普斯卡娅写了一篇短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历史上的一页》，经列宁修改后，发表在5月26日彼得格勒《士兵真理报》上。这是一篇列宁的传略。

6月4日上午，全俄农民代表大会继续开会。当大会主席宣布列宁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团讲话时，突

然有人大喊大叫起来：

“凭什么让列宁讲话？他又不是代表大会的代表！不许他讲话！”

大厅里喧哗起来，还夹杂着抱怨的声音。大会主席立即出面做了解释，列宁说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团讲话，党团有权提出代表以外的人为报告人。大厅里这才安静下来，列宁开始讲话。开始时大厅右边几排座位上还有人插话干扰，以后就没人插话了，代表们全神贯注地听着列宁讲话，目不转睛地看着列宁的面部表情和手势。列宁在讲话中指出必须把全部国家政权交给苏维埃，并阐述了布尔什维克的土地纲领，即：立刻把地主的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委员会，全部土地收归国有，把地主的大农场改建为模范农场，让农业工人在农艺师指导下用机器共同耕种土地。列宁批判了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纲领。最后，大部分与会者都被列宁的演说所折服了，他们十分钦佩列宁的口才，更钦佩他讲的道理。列宁讲完话，代表们欢呼起来。

回到祖国后，列宁经常深入到工厂中，做争取工人群众的工作，为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作准备。5月25日，普梯洛夫工厂传遍了一个消息：“列宁来了！”轧钢车间前面的广场里很快就挤满了人群，甚至车间的屋顶也坐着人，大家如饥似渴地听着列宁

的讲话，唯恐听漏每一个字。那时，前方战争在继续，工厂因燃料缺乏而停工，粮食短缺，工人们都希望列宁给指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列宁旗帜鲜明地指出，只有政权归苏维埃，才能制止帝国主义战争，给人民以和平、面包和工作。听完列宁的话，大家心里亮堂多了。很快，在梯洛夫工厂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发展壮大起来，取代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影响。

6月16日至7月7日，列宁参加了在第一海军学校大楼举行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1090名，布尔什维克仅占105名。列宁在会上发表了关于对临时政府态度的演说和关于战争的演说。6月17日晚在会议讨论对临时政府态度问题时，联合政府的邮电部长、孟什维克首领策烈铁里作了长篇发言，反对布尔什维克关于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建议。他说：“现在俄国没有一个政党会说：把政权交给我们，请你们走开吧，我们来占据你们的位置……”

这时，一个响亮有力、充满信心的话音，像晴天霹雳一样打破了会场的寂静：“有这样的党！”

说这句话的人是列宁，一句话引起了主席团的惊慌和会场的混乱。在策烈铁里讲完话后，列宁登上讲台发表演说，他大声宣布：“我回答说：‘有的！任

何一个政党都不会放弃这样做，我们的党也一样，它随时都准备夺取政权。’”他还明确指示，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完全有能力掌握政权。他对代表说：“你们经历了 1905 年和 1917 年，你们知道，革命是不能定做的，其他国家的革命都是通过流血起义的艰苦道路干起来的，而在俄国没有一个团体、一个阶级能够同苏维埃政权相抗衡。在俄国，这个革命有可能例外地成为和平革命。”列宁还建议公布资本家的利润、逮捕 50 至 100 个百万富翁。

列宁的演说时间用完了，当他说：“再有半分钟我就讲完”时，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纷纷要求延长列宁的发言时间。大会主席将延长列宁演说时间的建议付诸表决，绝大多数代表赞成，列宁接着发言。他在演说结束时指出：“在贫农的支持下把政权转归革命的无产阶级，争取和平的革命斗争就会以最可靠的、人类历史上最无痛苦的方式进行，俄国和全世界的革命工人取得政权和获得胜利就有了保障。”

尽管布尔什维克代表克雷连柯、诺根、舒米亚茨基等人发言，支持列宁关于对临时政府态度的演说，但大会最后还是通过了关于建立联合政府、反对政权归苏维埃的决议，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会议的主要问题上的获得了胜利。

1917年6月21日，列宁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6月23日组织彼得格勒工人进行和平示威，并在《真理报》发表了号召书。可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控制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却通过决议，禁止三天之内举行工人和士兵的和平游行，并诬蔑布尔什维克阴谋推翻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为了揭穿谣言，不造成与苏维埃的对抗局势，列宁于6月22日深夜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根据列宁建议，取消组织6月23日的游行，并派人深入工厂、兵营劝阻准备游行的群众。

在群众的强大的压力下，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决定在7月1日举行一次工人和士兵的游行，他们希望游行支持者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组织俄军在前线发动进攻的计划。6月26日至7月1日，列宁深入到工厂和兵营，挑选布尔什维克的讲演者，物色写新闻报道的通讯员，检查游行的标语和旗帜，拟定游行示威的口号是：“打倒战争，和平万岁！”、“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7月1日，彼得格勒爆发了50万工人和士兵的游行示威。绝大多数群众高呼革命口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决不同德国人单独媾和；决不同英法资本家签订秘密条约！”只有

少数人呼喊拥护临时政府的口号。列宁本人亲自参加了在马尔斯校场举行的游行示威。

这次游行示威表明，首都的绝大多数工人和士兵是跟着布尔什维克走的，群众不仅开始不信任临时政府，而且也开始不信任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执行的妥协政策。7月1日晚，列宁亲切地会见了参加游行示威的布尔什维克演说者柯伦泰等人，列宁意味深长地对他们说：“这次胜利比市杜马选举的意义重要得多。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表明，他们不取得苏维埃的胜利决不罢休。”

7月2日，俄军前线失败消息传到了彼得格勒，立宪民主党立即宣布退出政府。立宪民主党估计到：如果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不敢单独执政的话，就必须答应立宪民主党人提出的联合执政的条件，即解除工人武装，把革命军队撤出彼得格勒，取缔布尔什维克党。

6月29日至7月6日，列宁参加了在克舍斯卡娅大厦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前线和后方军队党组织全国代表会议，分别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土地问题的报告。他向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发出号召：组织好工人和士兵准备迎接新的革命斗争，同时要防止临时政府解除工人武装和把革命士兵调出首都的阴谋，但注意不要过早地举行武装起义。

7月中旬，由于过度紧张和疲劳，列宁开始头痛和失眠，不得不和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一起到穆斯塔米亚克车站附近的内沃拉村休息几天。他们先住在杰米杨·别德内依的别墅，后来又来到邦契—布鲁也维奇的别墅。但是，7月16日，工人和士兵游行示威再次掀起高潮，列宁立即终止了休息，返回城内。

7月16日，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群众由于不满意临时政府继续战争的政策，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以列宁为首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考虑到革命时机尚不成熟，首都和外省军队还未做好支持工人起义的准备，不赞成立即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

为了更好地领导游行示威，7月17日清晨，列宁在萨韦利也夫、邦契—布鲁也维奇及玛·伊·乌里扬诺娃陪同下，先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所在地克舍斯卡娅大厦，同参加游行的喀琅施塔特工人、士兵和水兵代表谈话，在大厦的阳台上向喀琅施塔特前来游行的革命群众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列宁请大家坚信，不管历史道路多么曲折，“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一口号一定会实现。接着，列宁又到达塔夫利达宫。这时，约50万工人、士兵和水兵的示威群众集中在这里，高呼口

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打倒资本家部长！”“要面包，要和平，要自由！”他们要求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即夺取政权。但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断然拒绝这个要求。临时政府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相勾结，利用调来的军队和士官生，向和平示威的工人和士兵群众开枪，造成了死伤 400 余人的惨案。接着，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疯狂镇压布尔什维克，查封了《真理报》，解除工人赤卫队武装，大肆逮捕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活动家。7 月 20 日对列宁下达通缉令。7 月 27 日组成了以克伦斯基为总理的新的联合政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参加了这个政府。由这些妥协党把持的全俄苏维埃中央委员会于 7 月 22 日通过决议，承认临时政府是“拯救革命的政府”，并宣布把全部政权交给它。7 月底至 8 月初，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先后被捕。

七月事变表明，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结束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独揽国家大权，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已经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由他们把持的苏维埃成了临时政府的附属品和遮羞布。

在这一危急历史转折关头，布尔什维克党适时地改变了自己的策略方针。党组织转入半合法状态，列宁则秘密隐藏起来，继续领导革命斗争。

7月17日深夜列宁离开塔夫利达宫，来到《真理报》编辑部。7月18日凌晨，《真理报》编辑部被一队士官生和哥萨克捣毁了。此时列宁刚刚离开。他先来到宽街叶利扎罗夫的住宅，第二天早晨，在斯维尔德洛夫的掩护下，悄悄地离开了。

当天晚上，一辆大卡车隆隆地开到宽街叶利扎罗夫住宅，车上站满了凶暴的士官生和士兵。他们下车后就闯入住宅，搜查了列宁住的房间，凡是他们认为可以藏人的地方，如床底下，柜子里，窗帘后边等地方都搜遍了。开着锁的柳条箱和橱柜，用刺刀往里面乱戳。女佣人安努斯卡生气地对这些士兵说：“炼炉里边也看一看吧，可能会有人坐在那里！”这些士兵又搜查了一遍厨房。以后，士兵又来叶利扎罗夫住宅搜查了两次。

奸细阿列克辛斯基于7月17日告诉彼得格勒记者协会，声称他掌握确凿的资料证明列宁是德国间谍，为此他要控告列宁。7月18日，《活的言语报》刊登了这一消息，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

7月19日下午，列宁来到俄罗斯雷诺工厂，参加了在这里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根据列宁建议，决定从7月20日早晨起停止总罢工，开始复工。这一天列宁曾给加米涅夫写便条叮嘱说，万一他牺牲，请把他于1917年

1—2 月写的札记《马克思主义论国家》想办法出版。

7 月 20 日，临时政府下令逮捕和审判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罪名是他们组织了 7 月 16 日—17 日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游行示威，“犯了背叛祖国、背叛革命的罪行”。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报纸纷纷发表文章，要求列宁出庭受审。当天晚上，奥尔忠尼启泽、斯大林、斯塔索娃、诺根和克鲁普斯卡娅等人来到阿利路也夫家商量对策。诺根认为列宁应该出庭，在法庭上揭露敌人，教育群众。但斯大林等人坚决反对这样办，他说：“敌人在把列宁带到监狱之前，就会在路上把他打死。”列宁最初也打算出席法庭受审，他于 7 月 20 日给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常务局写信说：“如果政府签发逮捕我的命令，而中央执委会也表示同意，那么我一定前往中央执委会指定的地点接受逮捕。”最后大家说服列宁放弃这一想法。

为了防止落入敌人之手，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决定委托工人党员尼·亚·叶梅利扬诺夫把列宁隐藏起来。叶梅利扬诺夫此时居住在拉兹里夫车站附近，接受了这个重大任务后，他与妻子周密地商量。他们认为，把列宁藏在家里太危险，万一被人包围了房子就没有退路了。他们忽然想起：这里的居民经常雇一些芬兰人在湖对岸割草。这样，他们决定把

列宁装扮成雇来的割草人，住到对岸的窝棚里去。

于是，叶梅利扬诺夫夫妇悄悄在湖对岸租了一块草地，搭起了一个窝棚，储备了一些生活用品。在一切就绪后，他们把秘密来到拉兹里夫的列宁用小船送到了对岸，住进了窝棚。窝棚是用树枝搭成的，上面盖上了草，看上去很简陋。叶梅利扬诺夫在附近的灌木林里给列宁清理出了一块办公的地方，还搭了个亭子，放着一段园木当凳子，窝棚旁边砌了一个炉灶，木架子上面吊着一口小锅，有时可以烧火做饭。

夜间蚊子经常很厉害，躲也躲不开。叶梅利扬诺夫的妻子和儿子经常用小船给列宁送来食品和报纸。列宁要求买的报纸尽可能全。为了不让人怀疑，叶梅利扬诺夫给孩子们分了工，规定了哪几种报纸由谁去买。看到报上说列宁乘潜水艇跑到德国去了，有的说是乘飞机走的，列宁感到很可笑，称这些报纸的记者是“胡闹的小丑”。

列宁在这里看书，写作，领导着全国的革命斗争。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名著《国家与革命》就是在这里开始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中央委员常到这里来看望列宁，但是叶梅利扬诺夫夫妇严格保卫列宁的安全，对不上暗号，就甭想见到列宁。

后来，格·叶·季诺维也夫也避居到这里，他们

通过奥尔忠尼启泽、佐夫、绍特曼和拉希亚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7月中旬，奥尔忠尼启泽来到叶梅利扬诺夫家。叶梅利扬诺夫的妻子就叫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给奥尔忠尼启泽领路。这个孩子领着奥尔忠尼启泽来到湖边，乘小船划到对岸后，走进了茂密的灌木林的一个干草垛边停下来，男孩喊了一声，叶梅利扬诺夫走了出来。彼此打过招呼，奥尔忠尼启泽说明来意。

这时候，有一个刮过脸、不留胡须的人朝奥尔忠尼启泽走来，问好，奥尔忠尼启泽淡淡地答应了一声。走到跟前，这个人拍着奥尔忠尼启泽的肩说：“怎么，谢尔哥同志，没认出我来吗？”原来他就是列宁。奥尔忠尼启泽非常惊喜地与列宁握手，热烈地攀谈起来。过一会儿，列宁请奥尔忠尼启泽吃晚饭，吃的是黑面包和鲱鱼。

晚饭后，奥尔忠尼启泽和列宁坐在窝棚里继续谈话，此时，夜幕降临了，湖面上刮起了阵阵的微风，把干草堆吹得哗哗作响，发出来阵阵清香的气息。奥尔忠尼启泽感到十分兴奋，他滔滔不绝地向列宁讲述了城里最近发生的事，工人和士兵情绪，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活动情况。列宁听完后，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他说：

“孟什维克苏维埃已经威信扫地了。两个星期

前，他们无需费劲就能取得政权，而现在他们已经不行了。他们的政权已被夺去了。现在只有通过武装起义才能够夺取政权，而起义已迫在眉睫。起义将不会迟于9月10日（指俄历）。我们必须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工厂去。工厂委员会将成为起义的机关。”

听到列宁这席话后，奥尔忠尼启泽感到十分惊喜：布尔什维克刚刚受到打击，列宁竟然预言2个月后会胜利地举行武装起义！奥尔忠尼启泽向列宁说，有一位同志曾预言，10月至11月，政权就将要转移到布尔什维克党手中，而列宁则会成为政府主席。听到这句话，列宁信心十足而严肃地说道：“是的，事情必将如此。”接着，列宁又向奥尔忠尼启泽谈了如何开展工作，要尽快地成立党的秘密中央机关、秘密印刷所和报刊。

奥尔忠尼启泽由于劳累过度，不知不觉地睡着了，谈话也到此中断。第二天11点钟，奥尔忠尼启才醒来。饭后，他带上列宁写的几篇文章和给斯大林的信，离开了拉兹里夫村，秘密地返回彼得格勒。

7月中旬，鉴于局势日趋紧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决定把列宁转移到芬兰去，以免被临时政府逮捕。中央把这件事委托给绍特曼来安排。

一天深夜，绍特曼来到了叶梅利扬诺夫的家。对

过暗号后，绍特曼向女主人说明了来意，女主人立即让她一个十二三岁的儿子带这位客人前去会见列宁。

他们沿着偏僻的小路走到湖边，坐上小船后，绍特曼摇桨，男孩掌舵，在明亮的月光下穿过芦苇荡，向列宁的住处划去。在湖里划行近半个小时后，他们又在长满灌木的沼泽地里步行了 10 分钟，来到了堆放在林间空地的大草垛跟前。

微弱的月光下，男孩子发出了一个信号后，从草棚中走出来两位穿着棉大衣的人，绍特曼费了好半天才认出来他们就是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一阵热烈问候之后，他们在干草垛边坐下来。绍特曼详细地介绍了彼得格勒事态的发展和党中央的工作，列宁也谈了俄国革命发展的几种可能出现的状况。最后，他们还商谈了列宁转移到芬兰去的计划。

沼泽地的夜晚寒气袭人，绍特曼睡在窝棚里，盖着棉大衣还冻得发抖，好久睡不着觉。第二天绍特曼回彼得格勒时，列宁让他带走他写的小册子《论口号》的手稿。在此后的两个多星期里，每隔一两天他就给列宁送来食品、衣服和报纸等。彼得格勒女工托卡烈娃也多次来看望列宁，送来了食品、衣服等物品。

第二十三章 准备起义

布尔什维克既然在两个首都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就能够而且必须夺取国家政权。

——列宁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 1917 年，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运动的同时，花费巨大的精力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工作，先后在报刊上发表了 120 多篇文章和一些著作。在这一时期，列宁发表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全面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出现的各种新情况，系统深刻地分析论述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历史地位，为无产阶级在新的历史条件进行革命提供了理论和策略基

础。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垄断的资本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垄断代替自由竞争，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帝国主义的实质。列宁指明帝国主义有五个基本特征：（1）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形成了金融寡头；（3）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的资本主义列强已经把世界领土分割完毕。列宁认为：帝国主义阶段生产的社会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在阶级关系上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空前尖锐化，因而帝国主义一定要灭亡，它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列宁的这些思想为正在准备社会主义革命的俄国工人阶级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8月8—16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秘密举行。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大会。大会一致选举列宁为大会名誉主席，并把列宁的小册子《论口号》发给每位代表。列宁虽然未能参加，但他通过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指导着大会。斯维尔德洛夫作了中央委员会组织报告，斯大林作

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大会通过的决议和宣言指出：革命的和平发展和使政权无痛苦地转归苏维埃已成为不可能，因为政权已转到反革命资产阶级手中，无产阶级只有同贫苦农民联合起来，举行武装起义，才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大会还通过了新党章。

在这次大会上，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在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分歧中寻找中间道路的“区联派”表示拥护布尔什维克的主张，正式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而卢那察尔斯基和布尔什维克中的“前进派分子”也重新回到布尔什维克之中。大会还讨论了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是否出席临时政府法庭问题。大会经过讨论，通过了布哈林的原则上反对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出庭的决议案。最后，大会选出 21 名中央委员和 10 名候补中央委员。列宁以 133 票（满票 144 票）的最高票数当选为中央委员。

8 月中旬，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离开拉兹里夫村。他们为此行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为了给列宁弄到去芬兰越过国境的通行证，一天，叶梅利扬诺夫提前来到工厂说服了熟悉的门卫，进入厂长办公室，拿了五张通行证。列宁选了其中名叫伊万诺夫的通行证。为了给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化妆需要买假发套，但临时政府的保安机关有规定，禁止理发师向没有身份

证的人出售和出租假发。于是，绍特曼开来了维堡区芬兰铁路员工戏剧组的一张证明，在巴谢伊纳亚街的一个理发馆里买了两个假发。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剃掉胡须戴上假发，请人照了相。叶梅利扬诺夫又请来一位高明的雕刻师在两个通行证上分别画了逼真的印鉴。经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仔细地检查也找不出一丝破绽，他们连连点头说：“嗯，好极了！你们真棒！”

离开拉兹里夫村的那天，当列宁正在等候接他的同志时，突然灌木丛后面出现一个人。

“那是谁？”列宁急忙问道。

“邻居。”

原来这位邻居想雇列宁替他割草。邻居走到叶梅利扬诺夫跟前问道：

“是谁替你割的草？”

“一个芬兰人。”

“他会说俄语吗？”

“不会。”

“他愿意到我那里去割草吗？”

绝对“不会的，你也不必问他。”

“没办法，我生病了，儿子又不能干，我需要雇一个割草的人……。”

邻居走了，列宁以开玩笑的口吻说道：“尼古拉

· 亚历山大罗维奇，谢谢你没有让我去当雇工！”

晚上 9 点钟时，列宁一行出发了。他们在漆黑的夜里摸索着行进。一路上，他们淌过了冰冷的河流，走过泥泞的沼泽，冒着危险走过了泥炭地，费尽了周折。然后，他们乘火车来到乌达利纽亚车站。8 月 20 日，他们乘上了第 71 次列车，列宁装扮成一个芬兰人进入了驾驶室，帮助驾驶人员工作。在整个行车期间，列宁很熟练地操作着，把一块块劈柴送进炉膛里。就这样，他们躲过了反动军警的检查，安全地来到了芬兰境内的捷里奥基车站。

芬兰工人帕尔维艾宁的女儿帕尔维艾宁来车站，为列宁雇了一辆马车，走了 14 俄里，来到亚尔卡拉村的帕尔维艾宁家，在这里小住了几天。列宁在这里通过房东的女儿帕尔维艾宁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建立了联系。

列宁住在村旁两个湖之间狭窄地带的一个木头房子里，紧靠着一片森林，环境清静幽雅。屋子里边有床、桌子和灯，列宁在这里看报、写文章。休息时，列宁经常帮助房东割草，到林里去采蘑菇和越橘，有时还到卡菲—雅尔维湖里洗澡、划船、钓鱼。列宁和房东的孩子们相处得很好，大家都愿意同列宁一起玩耍。

亚尔卡拉村离俄国国境太近，在这里长期住下

去仍然很危险。

8月下旬，赫尔辛福斯人民文化馆的两位演员卡·库赛拉和古·卡利奥受党组织的委托来接列宁。列宁秘密地来到拉提，住在社会民主党报纸《工人日报》记者阿·科斯基的住宅里。后来他又来到赫尔辛福斯，住在芬兰社会民主党人古·罗维奥的住宅里。这个人当时是赫尔辛福斯警察局代理局长，列宁住在这里是最安全的。住进罗维奥家，列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买报纸和传送邮件。他对罗维奥说：“请您每天上火车站去给我买各种俄国报纸。以后您要通过自己的邮路安排信件传送，对官方的邮局是信不过的。”

于是，罗维奥每天都要去火车站，为列宁买回各种报纸。列宁读完这些报纸就动手写文章，直至深夜。第二天把文章交给罗维奥，由他负责传递出去。列宁还让罗维奥给买回鸡蛋、黄油等食品，自己动手在煤气灶上烧开水沏茶和煮鸡蛋。列宁每天睡得很晚，埋头写作《国家与革命》。列宁对罗维奥藏书很感兴趣，这是他写作所必须的。

列宁后来又迁移到芬兰工人阿·乌赛尼乌斯的住宅和阿·布卢姆维斯特的住宅。通过同志和亲友，列宁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不断给国内的革命运动以指导。列宁在这里继续

写作《国家与革命》一书，还写了一些重要的文章。

在紧张的工作中，列宁十分思念家乡和亲人。8月下旬，克鲁普斯卡娅秘密来到赫尔辛福斯看望列宁。列宁高兴极了，颇有兴趣地听妻子讲彼得格勒的最近事态。克鲁普斯卡娅在这里只住了两天，就返回彼得格勒了。列宁要送她到火车站，为了列宁的安全，克鲁普斯卡娅只让他送到大街一个拐角处，告诉列宁，不必挂念她，她一定还来看望丈夫。

9月7日（旧历8月25日），在俄国大资产阶级和反动势力的支持下，反动将军科尔尼洛夫开始发动反革命叛乱，他把克雷莫夫将军指挥的第三骑兵军调往彼得格勒，名义上是“拯救祖国”，实际上是妄想镇压革命，摧毁苏维埃，建立反革命的独裁政权。

在获悉这一消息后，列宁立即于9月12日写了《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号召立即同科尔尼洛夫作斗争，粉碎反革命的进攻。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号召下，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场叛乱很快就失败了。

9月10日，列宁终于完成了他的名著《国家与革命》。全书共分七章，但第七章“1905年和190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没有写完，他在1917年12月写的初版《跋》中解释其原因时说：“因为1917年十月革命

前夜的政治危机‘妨碍’了我。对于这种‘妨碍’，只有高兴，……”

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是一本系统地论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伟大著作。在这本书中，列宁全面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为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作准备。

列宁写这一著作的目的是揭露第二国际机会主义，从理论上批判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头子一直鼓吹无产阶级可以通过争取议会多数办法夺取政权的谬论。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深受其影响，他们不动员人民群众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而寄希望于“预备议会”。而布哈林则宣扬无政府主义，主张炸毁一切国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列宁认为：“如果不在‘国家’问题上反对机会主义偏见，就无法进行斗争来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特别是摆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影响。”

列宁在著作中非常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并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点。他科学地分析了国家的阶级本质，指明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它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亡。国家的基本特征就是由常备

军、警察、监狱等构成的一种特殊的暴力机构。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国家机器都是掌握在剥削阶级手中，以便统治和压迫人民，无产阶级要想获得解放就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的著作《国家与革命》的意义和影响是十分重大的，它成为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工人阶级和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锐利思想武器。

由于赫尔辛福斯离俄国革命斗争的中心彼得格勒太远，通讯联系不方便，列宁怕因此耽误革命斗争的大事，于是他告诉房东罗维奥想迁到维堡去住，请罗维奥给他搞一个假发、眉笔、身份证，并在维堡给安排个住处。

一天清早，罗维奥和列宁一起，来到了符拉基米尔街一家理发馆。理发师是一位年纪大的彼得格勒人，是做假发的专家。这位理发师给列宁讲，他为许多公爵、伯爵、将军作过假发，使他们变得年轻了。列宁问做一个假发要多长时间？这位理发师说，这是一种精细的手艺活，需用两个星期以后。

“你们是不是有现成的？”列宁问。理发师量了一下列宁头部的尺寸，问需要什么颜色的假发。列宁说假发要掺有白发，大致像 60 岁人的头发。理发师听

后惊奇得差点晕倒。

“您这是怎么啦？您还那么年轻，要知道您还没有40岁呢。您要买60岁的假发干吗？您还没有白发。”理发师好心地绘声绘色地劝列宁不要过早地把自己扮成花甲老人。

“我买哪一种假发对您来说不都是一样给钱吗？”列宁说道。

“不，我想使您保持年轻的外貌。”理发师又开始唠叨起来。

列宁仔细看了看橱窗，发现那里放着一个有白头发的假发，就请理发师取来给他试试。这个假发戴着倒合适，只要稍微拆开改缝一下，理发师答应明天早晨取。次日，列宁终于买到了这顶假发。

罗维奥又给列宁买来眉笔和芬兰人使用的通行证。10月6日，列宁乘火车来到维堡，住在一个新闻记者家里。

10月14日列宁写《给中央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以及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信》，建议立即举行起义，尖锐地批判了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策略。10月16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通过决定：“建议伊里奇迁到彼得格勒，以便保持经常和密切的联系。”

10月16—23日之间，列宁从维堡返回彼得格勒

的老布尔什维克福法诺娃的家里。这所住宅在紧靠列斯诺伊的大街，窗户对着隔壁一幢楼的花园。福法诺娃把这座房子腾出来用作党的活动场所，又让妹妹把孩子送到乌法省的双亲那里去住。

为了全面迅速地了解俄国时局和动态，为布尔什维克党制订正确的方针路线，列宁要求福法诺娃每天 8 点之前务必买回各种报纸。报纸一买回来，列宁立即认真地阅读研究。

福法诺娃每天从 7 点钟就出去买报纸，有时还不得不进城去买。有一次，福法诺娃发现列宁把全部《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连续阅读了两天，晚上一直熬到深夜。第三天早晨，列宁说：

“这一下，我把社会革命党彻底研究清楚了，今天只剩下看看他们的农民委托书了。”

傍晚 5 点钟前福法诺娃回到家时，发现列宁又把所有报纸都摊在餐厅的桌子上了。列宁手拿一份《农民消息报》，愉快地对福法诺娃说：

“242 名地方代表签署的委托书，这可真不简单！我们就拿它作为土地法的基础，看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还有什么办法拒绝。”

为了保密，列宁的住处只有克鲁普斯卡娅、乌里扬诺娃、拉希亚等很少的几个人过去。在这里，列宁

紧张地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他在这里一直住到 11 月 6 日晚上去斯莫尔尼宫。

第二十四章 攻占冬宫

十月革命的胜利也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同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结果。

——邓小平

1917年10月23日晚，列宁出席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列宁是由拉希亚陪同前往参加会议的，并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列宁在报告中指出，目前，夺取政权在政治上已经成熟，党的当务之急是作好武装起义的军事技术方面的准备，应把起义提到日程上来。

会议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央委员会认为，俄国革命的国际形势（德国海军的起义，这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在全欧洲增长的最高表现；其次，帝国主义者扼杀俄国革命而讲和的威胁）和军事形势（俄国资产阶级和克伦斯基之流已经

明确决定把彼得堡让给德国人)，无产阶级政党在苏维埃中获得多数，再加上农民起义和人民转而信任我们党（莫斯科的选举）以及第二次科尔尼洛夫叛乱显然是已在准备（军队撤出彼得堡、哥萨克调往彼得堡、哥萨克包围明斯克等等），——这一切把武装起义提到日程上来了。中央委员会建议各级党组织应该以此为指针，并从这一观点出发讨论和解决一切实际问题（北方区域苏维埃代表大会、军队撤出彼得堡、莫斯科人和明斯克的发动，等等）。

在表决这项决议时，共有 10 票赞成，2 票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投了反对票，因为他们认为俄国工人阶级还没有能力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托洛茨基虽然没有公开反对这项决议，但他建议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不要开始起义。但这次会议还是以 10:2 绝对优势通过了这项决议，并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 7 人政治局，对起义进行政治领导，这 7 人除列宁外，还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和布勃诺夫。

10 月 25 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成立了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布尔什维克领导武装起义的指挥机关和战斗机关——革命军事委员会。10 月 29 日晚上，在列宁领导下，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武装起义问题。列宁就 10 月 23

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作了报告，宣读这次会议的决议，并作了详细说明。列宁说：“根据对俄国和欧洲阶级斗争的政治分析，必须制定最坚决、最积极的政策，这个政策只能是武装起义。”对于是否马上进行武装起义，会议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几乎所有的人都发了言，讨论到第二天凌晨才对决议付诸表决。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同意马上组织武装起义，他们认为布尔什维克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建议采取观望策略，等待立宪会议的召开。

最后，会议以 19 票赞成、2 票反对、4 票弃权：“会议十分拥护并完全支持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号召一切组织、全体工人和士兵全面加紧准备武装起义，支持中央委员会为此而成立的总部；会议表示完全相信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会及时指出进攻的有利时机和适当方法。”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上成立了领导武装起义的军事革命总部，该总部为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所属军事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核心。总部由下列人员组成：布勃诺夫、捷尔任斯基、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乌里茨基。

10 月 31 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公开在孟什维克的《新生活报》上发表声明，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这实际

上等于把党组织武装起义的秘密暴露给敌人。列宁于当天写了《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信》，他在信中气愤地说：“过去我同这两个从前的同志关系很密切，如果我因此犹豫起来，不能坚决地谴责他们，那我认为这是自己的耻辱。我直率地说，我不再把他们两个当作同志了，我要尽力向中央和代表大会提出，无论如何要把他们两人开除出党。”

11月1日，针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暴露武装起义秘密的事，列宁写了《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信》。11月2日，党中央委员会讨论了列宁的信，严厉谴责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人的反党行为，接受加米涅夫辞去中央委员的请求，并禁止他们二人发表任何反对中央委员会方针的声明。就在同一天，临时政府司法部部长普·恩·马利扬维奇指示彼得格勒高等法院检查官立即执行逮捕列宁的命令。

11月2日夜至11月3日凌晨，列宁在工人巴甫洛夫的住宅里会见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局军队领导人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涅夫斯基、波德沃依斯基等人，大家交流并商讨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准备工作进展情况。当有人说到，托洛茨基主张召开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前不要举行起义时，列宁毫不留情地嘲笑了他的主张。

“哪里见到过有不经战斗就会把政权交出来的事，”列宁说道，“政权总是通过战斗才能夺到。它不是会靠什么发表宣言就从一个阶级转到另一个阶级那里去的。”

列宁再次发出号召：不要等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就组织起义。

“现在的时机是有利于起义的，”他说道。“因此务必抓紧。一旦起义发动起来，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就将比较容易。”

波德沃依斯基说，军事局决定派代表到北方战线、西南战线的一些城市中去，了解那里能给予什么样的支援，因此他建议推迟举行起义。列宁坚决反对推迟起义，认为这样会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列宁主张加快起义的准备，要重视赤卫队指挥员的军事训练。列宁还详细地询问指挥员的军事素养和准备情况，要他们钻研作战艺术。

11月6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开始实施列宁的式装起义计划，领导已经初步发动起来的武装起义。上午，在斯莫尔尼宫举行了党中央非常会议，听取了军事委员会关于最近事态的汇报，并把各地段组织领导起义任务分配给各中央委员。

此时，列宁仍然留在福法诺娃的秘密住宅，但他的心早已飞到了革命斗争的第一线，他不止一次地

派福法诺娃给维堡党委员会和克鲁普斯卡娅送便条，请求他们同党中央取得联系，允许他到斯莫尔尼宫去参加领导起义的工作。

11月6日，列宁写了《给中央委员的信》，建议一定要在当晚推翻临时政府，夺取政权，指出：“拖延发动就等于死亡。”列宁反驳了托洛茨基等人推迟起义时间的主张，他说：“历史不会饶恕那些拖延时刻的革命者，他们本来在今天可以获得胜利（而且一定能在今天胜利），却要拖到明天去，冒着丧失许多、丧失一切的危险。我们今天夺取政权不是要反对苏维埃，而是为了把政权交给苏维埃。”他再次强调：“不能等待了！等待会丧失一切！”

晚上，联络员拉希亚来到列宁住处。他告诉列宁，克伦斯基临时政府要把河上的所有吊桥都拉起来，每个桥都由士兵把守。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么彼得格勒每个区都会孤军作战；除维堡区确实掌握在赤卫队手里外，其他区就会被击溃。拉希亚的话更坚定了列宁立即起义的信念，他说：

“是的，立即就应该动手了，”列宁和拉希亚喝了点茶，吃了点东西。列宁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正在思考下步怎么办。

突然，列宁提出让拉希亚去请斯大林到他这里来。拉希亚说，斯大林可能在斯莫尔尼宫，步行来回

要花几个小时，午夜之前无论如何也来不到这里。

听到拉希亚的话，列宁当即决定：“那我们到斯莫尔尼宫去吧。”拉希亚说，如果去斯莫尔尼宫，会冒很大的风险。列宁不同意拉希亚的看法，他坚定地表示：“我们马上到斯莫尔尼宫去！”

房东福法诺娃已被列宁派出去给克鲁普斯卡娅送便条去了。临走时列宁给福法诺娃留下一个纸条，上面写道：“我走了，到您不叫我去的地方去了。再见！伊里奇。”

为了安全起见，拉希亚给列宁化了妆，身穿旧大衣，头戴假发和压舌帽，面颊用头巾裹着。拉希亚随身带了两张假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签发的去斯莫尔尼宫的通行证。接近晚间8点时，他们前往萨姆普桑大街，他们先乘坐电车来到波特舍街的拐弯处，然后步行走到维堡区的利齐尧大桥，看到许多赤卫队在守卫大桥，没遇到盘问。但当走到大桥中间时，发现桥的另一端有克伦斯基政府的警卫队检查过路行人的通行证。列宁和拉希亚没有这种通行证。桥头守桥的士兵正和一群没有通行证的工人在争吵，工人们痛骂这些士兵，列宁和拉希亚乘机从岗哨身边迅速走过，转到什帕列拉街。正在街上走着，迎面走来的士官生，大声命令道：

“站住！通行证！”

拉希亚对列宁说：“您走，我一个人来对付。”同他们粗暴地吵起架来，拉希亚说，“我是一个流浪汉，我不知去何处领通行证。”这时列宁悄悄地走过去了。士官生举起马鞭子威胁拉希亚，让拉希亚跟他们走，拉希亚站立不动。后来，大概这两个士官生看拉希亚的确像一个流浪汉不理睬他就走了。

拉希亚走了一段路，才赶上列宁。他们走到斯莫尔尼宫门前，门口聚集着许多群众，哨兵在检查通行证。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原来使用的通行证是白色的，现在换成红色的了。拉希亚很着急，怕误了列宁指挥武装起义的大事，便怒气冲冲的一只手举着伪造的通行证，另一只手推开人群，同列宁一起进了斯莫尔尼宫，登上二楼。当人们发现列宁来到这里时，斯莫尔尼宫内外顿时沸腾起来，响起了一片“伊里奇！伊里奇！”的欢呼声。

此时，斯莫尔尼宫已经成了一座革命的大本营，充满了革命英雄主义的激情。工人、士兵和赤卫队员和代表纷纷从各地来这里汇报情况，接受指示，电话铃声响成一片，打字机嘀嗒嘀嗒响个不停。斯莫尔尼宫前面的广场上，装甲车在来回奔驰怒吼，机枪和三口径的野炮已经架起，还有一堆堆准备构筑街垒用的木材。各个门口都有卫兵严密地把守着。

列宁和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布勃诺夫、托洛

茨基等人一起，着手进行指挥着武装起义的工作。列宁给彼得格勒各区负责领导武装起义的代表发布命令，要求迅速采取行动，攻击关键目标。他还同工厂、部队、军舰保持着密切联系，及时研究和处理武装起义的细节问题。列宁还不断地询问各地起义的发展情况，如“中央电话局和电报局拿下了没有？”“桥梁和车站占领了没有？”等等。列宁在房间里焦急地走来走去，等候着武装起义的进展情况。

从11月6日（旧历10月25日）深夜到7日（旧历10月25日）清晨，大约有20万赤卫队员和革命士兵参加了这次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伟大武装起义。

11月6日24时，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斯维尔德洛夫命令波罗的海舰队把载有战斗部队的军舰从赫尔辛福斯开往彼得堡。11月7日（旧历10月25日）1时25分钟，赤卫队和革命的士兵占领了邮政总局。早晨2时，占领了尼古拉车站、波罗的海车站、中央发电站。3时30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在尼古拉耶夫桥旁抛锚，把巨大的炮对准了临时政府的最后堡垒——冬宫。6点钟占领了国家银行。7点钟占领了中央电话局，冬宫与军区的电话通讯全部被切断。9时，进攻部队占领了通往冬宫的各条要道，临时政府已陷于孤立无援的地步。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坐

着悬挂美国国旗的汽车逃出了首都。

10 时，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签发了列宁起草的《告俄国公民书》，告公民书发表在当天出版的《工人和士兵报》第 8 号上，并印成传单散发到各地。告公民书宣布：“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已转到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机关，即领导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军事革命委员会手中。立即提出民主的和约，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工人监督生产，成立苏维埃政府，所有这一切人民为之奋斗的事业都已有了保证。工人、士兵、农民的革命万岁！”

下午 5 点钟，攻打冬宫的包围圈缩得越来越小，封锁了冬宫的一切出口。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向盘踞在冬宫的临时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 6 时 20 分钟前无条件投降。但克伦斯基政府没有放下武器。于是，列宁下达了攻打冬宫命令，晚 9 时，“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响起了进攻的炮声。赤卫队员和革命士兵向冬宫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保卫冬宫的士官生驾驶的 6 辆装甲车中的 5 辆向起义者投诚。赤卫队员和革命士兵冲进冬宫，与顽固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11 月 7 日早晨 2 点钟，冬宫被占领了。

“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向世界宣布：俄国

十月革命胜利了，地球上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恩格斯毕生为之奋斗的科学社会主义理想终于变成了现实。11月7日作为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光辉节日而永远载入了人类史册。

11月7日晚10时45分，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隆重开幕。此时，攻打冬宫的战斗仍在进行之中。出席大会共有670名代表，布尔什维克390名，社会革命党人193名，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14名，无党派代表36名。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诬蔑布尔什维克组织武装起义是玩弄“军事阴谋”，声明拒绝参加大会而退出了会场。卢那察尔斯基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团在大会上宣读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宣布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11月8日晚9时，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当列宁来到会议大厅时，整个会场沸腾起来，代表们从座位上站起来，欢呼跳跃，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震耳欲聋，千百双眼睛注视着这位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爱戴的伟大的革命领袖。

列宁向大会做了关于和平和土地问题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宣布完全废除一切侵略性条约，建议各交战国人民及其政府立即

就缔结普遍的、公正的民主和约问题进行谈判。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土地法令》，无偿地没收了地主一切土地，把全部土地交给人民。大会还选举了新的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共选出委员 101 名，其中布尔什维克 62 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29 名，其他党派 10 名。加米涅夫当选为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这次苏维埃大会还组建了新的政府机构——人民委员会。大会任命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列宁）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总理。各部部长称“人民委员”。李可夫为内务人民委员，弗·巴米柳亭为农业人民委员，施略普尼柯夫为劳动人民委员，弗·阿·奥弗申柯（安东诺夫）、尼·瓦·克雷连柯和巴·叶·德宾科为陆海军人民委员，诺根为工商业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为国民教育人民委员，斯切潘诺夫为财政人民委员，托洛茨基为外交人民委员，格·伊·奥波科夫（洛莫夫）为司法人民委员，伊·阿·泰奥多罗维奇为粮食人民委员，格列博夫为邮电人民委员，斯大林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

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彻底失败。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宣告人类已进入以无产阶级革命为主导的世界革命的新时

代。十月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世界各国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迫民族指出了获得解放的康庄大道。毛泽东于 1957 年指出：“我们中国人正是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取得今天的胜利和成就的。中国人民一贯把中国革命看作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并且以此为莫大的光荣。”

第二十五章 保卫成果

如果说有什么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

——列宁

的确，列宁要在实践上领导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了。列宁累了，1917年12月24—27日（公历1918年1月6日—9日），列宁和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及妹妹玛丽娅，去芬兰卡累利阿地峡“哈利拉”疗养院进行为期四天的疗养。那是芬兰的一个十分清洁而宁静的休养地。列宁触景生情，回想起了十年前他在芬兰赫尔辛福斯的秘密生活，也想起半年前他在这里撰写《国家与革命》一书的情况。想着想着，他突然产生灵感，于是立即动笔写出了《政治家札记》，提出一系列有待研究的问题。还写了《被旧事物的破坏吓坏了的人们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人们》、《怎样组

织竞赛?》和《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四天当中，列宁的写作成果要比平时多得多。

在结束旅行返回途中，列宁又开始沉思起来：还是在想那些急待解决的问题。

实际上，这四天的休养对列宁来说只不过是变换了一下工作地点。最令人惊奇的是：列宁在极其幽静的疗养胜地，构思完成了那篇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怎样组织竞赛?》一文。谁能想到：18年后指导苏联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思想发源于芬兰湾的小花园里呢？也许正是在那幽雅美丽的环境中才能产生如此伟大的作品？也许他的天才思想早已酝酿成熟，只是在那种特殊环境中才迸发出来？

十月革命后的最初日子里，列宁与克鲁普斯卡娅都有自己繁重的工作，很难得在一起休息几小时。1918年新年的晚上，在维堡区同志们坚决要求下一起出席了他们的晚宴，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少有的

那天，克鲁普斯卡娅身穿一件洁白有翻领的浅色条纹短衫，下罩黑色卡腰长裙，配着她那高昂的前额和和蔼可亲的眼睛，分外引人注目。她和列宁一起在密集的人群中，谈笑风生，心情非常轻松愉快。人们高兴地欢呼着簇拥着自己敬爱的领袖，甚至把列宁夫妇连同他们坐的椅子一起抬了起来。那场面，使人又激动又快活。

但人们发现，他们两人那苍白的面孔和眼神里，都埋藏着深深的倦意。看上去不知有多少个日日夜夜，他们没有踏踏实实地睡觉了。人们还发现：列宁总是特别细心地、甚至不安地盯着他的妻子，因为，他已不止一次地发现她无节制地工作，她太疲劳了。列宁在和同志们谈话时抱怨地说：“我看得出，她身体不舒服，但她不听我劝告，也不愿去看医生。”

说归说，元旦刚过，列宁和妻子又投入紧张重要的工作之中。

彼得格勒发生了极其严重的粮荒，配给市民的面包根本不能填饱肚子。政府建议把工人家庭的孩子疏散到有粮食的省份去，并把这项任务交给列宁夫人。列宁知道妻子身体状况很差，需要休息，但他更了解粮荒将会夺走孩子们的生命。两者相比，他认为后者不知重要多少倍！

在政府工作中，财政和银行部门的困难最大，为了搞到经费，政府和财政部门不得不采取暴力措施——把国家银行总经理希波夫逮捕起来。列宁还亲自任命他所信任的皮达可夫为国家银行经理，奥新斯基为国家银行政治委员，命令他们一定要搞到1000万卢布作为新政府的经费。列宁非常严肃地对他们说：

“如果弄不到钱就别回来。”

哥尔布诺夫和奥新斯基率领一班人马——新职员、通信员、赤卫队员——凭借智慧和勇气，终于获得了足够的钱款。这笔钱安全地运到列宁的办公室。

为了彻底实现银行国有化，列宁派富有实干精神的斯大林领导这项工作。在进行一系列准备之后，政府任命了一批银行工作人员，到 28 个银行去担任领导工作。经过一番教育和改造工作，一些旧银行经理也表示愿在新政府监督下继续工作。

教育部门的工作也是很艰巨的。列宁夫人了解到一些情况，她认为必须报告给列宁。列宁仔细地听着妻子介绍的情况，感到十分惊讶：一些士兵在一所贵族子弟学校宿营，他们不知受了谁的挑动，一夜之间，把所有的图书、地图、练习本等统统撕得粉碎，并踏上脚乱踩，并且还说：“该死的贵族老爷们就是在这里教他们的子弟的。”

列宁认为事情很严重，立刻记录下来。在不久召开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向全国的工农大众讲解了“掌握知识，造福人类”的意义。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有的放矢的，而且切合实际，考虑到了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

除了处理政府的日常工作以外，当时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是完成如何保卫革命成果这一重大任务。

临时政府的部长们被逮捕了，但其首脑克伦斯基却乘美国大使馆的汽车逃到北方战线司令部所在地普斯科夫，调动沙俄将军克拉斯诺夫指挥的哥萨克部队向彼得格勒进攻。10月27日（公历11月9日），克伦斯基占领了加契纳，直接威胁彼得格勒。一时间，形势变得十分危急。

在这个紧要关头，列宁亲自领导了平定叛乱的组织工作。从10月27日（公历11月9日）晚到第二天早上，列宁一直在办公室里主持会议，召集步兵、炮兵和水兵等兵种的军官研究司令部的作战计划。

从陆上保卫彼得格勒的计划草案得到列宁的同意和批准，但他对从海上保卫首都的计划草案却提出意见。仔细看完这个计划草案后，列宁问出席会议的水兵军官：舰上大炮炮弹的射程有多远？水兵军官作了回答。列宁随即用圆规在地图上测量距离，并指出：如果按照计划草案安排军舰的位置，敌人一旦从海上进攻，一些防卫点就无法用舰炮来保卫了。列宁认为，应该把军舰配置在较近的地方，以便使它们同岸上的大炮配合起来，利用交叉火力击溃敌人的舰队。列宁深思熟虑，运筹周密，他的见解使大家都感到惊叹不已。结果列宁的修正方案被大家接受了。

列宁历来认为，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只有相信人

民的人，只有置身于人民之中的人，才能胜利。因此，他经常深入视察最基层单位的情况，了解群众的情绪，以便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和策略。10月28日（公历11月10日）夜，列宁来到普梯洛夫工厂，检查为前线制造大炮和装甲车的情况。列宁详细询问：工人情绪怎样？对夺取政权有什么反映？有多少工人去了前线？他们的装备怎样？作战情况如何？厂里粮食的情况如何？等等。可见，列宁不仅对重大军事行动很关心，对许多细小事情也了如指掌。正是由于列宁对时局和民情有正确的了解，充分依靠人民群众，所以在保卫革命成果的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先是粉碎了彼得格勒士官生的反革命暴动，随后又击溃了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的部队。这样，第一次反苏维埃政权的叛乱就被击败了。

这是列宁有生以来第一次领导武装斗争。在这以前，他一直是文人、学者、知识分子，是一个英明的政治战略家，对于暴力革命只是从理论上探讨过。现在经过实践，他进一步认识到，社会政治改革不依靠强大的革命暴力是根本不能成功的。

有一天，列宁看到一条新起草的法令，内容是关于废除死刑法的。列宁气愤地说：在这种时期能废除死刑吗？

“胡扯，难道你们认为解除自己的武装就能够对

付一切敌人吗？”

加米涅夫解释说：“此法令限于废除逃兵的死刑。”

列宁还是坚持批判这种轻率的态度。并建议取消这项法令。只是后来，考虑到党内一些同志的意见，担心取消该法令会给外界造成不好的印象，列宁才没有坚持己见。

可是，列宁并没有放下专政的武器。当资产阶级报刊联合起来，竭尽全力攻击列宁和新政权时，列宁不为所动，始终坚持他的原则立场。

有一次，列宁看到资产阶级报刊大肆攻击他的“剥夺剥夺者”这句话时，列宁觉得十分可笑。

“他们总算是抓住‘剥夺剥夺者’这句话了。”列宁带着幽默的神情对战友们说。

战友们问列宁：“这是谁说的？”

“是捏造的吗？”

“不，我确实说过这句话，可是他们断章取义把这句话变成了整个纲领。”他笑着挥了挥手。“这句话我决不收回，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

尽管资产阶级的喉舌喧嚣一时，在许多问题上对列宁极尽咒骂之能事，但列宁毫无惧色，在原则问题上从不妥协退让，他的反应只是付之一笑。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一方面要通过武装战线，另一方面也

要进行艰巨的政治斗争。

解散立宪会议，是列宁领导保卫苏维埃政权斗争的又一果断措施。

立宪会议是资产阶级民主的一种形式。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俄国政坛上围绕着是否召开立宪会议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向无产阶级夺权。通过认真研究观察，列宁认为，对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来说，立宪会议是一种倒退。于是，布尔什维克党团毅然退出了立宪会议，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部分穆斯林也相继退出。面对这种情况，一些社会革命党人和资产阶级分子举行了抗议活动，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示威，并试图挑起冲突，但很快就被赤卫队平息下去了。这样，资产阶级的阴谋又一次被粉碎了，无产阶级的政权在人民武装力量的保卫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1月6日（19日），列宁写《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人民委员会立即批准了这一文件。当日深夜，列宁出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通过了列宁起草的《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列宁在会上发表了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讲话，他指出，过去布尔什维克党拥护过立宪会议，因为，同沙皇制度和克伦斯基的共和国相比较，立宪会议要好一些。但是，苏维埃无可比拟的高出世界上的任何议会。况且立

宪会议妄图代替苏维埃，提出什么“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反动口号，因此必须解散立宪会议，只有这样才能保卫苏维埃政权。

10月29日（11月11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要求建立新的、从布尔什维克到人民社会党人都有代表参加的所谓“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出面召开关于政府组成问题的会议，孟什维克护国派、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邮电职员联合会、彼得格勒市杜马、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等都派代表参加了会议。列·波·加米涅夫和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受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委托参加会议。

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认为，关于扩大政府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切谈判，都应在承认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维埃政权活动纲领的基础上进行，就是说，要承认布尔什维克党的多数地位和主导作用。然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却想在联合政府中居领导地位，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甚至要求撤换列宁的政府首脑职务。参加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没有反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等的立场和建议，采取了妥协的立场。

11月1日(14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开会，讨论关于同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的谈判和布尔什维克代表团的妥协行为的问题。列宁在会上指出：加米涅夫妥协政策应当立即停止执行，我们决不能动摇，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和士兵都是拥护我们的。大多数中央委员都谴责了加米涅夫等人的妥协立场。党中央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参加关于政权问题的会议的唯一目的，是揭露建立联合政权的企图的荒谬性，并最终停止谈判。

但是，列·波·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米柳亭、拉林及梁赞诺夫等人继续对抗中央的路线。在11月2日(15日)深夜举行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提出了一项与中央委员会决议背道而驰的决议案，要求改变政府的组成，使布尔什维克在政府中只占一半席位。

得知加米涅夫等人的行为以后，列宁非常气愤。11月3日(16日)，列宁为中央起草了给加米涅夫等少数派的最后通牒。列宁在这一文献中指出：既然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千百万工人、士兵和农民把政权交给布尔什维克党，那么，强迫布尔什维克党放弃政权的任何企图都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背叛。由布尔什维克党执掌革命政权，这是俄国工人、士兵和农民推翻克伦斯基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起

义的指南，是布尔什维主义的革命的实质，全体党员首先是中央委员会的少数派必须无条件地执行。

但是，少数派固执己见，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米柳亭和诺根竟然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并继续与中央决议相对抗，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再次代表中央写信给加米涅夫等人，指出：虽然他们已退出中央领导岗位，但仍留在党内，因此有义务服从中央的决定。列宁在信中对少数派提出以下要求：或者立即书面保证服从中央的决议并在言行中贯彻中央的政策，或者在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以前退党并辞去工人运动中的一切重要职务。

尊重普通党员和群众，及时地把事情真相告诉他们，这是列宁的一贯作风。11月7日，列宁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言》，向全党、全国通报了少数派退出中央领导岗位的情况。列宁指出，这几个担任重要职务的党员在资产阶级进攻面前动摇了，要坚决斥责这种怯懦行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十月革命前就有过逃兵行为反对举行武装起义，他们十月革命前后所掀起的不过是杯水风波而已，谈不上布尔什维克的瓦解和复灭。群众的伟大热情和英勇精神，轻而易举地抛弃了这些逃兵。

后来，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米柳亭

等反对派看到大势所趋，便不再坚持反对意见，放弃辞职声明，回到党内。列宁以宽阔的胸怀接纳了他们。让他们重新担任党内重要职务，这件事深刻体现了列宁对待反对过自己的人的政策和宽容态度。

1917年11月29日，党中央决定由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组成中央领导核心。由于列宁忙于制定政策等重要工作，许多紧急的具体事务都由他的助手们来完成的。他们每天要花费5—6个小时讨论具体政策的修改方案。列宁主持会议，亲自领导制订了一系列重要法令，这些法令的内容包括：根除军队中的一切不平等现象，加强军队中的民主建设；放宽婚姻法和离婚法；强调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取消私有财产；实行工业和银行国有化；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吸收工人参加管理等等。这些都是俄国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新制度。

与此同时，列宁及时建立了新的法院和革命法庭，以对付政权的敌人。1917年12月，列宁委派波兰族人捷尔任斯基组织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设委员会（简称契卡）。1918年2月5日，又宣布了一条政教分离的法令，允许公民有信仰自由。

短短数月就公布了这样多的政策和法令，可想而知，列宁的工作是何等的繁忙和劳累。他几乎没有上下班和节假日，。虽然他曾经说过：会休息的人才

会工作，但他自己根本没有时间休息。幸亏他有钢铁般强健的身体素质，能够这样夜以继日地不停工作。

除了以身作则、勤奋工作以外，列宁还十分注意发挥周围一班人的积极性。他最喜欢坚定、果敢，讲求办事效率的人，托洛茨基、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等人都是他当时最信赖的得力助手。

斯大林的办公室离列宁最近，一天里，列宁不知要把斯大林叫去多少次。有时，一呆就是大半天，甚至晚上也在一起商讨和处理国家大事。托洛茨基的办公室远一些，列宁就派一名联络员往返跑路，以便两人能及时交流信息，确实解决问题。列宁尤其喜爱斯维尔德洛夫，称赞他的办事效率。每当列宁打电话询问某件工作的进展时，斯维尔德洛夫总是爽快的回答：“已经照办”。这使列宁非常满意。

遗憾的是这位忠实和实干的革命家 1919 年春天因患西班牙流行性感而离开了人世。弥留之际，列宁冒着被传染的危险前去看望他。对于他的死，列宁在很长时间都陷在深沉的悲痛中。

列宁主持会议的方式是新颖而讲实效的。主旨报告一般只给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要求简明扼要，辩论也是相当紧凑的。为了节约时间，采用向与会者传便条的方法征求意见，与会者再把自己的意见写在便条的背面交回来。列宁从反馈的信息中迅速做出

适当的判断。

制定法令时，列宁不仅善于全面地听取群众意见，而且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独特的创造性。但这种想象并不是虚幻的，而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和事务的发展规律之上。因此列宁制定的法令不仅符合现实而且具有创造性。

第二十六章 退出大战

“我们当前的任务之一，就是必须立刻结束战争。”

——列宁

早在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爆发不久，列宁就在俄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中，严正地表明布尔什维克党对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态度，提出“变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一正确的无产阶级口号。在他看来，国内战争的目的就是打倒剥削阶级的政府，只有这样才能结束这场帝国主义战争。十月革命胜利了，推翻了资产阶级政府，俄国理所当然要退出战争。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首先提出了《和平法令》，并作了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在当时，俄国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但如果没有和平的环境，其他问题都难以得到很好的解决。

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向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及其盟国政府，10月28日（10日）又向德国及其盟国政府发表声明说立即停战和开始和平谈判的正式建议。但美、英、法、意等协约国拒绝苏维埃政府的和平建议。国内反革命势力也妄图破坏苏维埃政府的和平努力。俄国代理总司令杜鹤宁拒不执行苏维埃政府要求他向各交战国建议停火的命令。

当时情况十分危机——1400万军队都在杜鹤宁的操纵之下，如果他们与正在向彼得堡进军的克伦斯基配合的话，肯定会使新生政权遭到毁灭性打击。在这危险时刻，许多革命者（包括高层领导人）都感到有些束手无策，或者犹豫彷徨。但列宁却镇定自若，毫不慌乱。他立即给杜鹤宁发了一封紧急电报，电文指示：“由于您不服从政府的命令，由于您的行为给各国劳动群众，特别是给军队带来了空前深重的灾难，我们受人民委员会的委托，以俄罗斯政府的名义解除您所担负的职务……现在任命克雷连柯准尉为总司令。”

11月9日凌晨4时30分，列宁同斯大林和克雷连柯一起驱车前往陆海军电台。早6时，电台广播了列宁起草的《致各团、师、军、集团军等委员会，全体革命陆军士兵和革命海军水兵》。列宁号召士兵和

水兵担负起停止战争、争取和平的使命，维持前线的秩序。列宁还要求前线立即派代表同敌军举行停战谈判，并及时报告谈判的结果。列宁寄希望于广大士兵群众，他指出，光靠上面是不能签订和约的，还要靠士兵们起来争取和平。俄国进行停战的谈判对象主要是德国。11月11日（24日），列宁召见苏维埃俄国停战谈判代表托洛茨基、克雷连柯和越飞，对如何同德国代表进行谈判作了详细的指示。11月20日（12月3日），俄、德两国谈判代表在德军司令部所在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开始进行停战谈判。苏维埃俄国方面提出的主要建议，包括：签订为期六个月的停战协定，德国军队不得从东线调到西线。尽管德国及其盟国对苏维埃俄国持敌视态度，但严重的国内外形势使它们在谈判时态度不得不灵活一些。

1917年12月2日（15日），苏维埃俄国同德国签订临时停战条约。条约规定：缔约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并保证军队不作任何调动；于1918年1月1日之前实现停战。

在漫长的俄、德战线上，大炮和机枪不再喧嚣了，流血冲突停止了，不时听到两国士兵联欢的歌声和笑声……这是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和平政策的胜利。这一胜利大大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团结了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并为各国人民指明了摆脱帝国

主义战争的道路。

此时，列宁又在思考着一个重大的问题：怎样才能把临时停战变成持久而稳固的和平？

1917年12月9日（22日），苏维埃政府的代表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及其盟国的代表开始进行谈判。苏维埃政府代表团在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以下原则：承认各民族一律平等并拥有自决权；占领军必须在短期内从被占领的土地上撤走并恢复各民族的政治独立；完全放弃兼并和赔款的要求，容许殖民地人民政治独立和自由发展。德国及其盟国的代表玩弄手腕，表面上同意苏维埃政府代表的建议而实际上却另有打算。

12月18日（31日），德国代表突然拿出一张他们重新标明国界的新地图。苏俄代表团团长托洛茨基立即被激怒了——它把俄国的大片领地划归了德国。托洛茨基当即给列宁打电报，提出了一个不战不和的方案要求中央对此事拿出具体意见。

1917年底，德国政府中军人集团取得了胜利，这种情况很快就在德国谈判代表团的行动中表现出来。1917年12月27日（1918年1月9日），德国谈判代表扔掉了假面具，声明他们完全拒绝民族自决的原则，坚持德军不退出它所占领的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和部分白俄罗斯领土的立场，要求苏维埃俄国

接受你们提出的条件，否则就恢复军事行动。战争阴云密布，国际形势严重地恶化了。

列宁清醒地看到，摆在苏维埃俄国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或者与德帝国主义及其盟国签订对自己极为不利的苛刻条约，以换取生存的条件，或者同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作战。二者必择其一。

列宁选择了同德国等国实行妥协，而不是继续进行战争。列宁决策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严重情况，1917年底至1918年初，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没有力量同武器精良而又有组织的敌人进行战争。要进行战争，就要有一支具有战斗力的军队。但是，旧军队事实上已经瓦解。从忠于十月革命理想的工人和贫苦农民中建立新军队需要一定时间。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广大群众正在忍饥挨饿，因此，立即进行革命战争的思想，即使在他们中间，也不是受欢迎的。

在国际上，西欧各国的革命形势无疑是在发展，群众性罢工浪潮席卷德国和奥匈帝国。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已经发生革命，苏维埃俄国还不能指望西欧无产阶级马上就能给予有效的援助。

上述情况便是列宁作出与德国妥协的决策的基础，无论国内或国外形势，都迫使苏维埃俄国同德国及其盟国妥协。妥协不是列宁的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形势的客观要求。在早些时候列宁曾就妥协问题

谈过自己的观点：革命政党的职责是，在妥协不可避免时通过各种妥协始终忠于自己的原则、阶级、革命事业。

列宁的妥协决策是从保住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角度出发的。因为只有有了革命政权，才能谈得上发展国家和收复失地。如果在自己力量很弱的情况下与敌人硬拼，因战败而丧失政权，其它就谈不上了。

但是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部，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立即理解妥协的必要性，列宁的主张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例如，1917年12月28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区域局（洛莫夫、奥新斯基、斯土柯夫等人）全体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停止与帝国主义德国进行和平谈判，并与各国所有玩弄外交手腕的强盗断绝一切外交关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也赞同对德国开展革命战争。

另外，社会上还流传着一些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极为不利的谣言，说布尔什维克已经被德国政府收买，现在正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演出一场早已准备好的喜剧。还说爱国主义的立宪会议被解散，这意味着俄国将不惜任何代价与德国人签订奴役性和约。苏维埃制度就是霍亨索伦王朝的代理人……

一时间谣言四起，弄得人心慌慌，社会上出现了

严重不满情绪。

在这种形势下托洛茨基提出停止战争、复员军队但不签订和约的不战不和的策略。他于12月18日致电列宁，急切地催促列宁尽快给予答复。

列宁接到托洛茨基的电报，心情极为沉重，巨大的压力像顽石一样落在列宁的身上。

1918年1月3日（16日），列宁在电报中告诉托洛茨基：你们的计划可以讨论。等与斯大林商量后再答复你们。列宁随即与斯大林商量，然后电告托洛斯基请他把和谈中断一下，回到彼得格勒来。1月6日（19日）托洛茨基中断了和谈，回到彼得格勒。

托洛茨基刚一回到彼得格勒，列宁立刻与他进行了严肃的谈话。

在全面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后，列宁问道：

“要是霍夫将军无力来调动他的军队来打我们，那最好不过了。但这种希望很小。如果他恢复了战争，那该怎么办呢？”

托洛茨基回答说：“那我们就只好签订和约，没有别的出路，到那时，我们才能粉碎那些谣言。”

听到这话，列宁的心情十分沉重，因为他担心拖延签订和约可能使俄国失去的更多，正像德国人在新地图上标明的那样。他惋惜地说：

“这样，我们将会冒丧失爱沙尼亚的危险……这

是很遗憾的事……无论如何，我主张立即签字，这是上策。”

1918年1月8日(21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了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党的工作者的会议。在俄、德战争一触即发的形势下，列宁在这次会议上宣读了《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割地和约问题的提纲》指出：“要解决现在能不能立刻进行革命战争的问题，就只能根据实现这一点的物质条件和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考虑。”他认为，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主张进行革命战争，正是没有考虑苏维埃俄国当前的力量和面临的形势。

列宁的整个《提纲》都服务于一个基本目的：必须创造和保证最好的条件去巩固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和苏维埃政权。围绕列宁提出的《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割地和约问题的提纲》中央会议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分歧很大。参加会议的63人当中，有32人支持“左派共产主义者”提出的“进行革命战争”的主张，16人支持托洛茨基提出的“不战不和”的建议，投票支持列宁关于签订和约的决策的只有15人。

“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的核心人物是布哈林、布勃诺夫、洛莫夫、奥新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皮达可夫、拉狄克等。他们的主张立即中止谈判，进入战争状态，绝不与帝国主义妥协。雅柯夫列娃的观

点更为极端，她说：我们将光荣地高举旗帜去牺牲，一切都是为了使欧洲爆发国际革命。列宁深刻地指出了这些“左派”反对派的实质：客观上是帝国主义挑拨的工具，主观上是狂躁的小资产者心理，硬充好汉，虚张声势。列宁称“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欢点是革命空谈，他认为：革命空谈就是在这种事变发生逆转的情况下，不顾客观形势，一味重复革命口号。口号虽然很漂亮，但毫无根据。——这就是革命空谈的本质。

托洛茨基之所以提出“不战不和”的建议，是由于他没有看到俄国内部有能够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力量，认为只有欧洲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革命，才能保证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正如他本人所说：只有欧洲革命才能真正挽救我们。对托洛茨基的这种观点，列宁在《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割地和约问题的提纲》中已经作了清楚的答复：如果把俄国社会主义政府的策略建立在预测欧洲的尤其是德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会不会在最近半年内爆发这种基础上，那就错了。因为这是根本无法预测的，所以一切类似的做法在客观上都是盲目的赌博。

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利用对德和约问题，加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他们指责布尔什维克背叛了民族利益，主张在“对帝国主义进行无情

战争”的口号下对德作战。实际上，他们是想利用当前形势来夺取政权。

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列宁坚定沉着，不屈不挠地捍卫自己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正确策略。列宁深刻地揭露了“左派共产主义者”和托洛茨基的理论的荒谬性，指出：如果按照他们的策略行事，将给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带来严重后果。但在激烈的争论中，他往往处于少数地位，一些人甚至因此而藐视他。

1月8日的中央会议结束后，列宁感到格外疲倦，他似乎已经丧失了说服大多数人的希望。他非常失望地对妻子说：“有什么法子呢，我们走吧！”

为了解除列宁的苦闷，那些天他的妻子常常陪他在涅瓦河畔散步。

冬天的俄罗斯天空总是灰蒙蒙的。古老的涅瓦河早已封冻，上面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寒风刮在脸上，像针扎一样疼痛。但列宁似乎全然不觉，他在妻子的陪伴下走着，走着……嘴里还一遍一遍地重复着自己的论点：“一定要签订和约。不能进行战争，除非德国革命。”

1918年1月11日（24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举行中央委员会会议，主旨是讨论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各种意见的分歧再次尖锐起来。“左派共产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发言，激烈地反对列宁。一部分

“左派共产主义者”，如布哈林、乌里茨基和洛莫夫，看到立即进行革命战争的主张没有成功的希望，转而支持托洛茨基的“不战不和”的主张，使托洛茨基在 16 票中获得 9 票对 7 票的多数。而斯大林、谢尔盖耶夫（阿尔乔姆）、索柯里尼柯夫和季诺维也夫则支持列宁，主张签订和约。由于各方谁也说服不了谁，会议陷入了僵局。

为了消除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签订和约问题上的阻力，转变那些拥护革命战争口号的人的激进情绪，列宁提出了竭力拖延谈判的建议。这一建议以 12 票对 1 票获得通过。

1918 年 1 月 21 日（2 月 3 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举行了各派代表协商会议，对“是否允许立即签订德国提出的兼并性的和约”这一基本问题进行表决，结果如下：同意的有 5 人：列宁、斯大林、穆拉诺夫、阿尔乔姆（谢尔盖耶夫）和索柯里尼柯夫；反对的有 9 人：洛莫夫、克列斯廷斯基、布勃诺夫、柯季尔、奥新斯基（奥博连斯基）、斯图科夫、普列奥布拉任基、斯蓬德、费尼格施泰因。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乌里茨基在表决前离开了会议。

当各派代表协商会议正在紧张进行的时候，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会议上的形势愈来愈紧张了。德国拒绝苏维埃代表团关于允许全乌克兰苏维

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参加谈判的建议，并于 1 月 27 日（2 月 9 日）同乌克兰民族主义的中央拉达签订掠夺性的条约。这是一种可耻的背叛行为，因为这等于在南方战线为德军打开一扇大门，把粮食和煤炭让给德军支配。谈判会议上发生的另一个严重事件是：托洛茨基没有完全按照同列宁约定好的方针去行动，而是采取了冒险主义的步骤。1 月 28 日（2 月 10 日），他宣布单方面停止战争并复员俄国军队，随后就离开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这样，他就在实际上中断了谈判，给德国破坏停战和发动军事进攻提供了口实。

1918 年 2 月 16 日 19 时 30 分，德国统帅部利用托洛茨基退出谈判，向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苏维埃俄国代表正式声明，结束俄德停战，恢复战争状态。列宁接到德国宣布恢复战争的电报后，心情格外沉重，本来就很忧郁的脸上更增加了几片阴云。他默默地把电报递给托洛茨基，大家都默不作声，静静地望着列宁。

“这只野兽什么也不放过，”列宁愤愤地说。

“他们终于欺骗了我们，这只野兽又要发疯了。”

1918 年 2 月 17 日晚，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会上讨论德国可能发动进攻的问题。列宁提议立即再次与德国就缔结和约问题进行谈判。赞成这一建

议的有 5 人：列宁、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索柯里尼柯夫和斯米尔加；反对的有 6 人：托洛茨基、布哈林、洛莫夫、乌里茨基、越飞和克列斯廷斯基。后来，列宁变换了一下问题的提法，提出“如果德国发动进攻已成事实，而德国和奥地利的革命高潮还没有到来，我们是否要缔结和约”的问题进行表决时，托洛茨基投了赞成票，布哈林、洛莫夫、乌里茨基和克列斯廷斯基弃权，只有越飞一人投反对票。这个建议终于以多数票通过。

2 月 18 日夜，列宁为人民委员会起草了发给德意志帝国政府的电文。在电文中，列宁谴责了德国政府背信弃义的进攻，并表示同意签订和约。这时，前线告急，敌军攻势凶猛，除德文斯克，还占领了文登、明斯克等城市。

2 月 19 日凌晨 4 时前，列宁主持召开了人民委员会紧急会议，通过给德国政府的电报。早晨，该电报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发往柏林。

列宁一夜没合眼，他又困又累，但仍不能休息。上午 10 时，列宁又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德国战俘酝酿反对苏维埃政权暴动的问题。接着，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讨论发出同意签订和约的电报以后的对外政策和组织国防等问题。晚 8 时至深夜，出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党

团联席会议。列宁在联席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持续两小时，阐述同德国缔结单独和约的必要性，并回答会上提出的问题。列宁指出：俄国没有别的出路，必须立即单独媾和，因为德国人正在以大批兵力在全线展开进攻，而我们是无力抵抗百万大军的进攻的。缔结和约后，我们就能处理国内事务和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能顺利地完成那些将使我们在俄国尽快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改革。

这就是列宁的一个普通工作日，这是辛勤劳动的一天，也是为社会主义事业鞠躬尽瘁的一天。在那些危急的日子里，列宁不知道有多少日日夜夜是这样渡过的。

在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列宁还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俄国政府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组织国家的防御。2月20日，人民委员会听取最高统帅克雷连柯和海军上将阿尔特法特关于前线形势的报告，决定成立以列宁为首的人民委员会临时执行委员会，负责处理一切日常事务。在彼得格勒成立以斯维尔德洛夫为首的革命防御委员会，成员有：沃洛达尔斯基、古谢夫、叶列梅耶夫、波德沃依斯基、乌里茨基。

但是，列宁的决策经常要遭到具有极“左”思想的人的抗拒。2月21日，法国驻俄国大使约瑟夫·努

兰斯打来电报称：在抗击德国的斗争中，法国可以在军事和财政上给俄国人以帮助。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此事引起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掀起一阵喧嚷，布哈林、洛莫夫、乌里茨基等人认为：同帝国主义者进行谈判在原则上是不能容许的。但是，斯维尔德洛夫、克列斯廷斯基和斯米尔加则主张，利用帝国主义的帮助，在原则上是可以容许的，而从英、法帝国主义者那里获得帮助，实际上是不合适的。托洛茨基和索柯里尼柯夫也主张从帝国主义者那里搞到武器。列宁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他派人送来一张便条，便条上说：“我赞成从英法帝国主义强盗那里搞到马铃薯和武器，请把我这一票加上。”最后，中央委员会以 6 票对 5 票通过可以接受英法帝国主义援助的决议案，在这之后，布哈林提交了退出中央委员会的声明，并辞去《真理报》编辑的职务。其他 11 名“左派共产主义者”也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声明，指责中央委员会投降了国际资产阶级，声称要开展广泛的鼓动，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政策。

列宁对“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言行感到怒不可遏，于 2 月 21 日和 22 日两天连续写了两篇文章。第一篇题名为《论革命空谈》逐一地批驳“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各种错误论调，最后着重强调：“为了将来任何时候人们谈到我们时都不会提起‘鼓吹革命战

争的革命空谈断送了革命’这个沉痛的事实，我们应当反对革命空谈，必须反对革命空谈，一定要反对革命空谈。”

第二篇题名为《论疥疮》，这篇文章是针对“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从英法方面购买武器和粮食以抵抗德帝国主义者而写的。列宁写道，害了革命空谈这种疥疮的人，甚至连显而易见的真理都要加以歪曲。这由于他们像小孩子似的不理解正确理论，生硬地乱套理论，不善于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例如，如果一个强盗为了杀人越货而以金钱、烧酒和面包作报酬，从另一个强盗那里买到手枪，那么，这两个强盗的交易就应该受到谴责。而社会革命党人卡利亚耶夫的行为就不同了。卡利亚耶夫刺杀了尼古拉二世的叔父莫斯科总督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公。从一个大坏蛋或大骗子或大强盗那里搞到一支手枪，答应用面包、金钱和烧酒作为报酬。卡利亚耶夫的行为就不应受到非难，而应受到颂扬。

严厉批驳“革命空谈”及其他各种错误观点的同时，列宁始终关注着前线的动态，并亲自指挥前线的军事行动。

2月21日，列宁向前线发去电报，命令哈尔科夫的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立即攻占罗斯托夫和新切尔卡斯克。派去2000名可靠的彼得格勒赤

卫队员助战。”

然后，他又通过直达电报，命令雷瓦尔的安韦尔特：“率部迎敌，将其歼灭。如难做到，则破坏所有道路，进行袭击，不让敌人巩固阵地。”

列宁起草人民委员会法令《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2月21日深夜，人民委员会通过了这一法令。

第二天，各报均在显要位置发表《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在这一法令中，列宁提出应该把全国一切人力物力都用于革命防卫事业的措施，要求保卫每一个阵地，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2月23日，彼得格勒各区举行了群众大会，口号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各工厂警笛齐鸣，动员工人保卫革命事业，参加开往前线的武装部队。仅在彼得格勒的维堡区就有3000名志愿者登记参加武装部队。其他城市也纷纷效法彼得格勒工人的榜样。于是，2月23日成了大规模动员革命力量去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开端，这一天作为苏维埃共和国红军诞生的日子载入了史册。

德国政府对苏维埃俄国同意媾和的电报保持沉默，一直不停地向前推进。虽然苏维埃俄国的广大军民进行了英勇抵抗，但德国军队还是占领了普斯科夫、列韦里和其他一些城市，对彼得格勒形成了严重

威胁。

直至2月23日，苏维埃政府才收到德国政府的答复。德国在答复中提出新的、更加苛刻的条件，并限定俄国必须在48小时之内接受。当天，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立即召开了会议，讨论是否接受这些苛刻的条件。在这次非同寻常的会议上，争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各种意见争执不下。

列宁先后做了8次发言，强调指出：“革命空谈的政策必须结束。我不愿听革命空话。如果空谈的政策还继续下去，我就要退出政府和中央委员会。”

听到这里，斯大林感到非常惊讶，提出疑问说：“辞职是否意味着事实上退党？”

列宁说：“这并不意味着退党。即使辞职不干，仍然要在党内保持宣传鼓动权，继续申明自己的主张。”

列宁还说：进行革命战争需要军队，但我们没有。这就是说，只好接受德国提出的条件。“如果我们不签字接受这些条件，那么三个星期之后，我们就得在苏维埃政权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

但“左派共产主义者”仍然固执己见。乌里茨基再次硬说：“我们向德国帝国主义投降将会推迟西方正在发生的革命，苏维埃政权也不会因为签订这个和约而得救。”

捷尔任斯基、克列斯廷斯基、越飞和托洛斯基等人投了弃权票。

斯大林建议暂不签订和约，而应重开谈判。列宁对他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斯大林说可以不签订和约，那是不对的。”在列宁的批评的影响下，斯大林放弃了自己的建议，并在第二次发言时赞成立刻签订和约。支持签订和约的还有季诺维也夫、斯维尔德洛夫、斯塔索娃、索柯里尼柯夫和斯米尔加。

最后，中央委员会以 7 票对 4 票（4 票弃权）的多数票通过了列宁提出的按德国所提的条件立刻签订和约的建议。

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党中央预见到资本主义国家将试图摧毁苏维埃共和国，因此一致通过立即准备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决议。

还是在 2 月 23 日这一天，列宁分别出席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联席会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联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在讲话中，他严厉批评了继续进行革命战争的主张，坚持按德国的条件签订和约。由于列宁的决策是从现实情况出发的，所以得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赞同。

2 月 24 日，苏维埃俄国政府通知德国及其盟国，同意按照它们所提的条件签订和约。同时，布尔什维

克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组成由索柯里尼柯夫任团长的苏维埃政府和平代表团，立刻前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俄德双方对和约的掠夺性条款没有进行讨论，便于3月3日签订了和约。这就是《布列斯特和约》。

对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来说，《布列斯特和约》是苛刻的，屈辱性的。按照和约的规定，苏维埃俄国失去大片国土：爱斯兰、库爾兰、里夫兰、立陶宛和波兰。在德国军队的奴役下，这些地方又恢复了剥削阶级的统治。在外高加索，卡尔斯、阿尔达甘和巴统转归土耳其统治。德国干涉乌克兰和芬兰的事务，而苏维埃俄国则必须从那里撤走自己的军队。此外，俄国军队还要撤出阿兰群岛。条约对俄国的规定还有：俄国必须与乌克兰中央拉达签订和约、复员军队、解除舰队武装、停止针对德国等国的革命鼓动。在经济方面的屈辱性的规定是：1904年签订的有利于德国的贸易条约又以更加苛刻的形式强加给俄国，包括德国有权免税从俄国运走木材和矿石；俄国要赔偿德国等国的一切损失；付清沙皇政府所欠债务的利息等。

德国要求俄国必须在两个星期之内即3月15日以前批准条约，然后条约立即生效。

布列斯特和约必须得到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

为了使代表大会能批准和约，布尔什维克党必须统一思想，作出一项得到全党多数拥护的统一的决议。所以，列宁亲自主持召开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

3月6日，代表大会在塔夫利达宫开幕。列宁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政治报告，并参加了辩论，前后发言共达18次之多。在那次会议上，辩论进行得极其激烈。

列宁的基本观点就是：俄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论如何都要保存下来。因此，要用土地换时间，争取和平喘息机会，以便使国家在经济上得到恢复，在国防上得到加强。

列宁尖锐地批评了反对派的观点，指出他们的革命口号同局势有着惊人的矛盾。这种局势是：国家实际上没有军队。“只要德国人稍微一进攻，我们就会一败涂地。我们不出几天就会成为敌人的牺牲品。”

“左派”人士说：有觉悟的革命者是不能接受这种和约，不能忍受这种耻辱。

列宁认为：这是用“小贵族”眼光看问题。这位“小贵族”临死时手握利剑，摆出美妙的姿态，说媾和是耻辱，战斗才是光荣。他们用“小贵族”的观点讨论问题，而我是用农民的观点。

“左派”人士说：缔结的是蒂尔西特和约，是空前的和约。

蒂尔西特和约，指拿破仑打败普鲁士军队后，与普鲁士于 1807 年 7 月缔结的丧权辱国的和约，使普鲁士失去一半领土、赔款 1 亿法郎、裁军至 4 万人等。

列宁说：但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决心签订屈辱二十倍以至一百倍的条约，以便取得哪怕是几天的时间来撤出彼得格勒。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减轻工人人们的痛苦，否则他们就会遭受德国人的蹂躏；同时我们可以使我们所需要的物资更容易地从彼得格勒运出。但我还主张训练军队，待条件具备时废除屈辱的和约。

“左派”人士说：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就是投降。

列宁说：“投降”一般说来是件坏事。任何人士在显然不利的条件下放弃战斗也可以叫作投降，但是这样的投降却是严肃的革命者应该做的。把一般真理鼓吹过了头，就会变成谬误。

托洛茨基认为：签订和约出卖了乌克兰和芬兰。

列宁举例予以批驳：两个人突然遭到十个人的袭击，一个人进行抵抗，另一个人逃之夭夭，这是叛卖；但是，如果两支各为 10 万人的军队。同 5 支各为 10 万人的军队作战，其中一支军队被 20 万敌军包围了，另一支军队理应去援助。但是它知道，已有 30

万军队已经在那里设好埋伏，这时能不能去援助呢？不能。这不是叛卖，不是怯懦。这样做可以使军队不至中埋伏而保存下来，等待友军的到来，再与敌军战斗。在这里不能按决斗者的感情办事。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也是同样道理。明知自己没有军队，怎么打仗？要打就要遭到更大的损失和伤害。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退却，要赢得喘息时间，整顿军队，准备条件，准备将来再废除屈辱的和约。

“左派”人士说：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应作好丧失苏维埃政权的准备。如果苏维埃共和国灭亡了，别人将会举起我们的旗帜。

列宁十分迷惑不解地说：国际革命的利益为什么要求这样做呢？也许“左派”人士认为，国际革命的利益不允许同帝国主义缔结任何和约。按照这种观点，处在帝国主义列强中间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不能同帝国主义缔结任何经济条约的，但如果这样的话，就必须飞到月球上去，否则就无法生存。也许他们认为，国际革命的利益要求强行推动国际革命，而强行推动这种革命的只能是战争，决不是和平，和平只会给群众造成帝国主义“合法化”的印象。列宁认为这种理论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从来都否认“强行推动”革命，因为革命是随着产生革命的阶级矛盾的日趋尖锐而发展起来的。也许他们

认为，德国革命已经全面展开，所以我们应当拿出自己的力量，帮助德国工人，应当牺牲自己拯救已经开始决战而受到严重打击的德国革命。但这种前提是不存在的。德国革命虽然走向成熟，但还没有爆发。

从代表大会开幕时，反对派就处于少数地位。在代表大会进程中，又有一些曾拥护革命战争的代表为列宁的理论所折服，转到列宁的立场上来。这样，在表决列宁的关于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决议案时，有 30 票赞成，12 票反对，4 票弃权，列宁的决议案以多数票获得通过。

但事情至此并没有结束，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还需得到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批准。

1918 年 3 月上旬，列宁决定把首都从彼得格勒迁到莫斯科。这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列宁认为，德国人的进攻直接威胁着彼得格勒——这里毕竟离西方太近了。

新生的政权如同襁褓中的婴儿，而老谋深算的德寇则如同野兽，列宁担心它会突然闯入首都，把红色政权的堡垒一举摧毁。然而，一些人，包括工人和士兵都不能理解列宁的战略转移措施。他们既热爱首都，又热爱列宁和新政权。他们曾经一起在这座城市夺取了政权，现在则想誓死捍卫它。他们把这座雄伟壮丽的城市看作先进思想和技术的大门，看做是

胜利的象征，是布尔什维克的希望与骄傲，甚至期望着和西方无产阶级一起，去夺取更辉煌的胜利。因此，许多人反对列宁的迁都主张。

列宁也非常留恋着彼得格勒的一砖一瓦，这里的人民尊敬他，爱戴他，并非常听他的指挥。离城不远的芬兰湾海军基地的水兵们都听过列宁的演讲；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曾开进涅瓦河向旧世界的象征冬宫开炮；水兵和城市的赤卫队员曾多次在紧急情况下出色地执行任务……这一切，都使列宁眷恋着这块土地和这里的人民。可是严酷的现实使列宁丢掉了怀旧之情。他说服所有不愿离开斯摩尔尼宫的领导人和群众，果断地迁都莫斯科。他指出：“如果德国人把彼得格勒连同我们一举拿下，革命就完蛋了。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在莫斯科，彼得格勒的失陷只是严重的局部挫折。”

3月10日晚10时，列宁同其他中央委员和各部人民委员乘专列离开彼得格勒前往莫斯科。从此以后，莫斯科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首都。

在赴莫斯科途中，列宁写作了《当前的主要任务》一文。文章以俄罗斯著名诗人涅克拉索夫的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中的几句感人诗句开头：

你又贫穷，你又富饶，
你又强大，你又衰弱，
俄罗斯母亲！

显然，列宁在这里是要鼓励所有的人把莫斯科当做革命的新摇篮，要热爱它，保卫它，更好地建设新生的俄罗斯祖国。列宁默默地忍受着布列斯特和约带来的屈辱，号召人民：

“抛掉一切颓丧情绪和空谈。”

“咬紧牙关……兢兢业业干起来，……决不因失败而气馁，就一定能建成强大而富饶的俄罗斯。”

到莫斯科后，列宁夫妇和妹妹分到了两套带浴室的房间，房间在苏维埃大厦（即原来的民族宾馆）二楼的向阳位置，楼下是一个贩买家禽的自由市场。

后来，列宁夫妇又被安排到克里姆林宫内的一处住所。可是看房子时他们发现，那里又脏又破——天花板漏水，炉子不能燃煤，楼梯板破烂不堪。看来这里已经长久没有人居住了，必须进行彻底的修缮。于是列宁和妻子暂时在“骑士室”里住下来。那里的环境显得古老而幽雅，建筑风格神秘庄严，酷似一座教堂，可以方便地登上克里姆林宫向四处眺望，纵观全市的风景。在宫墙下面，有绿草如茵的通道，那里行人稀少，异常安静。列宁和夫人经常在那里的通道

上散步，青青草地上不知留了他们多少脚印。

3月14日，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列宁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然后各党派的代表展开热烈争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及追随他们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人最高纲领派为一方，形形色色的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为另一方，虽然他们各自所谈的论据和口号有所区别，但他们之间的共同点是：不应批准布列斯特和约。会议中进行异常激烈的辩论。

尽管有人妄图破坏批准和约，但代表大会用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决议案并批准了布列斯特和约。投赞成票的有784名代表，投反对票的代表只有261名，弃权的有115名。表决结果证明：代表大会的绝大多数代表站在列宁主张签订和约的立场。这是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取得的一个重要胜利。

布列斯特和约开始生效，苏维埃俄国得到了和平喘息的时机，她可以一方面建立红军，准备迎击帝国主义不可避免的进攻，另一方面着手组织国家的经济建设。

第二十七章 最初构想

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动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

——列宁

组织国家的经济建设，对列宁来说，这是一个新问题。他最初是怎样构想的呢？

从 19 世纪 90 年代起到十月革命以前，列宁对社会主义的探索都是理论上的。列宁 1917 年 9 月写成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便是这些探索的总结。

当时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社会分为三个阶段：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的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列宁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经济制度应该是：

剥夺资本家，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全体公民变为一个大“辛迪加”，即整个国家的工作者和职员，实行按劳分配；实行计算和监督，社会职能由政治职能变为管理职能，“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列宁在这里没有提到商品、货币、贸易等概念，这说明：列宁在这一时期是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商品和货币的社会的设想的。

但列宁不是教条主义者，他一向强调实践第一，理论来源于实践，一切要从实际情况出发。

在自己的著作中，列宁曾多次引用德国著名作家歌德的悲剧《浮士德》中的一名言：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

十月革命以前，列宁强调“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实践的重要性决不次于理论，而且只有这种实践才能对我们的原则作出真正的检验”。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同样强调作为实际工作更重要。他甚至这样说过：“在对富人和骗子切实进行惩治、限制，对他们充分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每一步，都比一打冠冕堂皇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议论更重要。”

十月革命刚胜利，列宁认为，除了和平问题，就是土地问题最迫切了。所以，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公布了《土地法令》，并作了关于土

地问题的报告。

“《土地法令》是社会革命党人产物!”一大厅里有人叫嚷。

列宁回答:就算这样吧,但法令反映了绝大多数农民的意志,我们是民主政府,不能漠视人民的意志。“至于究竟是按照我们的方式,还是按照社会革命党人纲领所规定的形式,并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在于使农民坚信农村中再不会有地主了,一切问题将由农民自己来解决,他们的生活将由他们自己来安排。”

列宁尊重实践,尊重大多数人的意志,没有死抠马克思主义关于如何解决土地问题的具体条文。

《土地法令》公布一两天之后,列宁又针对工厂企业的管理,起草了《工人监督条例草案》,规定“对一切产品和原材料的生产、储藏和买卖事宜均应实行工人监督。”。

一个月以后,列宁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经济制度:“工业国有化”、“银行国有化”、“国家垄断对外贸易”、“用强迫参加消费合作社的办法使消费集中”、“同奸商行为作斗争”,等等。

1917年12月中旬,列宁提出《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有关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规定一切股份企业为国家财产、一切富有阶级的股东经营业务时必

须接受工人监督、16至55岁的男女公民都必须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富人必须将全部现金存入银行。

1917年12月下旬，列宁提出《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规定现有的消费合作社一律实行国有化，消费合作社负责采购、分配和销售产品，每个公民都必须参加消费合作社。

以上措施都是列宁在战争烽烟弥漫、和约还没有缔结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在这时期，列宁还在策划组织竞赛的问题，写了《怎样组织竞赛？》一文。列宁写道：“现在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也许就是最主要的任务，是尽量广泛地发扬工人以及一切被剥削劳动者在创造性的组织工作中所表现的这种独创精神”。“社会主义不仅不窒息竞赛，反而第一次造成真正广泛地、真正大规模地运用竞赛的可能，把真正大多数劳动者吸引到这样一个工作舞台上，在这个舞台上，他们能够大显身手，施展自己的本领，发现有才能的人。”“现在当社会主义政府执政时，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组织竞赛。”“计算和监督，这就是……主要经济任务。”

1918年1月中旬，针对城乡严重缺粮的现状，列宁果断地指出：“要增派大量武装部队，以便采取最革命的措施运输货物、征集和交送粮食。”

1918年3月上旬，列宁在《党纲草案草稿》中提

出以下设想：用社会主义方式组织全国范围内的生产，用有计划的分配彻底地代替贸易，交易必须首先依法通过消费生产公社进行，普遍劳动义务制要逐步推行到不使用雇佣劳动而靠自己经营维持生活的小农中去，对产品的全部生产和分配普遍实行计算和监督、采取各种措施向公共伙食过渡。

1918年4月，列宁受党中央委托，写作纲领性文献《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在这一文献中，提出并论证了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要把主要力量转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思想，初步拟定出俄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方针和措施。

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国家取得了胜利。在这种情况下，掌握政权的俄国无产阶级尤其需要尽快地转向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追上发达国家，使社会主义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这是列宁领导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贯指导思想。1918年初，布列斯特和约刚一签订，列宁就立刻提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他一再强调社会主义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指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劳动群众的重要任务，是完成破坏性的工作；而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他们的主要任务却是进行积极的或者说创造性的工作，“对产品的生产

和分配实行最严格的普遍的计算和监督，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生产在事实上社会化”。列宁说，这是一个历史转折，由夺取政权、镇压剥削阶级反抗的任务，转到“组织对俄国的管理”。

苏维埃政权面临的新任务要求干部具备完成新任务的能力。列宁指出，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要求相应地改变领导人的职能。过去，领导人主要是从事政治斗争的职业革命家。而在新的历史时期，经济建设的任务把做实际工作的领导人和组织家提到了最重要的地位。根据这一情况，如果领导人不能适应新条件和新任务，就应当对他们进行适当的重新评价，适当的调动”。列宁号召各级领导人重新学习，增强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领，从外行变为内行。他还主张把那些具有清醒头脑和实际本领、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埋头苦干的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

列宁反复强调了使用愿意为苏维埃政权服务的科学技术专家的必要性。他深刻指出，没有各种学术、技术和实际工作领域的专家的指导，就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

列宁十分了解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应当把资本主义所积累的全部文化、知识和技术变为社会主义的工具，把苏维埃政权同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新的进步

的东西结合起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架设起从资本主义旧社会通往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桥梁”。

列宁还主张，在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中实行民主集中制，加强劳动纪律，反对无政府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民主制和生产中实行个人权力之间没有任何原则上的矛盾；大机器工业本身需要最严格的统一意志，千百人必须服从领导者所体现的这种统一意志；召开大会讨论工作这种可贵的民主精神要同铁的纪律结合起来，同劳动时绝对服从领导者的个人的意志结合起来。

1918年4月1日列宁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建议在关于劳动纪律的法案中应写入以下内容：所有生产部门必须实行计件工资或奖励制度；为了计算生产率和维护劳动纪律，必须建立工业法庭，建立不同行业的检查员组成的小组，吸收工程师、会计和农民参加；要采用泰罗制中所提供的一切科学的工作方法；应该公布各个企业生产率的表报；对不遵守劳动纪律的惩罚应该从严。

1918年4月中旬，列宁提出以下经济措施：彻底完成工业和交换的国有化；严禁把国有化企业看作是本单位职工或本工会的财产；实行全国范围的经济生活的集中化；强迫居民参加消费合作社并采取

措施向这方面过渡，等等。

1918年4月，列宁着手进行规划科技工作，写《科学技术工作计划草稿》。在这一文献中，列宁建议“成立一系列由专家组成的委员会，以便尽快制定俄国的工业改造和经济发展计划”，并第一次提出了国家电气化的思想，他要求特别注意促进工业和运输业的电气化以及在农业中运用电力。列宁的这一思想后来发展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论断。列宁指出：“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初期所采取的上述措施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因此是必要的。但是，采取这些措施的指导思想中含有逐步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成分，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构想的重要思想。列宁的这一思想随着国内战争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后来形成了战时共产主义经济制度。这种制度甚至写到党纲中。列宁1919年2月写完的《俄共（布）纲领草案》中又重申了关于用有计划的产品交换来代替贸易的观点，甚至提出更为激进的经济措施。列宁的这些思想都为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所吸收。

在十月革命至苏维埃政权初期以及后来国内战

争时期，列宁对社会主义的基本设想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无商品货币的产品交易、劳动纪律。列宁当时认为，按照这种构想建立起来的制度能够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

1918年至1921年春天以前，在估计发展道路时，列宁多半都是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这种设想出发的。列宁于1918年3—4月份写的文章《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和《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等文章充分表述了这些思想。列宁的“直接过渡”思想的含义是：由国家统一组织生产和分配，用直接产品交换代替商业贸易，逐步消灭商品货币，代之以实物化的经济制度。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这种思想的集中表现。当然，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也有其客观原因，这就是饥荒和战争。

第二十八章 饥荒笼罩

如果冬天来了，
春天还会远吗？

—— [英] 雪莱

残酷的世界战争给俄国人带来了贫穷与饥饿。俄国的青年人大批地牺牲在战场上，肥沃的土地在战火硝烟中变为焦土瓦砾。广大的乡村地区变得荒无人烟，老人、儿童和妇女们常因饥饿和营养不良而悲惨地死去。少数地主和投机商人把粮食囤积起来，伺机高价出售，每普特粮食赚到一百、二百以至更多的卢布，从而大发国难之财。新政权成立后，阶级敌人更加嚣张地进行破坏活动，。粮食问题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俄国人民的生存。

苏维埃政权已经看到了面包问题的迫切性。早在1917年11月，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军事革命委员会就曾派出征粮队到产粮省份征粮。1918年5月27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法令规定，由地方粮食机关组建工人征粮队，这些征粮队多数是武装的。1918年夏天，国内饥荒最为严重的时期，征粮队越来越普遍了。这些征粮队只能按固定价格购粮，或征用富农的粮食。征粮队所征购的粮食一半归派出征粮队的单位支配，一半上交粮食人民委员部。

组建征粮队是列宁解决饥荒问题所采取的一项紧急措施。

1918年4月的一天，列宁召开一个关于粮食问题的短会。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首先汇报了情况，他说：

“莫斯科只有一天半的存粮了，贮备已经耗尽。正往这里运送的那点粮食也无济于事。城市急需粮食。”

列宁说：“一切都十分清楚了，那就快点行动吧。要是今天能出发那就更好了。我们就等着粮食。我提议，不要单靠征粮队搞粮食，要把当地的贫农组织起来，他们是会跟我们走的。富农的粮食要没收，中农的则请他们卖出来。有没有鼓动员跟你们一起去？”

“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征粮队的武装如何？”

“很好。”

“人可靠吗？”

“都是经过革命考验的。”

“这一点很重要。要注意，不要让农民兄弟受委屈。如果有人抢劫，就审判和枪决！工人阶级的代表有责任向农民显示自己的阶级力量和纪律性。就是实行余粮收集制，也应该使人同情苏维埃政权。农民的心是向着我们的，但要切记，农村中成份不一。”

听完了列宁关于征粮问题的重要意见后，与会者们满怀信心地离开了列宁的办公室。第二天，他们带着征粮队出发了。

征粮队员主要由优秀的工人组成，一万多名队员实行军事编制，每队大约 75 人，配备指导员和政委，并带有机枪等各种武器。他们从投机商人和富农手中夺取粮食，征得的粮食一半留给自己，一半上交政府，以解决城市居民的口粮。征粮队在解决粮荒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尽管如此，粮食仍然供不应求。

饥荒同样笼罩着彼得格勒。

1918 年 5 月 8 日，人民委员会通过列宁提出的《关于粮食专卖法令的要点》。这一文献明确规定：凡有余粮而不把余粮运到收粮站者一律为人民的敌人，判处 10 年以上徒刑，没收全部财产，永远驱逐出村社。可见，为了同饥荒作斗争，为了保卫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列宁在粮食问题上采取了极为严厉的

措施。

1918年5月22日，列宁专门给彼得格勒工人写了《论饥荒》一信。列宁在信中指出，出现饥荒并不是因为没有粮食，而是由于资产阶级和富人在粮食问题上正在同苏维埃政权作最后的斗争。资产阶级和富人破坏粮食垄断，破坏固定价格，搞粮食投机，其手段就是贿赂、收买和恶意赞助一切危害苏维埃政权的行为。而苏维埃政权为了战胜饥荒，坚定地执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个根本的原则。这个原则中包含了社会主义的基础，社会主义力量的取之不尽的泉源。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呢？列宁认为：首先，必须实行国家粮食垄断，绝对禁止任何私人买卖粮食，全部余粮都必须按照固定价格交售给国家。其次，必须严格地计算一切余粮，妥善地把粮食从余粮区运往缺粮区，建立供加工、消费和播种用的储备粮。第三，必须在无产阶级国家监督下，公平地把粮食分配给公民，富人不得享有特权和优待。

在给彼得格勒工人的一封信中，列宁充满激情地写道：

“个人行动，分散作战，决不能战胜饥荒和失业。需要先进工人到幅员广大的全国各地去进行大规模

的‘十字军付伐’。需要派出人数数十倍的有觉悟的、无限忠于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所组成的钢铁般的队伍。那时我们就能战胜饥荒和失业。那时我们就能使革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的真正的前提。”

在中央和列宁号召下，志愿参加征粮队的应召者像洪水一般涌来。但也有些人瞻前顾后，顾虑重重。当时的彼得格勒市委书记扎斯拉夫斯基借到莫斯科开会之机及时向列宁汇报了这一情况。

“响应您的号召，工人和企业领导们都在踊跃地参加征粮队。”

“是呀！那太好了！”列宁高兴地夸奖道。

“但也有人认为：彼得格勒是前线，不能让它空虚。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优秀分子到农村去。”

“这些人是谁？”列宁急忙问。

“季诺维也夫、拉舍维奇……”

“要无产阶级优秀分子保卫停工的工厂？无动于衷地眼看着老婆孩子挨饿？工人们又能从谁那里得到援助呢？他们能指望谁呢？这种反对真是岂有此理”说到这里，列宁有些激动了。他稍微停顿了一会儿，然后提高了嗓音，作了果断的指示：

“你们要大胆地行动，建立征粮队，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要从群众中来，从基层中选拔优秀分子到领导岗位上来。”

扎斯拉夫斯基仔细地听着列宁的每一个指示，他虽然没作笔记，但却把每一个字都牢牢地印在了脑子里。

派遣征粮队到农村去征粮，是解决饥荒、实行粮食垄断政策的重大措施。实行国家粮食垄断等政策，在法律上已有明文规定，可实际上每走一步都遭到破坏。俄国农村的财主，富农，土豪，鱼肉乡里几十年，现在他们又靠投机、酿酒来赢利发财，并且把造成饥饿的罪过推到苏维埃政权身上。那些富农的辩护士——立宪民主党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则公开和秘密地反对粮食垄断。左派社会革命党也是毫无气节，他们在革命浪潮面前惊慌失措，害怕同富农作斗争，提出提高固定价格、允许私人买卖、抗议粮食专卖等口号。一时间，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1918年5月，列宁派斯大林到察里津去征收粮食。他到那里后给列宁拍回一封电报，说那里“投机盛行、一片混乱”。斯大林表示一定要严厉地制裁反革命分子。斯大林立即给巴库的邵武勉写了一封信要求他“对达吉斯坦的其他匪帮，如果他们阻挠火车开往北高加索的话，要特别无情地对待他们；焚烧他们的村庄，把一系列村庄烧成灰烬，使他们不敢再袭击火车。”

有人向列宁反映斯大林打击手段的残酷性，仁慈的列宁被这种暴力行为震惊了。但是，面对千百万饥饿的人民，面对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他一时找不到更好的解决措施。

在征粮队的工作中，列宁也发现有些人不顾政策，盲目行动，伤害了许多自己人。对于这样的事，列宁知道后是从来不放过的。

他和负责征粮的同志谈话时，曾多次热情地嘱咐他们：既要加强纪律，也不要伤害自己的领导和同志。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列宁于1918年6月曾签署了在农村成立贫农委员会的法令。但有些农民委员缺少政策和道德教育，他们以征粮为名，随便抢劫私人粮食和物品。一些农村的流氓、无赖借机肆意犯罪，使农村的斗争人为地尖锐起来。7月，列宁到乡下视察时发现了农村抢粮斗争的普遍性和残酷性。他亲眼目睹了农村里出现的野蛮、惨无人道的“面包战”——一些男人和女人被活活打死或烧死。列宁对此感到无比惊讶。

8月18日，列宁发出一个通知：强调贫农委员会的性质和作用。力图扭转当时的状况。可是只收到一定效果，抢劫粮食的暴行仍然继续着。

通过认真观察，列宁认为：这样一个小农经济国

度里，许多人都抱着：“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想法，只关心狭隘的个人私利。针对这一点，列宁作了多次讲话，深刻剖析了小私有者的危害性，教育农村干部们摆脱自私、愚昧、落后和残忍，建设好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通过调查研究，列宁还了解到农村的小资产阶级势力是何等的猖狂：有些贫苦农民刚刚分到了地主的粮食和财物，转过脸来，就开始作投机倒把生意，高价倒卖粮食。还有些农村中的流氓恶棍利用对敌斗争的手段趁火打劫，扩大斗争面，伤害了良民百姓……这些都增加了斗争的尖锐、复杂性。

粮食投机生意甚至在莫斯科也很盛行。列宁曾亲眼见到了这样的人。

6月的一天，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乘车到郊区去，他们在大街上走着，并没有人注意他。克鲁普斯卡娅和一个生意人攀谈起来，问他生活怎么样，有没有粮食吃。那人肥头大耳，一副暴发户的嘴脸。他说：

“生活得很不坏呀。”

他一边抖着口袋，一边抽着香烟，得意洋洋地说：

“我们有很多粮食，现在正闹粮荒，我们可以高价卖出去，挣钱挺容易。”

还没等克鲁普斯卡娅说话，生意人又好奇地问：

“你是从哪儿来的呀？”

“我是彼得格勒人，刚来莫斯科不久。”

“彼——得——格——勒——人……”那人马上想到了列宁，但他并不知道，列宁就站在他的面前。他沉默一会儿接着说：

“我真不明白这个列宁，他真不通情理。他的妻子需要一架缝纫机，他就下令到处没收缝纫机。听说，现在整个克里姆林宫都堆满了缝纫机……”

列宁夫妇听到这儿，禁不住笑了起来。

但笑过之后，列宁又陷入沉思。他从这些小私有者身上看到了农民的落后心理，俄国农村低下的生产率、愚昧无知和缺乏教育等现象。他知道摆在苏维埃面前的任务太艰巨了。

1918年，饥荒笼罩着整个5月，接着来的6月7月和8月就更为艰苦了。当时饥荒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从下面这件事就可以略知一二：当时连最负责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都吃不饱饭，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和交通人民委员部的马尔柯夫等人也在饿肚子。有一次，瞿鲁巴正在开会，突然因饥饿而晕倒在办公桌上。

列宁对同事非常关心，为此专门给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写信，要求立即给全体部务委员（以及相近职务的人）一笔补贴，给他们增加一点营养。

其实，列宁本人的食品供应也不好，经常缺糖、茶和米，更不用说肉类和黄油了。列宁的午餐是由克里姆林宫食堂供应的，质量很糟糕，只有稀汤和黍米粥，有时增加点咸肉和红鱼子，仅此而已。

列宁在困难时期总是首先想着别人，而自己则严重格遵守有关规定，反对搞特殊化。

有一次，克里姆林宫的警卫队长马尔科夫给列宁送来一桶油质酥糖。列宁看见后发了脾气，埋怨他不该违反有关规定。

列宁身边的女服务员优龙曹娃回忆起这样一件事：

“那时我总是预备 15 个人的面包，每人是八分之一磅。有一次弄错了，我领到 25 份。我发觉了，但是我想：正好我们需要呢。于是我想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一天到晚工作，几乎什么东西都不吃。因此我给他送去茶和比平日要多的面包，然后在房里磨蹭着不走，我想他是会称赞我的。伊里奇注意到面包，隔着报纸看了一下，就对我说：

‘伏龙曹娃同志，你为什么弄来这么多面包呢？只应有八分之一磅呀，你从哪儿弄来的？’

他看了我这么一眼，使我不得不说实话了。我告诉他，是发面包的女孩子弄错了。

我说：‘没关系，他们有许多面包，架子上都堆

满了。吃吧。’

‘优龙曹娃同志，你以为他们只考虑我们以及你所照顾的那些人吗？’

列宁说着，便切下了份外的面包。‘把多余的还回去，以后再也不要这样了。’”

当时，克里姆林宫储存一些食品，以备不时之需。常有一些领导人写来条子，要求给某些人以照顾。可是，有时负责管理食品的同志主动想往列宁家送些食物，但总是遭到拒绝。

其实，人们出于对革命领袖的爱戴从全国各地给列宁寄来了很多食品，如果把这些食品包裹堆在一起，可以成为一座小山。可是，列宁总是把这些食品转送给学校和保育院的孩子们，从不给自己留任何东西。

克里姆林宫卫队长马尔科夫回忆起了这样一件事：

布琼尼将军到了莫斯科，带来了许多礼物。他问马尔科夫，如何将第一骑兵师的战士赠送给列宁的小礼物转交给他。马尔科夫说可以由他转交。布琼尼不同意，非要亲自转交不可。

可是第二天，列宁打电话让马尔科夫到他家去一趟。

列宁对马尔科夫说：

“昨天布琼尼到我这里来了，他是一位极好的同志！他带来了一些食物，请您转交给保育院，给孩子们，一定得给孩子们。”

马尔科夫把布琼尼将军送给列宁的食品，送给了保育院，列宁什么食品也没有留下。但是，他的脑子里留下了无尽的思考和强烈的激励：社会主义俄国一定能顺利地克服一切挫折，一定能克服旧势力所造成的经济破坏。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

1918年是严重饥荒的一年。按照列宁的说法，当时的处境“危急万分”，“很难相信共和国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真正支持下来。”

7月29日，列宁在一次讲话中着重谈到饥荒与阶级斗争问题。他指出：粮食危机加剧了，新粮下来之前是一个最艰苦的时期。帝国主义企图割断苏维埃政权与产粮区的联系，富农积攒了巨额财富和大批粮食。富农是俄国反革命运动的主要的和最强大的支柱。“没有一个村庄没有发生贫苦农民和一部分没有余粮、早已吃完余粮、没有参加投机活动的中农同一小撮富农之间，也就是大多数劳动者向富农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一阶级斗争已经深入到每个村庄。”“在这里，阶级斗争已经深入到了源头”。

富农囤积粮食，制造饥荒，这是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一种最阴险的手段。列宁对富农的态度是坚

决果断的，剥夺他们的粮食，镇压他们的暴乱。

尽管形势极为严峻，充满了危机，但列宁仍然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说：“但是我们坚信，我们一定能度过这‘通常的’（如在 1794 年和 1849 年那样）革命进程并战胜资产阶级。”

列宁把 1918 年夏天的危机同富农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动联系起来。列宁告诫工人阶级：富农疯狂仇视苏维埃政权，恨不得把工人斩尽杀绝。欧洲历次革命的经验都证明，如果工人表现软弱，向富农让步，那就是倒退——从共和国倒退到君主制，从劳动群众的政权倒退到剥削者的独裁。在资产阶级政权被推翻后，富农就都同外国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共同反对本国工人。

8 月 9 日，列宁致电奔萨省执行委员会，指出：“必须组织经过挑选的可靠人员加强防卫，采取无情的群众性恐怖手段对付富农、神父和白卫分子；把可疑者关进城外集中营。”

8 月 10 日，列宁致电奔萨省执行委员会库拉耶夫，指出：必须最坚决、迅速、无情地镇压富农的暴动，没收参加暴动的富农的全部财产和粮食。

8 月 12 日，列宁还致电奔萨省执行委员会的敏金，指出：镇压富农暴动应趁热打铁，还要利用这一机会普遍地、无情地镇压粮食投机商，没收大地主的

粮食并广泛发动贫苦农民，巩固临近前线地区的贫苦农民的政权。

当得知敏金在镇压富农时手软这一情况后，列宁马上于 8 月 14 日致电给他，指出：如果情况属实，那就是对革命的犯罪。

镇压富农是列宁在国内战争时期的一项重要活动内容，列宁把这一斗争看作是最后一次决战。为此，列宁于 1918 年 8 月上半月写了《工人同志们！大家都来进行最后的决战！》一文。

第二十九章 陷入合围

我们宣誓：是的，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们将在自己在岗位上竭尽全力进行战斗，决不会在向我们进攻的世界反革命势力面前放下武器。

——列宁

列宁把反对富农的斗争称为最后的决战，他指出：“俄国最后一个、也是人数最多的一个剥削阶级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了。当然，富农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它得到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支持。”

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所争得的和平喘息时机没有持续多久。苏维埃共和国同德国及其同盟者缔结的和约，使协约国帝国主义者深为不满。所以，尽管协约国还没有取得对同盟国集团的胜利，但仍然决定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其目的是帮助俄国境

内的反革命势力打败苏维埃政权，侵占俄国的领土，并迫使俄国继续参加帝国主义战争。

为了掩盖自己的阴谋活动，干涉者们找了一个借口，说俄国需要协约国来帮助消除“德国的危险”。这一极其荒谬的理由竟成了它们侵占俄国北方和远东的根据。

1918年3月2日，英法军事司令部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摩尔曼斯克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缔结了一个“口头协定”，在防御德国入侵的借口下，保证英法的军队能够占领摩尔曼斯克边疆区。

3月6日，英国“格格里号”巡洋舰陆战队在摩尔曼斯克登陆。

3月13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帮助俄国反对德国，接着美国的“奥林区亚号”巡洋舰开赴摩尔曼斯克。

3月18日，法国“奥布海军上将号”巡洋舰也驶抵摩尔曼斯克。

4月5日，日本和英国军队在苏维埃共和国远东边疆区登陆。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一方面向全世界揭露了外国武装干涉者的阴谋伎俩，一方面要求全国作好反击外国侵略者的准备。

在日军登陆的当天，西伯利亚苏维埃中央执行

委员会就作出决议，抗议日本政府的非法行动，宣布西伯利亚处于战时状态，命令各地方苏维埃立即着手组织红军，抵抗入侵。

列宁的反映非常迅速，4月5日即致电西伯利亚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表示完全赞同他们的决议，并建议储备粮食及其他食品，以便切实做好防御工作。“我们预定今天开始同大使们谈判。显然，现在对任何保证都不能相信，只有我们自己认真做好准备工作才是唯一可靠的保证。”

但是，有些地方领导人仍然幻想与协约国和平解决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列宁起草了给伊尔库茨克的直达电报，电报指出：不要抱幻想，日本人进攻是不可避免的。协约国集团都可能帮助日本人。因此，必须毫不迟延地立即开始全力以赴地进行准备。应该特别注意正确地退却，运走储备和铁路器材。要准备炸毁铁轨，运走车厢和机车，在伊尔库茨克附近或外贝加尔一带布设地雷屏障。

与此同时，德国军队也在向俄国步步进逼。德军占领乌克兰后，又占领了克里米亚，侵入顿河州，进攻高加索，还企图偷袭苏维埃俄国的黑海舰队。5月8日，德军和哥萨克白匪占领了顿河畔罗斯托夫，在顿河州建立了克拉斯诺夫将军的反革命专政。同时，在德国军队的帮助和立宪民主党、十月党的支持下，

乌克兰的政权也转到德国傀儡斯科罗帕茨基手中。实质上，这意味着地主资产阶级君主制已经在这些地区复辟，这必然使所有反革命分子的气焰又嚣张起来。

国际上，苏维埃俄国同德国的关系日益紧张，德国要求把伊诺炮台交给芬兰资产阶级政府。伊诺炮台在俄芬边界线上，与喀琅施塔得共同构成了保卫彼得格勒的屏障。另外，英国不顾苏维埃政府的抗议，继续占领摩尔曼斯克，并准备向内地推进。针对这些情况，俄共（布）中央于5月6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了国际形势，并由列宁起草了《俄共（布）中央关于国际形势问题的决定》和给俄罗斯联邦同乌克兰进行谈判的和谈代表团的电报稿。列宁在这些文献中指出：“向德国的最后通牒让步。拒绝英国的最后通牒。（因为对德战争将直接带来比对日战争更严重的损失和灾难。）”列宁还指出：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军事管制；尽一切力量保卫乌拉尔—库兹涅茨克地区，尽量与乌克兰签订和约，虽然这一和约要带来新的兼并。

列宁认为，只要军事协定不违背苏维埃政权的原则，能够巩固苏维埃政权和阻止帝国主义强国对它的进攻，我们绝不一概拒绝同一个帝国主义联盟的军事协定。

5月13日中央委员会批准了列宁起草的包含上述思想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提纲》。同一天，受党中央委托，列宁在莫斯科市党代表会议上以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上作报告，并把《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提纲》作为决议案在会上提出。代表会议以多数票通过了《提纲》。不久，苏维埃共和国又受到了新的威胁。1918年5月底，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发生叛乱。这次叛乱是协约国实施其武装干涉计划的一个最重要环节。

在俄国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是由奥匈军队的战俘组成的，有45000人。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允许捷克斯洛伐克人经过西伯利亚和远东去法国。然而，协约国的当权者却企图利用这个军团来达到其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目的。法国和英国政府给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领导人1500万卢布，美国为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提供1200万美元的贷款，以便他们购买武器，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军官同社会革命党一起在士兵中间进行反苏维埃政权宣传，欺骗他们：苏维埃政府打算把他们关进集中营，要想返回祖国就必须诉诸武力，拿起武器。这样，受欺骗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士兵们便组成了一支协约国侵略军。正如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外交代表1918年6月4日声明中所说：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是同盟军，受协

约国的保护和关注。

1918年5月底至6月初，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沿着从奔萨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一线铺开，发动了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叛乱。他们先后占领了车里雅宾斯克、新尼古拉耶夫斯克、奔萨、塞兹兰、鄂木斯克、萨马拉和乌法。6月29日，叛乱分子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发动反革命政变。7月6日，宣布该城接受协约国保护。

这一叛乱使苏维埃共和国陷入了十分艰难的境地。叛乱分子以及和他们一起行动的白卫分子占据大片领土：西伯利亚以及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的部分地区。这些地区的沦陷使苏维埃共和国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粮食基地，这就意味着饥荒会继续加剧。苏维埃政权反击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这条战线，成为1918年夏季和秋季的最主要战线。其战争在当时决定着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命运。

在策动了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叛乱后，1918年7—8月，帝国主义者借口保护叛乱分子，进一步扩大武装干涉。7月2日，协约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在巴黎决定“控制住西伯利亚”。7月6日，在华盛顿决定“要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巩固下来，给捷克斯洛伐克人以帮助”。随后，大批日本、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士兵陆续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

在北方，外国武装干涉者于7月初占领了直到凯姆的摩尔曼斯克铁路北部沿线，枪杀了当地的苏维埃领导人。

同时，协约国开始向俄国东南部地区进犯。英国侵入土耳其斯坦和外高加索。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占领石油基地巴库。7月31日，巴库苏维埃政权垮台。受协约国支持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达什纳克党人建立起自己的“政府”。

土耳其斯坦在英国人指使下也发生了叛乱，成立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政府”，肆意迫害枪杀布尔什维克。

1918年7月29日，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对苏维埃俄国的艰难处境和复杂形势作了这样描述：“我们看到，北方有摩尔曼，东部有捷克斯洛伐克的战线，东南方有土耳其斯坦、巴库和阿斯特拉罕，英法帝国主义铸造的包围圈几乎已经合围了。”

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武装干涉对俄国国内的反革命分子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他们开始重新集合起来反对工农政权。正是这种外国武装干涉，是俄国国内战争不断升级的决定性因素。正如列宁所说：造成苏维埃俄国国内战争并使它拖延

下去的真正祸首，是世界帝国主义。

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列宁十分强调必须遵循以下原则：既然是残酷的战争，那么一切都应该服从于战争的利益，整个国内生活都应该服从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在这一点上不容许有丝毫的动摇。

第三十章 镇压叛乱

革命非常彻底地使每种主张都得到了合乎逻辑的结局，无情地揭露了每个错误策略的一切缺陷和全部罪恶。

——列宁

苏维埃政权陷入敌人的全面合围之中，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武装干涉者的入侵和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叛乱，使被苏维埃政权打败的反革命势力复活了，他们开始蠢蠢欲动，恢复了地主资产阶级的经济秩序，白卫分子的部队也纷纷建立。列宁认为，反革命势力的社会基础是被无产阶级革命打垮了的资产阶级、地主、旧官僚和旧军官以及哥萨克的富裕阶层，白卫军的群众基础是富农。

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叛乱以后，富农分子开始集结成大规模的武装部队，疯狂地迫害共产党员和贫

农积极分子，颠覆苏维埃政权。在西伯利亚，富农用欺骗办法把部分中农拉到自己一边，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则极力帮助富农进行这种欺骗。这也是外国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分子在西伯利亚以及伏尔加河流域取得暂时胜利的主要原因。

在当时，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人民社会党人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扮演了反革命帮凶的角色。在苏维埃政权被推翻的地方，小资产阶级妥协派成员同白卫分子和资产阶级政治家一起参加由外国干涉者扶植的傀儡政府，有时还成为政府的主要领导人。

列宁称这些参加傀儡政府的小资产阶级政党领导人为叛徒。

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还利用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的困难、饥荒和经济崩溃，在苏维埃政权所控制的地区进行反革命活动。他们积极参加一些反革命地下组织，企图用武力推翻苏维埃政权。所有这些组织都同外国武装干涉者有联系，实际上是他们的帮凶。

1918年6月1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指出那些竭力破坏苏维埃政权威信并在企图推翻它的党派不能继续留在苏维埃内。于是，右派和中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孟什维克分子都被开除出

苏维埃。但他们很快就转入地下，仍然继续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破坏活动。

1918年7月初，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反苏维埃的叛乱。

1918年6月24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通过发动叛乱的决定。

7月5日，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作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总结发言。他深刻地批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倾向于战争，说他们已经堕落到了难堪的地步：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列宁此话的意思是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事与愿违的，因为他们本意还是爱国的，但按照他们的意见行事，是达不到战胜敌人的目的的。列宁此时已觉察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要冒险了。

7月5日晚，大会照常进行，代表们陆续登台发言。突然，一颗手榴弹在会场的一个角落里爆炸了，引起了一片混乱。当时主持大会的斯维尔德洛夫非常冷静，其他布尔什维克都很沉着，会场很快就平静了下来，会议照常继续进行。

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发生的流血事件很快就在莫斯科传播开来。

7月6日14时左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代表雅·格·布柳姆金和尼·安德列耶夫在其中央委员会

的指使下，持伪造的证件，混入德国大使馆，投掷了一颗炸弹，炸死了德国大使米尔巴赫伯爵。

7月6日15时左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爆发了，他们向克里姆林宫开炮，炮弹击中布拉戈维申斯克教堂。叛乱分子逮捕了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和莫斯科苏维埃主席斯米多维奇，并且占领了电报局、电话局，发布了宣言和通电，似乎政权已掌握在他们手中。

得知德国大使被炸死后，列宁立即前往德国大使馆，向德国表达了对于政治挑拨事件的愤慨之情，并说正在采取一切措施查找凶手，以便交付特别革命法庭审判。列宁还慰问了被害者家属，并发表了《致俄共各区委员会、各区苏维埃、各红军司令部》电话稿，通告德国大使被杀事件，指示动员一切力量来搜捕凶手。

7月6日傍晚，列宁紧急召见司法人民委员斯图契卡、拉脱维亚苏维埃步兵师政治委员彼得松和达尼舍夫斯基，向他们布置镇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的战斗任务。

“拉脱维亚步兵的士气如何？要把城外霍登卡的拉脱维亚部队调入市区。”列宁说道。

达尼舍夫斯基回答：“只要一听到人民委员会的号召，他们就会赶来反对叛乱分子。如果弗拉基米尔·

伊里奇能抽出点时间来接见驻克里姆林宫的拉脱维亚团的指挥员，并同他们谈话，那会是很有作用的。”

列宁稍加思索，便同意了。

深夜，静悄悄，偶而有枪声打破夜空的寂静。拉脱维亚步兵团的几个指挥员与达尼舍夫斯基一起走进人民委员会主席接待室。不一会儿列宁就来了。虽然由于劳累，列宁的脸色显得有些灰白，但眼睛还是那样炯炯有神。列宁同这几位军人握了手，用充满信心的口吻对他们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公开叛乱了。为了使国家免遭一场新的战争破坏，必须立即毫不留情的把他们消灭掉。”

指挥员们都表示坚决完成任务。列宁热情地鼓励了他们之后，便走进另一房间：那里还有更重要的工作在等待着他。

7月6日夜間，迅速集结起来的苏维埃政府部队把叛乱分子所在地区团团包围起来。

7月7日晨5—6时，革命军队开始猛烈炮击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司令部，敌人死伤惨重。12时，叛乱分子司令部开始乱作一团，并准备撤退。

战斗进行得非常顺利。7月7日16时，苏维埃政府发表通告：叛乱已彻底平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被粉碎……

仅仅一天多一点的时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蓄

谋已久的叛乱就被镇压下去了。这一仗是列宁同志亲自领导和指挥的，打得干净利索。他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从背后打击工人阶级的叛徒行径无比愤怒。但他镇定自若，从容不迫。只有在他提问、尤其在他得不到满意答复的时候，才能透过那异常苍白的脸色、十分严峻的目光和急促的动作，觉察到他内心的焦急。列宁要求迅速、果断、毫不留情地消灭一切叛乱分子。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莫斯科叛乱之后，东方面军司令、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穆拉维约夫声明忠于苏维埃政权，并决定退出左派社会革命党。列宁的眼光十分锐敏犀利，当即表示要对他“继续加以严密监督。”

果然不出列宁所料，穆拉维约夫的声明是他要的一个花招。其目的是为了掩盖他的叛变活动。当他收到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关于在莫斯科已夺得政权的电报后，便立即参加了叛乱，煽动东方方面军反对苏维埃政权，并联合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向莫斯科进军。7月10日，穆拉维约夫来到辛比尔斯克，宣布不承认布列斯特和约，并向德国宣战。

苏维埃政府采取紧急措施来制止穆拉维约夫的冒险活动。7月11日，苏维埃政府发表通告，宣布穆拉维约夫是俄国革命的叛徒和敌人。穆拉维约夫拒

捕，被当场击毙，他的同伙也作鸟兽散了。

许多人对此迷惑不解：为什么左派社会革命党走上公开武装叛乱的道路？经过分析，列宁得出结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忠于俄国民粹派的思想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不同。“在 worldview 的一些根本问题上有了分歧，到了困难的历史关头必然要表现出来”。他们闭着眼睛不看现实，不考虑国内外客观条件，结果铸成大错。

第三十一章 狠毒女人

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希望落空了。
伊里奇活下来了。

——克鲁普斯卡娅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由于与布尔什维克世界观不同，走上叛乱之路。还有的人，由于与列宁的世界观不同、政见不同，则走上了暗杀的通路，企图置列宁于死地。

1918年夏天以后，战火在全苏维埃俄国境内愈烧愈旺。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白卫分子经常发动叛乱，搞暗杀等恐怖活动。著名布尔什维克、出版委员沃洛达尔斯基就是在这期间遭到杀害的。

1918年8月30日上午，列宁接到急电，得知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乌里茨基也被杀害了。列宁立即派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赶赴彼得格勒调查、处理这一案件。

列宁，这位地主资产阶级政权的第一掘墓人，当然是敌人暗杀名单上的第一个人。乌里茨基的遇害只不过是一个黑色信号，敌人下一步就要对列宁下手了。于是，莫斯科委员会决定取消列宁当天晚上粮食交易所大厦和米赫里逊兵工厂的群众大会上的两场演说。

在那个年月，列宁早已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只要有宣传群众的机会，他是绝不会放过的。尽管他知道，危险就在眼前，当天晚上，列宁仍然坚持要去发表演讲。别人很难说服他。

中午，克鲁普斯卡娅把布哈林请到家里吃饭，劝说列宁放弃今晚的危险行动。可是，不管布哈林怎样劝说，列宁总是避而不谈这个问题，或者半开玩笑地说：“我要到那里去，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列宁的妹妹玛丽亚·伊里基奇娜因病呆在家里，下午五点多钟，当她听说列宁执意要去参加演讲时，要求陪同列宁一起去。但是，列宁坚定地说：

“无论如何不行，呆在家里好好休息吧！”说完，他没带警卫人员就一个人走了。

人们的担心并非多余，社会革命党人策划暗杀列宁的阴谋已经酝酿多日了，只是因为列宁总是在工人群众当中，他们一直没有找到时机。这一次，预先进行了精心的安排。他们派出的刺客是一个心毒

手狠的女人卡普兰，她十分爽快地应承了这项安排。她以为完成这项特殊使命将可一鸣惊人，并会博得所有反苏维埃势力的欢呼。在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她在男伙伴诺维科夫陪同下提前赶到了列宁演讲的地点。

列宁首先来到巴斯曼区群众大会现场。在那里，列宁发表简短而精彩的讲话：

妥协派被革命清除以后，又在乌克兰、高加索、西伯利亚和伏尔加河流域重整旗鼓。在那里，他们推翻了地方苏维埃，把布尔什维克活动家交给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和白卫分子去折磨。资本家和地主狂欢宴饮，而工人和农民则在痛苦地呻吟。土地交给了贵族，工厂还给了业主。八小时工作制废除了，工农组织被取缔，沙皇的余党和旧制度重新肆虐横行。“让每一个在政权问题上还摇摆不定的工人和农民看看伏尔加河流域，看看西伯利亚，看看乌克兰吧，那时他自己就会得出明确答案。”

在巴斯曼区群众大会上讲话之后，列宁立即赶到莫斯科河南岸区原米歇尔逊工厂参加另一个群众大会，并发表同样主题的讲话。

会场设在最大的榴弹车间，那里聚集了数不清的人群。没有讲台，没有坐位，列宁站在车间的一个制高点，又开始演讲了。在他的面前，是一双双渴望

获得真理的眼睛，是一付付充满革命激情的面孔。他们热爱自己的领袖，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领袖表达真实的情感。一时间，台上台下几乎融为一体，任何人不会想到，这时刻，竟有刺客和杀手正准备行动，竟有罪恶的子弹将射向领袖的身驱……

列宁那铿锵有力的话语仍在宽敞的车间里回荡着：

我们只有一个信条：任何从事劳动的人都有权享用生活资料，吸劳动人民血的寄生虫则不得享用。我们宣布：一切属于工人，一切属于劳动者！我们当前的任务是：不要理会资产阶级强盗的无耻叫嚣，全力以赴开创自己的革命工作。我们应当把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把那帮屠杀工农群众的匪徒消灭干净。

在结束讲话时，列宁高呼：“我们的出路只有一条——不胜利，毋宁死！”这最后一句话，深深震撼了每一个人的心——这位布尔什维克的领袖竟如此坚定，如此视死如归。狠毒女人卡普兰几乎都为之感动了。她不仅心在颤动，而且手也在发抖，面对如此受人民爱戴的领袖，她怎么能下手呢？可是，这个亡命之徒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她的同党和上级都在监视着她，她只能充当他们的炮灰和替罪羊。

刺客及同伙首先离开了会场，来到列宁必经的路口，等待着下毒手的时机。

演讲完毕，整个车间立即沸腾起来，掌声和欢呼声响成了一片。工人们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簇拥着列宁离开了榴弹车间，他们多想再望望列宁的身影，再听听他的声音。列宁的前后左右围满了热情洋溢的工人群众，其中有年长的、年轻的；有男人，也有女人；而带凶相的男人诺维科夫和狠毒女人卡普兰也混在这些当人当中，佯装成列宁的拥护者紧紧注视着列宁的脚步。男凶手诺维科夫快步走近列宁身旁，一边喊着“让列宁同志先走”，一边用手推开列宁身边的几个工人，似乎是在为列宁开道让路，实际上是在为凶手卡普兰制造一个开枪的机会。卡普兰意识到时机已经到来，她迅速地掏出一支手枪，向列宁的胸口连开了三枪。顿时，列宁倒在血泊之中。

工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震惊了。刹那间，工厂的院内突然变成了愤怒的战场，工人们握紧了仇恨的铁拳，立即把狠毒的暗杀凶手卡普兰捉住了。另一些工人迅速把列宁抬上汽车，护送回克里姆林宫的家中。

卡普兰被捕了。她的暗杀活动并没有取得完全成功。这个女人在动手前已经失魂落魄了，尽管她的枪法很好，但在当时，她的眼、手、脑已经不属于她自己控制了，她早已被列宁的力量所征服。她的手在不停地颤抖，一枪打中了列宁的右手，又一枪，子弹

射进了列宁的肩膀，第三枪斜过去了，子弹仅在列宁的背后留下了一个罪恶的痕迹。

列宁的大衣是他在1917年4月由国外回国时穿的，一直到逝世为止，这件大衣连同背上的弹痕一样随着列宁度过了他的后半生。这是列宁为革命事业出生入死的极好见证。

晚上八点半钟，人民委员会原定有一个会议。由于列宁未到，所以改为九点钟开。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担心也在迅速增长——他不会出什么意外吧？人们焦急地盼望着，等待着。当听到列宁遇刺的消息后，参加会议的人民委员一起来到了列宁的住地……

列宁的亲人更是焦急地等待着。妹妹玛丽娅怀着不安的心情站在窗口盼望那辆熟悉的汽车驶回家中。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她看到了令人吃惊的情景：司机跳下车来，慌忙打开车门。一些陌生人将列宁从汽车上扶下来。吃力地向前走着。见此情景，玛丽娅飞快地奔下楼去。列宁脸色苍白，嘴唇发青，呼吸微弱，但他神志异常清醒。他平静地安慰妹妹，说只是受了点轻伤。显然，他害怕亲人们为他着急，担心。

玛利娅把列宁安顿在床上躺下，工作人员们惊慌地忙乱着，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使列宁少受痛苦，

脱离生命危险。司机吉尔立即开车去接克鲁普斯卡娅，想让她思想有所准备。见到列宁夫人后，吉尔悲伤地叙述了列宁遇刺的经过，并安慰她说“伤势不重”。克鲁普斯卡娅急切地问：

“您只要告诉我一点，伊里奇是不是还活着？”

吉尔尽力劝解克鲁普斯卡娅，说：“问题不大，还能走路呢。”

克鲁普斯卡娅心急如焚地赶回家中，看到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们全都来了，个个神情都很严肃，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她想快步走到列宁的卧室，但是，双腿却不听使唤，好不容易才来到列宁的床前。看到自己的妻子，列宁柔声地说：“你回来啦，累了。去休息会儿吧。”为了不让列宁激动，她轻轻走出房门，站在门边，远远地望着列宁。关切的人们川流不息地前来询问列宁的伤势，人们看到列宁躺在床上，面无血色，有气无力地呻吟着：“没什么，只是手臂有点痛。”

很快，列宁的住所成了抢救室，这里有日夜值班的医生和护士，有各种药品、消毒用具和抢救器械。医生们发现：列宁被一颗子弹打断肱骨，造成骨折。另一颗子弹从背后肩胛骨方向进入身体，引起大量出血，子弹嵌入颈部前面的皮下。

列宁的伤势是严重的，一连几天，都没有脱离危

险，有时医生甚至找不到脉搏。而列宁却毫不介意地说：“不要紧，不要瞎担心。”

当天夜里，斯维尔德洛夫签署了列宁遇刺事件的通报。通报说：“工人阶级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自己的力量，用无情的群众性的镇压来对付革命的敌人，来回答对自己的领袖的谋刺。”

卡普兰现在已经后悔莫及。她怨恨自己当初不该接受这种毫无把握的罪恶勾当。

刺杀列宁事件不仅造成了卡普兰这个狠毒女人的自我毁灭，而且使阴谋杀害列宁的社会革命党受到严重的打击，左派社会革命党也开始瓦解。它的很大一部分党员都不支持其领导机构的冒险行动。这两个党的大部分成员后来都参加了俄共（布）。

经过几天的顽强拼搏，列宁奇迹般地脱离了危险，健壮的身体和坚强的革命意志使他战胜了伤痛。

为了不使列宁的肌体再受损伤，医生暂时没有取出体内的那颗子弹。然而，那却是一颗极其可怕的子弹：这是一颗被剧毒药物浸泡过的“达姆弹”。被伤害过的人很难活长久，而它却在列宁的体内留存了四年之久。

然而，列宁并不知道这一切。一周以后，他刚能写字，就用铅笔给农业人民委员写了一封短信，询问农村工作情况。他焦急地写道：“任何地方都没有材

料说明工作在热火朝天的进行！”他还在信中抱怨说：“很遗憾，您没有来。您不应当听信那些‘过分热心的’医生的话。”

9月11日，喀山战役大获全胜。列宁立即去贺电：

“我热烈祝贺红军的辉煌胜利。”

9月12日，列宁的家乡辛比尔斯克城解放了。红军第一集团军战士致电列宁说：

“亲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们收复了您的故乡，这是对您所受的一处枪伤的答复，为了答复第二处枪伤，我们要收复萨马拉！”

列宁复电说：

“我的故乡辛比尔斯克的收复，是包扎我的伤口的一条最有效的最好的绷带，我顿时觉得精神极好，力量骤增。我祝贺红军战士的胜利，并代表全体劳动者对他们付出的一切牺牲表示感谢。”

这些天，医生们一直在报上不断地发表诊断公告，向人民报告列宁的健康状况。9月18日发表了最后一次诊断公报，宣布了列宁的健康业已恢复，允许他进行工作。在这份公报上面，列宁高兴地题了字。

“根据这份公报和我的良好健康情况，我个人衷心地请求不要打电话和提出问题来打扰医生。”

实际上，列宁负伤后仅仅半个多月，他的健康并

未完全恢复。医生们不得不再建议列宁到离莫斯科不远的哥尔克的政府休养所去休养。列宁犹豫之后同意了。

在休养地，列宁会见前去看望他的高尔基。高尔基回忆说：“我去看他时，他的手还不能运用自如，他的被射穿的脖子，也只能勉强地移动。就像人们谈论令人生厌的事情那样，他很不乐意地回答了我的愤慨：

‘打架。有什么办法呢？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本事行动的。’”

列宁同高尔基的会见是非常亲切友好的。但由于高尔基对苏维埃政权的许多措施不理解，甚至提出反对意见，所以列宁是以一种惋惜的神情注视着这个“迷路的人”的。

讲了一会儿话后，列宁热情地对高尔基说：“谁不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超然于历史之外的人——只是一种幻想。就算以前有过这样的人，可现在没有了，不可能有了。谁也不需要这样的人。所有的人，都被卷进了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的现实的漩涡之中。您说，我把生活看得过于简单了吗？这种简单化有毁灭文化的危险吗？”

列宁提出的问题引起了高尔基的深思……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是一位人类文化事业的忠诚

捍卫者，是文人和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虽然出身贫穷，但他并不完全赞同无产阶级和革命政党的激烈言行，特别是不能理解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尽管如此，他仍然由衷地佩服列宁本人的品德和才能，他是以矛盾的心态与列宁结识的唯一朋友。他认为列宁是一个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他从自己的胸膛里掏出燃烧的心，为人们照亮前进的道路……现在列宁被凶手刺伤，高尔基震惊不已！他对资产阶级的幻想破灭了。高尔基以期待的目光注视着列宁并仔细地聆听列宁的教诲。

接着，列宁的目光变得更加锐利了。他好像已经洞察了高尔基的矛盾心态：对农民、对文化、对立宪会议、对共产主义，等等。他用一种深沉有力的声音继续说道：

“嗯，在您看来，几百万拿着枪杆的农民岂不是对文化的威胁吗？您以为立宪会议会克服他们的无政府状态吗？您经常指责农村的无政府状态，应当比别人更了解我们的工作。必须给我国群众指出一种很简单的道路和方法。”

“工人和知识分子的联盟，对吗？”

“这很不错。告诉知识分子，让他们到我们这里来好了。据您看，他们是真心诚意地为正义的利益服务的吗？请他们到我们这边来吧：我们正担负着唤起

人民、向世界说明生活的全部真理这一巨大任务，我们给各民族指出了一条通向光明的康庄大道，一条摆脱贫困和耻辱的道路。”

听到这里，高尔基深为感动——列宁劝知识分子“到我们这边来吧”，多么纯朴感人的语言！多么真挚诚恳的感情！高尔基本人是个著名的文学家，大知识分子，在这方面，他与列宁是同行知己。但在政治观点上，他却与列宁持有不同的政见。然而，这种思想上的分歧丝毫没有妨碍他们的友谊。相反，高尔基特别希望通过从这位导师和朋友那里得到真理和力量，得到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和灵感。于是，他开诚布公地向列宁倾吐了他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和矛盾心理。

听着听着，列宁突然大笑起来。接着，他和颜悦色地说：

“我还为此吃了知识分子的一粒子弹。”高尔基还谈到，无产阶级革命打碎了坛坛罐罐，而知识分子是不希望出现这样的局面的。

对此，列宁懊恼痛心地说：

“难道我没有说过知识分子是我们所必需的吗？可是您看到他们都充满了敌意，不懂得目前的要求。他们也没有看出：没有我们，他们就没有力量，就不会被群众了解。要是我们把坛坛罐罐打碎得太多，那

将是他们的过错。”

在同高尔基的谈话中，列宁表达了自己对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的关系的看法：无产阶级需要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离不开无产阶级。

由于列宁受伤和几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遇害，斯维尔德洛夫 9 月 2 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宣布：会议通过了关于对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实行群众性的红色恐怖的决议。

刺杀列宁的卡普兰那年只有 35 岁，本是个柔弱女子。对父母可能是娇女，对丈夫可能是贤妻，对子女可能是良母。但是，她向人民敬爱的领袖列宁举起罪恶的手枪，射出凶残的子弹。所以，她对人民，对革命，又是一个狠毒的女人。这个狠毒的女人的背后有一个党——社会革命党。十月革命以后，社会革命党公开进行反苏维埃政权的活动，于 1918 年 6 月初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此后，他们开展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并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恐怖、暗杀活动。卡普兰是社会革命党的恐怖活动的一部分。

1918 年 9 月 3 日，卡普兰被执行枪决。第二天，《消息报》上发表一项正式通告：“根据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决定，向列宁同志开枪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范妮·罗伊德（卡普兰）已于昨日被枪决。”

列宁读到这条消息时，自言自语道：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苏维埃俄国国内战争时期是一个混乱的年代。在这一时期里，列宁本人既经历过恐怖事件，也经历过盗贼的抢劫。

1918年严冬，天空灰暗，狂风怒吼，冰雪断道，周围一片白茫茫。

整个苏维埃俄国正在经历一个痛苦的时期。经济破坏严重，工业陷于停滞，食品和燃料严重不足，商店大门紧闭，满街都是严重妨碍交通的雪堆。经济破坏还引起了各种严重后果，其中之一便是偷窃、抢劫和土匪活动。强盗拦截汽车，然后驱车到机关和私人住宅抢劫，他们还冒充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为非作歹。这样一些案件是司空见惯的。

值勤民警为了维持治安，打击犯罪，经常拦住汽车，检查司机和乘客的通行证。

列宁的汽车也常常被拦，民警要列宁出示通行证。有一次，司机没有注意到民警的信号，没有按照他的要求立即停车，民警就朝天开了枪。

事后，列宁批评那个民警说：没有调查清楚乘客是什么人之前，切不可随意开枪。

民警是认真负责的，保安措施是多种多样，十分严密的。尽管如此，但拦路抢劫、杀人抢财等犯罪活

动仍然相当猖獗。1919年初，列宁也成了一次抢劫的受害者。

克鲁普斯卡娅当时在离莫斯科不远的索科里尼的林间学校养病。列宁经常去那里看望她。1919年1月的一个星期天，列宁和妹妹以及警卫切巴诺夫和司机一起乘车去看望克鲁普斯卡娅。那天晚上，林间学校要举行儿童节庆祝会和枞树联欢会，全校师生都希望列宁能按时到达，同孩子们一起高高兴兴地过节。

傍晚6时左右，列宁一行人出发了。在汽车行驶的索科里尼奇公路上有很多行人，熙熙攘攘。当汽车行驶到一个拐弯的地方，突然响起了一阵口哨声，引起列宁注意。当汽车驶近铁路桥的时候，突然响起了严厉的吆喝声：

“停车！”

列宁想，又遇上检查证件的民警了。由于害怕不停车他们就放枪，所以就让司机立即停车，汽车停了下来。令人吃惊的是拦车的三个人迅速地把列宁一行人都赶下车来，并把手枪口对准列宁的太阳穴，并翻抄他的口袋，搜走勃朗宁手枪和克里姆林宫的通行证。

列宁一再对这几个人说：“我是列宁。”但他们并不理睬。

妹妹乌里扬诺娃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时民警还没有穿制服，也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民警。乌里扬诺娃冲向用手枪对准列宁太阳穴的那个家伙。她说：

“你们想干什么，这是列宁同志！你们是什么人，拿出证件来。”

三个强盗跳进汽车，随即开足马力向索科里尼奇方向疾驰而去。强盗门的动作迅速利索，甚至没有引起过路人的注意。

列宁一行人留在路上。司机吉尔说：“我手中有枪，但不敢开，因为强盗的手枪正对着列宁同志的太阳穴。”

列宁沉思一会说：“不开枪是对的。”

事情发生后，列宁等人步行来到了索科里尼奇苏维埃，报告完出事的经过后，立即乘车赶往林间学校参加孩子们的晚会去了。

后来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专门以自己的这段亲身经历为例，说明在一定条件下妥协的必要性：

“假定您坐的汽车被武装强盗拦住了。您把钱、身份证、手枪、汽车都给了他们，于是您摆脱了这次幸遇。这显然是一种妥协。‘DO utdes’（‘我给’你钱、武器、汽车，‘是为了你给’我机会安全脱险）。

但是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发疯的人会说这种妥协‘在原则上是不能容许的’，或者说实行这种妥协的人是强盗的同谋者（虽然强盗坐上汽车又可以利用它和武器再去打劫）。我们同德帝国主义强盗的妥协正是这样一种妥协。”

经过动荡不定的 1918 年——1919 年，列宁顽强地战胜一次次的谋杀与暗害，仍像巨人那样继续挥动那支已经受过伤的手臂，指挥着革命航船奋勇前进。然而，那颗带毒的达姆弹仍在列宁体内暗暗地，一点一滴地侵蚀着他的健康，一分一秒地蚕食他宝贵的生命。但这一切，都是在三年以后才知道的，历史的遗憾已经无法挽回了！

第三十二章 揭露叛徒

考茨基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忘记了任何国家都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忘记了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机器。

——列宁

必要的妥协与可耻的叛变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要善于加以识别。

1918年10月初，列宁开始写作《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一重要的著作。

列宁在展望世界发展前途时写道：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客观条件使全人类陷于非抉择不可的境地：要么让千百万人去送死，整个欧洲文化遭到彻底毁灭；要么是把政权交到革命无产阶级的手中，实现社会主义革命。

事情很快证明，列宁的估计是正确的。俄国成功

地进行了无产阶级革命，退出了战争。这使资本主义各国的劳动人民坚信：除非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否则无法把千百万人从战争、饥饿和死亡中拯救出来。各国无产阶级正在力图按照俄国的榜样去行动。

列宁指出：现在，不仅在以前沙皇帝国疆界之内的各国，还是在西欧各国，无论是各中立国还是遭受战祸的各国（奥地利、德国），都发生了声势浩大的“苏维埃”运动。德国的革命一开始就采取了“苏维埃”形式。奥匈帝国也同样。“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工业社会化”的口号在欧洲和北美广泛传播。工人们站了起来，夺取了生产管理权，实行了社会化。然而，这些工人还没有认识到：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专政，否则就不能实现人民政权的理想和把一切生产资料转交给人民。

在出现革命高潮的同时，工人的群众性组织也蓬勃发展起来。但刚起来斗争的群众最初往往轻信改良主义，而对要求根本改革旧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纲领则不易理解。改良主义者用内战、饥饿、贫困、经济崩溃等可怕的灾难来恐吓群众，掩盖资产阶级民主这一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的实质，同时又通过自己的组织、工会、合作社给群众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即单靠实行一些民主改革就可以结束资本主义。

有的机会主义者竭力证明，资本主义作为整个体系还在继续向上发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为时尚早。有的机会主义者把进步同革命、民主与专政对立起来，硬说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只能损害社会进步和推迟无产阶级的社会解放。

有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则企图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说成是某种“军事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列宁批评这种观点，他写道：德国的普列汉诺夫分子称之为“军事社会主义”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就是使工人服军事苦役，使资本家的利润得到军事保护。

卡尔·考茨基发展了这种反动的帝国主义理论。与其他社会沙文主义者不同，考茨基同马克思主义决裂的方式不是替帝国主义辩护，而是幻想和平的资本主义。他断言，不应当把帝国主义理解成资本主义一个阶段，而应当理解成金融资本采取的政策。他认为，金融资本不改变其实质就能放弃侵略，推行和平政策。考茨基提了出超帝国主义论，认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掠夺政策将会被一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所代替，这种政策是：国际资本联合起来共同剥削世界，以此来代替相互斗争。

列宁指出：世界资本主义的确在朝着一个全世界的托拉斯的方向发展。但是，在各国金融资本超帝

国主义地联合成一个世界托拉斯之前，帝国主义就必然要崩溃，变成自己的对立物。考茨基用超帝国主义论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似乎金融资本的统治削弱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矛盾和发展的不平衡。其实，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在剧烈增长，并必然导致军事冲突，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解决这些矛盾。

列宁在自己的许多著作里都指出，超帝国主义论的真正意图，是在资本主义仍然是唯一的世界经济体系时，用可以保持持久和平的希望来对群众进行安慰。考茨基使劳动人民离开当代尖锐的矛盾，去注意所谓新的未来的超帝国主义的虚假前景。列宁着重指出：在考茨基的理论里，除了欺骗群众以外，没有任何新东西。

列宁粉碎了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的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论，在全面研究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制定了新的、科学的帝国主义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出了最伟大的贡献。

考茨基是大战期间中派的主要代表。由于沙文主义者同本国的帝国主义政府公开合作，名誉扫地，工人群众纷纷离开了他们。于是，中派就充当了社会沙文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作为一种政治现象，中派主义在客观上所起的作用在于：依靠虚伪的

统一口号不使老的社会民主党分裂，保持住社会沙文主义领袖们对群众的影响，阻碍革命工人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中派主义之所以特别危险，是因为它能够更灵活地使无产阶级利益服从小资产阶级利益，并经常用假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掩盖这种政策。

俄国十月革命后，在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中，考茨基是第一个开始反对列宁的理论和政策，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呢？考茨基自己后来对此作了回答：“布尔什维主义思想不仅对斯巴达克派，而且对日益增多的大批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也具有巨大的影响。”无产阶级群众越来越多地离开老的机会主义领袖而转向马克思主义一边。正是这一点迫使考茨基很快拿起笔来，想用自己的威望来阻止布尔什维主义深入到工人意识中去，用他自己的话说，防止工人头脑发昏。

1918年8月，考茨基在柏林出版的《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一文，号召各国社会民主党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

9月20日，列宁在《真理报》上看到《是民主呢还是专政》一文的摘要，10月初，他又读了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确认考茨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于是立即动手写作《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

考茨基》一书。在这部著作脱稿之前，为了尽快地占领阵地，列宁又于10月9日用同一题目写了一篇文章。列宁在这篇文章中说，考茨基的“这本书在可耻、可恶和背叛的程度上，比伯恩施坦那本有名的《社会主义的前提》要高出百倍。”

考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一书主要追求两个目的：一是歪曲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学说，用改良主义来偷换它；另一个是诽谤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指责无产阶级专政是灾难的根源。

考茨基的这部著作批评了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的东西——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企图引导工人阶级离开无产阶级革命中的迫切问题，涣散其斗志，使他们沉湎于资本主义可以自然进化到社会主义这种改良主义幻想。

考茨基回避对现代资产阶级国家进行阶级分析和批判，提出“一般民主”和“一般专政”的问题，认为民主绝对好于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对建设社会主义是不适用的。

考茨基避而不谈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权对革命工人的镇压。他一再强调，不消除阶级矛盾，民主也会使政治斗争具有和平的形式。按照考茨基的说法，议会制民主造成了一种条件，在这种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不同，将以经济的、立法的

和精神上的和平手段来进行，而不是采用暴力的手段”。但他忘记了一点：在资本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由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领导的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力量，是走这条道路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考茨基以学者的面目出现，他要西欧工人相信：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违反自然发展阶段的尝试。他讽刺布尔什维克好象是一个缺乏耐性的孕妇，为了加快分娩而拼命地跳。考茨基还片面地曲解列宁的观点，他把布尔什维克描写成不懂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唯一意志论者：盲目地相信意志万能，尽管俄国经济非常落后，搞社会主义的条件还不成熟，但仍然想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考茨基恶毒地把布尔什维克描绘成篡权者，说他们强行解散合法的代表机构立宪会议；说他们把所有不同意布尔什维克纲领的社会主义党派都排斥出政权，对所有持不同政见的人实行恐怖，建立最落后阶层的专政，把苏维埃从战斗组织变成国家组织。

以上便是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一书的主要思想。正是这些思想促使列宁立即拿起笔来，写作《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

1918年九、十月份，列宁受重伤不久，身体的伤痛是可想而知的。但他时刻在考虑着当时的一些重大问题：首先是如火如荼的国内战争；其次就是考茨

基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的攻击。对考茨基的攻击没有给予应有的回击，这使得列宁感到忧心忡忡。1918年9月20日，列宁以担忧的口吻写道：“考茨基的无耻谰言，胡说八道和庸俗不堪的机会主义使人不禁要问：为什么我们对考茨基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行为不作任何斗争呢？连梅林和蔡特金这样的人也竟然较多地‘从道义上’（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而很少从理论上同考茨基划清界限，这种情况能够容忍吗？”。

1918年10月初，列宁刚刚从重伤中康复，便以虚弱之躯集中全力写作《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同考茨基中派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他夜以继日地赶写这部著作。11月10日该书脱稿。12月在莫斯科出版。1919年在德国出版。1920年和1921年，分别在保加利亚、英国、阿根廷、美国、拉脱维亚、法国和意大利出版。

列宁的声音很快就传遍了欧美各国。

列宁同考茨基的论战是工人运动中两个派别即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思想政治斗争的表现。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列宁不仅批评考茨基主义，而且雄辩地证明：布尔什维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实践方面，是以往所创造的优秀成果的继承者。列宁的这本书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捍卫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

该书中把重点放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因为考茨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伪造马克思主义，曲解俄国革命经验和苏维埃政权的实质的。他故意把无产阶级国家同资产阶级国家的关系，无产阶级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归结为两种不同方法即民主方法和专政方法的对立。考茨基说，关于过渡时期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论断是马克思偶然说的一个词儿，考茨基建议以后一般不再使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字眼。

列宁批评了考茨基的这些谬论，他写道：“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公式是在历史上更具体、在科学上更确切地说明了无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任务，而这个任务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52 年至 1891 年这 40 年间，总结了 1948 年革命和 1871 年革命的经验而经常谈论的。列宁揭示了马克思的公式的内容，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资产阶级社会的任何法律约束的。这个政权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挫败阶级敌人的反抗，是为了镇压无产阶级的敌人。

列宁花费很大精力揭露批判了考茨基关于立宪会议优于苏维埃体系的谬论。考茨基说，立宪会议是全体人民的机构，苏维埃只是一个阶级的机构；因

此，苏维埃可以作为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而不应成为国家组织。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考茨基的论断证明他实际上转到了资产阶级方面。列宁进一步指出，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胜利了的工人阶级需要什么样的国家时就说过：“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而考茨基，一个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说，已经组织起来并同资本进行决战的无产阶级，不应该把自己的阶级组织变成国家组织。这说明，考茨基已经背弃无产阶级的利益，宣扬或维护资产阶级国家的不可侵犯性，他的观点是荒谬绝伦的。

在回答考茨基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攻击时，列宁自豪地说：布尔什维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普及到了全世界，把这个词从拉丁文译成俄文，又译成世界各种文字，并且以苏维埃实例表明：甚至一个落后国家中的工人和贫苦农民都能够在极大的困难当中，在同剥削者的斗争中，保持住劳动者的政权，建立起比以往的一切民主都高得多的民主，开始实现社会主义的创造活动。

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经典之作。该书全面总结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世界历史性胜利的丰富的斗争经验，有力地打击了中派主义——当时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

主要障碍，从而大大推动了正在发展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列宁深刻地揭露了考茨基这一无产阶级革命叛徒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从而使他永远失去了绝对正确的盛名，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这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

第三十三章 共产国际

一场新的、按其力量和深度来说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无产阶级运动已经蓬勃地开展起来，这场运动决不是任何旧框框限制得住的……

——列宁

布尔什维主义即列宁主义的发展过程伴随着同国内外各种错误思想流派的争论。列宁主义为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策略基础。1919年3月上旬，列宁亲自创立了第三国际。

由于欧洲革命形势迅速发展，革命无产阶级迫切需要联合起来。因此，早在1917年提出的四月提纲中，列宁就已经把建立第三国际看成是一项最重要的实际任务。他写道：现在我们党的处境要求我们必须立即建立第三国际。除了我们，现在谁也做不到这一点，而拖延是有害的。

然而，191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四月代表会议没有赞同列宁的意见，并通过了错误决定：仍然留在中派占优势的齐美尔瓦尔德联盟里。那时大多数党员还不了解，考茨基分子在齐美尔瓦尔德联盟中已取得优势，并导致这个联盟政治思想的蜕变。季诺维也夫千方百计地散布对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种种幻想，在四月代表会议和会议以后坚持认为，建立第三国际为时尚早。

季诺维也夫低估了中派主义不断增长的危险，反对马上同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决裂，认为可以把联盟中的大部分人吸引过来。他在1917年6月说过：要是现在把齐美尔瓦尔德国际抓住就好了。列宁对此的回答是：我认为这是极端机会主义的和有害的……这意味着抛弃我们的原则，忘记我们为反对中派而说过的一切，使自己陷入混乱，声誉扫地。

列宁认为，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已经完全过时了，布尔什维克如不同它断绝关系，就很难建立第三国际。1917年四月代表会议后，列宁指出，必须纠正代表会议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1917年夏天和秋天，列宁多次给中央和中央在国外的代表机构写信，要求尽快召开共产主义者的国际代表会议，以便建立一个只由左派组成的革命国际。

但是，季诺维也夫之流都竭力抵制列宁的指示。

他们认为建立共产国际的条件尚未成熟，召开左派代表会议必将失败，因为参加代表会议的人数将是微乎其微的。

列宁对这种观点予以批驳，他于 1917 年秋天在从芬兰写来的信中说：如果要等待大量的参加者和由于现在参加者太少而难为情，那是无比愚蠢的。因为在现在，不管参加者有多少，这样的代表会议将是一种思想力量，再晚一些它可能就无声无息了。列宁还指出：党的第七次（四月）代表会议和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及布尔什维克的新的纲领草案，这已经是足够的思想基础，足以在全世界面前明确地回答帝国主义的问题，列宁的这些意见没有被接受，但是，它们对于共产国际的组织准备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十月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国际形势，并为建立共产国际创造了有利条件。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依靠国际工人运动中左派团体的支持，采取了一系列筹建共产国际的具体措施。

1918 年 1 月，在彼得格勒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者有布尔什维克以及瑞典、挪威、英国、美国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还有波兰、罗马尼亚、捷克等国的国际主义者。会议决定：必须召开左派国际代表会议，并且以下列条件为基础：一、各党和各组织赞

成走上反对本国政府的革命斗争道路，立即实现和平；二，支持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

1918 年底，建立第三国际的斗争进入最后阶段。各国纷纷建立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小组，这意味着第三国际事实上已经产生并开始活动，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把这些分散的共产主义队伍联合起来，这样就会大大增加他们的力量和扩大对群众的影响。这项任务之所以特别紧迫，还由于改良主义者正在加强活动，要尽快恢复第二国际。鉴于这种情况，俄共（布）中央 1918 年 12 月 24 日致电第三国际的支持者，指出：“叛徒和反革命分子正在组织的国际有一个明显目的，即要建立一个反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堡垒。为了与这个国际对抗，各国共产党人应该团结在事实上已经建立的第三国际即革命国际的周围……。”

1919 年 1 月，在莫斯科举行了国际会议，一致同意接受列宁关于近期召开第三国际成立大会的建议。苏俄、波兰、匈牙利、奥地利、拉脱维亚、芬兰的共产党代表，以及巴尔干社会民主党联盟和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代表签署了宣言。宣言简要地阐述了正在建立的第三国际的思想政治纲领，确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目的，策略和组织原则。宣言还号召各个兄弟党和组织讨论建立共产国际的问题并

参加共产国际成立大会的工作。这一号召，在各国革命工人中得到了最广泛的响应。

1919年3月1日，列宁领导到达莫斯科的各国代表举行预备会议，讨论即将召开的共产党国际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等问题。由于各国反动派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阻挠，真正的大党和一些国家的代表未能出席会议。鉴于这种情况，会议决定：这次代表会议不作为共产国际的正式成立大会，只是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它的任务是制定纲领，选举执行局，向各兄弟党发出联合起来的号召。

1919年3月2日晚，克里姆林宫大厅里灯火明亮，会场一片寂静，代表们好奇地环顾四周，又把目光投入主席台。列宁在主席台上站起身来，目光炯炯有神，看样子已恢复健康。他庄严地宣布大会开幕，并致了简短的开幕词。

参加代表会议的共有欧洲、美洲和亚洲的21个国家35个组织的52名代表。其中19个组织有表决权，16个组织有发言权。他们代表以下国家的共产主义和左派社会主义的政党和团体：奥地利、保加利亚、大不列颠、匈牙利、德国、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荷兰、挪威、波兰、罗马尼亚、苏俄、芬兰、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美国、伊朗、土耳其、中国和朝鲜。

参加会议的只有俄共（布）是真正的大党，芬兰、奥地利、匈牙利、荷兰、波兰、德国的共产党都是刚成立不久，大多数与会者只是本国共产主义小组或左派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所代表的组织仅仅是未来共产党的萌芽。共产国际当时的主要任务之一，实际上就是要帮助这些“萌芽”尽快成长起来，奠定牢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列宁被选为代表会议主席团的常务主席。3月3日晚，会议讨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纲领草案。草案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的主要论点，其中谈到：帝国主义战争已变为国内战争，一个新的时代——资本主义瓦解、崩溃的时代，共产主义革命的时代诞生了。

纲领草案中指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已成为很多资本主义国家的直接任务。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是简单地更换政府人员，而是摧毁旧的国家机器，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建立新的无产阶级的管理机构。新的无产阶级国家保证对人民实行真正的民主，这个民主是反对资产阶级的。它保证工业无产阶级的优势地位，但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目的，而是为工人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实行社会经济改造的一种手段。最近的经济任务是剥夺剥夺者，把大工业和地主的产业转归无产阶级国家所有，对小的产业绝不应剥夺。

无产阶级要同一切站在无产阶级专政立场上的工团主义分子等结成联盟，支持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以促使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彻底崩溃。

纲领草案进行记名投票表决，除弃权外，全体一致通过。这说明，纲领已经确认列宁主义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

3月4日，列宁在会上作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报告。列宁深刻剖析了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局限性，论证了由无产阶级专政取代它的历史必然，并详细阐明了苏维埃政权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的意义。列宁认为，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开始的情况下，除了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以外，不可能有任何中间道路，幻想走第三条道路是小资产者的反动的悲叹。他指出，德国中派要把苏维埃制度同国民议会结合起来，即把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的企图，是荒唐可笑的。

列宁指出：西欧各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向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说明，新的无产阶级民主的历史意义，它在政治上和历史上的必然性，列宁批评说，有些共产党人不大关心苏维埃制度的普遍推广。其实，只有在城市工人和农村无产者都组织成苏维埃的时候，胜利才会是有保证的。所以，绝对必要的

任务是尽快地推广和组织苏维埃。列宁最后强调：作为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部队，各国共产党应当力求在苏维埃中取得稳固的多数，这样我们的胜利就有保证，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共产主义革命。否则，胜利就不容易得到，即使得到了，也不会持久。

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被大会一致通过。大会还决定组织出版和宣传这个提纲，把它当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纲领性文件。

3月4日晚，由于新的代表的到来，建立第三国际的问题，又被提出来了，奥地利和匈牙利共产党、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利巴尔干社会民主联盟的代表提出一项共同建议：成立第三国际是历史的需要，应当实现。他们进一步指出：第一，争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要求有一个团结统一的国际组织；第二，为了反击伯尔尼国际分裂国际无产阶级的企图，必须成立第三国际；第三，如果在这次代表会议上不成立第三国际，就会削弱共产党人的力量，加剧动摇分子中间的混乱。

辩论以后，全体代表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参加表决。除德共代表弃权外，其他代表都赞成立即建立共产国际。立即建立共产国际的决议通过了，全体代表们激动得高唱无产阶级的颂歌，祝贺共产国际的光

荣诞生。

因此从 1919 年 3 月 4 日起，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已经作为共产国际第一次（成立）代表大会开始工作了。

列宁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是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指导思想，在此基础上，共产国际通过了一系列文件，这些文件为国际无产阶级提供了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战斗纲领，明确规定了各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和策略。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建立共产国际领导机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该委员会由苏俄、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巴尔干联盟、瑞士、斯堪的纳维亚共产党的代表组成。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国际意义十分巨大。它正式宣告了共产国际的成立。在列宁思想的指导下，这次大会总结了十月革命为中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各国无产者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联合起来奠定了基础。这次大会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团结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向改良主义者的伯尔尼国际进行斗争。欧美的无产阶级同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劳动人民也第一次联合起来。列宁认为，共产国际的基础是牢固的，他写道：“在革命中，只有无产阶级群众争取到的东西才是牢固的。只有真正牢固地争取

到的东西才值得记载下来。1919年3月2日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宣告成立，这一事实中不仅记载了俄国的无产阶级群众争取到的东西，而且记载了德国、奥地利、匈牙利、芬兰、瑞士的无产阶级群众争取到的东西，一句话，记载了国际无产阶级群众争取到的东西。”

列宁在论述第三国际的历史地位时写道：“第一国际为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奠定了基础。第二国际是为这个运动在许多国家广泛的大规模的开展准备基础的时代。第三国际接受了第二国际的工作成果，清除了它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脏东西，并已开始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十四章 党内争论

我觉得，我们的代表大会应当完全在这种建设和组织工作的标志下进行。党纲中那些在理论上难于解决的问题归结起来主要是建设方面的问题，这次代表大会议程又专门列入组织问题、红军问题、特别是农村工作问题，——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主要问题即组织问题上，这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但对社会主义者来说又是一个能收到最大成效的任务。

——列宁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蓬勃发展。列宁领导苏维埃政权在国内战争中也坚强地挺住了，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1919年3月中下旬，列宁主持召开俄国共产党

（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制订新的党纲。

早在上一年年底，列宁领导的苏维埃共和国同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战争就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击退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分子的进攻后，红军把乌克兰、顿河州、拉脱维亚、立陶宛、乌拉尔地区的大部分和几乎整个顿巴斯都从敌人手里解放出来。

可见，协约国 1918 年和 1919 年年初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失败了。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外国进行大规模武装干涉以来，“我们被敌人团团围住，奋起自卫，夺回苏维埃俄国的每一寸土地”，“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引以自豪的是，我们经受住了这个考验，尽管历尽千辛万苦，我们还是捍卫住了劳动者的政权”。

苏维埃政权的初步胜利，使西方列强十分害怕，特别是英、美、法等国首脑一时感到不知所措。

1918 年底，英国国王乔治举行了一个有各国首脑参加的宴会。晚宴之后，乔治在大厅里问美国驻俄大使费朗西斯说：“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对付俄国呢？”

弗朗西斯说：

“陛下，依我看来，盟国应当推翻布尔什维克。——派遣大军携带足够的粮食，去拿下彼得格勒”。

“对，就应该这样！”乔治国王非常赞同地点头说。

而在场的美国威尔逊总统却不同意这么干——他深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同时也害怕本国的军队倒戈。这确实是他们大伤脑筋的问题。

1919年1月，协约国举行了十人委员会，他们公开承认对俄国武装干涉的失败，但不同意强打硬拼式地击败苏俄。

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态度很明确，他说：共产主义是一种“社会和政治危险”，但征服它办法应是和谈，而不是武力征讨。

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也认为：如果用武力镇压，军队就会起来造反。他担心地说：“我们从哪里找到能够帮助我们进攻俄国的军队呢？”

很显然，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俄国国内的反动势力身上。

劳合·乔治建议邀请苏维埃政府和白卫政府的代表共同参加和会，以便进行停止内战的谈判。美国总统威尔逊也同意这一建议。最后，十人委员会通过了这一建议。

其实，这是一个为欺骗舆论而耍的手段。原来协约国反对苏维埃政权是以自己的军队为主力，他们遭到失败后，改由俄国国内的反革命军队以及西部

和西北部与俄国交界的几个小国的军队充当主角。他们准备发动由所有反苏维埃力量参加的、目的在于包围布尔什维克的联合进攻，由他们供给武器、服装和金钱。协约国的军队则在占领区担任军事警察，为反革命提供基地和后方。

协约国企图用和谈来挽救俄国白卫军，使他们能够在自己占领的领土上巩固起来。但出乎他们的预料的是，苏维埃政府同意参加和谈，像过去布列斯特和约那样做出重大让步。列宁认为：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后，苏维埃政权得到巩固，欧洲革命运动发展了，白卫分子的后方则被削弱，所以，深信即使再签订作出重大让步的条约，也将是暂时的。

然而，协约国实际上并不希望签订和约，也不打算停止同苏维埃共和国的战争。这样，白卫分子在他们的授意下拒绝参加和谈。结果这次和谈就没能举行。

1919年1月18日开始举行巴黎和会。这次会议上，协约国的头子们详细制定了扼杀苏维埃共和国的计划和措施。他们公然说：对协约国几个大国来说，最迫切的问题是尽快推翻苏维埃政府。于是，他们大力扶持俄国内部的反动分子高尔察克、尤登尼奇和邓尼金等。

1919年春天，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力量是高

尔察克的军队。

海军上将高尔察克（1873—1920 年）曾在 1916 年担任俄国黑海舰队司令。十月革命前夕，克伦斯基派他到了英国、加拿大、美国、日本、新加坡、北京等地。他会见过美国总统、英国大使及英美高级军官，并表示愿为协约国效劳。

回俄国后，高尔察克成了鄂木斯克反布尔什维克政府的陆军部长。在英、法、捷克斯洛伐克等政府的支持下，他于 1918 年 11 月 17 日夜发动政变，宣布自己是俄国的“最高统治者”。

在帝国主义帮助下，高尔察克组织起拥有 30 万人的军队。3 月 4—6 日，高尔察克的军队在东线转入进攻。迫于敌军的优势兵力，红军不得不向西方且战且退。

4 月 17 日，列宁在莫斯科工厂委员会和工会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号召俄国人民同高尔察克作斗争。列宁指出：“正当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国际帝国主义的事业永远地遭到失败的时候，来自东部、来自疯狂残暴的高尔察克白卫匪帮的危险却在向我们逼近了。应该消除这一危险。”

与此同时，尤登尼奇和邓尼金的军队也蠢蠢欲动。

在协约国支持下，旧沙俄中将邓尼金从 1918 年

4月起，在北高加索、顿河和乌克兰建立反革命自卫军统治，包括志愿保团军、顿河哥萨克集团军和库班哥萨克集团军总计15万余人。1919年1月，邓尼金成为南俄武装力量总司令。

沙俄将军尤登尼奇1919年任西北集团军白卫军总司令。

这两股反动势力的崛起使苏维埃共和国又面临着严重的危险。

就在这复杂严峻的时刻，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了，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们要总结一年多所取得的经验，通过新的党纲，讨论国内战争和建设方面的各种问题。

1919年3月18日，俄共（布）八大在克里姆林宫原司法机关大楼的圆形大厅开幕。在这座不大的披了节日盛装的白色圆柱大厅里聚集着403名代表，代表了313766名党员。当时正值寒冷季节，窗外冰天雪地，即使是在万里无云的晴天里，连阳光也显得寒气逼人，没有一丝暖意。大厅里没有供暖设备，代表们穿着军大衣、短皮袄、呢外衣、皮夹克，一个紧挨一个地坐着，椅子摆成半圆形。他们中间有工人、农民和前线战士，有的来自城市和农村，有的来自内战前线和敌占区的地下组织。他们是党的精华，早就把自己的命运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联系在

一起了。

列宁首先致开幕词。他说：“在十月革命后的初期，党的力量和苏维埃政权的力量几乎完全用来直接保卫国家，直接抗击敌人，直接抗击那些根本不让社会主义共和国长期存在的国内外资产阶级，现在，我们毕竟逐步巩固起来，并开始把建设任务和组织任务提到首位。”大会开幕后开始选举主席团。列宁被选入主席团，并代表俄共（布）中央作总结报告。在代表大会以后几天的日程上，列宁还作了关于党纲的报告和总结发言、关于军事问题的讲话、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并写关于对中农的态度的决议。

在总结报告中，列宁强调指出：资产阶级的俄国是和苏维埃俄国绝对不能和平共处的，苏维埃和帝国主义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在结局没有到来之前，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是在列宁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这次代表大会主要解决了三个问题：通过新党纲，确定党的中农政策和军事政策。

俄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纲是 1903 年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1917 年二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即在《远方来信》和《四月提纲》中提出修改党纲的要求，并向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党纲修改的方

针。列宁随后又写了《党纲的理论、政治及其他一些部分的修改草案》、《论修改党纲》和《党纲草案草稿》等文献，还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纲的报告。在这些文献基础上，列宁于1919年2月重新拟就了《俄共（布）纲领草案》。

《俄共（布）纲领草案》的理论部分增加了对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性质的分析，指出：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新纪元已经开始，只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把人类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绝境中解救出来，“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党纲草案的实践部分规定了党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任务。在政治方面，草案阐述了苏维埃国家的性质，和苏维埃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区别，指明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道路。草案还规定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提出了国民教育的任务。经济方面的任务在草案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列宁的基本观点是：把生产资料和流通资料变为全民财产；使小农经济逐步向社会主义大农业过渡；全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草案中关于经济任务还做了一些具体规定，如生产管理高度集中化，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商业，扩大非货币计算的领域并准备消灭货币等等，这些内容既是战争期间的非常措施，也是当

时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

列宁草拟的党纲草案大部分条文为党纲委员会所采纳，写进了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正式党纲。尽管新党纲还存在一些缺点，但它已作为总结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新阶段的纲领载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史册。列宁说，这个党纲是一个政治纲领，是我们的任务表，它应当用第二个纲领，即具体的经济建设计划来加以补充。

在八大会议上，公开出现了两个反对派，一个是以奥新斯基为首的组织反对派，一个是以斯米尔诺夫为首的军事反对派。他们都提出了与列宁截然对立的观点。

奥新斯基第一个发言，他指出：列宁提出的“权力哲学”是“有权威的个人”管理党和国家，而不是作为整体的中央。不幸就在于：党内只有领袖和个人（他是指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而从来没有整体的中央。”这说明党正在蜕变……必须结束这种状态。”

奥新斯基的发言博得一些党员的称赞。反对派代表伊格纳托夫认为：党内已出现官僚化，必须加以杜绝，挽救的办法是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他形象地说：“尽管伊里奇的脑袋是独一无二的，但在这个脑袋周围仍需要有人。”他认为，党的机关已经篡夺了国家的政权，这是违背宪法的。

列宁没有直接参加这场争论，只是听取了季诺维也夫的汇报。季诺维也夫的总结很好地解释了列宁当时的思想。他说：

“出面执行的是人民委员会，而做出决定的是党中央。这一点不应改变。既然如此，你们的全部提纲就落空了……你们的议论中没有党中央，所以我重复一遍，反对党的一切议论都落空了。”

大会多数代表接受了季诺维也夫的提纲，因为这一提纲体现了列宁的建党原则——党中央是最高权力机构，各级党委领导各级党组织和各级国家机关。但鉴于反对派的意见，列宁作了一些让步。在决议中增加了这样的内容：

“不应把党的机构的职能同国家机关的职能混同起来。党要在宪法范围内，通过苏维埃机关贯彻自己的决定。党尽力领导苏维埃的活动，但不能代替它。”

代表大会争论的另一个焦点是民族问题。

历史上，民族问题历来困扰着俄国，内战中邓尼金的旗帜上写着“为统一与不可分割的俄罗斯而斗争”。相反，列宁提出了“承认民族自决权”的口号。列宁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他认为这种沙文主义甚至在共产党内都有很深的影响。他曾经说过：

“随便抓出一个共产党人——就能找出一个大

俄罗斯沙文主义者”。

当时，很多代表不能理解列宁的这一思想。

斯大林就不同意列宁的观点，他认为对“民族自决权”的口号应做阶级分析，“必须把自决权解释为该民族劳动群众的自决权，而不是资产阶级的自决权。”

但当时斯大林回避了这个问题——在会上一言不发。只是在三年后列宁病重时。斯大林才公开提出了与列宁不一样的观点。

托姆斯基没有斯大林的那种心计，他直接了当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在这个大厅里，没有一个人想说民族自决、民族主义运动是正常的和合乎愿望的。”

他认为：“自治”口号只有宣传性含义，是揭露性口号或反义词，是一个安抚民心的口号。

反对列宁“自治”思想的还有布哈林和皮达可夫等人。他们都在会上与列宁进行了辩论。

列宁批驳了这些人在民族问题上的观点，指责他们不顾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还存在着民族和民族差别的事实，只承认各民族劳动阶级的自决权。列宁认为，既然各个民族还处于从中世纪进到资产阶级的民主或者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进到无产阶级的民主的道路上的不同阶段，那么党纲中关于民族自

决权的原则便是正确的。只有承认民族自决权，才能保持各民族劳动群众之间正确的相互关系和彼此信任，才能保证各民族自愿和平等的联盟。在不同国家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分离是循着不同道路发展的，对待这个问题必须特别谨慎，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不能借口民族内部在发生分化而只承认劳动阶级的自决权。

在这一时期，列宁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中农的态度问题，也是党的八大要着重解决的问题。在苏维埃政权初期，布尔什维克党在农村中奉行同贫农结成联盟反对城乡资产阶级，中立中农的路线。当政权已经巩固，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如何对待中农就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了，废除土地私有制之后，中农日益增多，农村逐渐中农化。作为农村中的基本群众，中农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他们既是粮食的主要生产者，又是红军的主要兵源。孤立中农的政策已经过时了。1918年秋，列宁提出了同中农妥协、同中农结成联盟的口号。这一新政策对于吸引中农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对于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有极重要的意义。列宁在党的八大的开幕词、总结报告、关于党纲的报告和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中，都论证了党对中农的新政策，强调中农问题的重要性，指出处理

好同中农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建设中一项很困难的任務。列宁科学地分析了中农的阶级地位和特性，规定“俄共对中农的政策是逐步地有计划地吸引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党的任务是把他们同富农分开，关心他们的需要，把他们吸引到工人阶级方面来，用思想影响的办法而决不用镇压的办法来克服他们的落后性，在一切触及他们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力求同他们妥协，在确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方面向他们让步”。列宁强调，应当把中农同富农严格加以区别，决不容许对他们采取暴力手段，否则将会葬送革命事业；需要的是说服教育，长期合作，帮助中农改善生活和生产条件，然后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列宁按照这些精神为代表大会草拟了《关于对中农的态度的决议》，规定了一系列旨在改善同中农关系、巩固工农联盟的具体措施。这一决议在大会上获得了一致通过。

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索柯里尼柯夫代表中央作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斯米尔诺夫、萨法罗夫、皮达可夫、布勃诺夫、雅罗斯拉夫斯基等人，组成“军事反对派”，反对中央的军事路线。他们反对建立正规的红军和在军队中实行铁的纪律，否认有必要吸引旧的军事专家担任指挥职务，要求给政治委员更广泛的军事指挥权

力。

早在 1918 年夏秋，军事反对派的势力就已形成。当时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军事观点极不一致，双方以“电报战”的形式不断向列宁告状，迫使列宁不得不把斯大林从南方战线调出来。

1918 年 10 月 8 日，斯大林曾给列宁打电报，要求在中央讨论他们认为有使南线崩溃危险的托洛茨基的行动问题。斯大林对总司令部的某些命令也加了“不予理睬！”的批语。

而托洛茨基的态度也是相当明确的。他大胆使用旧军事专家，提倡军队集中制和铁的纪律，主张建立正规军，反对某些人的游击习气和盲动行为。在八大会议上，“军事反对派”发难了，激烈地反对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军事路线。

托洛茨基没有参加八大会议，因为他当时仍在前线指挥作战。

斯大林风尘仆仆地从前线赶回来参加了会议，但他并没有参加反对派的行列，因为他知道列宁支持托洛茨基。

军事反对派着重批评了中央 12 月 12 日“关于军团军司令员的条例规定”和 1 月颁布的红军纪律条令。他们认为，前者限制了红军中政委的作用，后者则保护了旧军官特权，损害了红军战士的权利。总

之，他们认为军队的组织和指挥都存在着许多的问题，中央军事政策必须做重大调整。

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军事组”，召开了多次会议，反对列宁和托洛茨基军事路线的观点占了多数。

尽管“军事反对派”在代表大会上拥有了多数，但他们提出的草案仍没有被采纳。因为列宁驳斥并批评了他们。正如托洛茨基后来所说的那样：

“列宁发表了激烈的讲话，为我的军事政策进行了辩护，驳斥了反对派的批评。”

列宁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批评了“军事反对派”的错误主张，论证并维护了党在红军建设方面的方针政策。在总结报告和关于军事问题的讲话中，列宁总结红军建立一年来的经验和教训，说明了军队正规化建设和吸引旧军事专家的必要性，列宁指出：“军事反对派”具有游击习气，反对正规化，反对利用军事专家，这些错误给红军造成了极大危害；取得政权的工人阶级必须把革命的热情同科学技术结合起来，把红军建设成为拥有军事技术和严格纪律的正规军队，这样的军队才能无往而不胜。

列宁知道，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是军事反对派的，他要求他们在会上表态支持中央的立场，并对“军事反对派”进行批评。斯大林违心地按照列宁的要求做了，这使列宁感到非常满意。

列宁原以为反对派都会向斯大林那样迅速站到自己方面来。但是，事实使他感到惊讶——22日的投票结果是：176名代表赞同中央的提纲，有95名代表反对中央而支持反对派的提纲，有4名弃权。

列宁对表决结果深感不满。为取得一致意见，代表大会选出了由多数派和反对派组成的协商委员会。协商委员会经过充分讨论，终于制定出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案。这一决议案以绝大多数票获得通过，它的内容体现了列宁的军事思想。

第三十五章 决胜千里

那是一个风大浪急的夜晚，寒风料峭，大雪纷飞，夜色如墨，船只被顺流疾下的冰块撞得砰砰作响，随时都有覆没的危险。人们在黑暗中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他伫立船头，稳如泰山，坚定沉着地指挥着船队破浪前进。

——威廉·埃利奥特

排除俄共（布）内部“军事反对派”思想的影响，确立列宁的正确军事思想，是国内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1919年，国内战争的规模和紧张程度都达到顶点。苏维埃政权在长达3000公里的6条战线上同国内外反动势力展开激烈的战斗。白卫军竭力要在战斗中击溃红军和消灭苏维埃政权，而英、法、美帝国主义者武器、弹药和装备，源源不断地供应给他

们。正如英国将军诺克斯所说：“我们把几十万支步枪、几亿发子弹、几百门大炮、几千挺机枪、几十万套军服和装备等运到了西伯利亚。俄国士兵射向布尔什维克的每颗子弹都是英国制造的。”

1919年3月，高尔察克的军队从乌拉尔进攻。4月，他们逼近了伏尔加河，其先头部队到达距喀山和萨马拉80公里的地方。东线的红军全线后撤。白卫军的气焰十分嚣张，准备迅速扩大战果。

4月10日，列宁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通过一系列支援东线的紧急措施，例如，关于征召1886—1890年出生的工人和农民加入红军的法令。列宁立即签署了这一法令。同日，列宁写《为支援东线告彼得格勒工人书》，向人民群众说明东线危急的形势，号召动员人民支援东线，因为那里决定着革命的命运。

4月11日，列宁写了《俄共（布）中央关于东线局势的提纲》，全面阐述共产党关于动员工人、农民起来同白卫军斗争的行动纲领。提纲中说：“只要调动起一切力量，发挥出革命干劲，高尔察克是会被迅速粉碎的。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西伯利亚是可以而且应当守住和夺回的。”

在列宁的号召和组织下，大批增援部队陆续开往东线。红军对白卫军进行多次有力的反击之后，于

4月28日转入反攻。在两个星期内就粉碎了白卫军几个精锐师。白卫军被打得丢盔弃甲，匆忙向乌拉尔撤退。在不到一个月的战斗中，红军俘虏25000多名白卫军，击毙者不计其数。

红军在东线的胜利使协约国的头子们感到坐立不安。他们立即对高尔察克增加援助。光是美国在1919年上半年就送给高尔察克25万多支步枪、几百门大炮、几千挺机枪以及大量的弹药、军服和装备。与此同时，协约国还准备在法律上承认高尔察克政府。

在这种形势下，苏维埃政府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防止高尔察克重整部队和发起新的进攻。5月29日，列宁致电东方面军以极严肃的口吻说：“如果我们在冬季以前不能收复乌拉尔，那我认为革命的灭亡就不可避免了。要全力以赴。”

东方面军严格执行了列宁的指示。6月9日，土耳其斯坦集团军解放了乌法，瓦·伊·恰巴耶夫指挥的第25师在战斗中表现特别出色。6月13日，第三集团军打击了格拉佐夫的高尔察克白卫军，迫使白卫军退向乌拉尔山区。

按照列宁的意见，东方面军于6月下旬开始向乌拉尔进攻。参加进攻的第3、2、5集团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神速地向前推进。7月1日，第3集团军解放

乌拉尔西部的中心城市彼尔姆；第2集团军解放昆古尔。列宁得知这一胜利喜讯后，立即向红军参战部队表示祝贺。列宁在给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中写道：“我向攻克彼尔姆和昆古尔的英雄红军祝贺。向乌拉尔的解放者表示十分诚挚的敬意。无论如何要把这一事业迅速进行到底。”

在乌拉尔山区，红军遇到了白卫军的顽强抵抗。通过10天的激战，高尔察克的白卫军被击溃了。7月13日，第5集团军解放了兹拉托乌斯特。7月14日，第二集团军开进乌拉尔的工业中心叶卡捷琳堡。在不到20天的进攻时间里，东线红军越过乌拉尔山脉，逼近西伯利亚。

鉴于红军在乌拉尔取得巨大了军事胜利，列宁于8月24日写《为战胜高尔察克告工农书》。列宁指出，虽然红军已解放乌拉尔并开始进入西伯利亚，但绝不能掉以轻心。“必须竭尽全力把高尔察克、日本和其他外国强盗赶出西伯利亚，必须更加努力地消灭敌人，决不允许敌人一次又一次地来为非作歹。”怎样才能防止高尔察克叛乱的灾难重演？列宁提出3条意见：第一，必须有强大的红军才能捍卫工农政权；第二，必须有大量的粮食储备；第三，必须遵守严格的革命秩序，恪守苏维埃政权的法律和命令，并监督执行；第四，必须学会按行动而不是按言

论来评价各个政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说得很好听，实际上他们是白卫分子的帮凶，第五，为了消灭高尔察克匪帮，不让他们卷土重来，所有的农民都必须拥护工人阶级国家。

列宁的这封信成了正在高尔察克叛乱地区进行战斗的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的行动纲领，它鼓舞着工人、农民和红军战士去建立新的功勋。

乌拉尔的解放是红军在军事和政治上取得的一次巨大胜利，标志着国内战争一个重要阶段结束了。在这个阶段中，高尔察克军队是主要的反革命力量，现在他们虽然没被完全消灭，但已不再是主要敌人了。但是，另一个新的主要危险在迫近，这就是盘据在南方的邓尼金反革命势力。

目睹了高尔察克军队在东线节节失利，协约国又作了新的安排。他们大力援助沙俄将军邓尼金，从南方发动大规模进攻。5月4日，在经过殊死抵抗之后，英雄的城市卢甘斯克终于被白卫军占领了。列宁高度评价卢甘斯克的居民的英勇行为，致电国防委员会驻南方面军特派员列·波·加米涅夫：“您不仅绝对必须亲自……检查和加紧向卢甘斯克和整个顿巴斯派援军，而且要亲自把这项工作抓到底，否则灾难无疑将是巨大的，而且恐怕难以挽回。”“如果不在短期内彻底肃清顿巴斯之敌，我们无疑会灭亡。”

列宁和党中央对南方的局势极为关心。5月8日，列宁代表党中央致电乌克兰人民委员会，紧急建议乌克兰国防委员会务必用一切力量迅速加强对顿巴斯的军事援助，迅速而普遍地动员敖德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尼古拉耶夫、哈尔科夫、塞瓦斯托波尔的工人去增援南线的部队，并规定由波德沃伊斯基和安东诺夫两人负责对付马赫诺匪帮。在列宁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乌克兰党和苏维埃的领导干部肩负重大的使命，一直战斗在前线。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顿涅茨省执行委员会主席费·安·谢尔盖耶夫（阿尔乔姆）组织了哈尔科夫保卫战，后来又参加了沃罗日巴和苏梅附近的战斗。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乌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安·谢·布勃诺夫领导补充红军兵员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红军在顿河流域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初春时，红军在这里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可惜没能巩固下来。叛乱先后在喀山镇和韦申斯卡镇发生，后来又扩展到顿河州北部地区，对南方面军第8、9集团军后方造成严重威胁。

邓尼金的胜利也助长了叛乱。叛乱分子于5月份攻占赫尔松城和尼古拉耶夫城。由于后方遭到破坏，苏维埃红军的前线也受到严重削弱。5月25日，邓尼金的骑兵突破第9集团军的阵地，并于6月7日

与叛乱的哥萨克会师。

6 月份，白卫军占领整个顿巴斯、顿河州、克里木和部分乌克兰领土。6 月 30 日，红军经过激战后放弃了察里津。7 月 30 日，邓尼金下达攻占莫斯科的命令。邓尼金的部队进入了苏维埃共和国的要害地区，逼近莫斯科。新生的工农政权岌岌可危。

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于 1919 年 7 月 3 日至 4 日举行全体会议，列宁出席了会议。会议专门讨论了怎样战胜邓尼金的问题；任命古谢夫、列·波·加米涅夫、李可夫、斯克良斯基、斯米尔加、托洛茨基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托洛茨基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任命加米涅夫为总司令，伏龙芝为东方面军司令员，叶戈里耶夫为南方面军司令员，吉蒂斯为西方面军司令员。

俄共（布）中央这次全会的主要精神集中反映在列宁代表中央写的《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一信中。

列宁在信中指出，目前是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一个最危急的关头，工人和农民所取得的成果受到了严重威胁。列宁发出庄严号召：“首先而且主要是全体共产党员，还有全体同情分子，全体正直的工农，全体苏维埃工作人员，都要按战时要求紧张行动起来，把自己的工作、精力和注意力尽量转到完成直

接的战争任务上，转到迅速击退邓尼金的进犯上”，“苏维埃共和国已在敌人包围之中。它应当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成为一个统一的军营。”

列宁的这封信是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发出的政治指示。为了执行列宁的指示，红军制定了在南线进行反攻的计划。根据这一经过党中央同意的计划，担任主攻力量的是南方面军的左翼——绍林的部队，打击方向是新切尔卡斯克、顿河区和库班，接近敌人的根据地，占领哥萨克的中心。哥萨克对于邓尼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列宁写道：“过去和现在，单是哥萨克就能使邓尼金拥有很大的力量。”担任辅助进攻的是以南方面军副司令员谢利瓦乔夫为首的部队，打击方向是库皮杨斯克，目的是援助苏维埃乌克兰。

红军的这次反攻进行了大约一个月，没有取得成功。

俄共（布）中央从反攻失利的教训中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必须改进对南方面军的领导工作，加强对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监督；第二，必须建立强大的骑兵部队，以便抵抗敌人的骑兵。

9月12日，邓尼金下令：进行全线总攻。经过数日猛攻，邓尼金的部队突破了库尔斯克—奥廖尔的防线，于9月20日占领库尔斯克。与此同时，什库

罗的白卫骑兵军团与马蒙托夫的骑兵军团会合，插在红军驻在沃罗涅日的第 8、9 集团军之间。10 月 1 日，白卫军又占领了沃罗涅日。白卫军的这些胜利迫使红军的南方面军重新退却，苏维埃共和国的最危急的时刻来临了。

为了消除邓尼金对国家中心地区的威胁，彻底击溃白卫军，俄共（布）中央号召工人和农民立即动员起来。列宁发出指示：应当把全国变成一座真正的军营，坚决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巩固工农联盟。

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但工人阶级的人数毕竟很少，只有与包括中农在内的广大劳动人民结成联盟才更有力量。同中农结成联盟是列宁和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重要决策。八大以后，俄共（布）各级组织和苏维埃组织都在认真贯彻这一决策。

在巩固工农联盟方面，最重要的因素是 1919 年广泛吸收中农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这一年的春夏进行了村和乡苏维埃选举。如果说过去苏维埃里中农很少，那么经过选举之后，中农在苏维埃中的数量大大增加。

苏维埃政府在物质方面也对中农作了一些让步，不再向他们征收革命特别税和 1918 年的收成实物税，提高粮食价格，优惠供应木材。采取这些措施

是在执行列宁和八大关于同中农结成联盟的决策。这些措施主要是维护了中农的合法权益。

苏维埃政府还非常关心红军战士家庭及其经济情况。红军战士的家庭每月都得到现金补贴和包括有面包、糖和盐的一份食品。

在国内战争的艰苦年代里，到处战火纷飞，河山一片残破，工业遭到严重破坏。尽管如此，俄共（布）和苏维埃政府还是尽可能地向农民提供生活必需品和农具。仅 1919 年就向农村供应 212000 张犁和耙，180 万把大镰刀，8 万台农用机器。在农村的各种会议上，共产党的干部们经常向农民进行解释：现在苏维埃政权几乎一无所有，但它不会欠债不还，战争结束后一定要帮助农村劳动者。共产党员还向农民宣讲列宁关于中农问题的演说。

由于列宁和俄共（布）在农村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工农联盟的经济政策，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得到巩固，中农也日益深刻地认识到他们的命运是同社会主义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之间的关系采取了军事政治联盟的形式：农民从无产阶级国家那里得到土地和保护，免遭地主和富农的剥削，而工人则从农民那里借到粮食。

工人阶级与农民的军事政治联盟是建立强大红

军的条件，是同外国武装干涉者和国内白卫分子斗争的可靠基础。俄共（布）中央执行八大决议，为建立一支战斗力强，纪律严明的正规军而开展积极的工作。工人和贫农是红军的骨干，然而红军的主要成员却来自千千万万的中农家庭。例如，1919 年有 130 万人参加红军，其中有近 100 万人来自中农。

红军中农民成分占据绝对优势。这就要求共产党加强对红军战士的政治教育。在这方面，列宁作出了表率。

那是 1919 年夏天。在莫斯科霍登卡卫戍部队军营里，几千名身穿灰色大衣的军人来到这里参加非党红军战士代表会议，他们中间大多数是农民。严酷的战争和异常艰苦的生活使得他们面容消瘦、疲惫不堪，他们因强烈思念故土和妻儿老小而情绪动荡。

列宁登上了讲台。他没有任何矫揉造作，一点也不像 1917 年的那些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靠“喊叫”、“抹眼泪”、“娓娓动听的词藻”来吸引听众。列宁十分真诚坦率，平易近人。他登上讲台并不是为了不择手段地影响与会者的情绪，也不是为了迁就和迎合他们，而是为了与普通的红军战士一起关心国家命运，与他们一起检查现行的路线是否正确。列宁向战士们详细介绍了世界的局势，和国内的现状，说明与外国武装干涉者和国内白卫分子斗争的不可

避免性。他的语言简明质朴，对听众尊重而信任。他同听众一起分析复杂问题，丝毫没有简单化和公式化的作风，毫无哗众取宠的浮躁习气，但却蕴含着一种难以抵御的巨大力量。

四周十分安静，只有列宁宏亮的声音在回荡着。红军战士们聚精会神地听着，深受启发和鼓舞。于是，他们过去的一些疑虑渐渐消失了。讲话结束时，战士们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向自己的领袖热烈欢呼。

牢固的工农联盟正在焕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并逐渐转化成为打击外国武装干涉者和国内白卫分子的物质力量。

1919年秋天，南线的局势愈来愈危险。红军为了阻止白卫军的进攻，为了保护住通向莫斯科的交通要冲，在前线与白卫军展开激战。

9月21—26日，俄共（布）中央全会正在克里姆林宫列宁的办公室里进行。全会讨论了战争形势，通过几项关于组织反击邓尼金的重要决议。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派遣新的力量，首先是共产党员和非党工人来巩固南线。全会还决定党和苏维埃的一些工作人员尽可能地转作军事工作。

根据中央全会的意见，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戈罗夫为南方面军司令员，斯大林为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任命绍林为东南方面军司

令员，斯米尔加和特里丰诺夫为东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0月，红军与邓尼金的白卫军在奥廖尔等地展开激烈的争夺战。10月13日，邓尼金占领奥廖尔并开始向图拉推进。图拉是红军的一个武器工业中心，并且是通向莫斯科道路上的最后一个屏障。从10月10——17日的一个星期，是这艰苦一年中的令人最紧张的一段时间。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回忆说：“我不记得在整个国内战争时期有比这更复杂的局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毫不动摇的镇静态度，是对总司令部的最巨大的支持。”

彼得格勒一带的形势也更加危险了。在那里，尤登尼奇的军队于9月底转入进攻，于10月中旬占领红谢洛、加特契纳，并向城内逼近。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国家的主要中心——莫斯科和彼得格勒还从未受到过这样的威胁。

在这紧要关头，政治局会议决定：绝不放弃图拉、莫斯科和彼得格勒，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保卫国家的核心。

这时，奥廖尔的战斗十分激烈。白卫军踩着自己同伴的尸体凶恶地向共和国首都移动。但就在奥廖尔陷落的第二天，即10月14日，由久经战斗考验的部队拦腰切断了敌军。这一情况迫使邓尼金分子暂

时停止向北推进，并集中大量兵力来对付红军的突击部队。战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10月18日，第14集团军司令员乌博列维奇和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奥尔忠尼启则下达了攻占奥廖尔的作战命令。

两天后，列宁收到奥尔忠尼启则打来的简短电报：“从奥廖尔向你致敬！”这一天凌晨，爱沙尼亚步兵师、拉脱维亚步兵师和第9步兵师的先头部队已攻下了奥廖尔。丢失奥廖尔，对于邓尼金的部队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同时，红军在彼得格勒附近也已经作好反攻的准备。反攻尤登尼奇军队的计划是根据10月24日列宁给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电报制定的。列宁在10月14日电报中指出：“要击退敌人，袭击杨堡和格多夫。”关于后方工作，列宁指出：“动员工作人员上前线。撤销十分之九的部门。”

在列宁直接指导下，红军打败了彼得格勒附近的尤登尼奇的部队。与此同时，红军在南线也取得了新胜利——布琼尼的骑兵团与第8集团军互相配合，击溃了什库罗和马蒙托夫的白卫骑兵，解放了沃罗涅日。

这一系列胜利是战争中出现的一个转折点。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列宁10月24日讲话中，为下一

步的斗争指出了方向：“我们必须把小规模的地方的进攻转变为大规模的进攻，直至夺取最后的胜利。”

列宁的这一设想是完全正确的。但在这种局面下，南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的地位和作用、后备力量在它们之间的分配等问题就提了出来。东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斯米尔加认为，主要战线仍然应该是东南线，因此主要后备力量应由他支配。

而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斯大林和谢列布里亚科夫则持相反的观点。他们否定了东南方面军向顿河区和库班广泛进攻的必要性，坚决要求把后备军的主要部分交给他们，而不是交给东南方面军。

俄共（布）于11月14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列宁出席并领导了这次会议。会议集中讨论了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意见，与会者认为：应该由南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共同进攻和击溃邓尼金的部队。政治局委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向总司令加米涅夫下达指示：占领库尔斯克并向哈尔科夫和顿巴斯推进；把从东线和土耳其斯坦战线撤回的增援部队分配给南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

按照俄共（布）中央的战略布置，红军于11月17日解放库尔斯克。此后，南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开始共同进攻，红军不断给白卫军以沉重打击，1919年

底和 1920 年初取得了重大胜利，从邓尼金分子手里解放顿巴斯、塔甘罗格、察里津、新切尔卡斯克、顿河畔罗斯托夫，并到达亚速海岸。邓尼金的部队遭到重创，到 1920 年 3 月，邓尼金的部队被彻底击溃。此后，邓尼金退出政治舞台，把权力转交给弗兰格尔。

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失败了。这意味着列宁领导的苏维埃共和国在同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斗争中取得了又一个胜利，国际帝国主义联合绞杀新生的工农国家的企图破产了。受协约国摆布的小国开始同苏维埃俄国媾和。爱沙尼亚同苏维埃政府签订了和约。对此，列宁感到十分兴奋，他在谈到这一事件的重大意义时指出：这项和约是一扇通向欧洲的窗户。它使我们有可能同西欧各国进行贸易。我们不仅坚持下来了，而且胜利了。我们没有从任何地方得到援助就取得了胜利，我们之所以能胜利，完全是因为工人和红军战士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战。

1919 年 12 月，在苏维埃俄国的国内外形势明显好转的情况下，列宁领导召开了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和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列宁在会议上做了重要报告和讲话，指出：同协约国斗争取得了三大胜利：第一，争取了协约国的工人和农民，因为以他们为主体的协约国军队一踏上苏俄国的土地就受革命的影响，转而同情苏维埃俄国；第二，使

那些受协约国奴役和支配的小国保持中立，使它们认识到协约国是压迫它们的强盗；第三，取得协约国国内小资产阶级的同情，他们认为封锁俄国会使儿童和老人毁灭，从人类文明的角度来看是不能允许的。另外，列宁还全面分析了有利的国内外形势，总结了苏维埃共和国两年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粉碎协约国军事进攻的经验教训，阐述了苏维埃政府的政策，论述了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等问题。

在乌克兰问题上，列宁与乌克兰领导人出现了分歧。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拉柯夫斯基认为：国营农场应是我们共产主义建设的基础。

列宁不同意这一说法，他认为：巩固乌克兰苏维埃政权的最重要条件就是同劳动农民建立紧密的联盟。不能由于建立国营农场而又一次恶化同乌克兰农民的关系。“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只能把很少一部分经营水平高的农场转为国营农场，不然我们就不能与小农结成联盟；而这一联盟正是我们所必需的。”

由于国内形势根本好转，所以有了较多时间来谈论建设问题。列宁在大会的闭幕词中高兴地说道：“第七次代表大会是第一次能用这么多的时间来讨论实际的建设任务，第一次开始直接根据经验来实

际讨论如何更好地组织苏维埃经济和苏维埃管理工作的任务。”

第三十六章 战时共产主义

“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

——列宁

战争时期的经济建设必然会打上战争的烙印。

十月革命至新经济政策时期之前，列宁在估计可能的发展道路时，多半都是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这种设想出发的。列宁认为 1918 年春天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同属于一个时期。但如果没有国内战争，当时的政策也不会是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那个样子。“战时共产主义”的确是在极度贫困、经济破坏和残酷战争的形势下实行的一种非常措施。

托洛茨基积极倡议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他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他对人的道德本质作过这样的分析：

“人是力求逃避劳动的，懒惰的动物……要把这

种懒惰性纳入一定轨道并借助于社会劳动组织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托洛茨基要求工人和农民也和士兵一样地服从调遣和指挥。如果工人、农民逃避这种“劳动军事化”，应该怎么办呢？托洛茨基明确地回答：

“……要有计划地、有条不紊地、顽强地、严肃地同逃避劳动现象作斗争，……把他们送进集中营。”

列宁赞同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他在国内战争的危机时刻指出：“苏维埃共和国已在敌人包围之中。它应当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成为一个统一的军营。”

在列宁的这种思想指导下，苏维埃政府制定各项方针政策。

首先是在农村实行余粮收集制。它要求农民除去食用、种子和饲料以外，交出所有余粮。苏维埃政权给农村提供一定的商品作为交换。

1919年8月，正值收获时节，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为执行余粮收集制而斗争，中央在一封信中写道：“在农村坚定地实行粮食义务制——这既是粮食任务，又是政治任务。由于它是粮食任务，解决这一任务就完全是粮食机构的职责；由于它是政治任务，解决它就要靠所有党组织、省执行委员会及所有与农

村打交道的政权机构。”

俄共（布）中央选派有经验的老党员到农村去搞征粮工作。许多工人征粮队在劝说农民执行余粮收集制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在征购粮食的同时，还进行政治工作，同贫农一起在中农的支持下制止富农的反苏维埃活动。富农们拼命地反对余粮收集制，用各种手段去破坏它。他们还把粮食藏起来并怂恿中农也这样做。他们在农民中间进行反革命宣传，挑唆农民反对征粮队。在许多地方，富农残酷迫害征粮队工作人员，几千名优秀工人和贫农惨死在他们手中。

在阿尔达托夫县塔拉索夫卡村，富农公开向征粮全权代表喊道：

“我们就是不把粮交给你们！”

这伙富农殴打了乡执行委员会主席，然后敲钟，企图解除征粮队员的武装。由于另一个征粮队及时赶到了，才把他们打下去，并把其首要分子抓了起来。但是农民还是不敢向征粮队交粮食。问他们这是为什么？他们回答害怕富农报复。

在克柳奇谢乡，富农杀死一名共产党员，并烧了他的房子，因为这名共产党员曾与粮食投机商作过斗争。乡苏维埃主席晚上睡觉时身边总要放一支步枪，他妻子身边则放上一把火钩子，因为富农威胁说

要杀死他们。

这的确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

阶级矛盾激化的原因，除了富农的反抗以外，也有征粮队本身的原因。有些征粮队员素质很低，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做思想政治工作，只想靠手中的武器随意抢粮食。这种做法引起了农民普遍不满，甚至引起暴动和农民起义。这些问题是列宁当时没有想到的，后来他吸取了教训。

城乡资产阶级反对列宁的余粮收集制政策，除了采用残忍的恐怖主义手段外，最常用的办法是进行粮食投机活动。

1919年8月，列宁把反投机、反粮食自由贸易的斗争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认为“这是一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最深刻、最根本、最经常、最广泛的斗争”。粮食投机活动对于执行余粮收集制危害极大，仅1919年粮食贩子就从农村运出6600万普特粮食，几乎相当于国家收集的1/3。在粮食方面，资本主义正在同社会主义进行着一场最激烈斗争。

尽管俄共（布）和苏维埃政府在粮食征购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但还不能满足国家和人民的粮食需要。保证供应红军战士之外，首先是保证供应工人，对孩子则实行无偿供给。

列宁还特别注意从思想上教育农民，帮助农民

克服过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形成的习惯和偏见，希望他们能提高认识水平，看到：“在人民挨饿的时候进行粮食自由贸易，在自由市场出卖粮食，就是让人和人互相斗争，让投机者发财，让人民大众挨饿。”“必须进行斗争反对资产阶级，反对投机，反对小经济，必须抛弃以前存在过的‘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原则。”

除了粮食以外，列宁和俄共（布）还十分重视燃料问题。由于石油产地和主要煤炭产地被白卫军占领了，木柴就成了主要燃料。1919 年木柴占燃料总量的 88%。工业和运输业全靠木柴来支撑。

1919 年 11 月 8 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燃料问题。列宁受中央的委托起草《与燃料危机作斗争》这封给各级党组织的通告信。列宁写道：“燃料问题成了最中心的问题。必须消灭燃料危机，否则不仅粮食任务不能解决，军事任务和全国经济任务也都不能解决。”

列宁和俄共（布）中央的号召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响应。通告信发表的第二天，即 11 月 14 日，莫斯科红色普列斯尼亚区率先组织了共产主义劳动“燃料周”，要求所有共产党员都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11 月 18 日，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动员 200 名优秀共产党员到燃料战线工作。采运燃料的热潮由城

市很快扩展到了广大农村。就连红军也宣布 11 月 24 日至 12 月 1 日为采运燃料周。这样，列宁和中央的号召以及所采取的一系列有效措施，再加上全国人民的积极努力，终于使燃料危机缓和下来了。

列宁和党中央对工业战线给予了特有的关注。到 1919 年 10 月 1 日，苏维埃俄国已把 2522 个加工企业收回国有，占全部开工企业的一大半，工人总数超过 75 万。为了使工业更好地满足前线的需要，俄共（布）和苏维埃政府实行严格的集中制管理。

战争迫使所有工业部门都转到为前线工作上，与国防无关的企业关闭了，工人转到其他地方。同时，由于原料和粮食非常少，也只能首先保证供应军事化的工厂。这样的工厂工人免服兵役，得到红军战士的口粮。

工业战线的职工们为了战争的胜利，都鼓足干劲，英勇地与艰苦、饥饿、寒冷、疾病作斗争，克服原料和燃料不足的困难，努力为苏维埃国家作贡献。

1919 年 4 月 3 日，列宁在莫斯科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会非常会议上做了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报告。列宁指出，国内外反动势力不仅武装进攻工农国家，而且在苏维埃国家内还制造阴谋，组织暴动，投掷炸弹，他们曾经试图炸毁彼得格勒的自来水厂，并在离萨马拉不远的地方炸毁运输粮食的主要铁路线。列

宁向工人阶级发生呼吁：必须全力以赴，把燃料、粮食、运输等方面的工作搞好。妇女能干的活，就让妇女代替男人，而把男人调到修理厂，或者调去支援铁路员工。

听完列宁的报告后，莫斯科——喀山铁路莫斯科编组站机务段政委布拉科夫回到机务段，召开党员会议，他向党员说：“伊里奇说话了，要求帮助。”几天以后，机务段党员会议通过了关于星期六全体党员夜间都去工作的建议。这是组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首次创举。共有 15 名共产党员参加这次活动。

这一创举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5 月 7 日，在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共产党员和党的同情分子大会上，人们提出要以实际行动帮助战胜高尔察克的建议。建议说：为了对阶级敌人取得优势，共产党员和党的同情分子应当更加鞭策自己，在星期六进行一次六小时的体力劳动，以便立即创造出实际的价值。建议还认为，为了保卫革命果实，党员们不应吝惜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所以这项工作应该是无报酬的。5 月 10 日，星期六，共产党员和党的同情分子像士兵一样来到工作现场，用共产主义革命精神从事工作。不久，喀山也组织了第一次群众性的星期六义务劳动。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产生在莫

斯科，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

列宁高度评价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即《伟大的创举》。通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看到了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萌芽。

1920年3月29日—4月5日，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大会通过的《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决议中指出：“各地对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注意应当比目前大大地加强。”大会决定：“把今年适逢星期六到来的国际无产阶级的‘五一’节变成大规模的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日。”

列宁在“九大”上作了报告和发言。他把战胜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尤登尼奇等称为“奇迹”。他认为，这种“奇迹”是实行“集中化”和铁的纪律的结果。他认为：如果没有这两种东西，我们不仅不能支持两年多，甚至连两个月也支持不了。

列宁认为，转入和平时期，同样应把这个经验带入经济战线。可见列宁同样想在劳动战线创造奇迹。

这时，党的九大上又出现一股反对列宁的势力，叫做“民主集中派”，其代表人物是萨普龙诺夫、布勃诺夫、奥新斯基、斯米尔诺夫、马克西莫夫斯基、里希琴、拉法伊尔、明科夫、姆格拉泽等人。他们不同意列宁的观点，反对权力过于集中，反对“一长

制”，主张实行集体管理。他们在“九大”会议上提出了一系列与列宁对立的观点。

列宁没有对反对派让步，他说，社会主义中央集权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阶级的意志有时是由独裁者来实现的，他一个人有时可以作更多的事情，而且一个人行事往往是更为必要的。

在列宁的权威面前，反对派最终服从了大会的多数。但这种思潮并没有解体，在以后它将以更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

192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举行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这次活动规模巨大，仅莫斯科一地就有约425000多人参加。

早晨，人们很早就行动起来了。首都莫斯科同全国一样，红旗招展，横幅标语随处可见。穿着工作服的人们个个朝气蓬勃，扛着各种劳动工具，走向劳动场地。

列宁亲自参加这次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他很早就来到了劳动现场，同克里姆林宫军校学员一起清理克里姆林宫的建筑材料。整整劳动了4小时。列宁已年过半百，身上还有枪伤和敌人留下的子弹。但他同年轻人一样，劲头很足，干起活来毫不示弱。

当别人劝列宁休息时，他回答：“我也是克里姆林宫的居民，这与我也有关系。”

列宁是以一种儿童的天真心情欢度这个星期六义务劳动日的。列宁认为，这一天是实现自由劳动理想的开始，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他对大街上、广场上嘹亮明快的歌声感到由衷的喜悦。他在这一天笑得很多，他的笑声是那样富有感染力。

列宁这一天的日程排得很满。下午2时，列宁来到斯维尔德洛夫广场，在马克思纪念碑奠基典礼上发表了讲话。列宁深情地表示：“我们今天奠基的伟大导师的纪念碑将号召大家全神贯注地作出长期努力，以便建成一个没有剥削的社会。”

下午3时，列宁来到莫斯科河沿岸的普列奇斯坚卡大街，向聚集在那里的群众招手致意，大声问好：“同志们！祝大家五一好！”列宁同大家热烈握手。一些女工高兴地欢笑着，谈论着，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歌。共青团员瓦利娅·米洛诺娃领唱。令大家感到意外的是，列宁第一个跟着唱起来：“我们的旗帜在世界上空飘扬……”

一位老工人笑着说：“要是有一架手风琴就好了！”

列宁听到后说：“战争胜利后，图拉就不再生产枪枝了，可以生产手风琴了。”

奥斯特洛乌莫夫工厂的青年女工、共青团员娜塔莎·斯米尔诺娃走到列宁跟前，认真地问道：“弗

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志，战争快结束了，这非常好，可是我们能活着看到共产主义吗？”

列宁仔细瞧了瞧她，同样认真地回答说：“是的，你能活到共产主义，而你的孩子们甚至不会想到曾经有过这样的社会——一个人占有很多房子、工厂和财富，而成千上万的工人却无立身之地，甚至吃不饱肚子……”

第三十七章 反对腐败

一个国家的革命，核心问题是党。有了一个好党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靠一个好党，否则胜利就靠不住。

——邓小平

无私奉献，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鞠躬尽瘁，而且从每一件具体的事情做起，这种思想和品德是列宁执掌政权的座右铭。

1918年5月23日，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收到列宁的一封正式信函，信中极严厉地写道：

“鉴于您不执行我的坚决要求，不向我说明为什么从1918年3月1日起把我的薪金由每月500卢布提高到800卢布，鉴于您直接破坏人民委员会1917年11月23日的法令，在取得人民委员会秘书尼古拉

·彼得罗维奇·哥尔布诺夫同意后擅自提高我的薪金这一公然违法行为，我宣布给您以严重警告处分。”

在这之前，列宁已经把邦契—布鲁耶维奇和哥尔布诺夫叫到办公室，认为他们违反了人民委员会的有关决定，对他们进行了极其严肃的批评。

在公职人员的工资问题上，列宁是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的。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认为，公职人员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列宁完全赞同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认为无产阶级国家公职人员是人民的公仆，应只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不能在金钱上搞特权。列宁早在1917年8—9月写的《国家与革命》小册子中就指出：马克思指出的公社所采取的一项措施，即取消支付给官吏的一切办公费和金钱上的特权，把国家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为什么特别值得注意？按照列宁的见解，“这里恰巧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转变：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从压迫者的民主转变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主，从国家这个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变为由大多数人——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压压迫者。”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列宁认为，是资产阶级民主还是无产阶级民主，是资产阶级专

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其标准不是口头上宣布的是什么，而要看实际，特别是看公职人员即各级当权者是否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看他们的生活水平是否相当于工人的生活水平。如果没能做到这一点，就不能表现出从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民主的转变。这样的政权很难能真正为绝大多数人服务。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成了执政党和新国家的领导人，于是他开始着手实现马克思关于公职人员是人民公仆和把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的设想。

1917年11月18日（12月1日），列宁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写了《人民委员会关于高级职员和官员的薪金额的决定草案》，这一文件稍加修改后为人民委员会通过。文件规定：人民委员每月最高薪金，无未成年子女者为500卢布，有未成年子女者每个子女另增100卢布；家庭成员的住房每人不得超过1间。

列宁对公职人员薪金的这一规定是符合当时的“工人工资”标准的。例如，当时莫斯科机械工人最高工资为480卢布，彼得格勒铁路职工的最高月工资为510卢布。

列宁按照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行事，严格执行

他自己提出并为人民委员会所通过的这项决定，对自己和手下工作人员都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列宁严厉批评各种搞特权的现象，他自己不搞特权，反对别人搞特权，也反对别人为他搞特权。上面提到的列宁严厉批评别人擅自为他长工资的事件就是一例。

列宁，一个意志非常坚强的人，一个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人，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一丝不苟。他所遵循的原则是：“人们的生活很苦，因此我也应当过苦日子。”

在困难的 1919 年，全俄国的人民都很关心列宁，希望他身体健康，为人民做更多的事情，因此，给列宁寄来很多食物。但列宁实在不好意思吃这些东西。当包裹送到列宁简陋的寓所里的时候，列宁总是显得局促不安，匆忙把面粉、糖、牛油等分送给害病体弱者或幼儿园的儿童。

列宁对别人给他送礼有些无可奈何。有一次，列宁邀请高尔基到他那里去吃饭，说：

“我请您吃熏鱼，这鱼是从阿斯特拉罕寄来的。”

列宁一边说着一边皱起眉头补充道：

“他们寄东西来就像送给贵族老爷似的！怎么阻止得了呢？拒绝吧，他们会见怪的。但是周围的人都在挨饿。只好收下，然后把大部分送给更需要的人。”

列宁生活很俭朴，从不肯轻易接收别人送给他的东西。有一次，克里姆林宫卫队长马尔科夫搞到一些酥糖，分给人民委员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也分了几磅给列宁。

马尔科夫刚回到自己的房间就听到有人来敲门。

“请进。”——马尔科夫说。

进来的人是克鲁普斯卡娅。她把一包酥糖放在马尔科夫的桌子上，并说：“马尔科夫同志，十分感谢您送来的酥糖，十分感谢。只是我们不需要，谢谢您了。您把它分配给所有的同志吧。”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不是这么回事。我不只是给了你们，所有的人都有一份。”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过，反正您还是收下吧，把它让给别人好了。”

“这是为什么？或许，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喜欢吃酥糖？”

“喜欢还是喜欢的。只是，您知道，酥糖很贵，我们现在又没有钱。请您谅解。”

“别再说了，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我不能收回，而且分给大家的酥糖是不收钱的。”

马尔科夫好不容易才说服克鲁普斯卡娅收下这份酥糖。

几磅酥糖原本不算什么贵重东西，但在食品极端匮乏的国内战争年代还是很珍贵的。糖是人体不可缺少的营养，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都喜欢吃糖，但他们首先想到其他同志，按照党的纪律严格地自我克制。按照高尔基的说法，他们对自己要求之严格，“往往达到自我折磨和自我糟踏的地步”。严于律己，关心他人，多为人民干实事，这是列宁对自己的要求，值得每一个共产党员学习和仿效。

列宁一向认为，只要有马克思主义指引，有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带领人民群众奋斗，就能把整个世界翻转过来，被统治的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现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民群众取得了革命的成功，世界翻转过来了。但翻转过来的世界怎样进行建设？这还得靠一个坚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党是建设成败的关键。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仍然很重视执政党的建设。不久就开始了国内战争，全党都投入到战争中去。

1919年4月11日，列宁代表俄共（布）中央写了“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的信，要求全党调动起一切力量，发挥冲天的革命干劲，战胜高尔察克。

1919年6月28日，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谈到党内状况，他指出，革命成功后，冒险家和其他危害分子乘机混进执政党里来，这是不可避免的

事情。如何对待这种情况？办法是：以先进的无产阶级作为依靠的执政党，要善于清洗自己的队伍。动员党员上前线作战帮助了清党，胆小鬼和坏蛋逃到党外去了。还要利用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来清党。清党以后，党员的数量虽然有所减少，但党的力量 and 作用却大大增加了。

列宁把清党工作同不断提高党为共产主义工作的要求联系起来，认为这样将会改善国家政权机关，并将大大促使其他阶层的人们迅速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

“八大”会议上，党内反对派的出现使列宁警觉起来。他在新党纲中增加了“严格党的纪律”一节，要求党员必须服从党中央和地方组织。新接收的党员要有预备期，接收党员的主要标准是服从党机关的指示。同时，列宁还决定进行一次清党活动。

这是布尔什维克党成立后的第一次“清洗”，——以“全体党员普遍登记”的形式对不合格党员进行清洗。据统计，有半数左右的党员被清洗出去，其数量将近 15 万人。第一次清党延续到 1919 年 9 月底结束。这种“党员重新登记”的形式一直延续了很多年，并为许多国家的共产党组织所仿效。

在清党的同时，还大量吸收优秀的工人和红军战士入党。在九大会议前夕搞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入

党周”，共吸收了 20 多万名党员，使党员数量猛增到 61 万多人。面对这种情况，列宁不无忧虑地说：“我们担心党过分扩大，因为那些只配枪毙的野心家、骗子手一定会想方设法钻进执政党里来。”

1921 年 3 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党的建设》决议，决议中要求“把非共产主义分子清洗出去”。根据这一决议，俄共（布）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清党。这次清党工作经过了长期的认真准备。1921 年 6 月 21 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关于党员审查、甄别和清党问题的决议》，把征求党内外劳动群众对被审查党员的意见作为清党的一项必要条件，同时规定了成立地方审查委员会的程序。7 月 7 日，中央政治局批准了中央清党领导机构——中央审查委员会成员名单。7 月 27 日，中央委员会在《真理报》上发表致各级党组织的信，阐明清党的任务和方法，提出了清党方针：对于工人，应放宽一些；对于农民，应严格区分富农和诚实的劳动农民；对于“摆委员架子的”和担任享有特权的职务的人，应该从严；对于旧官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应特别注意审查；对于原属其他政党的人，尤其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应进行最细致的审查和清洗。从这些方针可以看出，清党的目的在于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清除阶级异己分子。

这次清党从 1921 年 8 月 15 日开始，到 1922 年 3 月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结束。结果，共有 159355 人被清除出党。

清党开始后一个月，列宁写了一篇具有指导意义的文章《关于清党》。1921 年 9 月，改行新经济政策已有半年，列宁对革命的看法已与一两年前有很大不同。那时主要是进行武装斗争，用武力保卫革命政权，打败国内外反动派。打败国内外反动派以后，列宁的主要注意力转到了经济战线。这时他认为，革命的主要成就表现为“不辉煌、不显眼、不是一眼就能看出的内部改善”。改善表现在劳动情况、劳动组织和劳动结果上。改善的内容是要抵制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要达到这样的改善，就必须把脱离群众的分子清除出党（自然，更不用说那些在群众眼中玷污了党的分子了）”。“必须把欺骗分子、官僚化分子、不忠诚分子和不坚定的共产党员以及虽然‘改头换面’但内心里依然故我的孟什维克从党内清除出去”。关于这个问题，列宁的观点非常中肯：“在评价人的时候，在揭露‘混进党的’、‘摆委员架子的’、‘官僚化的’人的时候，非党无产阶级群众的意见以及在许多场合下非党农民群众的意见是极其宝贵的。”

1921 年 10 月 17 日，列宁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

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重要报告，题目是《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列宁在这一报告中着重谈了清党的问题。他认为，有些党员不会利用苏维埃的法律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甚至妨碍这一斗争，清党就是要处理这些妨碍斗争的党员。列宁说：“我很希望我们能从党内赶走 10 万到 20 万混进来的人，他们不仅不会同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作斗争，而且妨碍回这些现象作斗争。”

列宁把贪污受贿列为对共产党人的三大威胁之一。他说，如果贪污受贿现象盛行，实施法律只会产生更坏的结果，就没有搞政治的基本条件。

对于贪污受贿者列宁历来主张严惩，有一件事充分表现列宁的这一态度。1918 年 5 月 2 日，莫斯科革命法庭审理了莫斯科侦察委员会 4 名工作人员受贿和勒索一案，结果只判了半年徒刑。列宁对此事进行了干预，他在给党中央的信中写道：“我请求把审判贪污案件（1918 年 5 月 2 日）的党员开除出党的问题列入议程，因为他们对案情属实、本人供认不讳的受贿者只判了半年监禁。不枪毙这样的受贿者，而判以轻得令人发笑的刑罚，这对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来说是可耻的行为。这样的同志应该受到舆论的谴责，并且应该开除出党，因为他们应该是与克伦斯基之流和马尔托夫之流为伍，而不能跻身于革命的共产

党人之列。”

由于列宁的有力干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重新审理了这个案件，其中 3 名被告各被判处 10 年徒刑。

列宁对以权谋私、利用职权接受贿赂等行为极为痛恨。1918 年 7 月 1 日，人民委员会举行会议，交通人民委员涅夫斯基在会议上汇报说：某些征粮队利用手中的权力胡作非为，铁路员工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人民委员会讨论后，列宁立即发出给各铁路沿线征粮队队长的电报。列宁在电报中说，如有接受粮贩的贿赂而玷污苏维埃共和国的声誉者，必须立即加以逮捕，交送革命法庭严加惩处。

但是，利用职权索取贿赂的事情仍时有发生。1918 年 8 月，有人报告说，民政委员部工作人员违反规定，给一批奥地利和德国俘虏发放了进入莫斯科的许可证，并向每个俘虏勒索一个卢布。得知这一情况后，列宁立即指示秘书：给莫斯科军区司令穆拉洛夫去电话，命令他逮捕受贿者。

列宁对共产党员要求一向十分严格。在国内战争期间，列宁认为党员应该积极上前线作战；不能上前线的应在后方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指出：“我们运用动员人们上前线和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办法，来清洗党内那些一心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

位‘捞到’好处而不愿肩负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重担的人。”“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

对党的领导层，列宁的要求更为严格，他本人更是严于律己，以身作则。

列宁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和坚定信念去影响党的领导人甚至全党。事实证明，列宁的这种想法实现了。他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回忆说：在困难的1919年，在反动势力暂时得逞的时候，“伊里奇连一分钟也没有动摇过必胜的信心，他从早到晚工作着，但重重的心事使他夜不能寐。他时常夜里醒来就打电话布置工作。”

对于失眠的人来说，黑夜是漫长的。列宁由于时刻都在考虑革命事业，因此常常在夜间产生革命的灵感。他不愿意丢掉它，希望抓住那象闪光一样的“灵感”火花，他还常常用电话叫醒一些正在沉睡的领导人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

为了工作，列宁甚至没有时间去食堂吃饭。妻子为他买好主食和汤，把汤反复热上几次，他才能回来。

列宁从来没有参加过冗长的丰盛宴会，更没有时间去听音乐会。尽管他小时弹过钢琴，也很爱唱歌，可是在战争和建设的紧张年代里，他既没有那份

雅兴，更没有时间。1919年秋天，他出席了首都大剧院的一个音乐会。由于那天有俄国著名歌唱家作精采表演，剧院里很挤，列宁穿着大衣走进去，谁也没认出来。但当帷幕降落时，一个观众发现了他，便高呼起来：“世界革命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万岁！”于是人们的情绪顿时热烈起来了。看到这种情况，列宁只好从旁门离开了演出大厅，一个人悄悄地走了。那是他遇刺以后不久发生的事情。

大多数人都认为列宁是个不知疲倦的人，那只是看到了列宁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这一面。他的妻子最了解他，她看到他经常是疲倦地回到家里，尤其是在与党内同志发生争论之后，他不仅疲倦，而且还感到伤心和忧郁。因为她知道，列宁很注重友情。他与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都有很深的交往，在革命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是，在党内分歧剧烈的时候，列宁不得不放弃个人感情而坚持革命原则，维护党的利益，尽心竭力地作好各项工作。

第三十八章 反对迷信

工人领袖不是天使，不是圣人，不是英雄，而是普通的人。

——列宁

进入 1920 年以后，国内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苏俄进入了和平建设的新时期。由于列宁在战争期间顶住重重压力，英明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符合实际而又灵活多样的有效措施，化解了一次次极为严重的危机，使革命事业转危为安，并不断取得重大胜利，所以在党内外赢得了极高的声望。这样一来，人们对他的敬仰和崇拜之情也越来越强烈了。

这种崇拜在党的九大上有明显的表现。

1920 年 3 月 29 日至 4 月 5 日，俄共（布）召开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 554 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 162 名有发言权的代表。

3 月 29 日，列宁出席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致了开幕词，被选为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并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大会主要讨论了怎样进行经济建设等问题，取得了一致认识。

4月5日，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完成了全部议程，列宁致完闭幕词后，会议便结束了。但是，代表们并没有离开会议大厅，因为大家都知道，敬爱的列宁同志的50寿辰快到了，他们打算为列宁祝寿。

列宁坚决反对任何吹捧和颂扬他的功绩的做法。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总是千方百计加以制止。这次，一些代表提议为列宁祝寿，全体代表的热情都很高，不断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表示完全赞同。面对这种情况，列宁既不自在，又十分不安。列宁心里不高兴，但又不便去批评代表们。对于他说，这是一种非常尴尬的处境。为了转移大家的情绪，列宁建议说：“让我们一起唱《国际歌》吧！”代表们一起唱完这首无产阶级颂歌以后，一个跟着一个走上讲台，对列宁表示热烈祝贺。列宁无可奈何，只得悄悄离开了会场，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打电话催促大会主席赶快结束这种颂扬性的讲话。但是代表们的发言仍在继续进行。这次会议通过了出版《列宁全集》的决定。

4月23日，九大以后，莫斯科市委举行会议庆祝

列宁 50 诞辰。会议主持人一再邀请列宁参加这次会议，但列宁实在不愿意听那些歌功颂德的话，所以到会议快结束时才来到会场。列宁在会上发表一篇给全党敲警钟的讲话。列宁首先感谢大家对他的祝贺，接着他拿出一幅讽刺民粹派首领米海洛夫斯基庆寿的讽刺画给大家看。在这幅画上，画家把前去向米海洛夫斯基祝寿的马克思主义者画成一群幼稚可笑的小孩子。显然，画家认为这类祝寿活动是非常幼稚的。列宁也是赞同这一观点的，他希望今后免去这种祝贺仪式。接着，列宁谈论布尔什维克党的现状。他首先念了考茨基 1902 年预言革命中心移向俄国的一段言论，然后说：“这段话使我产生一个想法：我们党目前也许会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即变得骄傲自大起来。这是十分愚蠢、可耻和可笑的。大家知道，一些政党有了骄傲自大的可能，这往往就是失败和衰落的前奏。”列宁要求全体党员都应当加倍注意这种危险的倾向。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我希望我们决不要使我们的党落到骄傲自大的地步。”

反对搞个人迷信和对领导人歌功颂德是列宁一贯的思想和作风。

列宁 1918 年 8 月 30 日遇刺，伤势严重。当时这件事震惊了全国，人民群众纷纷集会，声讨阶级敌人，祝愿自己的领袖早日康复。人民委员会办公厅收

到来自各方面询问列宁病情的电话、电报和信件不计其数，到人民委员会来慰问列宁的工农兵群众的代表团也络绎不绝。鉴于这种情况，各报每天都发表列宁病情公报，刊载大量人民反应的报道、群众集会的决议和谈论列宁的文章，其中自然有不少发自人们内心的歌颂列宁丰功伟绩的言辞。

列宁康复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他首先翻阅半个多月来没看的报纸。过了不到半小时，列宁就连续按电铃，急迫地召唤办公厅主任。办公厅主任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很紧张，以为列宁出了什么事，飞快地向他的办公室跑去。

他进屋一看，列宁的脸都气白了，激动地看着他，责备道：

“这是怎么一回事？”

列宁指着报刊上给他名字冠上的各种美好辞句的标题和许多他的图片，继续质问办公厅主任：“你怎么能让他们这样干呢？你看一看，报纸上写了些什么？写的都是我，全是夸张，说我是天才，是什么特殊的人。”

列宁的怒气还没有消，但语气稍稍缓和了一些：“我们早已同英雄问题决裂，可是这里忽然又推崇起个人来了！这是非常有害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你看看，到处都是我的图片，躲都躲不开。这是绝不容许

的。我是同大家一样的人。最好的医生给我治疗，还要怎样呢？群众享受不着这样的护理和治疗。我们还做不到使人们都能得到这一切。”

办公厅主任耽心列宁太激动会伤了身体，在列宁平静下来以后，便把列宁被刺在全国引起的焦虑不安、人民群众真诚关怀和由衷热爱列宁的动人情景告诉了列宁。列宁听后轻轻地说：“这一切确实令人感动的。我不知道我使大家那样焦虑不安。但是，现在应当停止这样做了。不应当引导群众过分注意一个人的事情。这是不必要的，也是有害的。这违反我们对个人的观点。”

然后，列宁委托办公厅主任去制止对他的各种不适当的宣传：“你一定替我办这件事情，立即到各报刊去，不要责备他们，真实地转告我对你们说的话：他们是有头脑的，从明天起，停止做这种突出个人的事情，让报纸的版面登载更需要的、更有实际意义的东西。”

一会儿，《真理报》编委奥里明斯基和学者勒析辛斯基也来到列宁的办公室，列宁愉快地欢迎这两位早年的挚友。

奥里明斯基一向彬彬有礼，很有教养。他对列宁说，他主观上对所发生的事是感到高兴的……

列宁不解地问：“为什么？”

奥里明斯基慢吞吞地回答：“由于这件事，我可以看出您身体健康、朝气蓬勃。但客观地说，这事的确实不适合，报纸集体造神是不适合的。”

勒析辛斯基开玩笑说：“弄得不好还会把您当作圣徒呢，要知道圣徒也是有利可图的。我真想重操日内瓦的旧业，把这一切都画出来。”

“这就对了，”列宁快活得叫了起来……“让我们高兴一下吧，像过去那样画一张出色的漫画，就用‘英雄’与群氓作主题，并且也把主张英雄史观的米海洛夫斯基为首的民粹派分子挂上……”

列宁高兴起来，哈哈大笑，不过立刻就催促说：“快去吧！别开玩笑，问题很严重，应该立即制止这种个人崇拜。请你们三个人一起，马上到各个报刊杂志编辑部去一趟，巧妙地停止个人崇拜的宣传，用更需要、更有意义的内容来充实版面。请你们快点去办。”

第二天，各报发表了关于列宁康复并已开始工作的简短消息，宣传调子彻底改变了。

列宁与高尔基之间有很深的友谊，但列宁对高尔基颂扬他的文章也很反感。1920年，高尔基以赤诚的感情和对列宁深深的爱戴，为《共产国际》杂志第12期写了一篇题名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文章，以社论形式发表；还写了《致赫·威尔斯的

一封信》。高尔基在书信和文章中对列宁作了不恰当的歌颂，例如，说“列宁的个人生活完美无缺，要是在宗教盛行的时代会被人们当作圣徒。”“这样的人在世界上还从未有过。”列宁是“力量的源泉”，“站得高于一切的中心人物”，等等。列宁读了高尔基的这些文章和书信后很不满意，要求立即把它们从杂志上去掉，或者收回这一期杂志。但杂志已经发出了，列宁没有办法，只好就这件事为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起草一份决定草案，指出：《共产国际》第12期刊登高尔基的两篇文章是不妥当的，因为文章没有任何共产主义的东西，相反有许多反共产主义的东西。今后，此类文章绝对不得在《共产国际》上刊登。

列宁一方面反对别人对自己的颂扬，一方面把自己摆在平常的位置上，从不认为自己能代表党中央，不认为自己高人一等。1921年3月15日，越飞致信列宁，把列宁与党中央等同起来。列宁立即回信说：“您不止一次地说，‘中央——就是我’，您这就错了。只有在非常激动和疲劳过度的情况下才能写出这种话来。原中央（1919—1920年）在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上击败了我……在组织问题和人事问题上，有无数次我处于少数。”

列宁平易近人，从来不摆大国领袖的架子，是尽

人皆知的。这里有一个小故事可以真实地说明这一点。那是1921年6—7月举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6月22日，大会开幕，列宁被选为代表大会名誉主席。那时，会场只是一个简单的会议室，有一个讲台，台上有一张长板凳，还有一张桌子，周围坐着四五个主持会议的人。有一次，列宁走进会场，几位主席团委员想站起来，给他在桌子边腾个地方。列宁摆摆手，请他们坐下，自己则坐在讲台的台阶上。这就是列宁的性格。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平易近人，没有任何官架子的人。面对造神运动，面对个人崇拜的宣传，称他为天才的美好辞句，他从内心感到反感，发出严厉而又正当的怒吼：“真是莫名其妙！”对此，一切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人们都是理解的。

列宁是一位爱思考问题的人。每当遇到“个人迷信”活动，他就想：如果人民把领袖当做圣徒，那么，无产阶级政权与宗教还有什么区别呢？因此绝不能容许这样做！于是列宁奋笔疾书，写下这样的名言警句：

“工人领袖不是天使，不是圣人，不是英雄，而是普通的人。”

列宁的伟大正是在于他的平凡之中。从一个受迫害的政治理论家，成为人民爱戴的领袖；从一个身

处逆境的知识分子，成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开国元勋。这种地位上的巨大变化丝毫没引起他的头脑发热，相反，他清醒地看到自己仍是个“普通的人”，任何吹捧与迷信都是他从心底里厌恶并坚决反对的东西。

列宁对个人迷信的愤怒是极其真实的，丝毫没有虚情假意或矫揉造作。

一般人看来，列宁这样强烈地反对个人迷信似乎有些不通情理。其实个人迷信是传统势力和习俗对人们思想的影响，而列宁正是把反对个人迷信看成是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革命。他认为，把领导人偶像化，那将会导致个人独断专行；破坏民主集中制，损坏无产阶级领袖核心的形象。他非常欣赏马克思的一段话：

“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

列宁深知：越是伟大的人物，越不需要歌功颂德。在列宁眼里，马克思就是这样的伟人，是他效仿的楷模。

列宁，这位自称为“普通的人”的人，确实有着一颗善良的、平常人的心。他一方面对真正的敌人毫不手软，另一方面又善待平民百姓。他认为：对待那些地位较低的人粗暴无礼是一种卑鄙的小人行径，

是和社会主义的公民和共产党员不相容的。他常说：

“共产党员不过是沧海一粟，不过是人民大海中的一粟而已。”他的言行之间的误差几乎等于零！

一位给列宁生炉子的清洁工回忆说：当列宁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遇见她时，总是与她亲切和蔼地谈话。善于尊重每个普通劳动者的人格——这是列宁的独特性格。

第三十九章 兵败华沙

波兰的进攻就是当年要把整个国际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的那个旧计划，既然那个从纯军事角度来看是有把握获得绝对胜利的庞大计划在那时都没有成功，那么，现在的这个计划就从同样的角度来看也是不会成功的。

——列宁

列宁深知和平喘息的时机来之不易。布列斯特和约签订没多久，就遭到了破坏，全国卷进战争。打败协约国和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尤登奇等白卫分子后，又获得了和平。这样的时机，真是千载难逢，而且代价极为高昂。

列宁，一个时时刻刻想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人，一个真正关心人民疾苦、对人民充满感情的人，怎能不十分珍惜这极为珍贵的和平喘息时机！因此，

列宁领导俄共（布）和苏维埃政府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努力将和平喘息时机变为持久的、巩固的和平时期。从1919年12月到1920年4月，苏维埃政府先后50多次向美国、法国、英国、日本、波兰、罗马尼亚和爱沙尼亚等资本主义国家提出和谈和建立经贸的建议。

苏维埃共和国希望同自己的西方邻国，首先同波兰建立正常关系。1919年底，苏维埃政府在给波兰的照会中说：“波俄之间的和平，对两国的发展，对于两国的繁荣和经济活动都是非常必要的。苏维埃政府坚信，两国之间的任何分歧都可以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得到消除，两国人民将非常高兴地欢迎这种协商。”

苏维埃政府的和平方针是根据列宁的思想确立的。列宁认为，苏维埃俄国为了避免流血，应对波兰作重大的让步，特别是在边界问题。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同波兰开始谈判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了这种卓越的思想：给予波兰的土地要比克列孟梭和寇松给的还多。在里加进行谈判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电话里详细询问了各项建议的细节，最后仍然坚决主张按照现有的形式签订条约。”

但是，波兰统治集团却无视苏维埃俄国的这种

诚意，他们妄图利用进攻俄国来扩大本国疆界，同时镇压国内的革命运动。这样，以皮尔茨基为首的波兰统治集团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拒绝了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缔结和约的建议。1920年4月25日，美国、法国和英国装备起来的波兰军队同俄国内部的佩特留拉的军队一起，开始在乌克兰发动军事进攻。他们认为苏维埃俄国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国力很弱，战胜它是不成问题的。

为了进攻苏维埃共和国，协约国把邓尼金失败后躲藏在克里木的白卫军也装备起来，弗拉格尔成了这些部队的首领。

就这样，苏维埃共和国的和平喘息时间只持续了三个多月，又被协约国的军事干涉终止了。

其实，对波兰进攻苏维埃俄国的危险性列宁早就估计到了。早在1920年2月19日，列宁就在给托洛茨基的电报中提出：“波兰人也会打过来。”而且列宁认为，如果对此毫无准备，就是白痴和犯罪。

2月27日，列宁致电托洛茨基，就波兰问题作出专门部署，列宁指出：“一切迹象表明，波兰将向我们提出根本无法办到的、甚至是蛮横无理的条件。必须集中全部注意力，做好备战工作，加强西方面军。”加强西方面军，其主要目的当然是防御波兰。列宁继续写道：“我认为，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从西伯利亚

和乌拉尔把能够运来的一切都迅速运往西线。我担心劳动军这件事我们办得稍微急了一点。除非我们现在把他们全部用来加速向西线的运输。”列宁在电报的最后十分肯定地说：“必须提出准备与波兰作战的口号。”

3月11日，列宁还分别致电西方面军、高加索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强调指出：“波兰人势必要和我们打仗”，“我们尽一切可能加强防御”。

3月15日，列宁致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马·斯良斯基，要求革命军事委员会必须下令纠正正在克里木所犯的错误。这个错误是指没有调足够的兵力攻占克里木。致使邓尼金的残部驻扎那里，成了心腹之患。

可见，列宁和俄共（布）中央认为西线是主要战线，因此应该尽快地抽出巨大的人力和物力集中在这条战线上，同时还必须作好歼灭克里木白卫军的准备。

但是，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和总司令部低估了波兰和白卫军进攻的危险性。3月25日，托洛茨基在会议上说，西方战线没有独立的意义。他断言，反对苏维埃共和国最厉害的手段就是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协约国已经全都使用了。按照托洛茨基的这种说法，好像协约国再也没有什么新鲜

的招数了。这种思想违背了列宁和中央的意见，松懈了人民的警惕性，有碍于红军的作战准备。

所以，当波兰军队开始进攻时，苏维埃共和国反击敌人进攻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完成。结果，敌人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和中央委员会以及各级地方组织都把全部注意力又转到国防问题上来。先需要向人民讲清楚自卫战争的意义，明确规定任务，并拟订消灭敌人的计划。4月26日和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都是讨论这个问题的。列宁和中央的对敌斗争计划包括以下内容：为了阻止敌军在乌克兰的推进，从高加索方面军抽调大批部队到西南方面军去；西方面军在波列西耶以北进行主攻；西南方面军对准布列斯特方向辅攻。总之，列宁的根本出发点是：要打有准备之仗。

4月30日，中央公布《致俄国全体工人、农民和正直的公民》宣言。这一文件揭示了战争的目的和性质，指出了打垮干涉者和白卫军的重大意义和所需做的事情。

5月5日，在莫斯科中心剧院广场举行了盛大阅兵式，列宁检阅莫斯科自卫部队。在阅兵式之前，列宁在广场上对开往波兰战线的红军战士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列宁指出：这次战争是波兰地主资产阶

级政权在协约国的唆使下强加给俄国的。苏维埃俄国同波兰的工人和农民并没有什么争执，我们愿意承认波兰的独立，在波兰的边界不受侵犯的条件下缔结和约。

讲完话后，列宁走进莫斯科大剧院，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会和工厂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一切为了战争，只要集中了一切力量并作出牺牲，就一定会取得胜利。

但是，由于苏维埃共和国事先没有作好防御的充分准备，所以，5月6日，基辅被波兰军队攻占了。

列宁对反对波兰地主资产阶级的战争的宣传工
作很重视，他从一开始就提议，所有关于波兰和波兰战争的文章都应经过审查，不要陷入民族沙文主义的泥坑，始终要把波兰的地主、资本家同工人、农民区别开来。

红军在白俄罗斯发起了首次进攻。进攻于5月14日开始，目的是阻止敌人向乌克兰腹地推进，破坏他们进攻白俄罗斯的计划。起初，这一攻势效果显著，战线向西推移了100—200公里。但是，敌人把预备队调集到一起，收复了失去的地盘。

虽然红军第一次进攻没有成功，但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迫使敌人把自己的预备队投入战斗并最终放弃了在乌克兰的攻势，从而有助于西南方面军

的部队作好进攻的准备。为了加强这个方面军，从北高加索调来第一骑兵集团军，从乌拉尔州调来第25师，即恰巴耶夫师，还从西伯利亚调来一些部队。西南方面军司令员是亚·伊·叶戈罗夫，5月18日，中央政治局任命斯大林为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5月26日，西南方面军开始进攻。进攻最初没有成功。于是，俄共（布）中央在西方战线集中了尽可能多预备队。6月5日，西南方面军的部队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并急速向西挺进。6月12日，解放了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政权转归革命委员会。

在红军的打击下，敌人急速向西撤退。7月4日，西方面军发起新攻势，最初几天就取得重大胜利，波兰人开始撤退，缴获5门炮以及其他各种战利品。列宁得知这一胜利后，立即发电催促立即采取措施在新解放区建立苏维埃政权、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赶走地主、把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7月11日，红军解放了白俄罗斯的首都明斯克。

波兰统治集团惊慌失措，赶紧派代表参加7月5日在比利时斯帕召开的协约国会议，请求协约国最高委员会给予支援。7月12日，英国外交大臣寇松照会苏维埃政府。这是协约国要求红军停止进攻波兰的最后通牒。寇松的照会的主要内容是：建议苏维埃

俄国同波兰停战，条件是波兰撤到巴黎和会给波兰划定的边界，即格罗德诺、亚洛夫卡、涅米罗夫、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多罗胡斯克、乌斯季卢格、克雷洛夫一线以西，此线以东地区全归苏维埃俄国。红军必须撤到此线以东 50 公里处。寇松还建议苏维埃政府同弗兰格尔签订停战协定，条件是弗兰格尔退到克里木。

列宁对寇松的照会的态度非常明确，认为这是一个大骗局，目的是要兼并克里木，想用骗人的语言夺走苏维埃俄国已经到手的胜利果实。所以，列宁要求斯大林猛烈加强攻势。

稍后，列宁在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给寇松的电报中补充了一项与波兰议和的原则：苏维埃政府认为，除了俄国劳动群众的利益外，需要注意的是波兰劳动群众的利益，因此，只有通过同波兰直接谈判，才能签订同波兰的和约。

列宁的这些思想是俄共（布）中央的指导方针。中央全会决定“拒绝协约国干涉苏维埃俄国同波兰的谈判，如果波兰政府亲自提出和谈建议，那就予以采纳。中央还认为，必须郑重地正式告诉波兰人民，苏维埃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保证波兰人民的独立共和国的边界线比寇松照会提出的更靠东。苏维埃政府按照上述精神，答复了协约国的最后通牒。这是列

宁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具体表现。

俄共（布）中央全会坚持这样的立场：在同波兰达成停战协议以前，红军必须继续采取军事行动。

7月17日俄共（布）中央全会批准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针对寇松的照会而发表的告苏维埃俄国和乌克兰的工人、农民和一切诚实的公民书。这份告公民书充分表达了苏维埃国家劳动人民捍卫自己的自由和独立，不让帝国主义列强侵犯的坚强决心：“我们热切希望所有国家和平友好，但由于非常不信任世界帝国主义，我们必须更加紧握手中的革命利剑，把保卫、巩固繁荣我们社会主义共和国、反对一切敌人的斗争进行到底。同时，我们也要帮助波兰工人和农民摆脱波兰本国和外国的压迫者。”

战争进行到7月份，苏维埃共和国的部队已经很疲惫了，他们需要补充人员、弹药和武器，前线形势日益严重。弗兰格尔开始举行进攻。波兰也在准备新的预备队。

在这种复杂情况下，苏维埃共和国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司令部和各方面军司令部却没有作出正确的判断，他们过高地估计了红军的潜力和敌人失败的程度，甚至认为三周内占领华沙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把西南方面军的主要打击方向转移到加里西亚境内。总司

令批准了这个建议。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因为这样一来，西南方面军和西方面军就在不同的方向进攻，从而削弱了红军的攻击力量。尽管如此，红军仍然于7月底解放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领土，并且逼近波兰边界线。

波兰政府口头上同意与苏维埃俄国进行和平谈判，实际上却暗中破坏，并准备新一轮的军事行动。所以，红军还在继续进攻，并越过波兰边界线。

7月22日，列宁致信契切林，指出：如果英国、法国等国希望真正的和平，那就请把弗兰格尔领走，他是协约国豢养的，那时我们就立即谈判。如果波兰希望媾和，我们同意；这点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现在再讲一遍，让它提出来吧。

根据列宁的指示，契切林起草了苏维埃俄国给英国的复照，经批准后用无线电发出。

国内局势变化多端，令人捉摸不定。有些地区暴乱严重，特别是库班的暴乱尤其突出。来自弗兰格尔的危险日益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重新讨论了各条战线的形势。8月2日政治局通过一项决定，认为弗兰格尔战线有重大意义，把它划为独立的战线，决定将西南战线克里木划分出来成立独立的南方面军，并委托斯大林组织这个方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列宁马上致电斯大林，把中央的

这一决定通知他，并告诉斯大林，中央愈来愈倾向于立即同资产阶级波兰媾和。

谁知斯大林不同意中央的意见，他当日即从乌克兰的洛佐瓦亚复电列宁说：“残酷的斗争愈来愈激烈，大概今天要丢掉亚历山德罗夫斯克。收到了您关于划分战线的短信，政治局本来不该讨论这些琐事。……总司令部的诺言我一点也不相信，他的这些诺言只能让人上当。至于谈到中央内部的倾向同波兰媾和自我批评情绪，不能不指出，我们的外交有时非常成功地破坏了我们军事上的胜利成果。”

接到斯大林的复电后，列宁立即回电，表示不同意斯大林的意见，他说，我不理解，为什么您对划分战线这样不满意。既然来自弗兰格尔的危险不断增长就必须这样做。我们的外交服从于中央，只要弗兰格尔的危险不引起中央内部的动摇，那么我们的外交在任何时候也破坏不了我们的胜利。我们从库班和顿河州得到了令人不安的消息，说暴乱正在可怕地蔓延。他们坚决要求尽快消灭弗兰格尔。

红军指挥人员之间存在意见分歧，妨碍了对波兰作战。西方面军作好了进攻华沙的准备工作，计划让主力从北面绕过华沙，然后进攻华沙。同时，总司令已经得知，波兰军队准备打击由力量较弱的莫济里部队驻守的侧翼防线。8月10日，总司令向西方面

军司令指出了这一危险性，但西方面军司令不同意这一意见。所以，直到8月20日，第1骑兵集团还在继续进行进攻利沃夫的战斗，而莫济里军队并没有得到加强。

8月17日，波兰军队发动反攻了，他们首先进攻的正是莫济里军队的防线。波军突破了这一防线，并迫使西方面军后退。不久，红军也开始从利沃夫附近后撤。到此，进攻华沙战役宣告失利。

由于红军在华沙和利沃夫附近失利，苏维埃国家的处境极其艰难，战争极有可能延长，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将经受新的严峻考验。另外，弗兰格尔在南方也加紧了军事行动。

1920年9月22日，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开幕。此时的形势十分危急，对波兰的战争发生了有利于波兰的转折。列宁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政治报告，着重谈了对波战争中的政策、红军进攻华沙的意义以及同波兰缔结和约的问题。

列宁指出苏维埃政府早在一月份就建议波兰在对它极为有利的条件下缔结和约，但波兰把这个建议看成是软弱的表现，所以挑起战争。对此，红军发动反攻并打到华沙城下，这对于国际局势产生了十分强烈的影响。红军以自己的进攻对战后帝国主义关系体系的基础——凡尔赛条约造成了真正的威

胁。列宁说：这在全世界的政治中都是一个最重要的转折。在此以前，我们作为反对全世界帝国主义的唯一力量，仅仅希望抓住帝国主义分子之间的裂缝生存下来。而我们现在更加巩固了，我们将采取反攻来回敬你们的每一次进攻，要让你们知道，你们不仅要冒耗费几亿资金的风险，而且要冒你们的每一次有可能扩大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土的风险。

同时，列宁还分析了红军在华沙城下失利的原因，他指出，原因应该既从政治方面也从战略方面寻找。错误的根源是过高估计了波兰工人和贫苦农民的革命准备，过高估计了苏维埃军队在主要的方向的力量优势。较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波兰边界止步，这样可以取得可行的胜利。

1920年秋天，杰出的国际主义运动家克拉拉·蔡特金来到莫斯科，由于水土不服病倒在床。列宁与她是亲密的战友和朋友，前去探望她。用蔡特金的话来说：“他像最温柔的母亲一般，关心地问我是否得到适当地医治和营养，再三询问我需要什么东西，等等。”

在同蔡特金的谈话中，列宁也谈到红军兵败华沙的问题。

蔡特金说：“当红军英勇地挺进华沙时，我和许多人的心中满怀着革命的美梦；可是红军从波兰撤

退了，这像严霜一样摧残了这些美梦，使它们未能实现。”

列宁默默地沉思，他不无遗憾地说：是的，事情就这样在波兰发生了。由于当时的那些情况，我们那些英勇非凡的先锋队没有任何步兵的后援，缺少装备，甚至未能吃到足够的干面包。他们不得不向波兰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收取粮食和其他的必需品。于是这些人就把红军看作是敌人而不是兄弟和解放者。我们指望的波兰革命没有发生。受地主资产阶级蒙蔽的农民和工人，保卫了自己的阶级敌人，让我们英勇的红军战士饿死，或把他们打死。

列宁继续向蔡特金阐述自己的观点，你知道吗，同波兰媾和，最初遭到激烈的反对，我受到极其猛烈的抨击。因为和约的条件确实十分有利于波兰而使我们吃亏。但我认为，从政治的观点着眼，同敌人媾和是比较聪明的，据我看来，条件苛刻的和约带来的一时牺牲，总比继续作战的代价小一些。我们的红军战士，我们的工人和农民，他们已经受了这么多痛苦，难道我们应该再派他们去前线吗？如果不断地投入战争，将有千万人挨饿、受冻和在默默的绝望中死去。食物和衣服现在已经缺乏了。工人和农民在发牢骚，说我们只拿走他们的东西而什么也不给他们。想到另一次冬季作战的苦难，我是不能忍受的。我们必

须讲和。

列宁再也不愿意打仗了，他为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贫穷苦难而忧心忡忡。由于心情沉重，列宁与蔡特金谈了一会儿便告辞了。

波兰虽然取得了暂时的军事胜利，但是它面临的形势却十分严峻。在波兰，除工人外，小资产阶级政党也开始赞成和平，甚至军队也开始动摇。所有这些情况都迫使波兰政府不顾法国、美国和英国的强烈反对，开始同苏维埃俄国谈判签订和约。但在谈判当中，波兰政府提出一些涉及国家边界的补充要求。列宁充分研究这种情况，建议接受这些要求，并指出同波兰谈判的苏俄代表团团长越飞尽快缔结初步条约。

10月12日，在里加，以苏俄和乌克兰为一方，波兰为另一方，双方共同签订了《关于停战及实现和平的初步条件和条约》。10月23日，俄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这个条约。两天以后，波兰议会也批准了条约。

10月15日，列宁在一次讲话中再次解释苏维埃俄国决定立即同波兰签订和约的原因。列宁说：“苏维埃共和国的情况非常严重，这就是迫使我们急于在冬季战局之前求和。我们急于求和，是想避免冬季战局，是因为我们意识到，尽管会得到一条对我们不

利的边界线，就是说只能得到白俄罗斯的小部分领土，只能把较少的白俄罗斯农民从资产阶级的压迫下拯救出来，这也总比让全俄国的农民再受一次苦难，再经受一次冬季战局要好些”。

同波兰签订和约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苏波战争的结束，意味着协约国用军事进攻扼杀苏维埃俄国的阴谋以失败而告终。列宁在评价波兰军国主义者反对苏俄的这场战争的战局时指出，波兰统治者现在接受的和约不如战前苏维埃政府向他们提出的和约对他们有利。列宁强调指出，苏维埃政权再一次证明，它实际上比看上去要更为强大。如果你今天不愿意同苏俄讲和，过些时候你就不得不接受更坏的条件来讲和。

1920 年秋，俄国南方的局势日趋紧张。南方的弗兰格尔军队有 8 万人之众，苏波和约签订后，协约国让弗兰格尔扮演反苏的主要角色。弗兰格尔得到协约国的大量援助，成为一支拥有大量的骑兵、炮队、坦克和空军的非常强悍的部队。而守卫南方的苏维埃红军只有第 2 骑兵军团以及几架老式的飞机和几辆坦克，在数量和装备上，都远远不及白卫军骑兵队。但苏维埃红军的精神面貌要比白卫军好得多。

南方战线每天都有战斗发生。9 月 8 日，列宁提议任命伏龙芝为南方面军司令员，并征询了托洛茨

基的意见。列宁还非常重视弗兰格尔部队的一位投诚者的建议。这位投诚者叫雅柯夫列夫，他建议在弗兰格尔军队内部成立一个旨在搞掉弗兰格尔并将其军队交给苏维埃政权的秘密军官组织。参加这个组织的有近 30 名弗兰格尔各主要司令部的军官。但他们要求俄国政府保证对其实行赦免，并要求总司令作相应的表态。

9 月 9 日，列宁在给托洛茨基的信中认为，雅柯夫列夫的有关建议是极其重要的，应予以采纳并予以审查。但不管审查情况如何，就立即起草一份宣言书。根据列宁的意见，很快就草拟了《告弗兰格尔男爵军队军官书》，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等人共同签署，发表在《真理报》上。文件号召弗兰格尔军队的军官们拒绝充当为波兰地主和法国高利贷者效劳的工具，对于真诚自愿向苏维埃政权投诚的人保证不予追究。

但是，弗兰格尔还是于 9 月 14 日开始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企图占领顿巴斯。红军的第 13 集团承担抗击敌人的主要任务。在此之前，高加索方面军亚速海分舰队通过激烈的战斗，已经消灭了敌人的登陆部队。弗兰格尔在顿巴斯也没有获得胜利。而红军在集中力量，准备对敌人进行决定性的反击。

9 月 20 日，列宁同伏龙芝谈话。随后，中央全会

任命伏龙芝为南方面军司令员。

为准备粹碎弗兰格尔的军队，列宁和中央还非常重视南方面军内党的建设，多次进行党内动员。南方面军共 700 多个党支部和 16700 名共产党员。有这么一支强有力的党员队伍作核心，就能够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巩固纪律，大大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10 月 9 日，弗兰格尔开始了新的大规模的进攻，企图在红军的援兵到来之前消灭第聂伯河西岸的红军。弗兰格尔发动这次进攻还有更深一层的政治目的和背景：攻占第聂伯河西岸乌克兰地区，同波兰皮尔苏茨基的军队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反对苏维埃国家的统一战线。弗兰格尔希望，如果他的部队冲进了第聂伯河西岸乌克兰地区，就会破坏苏维埃政府同波兰政府的和平谈判。但是，白卫军进攻没有成功。红军阻止住了这伙凶恶的敌人，使他们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

红军继续准备进攻。10 月 10 日，列宁电告托洛茨基：“中央政治局责成军事当局冒一定的风险，调用西南方面军一些部队，以便最迅速和最可行的消灭弗兰格尔。为了帮助南方面军对弗兰格尔发动进攻，中央决定派加里宁、卢那察尔斯基、库尔斯基、谢马什柯和总司令加米涅夫到那里去。他们每天都

把他们的工作情况和南方面军的状况及时报告给列宁。

10月28日，红军开始反攻。到11月16日反攻结束，彻底粉碎了弗兰格尔分子，并且解放了克里木。这是苏维埃红军在国内战争期间时间最短，同时也是最有效的进攻性战役之一。

第四十章 文化建设

如果你们要问，为什么马克思的学说能够掌握革命阶级的千百万人的心灵，那你们只能得到一个回答：“这是因为马克思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全部知识的坚实基础……。”

——列宁

战场上的胜利推动了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建设，同时也为苏维埃政权的文化建设创造了必备的条件。列宁领导苏维埃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对俄国的全部文化生活进行根本的改造。

建设新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十月革命所开创的大规模工程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建设新文化有利于克服愚昧无知现象和宗教的欺骗宣传，有利于减少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丑恶行为。建设新文化，是确立新的社会主义行为准则和道德观念，确立对

社会、劳动、家庭的新态度的前提之一。

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革命和建设都迫切需要知识。这种迫切需求激发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对知识的孜孜不倦的追求。他们渴望知道一切，用自己的世界观独立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运用科学知识去从事一切想从事的工作。世代受剥削制度所压制和窒息的人民之中的人才，在苏维埃国家和各个领域不断涌现出来，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中坚力量。

列宁十分重视新生的苏维埃国家的文化建设，他在《怎样组织竞赛？》、《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和《科学技术工作计划草稿》等文献中，提出苏维埃俄国文化发展的具体计划。列宁主张要密切联系国家的具体历史任务来解决文化的基本任务：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建设各种学校、从人民中培养干部、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吸引过来加以利用，等等。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是文化建设计划的坚实基础。苏维埃政权所要解决的文化任务是宏伟而艰巨的。正如列宁所说的应该在几年乃至几十年的时间还清许多世纪的文化债。

建设新的社会主义文化，首先碰到的是如何对待文化遗产问题。列宁认为，工人阶级并不拒绝接受人类在许多世纪所创造的丰富文化财富，而是将它

吸收过来，批判地掌握它并运用它来建设新社会。不最充分地吸收世界文明中一切优秀的成果，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因此，布尔什维克党坚决反对全部否定过去文化的虚无主义观点。列宁指出：“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并且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

列宁认为，所谓“纯粹”无产阶级文化，即同过去遗产没有联系的文化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1920年10月2日，他在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发表题为《青年团的任务》的讲话，尖锐地批判了那些文化虚无主义者。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

列宁在这里提到了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代表人物。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苏维埃政权早期的群众性文化组织，十月革命前夕在彼得格勒成立。参加协会的有许多真诚希望参加苏维埃国家文化建设的青年工人，但协会的领导权为经常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波格丹诺夫及其拥护者所把持。波格丹诺夫提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的错误理论，坚持无

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独立性，并通过该组织的活动来贯彻自己的方针，他们把自己置于同党和苏维埃国家相对立的地位。他们完全否认以往的文化遗产的意义，企图摆脱群众性文教工作的任务，想以“实验的道路”来创造“纯粹无产阶级的”文化。

1920年10月，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莫斯科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派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去发表讲话，他明确指示卢那察尔斯基，要坚持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必须接受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并成为它的一个机构。但卢那察尔斯基没有这样做，后来他自己回忆说：“我在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相当婉转温和，而传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时就变得更加软弱无力了。他把我申斥了一顿，后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就根据他的指示改组了。”

在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列宁为大会起草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决议草案。在决议草案中，列宁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基本论点：苏维埃共和国的教育事业必须贯彻无产阶级斗争的精神；共产党应当作为最积极的力量参与教育事业；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能正确反映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文化成就，

而是吸收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要最坚决地反对否定一切文化，把自己关在与世隔绝的组织中，把教育人民委员部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工作范围截然分开的思想和行为等。

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根据列宁的这种思想所拟定的决议草案。但是代表大会以后，文化协会的某些领导人却声称他们不同意这个决议，并说俄共（布）中央要限制工人在艺术创作领域中的主动性，取消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组织。

其实，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领导人历来主张否定过去的文化遗产。十月革命前他们就打着“真正的”艺术革命的旗号，否定以往的精神遗产，鼓吹创立独特的无产阶级文化。例如，他们在《未来》杂志 1918 年第 2 期上发表过这样的诗句：

“为了明天，我们要烧掉拉斐尔的名画。

我们要捣毁博物馆，把艺术之花踏在脚下。”

由此可见，他们对以往的文化，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

列宁指出：这种狂妄的图谋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阵地，破坏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基础。在《论无产阶级文化》决议草案中，列宁着重指出，教育组织应该把自己的任务“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

来完成。

1919年5月6日，列宁在全俄社会教育代表大会上的贺词中，就已经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问题。列宁说，在推广社会教育的事业中，不得不首先同两个缺点作斗争。“第一个缺点，就是来自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人数很多，他们往往把按照新方式建立起来的工农教育机关看作自己在哲学方面或文化方面进行个人臆造的最方便的场所，往往把最荒谬的矫揉造作的东西冒充为某种新东西，并且在纯粹的无产阶级艺术和无产阶级文化的幌子下，抬出某种超自然的和荒谬的东西”。列宁在这里批评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领导人的理论与实践。列宁继续说，这在革命初期“是很自然的，是情有可原的，不能开罪于广泛的运动；我希望，我们终究摆脱而且一定会摆脱这种状况”。

1920年10月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代表大会草拟决议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列宁写了《决议草稿要点》，重申他在10月8日所写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决议草案中的一些最重要的论点：“不是臆造新的无产阶级文化，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级在其专政时代的生活与斗争的条件观点，发扬现有文化的优秀的典范、传统和成果。”

布哈林不同意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看法，他们俩人之间存在着的分歧。10月11日，布哈林要在当时正在莫斯科召开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代表大会上发言。列宁很不放心，立即给布哈林写了一个便函，要求他不要涉及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而“只要以整个中央的名义声明并论证”以下几点就够了：

- (1) 无产阶级文化＝共产主义
- (2) 实行者是俄国共产党
- (3) 无产阶级＝俄国共产党＝苏维埃政权。

显然，列宁不愿意把政治局内部的意见分歧扩大化，更不愿意把这种分歧宣扬出去，为此提出了三条原则性的意见。在第一条中，他用一个简单的等式概括了一个重要思想，如果没有达到共产主义的水平，那就谈不上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可以想象，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里，即没有物质基础，又没有文化素质，怎么谈得上建设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呢？同时列宁还指出：不管实行共产主义还是建设无产阶级文化，都要靠共产党的领导，文化协会不能脱离党的领导另搞一套。俄国共产党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它是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列宁用这样一个连等式概括了列宁主义的全部实质：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即“无产阶级＝俄国共产党

—苏维埃政权”。

但是，卢那察尔斯基和布哈林仍然不同意列宁的观点。暗中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布哈林在1922年9月27日的《真理报》上刊载了文化协会主席普列特涅夫的《在意识形态战线上》一文，列宁仔细看后，在这篇文章上加了很多批注。他把文章寄给了布哈林，还附了一封短信，尖锐地批评了布哈林和普列特涅夫。列宁在信中写道：

“寄上今天的《真理报》。究竟为什么要刊登普列特涅夫的杂文，刊登这些用各种深奥时髦的字眼故弄玄虚的蠢话？我标出了两处蠢话，并打了几个问号。作者应该学习的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科学。他应该进行一般的学习。难道《真理报》编辑部不打算向作者指明他的错误吗？这可是在伪造历史唯物主义！玩弄历史唯物主义！”

普列特涅夫的文章中强调这样的观点：“创造新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化，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基本宗旨。”列宁在这句话的下面加上了大量的批注。普列特涅夫认为，无产阶级文化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业，而不是“从资产阶级阵营里来的人”的事业。列宁不同意这种观点，在这里这样问道：“而农民呢？而机车创造者的百分比呢？”列宁强调说，俄国的工人是比较穷的，仅靠工人是不行的，怎么能在一个非

无产阶级占主要地位的国家里创造出无产阶级的文化来呢？经济基础决定政治的和文化上层建筑。列宁非常赞同托洛茨基的观点：“文化是靠经济的乳汁喂养的。而普列特涅夫等人却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割裂开来。”

列宁十分强调文化艺术的党性原则，认为它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第一个训条。早在 1905 年列宁就发表过这样一段文字：

“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作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列宁在这里所说的“超人的写作者，”实际上也应该包括后来的像马雅可夫斯基那样的未来派。列宁说他“乱叫乱嚷，捏造一些离奇古怪的字眼。”列宁曾作过这样的指示：“出版这些未来主义者的作品一年不准超过两次，并且不能超过 1500 册。

未来派像无产阶级文化派一样，是文化领域中的“摧毁派”。他们宣传说：“必须用极端革命的方法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的腐朽余孽——令人厌恶的资产阶级文化，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新的劳动文明。”未来

派的性质是小资产阶级的，与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表现在他们的作品中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和对文化遗产完全否定的态度。

这种全盘否定旧文化的思想不能不影响年轻人。1919年的一天，列宁和妻子来到亚尼茨行街的大学生宿舍，询问了他们的衣、食、住、行的情况，并与他们探讨俄国文化和古典文学。

从谈话中列宁了解到青年们对古典文学了解甚差，很多人甚至拒绝接受“旧制度的遗产”。列宁对此发表自己的看法。他深情地告诉青年们，他非常喜爱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的作品，他说：

“要知道他的作品教育了整整一代革命者。”

列宁在宿舍里看到墙上挂着的一条标语——马雅可夫斯基的一句诗：“我们要把钢筋混凝土抛上天空！”

列宁感到十分费解，他反问大学生们：

“干嘛要把钢筋混凝土抛上天空去？我们地上也需要它嘛！”

这些大学生们都很崇拜马雅可夫斯基，他们与列宁辩论，七嘴八舌地想要说服列宁。于是，列宁半开玩笑地地说：他要好好的读些有关著作，研究一下绘画和诗歌的方面的未来主义问题，那时，他一定能

驳倒所有的人。

后来，列宁责怪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说：

“您的青年是一些好青年，可是您是用什么去教育他们的呢？”

列宁认为未来派的绘画、诗歌及现代派艺术家的作品对新制度的建立没有什么帮助，这种貌似高雅的作品与急待解决的革命和建设任务不能合拍。他曾对德国革命领导人蔡特金坦率地说：

“我倒有指出自己是个‘野蛮人’的勇气。我不能把表现派、未来派、主体派和其他什么‘派’的作品认为是艺术天才的表现。我不懂它们。它们不能使我感到任何愉悦。”

列宁认为：“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深深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之中。”“它必须为群众所了解和喜爱……当工农大众还缺少黑面包的时候，难道我们要把精致的甜饼送给少数人吗？……我们必须永远把工农放在眼前。为了他们，我们必须学会管理，学会计算。在艺术和文化领域也是如此。”

总之，列宁认为俄国的现状是贫穷与落后。“有千百万的人渴求学会拼写自己的名字，学会算术，急于获得文化……文盲现象同建设的任务是不相容的”。

列宁参与起草《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一信，发

表在 1920 年 12 月 1 日《真理报》上。信中揭露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未来主义的理论家们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指出：1905 年革命失败后，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曾经泛滥，并且有好几年主导一些“社会民主派”知识分子的头脑。他们在反动年代醉心于造神说和唯心主义哲学，现在又企图用伪装的形式把这些观点灌输给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广大党员和群众。

列宁领导共产党员和广大文化工作者同“纯粹无产阶级文化”思潮进行斗争，促进了新的苏维埃文学和艺术的发展。

不能完全抛弃优秀的文化遗产，也不能完全抛弃掌握文化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列宁的一贯指导思想。

本来，按照列宁的思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一切公职人员都要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但他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行了例外，他认为可以付给他们高薪。

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初期指出：“国家要利用优秀的组织家和最大的专家只有两种形式：或是按照旧的方式，资产阶级的方式（即计算给高额报酬），或是按照新的方式，无产阶级的方式（即造成全民计算和自下而上的监督的局面，这样就必然而且自然地

使这些专家服从，并把他们吸引过来)。”

列宁认为，在当时条件下，“我们不得不采用旧的资产阶级的方式，同意对资产阶级最大的专家的服务付给高额报酬”。

列宁这样做的目的是吸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把他们争取到社会主义方面来，这是利用全人类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列宁说：仅靠摧毁资本主义，还不能填饱肚子。必须继承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优秀文化，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

在无阶级专政条件下，吸引旧知识分子同无产阶级合作，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最主要的任务之一，这也是一种新的斗争形式。这不是同知识分子斗争，而是一场争取知识分子的斗争，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如何，取决于这场斗争能否胜利完成。

列宁尤其喜爱高尔基这样的知识分子。高尔基不仅是一位文学巨匠，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在知识分子中有很高的威望。他主办的《时代文学》刊物，经常发表进步的政论性的文章，但由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前反对武装起义的声明就发表在这个刊物上，因此，高尔基的《时代文学》被认

为是“半孟什维克”的刊物。

列宁并没有因为政见不同而排斥这位伟大文豪，相反他总是以最真挚的私人感情和同志式态度感化帮助高尔基。这使得高尔基敢于毫无顾忌地与列宁倾心交谈。

1919年，高尔基埋怨住在冬宫里开会的贫民代表，指责他们把宫殿里的澡盆、非常珍贵的北方萨克森花瓶、东方花瓶都用做便盆，他认为：“这种流氓行为表现了他们要把美好的物品弄脏弄坏的思想。”为此，高尔基对苏维埃制度产生了不满，认为它限制自由，破坏文化，迫害知识分子。列宁了解到高尔基的这种情绪，尽全力帮助他站到革命立场上来。1919年7月9日，列宁写信给克鲁普斯卡娅说：高尔基“明天到达这里，可我倒是非常希望他能离开彼得格勒，因为他在那里心神不安，精神不振”。

第二天，列宁亲自会见高尔基并劝说他参加革命宣传工作。但高尔基拒绝了。1919年9月17日，列宁再次写信邀请高尔基到哥尔克政府休养所疗养。列宁的信写得非常友好、诚恳，说：

“我常到乡下去住两天，在那里我可以给您安排得很好，短时间或者较长时期都行。说真的，请来吧！电告何时来；我们给您定铺位，这样路上会舒服些。您真该稍微换一换空气。盼复！”

在回信中，高尔基没有谈疗养的事，而是继续坚持他的“平等博爱观”，企图说服列宁。列宁很快就写了回信，对高尔基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批评劝告。信中说：

“您的结论和您的一切印象，都是完全不健康的。彼得格勒是近来最不健康的地方之一……饥荒很严重，军事危险也很严重。您的神经显然经受不了。这是不奇怪的。人家劝您换个地方，而您却固执己见。把自己的神经折磨到病态的地步是极不明智的……”列宁在信中还指出：高尔基的怨愤情绪是因为他认为“这个被围困的城市遭受贫穷”。

列宁在信中恳切地说：“我们正在采取一切办法吸引知识分子（自卫分子）去同盗贼作斗争……在彼得格勒这个城市里失去地位（和理智）的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特别多……您受到那些满怀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列宁劝高尔基到火热的生活中去，劝他跳出知识分子的小圈子，去观察俄国居民生活中的新事物。

在信的结尾，列宁再次劝告高尔基：“要彻底改换环境，改换接触的人，改换居住的地方，改换工作，否则生活会使您完全厌恶。”

列宁对待高尔基这样的知识分子是耐心的，他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争取他们参加到革命和

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来。

列宁关于改造、继承旧文化以建设新文化的思想，关于吸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工人阶级方面来的思想，极大的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形成新文化的途径的学说。

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在非常复杂的条件下，在旧势力疯狂反抗和外国侵略者的武装干涉的国内战争环境中，在严重饥荒和经济破坏的情况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来解决建设新文化、消除群众愚昧和文盲充斥的任务。

由于俄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发展程度参差不齐，所以情况就变得更为复杂起来。单是鞑靼斯坦一个共和国，就有 32 种语言和 81 种方言。俄国各族人民分别处在极其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有些民族甚至没有自己的文字，尽管存在着这种种不良因素，列宁并没有延迟着手进行大规模的文化工作。列宁依靠社会主义革命所激发起来的巨大积极性，依靠劳动人民想做自己命运的真正主人的热切愿望，开始了文化革命。列宁把知识摆在极为重要的位置，他说：“劳动者渴求知识，因为知识是他们获得胜利所必需的。十分之九是因为没有受教育；现在要真正做到人人都能受到教育，全靠他们自己。”

列宁高度重视教育的思想指导着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发展教育首先需要扫除文盲，不识字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据统计，在1920年，文盲占据总人口的67%。根据这种情况，人民委员会于1920年7月19日批准成立全俄扫盲特设委员会。该委员会隶属于教育人民委员部，任务是实施人民委员会1919年12月关于在8—50年内扫除文盲的法令。

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青年到农村去扫除文盲，因为“在一个文盲的国家里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

1920年10月17日，列宁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指出：提高文化水平是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共产党员面前有三大敌人：第一敌人是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第二敌人是文盲，第三敌人是贪污受贿。列宁把文盲列为第二个敌人，足见列宁对文盲问题的严重性的重视。

列宁关于扫除文盲的思想得到了人民的热烈支持和拥护。人们要求得到知识、要求识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达到令人惊奇的程度。列宁和苏维埃政府要求各级政府对人民的这种求知欲因势利导，满足他们的迫切要求。

各地方政权坚决贯彻执行了列宁的思想和苏维

埃政权的法令，在城市和农村都成立了各类识字学校和扫盲班。所有的人，包括老年人和青年人，工人和农民，男人和女人，都在学习。红军战士在战斗的间歇时间拿出识字课本认真地学习。对于他们来说，读书识字就是走上通向光明的、内容充实的生活的伟大道路的开始。

列宁主张，帮助工农兵识字也要采用一种联系实际生活的教学方法。根据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到前线去决议后，许多优秀教师到前线去帮助红军战士识字。其中有一位叫埃利金娜的女教师，到部队后还按过去的经验教学教战士念书：

“玛莎喝粥，玛莎洗筐。”

但埃利金娜忘了“现在的红军战士已经不是沙皇的奴仆了，他们满脑子里都装着“革命”，“不当奴隶，要当主人”，所以，红军战士对她很不满意，说：

“你是怎么教我们的？我们不愿念这个！”

埃科金娜根据战士们的意见，改进了教学的方法，加进了战士们喜爱的并且熟悉的内容。也教他们念：

“我们不是奴隶，奴隶不是我们。”

教学与战士的思想实际联系起来了，战士们的学习热情就大大的提高了，既认了字，又学会了用文

字表达自己的思想，学会了阅读革命书刊。

在苏维埃政权成立的头三年中，就有 700 万人参加了识字学习，这是扫除文盲工作的一项巨大的成就。但是，列宁对这一成就并不乐观。他在 1923 年写道：“我们距离普遍识字还远得很，甚至和沙皇时代（1897 年）比，我们的进步也太慢。”

工人、农民和士兵识字了，接下来就需要有通俗易懂的书刊供他们阅读。多读书，读好书，才能使他们进入一个新的政治和文化境界，走向文明和进步。列宁十分重视群众借书的问题。据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回忆，十月革命后，他出任教育人民委员，列宁嘱咐他说：“你们要首先注意图书馆。必须利用各先进资产阶级国家所创造的广泛传播图书的一切形式。必须尽快让群众能够借到书籍。”

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之后，政府作出决定：大图书馆实行国有化，国家征用私人图书馆，学者、文学家和艺术家例外。这样，源源不断的书籍便运到了各公共图书馆。莫斯科鲁勉采夫图书馆 1918—1920 年得到国有化书籍达 150 万册以上，藏书量猛增一倍。1922 年 11 月 3 日，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图书馆事业实行集中化和建立俄罗斯联邦统一图书馆的法令。由于列宁和人民委员会对国家图书馆事业的重视，到 1920 年，图书的数量就已达到 270 万册左右。

严峻的经济形势造成了纸张极端匮乏，书刊的出版受到很大限制，因此只能出版那些最迫切需要、对社会有益的书刊。1920年，苏俄开始筹备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

在全国各个民族区域都先后成立了自己的出版社，用各族人民的语言广泛出版、发行革命政治书刊，促进文学和艺术的普及和提高。

1920年，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国家的定期出版物的印数大大增加了。《真理报》从1919年的13万多份增加到25万份；《贫民报》从24万增加到57万份。但是，在战争和经济破坏严重的形势下，要使社会对书刊的需要完全得到满足是很困难的，为此，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采取了一些措施。列宁发出指示：努力把报纸和书籍免费分配给各图书馆和阅览室，分配给正在为全国工农兵群众服务的图书馆和阅览室。

在文化建设过程中，列宁要求多出版一些书籍和报刊，但应该是好的书刊，有利于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书刊，而不是有害于人民的，更不是鼓动资本主义复辟的书刊。所以，列宁主张对出版事业要进行严格的监督。

1921年，党的领导干部米雅斯尼科夫给党中央写一报告书，并发表了《伤脑筋的问题》一文。在这

些书面材料中，要求恢复企业里的工人代表苏维埃作为带领工人战胜经济破坏的指挥员，组织农民联合并给予它以工农检查院的权力、给予一切政治派别以言论出版自由。

针对米雅斯尼科夫的这些观点，列宁于 1921 年 8 月 5 日写了《关于“出版自由”》一信。他在信中着重批评米雅斯尼科夫的关于言论和出版自由的观点。列宁指出：在凡是有资本家地方，所谓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报纸和作家的自由，就是收买和炮制舆论帮助资产阶级的自由。而在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包围的苏俄提出出版自由，就是让资产阶级及其奴仆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比苏维埃俄国强大很多，再让它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那就是为敌人的活动开方便之门，就是帮助敌人。

在信中，列宁进一步分析米雅斯尼科夫主张出版自由的原因，认为他误入了迷途，他觉得，“在我们这里有许多胡作非为和营私舞弊的现象，出版自由可以把它们揭发出来”。

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有许多毛病，像 1920 年秋天和冬天在分配燃料和粮食方面就犯了很大的错误。但是，您“本想医治共产党，抓的却是一剂致人死命的药”。不应当用给资产阶级自由，而应当用无产阶级的办法来医治共产党的病，

即：同党外同志建立联系，请他们来检查党员的工作。列宁认为，看到共产党的错误不能陷入绝望，不能投入资产阶级的怀抱，要治病应做很多工作。

总之，列宁认为，俄国的文化是落后的，由于历史的机遇，实现了政治和社会变革，这是文化变革的先导。实现了文化变革，苏维埃俄国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

第四十一章 共运壮大

我们不知道而且也无法知道，哪点星星之火能燃起熊熊之焰……因此我们必须本着我们新的、共产主义的原则，去“耕耘”一切园地，甚至包括最陈腐的、臭气熏人的、看来毫无指望的园地，不然我们就将肩负不起自己的任务……

——列宁

苏维埃和俄国所取得的每一项成就，包括文化建设的发展，经济建设的恢复和革命战争的胜利，都直接影响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1919年6月28日，战败的德国代表在法国的凡尔赛宫签署了和平条约。战胜国大肆渲染，把这个条约描绘成正义的象征。1919年7月14日，列宁尖锐指出：“凡赛尔和约甚至向傻子和瞎子、向许许多多近视的人证明，协约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和德国一

样沾满鲜血的齷齪的帝国主义强盗。”

凡尔赛条约加深了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的矛盾。列宁认为，帝国主义世界的全部重担都压在那些战败国劳动人民的肩上，而德国帝国主义者却保持住了自己的地位，他们依靠外国的贷款和输血，很快便恢复了工业生产能力，又开始准备新一轮的侵略战争。

协约国尽管重新瓜分了世界，但是，它们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消除。许多国家总认为自己分得少了，美国尤为不满。因此在战后，各战胜国之间的角逐愈演愈烈。

凡赛尔条约未能解决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战后，各殖民地国家纷纷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列强。

战后的国际关系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世界分裂为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帝国主义国家要面对日益强大起来的苏维埃共和国。这使得帝国主义者感到十分恐惧。1919年3月，英国首相戴·劳·乔治忧心忡忡地写道：“当前形势的最大危险是德国可能倒向布尔什维克主义……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整个东欧就将卷进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漩涡……”

恐惧，仇恨，是帝国主义者对待新生的工农国家的根本态度。他们千方百计要把德国和其他欧洲国

家变成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堡垒。

凡赛尔和约还促使世界革命危机进一步加深。因为它并没有使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反之，失业、通货膨胀、税收增加、物价上涨，这一切都使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数居民更加贫穷，陷入了生活毫无保障的境地，这不能不引起他们的反抗。

1919年—1920年，工人和士兵为维护民主自由和经济成果而举行的罢工和示威游行，出现了新的高潮。农民反对地主和大庄园主的革命斗争方兴未艾，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也蓬勃兴起。在世界革命运动基础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一步发展壮大起来了。

德国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德国人民中仍然蕴藏着巨大的革命积极性。1920年春天，德国无产阶级奋起斗争，爆发了有120万人参加的总罢工。鲁尔的工人们武装起来了，建立一支拥有10万名斗志昂扬的战士的强大红军。这个被列宁称为“德国的科尔洛夫叛乱”的卡普叛乱，虽然很快失败了，但德国团结起来，而且在政治上更加拒绝信任右翼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了。

1920年6月6日，德国帝国国会举行选举。选举结果表明，人民群众在向左转。与1919年1月19日的选举相比，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几乎丧失了一半的

选民；中派的独立党人的选民人数增加一倍以上；共产党人虽是第一次参加选举，却有 50 多万选民投他们的票。可见，德国革命工人运动正在蓬勃发展。

奥地利的情况也与德国类似。广大群众对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政策感到失望，开始向左转，日益强烈要求采取革命策略和建立革命组织。

形势要求共产党人进行周密的工作，把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争取过来，与城市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和劳动人民组成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者，争取自己的彻底解放。很大一部分劳动人民参加了工会、工厂委员会、合作社、农民协会等群众性组织，这就为共产党领导建立统一战线提供了方便条件。

但是，共产党的影响扩大很缓慢，争取群众的工作还存在许多困难。原因何在？首先，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和中派独立党人对工人群众有着传统的影响。其次，德国等国共产党队伍广泛存在左倾观点和情绪，这严重妨碍他们争取群众的斗争。

左倾分子搞宗派主义，采取过于激进的行动，损害了共产党的威望，影响了党同群众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1919 年 10 月，德国共产党在海德堡召开了代表大会，把左派首领们开除出党。但是，左倾宗派主义错误并没有因此而完全克服。这些错误妨碍

了德国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同时也难以使受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领袖影响的工人转到共产党一边来。

1919年—1920年，在各战胜国也陆续发生强大的工人运动。工人的罢工极为顽强，在许多场合还同警察和军队发生冲突，甚至酿成流血事件，发展成为公开的武装斗争。

俄国无产阶级最先打断资本主义锁链，为各国无产阶级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而资本主义各国的劳动者也越来越对俄国无产阶级表示尊敬和同情，这集中表现在他们进行的争取停止干涉苏维埃国家的战争的群众运动中。1920年夏天，声援苏维埃俄国运动达到高峰。这一运动吸引了不同国度几百万劳动者，证明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的强大力量，各国群众向他们的统治者喊出了“滚出苏维埃俄国”的口号。列宁高度评价了各国无产阶级兄弟般的支援，他说：只要国际资产阶级向我们举起手来，他们的手就会被本国工人抓住。

列宁深刻全面地研究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对运动的情况很熟悉，有十分精辟的见解，对意大利斗争的看法就是一例。

在意大利，阶级斗争十分尖锐，雇佣工人的斗争得到雇农和贫苦农民的广泛支持。1919年，许多工厂

企业在罢工过程中产生了工厂委员会，这是无产阶级群众性组织，它们同改良主义的工会相对立，吸引了企业的所有工人。工厂委员会积极干预生产，力图建立工人监督制度，这引起了资本家的切齿痛恨。1920年春天，意大利资产阶级开始进行同盟歇业运动，企图镇压罢工运动，取消工厂委员会。都灵无产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宣布进行总罢工。这次罢工遍及整个皮埃蒙特省，参加的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达50万之众。1920年8月，当资本家宣布实行新的同盟歇业的时候，工人们立即夺取了工厂。9月，意大利的钢铁工业、金属加工工业、机器制造工业几乎全部转入工人手中。工厂委员会成了各企业的主人，负责领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工人们把夺到企业和成立工厂委员会看作是夺取政权的第一步。但是，要迈出第二步，就必须把运动扩大到一切工业部门，依靠团结农民群众，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但在这个问题上，意大利社会党内部存在着分歧。

1920年7—8月，为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各国的代表团云集莫斯科。意大利有两个代表团来到了莫斯科，一个是扎软托·梅诺蒂·塞拉蒂率领的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团，一个是粮食专家费尔南多·波查尼率领的意大利合作社代表团。一天晚上，

他们同时接到通知：列宁将于明日接见两个代表团的成员。

第二天上午，意大利两个代表团的全体成员来到列宁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列宁的办公室非常简朴，甚至寒伧：平平常常的家具，蒙着黑漆布面；写字台大概用过了好几十年；电话机是带摇把的。据一位出席共产国际二大的代表回忆，列宁的衣着也十分朴素，穿着一件白衬衫，系着旧领带，一副小学教员打扮。

列宁对意大利局势研究之细，令人赞叹不已。列宁开门见山地问客人：

“对工人夺取工厂的运动有什么想法？”

客人们有些措手不及。

代表大家回答的是国会议员恩利科·杜果尼，他说：我们意大利社会党人不急于举行革命。我们掌握着各劳工局，它们可以监督工业和农业；我们在意大利几乎所有市政府中占多数，我们通过社会主义公社同盟对它们进行领导；我们密布的合作网是对全国经济起决定性作用的。总而言之，我们有政权的一切好处，而不用承担政权责任……

恩利科·杜果尼正说着，列宁突然用法语打断了他的话。十分肯定地指出：你们的劳工局将被烧毁，你们将被赶出市政府，你们的合作社将被砸烂！

列宁继续说：

“既要冒犯财富的占有者，就不能不夺取政权，不管这会担多大的责任，付出多大的代价。否则，你们就会成为牺牲品。”

现实生活很快证实了列宁的预言。不到三个月，1920年11月21日，法西斯党徒用武力解放社会党占多数的波伦亚市政府，意大利反动派开始对无产阶级发动进攻了。

列宁对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革命也非常重视，在理论和实践上给他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俄国东部各民族大多是比较落后的，与世界上的其他落后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有某种共同特点。

1919年11月21日，列宁主持召开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在会议上阐明了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的任务。

11月22日，列宁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做了重要报告。阐述了东部各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问题，高度评价了俄国东部各族人民的觉醒。列宁说，东部人民将作为独立的斗争参加者和新生活的创造者参与决定世界的命运。他指出：“你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都必须以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

需要解决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因为一些还没有参加过斗争的群众正被卷入斗争中来……”

在东方，在那些最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共产主义运动在农民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已经觉醒并积极投入政治斗争的条件下发展起来了。由于小资产阶级意识随处可见，而人数很少、组织又很差的，所以，这种意识形态侵入了共产党人队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东方共产主义运动中流行左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主要原因，左倾病长期以来妨碍着无产阶级政党同群众的关系。尽管如此，共产主义运动在这些国家中仍然在不断地发展壮大。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保加利亚、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印度尼西亚、土耳其、伊朗都成立了共产党。阿根廷国际社会党、希腊社会主义工人党、丹麦左派社会党、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挪威工党、意大利社会党、英国社会党、英国独立工党苏格兰派、卢森堡社会党以及一系列革命团体和工会，都纷纷宣布参加共产国际。

列宁指导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传播共产国

际思想方面作了大量工作。1919年5月,《共产国际》创刊号问世。这家杂志用俄文、德文、英文、法文,后来又用西班牙文和中文出版,成了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思想中心。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它的主要任务是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巩固和发展。但是,各国共产党的成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许多严重困难。共产党人虽能比较迅速的带领先进工人前进,然而他们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广大阶层中的影响比较微小。而且由于共产党犯了左倾和宗派错误,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例如,在英国有五个革命政党和组织,它们于1919年开始就筹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问题进行谈判。谈判过程中,它们在参加工党和议会活动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英国社会党认为:未来共产党应该参加工党,在工党内部进行工作。然而,其他革命政党和组织不同意这一观点,它们拒绝参加工党,对参加资产阶级议会持否定态度。

左倾宗派主义观点和情绪在德国、奥地利、法国、意大利、美国、荷兰以及其他国家也很普遍。在德国,被开除共产党的极左派甚至成立了单独的政党。为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9年6月向这一新成立的党发出一封公开信,信中阐明,他们的政治活动具有分裂主义性质,给工人运动造成很大危

害。信中还批判了他们在党的建设问题上，工会和议会中的工作错误。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宗派主义引起列宁的忧虑，他认为错误会使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最严重的危害。如果不克服这些错误，共产党人就不能在劳动人民群众中顺利地进行工作。因此，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进行斗争就成了刻不容缓的任务。

在这种形势下，列宁写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全面剖析左派共产党人的错误，用俄国历次革命的经验帮助他们深刻认识并自觉纠正这些错误。

列宁在书中还以大量篇幅揭露并剖析了左派共产党人否定政党、否定纪律、否定民主集中制、拒绝在反动工会里工作、抵制议会活动、拒绝任何妥协的严重错误。

列宁希望各国共产党自觉地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应适于各国的基本原则。对于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是统一的，但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都应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绝对不能机械地照搬别国党在不同条件上的策略。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并不要求各党的策略千篇一律，而是要求在运用共产主义基本原则时，在某些细节上按照本国的实际情况加改变，

制定出符合本国特点的战略和策略。列宁说，在每个国家通过具体的途径来完成统一的国际任务时，都必须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这就是一切先进国家在目前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所阐述的精神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得到了体现，并成为各国共产党的行动纲领。

1920年7月19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举行开幕式。列宁同41个国家的67个组织的217名代表来到彼得格勒。——彼得格勒是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摇篮。那里的工人同群众用盛大的游行来迎接列宁和代表大会代表。列宁胸前佩带着红色花结，还插着一朵石竹花，兴奋、愉快地和代表们一起走在游行队伍前列。此时列宁非常兴奋，因为他梦寐以求的理想：建立工人阶级革命的国际联合组织，不但终于实现，而且大大向前发展了。走在列宁身边的是俄罗斯的一代大文豪高尔基。

代表大会开幕式在塔夫利达宫举行。会扬的气氛非常热烈。各国代表分组坐在大厅里，他们中间有英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黑人、阿拉伯人……人们用各种民族语言交谈，有些代表还唱上了本国的革命歌曲。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声音以独特的方式汇成了一场大合

唱。

列宁被选入大会主席团。在大会正在确定议程和规则的时候，列宁突然从主席台上站起来，在大会的庄严气氛中匆忙穿过大厅，向后面走去。原来，列宁发现了他的老朋友和老战友舍尔古诺夫。列宁向他奔去，两个人紧紧拥抱在一起。不了解列宁的人可能觉得意外，其实列宁就是这样一种性格，这是他对同志和朋友深厚感情的真实流露。这时，全场代表都站了起来，他们激动得热烈鼓掌欢呼。

在米·伊·加里宁代表苏维埃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向大会致贺词后，列宁作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全场代表起立向这位伟大的革命家致以长时间的欢呼，鼓掌。

国际共运中出现了一种危险——各个社会民主党加入共产国际后，带来了机会主义和中派主义的影响。列宁写道：“在一定的情况下，共产国际有被那些还没有摆脱第二国际思想体系的、不坚定和不彻底集团溶蚀的危险。”此外，在一些共产党内还流行这样一种观点，就是认为共产国际只应成为一个情报中心，不要用统一的纪律和领导来约束各国共产党。针对这些情况，列宁为共产国际起草了《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防止非共产主义者加入共产国际。经过全面讨论后，这个由 21 条组成的文件得到

代表大会的赞同。

在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上，列宁提出并确立了必须遵守无产阶级政党纪律的原则。奥地利共产党作出抵制议会选举的决定，这是违反共产国际的纪律的。为此，列宁于1920年8月15日写信给奥地利共产党，阐述了遵守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的必要性，他指出，“我们感到自豪的，是在解决工人争取自身解放的重大问题时，我们遵守革命无产阶级的国际纪律，考虑到各国工人的经验，估计到他们的认识和意愿，从而在行动上……实现工人为在世界建立共产主义而进行的阶级斗争的统一。”

列宁提出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得到大多数代表的认可和理解，但也遭到一些代表的反对。例如，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团领导人塞拉蒂主张第三国际要对一切政党敞开大门，反对把不接受加入共产国际条件的人开除出党的规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代表迪特曼和克里斯平则反对必须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关条款。同时，意大利社会党的代表博尔迪加、荷兰共产党的代表怀恩科普以及其他左派反对允许已同第二国际决裂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挪威工党等加入共产国际。

列宁坚决捍卫自己提出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他指出，某些人的发言浸透了资产阶级观点，用

这种观点是无法准备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他也批评那些反对邀请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并反对同该党代表进行谈判一事的人。列宁说：“当考茨基反对我们而且还写书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把他当作阶级敌人同他论战。可是独立社会民主党（该党现在已经由于大批革命工人加入而壮大起来）到这里来谈判，我们就应该同他们的代表谈，因为他们代表着一部分革命工人。”

列宁指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批准了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这就制定出了各国共产党所必须遵守的纪律，从而使它们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8月7日结束。列宁指出：共产党人在莫斯科举行的代表大会以及东方各民族的共产国际主义者在巴库举行的代表大会所取得的成果，是不能立即加以估量的，这是一种比某些军事胜利意义更大的成就，因为它表明：布尔什维克的经验、活动、纲领以及对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的革命斗争口号，已经为全世界所公认……

列宁认为，第二次代表大会已经把同无产者群众有联系的各个坚强组织的代表们都团结起来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为国际无产阶级在共产主义旗帜下达到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团结奠定了基础，第二次代表大会则已经向前迈出了一大步。第二次

代表大会由于通过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和章程，使共产国际在组织上最终形成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统一的世界性的政党。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前，1921年6月17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室里举行一次会议，匈牙利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贝拉·库恩正在发言。库恩是左倾“进攻理论”的拥护者。法国共产党的《人道报》发表了《冷静与纪律》一文，文章对卢森堡派兵占领莱茵省提出抗议，同时鉴于事态严重，又提出要冷静和遵守纪律。库恩认为法共的这种观点是机会主义的，要求法共采取革命行动。列宁突然来到执行委员会会议室。大家对列宁表示热烈欢迎，室内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掌声雷动。库恩当时感到尴尬，匆匆结束讲话。列宁当即发言，他同志式的批评左派，首先是库恩。

列宁说：“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发言反对库恩的观点，因为我肯定，库恩只要一开口，必定会替左派辩护。以为只有机会主义的错误不是的，也有左的错误。如果共产国际的法国问题上听从库恩及其朋友的主意，法国共产主义运动就会一败涂地，好多年不能重整旗鼓。对于法国党应当批评，但是，批评应针对它的不正确的机会主义运动，不应当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它，分裂它，不应当用左派的蠢事去同机会

主义行动对抗。我注意到法国共产党的出色工作，看到它所建立的支部和工会等组织中的党团，我敢说，法国革命的胜利是有保证的，只要左派不干出许多蠢事来。如果像库恩那样，说什么不需要“冷静与纪律”，那末，这便是左派，也初步统一认识了左派干的蠢事。”

列宁的简短的话语使大家的思想开了窍。大家由衷地感到，列宁的思想充满了辩证法，他确实是世界革命的领袖，牢牢地掌握着共产国际舵，对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坚定的信心。

1921年6月22日晚7时，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大剧院大厅中开幕。列宁被选为代表大会名誉主席。

列宁从正门进入会场，为了不惊动大家，他迈着小而快的步子悄悄地向主席台走过来。但是，人们还是认出了他，因为代表们正急不可耐地等着他莅临大会呢。代表们立即从座位上站起来，许多人站到椅子上。全场一片沸腾，掌声，欢呼声如同雷鸣，久久不能平息，逐渐变成了雄壮有力的《国际歌》的歌声，这是由多种语言的歌声，虽不十分整齐，但却极为宏亮雄壮。

列宁微笑着向主席团的同志们问好，致意，并一一握手。列宁聚精会神地听代表们发言。休息的时候

列宁独自在讲台后面的一个阶梯上，弯着腰在一张纸上写字，专心致志地准备发言稿。

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瞿秋白对列宁发言时的情景作了逼真的描写：“安德列厅赤色光辉四射，全宇宙映辉，各国劳动者代表的演辞，声音震及环球，——第三次大会的共产国际；今日之克里姆宫真做得人类文化的驳杂光怪的象征。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而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安德列厅每逢列宁演说，台前拥挤不堪，椅上，桌上都站成了着人山。电气照相灯开时，列宁伟大的头影投射在共产国际，‘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等标语题词上，又衬着红梭奇画，——另成一新奇的感想，特异的相片……列宁演说，篇末数字往往为霁坊的鼓掌声所吞所……”

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召开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开幕式在彼得格勒举行，会议从11月9日起改在莫斯科举行。开幕式列宁未出席，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开幕式上宣读了列宁的贺词。

开幕式后，代表们操着几十种不同的语言在冬宫前，热烈地交谈着。五年前，这里发生震惊世界的

大事件，无产阶级从此当家做了主！此时此刻，代表们想得很多，他们一刻也没有忘记，过一两天就要去莫斯科开会，就要见到列宁了！此时，代表们心中都有两种思想在交战：一方面担心列宁的身体，怕发表长篇演讲会影响他的健康；同时，又最想听到列宁讲话。他是代表的，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最崇拜的人。

代表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那是 1922 年 11 月 13 日上午。中间休息时，突然传来一个消息：“列宁同志来了！”大家往前冲去，想亲眼看看个究竟，尽量靠近列宁。列宁在一群同志和一位医生的护卫簇拥下走进来。

当列宁进入会场，代表们刷地站了起来，热烈鼓掌，响起了几十种语言的喊声：“列宁万岁！”

患病的克拉拉·蔡特金坐着轮椅在主席台上。她是列宁的好朋友和老战友，列宁走过她面前时，亲切地向她问好。这一刹那，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蔡特金握住列宁的手，把他拉到跟前，热烈地吻了他。这件事有些突如其来，列宁有点不好意思，脸红了。这时，会场里立即又爆发出一阵暴风雨般的欢呼声。蔡特金的这一吻，表达了许许多多的内容。表达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对革命领袖的热爱。在高高的大厅圆顶下，自发地响起了《国际歌》

.....

下午 1—2 时，列宁用德语作《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长篇报告。列宁着重讲了苏俄实行的新经济政策，讲了新经济政策的正确性及其产生的效益。在报告的最后，列宁表示深信：“世界革命的前途不但是美好的，而且是非常美好的。”

这是列宁一生最后两次向公众讲话中的一次。

第四十二章 重心转移

在我看来，列宁是一个传奇的英雄，
他从自己的胸膛里掏出燃烧的心，用它的
火焰为人们照亮道路。

——高尔基

俄国伟大的文豪高尔基曾经绘声绘色地描写过列宁的性格和为人。他说：

“列宁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意志的异常完美的化身……要描绘他的肖像是很困难的……他有伟大狡黠者的洞察一切的眼睛。”

的确，列宁所有的精神品格都令人刮目相看，甚至使人为之一惊。

列宁的意志里充满了鲜明的目的性，当他领导人民为革命打碎坛坛罐罐时，他比任何人都更心疼这些失去的东西。同时，他比任何人都更早地提出重新建设这些东西。列宁没有忘记 1918 年从彼得格勒

迁都时，他的警卫沃龙佐夫说的话：

“一旦发生意外他们能得到许多东西，应该把炸药埋在彼得格勒地下，把一切都摧毁。”

“这样做您不感到很可惜吗？”托洛茨基用欣赏的语调这样发问。

“有什么可惜的？我们会回来的，我们将会把世界建设得更好。”

列宁若有所思地想着这些耐人寻味的对话。

列宁也没有忘记他的两位学生、红旗勋章获得者不久前说的话：

“为了内战的胜利，我们几乎掠夺了大半个俄国！”

曾任南方征粮特派员的斯大林说过：

“谁若是敢拦截运粮食的火车，就把他们的村庄烧成灰烬……”

想到这里，列宁感到不寒而栗。

“嗯——嗯！破坏的已经够多了。”

不管是来自革命还是反革命的势力，战争带来的灾难都会落在人民的头上。想到人民，列宁的胸中又燃起熊熊的火焰，焦急的心情使他夜不能寐。每当这时，他总是披上衣服，来到电话机旁，把自己重要的想法和指示连夜布置下去，或查问已经指示的事情是否都完成了。他在争分夺秒地挽救被战争破坏

的国家，全力以赴为建家园而操劳。

列宁一向认为，夺取政权以后，以共产主义和世界和平作为奋斗目标的共产党，一定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列宁曾说过：

“我记得，1918年4月我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曾经说过：我们的军事任务似乎就要结束了，我们不仅征服了俄国，不仅为劳动者从剥削者手里夺回了俄国，而且我们现在应当转到管理俄国以从事经济建设这一任务上来……我们曾经几次作过这种尝试：1918年春天作过一次，今年春天在实践中提出劳动军问题的时候又以较大规模尝试过一次。现在我们必须再一次把这种转变提到首位，并尽一切力量加以实现。”

现在，实现重心转移的任务已经是迫在眉睫地摆在面前，列宁为此而心急如焚，日夜忙碌。

1920年11月，全俄国范围内，战争硝烟还没有完全散去，不时还能听到微弱的枪炮声。但是，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权毕竟战胜了外国武装干涉者和国内反革命势力。苏维埃共和国站稳了脚跟，巍然屹立在世界1/6的土地上！

战争中胜利了，应该集中精力搞建设了！这是列宁多年梦寐以求的事情。列宁早在1918年4月写的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就适时地提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的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并且为此）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劳动组织。”

侨居国外时，列宁看到英、法、德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大大超前于自己的祖国时，他是何等羡慕啊！对俄国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了全面调查，得出的一些基本数据使他心焦。经过四年帝国主义战争和三年国内战争，俄国的生产水平倒退了几十年，1920年同1913年相比，俄国的产业工人减少一半，大工业的产值几乎减少 $\frac{6}{7}$ ，生铁产量仅为战前水平的3%，煤减产 $\frac{2}{3}$ ，石油减产约 $\frac{3}{5}$ 。铁路运输瘫痪，田地荒芜，农业产量仅为1913年的 $\frac{2}{3}$ ，粮食和日用必需品严重不足，人民群众的生活极其艰难困苦。

这样一个烂摊子等待列宁拿出治国良策进行全面的治理。

1920年11月6日，莫斯科举行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大会。列宁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苏维埃政权成立三年来，依靠红军战士和工农群众的英雄主义、自我牺牲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

利。现在，全国上下必须满怀劳动热情和顽强精神，最迅速发展恢复国民经济，夺取比以前在一切血战中获得的更巩固更可靠的胜利。

同一天，列宁写信给俄共（布）中央委员，建议委托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会上作关于电气化的报告。他写道：“我们将按照一个总的计划有效地恢复国民经济。没有电气化，这样一个计划就等于零，而离开这个计划来谈论什么‘基本任务’，那是不严肃的。”

列宁关心着祖国的电气化事业。这方面取得的任何一项成就都会使他感到欣喜。

卡希诺村用自己的力量兴建了一座电站，村民大会决定邀请列宁来参加电站落成典礼。发出邀请时，许多人都摇头：

“这不会有结果的，他太忙了。”

“这是什么时候啊，战争，破坏，饥饿……”

“离我们可不近哪，整整有 150 俄里。”

就在大家都以为列宁不会来参加电站落成典礼的时候，可是，列宁却爽快地答应了村民们的请求。

村民们都很高兴，大家忙着作准备，都想把客人请到自己家。但争来争去，最后选定在玛丽娅·尼基季奇娜·卡什基娜的家来招待客人，因为她的房子

有两个房间，宽敞明亮，屋面镶着薄板，房檐还雕了花纹。

村民们当时还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可是他们还想请列宁吃顿饭。大家选巴维尔·叶哥罗维奇·叶哥罗夫当厨师，选库兹马·瓦西里也维奇·美沙尔金给厨师当助手。食品全部是大家送来的。有鸡、黄瓜、油、蛋、白菜，还有啤酒。一切准备就绪。

1920年11月14日早晨，天空飘着轻柔欢快的雪花，和风轻轻地吹拂着山川大地。人们在等待着，等待尊贵的客人的到来。邻近村子里的人得知列宁要来的消息后，也都涌了过来。首先见到列宁的还是列宁所最喜欢的孩子们，他们沿着公路跑到离村子里很远的地方去等待，终于最先迎来了列宁乘坐的汽车。

所有人都涌到村口，向列宁的汽车奔去。

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走出汽车，一边向村民们招手，一边亲切地说：“公民们，你们好。”

大家挽着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的手臂走进屋里。屋子里摆着几张铺上白色粗麻布的桌子，管弦乐队奏起《国际歌》。

有个小伙子准备给列宁脱大衣，但列宁客气地谢绝了，自己脱下大衣，然后亲自给克鲁普斯卡娅脱下长毛绒的短大衣。

村民们都仔细端详列宁。他有一双异常灵活的眼睛，时常用手掌擦擦凸出的前额和鬓角。看上去他结实，健壮，脸上堆满了笑容。列宁的健康状况使村民们高兴极了。

有人给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端来一杯家酿啤酒。

列宁问：“不是烈性的吧？”

端酒人回答：“不是，没有放啤酒花。”

列宁喝了酒，擦了擦浅色的胡子，克鲁普斯卡娅也把酒喝了。

电站的建设者向列宁讲述建设电站的事。列宁为电站建成而感到兴奋。紧接着，村民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问前线打仗的情况以及印花布、火柴、粮食等方面的问题。一个农民忽然站起来说：

“对我们庄稼人来说，最糟糕的是不清楚……”

列宁问：“不清楚什么？”

这个农民回答说：“我说的是余粮收集制。农民种田，但不知道秋天会让他们要走多少粮食。种得多，要得也多。可是种得少，对国家就不利了。”

列宁正要回答这个农民的问题，摄影师来了，说要给列宁和村民们合影留念。照完相后，列宁走上讲台，就大家提的问题发表了讲话。列宁脱下帽子，敞开大衣，一边说着一边挥动着手臂，话语有力而清

晰。

列宁说，战争即将结束，情况会很快好转。到那时候，苏维埃政权得到了巩固，工厂恢复了生产，经济会迅速发展起来。将会有布匹、粮食、拖拉机。国家从农民那儿拿走的东西，到了和平时期，将成百倍地偿还。

村民们都听得入了神，有人说：“讲得真够味儿。”

列宁还要求农民群众跟工人阶级保持兄弟般牢固的联系，同他们一起前进。

听了列宁的讲话，村民们的心里都好像给太阳照亮了……

列宁的汽车开动了。村民们依依不舍地跟在汽车后面，孩子们则跟着汽车奔跑起来……一直到汽车消逝在远方公路上。离开卡希诺村后，列宁又到亚罗波列茨村去了。

1920年11月21日，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发表题为《我国的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讲话。列宁认为，苏维埃俄国经过三年残酷的战争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取得了生存下去的条件，即使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推迟爆发，苏维埃共和国也能够生存下去。因此，现在应当把经济建设放到首位。列宁指出：“为了彻底战胜资本主义，第一，

必须战胜剥削者和捍卫住被剥削者的政权，这是用革命力量来推翻剥削者的任务；第二，担负起建设任务，就是建立新的经济关系，树立怎样做这件事的榜样。实现社会主义变革任务的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这使我们的革命不同于以往的革命，以往的革命有破坏这一面就够了。”列宁阐述的道理很清楚，如果完不成第一个任务，就谈不上有无产阶级政权；如果完不成第二个任务，那么，已取得的任何成就都会付诸东流，旧制度的复辟就会不可避免。列宁对这两个任务都十分重视，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及时号召全党把全部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方面去。列宁在这里第一次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政治方面的保证，而全国电气化则是经济方面的保证。列宁希望改造党的工作，使党能够领导国家的经济建设，取得实际的成就，并且多用事实少用空话来开展宣传工作。

1920年11月，列宁的一系列言论和活动都表明，列宁正在思考如何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他认为，必须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任务，而这个任务的中心环节就是电气化。

列宁讲农业发展道路时也谈到了电气化问题，他在《论粮食税》小册子的提纲里写道：

“小农
集体农庄
电气化。”

列宁认为：只有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才有可能解决城乡的对立。他说：“在现代最高技术基础上，在把城乡连接起来的电气化的基础上组织工业生产，就能消除城乡对立，提高农村的文化水平，甚至消除穷乡僻壤那种落后、愚昧、贫困、疾病丛生的状态。”

列宁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思想，是俄罗斯国家电气化计划的基础。这个计划是苏维埃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 10—15 年远景计划。该计划提出了十分宏伟的任务：奠定社会主义牢固的经济基础，在电力基础上创造出新的生产力，把俄国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完成这一任务要达到以下指标：工业生产水平要比战前增加一倍，要新建 30 个电站，总功率为 175 万千瓦，年发电量 88 亿度。在最重要的经济区电气化的基础上，进行广泛的工业建设，首先是发展重工业中有决定意义的部门，并为农民的小商品经济过渡到公共的大生产准备条件。

列宁说，俄共（布）八大通过的党纲是政治纲领，“它应当用第二个党纲，即重建整个国民经济并使它达到现代技术水平的工作计划来补充”。列宁把俄罗

斯国家电气化计划叫做第二个党纲，认为没有这样的党纲即电气化计划，就不能转入真正的建设。

当时的俄国是一种什么情况呢？战争过后，满目疮夷，一片废墟，到处是经济破坏和贫困。在这种状况下，列宁倡导实行电气化，表现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和远见。无怪乎当时许多人认为列宁的经济建设计划是幻想，是不能实现的幻想。尤其是西方一些循规蹈矩的学者和文人更不能理解列宁的大胆设想，他们怀着迷惑不解的心情审视着苏维埃政权和它的领袖。好奇心驱使他们甚至要与列宁亲自面谈、辩论。

1920年深秋，英国著名作家赫伯特·威尔斯带着满腹狐疑来到莫斯科，迫不及待地要求拜见列宁，同这位无产阶级领袖探讨那些他认为近乎荒唐的结论。

列宁深知，像威尔斯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然是开明人士，但不可能懂得俄国无产阶级的雄心大志，但列宁还是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抽出一个小时时间，满足了这位撰写空想题材的作家的要求。

经过短暂的谈话，列宁敏锐地看出了威尔斯谈话的实际目的和他的内心世界。威尔斯走后，列宁一面笑着一面叹气，似乎有些惋惜地说道：“哎，可真是一个庸人！一个小市民。”

的确，采访列宁后，威尔斯所写的文章充满了资产阶级的观点，他在描写列宁时这样写道：

“在莫斯科出现的有他（列宁）签名（！）的尖锐的抨击性小册子，对西方工人的心理充满着错误的见解……很少能表现出列宁思想的真正实质。”“我曾听说列宁喜欢教训人，但他并没有对我这样做。”

威尔斯坦率地与列宁交换看法，他企图说服列宁：“需要改造的不单单是生活的物质方面，而且也包括整个民族的心理。”他说：“俄国人生来就是个人主义者和商人。”威尔斯认为：他与列宁的主要分歧是：进化的集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差别。他的观点是“相信通过有计划的社会教育，使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文明起来，变为集体主义的制度”。

通过短短的谈话，威尔斯得出结论：“他对事业的信仰是无限的，……我承认，同他辩论很困难。”甚至“永远不要抱有希望”。

威尔斯回国后，写了《俄罗斯之迹》一书。在这本书中，对列宁的风貌有一段细致入微的描写：

“列宁那张开朗的微黑脸，表情变化得很快，嘴角上挂着自然的微笑。他在听对方谈话时，总是眯着一只眼睛。这种习惯可能是因为视力不好引起的……谈话时，他抬起手来……略微作些手势；他讲话很快，津津有味，坦率而直接了当，没有任何矫揉造

作，就像一个真正学者讲话一样。”

威尔斯对苏维埃俄国是十分同情的。尽管他不同意马克思主义，但他承认苏维埃政权是受到人民支持的，承认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开展了巨大的建设工作和教育工作。列宁给他留下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威尔斯说：“我会见的这位非凡的人物坦率地承认困难重重，承认建设共产主义的复杂性，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贡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威尔斯写道：“在这样一个森林遍布、广大农民目不识丁、水力资源贫乏、没有技术人才、商业和工业几乎停顿的大国里，还能想象比这更大胆的计划吗？目前，荷兰正在实行这种电气化计划，英国也正在讨论这种计划；不难想象，在这些人口稠密、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实行电气化是会成功的，而且有利可图，而且一般说来是有好处的。但是，要在俄国实现电气化计划，只能是想入非非。我不管用哪一面魔镜，都看不到这个未来的俄国。但是克里姆林宫的这位身材不高的人却有这种本领。他看到新的电气化的铁路如何代替已被破坏的铁路，他看到新的公路如何布满全国，一个万象更新的、工业化的共产主义强国如何站立起来。”

的确，威尔斯看出了列宁的伟大之处：他具有远见卓识，看到了俄国的未来，深信电气化的大胆计划

的现实性和可行性，因为这个计划的基础是科学、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

列宁的电气化计划不仅在国内外引起了各种怀疑，甚至嘲笑，而且在俄共（布）内部也引起争议。托洛茨基不同意列宁的主张，他提出了一个在军事化劳动基础上复兴俄国经济的空洞提纲。李可夫则认为，不应急于搞电气化计划。

当时斯大林正在高加索治病。他一口气读完了列宁建议起草的《俄罗斯电气化计划》，立即给列宁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在信中，斯大林对列宁的电气化意见大加赞赏，对反对列宁电气化计划的托洛茨基、李可夫等人给予尖刻的批评，提出了推行列宁计划的五点建议。中央其他领导人也和斯大林一样，坚决支持列宁的电气化计划。这样，根据列宁的提议，俄罗斯国家电气化计划问题列入了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议程。

列宁几乎每天都要亲自过问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为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准备材料的工作，在列宁的敦促下，俄罗斯国家电气化计划及时地印出来，并分发给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根据列宁的意见，在将要举行代表大会的大剧院的舞台上，高高地悬挂起巨幅俄罗斯电气化计划的示意图。

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俄罗斯国家

电气化委员会主席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作了电气化计划的报告。列宁为代表大会起草了关于电气化报告的决议，决议中写道：“代表大会相信，一切苏维埃机关、各级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全体工人和劳动农民都会鼓足干劲，不惜一切代价，不顾任何困难，坚决实现俄罗斯电气化计划。”这一决议为代表大会所通过。

苏维埃国家的工农劳动群众不惜一切力量，团结奋斗，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把列宁的电气化计划变为现实。到 30 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就发电量来说，几乎超过电气化计划规定的 3 倍，一个个宏伟的水电站灌溉着俄国的沃土良田，电气火车像一条条巨龙一样飞驰在山谷平川。这是沿着全国电气化道路迈出的第一步。这是列宁指出的光明道路，是他的雄才大略结出的丰硕之果。但遗憾的是列宁本人未能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第四十三章 酝酿改革

什么是群众路线呢？概括地说，群众路线的基本点就是：第一，信任人民群众，相信他们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相信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第二，党必须根据群众的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工作，党的方针、政策、措施都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刘少奇

完成任何宏伟的计划，都需要有一条正确的路线，而正确路线是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

早在 1920 年初，列宁就派托洛茨基去到乌拉尔地区主抓经济工作。那时，战争的烽火渐渐平息，饱受到战乱的人民仍处在极度贫穷之中，人们的餐桌上依然是空空荡荡的，贸易遭禁，市场萧条，铁路瘫

痪，交通陷于停滞——到处是残破和悲惨的景象。

托洛茨基继续在乌拉尔地区推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他把原来作战的部队改成劳动大军，并把当地农民编入劳动大军，这引起了红军战士和农民的极度不满，他们以开小差、怠工、破坏生产等多种手段进行抵制，这更加剧了饥荒的持续与蔓延。

工业生产也极不景气。火车头和车厢大部分被损坏，铁路不能运送工业物资，许多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国内战争的创伤使俄国大约有 2700 万人死于战场和饥饿。

根据乌拉尔地区的实际情况，托洛茨基首先否定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提出了最初的改革方案。

但他的方案未能马上被党中央所接受。列宁和托洛茨基本人都不能对新的改革政策提出肯定的看法。他们害怕倒退，害怕丧失社会主义原则。归根到底他们对人民的情绪了解得还不够。这样，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仍在继续执行。

1920 年 11—12 月，列宁领导劳动人民打败了外国武装干涉者和国内反动势力，武装斗争基本结束。这时，广大劳动农民对战时共产主义，特别是对余粮收集制的不满突出出来。许多农民写信或上访，表达了他们的不满情绪。这些农民都提出了一个共同要求，立即废除余粮收集制，改行粮食税。这时，列宁

才真正考虑酝酿改革的问题。

1920年11月30日，列宁写了《人民委员会关于直接税的决定草案》，其中提到把余粮收集制改为实物税这一重要思想。但这时列宁改行粮食税的思想还不是坚定的，只是让专门委员会去研究怎么办。

后来农民来信和上访人数越来越多，说明农民的不满情绪在日益增长，工农联盟面临危机，有破裂的危险。列宁对农民的意见很重视，经常接见上访农民，亲自听取他们的意见。

1921年2月9日下午1时15分，西伯利亚农民切尔诺夫来到列宁的办公室。列宁站起来迎接切尔诺夫，问：

“您从西伯利亚带来了什么消息啊？”

“我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了，请允许我念一念。”

“您念吧，请坐。”

列宁和切尔诺夫都坐下来。列宁侧着身子瞧着切尔诺夫，认真倾听他的意见。

切尔诺夫在念的时候，注意观察列宁的脸色变化。起初，列宁的脸上好像显出非常疲乏的神情。是啊，列宁怎么能不疲乏呢？仅仅在这一天中他处理了多少公务，接待了多少客人啊！上午11时45分，列宁接见副农业人民委员奥新斯基。中午，列宁同工农检察院院务委员派克斯谈有关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

问题。12 时 30 分，列宁又接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库恩·贝拉。

切尔诺夫在继续念自己写的材料，材料中谈的是在西伯利亚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问题。列宁的脸色在变化，他不时向切尔诺夫转过身来，看看他，又眯起眼睛。可以看出，切尔诺夫的意见正好证实了列宁的思想，这是他从 1920 年底到 1921 年初一直在酝酿的决策：放弃余粮收集制，实行粮食税，由战时共产主义全面改行新政策。

切尔诺夫念完后，列宁问：

“您是什么人？”

切尔诺夫告诉列宁，在十月革命前，他由于参加社会革命党被判服过苦役，自认为是个非党人士，在西伯利亚有自己的产业。

列宁又请切尔诺夫谈了对累进税的看法。然后，列宁希望切尔诺夫把材料送《真理报》发表。两天以后，即 1921 年 2 月 11 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了切尔诺夫的材料。

后来，切尔诺夫，这位前社会革命党人，这样回忆了列宁的高尚品格：

“列宁的伟大表现在什么地方？他的伟大在于：他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不平凡的人才听取我的意见，而是要通过我，听取全体农民的意见，通过我看

到下层社会的全部复杂性。”列宁与众不同之点在于：“理论束缚不住他，他抓住生活和革命中的问题引导理论向前发展，他犹如长者那样实现群众的愿望，他是闪烁着一切智慧的群众的灵魂。”

在到列宁那儿去之前，许多人对切尔诺夫说：你虽然正确，但要按照你的意见去做终究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些人猜错了，列宁认真地听取了他的意见，并接受了正确的主张：改行新经济政策。

1921年2月28日，列宁接见弗拉基米尔省戈罗霍韦茨县弗明基村农民代表切库诺夫等。

在跨进列宁办公室门槛之前，切库诺夫既激动又胆怯。但一跨进门槛，激动和胆怯就消失了，因为列宁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带着令人感到温暖的笑容走到门边，伸出手，说：

“您好啊，切库诺夫同志！”

列宁请切库诺夫到桌子边坐下，然后亲切地询问农民生活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委曲，对哪些事情感到不满意，等等。

切库诺夫直率地告诉列宁：农民的主要愿望就是废除余粮收集制。

列宁了解完情况后，告知切库诺夫：中央决定即将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列宁希望切库诺夫把这次谈话内容详详细细地写给《贫农报》。

切库诺夫回答说：“不一定能完成这一任务。”

列宁问：“为什么？”

切库诺夫说：“在路上把眼镜弄丢了，在市场上买了一副破烂货，几乎没有用。”

列宁回到桌子前，按了一下电钮，秘书进来了。

他对秘书说：“请转告卫生人民委员谢马什柯，明天就给切库诺夫同志配一副好眼镜。”

切库诺夫对列宁的这种关怀和体贴十分感动，含着眼泪告别了列宁。列宁还是有点不放心，自己又亲自给谢马什柯写了一个便条：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

伊万·阿法纳西耶维奇·切库诺夫同志正在我这里，他是一个很有趣的劳动农民，他用自己的方式来宣传共产主义原理。他把眼镜丢了，花 15000 卢布买了一副破烂货！能不能帮他弄到一副好眼镜？务请帮忙，并请您的秘书告诉我，是否办到了。”

这段时间，列宁脑海里经常思考着同切尔诺夫等农民代表谈话的情景，思考着农民关于废除余粮收集制的要求，为此他还认真研究许许多多从农村搜集来的材料。克鲁普斯卡娅写道：“凡认识伊里奇的人都知道，他是多么善于体察生活，明察秋毫。”列宁制订新经济政策就是以 1918—1920 年俄国经济和社会政治发展状况为依据的，是以大量的实际材

料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为基础的。列宁特别喜欢农民向他讲的真话。

1921年初，国家处在困难时期，农民的生活极端贫困。农民向《贫苦农民报》寄了大量信件，列宁一封一封认真地看。《贫苦农民报》编辑卡尔宾斯基交给列宁一封信，对列宁说：

“您看，信里说，苏维埃政权比沙皇政权还坏。”

“比沙皇还坏？谁写的？富农？中农？”列宁眯起眼睛问。

列宁并没有因农民骂新政权而生气，相反，他命令编辑把农民对余粮收集制的意见归纳起来写一份报告。列宁看了报告后，高兴地对卡尔宾斯基说：“瞧，这才是真正推心置腹的文件！要知道，这是我在任何一个报告里都听不到的！”列宁的确从劳动农民那里吸取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在对这些意见进行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制订了新经济政策。

此后列宁要卡尔宾斯基定期汇报收到农民来信的情况。列宁的这种指示并不是强迫命令，而是充满了亲切、文雅与谦虚。请看列宁写于1922年1月26日的信：

卡尔宾斯基同志！

可不可以给我写封短信（最多两三百），说一说：《贫苦农民报》接到多少封农民来信？

在这些来信中有什么重要的（特别重要的）
和新鲜的东西？

情绪如何？

迫切的问题是什么？

能否每两周给我写一封这样的信（下一次
是 1922 年 3 月 15 日）？

（1）来信的平均数

（2）情绪

（3）最重要的迫切问题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

列宁就是这样关心广大劳动人民，注意认真倾听基本群众的呼声。

列宁的民主作风表现在各个方面。他从不以领袖和权威自居，更不压制和打击不同的舆论和批评。持各种不同意见者在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畅所欲言，党内享有广泛的民主和言论自由。

从战争转到和平，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到新经济政策，都伴随着不同意见的激烈争论。

以萨普尤诺夫和奥新斯基等为首的“民主集中派”认为，在经济建设时期，党内应当允许自由建立派别和集团，他们否定党领导苏维埃的必要性，要求对工业企业实行集体管理。以施略普尼柯夫和柯伦

泰等为首的“工人反对派”要求，俄共（布）中央不干涉苏维埃和工会的工作，取消工作人员委任制。托洛茨基支持“民主集体中派”和“工人反对派”，这样一来，党内斗争趋于复杂化了，形成了“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

工会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是“在如何掌握群众和对待群众、联系群众的问题上”。

1920年11月3日，在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共产党党团会议上，托洛茨基提出了工会“国家化”的要求。他建议按工业部门把经济机关对工会加以合并，赋予它们行政管理职能。托洛茨基认为，工会在教育群众和保护群众经济利益等方面的活动是次要的，或者是完全不需要的。主张把军事领导方法定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劳动者社会团体的活动准则。托洛茨基建议对工会采取一系列极其严峻的组织措施，对工会进行“整制”，把善于“拧紧螺丝钉”的人放到工会领导岗位上，在群众工作方面采用强制方法。在托洛茨基的支持下，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对工会会员的处分草案，其中规定因各种过失关押30天以内，或强迫劳动1—6个月。托洛茨基的理论基础是“不断革命论”，他认为，没有国际范围内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俄国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主要目的是准备进行革命战争，推动世

界革命。从这一理论出发，就要实行国家军事化，严格限制民主，把农民当作社会主义的敌对力量。

这个时期，反对派宣扬的观点归结起来就是要求有派别和集团活动的自由、否定党的领导并破坏党的统一、不相信劳动群众有创造的才能、瞧不起农民、蔑视工农联盟。由于反对派的派别活动，俄共（布）内出现了分裂的危险。

1920年11月8日，列宁在中央全会上提出与托洛茨基相对立的提纲。列宁主张改变工会的工作方针，即用民主的方法代替行政命令的军事方法。中央全会随即进行了讨论表决。结果：列宁的提纲得8票，托洛茨基的提纲得7票。列宁以他的提纲为基础写成《〈工会的任务及其实现的方法〉决议草案》，在中央全会上获多数票通过。列宁的这一文件的主要思想是工会生活民主化。

俄共（布）中央设立的工会问题委员会根据列宁的工会思想，制定了《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问题的决议草案》。这就是党史上有名的“十人纲领”。纲领根据国内战争结束和平建设开始这一新形势，规定了工会的任务和作用，指出工会应该是学习管理的学校和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同时规定工会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说服教育，即在工会内部广泛实行无产阶级民主。这一纲领得到绝大

多数地方党组织的支持，成为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决议的基础。

但是，在 1920 年 12 月 7 日的中央全会上，托洛茨基等继续反对列宁的思想。布哈林等人为了缓和列宁与托洛茨基等人在工会问题上的争论，成立“缓冲派”，他们的言行实际上有利于托洛茨基。

列宁极喜爱布哈林这位年轻的理论家，但正因为这样，列宁更不能迁就姑息布哈林的错误，反而更加严厉地批评他。列宁把布哈林比作一个火上加油的人，说“缓冲集团”比谁带来的危害都严重，说这个集团扮演了“最恶劣、最有害的派别活动的帮手”。列宁还写道：“布哈林等人的提纲，则是思想瓦解到了顶点的表现。”

对于托洛茨基也是如此。列宁一向认为他是一位杰出领袖人物，因此，列宁对托洛茨基的批评显得格外严厉。

列宁在自己的一些讲话中，在 1921 年 1 月写的《党内危机》和《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等文章中，揭露了那些反对派小集团的纲领的反党实质，揭露他们的活动的危害性。

列宁一再强调：同托洛茨基分歧的本质是“在对待群众、掌握群众、联系群众的方法问题上”根本不同。托洛茨基要求把军事方法搬到工会中去，用强制

手段对待群众。列宁则认为，说服方法才是对待群众的正确方法，才是工会活动的基础。只有采用说服的方法，才能使千百万劳动者发挥自觉的创造性，而这正是苏维埃政权的不可战胜的力量源泉。

列宁说：“历史活动的规模愈大，参加这种活动的人数就愈多，反过来说，我们所要实行的改造愈深刻，就愈要使人们关心这种改造并采取自觉的态度，就愈要使成百成千万的人都确信这种改造的必要性。”

列宁进一步解释，工会的使命是发动工人群众解决经济政治任务，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强劳动纪律而斗争；工会应当维护劳动者的利益，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积极参加文化教育和生产宣传活动。

列宁明确地指出：工会不是国家组织，“它是一个教育的组织、是吸取和训练的组织，它是一个学校，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作为一所共产主义的学校、尤其应该是劳动者学习管理社会主义工业（然后是管理农业）的学校，工会的任务，是吸取群众积极参加经济机关和与经济有关的国家机关的工作，参加拟定经济计划、生产计划等，从工人和劳动群众中推荐和培养行政管理人员。

列宁还揭示了国家、党和工会三者之间的关系，

认为托洛茨基从根本上歪曲了这种关系。列宁说：“国家，这是实行强制的领域。只有疯子才会放弃强制，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采用‘行政手段’和以行政管理人员的态度来对待问题，在这里是绝对必需的。党呢，党是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者，开除党籍而不是实行强制，这是一种特殊的诱导手段，是纯洁和锻炼先锋队的手段。工会是国家政权的蓄水池，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这个领域的特殊之点和主要之点不是管理，而是‘中央’（自然也还有地方）‘国家管理机关、国民经济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联系’……”

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并不畏惧列宁，他们敢于当面与列宁辩论，说列宁从政治上看工会问题，其实应该从经济的观点看工会问题。列宁认为他们是不对的，是以折中主义的态度看待政治和经济的关系。

列宁写道：“这种理论错误令人吃惊……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问题只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

托洛茨基支持“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

反过来，这两个派别又支持托洛茨基。“工人反对派”提出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纲领，否定党的领导作用，特别是对工会的领导作用，取消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他们还诬蔑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要求“批评自由”、“辩论自由”，等等。列宁指出，这个反对派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代表。

列宁对“工人反对派”的基本论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列宁指出，“工人反对派”采用既包括无产阶级又包括半无产者和小商品生产者的生产者这个术语，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确切划分阶级的要求，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否认无产阶级对劳动群众的领导作用。列宁进一步解释说，在过渡时期，经济的发展是同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密切相关的，是同工农相互关系问题不可分割的。而这些问题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国家才能解决。列宁还批判了主张由工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他写道：“这就完全背离了共产主义而转到工团主义立场上去了。”“这就是同共产主义不相容了，就同俄共党纲不相容了。”

1921年1月23日，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上，列宁作了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报告。列宁针对布哈林的关于党必须接受工会派出的人选的观点说：“我们在党内已经斗争了 20

多年，我们用行动而不用空话向工人证明了：党是一个特殊的组织；它需要有觉悟的，决心作自我牺牲的人；它可能犯错误，但是它能够纠正错误；它所领导和挑选的人了解我们要走的道路，知道我们还要经历哪些困难。党不欺骗工人，党不开空头支票。”“如果我们说，不是党而是工会自己来提人选和管理，这听起来很民主，可能也会争取到一些选票，但是不会长久。这只会葬送无产阶级专政。”“要管理，就需要有一支经过锻炼的共产主义革命的大军，这样的大军是有的，这就是党。”

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上，托洛茨基和施略普尼柯夫分别作了报告。会议经过讨论后进行了表决，结果表明，绝大多数代表都拥护列宁的正确主张。

列宁的理论是正确的，具有令人信服的说服力。愈来愈多的人逐渐认识到，只有共产党团结、教育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才能抵制这些群众中不可避免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斗争。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它把全体人民、所有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的活动，都引向一个共同目标——社会主义。列宁作出结论说：“不通过共产党就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因此，敌对势力总是竭力反对共产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作用。例如，他们在后来的喀琅施塔得叛乱时期，表面上不反对苏维埃政权，却攻击共产党，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作用，提出“没有共产党员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

喀琅施塔得位于彼得格勒附近、芬兰东部的科特林岛上，那里曾被誉为“红色堡垒”，许多水兵参加过 1905 年革命、1917 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

1921 年初，苏维埃共和国陷入极为困难的境地。经济危机急剧发展，歉收导致了饥荒和饲料不足，再加上畜疫，使大批牲畜死亡，使农民的状况更加悲惨。失业和饥饿导致工人产生不满情绪，军队复员产生更大的社会问题。

这时，敌视苏维埃政权的势力企图利用严重局势达到自己的目的。喀琅施塔得事件是敌对势力活动和农民对余粮收集制不满的集中表现。这一叛乱是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白卫分子在外国帝国主义者支持下策动的。他们拥有当时苏维埃最先进的武器和战舰，3 万水兵和 1.3 万海军工厂工人。当时波罗的海舰队中参加过十月革命的水兵大都上了国内战争的前线，新补充的水兵多半是农民，受到小资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不满意战时共产主义的余粮收集制。

1921年2月28日和3月1日，喀琅施塔叛乱分子的首领召开大会，通过决议，提出“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的口号，要求让所谓“左派社会主义政党”自由活动，取消政治委员，允许自由贸易，改选苏维埃。他们指望由小资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并为白卫分子统治和复辟资本主义创造条件。

3月2日，叛乱分子逮捕舰队指挥人员，占领喀琅施塔得海军要塞，严重威胁彼得格勒的安全。俄共（布）中央和苏维埃采取紧急措施，宣布彼得格勒实行特别戒严，命令该岛驻军立即放下武器。3月5日重组第7集团军，由图哈切夫斯基任司令员，负责镇压叛乱。但是，红军发动的三次进攻都失败了。正在举行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派出伏罗希洛夫等300名有军事经验的代表去加强第7集团军的领导，并增派4.5万兵力，经过三天的激烈战斗，叛乱于3月18日被彻底粉碎。双方人员损失惨重。

列宁对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分析可谓是入木三分。他指出，与外国帝国主义者关系密切的白卫将军们对于这一事件起了很大的作用，这种小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和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自发势力，无疑要比邓尼金、尤登尼奇和高尔察克合起来还要危险。

列宁对国内形势的估计是清醒的。他认为，国内已经发生了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危机。这个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小农国家，在从战争向和平过渡的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困难。而共产党人对这些困难估计不足，犯了错误。1920年秋冬，在燃料和粮食分配方面发生了严重的失误。对此，列宁指出：这是我们共同的错误，更主要的问题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已经不再适合新的条件了。

后来，列宁在总结经验教训时说道：是因为我们在经济进攻中前进得太远了，没有给自己留下足够的基地；群众已经感受到了，我们当时还不能自觉地表述出来，但是我们很快就认识到：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

第四十四章 历史转折

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

——邓小平

党内争论是党内民主的一种表现。通过民主和实践来发现和认识真理，这是列宁的重要领导方法。

俄共（布）内部反对派虽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但他们还没有瓦解，影响还在。所以列宁很重视对他们的批评，重视党的团结统一。

可是列宁敏锐地看到：人们是在饿着肚皮开展辩论。在城市，1921年初，本来就不足以充饥的面包配给量又减少了1/3。由于燃料的危机，食品和物资无法运送，人民的痛苦日益严重。因此，列宁下决心在今年的党代会上中止无休止的党内辩论，并克服

一切阻力去推行代表人民利益的新经济政策。

1921年3月8—16日，俄共（布）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这是一次具有转折性的大会。3月8日，列宁在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他指出：国内战争结束后，资本主义国家同苏维埃俄国之间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列宁号召加强党的统一，坚决同一切派别活动作斗争，“要使派别活动完全绝迹”。列宁在以后短短几天会议中，作了俄共（布）中央政治工作，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几个报告和关于工会问题、燃料问题的讲话，并起草了最重要的决议案。

列宁做报告向来严格遵守时间，尽管他所谈的都是极为复杂的问题。每次报告之前，列宁总要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金表放在桌上，作报告时总要经常看着这只表。列宁做报告从不照本宣读，这使人感到，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发自肺腑，因此能够赢得代表们的极大信任。

列宁对全俄国的各种情况都很了解，甚至了解遥远的西伯利亚发生的事情和个别工作人员的情况，而且在许多事情上都能与广大代表想到一起。当代表大会通过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以后，列宁提出：为了顺利贯彻大会通过的决议，必须选用有经验的人。列宁请代表们推荐一些精通农

业并在群众中享有威信 of 农民，吸收他们参加农业人民委员部各级机关的工作。

大会休息时，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党组织的代表舍尔同另一位代表一起找列宁，向他推荐雅科温科，并介绍说：雅科温科在坎斯克县的农民中享有盛望，他在领导西伯利亚游击运动时作了大量工作，他在领导群众方面具有卓越才干。

听完舍尔的推荐意见后，列宁随便提了几个问题。舍尔马上明白了，原来列宁早已了解雅科温科的情况，甚至读过他写的分析余粮收集制的那本小册子。列宁说，他将考虑舍尔的推荐意见。

列宁很快作出了决定，舍尔还没有离开莫斯科时，雅科温科就已奉调来到莫斯科农业人民委员部工作，不久就被任命为农业人民委员。

在代表大会上，列宁的主张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多数代表同反对派展开激烈争论。他认为，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解决所有反对派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列宁与代表们一起，积极参加争论。列宁精力充沛，具有坚定的决心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种精神状态深深地感染了参加大会的代表们。

俄共（布）十大总结了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以列宁的“十人纲领”为基础，作出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决议，根据列宁关于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的

原理，制定出了改组工会全部工作的措施。

列宁指出，这次争论令人信服地表明了党的成熟和力量，同时也暴露出反对派真实面目。列宁认为，反对派的活动和言论旨在削弱和动摇党，是帮反革命势力的忙。因此在共产党执政条件下，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具有特别的意义。党的统一是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团结在党周围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和巩固的重要条件。

列宁十分珍视共产党的统一和团结。在俄共（布）十大期间，连续起草了两个决议草案：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和关于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草案，并作了报告和总结发言。列宁着重提醒全党注意：“目前许多情况正在加剧国内小资产阶级居民的动摇，在这个时候特别需要保持党的队伍的统一和团结，保证党员相互之间的完全信任，保证在工作中真正齐心协力，真正体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

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规定，党内决不容许任何派别活动，立即解散按某种纲领组成的派别，对破坏党的统一的共产党员采取党内处分办法，直至开除出党。列宁认为这一条所以必要，是因为党在新形势下迫切希望彻底消除分裂。

关于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

指出，“工人反对派”的纲领是一种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违背马克思主义；“工人反对派”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会动摇无产阶级专政和削弱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因此宣传这种思想是同共产党员的身分不相容的。列宁在报告中说，党不排除对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讨论，不过这要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在党的政治路线范围内进行。列宁提出的这两个关系党的命运的决议案在代表大会上以绝大多数票通过。

这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大大限制了党内宗派和集团的活动。过多的党内争论必然导致精力分散，必然会瓦解党的力量。然而，党内反对派的力量削弱了，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又滋生起来，它同样侵蚀着党的肌体和信誉。列宁当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列宁在3月8日作的中央政治工作报告和3月15日作的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中，深刻论证了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必要性。列宁认为，这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它的实质是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关系问题。新经济政策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巩固工农联盟，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认为，工农联盟这一形式是由具体的社会条件和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某一阶段所面临的任务决

定的。在国内战争的战火中，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军事政治联盟，对于击溃苏维埃政权的内外敌人，对于保卫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具有头等重要意义。但战争结束后，国家转入和平建设，原来的工农联盟的形式就不适合了。为了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城乡劳动者之间的经济联盟。用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让农民能够支配自己的剩余产品，出卖这些产品并换取日用必需品，这些措施就是这种经济联盟的基础。

列宁认为，工农联盟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他指出：“只要在10—20年内和农民保持正常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甚至在日益发展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推迟爆发的情况下），否则就会遭到20—40年白色恐怖的苦难。”列宁认为，工人同农民不仅应该结成政治联盟，而且必须结成经济联盟，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能取得胜利。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社会主义建设学说的发展。

列宁指出，用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和发展商品流通，将会激发农民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农业产量才能提高，才能改善对城市的供应，保证大工业所需的粮食、燃料和原材料，归根结底，才能保证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

列宁的头脑是清醒的。他肯定地认为：“这种流转和贸易自由不可避免地要使商品生产者分化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分化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就是说，重新恢复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这种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在全世界都正是从商品农业经济中生长起来的。”

列宁自己给自己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能不能在一定的程度上给小农恢复贸易自由、资本主义自由而不至于因此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根基呢？”

通过周密思考，列宁自己回答道：“能够，问题在于掌握分寸。”

在实事求是地分析过去的教训之后，列宁得出结论：“我们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允许地方流转自由，而又不破坏无产阶级政权，还能巩固这一政权。”

俄共（布）十大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从而实现了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列宁领导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对全国经济领导体制进行了改组，在工业、农业和财政领域，在劳动组织和城乡商品流转方面，都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

改行新经济政策的决策作出了，但如何才能顺利地执行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与布尔什维克党的一贯主张是不一样的，甚至完全相反的。列宁深知问

题的复杂性。

俄共（布）十大以后，列宁为宣传和贯彻代表大会关于改行新经济政策的决议而日夜忙碌。列宁多次作报告和发表讲话，从理论上全面深入地阐述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和新经济政策的实质。

1921年4月9日，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支部书记及支部负责代表会议上作关于粮食税的报告。他指出：作出这种改变的主要原因是农民经济十分困难，许多地方几乎完全破产；而苏维埃政权只有从农民那里才能得到必需的粮食和原料，国民经济才能得到恢复和发展。在议论粮食税时不可忘记，工农之间经济关系的实质，是工人为国家和农民生产一切必需品，通过铁路和船舶运送给农民，同时从农民那里取得剩余的农产品；粮食税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一种过渡办法，这种办法可以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且使小工业也恢复起来。制定这个政策的根据是：俄国农村已经中农化，要提高农民经济的生产率，就必须帮助中农发展经济。既然存在小经济和贸易自由，就会产生资本主义。但是，在工人国家掌握了工厂、运输业和对外贸易的情况下，这种资本主义是不可怕的。

1921年4月11日，列宁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作关于租让问题的报告。列宁指

出，党纲首先讲到无论如何要增加产量，如果不善于实行租让政策，不善于把外国资本吸收进来，就做不到这一点，就根本谈不上改善俄国经济状况，那就表明在经济上没有一点求实精神。列宁十分肯定地指出：“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外国资本家到俄国来承租企业就意味着发展资本主义，但这些被承租的企业的所有权仍属于苏维埃国家，而工人和农民却会由于产品的增加而得到好处。

1921年4月21日，列宁写了《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这是一篇从理论上阐述新经济政策的重要著作。该文的第一部分《关于俄国现时经济》完全摘自1918年5月写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以此说明俄国的经济背景、经济基本成分没有改变，新经济政策正是从这种客观条件产生出来的。第二部分《论粮食税、贸易自由、租让制》首先指出，1918年在估计恢复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期限方面有错误，实际期限比估计的要长。国民经济遭到战争破坏，这就使期限更长了。列宁接着指出：无产阶级作为领导阶级应当首先去解决刻不容缓的任务；要恢复国民经济，应该从农民开始，采取最迅速、最坚决的办法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生产力；只有经过这种办法，才能巩固工农

联盟和无产阶级专政；所谓从农民开始，就是用从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开始，允许农民在交纳粮食税后进行自由贸易。列宁在文章中第一次使用“战时共产主义”来概括国内战争时期所采取的一整套措施，并将其最主要的内涵揭示出来：“我们实际上从农民手里拿来了全部余粮，甚至有时不仅是余粮，而是农民的一部分必需的粮食，我们拿来这些粮食，为的是供给军队和养活工人。”列宁认为，如果当时不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就不能战胜地主和资本家。所以，列宁充分肯定战时共产主义的功劳。列宁同时指出：“‘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必须改变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帮助恢复小工业，因为小工业不需要机器和大批的原料、燃料和粮食的储备，却能够立刻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这样做的结果是：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会在一定的贸易自由基础上复活。这是毫无疑问的。

1921年10月29日，列宁在莫斯科省第七次代表会议上，作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在报告中，列宁对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的整个经济政策作回顾。他说：十分明显地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从1918年初到1921年春，另一个是从1921年春开始以后的时

期。从布尔什维克 1917 年底到 1918 年初所作的各种声明可以发现，那时认为，发展道路既可能是比较短的，也可能是漫长而艰辛的。但是，在估计可能的发展道路时，多半都是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这种设想出发的。列宁继续说：1918 年三四月间，我们就已把搞斗争的行动方式同渐进过渡的方法对比，前者主要是用于剥夺剥夺者，而这项任务正是 1917 年底和 1918 年初革命头几个月的主要特征。那时我们已经不能不承认，我们在组织计算和监督的工作远远落后于剥夺剥夺者方面的工作。因此便提出由破坏旧政权的任务转向组织计算和监督的任务，转向经济任务。那时我们已经在许多问题上后退了。例如，1918 年三四月间出现了专家报酬问题，即付给专家高报酬。这不符合社会主义关系。给专家高报酬原先没列入苏维埃政权的计划，甚至不符合 1917 年底颁布的法令。但在 1918 年初，我们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在这方面应该作某种妥协。当时设想不必经过一个旧经济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时期就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后来在国内战争中，在资产阶级强迫我们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试验之后，到 1921 年春天，情况已经很清楚：不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是要在许多经济领域退向国家资本主义。但在 1921 年秋天回过头来看，还是觉得不够。列宁是这样

进行总结的：“今年春天我们说过我们不怕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我们还说过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商品交换这一形式固定下来……商品交换这个概念包括一些什么内容呢？这个概念所设想的建设计划（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怎样的呢？它设想，在全国范围内，或多或少要按照社会主义方式用工业品换取农产品，并通过这种商品交换来恢复作为社会主义结构唯一基础的大工业。结果怎样呢？现在你们从实践中以及从我国所有的报刊上都可以清楚地看到，结果是商品交换失败了。所谓失败，是说它变成了商品买卖。如果我们不想把脑袋藏在翅膀下面，如果我们不想硬着头皮不看自己的失败，如果我们不怕正视危险，我们就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得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商品交换没有得到丝毫结果，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你们要努力适应这种情况，否则买卖的自发势力、货币流通的自发势力会把你们卷走的！”列宁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市场经济的问题。

对于搞市场经济，不少人表示了强烈的怀疑。

列宁认为，这些人是幼稚的。俄国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宗法经济、小商品经济（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

主义。既然有交换和商品流转，就有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无可争辩的。面对这样的经济现实？列宁认为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

第一条道路：“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国营的交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列宁认为，走这条道路，那就是干蠢事，就是自杀。

第二条道路：“不去试图禁止或堵塞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努力把这一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这是一条可行的道路。

列宁明确主张走第二条道路，使用私人资本主义的办法。列宁认为，有可能通过私人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列宁得出一个重要结论：要利用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来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中间环节就是资本主义，它也是提高生产力的手段和方式。

列宁详细评述了国家资本主义的三种形式：第一，租让制，即同外国资本家订立书面合同的形式，其基础是大工业。租让制获得成功，就会使苏维埃国家获得具有现代先进资本主义水平的模范的大企业。第二，合作制，指作为一种商业形式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其基础是小生产；合作制获得成功，就

会把小经济发展起来，并使小经济比较容易在相当期间内，在自愿联合的基础上过渡到大生产。第三，代购代销制，指国家把作为商人的本国资本家的商品购买过来，再通过国家的渠道销售出去，这种租赁合同与租让合同极为相似。

列宁最重视、论述最多的是租让制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

1918年初布列斯特和约签定以后，列宁第一个提出实行租让制，1920年3月25日，列宁正式签署《关于租让制的提纲》。10月16日，人民委员会听取米柳亭关于租让制的报告，并决定委托列宁、米柳亭、库尔斯基、列扎瓦、谢列达组成一委员会来修订租让法令草案。11月23日，人民委员会听取库尔斯基的报告，批准租让法令。1921年3月，列宁亲自起草了《租让合同基本原则》。这一文件成了人民委员会1921年3月29日通过的《租让合同基本原则》决定的基础。1921年4月11日，列宁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作关于租让问题的报告，逐条宣读并解释《租让合同基本原则》决定。

实行租让制，归根到底是为了使国家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这是列宁始终坚持的一个根本点。因此，只要对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有好处，列宁就领导党和人民去实践，即使过去规定不租让的企

业，也要突破这一规定。例如，1918年苏维埃政府规定：只有新的建设工程才实行租让，老企业不租让，像巴库和库兹巴斯这样的大矿区更是不能向外租让的。国内战争以后，几个大油田遭到严重破坏，要恢复生产需要巨额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列宁于1921年2月1日起草关于石油租让的决定草稿。人民委员会根据列宁的草稿通过决议，同意在巴库地区和格罗兹尼地区实行租让政策。

对于外国资本家到俄国来承租，列宁的头脑是清醒的。他在实践中认识到，外国资本家需要的是市场，想赚更多的钱，而不是为了帮助苏维埃俄国，所以他们在谈判中往往要价太高。于是，苏维埃政府在与外国资本家谈判过程中，展开了讨价还价的斗争。

英国工业家兼金融家莱斯利·厄克特十月革命前是“俄亚联合公司”董事长和四个大型矿山企业的老板。他与苏维埃俄国谈判的目的是争取承租他过去经营的四个企业，继续赚取高额利润。经过艰苦的谈判，双方于1922年9月9日签订了初步合同。

列宁经过认真分析研究认为，这一租让合同对苏维埃俄国明显不利。列宁写道：“厄克特答应两三年后我们会有收入，而现在他却要从我们这里拿钱。这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建议否决这项租让合同。这是奴役和掠夺。”列宁曾说过：“只要能够恢复经

济，就不惜让资本家得到一些额外的利润。”“也许我们不得不把百分之几百的，甚至百分之几千的利润给予资本家。”列宁这句话包含这样的意思：要使资本家能得到好处，他才肯来投资。但同时，苏维埃俄国也要从根本上得到好处，得到资金和技术。如果从长远来看，苏维埃俄国无利可图或者得利甚少，那就违背了实行租让制的初衷。

在列宁接触过的外国承租者中间也有对苏维埃俄国怀有诚意的人士，列宁认为，与他们签订的租让合同一定要认真执行。美国药品和化学制剂联合公司的代表阿·哈默和 B·米歇尔对苏维埃俄国是友好的。1921 年 11 月初，苏维埃政府批准与哈默签订的两个合同：俄国向哈默的公司租让乌拉尔的石棉矿；哈默的公司向俄国提供 100 万普特粮食换取乌拉尔的工业品。列宁一直十分关注谈判过程。列宁强调，这两个合同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通向美国实业界的道路应该千方百计加以利用。他指示有关部门：执行同哈默签订的合同要再三检查，避免出丑。有一次，发往美国的货物出了质量问题，造成不好的影响。列宁对这件事提出严厉的批评，指示：“一定要进行监督，务必绝对严格、一丝不苟地履行这个租让合同中规定的我方义务，而且对整个事情都要更仔细地进行监督。”同哈默签订的合同，

是苏维埃俄国第一个成功的租让合同。

哈默的父亲是美国共产党的老工作者，在 1907 年举行的斯图加特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见过列宁。哈默拿着父亲给列宁的私人信件，于 1921 年秋到了俄国。动身之前，许多美国朋友劝他不要去俄国，说布尔什维克有许多暴行，列宁是个“骇人听闻”的领袖，在俄国有可能丧命，等等。

哈默没有听这些劝阻，勇敢地来到莫斯科，列宁很快就接见了哈默，那是 1921 年 10 月 22 日。

一见面，列宁爽朗地问：“我们用什么语言交谈？俄语还是英语？”

哈默回答道：“您的英语比我的俄语说得好，我们用英语谈吧。”

列宁和蔼地笑了，表示同意。

列宁同哈默足足谈了一个半小时。先谈了私事，如关于哈默的父亲等；接着谈到政治问题。列宁特别关心美国承认苏维埃俄国的问题。列宁对美国的事情很了解，甚至比某些美国人还知道得多。他不时说一些幽默的话，于是办公室里响起阵阵轻松愉快的笑声。

列宁对哈默说：“在世界各国中，我们认为美国是最发达的国家。我们当然希望俄国也能达到同样的水平，区别只是在于生产资料将掌握在国家手里；

这样，国民劳动的全部产品将归人民，而不是为少数私人企业主所攫取。”

接着，列宁转到外贸和租让的问题：我们邀请美国人到俄国来，请他们教给我们生产方法，把我们的工业提高到应有的高度。对这样的援助，我们愿意付出代价，美国资本绝对不会受侵犯，它在一定时期内能从它承租的工商企业中赚到钱。

列宁一边快速地翻阅一本《应用科学的美国》杂志，一边对哈默说：

“看，这是你们作的。这才是进步：建设、发明、机器、减轻人的劳动。现在的俄国就像是你们的国家最初开拓的那个时期。我们需要知识和勇气，是知识和勇气把美国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哈默看出列宁是想和他做生意。但他毕竟来自另一种社会制度的国家，不免顾虑重重。他爽快地告诉列宁，他是一个小企业家。列宁非常直率地说：“没关系，这不重要，但是，要由某个人把坚冰打破。”

列宁的态度很明确，他极力主张美苏进行贸易，把政治对立造成的“坚冰”融化，使贫穷的俄国早日富起来。对于这一点，哈默是坚信不移的。不过，哈默还是担心谈判会有阻力，从而使时间拖得很久。列宁高声说：“拖拉作风是我们许多可咒骂的作风中的一种。”说到这里，他立即决定派两个人专门负责此

事，并说：“生意人不是慈善家，如果他们不相信能获得利润，那他们把金钱投入俄国就是傻瓜。”

列宁对哈默许下诺言：亲自帮助美国人来承租俄国的第一个企业。列宁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尽力为哈默提供各种方便条件，并嘱咐秘书：“请代表我尽力帮助他。”这样，在列宁的亲自帮助下，哈默于1921年10月29日与苏维埃政府的代表签订了第一个租赁合同。苏维埃政府很快就批准了这一合同。

列宁利用租让制引进外资和技术，推进了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但租让制的实行也遇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

在工农群众中，有不少人认为实行租让制是出卖俄国，他们表示：宁愿再受三年饥寒，承担三年义务，也不愿“把我们的亲娘俄国用租让的办法卖掉”。还有人有各种各样的担心：苏维埃俄国经济困难，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外国资本家会不会借机煽动人民反对苏维埃政权？俄国资本家会不会同外国资本家一起出现？租让企业中的俄国工人会不会带来从内部瓦解和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危险？

列宁很理解群众中提出的这些问题，但是，他并不同意这些意见，耐心地做了解释工作：“这根本谈不到把俄国出卖给资本家，我们说的是租让，同时每

一个租让合同都受到一定期限、一定协议的限制。”列宁认为，实行租让后，俄国可以引进外国资本，买到外国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

列宁的租让制政策也遭到其他政党的反对。为了达到破坏租让的目的，立宪民主党一方面挑唆外国资本家不来承租，说什么承租者不能从中得到好处；另一方面煽动国内人民反对租让，说什么布尔什维克要把俄国分成几部分拍卖给外国资本家。一些流亡国外的立宪民主党人在巴黎集会，指责实行租让制就是允许外国人掠夺俄罗斯的财富，损害人民的利益和权利，污辱了民族感情。立宪民主党的重要头目谢·尼·普罗柯波维奇认为，苏维埃政府把企业从俄国资本家手中夺走，租让给外国资本家，是反对俄罗斯民族的行为。

孟什维克也反对列宁所倡导的租让制，1918年4月25日，孟什维克的《前进报》刊载伊苏夫的提纲，指出：“苏维埃的政策与真正的无产阶级性质背道而驰，日益公开地走上与资产阶级妥协的道路，而带有明显的反工人的性质。在工业国有化的幌子下实行培植工业托拉斯的政策，在恢复国家生产力的幌子下取消8小时工作制，实行计件工资和泰罗制，这个政策会使无产阶级丧失经济方面的基本成果，变成

资产阶级剥削的牺牲品。”还到处进行反租让制的活动：散发传单、煽动工人罢工和游行示威，枪杀共产党员，等等。

列宁针锋相对地反对破坏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言行。他指出，这些指责苏维埃政权的人，就是同反动派一起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人，是打算解除武装、镇压工人革命的人，是用漂亮词句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人。这样一些人居然打起反对资产阶级复辟的旗帜，真是绝大讽刺。列宁号召人民识破他们的阴谋诡计，以更有成效的工作驳斥他们。

俄国共产党内部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也反对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他们指责说：“在生产中恢复资本家的领导，实行劳动纪律并不能真正提高劳动生产率，反而会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主动性、积极性和组织性。实行劳动纪律有使工人阶级受奴役的危险，它将不仅激起落后阶层，而且激起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不满。他们还说，如果实行退却的策略，无产阶级就不能保全自己。列宁认为，“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这些言论，证明他们受了孟什维克以及资产阶级的挑拨，落入了他们的圈套。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列宁深刻批判了“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这些错误言论。由于列宁的坚持并同反对租让制的错误思想进行坚决斗争，在党内讲明租让制

的好处，才使大多数同志逐渐认识到租让制的必要性，并在俄共（布）十大上通过实行租让制的决议。

俄共（布）内部的“工人反对派”也反对实行租让制。1921年4月11日，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工人反对派”的组织者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又挑起关于实行租让制的争论。施略普尼柯夫反对向外国资本家实行租让，认为应该把企业租给俄国工人。列宁反驳说，这种看法太荒唐了，如果租给俄国工人，我们就要保证供给各种物资，但我们连自己的重点企业都不能保证供应。如果把企业租让给外国资本家，他们就可以把必需品都从国外运来，这对于俄国发展国民经济是有利的。两种办法，孰是孰非，显而易见。

另外，在俄共（布）内部还存在一种非常危险的颓丧情绪。1921年春天俄共（布）决定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实行商品交换。但那时的商品交换还没有超出产品交换的框框，这是不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面对现实，不能“把脑袋藏在翅膀下面”。退到国家资本主义还不够，还必须退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列宁一直坚持对外开放，向外国资本家租让企业，引进外资和技术。在这种情况下，党内的颓丧情绪更加滋长。例如，当谈到要学会经商的时候，有人就觉得非常可怕。他们

认为，共产党员居然要把最平常、最庸俗、最微贱的商业任务提上日程，真让人万念俱灭，共产主义没有了。列宁指出，党内的这样情绪是危险的，不利于恢复正常的经济关系和振兴大工业，必须克服这种情绪。

列宁在党内和群众中反复解释利用资本主义的必要性，阐明实行租让制的好处。同时，既反击了阶级敌人的造谣诽谤，又驳斥了党内反对派的指责。由于这一系列得当的举措，1921年以后，随着新经济政策不断深入贯彻，租让制比以前有较大的发展。

利用资本主义，实行租让制，的确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经济，又有某些副作用。对于这一点，列宁的头脑始终是清醒的。

1920年12月6日，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积极分子大会上作了关于租让的报告，其中有一部分专门谈利用资本主义的副作用问题。列宁认为，苏维埃俄国采取一些利用资本主义的措施以后，对发展经济有很大好处，但的确可能产生一些消极后果。首先，存在着资本主义国家控制苏维埃俄国国民经济、干涉内政、恢复资本主义的危险。其次，帝国主义国家可能派遣特务来收集情报，搞破坏活动。第三，会带来资本主义习气，使人民受到腐蚀。因此列宁认为，租让不是和平，而是战争的新形式。列宁清醒地

看到这些危险，但并不害怕它，而是想办法与它进行斗争并争取胜利。

列宁的斗争办法是：运用无产阶级专政机关识破国内外敌人，打击他们的颠复活动；第二，加强共产主义宣传，抵制资本主义影响。列宁说：对于资本主义习气，“应该处处用自己的共产主义影响加以抵制。这也是一场战争，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方式、两种形态、两种经济的军事较量”。

对于国内外敌对势力千方百计要战胜苏维埃俄国的图谋，列宁是十分警惕的。这些势力对苏维埃政府主动提出租让制感到非常高兴，以为这是一个有利于他们的时机，战场上没能得到的东西可以通过和平手段获得了。例如，美国沙文主义者斯帕戈谈到租让制时“手舞足蹈，欣喜若狂”，认为苏维埃俄国同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租让合同说明共产主义破产了。列宁于1920年11月21日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回答了敌对分子的妄想：“那些曾经因为我们采取的恐怖手段或者因为我们的整个制度而对我们发动战争的列强，明知同我们建立贸易关系会增强我们的力量，现在却不得不违心地走上这条道路，这正是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战胜了全世界资本家的最好不过的证明。”

中国古代《易经》中说：“仁者见之谓之仁，智

者见之谓之智。”这种情况在世界上是屡见不鲜的，对列宁的各种政策也是这样。敌对势力认为俄同外国资本家签订租让合同，是共产主义理论破产的证明；而列宁则恰恰相反，认为这件事象征苏维埃政权的胜利。

苏维埃政权的反对势力中有各种不同的派别，有死硬的用武力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派别；也有主张与苏维埃政权和解，用和平手段战胜苏维埃政权的一派，这一派的代表就是“路标转换派”。

“路标转换派”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主要由流亡国外的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政治派别。这一名称来源于1921年在布拉格出版的《路标转换》文集。所谓“路标转换”，其基本含义是：由武装斗争反对苏维埃政权，转而在表面上支持苏维埃政权，为建设新俄罗斯积极工作，达到使苏维埃政权和平演变之目的。

在“路标转换派”等资产阶级人物眼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是向资本主义的演变。他们认为，和平演变苏维埃政权的时机到了。

“路标转换派”的理论家乌斯特里亚洛夫把他们的策略讲得十分透彻，他写道：承认苏维埃政权，“绝不是无条件地接受布尔什维主义或者与它完全和解，只是彻底改变战胜它的方法。在国内战争中没

能用武力战胜布尔什维主义，在国内和平的条件下，将要通过演变的方式把它消灭……不管苏维埃政权的代表人物自己怎么说，它内部从本质上发生演变的过程，无疑已经开始。我们当前的共同任务，就是促进这一过程的发展。”乌斯特里亚洛夫等人认为，完成这一任务就会实现所谓的“民族复兴”，逐渐使苏维埃政权蜕化成资产阶级共和国。

在乌斯特里亚洛夫等人眼里，苏维埃政权实际上已在蜕变，他把苏维埃政权比喻为小萝卜，这样描写道：

“小萝卜，外表是红色，里面是白色。红皮这块十分惹人注目的招牌是有用的，因为它对人们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它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内瓢即实质是白色的，而且随着果实的生长、成熟，越来越白。它自发地、本能地变白。

冬宫的红旗和克里姆林宫钟楼里的《国际歌》的声音不也是同样的吗？……

旧资产阶级灭亡了。——新资产阶级正在产生。有的时候，旧资产阶级也转变为新资产阶级。

旧官僚也灭亡了，——新官僚同样不可避免地在产生。旧官僚往往像不死鸟一样，经过‘灰烬阶段’，在新官僚中间得到复活。

军队也是这样。

外交也是这样。

……国亡死了，——国王万岁！……”

1921年11月7日，乌斯特里亚洛夫在《生活新闻》上发表《革命的黄昏》一文，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他对当时的俄国作了以下描述：十月革命进入第五年时，与它最深入的时候有本质的不同。过去是“立即实行共产主义”；现在则恢复私有制，鼓励“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把国家资本主义说成是现实成就的顶点。过去是“立即实行世界革命”；现在则把“面向世界资本主义的方针”提上日程，放弃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的极端斗争方法。过去是好战的无神论；现在盛行“同教会妥协”。过去是不可遏止的国际主义；现在“要考虑爱国情绪”。过去是最正统的反军国主义；如今红军已成为革命的骄傲。如此等等。

“路标转换派”眼里的苏维埃俄国已经和平演变了。他们在一系列文章中大肆宣扬，苏维埃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就是在演变，“掌权的还是原来的人，但他们本身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革命的黄昏正在到来”。“路标转换派”的结论是：应该支持苏维埃政权走向资产阶级国家，促进演变进程。

列宁对于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战略一向都很警惕。早在苏维埃政权初期，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就指出：“必须坚持不懈地发展苏维

埃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组织。现在有一种使苏维埃成员变为‘议会议员’或变为官僚的小资产阶级趋势。必须吸引全体苏维埃成员实际参加管理来防止这种趋势。”

1920 年春天，苏维埃俄国在国内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在这种形势下，列宁在俄共（布）九大上提出在不流血的战争中获得胜利的问题。列宁指出：“他们想把和平的经济建设变成对苏维埃政权的和平瓦解。帝国主义者老爷们，对不起，我们是有戒备的！”

1922 年 3 月 27 日，列宁在俄共（布）十一大上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报告中专门谈到“路标转换派”妄图促进苏维埃政权和平演变的问题。列宁指出，“路标转换派”认为苏维埃俄国改行新经济政策是向资产阶级政权蜕变，这是阶级敌人说的真话。列宁认为，它道出了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危险：“你们正在滚进通常的资产阶级泥潭，那里只不过摇动着几面写着各种空话的共产主义小旗子罢了。”

第四十五章 商贸外交

我们一开始就声明，我们欢迎热那亚会议并准备出席这次会议；我们十分清楚而且毫不隐瞒，我们准备以商人的身份出席会议，因为我们绝对必需同资本主义国家（只要它们还没有完全垮台）进行贸易，我们到那里去，是为了最恰当、最有利地商定政治上合适的贸易条件，仅此而已。

—列宁

“滚进通常资产阶级泥潭”，如果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真的走到这一步，那就意味着列宁为之奋斗几十年的成果付之东流，一生的心血化为乌有。这是列宁无论如何也不愿看到的。列宁经常想：“路标转换派”的真话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有好处，它可以成为警钟，比那些谎话强。听着这长鸣的警钟，列

宁在顽强的工作着。其实，列宁自 1918 年负伤以来，身体一直不好，子弹还在体内。但列宁的意志坚强，把自己的精力完全集中在如何巩固新生政权这个最重大的问题上。

1921 年初，列宁领导苏维埃俄国彻底打败外国武装干涉者。此后，如何与敌视苏维埃共和国的资本主义国家相处，仍然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

资本主义世界遭到空前的经济危机，反对武装干涉苏俄的力量日益强大。东方各国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大大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得出以下结论：用军事干涉的办法不能推翻苏维埃政权；只有使苏维埃俄国回到世界经济体系中来。1922 年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说，我们是商人，现在失去了俄国这个大市场，不能这样继续下去，必须与俄国谈判并达成协议。列宁也揭示了资本主义各国同苏维埃俄国建立贸易关系的客观必然性，他指出：“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定，这种力量就是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迫使他们走上这条同我们往来的道路。”

从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一天起，苏维埃俄国就向全世界公布了和平法令，把和平外交定为基本国策。苏俄努力与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平贸易关系，因

为只有建立起这种关系，有和平的国际环境，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俄共（布）内部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与资产阶级政府签订任何经济条约。列宁严厉批评他们说，处在帝国主义列强中间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如果不同列强缔结经济条约，又不飞到月球上去，那就无法生存。列宁始终强调要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尽力发展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但是，苏维埃政府的许多尝试都失败了，因为旧世界不愿承认新的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

尽管如此，列宁仍然领导苏维埃政府坚定不移地执行和平外交政策。

1921年10月25日，苏维埃政府给英国、意大利、美国、法国和日本发去照会，建议召开国际会议，讨论在欧洲保持和平和建立经济合作关系。

英国第一个响应苏维政府的建议。1921年12月24日，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答复苏维埃俄国驻伦敦代表列·波·克拉辛，表示同意进行关于承认苏俄和帮助它恢复经济的谈判，但必须有以下先决条件：苏俄国承认沙皇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欠下的债务，并赔偿由于实行国有化而给国内外资本家所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苏俄国不能接受英国人提出的先决条件。但是，

苏俄国外交人民委员部回答说，苏维埃政府准备在会议上讨论关于债务的问题。这样就保证了这次会议按计划召开。

1922年1月6—13日，协约国各国在法国戛纳召开最高级会议，正式决定在不久的将来召开有苏俄参加的国际经济和财贸会议。

1922年1月7日，苏维埃政府收到意大利外交部的备忘录。备忘录中说，协约国各国决定召开有苏俄参加的欧洲各国经济和财政会议，如果列宁能亲自出席，将会有利于欧洲的经济复兴。

1月8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答复说，苏维埃政府接受邀请，如果列宁不能亲自前往，将派拥有全权的代表团出席。

协约国各国决定邀请苏维埃俄国出席国际经济和财政会议，这一事实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在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中获得了重大胜利。1922年1月22日《真理报》写道，俄被邀参加国际会议，不仅是它的外交胜利，而且是红军三年来斗争的胜利，是国内稳定和工农联盟巩固的结果。

戛纳决议第一条规定：一些国家不能干涉另一些国家的所有制和管理方式；每一个国家都有权选择自己的制度。这里表达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平等、互不干涉的思想。但是，戛纳决议又规定：只有

苏俄偿还过去的所有外债和取消国有化法令，才能承认苏俄并与它签订经济条约。这等于又否定了第一条所规定的两种制度完全平等、互不干涉的思想。

1922年1月2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特别会议，为出席热那亚国际会议作准备。会议任命了列宁为苏俄出席热那亚会议代表团团长，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为副团长。列宁亲自领导代表团的准备工作，提出代表团遵循的路线和方针以及有关组织措施，并提出敢于斗争与善于斗争、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策略思想。

列宁首先注意的问题是，在热那亚会议上要争取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可争取的力量。1922年2月1日，列宁提出了给热那亚会议代表团副团长和全体团员的指示草案，指出，苏俄的代表要这样准备发言：在简述共产主义观点之后，要详细阐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同帝国主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还要说明，虽然我们是共产党人，但愿意按照资产阶级的观点提出废除一切债务的必要性问题。

吸收资产阶级专家参加代表团的工作，这是保证代表团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的组织措施。列宁不拘一格选人才，只要是爱国和能为代表团出力，不论政治信仰如何，都可以请进代表团担任专家。1922年2

月4日，列宁读了《路标转换》杂志第13期上发表的“路标转换派”代表人物之一、国际法专家克柳奇尼科夫的《热那亚会议》一文之后，建议吸收克柳奇尼科夫作为专家参加代表团的工作。由于列宁和俄共（布）对克柳奇尼科夫等专家的重用，这些专家在苏维埃俄国的外交斗争中充分发挥了作用。他们积极参加筹备热那亚会议和海牙会议，批驳资产阶级破坏苏俄国际地位的言论，斥责帝国主义国家向苏俄提出的赔款要求。

列宁指示苏维埃代表团，一方面要争取具有和平主义情绪的资产阶级，同时要坚持原则的立场不作任何有损于苏维埃国家利益的让步。

列宁审时度势，根据国际力量对比，主张提出一个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纲领，赞成别国提出的改良主义措施。1922年2月6日，列宁在他写的俄共（布）中央给出席热那亚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的指示草案中说：“代表团绝对必须就所有根本性问题阐述全面、独立、完整的纲领。”“这个纲领应当是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但是，我们代表团要及时地、明确地声明，我们之所以在这里不提出唯一符合我们观点的共产主义纲领……是因为我们希望提请持有完全不同的立场的其他代表团注意，在英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里，一些具有资产阶级观点的人已经就部分

问题提出了许多治标的办法和改良主义性质的措施。在一定条件下，这种治标的纲领总还能够缓和一下当前的严重局势的（要确有把握地摆脱这种局势，只有同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一切原则彻底决裂）。 ”

契切林在来信中对热那亚会议能否成功表示担心。1922年2月7日，列宁在给契切林的复信中指出，惊慌失措比什么都危险，决不接受任何对我们不利的东西，决不屈服于最后通牒，孤立、封锁和武装干涉都吓不倒我们。列宁坚定地说，如果他们要做生意，那就来吧！“但是，没有看到的货色我们是不买的，而且不把‘要价’一分一厘都算清楚我们也决不成交。”

1922年2月15日，列宁致函契切林，揭露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对苏俄的威胁，劳合—乔治说，如果苏维埃政府拒绝承认戛纳决议，整个会议就要受到破坏。列宁指出，邀请苏俄代表团出席热那亚会议并没有提出以承认戛纳决议为先决条件，苏俄也没有作过这种承诺。

列宁在领导制定苏维埃代表团的纲领时，注意了向那些由于进行武装干涉和封锁而给苏俄造成重大损失的国家提出反要求。列宁建议调查外国武装干涉给苏俄造成的损失。经过专门委员会的认真调查，损失达390多亿金卢布，而俄国在大战前和

大战中欠外国的债务才 185 亿金卢布。这样来看，帝国主义国家应该偿还苏维埃俄国的债务，而不是相反。

1922 年 2 月 24 日，列宁提出俄共（布）中央关于出席热那亚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的任务的决定草案，规定了代表团一步一步的斗争方法：关于承认戛纳决议中提出的条件问题，代表团应竭力回避，如果回避不成，那就提出以下方案，即所有国家都承认它们的国债，并赔偿由本国政府的行动所造成的损失。如果这样也不行就准备破裂。列宁坚定地指出，我们不允许在我们与资产阶级国家之间有一个最高仲裁，因为争执是在两种不同所有制之间进行的。列宁还指出，我们的纲领不隐瞒共产主义观点，但只限于最扼要地提一提，因为我们是签订贸易协定，是谋求同资产阶级阵营中的和平主义部分达成协议的，甚至达成政治协议。列宁提出参加热那亚会议的政治任务：第一，要想办法加强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一翼，哪怕能给这一翼在竞选中增添一线胜利的希望也好；第二，分化在热那亚会议上联合起来对付我们的资产阶级国家。这样可以加深国际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阵营同反动阵营之间裂痕，达到和平主义的目的和贸易的目的。

斯大林对列宁提出的决定草案作两点补充：“1.

关于承认苏维埃政权的问题不在会议开始时，而在会议结束时（即在为达成经济协议作多种尝试以后）提出、并且也不要以此作为最后通牒；2. 在会议上不要（像克拉辛那样）把中央消费合作社、农业合作社等提出来作为俄国方面（订立协议）的主体，而要记住只有一个主体，这就是俄罗斯国家。”

1922年2月2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列宁的决定草案和斯大林的补充意见。

1922年3月6日，列宁在一次会议上谈国内外形势时说，我们准备以商人的身份出席热那亚会议，因为“只要资本主义国家还照样存在，我们就必须同它们做生意”。

契切林根据列宁指示，为苏维埃代表团拟定出一份和平主义纲领。1922年3月10日，契切林写信给列宁，汇报了这一纲领的内容。列宁仔细审阅契切林的信，并把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划了出来。这些内容是：（1）吸收殖民地和欧洲各民族平等地参加解决国际问题；（2）吸收工人组织参加国际会议；（3）国际会议遵循不干涉各民族事务的原则；（4）召开一个有全球一切民族参加的世界大会，解决重要的国际问题；（5）由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各出相等人数的代表，建立解决国际争端的仲裁法庭；（6）普遍裁军；（7）禁止大规模的杀伤武器；（8）世界大会建

立的各种技术委员会将指导最广泛的世界复兴纲领的实施；（9）援助弱小国家；（10）建议先进国家的资本家修建一条伦敦——莫斯科——北京的超干线铁路；（11）有计划地分配目前闲置在美国银行金库中的黄金；（12）给破产的国家贷款；（13）有计划地和平地分配恢复经济所需要的产品。这些内容就是契切林在热那亚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言的基本内容。1922年3月14日，列宁致信契切林，认为他在信中把和平主义纲领叙述得很出色。

列宁告诫苏俄代表团，在发言中避免使用不利于团结的吓人字眼。1922年3月23日，列宁对代表团声明草案提出以下修改意见：删去“不可避免的暴力变革和采用流血斗争”、“我们的历史观包括采用暴力措施”、“我们的历史观认定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等字眼，仅仅说明：我们不同意和平主义者的观点，但我们要全力支持和平解决有争议问题的一切尝试，为达成经济协定，我们将尽量广泛地实现和平主义纲领。

经过充分准备之后，苏俄代表团于1922年3月17日启程前往热那亚。列宁由于健康原因和国务繁忙没有前去，由代表团副团长契切林代行团长的一切职权。行前，契切林对《真理报》和《消息报》的代表发表谈话，他说：苏俄代表团在热那亚会议上将

坚持苏维埃制度和国家的主权不受侵犯，坚持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基础，否则苏维埃制度就要受到威胁，劳动群众将重新被奴役。

列宁认为，苏俄代表团应注意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是反对苏俄的帝国主义阵线的最薄弱的环节。苏维埃俄国不承认凡尔赛条约，这大大帮助了战败国德国。此外，德国被夺走了全部市场，所以特别关心同苏俄发展经贸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德国在政治上多么仇恨布尔什维克，不管协约国怎样企图阻止苏德关系的发展，都无法使两国经济关系接近的进程停顿下来。1922年4月初，苏俄代表团到达柏林，同德国政府进行了关于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和经济关系的谈判，虽然没有达成协议，但仍然起了积极作用。契切林写道：“我们与德国政府约定，在热那亚会议上我们两个代表团将互相联系、互通情报和互相支持。”

在热那亚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契切林宣读了苏俄代表团的声明，指出，现在是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时期，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对于全面恢复经济是绝对必要的。苏俄要尽力同所有国家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建立经济关系，为恢复欧洲的经济作出贡献。声明还提出了关于全面裁军的建议。

但苏俄代表团的声明遭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反

对。作为俄国战前最大债权国之一的法国代表说，法国坚决反对苏俄关于裁军的建议。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支持法国代表的观点。这样一来，苏俄的建议没有经过讨论就被拒绝了。

1922年4月11日，协约国把它们拟定的备忘录交给苏俄代表团。备忘录中要求苏俄偿还沙皇和临时政府时期的债务、归还国有化时没收的外国人的财产和企业、为外国人建立不受苏俄法律约束的特殊制度、停止在一切国家宣传共产主义。苏俄如果答应了这些要求，实际上就等于取消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甚至等于把苏俄置于半殖民地的地位。

4月中旬，苏俄代表团同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的代表举行秘密会谈。苏俄的代表遵照列宁的指示，坚决驳斥西方各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向它们提出反要求，即要求西方各国赔偿它们的武装干涉给苏俄造成的390亿金卢布的损失。

西方列强当然不肯接受苏俄的要求。法国代表采取了强硬的立场。英国代表团团长劳合—乔治则采取两面派手法。他暗示，如果苏俄放弃自己的反要求，就准备讨论关于减少军事债务和延长偿还期限的问题。劳合—乔治是希望把苏维埃代表团托进长期谈判当中去，争取最终满足协约国的要求。

当苏俄代表团已经清楚地看到这一谈判不会有

任何结果时，就按照列宁的意见，建议恢复苏德在柏林开始的关于缔结条约的谈判。德国由于在热那亚会议上没有达到修改凡尔赛条约的目的，而且对英、法、意、比等国同苏俄的谈判很担心，再加上希望尽快与苏俄建立广泛的贸易关系，便同意恢复苏德谈判。

1922年4月16日，苏德条约在热那亚郊区拉帕洛签订，史称拉帕洛条约。条约规定立即恢复苏德外交关系、互相放弃要求偿还军事债务和战争带来的损失、德国承认苏俄对德国财产的国有化。条约还规定，两国互相享受最惠国待遇，在此基础上发展经贸关系。

苏德拉帕洛条约打破了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苏俄的统一战线，创造了苏俄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相互平等基础上建立经济政治关系的先例。拉帕洛条约对于协约国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协约国本想利用德国来反对和孤立苏俄，但苏俄与德国成功地签订了条约，这完全违背了协约国的愿望。他们认为，拉帕洛条约破坏了欧洲团结，因此要求废除它。德国拒绝了这一要求。苏俄也坚决反对协约国干涉苏德发展关系。1922年4月20日，苏俄政府向代表团发出指示，要求代表团必须无条件地捍卫拉帕洛条约，这样，协约国破坏苏德接近的一切尝试都彻底失败了。

列宁密切注视热那亚会议的进程和会议上发生的各种情况,并及时给予指示。1922年4月19日,列宁告诉斯大林、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建议给契切林等发以下电报:来自热那亚的消息表明,我们正在受骗。劳合—乔治叫嚷反对法国,借此掩盖其迫使我们偿还一切债务的意图。应该系统地揭露英国的这一惯用伎俩。

1922年4月20日,苏俄代表团在热那亚会议宣读备忘录,正式答复协约国提出的备忘录。苏俄代表指出,协约国的备忘录提出的要求违反了它们的夏纳决议,是要奴役苏俄。

4月21日,列宁致电契切林,回答了契切林4月20日来电。契切林在来电中说,英国对要求苏俄赔偿外国人的损失这一问题特别关心,如果不让步,英国可能破坏会议。列宁在回电中说,这丝毫不能改变苏俄的政策,不应该害怕破裂。

契切林在4月20日给劳合—乔治的信中说,在废除债款和债款利息、提供足够的财政援助和承认苏俄的条件下,苏维埃政府可以将收归国有的财产退还原产权人,而在无法照此办理的地方,可通过与原产权人达成协议,或按照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满足其合理要求。但苏俄代表团大多数成员认为,契切林的信违背了俄共(布)中央的指令。4月22日,代

代表团成员扬·埃·鲁祖塔克将此情况电告外交人民委员部。

4月24日，列宁致电契切林，认为鲁祖塔克的意见是正确的。列宁再次指出，绝对不能同意恢复我国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列宁还说，我们所能作的最大让步已经通知代表团，不会再作丝毫让步了，一旦搞清在这种让步基础上还不能达成协议时，就中断会议。

4月30日，苏维埃政府代表团成员李维诺夫来电说，如果苏俄同意满足私有者的要求，协约国就同意成立国际银行团来帮助苏俄。李维诺夫认为，只有就赔偿外国原产权人问题达成协议，才有可能得到贷款。5月2日，他又来电说，在我们承认赔偿外国原产权人的原则之前，协约国代表坚决拒绝讨论贷款问题。契切林也两次来电建议：苏俄一方面宣布没收私有财产的权利是不可动摇的，同时声明，由于需要取得贷款，同意采取发行10年后归还的苏维埃国家债券的办法赔偿原产权人的损失。

列宁收到上述电报以后，担心他们在同协约国代表的谈判中可能作出违反中央指令的让步，因此于5月2日写便条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说契切林和李维诺夫等人表现了可耻而危险的动摇，建议给予严厉批评。列宁还起草了给契切林的电报稿。命令代表团无条件地中断会议，理由是不同意恢复私

有财产，同时声明，苏俄只有立即得到优惠贷款，两种所有制之间无条件地签订平等条约，才同意作出部分让步。列宁还严厉警告说，如果契切林等人再动摇，中央就宣布不承认他们的言行，并撤销其职务。

5月3日，苏俄代表团收到协约国的备忘录，又一次要求苏俄偿还沙皇和临时政府的一切债务，把收归国有的私有财产还给原产权人，同时拒绝赔偿武装干涉和经济封锁给苏俄造成的损失。

5月5日或6日，列宁致电契切林，要他务必尽快利用协约国的这一备忘录使热那亚会议破裂，“因为我们决不向产权人让步，而比这更好的时机是找不到了。延误会削弱我们的地位。既然我们手头有了德国条约，我们现在就决不放弃长时间内只以这个条约为基础的打算。请开始极其谨慎地单独拉一下意大利。”

5月8日，列宁致电李维诺夫：“我们觉得，列强最近的备忘录全然无法接受，这是使会谈破裂的恰当借口。但是，如果您不同意这一点，我们同意由您酌定最合适的破裂时机，我们认为破裂是注定的。”

5月11日，苏俄代表团根据列宁指示精神，发表备忘录，驳斥协约国的要求，并声明：如果协约国不承认互惠原则，苏维埃俄国是会让步的。这样，苏俄与协约国各国在热那亚的谈判到此宣告破裂。

5月15日或16日，列宁起草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出席热那亚会议代表团的工作报告的决定草案，指出，苏俄代表团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维护了俄罗斯联邦的主权完整，同试图实行奴役和恢复私有制的行径进行了斗争，与德国缔结了拉帕洛条约。列宁高度评价拉帕洛条约，认为它是摆脱困境和战争危险的唯一正确的出路。在苏俄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上，只有这种类型的条约才是正常的。

1922年8月，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会议高度评价出席热那亚会议的苏俄代表团的工作。代表团的工作之所以受到了高度的赞扬，是因为代表团执行列宁的指示，纠正了自己的不正确意见。

列宁对协约国的意图非常明了：它们要利用热那亚会议，把奴役的条件强加给苏俄，使它服从于外国资本，从而达到用武装干涉所没有达到的目的。面对协约国的和平攻势，列宁一再指示苏俄代表团要揭露它们的阴谋诡计，捍卫革命成果，捍卫苏俄的主权和对外贸易垄断制，签订打破帝国主义国家反苏统一战线的拉帕洛条约。列宁的对外政策是和平。为了贯彻和平外交政策，列宁认为必须坚持以下几点：坚决维护苏俄的主权，不允许帝国主义列强干涉内政；要利用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突破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阵线的薄弱环节；区别醉心于武力解决

问题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和平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既要讲原则，又要灵活，既不害怕敌人的恫吓，作有损主权的妥协，又不用左的词句去吓唬别人。

第四十六章 与斯大林绝交

那个格鲁吉亚人……他自己不仅是真正道地的“社会民族主义分子”，而且是粗暴的大俄罗斯的杰尔席莫尔达……

——列宁

列宁一生中有许多朋友、同志和学生，而他最后与之绝交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斯大林。这一情况在列宁去世很多年以后才被人们所知晓，因为列宁的有关书信和著作被扣压了。

自从 1921 年起，列宁自感身体情况日益下降，脑血栓的征兆已经开始显现出来。那时，国家形势十分严峻，党内斗争也很激烈。繁重的党政工作和自身对事业的追求，迫使他无止境地操劳着，战斗着。甚至他常把自己的不适症状统统掩饰起来，从不让医生、亲人和同志们知晓。直到医生们发现列宁的体力完全不能适应工作，才强迫他到莫斯科近郊哥尔

克村去休养。

哥尔克村的环境十分优雅，有宽阔的通道和美丽幽静的小花园，大面积的草坪衬托着考究的房屋，不远的地方便是浓密的小树林。不用说，这是一个风景宜人的疗养胜地，列宁和他的妻子都很喜爱这个地方。夏天，他们有时去那里避暑和疗养。可是列宁放不下自己的事业，即使是在疗养期间，他也把秘书和办公室搬到乡间，不断地起草文件，接见客人，布置工作。哥尔克村成了列宁第二个办公地点。尽管列宁经常地感到头痛和疲倦，但他始终不愿停止工作。

1921年下半年，列宁拖着疲惫的身躯，仍然为来年春天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思考着，奔波着。因为他知道，每次党内出现的民主辩论都使他耗费极大的精力。“八大”以来，反对派势力一直有增无减，他们的矛头直接指向无产阶级政党和列宁本人。特别是中央委员施略普尼柯夫，这位“工人反对派”的首领串通 22 名老布尔什维克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递交了一份声明，控告中央的错误路线。共产国际执委会听取了施略普尼柯夫和柯伦泰的陈述，并组成了一个共产国际法庭。列宁只好派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向执委会“澄清这个现象的真实性质及其中对现实的歪曲”。

在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党内要求民主的

呼声也十分强烈。不少人对前“工人反对派”及 22 人声明表示同情和支持，在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他们甚至不同意列宁的主张，拒绝开除施略普尼柯夫和柯伦泰出党。这使列宁感到十分忧虑。

列宁已经隐隐约约地看出党内会产生分裂的迹象。尽管莫洛托夫代表中央书记处在这次会上作了清党总结报告，宣称“那些反对派潮流和半正式的派别已经不复存在了”。但列宁并未掉以轻心。他深信，党内对抗远没有消亡。会上，很多人对臃肿的官僚机构和书记处的工作提出意见。在这一点上，列宁和多数代表意见是一致的。但他知道这是一股强大的势力，是不能一下子就扭转的顽固势力。这种转变远非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就能一下子解决的。

在十一次代表大会之前，列宁就感到疲惫不堪，体力严重不支。这次会议，他只出席了开幕式和闭幕式。为了加强党的机关工作，中央在酝酿设立总书记这一新职务。在列宁的理想中，这个人应该具有较高的修养、素质和工作能力，在党内有相当的威望，是一个年轻有为的革命家。这大概是列宁最早开始考虑选择接班人的基本条件。可是，找到这样合适的人谈何容易？相比之下，从知识、资历、能力和权威方面，大家一致赞同的人选就是斯大林了。

列宁对斯大林的能力和实干精神是比较满意

的。20年前，列宁就知道这位格鲁吉亚的“柯巴”，他在几次关键时刻一直是紧紧追随列宁的：1917年的武装起义、1918年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与反对派的争论、新经济政策的贯彻，在这些重要的时刻，斯大林总是把关键的一票投向列宁一边。每当这时，列宁总感到有一支巨手在支持他，使他在危机时刻克服难关。这是列宁器重斯大林的原因之一。

1922年4月3日，代表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在中央全会上，政治局主席加米涅夫代表政治局提名斯大林担任总书记职务。列宁表示同意并亲自起草了《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书记处工作安排的决定草案》，指出：“责成斯大林同志立即给自己物色几名副手和助手，使他解脱苏维埃机关的工作（除原则性的领导外）。”

在此期间，医学专家为列宁会诊。初步诊断只是由于劳累引起的神经衰弱，建议加强饮食、锻炼和休息。

4月6日，高加索局领导人奥尔忠尼启泽劝列宁到高加索去休养。斯大林也非常赞同这一主张，以便使列宁摆脱繁重的事务，彻底治疗。另外，斯大林深信，即使列宁远离莫斯科，他也能够把列宁的事业担当起来。可是列宁本人并不热衷于去南方休养。况且，从莫斯科到高加索要坐3天火车，列宁担心自己

会吃不消。

两周以后，列宁的医生再次与德国专家为列宁会诊。因为，第一次会诊时，德国专家推测：列宁的病是由于留在体内存留的子弹头引起了铅中毒，必须取出那枚弹头。列宁同意这种推断。

4月23日，医生为列宁做了手术，将四年前留在颈部下端的毒弹头取了出来。这次手术是德国教授博尔夏特和外科主任医师罗扎诺夫共同完成的。

手术中列宁很镇静，只是微微皱了皱眉头。

手术后，列宁仅在医院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中午，列宁就带绷带出院了。

4天后，列宁的伤口完全愈合了。4月27日，当罗扎诺夫医生为列宁取下绷带时，关切地问列宁：

“您的自我感觉如何？”

列宁回答说：

“总的说来没什么，只是有时头疼，睡眠不好，心情也不太好。”

接着，列宁又关心起自己的医生来了。他对罗扎诺夫说：

“您也该休息一下才是，您的气色也不好，该到国外去休养。”

后来，列宁真的给斯大林写了信，请求中央批准罗扎诺夫去休养。后来，列宁的医生带着儿子去休

假。列宁又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

几乎所有人都指望这次手术能使列宁的健康状况好转，但这种希望最终没有实现。在此期间，列宁仍然无休止地工作，直到5月22日，列宁才决定回哥尔克村休养。按照列宁的话说，这是一次“大修”。

列宁过去总是关心别人的健康。在他的便条中，不止一次地写过“送某人去大修”的指示，口头或电话的命令就更多了。可是现在轮到他自己。这不能不使列宁感到悲哀——此时他只有52岁，正是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时期，有多少事情等待着他去做啊！新经济政策刚刚推行一年，国家已开始复兴了，人民热烈地为这一经济改革拍手叫好，尤其是农民更体验到了它的优越性。列宁的形象在人民中间，甚至在国际上都一天天地高大起来。可是，他的身体却在一天天地衰弱。

5月26日上午，列宁的妹妹给医生打来电话。她以惊慌的声音报告说他“情况不好，腹痛、呕吐”。

医生和警卫队长别连基以及列宁的弟弟等人坐车飞速赶到哥尔克时，列宁已经不再呕吐，但他已经右半身瘫痪，说话困难。这是他脑血栓第一次严重发作。

尽管列宁病情严重，但头脑仍十分清醒。当人们企图劝慰列宁时，他近乎悲哀地说：

“不！这是第一次铃声！”

好像他已预感到，这是死神的第一次召唤。

列宁病倒了，这对党和人民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列宁的亲属、朋友和同志都焦急万分。党中央委派最好的医生和护士日夜守护在他的身旁。政治局的成员们都焦虑不安。人们怎么能够想象，在俄国建设的关键时刻没有列宁呢？人们都急切地盼望列宁能早日康复，重新走上革命领导岗位。

令人兴奋的是在医生精心治疗下，列宁以顽强的毅力，奇迹般地站起来了。7月中旬，斯大林前去看望病中的列宁。他看到，这位不知疲劳的老人经过大病的折磨变得消瘦多了。这使他想起了内战时期战士们一连几夜打硬仗的面容。他知道，列宁同样是因为过度的劳累所致。他相信，列宁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一定会重返岗位。斯大林把这个可喜可贺的消息告诉人民，他写了一篇题为《列宁在休养中》的短文，登载在1922年9月24日的《真理报》上。

列宁为斯大林的到来感到非常欣慰，而对医生的过分关照似乎有些不满，他埋怨说：“不允许我看报，也不能谈政治。”斯大林风趣地接着说：

“但我们也嘲弄了医生，因为他们既然允许职业政治家会面，他们就不会不谈政治。”

在此期间，列宁以惊人的毅力与病魔拼搏。他像

一个儿童一样，重新开始练习说话和写字。发病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能够写字了，他高兴地写道：

“我的手迹又开始像是人写的了。”

一个月以后，斯大林再次看望列宁。正如他前一次预料的那样，列宁康复得很快——已经没有疲劳的痕迹了，列宁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里又放射出智慧的光芒。为了重返岗位，列宁在疗养地开始忙碌起来。他的周围堆满了书报、文件，他决心把养病的时间弥补回来。在他的时刻表里，简直是一天等于一年甚至十年。尽管医生执意要他多休息一段时间，并建议他到气候温和的克里米亚去疗养，可是列宁不听劝告，他的心早已飞回了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在短文中这样描写列宁：

“那种如饥似渴地打听各种问题的精神，急于要做工作的那种不可遏制的热情简直使我惊讶。显然他已经渴望好久了。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热那亚会议和海牙会议，今年年景，工业和财政状况，——所有这些问题都——提出来了……”斯大林的文章写得很生动感人，并使人意识到：他确实是列宁的忠实战友和学生。

列宁的另一位副手加米涅夫也于9月中旬前去看望列宁。他写的通讯同时被登在9月24日的《真理报》上。

加米涅夫的文章别具一格。他采用问答式的写法讲述了人们最关心的的问题，文章写道：

“使列宁感兴趣的是什么呢？是美国的参议员博拉，是不久前公布的克雷连柯写给卢那察尔斯基的一些信件，是税收，是波兰的内部局势和美国救济总署的活动，是苏维埃托拉斯的工作和胡佛在最近美国选举中的情况，是维·舒利金写的一本书和对外贸易的交易额，是工会代表大会和俄国的播种面积，是玛丽亚·伊里尼娜·乌里扬诺娃的摄影作品和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失败以及其他很多问题……”

“受到列宁谴责的是什么呢？首先是官僚主义机构。”

“受到列宁赞扬的是谁呢？是美国同志和彼尔姆农民。美国同志给彼尔姆运来 20 部拖拉机，彼尔姆农民为运托拉机提前修好了道路。”

“列宁谈论的最少的是什么呢？是关于自己的病。”

9 月 24 日，《真理报》用最好的白纸免费出版一份带插图的副刊，刊载了主编布哈林写的序言。他告诉人民：

“列宁已经康复了，他还将长期同我们在一起……但不应让他负担过重。”

当人们看到副刊中的几幅列宁照片时，都不禁

感到十分惊喜异常。

10月初，列宁已经坐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开始专心致志地办公了。

列宁恢复工作后，最使他感到不安的是：怎样改革庞大的官僚机构，防止官僚主义的滋生和蔓延呢？这是列宁生病以后才逐渐认识到的新问题。

列宁离开克里姆林宫只有短短五个月，斯大林在这段时间里充分地显示了自己的才能。团结了政治局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组成“三驾马车”，把列宁认为是“党内最能干的人”托洛茨基孤立起来，并把自己的亲信和密友安排在重要的岗位。斯大林年富力强，精力绰绰有余，似乎可以驾驭整个苏维埃国家了，以至列宁恢复工作时他甚至感到是一种多余。

在过去的几年里，当与党内反对派激烈争辩时，列宁没有认真体验斯大林的为人，只是看到了他的谨慎与稳重，斯大林的“坚强信念和果断”精神也曾经使列宁感到满意。但是，当列宁病愈重返岗位时，他敏锐地发觉了中央机关的微妙变化，情况表明斯大林已经不再需要任何导师而迫切希望独立工作了。特别是在民族问题上，列宁与斯大林的分歧越来越大。最后，他几乎完全对斯大林失去了信任，后悔不该把无限的权力交给斯大林。他的思想感情更倾

向于托洛茨基。虽然托洛茨基曾经与列宁争论得面红耳赤，但列宁认为那样并不可怕，那种争辩是在明处。而斯大林从来没与列宁当面争辩过，他只喜欢沉默无言、窃窃私语或交头结耳。

在一次谈话中，列宁和托洛茨基对机关的官僚主义作风怀有共同的忧虑。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是总根源。列宁激动地道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他对托洛茨基说：

“是啊，我们的官僚主义非常严重，我回来工作后，对此感到十分震惊，……”

托洛茨基说：困难主要来自党的机关，它阻碍了我的工作。

“好吧！让我们联合起来，反对一切官僚主义，其中包括反对组织局的官僚主义。”

在这段时间里，列宁没有直接与斯大林谈过这方面的问题。9月间加米涅夫去看望列宁时，列宁询问了中央工作情况，并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不久，加米涅夫把列宁的意见转达给斯大林说：

“伊里奇准备采取一切措施来捍卫关于民族自决权的立场。”

斯大林听后大为恼火，但他并不惧怕列宁，也不想让步，因为他已是“三人团”的首脑，掌握了最高领导权。

“我认为，必须坚决反对伊里奇。”

此时，加米涅夫好像是站在十字路口。他已看出列宁和斯大林的对立在加剧，但并不知最终是哪一方获胜。当时政治局的五个人，列宁是支持托洛茨基的，而季诺维也夫极力反对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站在一边。托洛茨基虽然是加米涅夫的妹夫，但这种亲缘关系在政治斗争中有时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列宁是公认的领袖，但他毕竟已患上了致命的疾病，风烛残年。从自然条件上看，斯大林已经获胜了，他精力旺盛得足以对付一切反对他的人，包括列宁。

列宁刚到哥尔克村时，仍向莫斯科发布命令。但斯大林并不愿顺从地执行这种命令。

5月20日，列宁用电话口授一封信给斯大林，说：“由于在热那亚毕竟向停战迈出了某种现实的一步，因此应当宣布将红军裁减1/4。”但斯大林领导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否定了这项建议。

5月23日，列宁写信给斯大林和政治局，认为有必要使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至少60%是不在苏维埃机关担任职务的工人和农民。斯大林感到为难，他不同意这样做。再一次否决了列宁的建议。列宁已经预感到：这是第一次铃声所反映的政治信号——斯大林的权力实在太大了！

到第二次铃声响过之后，严酷的现实使列宁更

加忧心忡忡。

1922年12月30日，正值严冬时节，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召开苏维埃联席代表大会，宣布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这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人们在为这一事而忙碌和欢呼。列宁因病未能出席苏联成立大会，被缺席选为大会名誉主席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大会向列宁发了致敬电。

此时此刻，列宁正躺在克里姆林宫内一个小房间的病床上，可头脑却异常清醒。成立苏联是他多年的愿望，但现实却使他高兴不起来。他觉得很对不起俄国工人，因为没有十分坚决地过问民族“自治化”问题。

列宁陷入沉思。各个联合起来的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将怎样发展呢？

俄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沙皇俄国是各民族的监狱，因此十月革命之前不可能解决民族问题。十月革命爆发后，列宁在《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中，庄严宣告：“将保证俄国境内各民族都享有真正的自决权。”可见，在列宁看来，俄国的民族问题是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

1917年12月3日（16日），列宁在《告乌克兰

人民书》中再次郑重声明：“俄国社会主义政府即人民委员会再次确认，凡过去受沙皇政府和大俄罗斯资产阶级压迫的民族都享有自决权，直至这些民族同俄国分离的权利。”

1918年1月13日，列宁在全俄铁路员工非常代表大会上作报告，他说：“我们不会强行把任何过去在沙皇政府羁绊下的民族继续控制在俄罗斯的手中，或留在俄国一个国家里。”

令列宁十分气愤的是俄共（布）中央和苏俄的某些上层领导人却不理解民族自决的思想，不理解应对少数民族让步和宽容的思想，甚至还有抵触情绪。这主要表现在建立苏联和“格鲁吉亚事件”上。

1922年8月11日，根据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建议，俄共（布）中央组织局成立一个委员会，为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讨论俄罗斯联邦与各独立的民族苏维埃共和国的相互关系问题作准备。参加该委员会的有斯大林、古比雪夫、奥尔忠尼启泽、拉柯夫斯基、索柯里尼柯夫和各民族共和国的代表；斯大林为委员会草拟了《关于俄罗斯联邦和各独立共和国的相互关系》决议草案，其基本点是：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这就是斯大林的“自治化”方案。按照这一方案，各民族共和国加入联邦后，要受俄罗

斯联邦最高权力机关的领导。草案发给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讨论，结果是：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反对，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张保持各独立共和国之间的条约关系。尽管如此，1922年9月23—24日，这个草案的基本内容仍然在斯大林等人参加的委员会会议上获得了通过。

1922年9月25日，《关于俄罗斯联邦和各独立共和国的相互关系》决议草案送交在哥尔克休养的列宁。列宁看到这一决议草案后，立即批评了斯大林，主张对斯大林的方案作原则性的修改，即“在第一条中把‘加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改成——‘同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一起正式联合成欧洲和亚洲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究竟是其他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还是同俄罗斯联邦联合，这是一个关系到大小国、大小民族是否平等的原则问题，列宁主张俄罗斯联邦同其他共和国联合成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列宁没有一点大国沙文主义！

1922年9月26日，列宁写信给加米涅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把自己对斯大林草拟的决议草案的重大修改意见告诉他们，并要他们“好好考虑一下”。列宁在信中还批评斯大林有点“操之过急”。斯大林对列宁的批评忿忿不平，但还是表示同意列宁

对草案第一条的修改，并提出表述方案：

“确认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一起正式联合为欧洲和亚洲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适宜的。”

但斯大林并没有真正理解列宁的修改意见的真正意义，所以他在给列宁的信中写道：

“关于列宁对第二条的修正——除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再建立一个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我认为不应采纳：在莫斯科存在两个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一个显然是‘下院’，另一个则是‘上院’，这只会带来冲突和磨擦。”斯大林建议把俄罗斯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改组成全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并规定其决定是联盟的各共和国必须执行的。按照这一建议，各共和国实质上还是加入俄罗斯联邦，受俄罗斯联邦的领导。这样，列宁关于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思想实际上还是没有被接受。

1922年10月6日，俄共（布）中央全会讨论俄罗斯联邦和各独立的民族苏维埃共和国的相互关系问题。列宁因病未能出席会议，他给了加米涅夫一张便条，上面写到：“我宣布要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决一死战。我那颗该死的牙齿一治好，我就要用满口好

牙吃掉它。”可见，列宁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民族不平等是多么深恶痛绝，多么誓不两立！

关于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问题，列宁写了一个书面意见，其内容是：要绝对坚持由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等轮流担任主席。这也是一个关系到各民族平等与否的问题。斯大林表面上赞同，他在列宁的意见下面写道：“对！”这样，列宁的意见被写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条约》，其第十条规定：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四名主席。

然而，斯大林此举只不过是為了安慰列宁，保护自己。实际，他的行动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格鲁吉亚事件的发展使列宁和斯大林的分歧明朗化了。

关于各独立共和国成立苏联的决议草案的第一条，列宁的修订意见是：认为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各苏维埃共和国同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一起正式联合成欧洲和亚洲苏维埃共和国联盟是适宜的。可是中央全会通过的决议却是：认为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外高加索共和国联邦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缔结关于联合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条约是必要的。新决议的错误在于：它规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不是与俄罗斯等国一样，直

接地加入即将成立的苏联，而是要通过外高加索联邦。这一点违背了列宁的意见，也受到以波·古·姆季瓦尼为首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领导人的坚决反对，他们要求不通过外高加索联邦这一中间环节而直接加入苏联。

但是，以奥尔忠尼启泽为首的俄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对格鲁吉亚共产党的要求采取了高压政策，给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领导人奥库查瓦、钦察泽和马哈拉泽以党内警告处分，解除并撤消了他们的职务。

格鲁吉亚共产党人不同意这些粗暴的做法，向俄共（布）中央提出自己的申诉意见。

1922年10月21日凌晨，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人钦察泽、卡夫塔拉泽和马哈拉泽接通同莫斯科的直通电话，他们说：“格鲁吉亚走投无路的局势迫使我们打扰您。请把下述一切转告列宁同志，我们相信，他和您的绝对权威的決定，一定能结束现在的灾难性混乱和纷争。奥尔忠尼启泽刚愎自用……开始摧毁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了，奥库查瓦被解职，我们已无法承担责任，明天我们将在中央全会上声明这一点。总之，格鲁吉亚的苏维埃政权还从没像现在这样处于危险状态，这一切全是奥尔忠尼启泽造成的……”接着，对奥尔忠尼启泽进行了谩

骂。

由于格鲁吉亚原领导人不断向俄共中央申诉，列宁对情况逐渐有所了解，中央决定派一个专门委员会去格鲁吉亚调查。该委员会由捷尔任斯基任主席，其成员有米兹凯维奇。但对该委员会的两次表决列宁都弃权，这说明他根本不信任这个委员会。他派李可夫到梯弗里斯去进行调查，并要求他亲自向他汇报。

12月12日，李可夫和捷尔任斯基等人返回莫斯科，列宁当晚就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并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列宁对委员会的工作不满意，认为他们偏袒奥尔忠尼启泽，没有指出他所犯的严重错误。列宁特别愤慨的是奥尔忠尼启泽作为中央苏维埃政权和俄共（布）中央在高加索的代表，竟然动手打格鲁吉亚领导人卡巴希泽，这种粗暴行为使列宁深受刺激。

12月12日列宁与捷尔任斯基谈得很晚。夜里，他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入睡，第二天早晨他又一次发病了。医生花了很大力气劝说列宁，要他去郊外休息。最后，列宁同意了医生的意见，并说：“今天就开始清理自己的事务。”

格鲁吉亚冲突以及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等人没能公正地予以处理，伤害了列宁的身心健康。大小民

族一律平等的观点没有为某些共产党领导人所接受，这种情况也促使列宁不能不站出来说话，批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观点和做法，特别是批评总书记斯大林的粗暴作风。不过直到 1922 年底，列宁仍没有与斯大林绝交的念头，仍把他看做党的领导人，希望他转变错误立场。尽管他现在已把斯大林看成是“只会烧辣菜的厨师”，是“粗暴的大俄罗斯的杰尔席莫尔达”（意指用大棒随意打人的警察），他还是准备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进行一次最后通牒式的教育。

1 月 24 日，列宁派秘书福季耶娃索要格鲁吉亚问题的详细材料，以便在代表大会上作报告之用。

但斯大林等人却以种种理由干预搪塞，不想交出材料，这使列宁的身心受到了又一次打击。列宁与斯大林的另一个重要分歧是外贸垄断问题。

早在红色政权成立之初，列宁就坚持外贸垄断的政策，只是由于战乱无法认真加以贯彻。

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在 1917 年 11 月下旬写的《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和《经济措施纲要草稿》两份文献中，提出“国家垄断对外贸易”的重要思想。12 月中旬，列宁在《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有关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的草稿中再次写道：“宣布对外贸易由国家垄断。”可以看出，列宁主张对外贸易实行

国家垄断的思想，是十分明确的。但苏维埃政权一开始并没有实行对外贸易垄断，而是实行对外贸易监督。但是，仅仅靠监督和关税保护，还不可能可靠地保护苏维埃经济免受外国资本的侵害。所以，1918年4月22日，人民委员会根据列宁的思想，通过了关于对外贸易垄断的法令。1918年4月，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对对外贸易垄断的意义。他认为，没有外贸垄断，苏维埃政权就不能用交纳“贡赋”的办法“摆脱”外国资本。而社会主义建设是否可能，要看苏维埃政权能否在过渡时期内，用向外国资本交纳一些贡赋的办法来保护国家经济的独立。

但列宁关于对外贸易垄断的主张并没有得到俄共（布）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层的一致支持。1921年10月28日—31日，在里加举行波罗的海经济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团长米柳亭提出一个对外贸易非国有化的计划。他认为对外贸易非国有化是必要的，在非国有化的条件下，私商比国家更容易在国外市场上得到货款和流动资金。对于米柳亭的主张，列宁在契切林的信上给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米哈伊洛夫写了以下批示：“建议送政治局委员传阅。我个人的意见是：整个地否决米柳亭的这个根本不能用的、毫无根据的计划。我建议：否

决。”政治局接受了列宁的建议。

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和同外国贸易往来的扩大,越来越需要对1918年4月22日颁布的关于对外贸易垄断的法令作补充。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列扎瓦就拟订了《对外贸易提纲》,强调必须保持和加强对外贸易垄断制,同时建议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监督下给某些国营和合作社的联合公司以独立出口权。列宁赞同这一提纲。1922年1月4日,人民委员会最高经济委员会通过这一提纲。

斯大林否定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对外贸易提纲》,他在1922年2月写道,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克拉辛的解释不能令人满意,问题不在于垄断制的提纲,而在于实际上不存在垄断制。

1922年3月3日,列宁写信给加米涅夫,说:“我的结论是克拉辛无疑是正确的。”列宁坚定地表示:“(1)绝对不得破坏对外贸易垄断制;(2)明天就通过列扎瓦的提纲;(3)立即(我们已丧失了大量时间)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名义发表一项强硬、冷酷和严厉的声明:在经济方面我们不再作更多的退让,凡是蓄意欺骗我们(或者逃避垄断,如此等等)的人,将遭到恐怖手段的回击……”“我们不能搞自由贸易,这会葬送俄国的。”

3月4日,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对外贸易提

纲》稍作修改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予以批准。3月1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以这个提纲为基础的《关于对外贸易的决定》。

财政人民委员索柯里尼柯夫不顾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反对对外贸易垄断制，并提出准许托拉斯、合作社和其他机构在国外采购粮食的计划。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弗鲁姆金也主张放松外贸垄断，弗鲁姆金的理由是：国营商业出现亏损，在自由竞争中会被私营商业击败。

斯大林和索柯里尼柯夫等领导人反对对外贸易垄断制，对同外国资本家的业务谈判产生了消极影响。有鉴于此，1922年5月15日，列宁写了《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的决定草案》，指出：“中央委员会确认对外贸易垄断，并决定一律停止研究和筹划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合并事宜。”同时，列宁还写信给斯大林和弗鲁姆金，认为“有关削弱对外贸易垄断的一切议论、商谈和委员会等等都应正式禁止。”

1922年5月17日，斯大林在列宁信的下面写了自己的答复。斯大林同意国营商业在“自由竞争市场上不应当被击败”，但是，他认为，在“非自由竞争市场上”，国营商业得不到发展，将会变成温室里的植物。斯大林不反对正式禁止旨在削弱对外贸易垄

断的步骤，但他写道，“削弱仍是不可避免的”。

尽管有人反对，1922年5月2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还是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确认对外贸易垄断的决定草案。

没过几天，1922年5月25—27日，由于脑血管硬化，列宁的病第一次严重发作——右手和右腿活动不灵，说话有些不清。这种情况持续了将近三个星期。在这期间，季诺维也夫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一项有损外贸垄断制的建议：削减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采购和贸易职能，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只负责监督和调节，执行关税政策，研究市场动态，等等。政治局决定接受季诺维也夫的建议。

1922年10月6日，在列宁没有出席的俄共（布）中央全会上，通过一项有损外贸垄断制的决定。列宁不同意中央全会的这一决定。10月12日，列宁就外贸问题同斯大林进行了谈话。后来又写信给斯大林并转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明确指出，中央全会关于对外贸易的决定“是破坏对外贸易垄断”。列宁认为，如果破坏了对对外贸易垄断，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例如，亚麻，在俄国卖4.5卢布，在英国卖到14卢布。如果放弃垄断，亚麻走私活动就会达到可怕的程度。列宁说：“我们与之斗争的将不是职业走私者，而是亚麻产区的全体农民。在这场斗争中，我们

几乎一定要挨打，而且会弄得不可收拾。”

列宁认为，削弱垄断的另一个缺点是使苏维埃国家的余粮迅速外流。第三个缺点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资金积累。外贸垄断可以为苏俄开辟黄金储备的来源，如果开放几个港口，那就全完了。所以列宁建议：“延期两个月解决这个问题，即延至下次全会；在这个期间收集关于我们贸易政策经验的汇总的并经检验的文件。”

1922年10月16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以14票对1票通过把对外贸易问题延至下次中央全会解决的决定。

斯大林虽然也同意延期解决，但他是不同意对外贸易垄断的观点的。斯大林给中央委员们写信说：“列宁同志的信没有说服我放弃10月6日中央全会关于对外贸易问题的决定是正确的这一看法……然而，鉴于列宁同志坚决建议推迟执行中央全会决议，我投票赞成延期，以便下次全会在列宁同志参加下把问题重新提出讨论。”

在列宁看来，外贸垄断制关系到苏维埃政权的生死存亡。坚持外贸垄断制，苏维埃政权就能坚强的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否则，就可能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为了能使自己的观点为全党所接受，在召开下次中央全会之前，列宁抱着带病之身废寝

忘食地工作，收集关于外贸的材料并成立研究这些材料委员会；了解俄罗斯联邦各驻外商务代表处的工作情况；同中央委员、苏维埃和经济部门的负责人交换意见；写信说服那些怀疑外贸垄断制的同志；同支持外贸垄断制的人商谈在全会上发言的有关事项；等等。

当时，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几位主要成员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等或者主张放松，或者主张废除外贸垄断制，只有托洛茨基表示应停止关于取消外贸垄断制的谈论。这样，列宁得到了托洛茨基的支持。这是导致列宁与斯大林最后绝交的直接原因之一。

12月12日，列宁从疗养地回到莫斯科。当天，就口授了一封短信给托洛茨基，并送上俄罗斯驻德国全权代表克列斯延斯基12月3日的来信。克列斯延斯基在信中汇报了同一些德国公司达成的协议、正在进行的谈判和这方面的广阔前景，他认为，一旦废除对外贸易垄断，这一切都付诸东流。还提供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情况：到过国外的许多同志，如瞿鲁巴、弗拉基米罗夫、李可夫和瓦涅索夫等，都支持对外贸易垄断。列宁在给托洛茨基的信中急切地问：您是否同意克列斯延斯基的观点？“我将在全会上为维护垄断而战斗。”注意，列宁在这里用的是“战斗”一

词，可见列宁是多么不能容忍那些反对外贸垄断的人。

但是，很可惜，列宁已经不能如愿了——1922年12月13日上午，他再次发病。医生劝说列宁暂时全体，不要在会议上发言。这样，列宁就不能参加即将举行的中央全会了。列宁心急如焚，在口授给托洛茨基的信中说：我和您的意见完全一致，请您在即将召开的全会上出面维护我们的共同意见，在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会给我们造成前所未有的危害，而反对外贸垄断的理由是指责外贸办事机构不完善，而办事机构不完善的情况到处都很突出，因此而取消垄断，岂不等于把小孩和水一起从澡盆里泼出去。

12月13日中午12时30分至下午2时35分，列宁同斯大林谈话。晚上7时30分至8时25分，列宁用电话向秘书福季耶娃口授给斯大林并转中央全会的信，建议批评和反驳布哈林1922年10月15日信中提出的反对外贸垄断的理由。列宁指出，布哈林没有看到，在帝国主义时代，国与国之间差距非常悬殊，贫穷国家的高关税挡不住工业国商品的输入，因为如果它们采取出口补贴政策，俄国的任何关税保护政策都不会有效，俄国的工业就肯定要被摧毁。

列宁病了，但他没有休息，他还是惦记着捍卫外贸垄断的问题。12月15日，列宁两次口授给托洛茨

基的信，再次要托洛茨基在中央全会上坚持外贸垄断。列宁说：如果有人担心这个问题会使我感到不安，使我的健康状况受到影响，我认为这是完全不正确的，因为拖而不决将使我们在一个根本问题上的政策完全稳定下来，这就更会使我一万倍地感到不安。

12月15日，列宁还口授一封给斯大林并转俄共（布）中央的信，说有一件事使他非常焦急，就是不能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讲话。关于外贸垄断问题，列宁十分肯定地说：“我坚决反对把对外贸易垄断问题拖下去。不管出于何种考虑（包括希望我能参加这个问题的讨论这种考虑），如果想推迟到下次全会讨论，我坚决反对，因为我相信，托洛茨基维护我的观点，一点也不比我差……在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上继续犹豫不定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是会破坏全部工作的。”

12月13日发病以来，列宁一直没有休息。到15日深夜至16日凌晨，列宁的病情突然恶化。列宁付出了代价，而这一代价结出了硕果。由于列宁的辛勤的、忘我的说服工作，许多中央委员都认识到外贸垄断的必要性。作为总书记的斯大林也改变了自己原先的看法。12月15日，他给中央委员们写信说：“鉴于最近两个月积累的有关对外贸易问题的材料，说

明必须保持对外贸易垄断……我有责任声明，收回我两月前书面通知中央委员们的反对对外贸易垄断的意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发表声明，放弃原先的观点。这样，12月18日，俄共（布）中央举行全会，全会支持列宁的意见，重申坚决实行外贸垄断制，同时撤销十月全会有损外贸垄断制的决定。俄共（布）中央把决定告诉了列宁。

列宁得知中央全会的决定后，心情异常高兴，于12月21日征得医生同意后，向克鲁普斯卡娅口授给托洛茨基的信，喜悦之情跃然纸上：“好像仅仅调动了一下兵力，就一枪不发地拿下了阵地。”列宁性格是总不满足于已取得的胜利，所以，他紧接着就说：“我建议不要停顿，要继续进攻，为此要通过一项提案，即向党代表大会提出加强对外贸易和改进对外贸易的措施问题。这件事要向苏维埃代表大会党团宣布。”

整个12月份，列宁都在病榻上处理着一系列党政大事，并积极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准备材料，特别是关于外贸垄断问题，现在，他总算放心了。

在此期间，斯大林一直暗中注视着列宁的活动，最使他感到忿恨的是：列宁竟与托洛茨基结成联盟，他必须以“正当”的手段干涉列宁。而唯一的正当理由是：列宁再次发病，必须限制列宁的活动——为了

他的健康。

12月18日，中央决定让斯大林负责监督医生和护理人员制定并执行列宁的治疗方案。该方案规定：

1. 列宁每天只能口授5—10分钟，但不应具有通信性质；

2 禁止会客；

3 无论朋友还是家属，都不要向列宁汇报任何政治生活中的事情。

极其严格的监督引起列宁的强烈不满，因为等于剥夺了列宁过问政务的权利。对于一个一生从事革命活动的领袖来说简直是不能容忍的，因而导致列宁与斯大林的矛盾更加尖锐化。

12月21日，当得知列宁向克鲁普斯卡娅口授了给托洛茨基的那封信之后，斯大林立刻用粗鲁的语言在电话里恫吓和辱骂了克鲁普斯卡娅，说她违背医生的规定，并以诉诸监察委员会相威胁。对此，克鲁普斯卡娅感到很委屈，她写信给加米涅夫：

列夫·波里索维奇：

由于我记录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医生许可口授的一封短信，斯大林昨天竟然对我极其粗暴无礼。我入党不是一天了。30年来从未听见任何一位同志对我说过一句粗话，我珍视党和伊里奇的利益并

不亚于斯大林。现在我需要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什么可以同伊里奇讲，什么不可以讲，我比任何医生都清楚，因为我知道什么事使他不安，什么不会，至少比斯大林清楚。

克鲁普斯卡娅还请求保护她，不遭受粗暴的干涉，无端辱骂和威胁。加米涅夫向斯大林转达了克鲁普斯卡娅的意见。斯大林根本不予理睬。

为了不使列宁激动，克鲁普斯卡娅一直向他瞒着这件事。直到 1923 年 3 月她才告诉列宁。列宁听了之后很生气，立即口授了一封给斯大林要他作出抉择的极为严厉的信。

信的内容如下：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

您竟然粗暴地要我妻子接电话，并辱骂了她。尽管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的话，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是从她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我不想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言行。因此，请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

顺致敬意

列宁

1923年3月5日

显然，列宁这时对斯大林已经失望了。当秘书把列宁的信交给斯大林，斯大林接过这封信，当面拆开，并站在那里读了起来。沃洛季切娃秘书这样描写斯大林的神态：他面容安静如常，稍作考虑之后，慢条斯理地对我说：“这不是列宁说的话，这是他的病在作怪。我不是看病的医生，我是政治家，我是斯大林。如果我的妻子，一个共产党员，做错了事，受了处分，我认为我没有权利去干预这样的事情。而克鲁普斯卡娅是党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定要坚持这样做的话，我可以向克鲁普斯卡娅赔礼道歉，承认自己粗暴。”

后来，虽然斯大林违心地道了歉，可是，内心仍对列宁十分不满，说列宁是“被女人包围的病人”，说他表现反常，等等。

从那天以后，列宁再没有与斯大林有过什么交往，斯大林也没有去看望过列宁。

列宁写的最后的五篇著作，或点名或不点名地对斯大林进行了深刻而尖锐的批判。斯大林执政几十年中一直扣压了列宁的这些著作，有些内容直到斯大林去世之后才被公诸于世。

第四十七章 最后岁月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致于因为虚度年华而痛悔，也不至于因为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奥斯特洛夫斯基

第一次铃声响过之后，列宁更加珍惜自己的时间了。重返岗位后，他是那样废寝忘食地工作，争分夺秒，似乎从来没有生过病一样。

据列宁的秘书福季耶娃回忆：在 1922 年 2 月至 12 月 16 日之间，列宁写出 224 封信和便函；接见过 171 名正式来访者；主持过 32 次政府部门的工作会议；发表过 3 次重要讲话。这样的工作效率，是健康

人都难以达到的！

最令人感动的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压抑住列宁的这种工作热情和拼搏精神。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似乎它在单位时间里消耗得越多，总体耗用的时间就会缩短。这一次，列宁恢复工作的时间仅仅维持了两个半月。实际上，列宁在最后的岁月里，是在用宝贵的生命在为党工作，为国家操劳。1922年11月下旬，医生强迫列宁必须全休一周。即使在这时，列宁仍然没有放弃工作，他不断给中央领导人打电话布置工作，或找有关人员谈话，往往在吃饭后继续工作，甚至有时中午也不休息。

11月30日晚上，夜幕早已降临，列宁仍在房间里忙碌着：他在翻阅由他自己编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选集。他把浏览过的新书交还给图书管理员，并请管理员把恩格斯的《政治遗嘱》一书放在书架上，以备随时查阅。

难道列宁此时也开始考虑自己的《政治遗嘱》了吗？不管怎么说，他心里十分清楚，自己能够维持工作的时间已经很有限了。

几乎所有的当权者在最后岁月里都要立下遗嘱，其内容无非是权力和财富的分配。他们的权力和财产往往是成正比的。而列宁则截然不同。他一生清苦、廉洁，谈不上有什么财产的分配与继承问题。他

手中只有一个苏维埃政权，一个他参与缔造的党。他希望把这个代表人民至高无上的权力交给一个可靠的人。众多个同事和战友在他的脑海中一一掠过，究竟谁能承担这一重任呢？列宁苦苦地思索着。

早在内战时期，列宁就不无风趣地与托洛茨基探讨过这个问题。

“万一白卫军把我们两个都打死了怎么办？布哈林和斯维尔德洛夫能应付得了吗？”

列宁这样发问着，又自己开玩笑似地回答说：

“鬼才知道呢！”说完，他自己也呵呵地笑起来。

那时列宁还很健壮，除非牺牲在战场上，否则不可能想到死。但他毕竟考虑过接班人的问题。

斯维尔德洛夫是列宁最信赖的人。无论是组织能力，还是工作作风，都是无人能比的。他勇敢、机智、办事雷厉风行，列宁对他一贯很满意。斯维尔德洛夫的去世，使列宁非常难过，他曾经遗憾地说：再也找不到这样的领导人了。

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曾经是列宁信赖的两位接班人。可是，列宁早已经看出，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于是，列宁在自己的“政治遗嘱”里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提出了防止分裂的措施。

1922年12月22日深夜至23日凌晨，列宁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右臂和右腿瘫痪。这时，列宁清

楚地意识到自己病情的危险性。——有可能引起突然死亡。对于死亡，列宁无所畏惧，但他对于离开自己的战斗队伍感到有些悲哀和凄凉。列宁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才刚刚起步，革命事业的经验和教训、成功和失败，都需要去探索。列宁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他要抓紧时间把自己最重要的想法口授出来。

12月23日，列宁请求医生科热夫尼科夫允许他向速记员口授5分钟，因为有一个问题使他焦虑不安，怕一觉睡下去永远起不来了。医生同意后，列宁请来速记员沃洛季切娃，对她说：“我想向您口授一封给代表大会的信。请记吧！”列宁连续口授了4分钟。这就是重要的文献——《给代表大会的信》的第一部分。信中说道：

“我很想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实行一系列的变动。

我想同你们谈谈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些想法。

首先我建议把中央委员的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100人。如果我们不实行这种改革，我想一旦事态的发展不是对我们十分有利（而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十分有利这一点上）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就会遭到很大的危险。……为了提高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为了认真改善我们的机关，为了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个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大的影响，这样

做是必要的。”

“……我想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我们党的稳定性将增强千倍。”

由于时间的限制，列宁第一天仅仅做了原则上的论述，并未涉及个人品质方面的问题。但列宁早已胸有成竹，他要在以后的几天里，陆续阐述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沃洛季切娃记录了列宁的口授信之后，很晚才回到秘书处。她久久地坐在椅子上，心情十分沉重——列宁的信使她很不安。于是她给福季耶娃打电话，问她这封信是否要给斯大林看。经同意后，沃洛季切娃把信的副本交给斯大林，并告诉他：列宁虽卧床不起，但精神饱满，说话流畅；口齿清楚。而斯大林却认为：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是病中的反常表现，没有什么价值，并且吩咐秘书把信烧掉。

第二天，列宁要求继续口授，医生没有同意，列宁提出“最后通牒”：如果不容许他口授，他就拒绝治疗。当时主持列宁治疗的教授费尔斯特说：“对于列宁来说，工作就是生命，不工作就意味着他去世了。”晚上，列宁向沃洛季切娃口授了《给代表大会的信》的第二部分。

列宁在12月24日的口授中，更深刻地阐述了防止党中央分裂的意义。他说：“一个白卫分子在《俄

国思想》杂志上说的对，第一，在他们反对苏俄的赌博中他把赌注押在我们党的分裂上，第二，在这种分裂方面他又把赌注押在党内最严重的意见分歧上。”

接着，列宁一针见血地谈到对纯粹个人特性的一些看法。他说：“我想，从这个角度看，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这种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在我看来，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 50 人，增加到 100 人，这应该是避免分裂的一种办法。”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

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

虽然，列宁把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并列为“中央两位杰出领袖”，但可以看出，列宁已经完全摒弃了斯大林，而把希望倾注在托洛茨基身上。只是列宁的这

种感情深深地埋藏在心里，倾吐在遗嘱式信中。他一再嘱咐秘书对信的内容要保密，直到他死去那一天。

在 24 日和 25 日的口授记录里，列宁还对其他中央委员进行评价。他说：“我只提醒一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的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

“年轻的中央委员中……布哈林和皮达可夫……他们是最杰出的力量（在最年轻的力量中），……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皮达可夫，他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杰出才能的人，但是太热衷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以致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是不能指靠他的。”

列宁说他对这两个人的“评语是仅就现时情况来说的”。可见，列宁从来不是一成不变地看待人和事。

12 月 26 日和 29 日，列宁继续对机构改革问题作了补充。他说：

“吸收很多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会有助于工人改善我们糟透了的机关。”列宁强调：这个机关“是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过来的旧机关”，而工农检

查院不能行使改造旧机关的任务。列宁认为：只有增加中央委员中的工人成分（也包括农民），而且是不在苏维埃机关长期任职的工人，才能有效地防止分裂，抵制官僚主义和腐败作风。可见，列宁对“三驾马车”掌管大权的现状是极不满意的，尤其是总书记的官僚主义和粗暴作风，已经使列宁忍无可忍了。

1923年1月24日，列宁又对1922年12月24日口授信作了重要补充：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这就是列宁为防止党内分裂所提出的一项重大措施。

此时在列宁看来，斯大林就像一个愚蠢粗野的警察。列宁3次在口授文章中提到：“那个格鲁吉亚

人是杰尔席莫尔达”，“杰尔席莫尔达”是俄国作家果戈里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一个愚蠢粗野的警察。列宁明确地指出：这样的人是不能胜任总书记职务的。

其实，列宁对斯大林的粗暴作风早已有所耳闻。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以后，粗暴作风不但没有克服反而更加放纵，特别是列宁病重后，尤为突出。在此期间，列宁曾找斯大林谈话，但斯大林对列宁的批评不以为然，他心里认为：我的粗暴是对错误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人和事，是正当的行为。

从1922年12月23日至1923年1月4日，列宁分五次口授了《给代表大会的信》，斯大林只看到了23日的第一封信。24日，列宁一再嘱咐：这些信不能给任何人看。遵照列宁的指示，这些材料保存在用火漆封好的信封里。信封上注明：陈列宁本人外，只有他的妻子才有权拆封。所以斯大林和其他中央领导都不知道信的内容。

1922年12月27—29日，列宁口授《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一信，认为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既要有行政管理才能，又要具有科学修养，应该把这两种素质结合起来；国家计划委员会要全面发展成为专家委员会；扩大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职权，使它的决定不被通常的苏维埃审议程序所

推翻。

1922年12月30日、31日，正值宣告苏联成立之际，列宁口授了《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信。

在这篇文章里，列宁狠狠地痛斥了党内“大民族主义”思想。列宁说：“我们大民族的人，在历史实践中几乎从来都是有过错的，我们施行了无数暴力，甚至施行了无数暴力和侮辱，自己还没有察觉。只要回忆一下我在伏尔加河流域时的情况，就可以知道我们的人是怎样蔑视异族人的；把波兰人都叫作‘波兰佬’，嘲笑鞑靼人为‘王爷’，乌克兰人为‘一撮毛’，格鲁吉亚人和其他高加索异族人为蛮子。”

因此，列宁认为，压迫民族或所谓“伟大”民族的国际主义，应当不仅需要形式上的平等，而且还需要用对待异族人的让步来抵偿“大国”民族的政府在历史上给他们带来的那种不信任和侮辱。

可以看出，列宁暮年的政治态度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包括对暴力、专政问题和对人民的态度问题，都趋向于温和与实际。

列宁在这篇文章里批评了俄罗斯机关，但是口气很缓和，好像在作自我批评，说：“这种机关，正如我在前面的一篇日记里已经指出的，是我们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

色彩罢了。”列宁说：这种机构“实际上是和我们完全格格不入的，它是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的大杂烩，根本不可能在五年内把它改造过来。”因而，苏维埃中会有人“沉没在这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垃圾的大海里。”

的确，列宁的这封信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点，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各民族之间关系具有指导意义。

斯大林的“自治化”方案反映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反映了民族不平等。列宁在这封信中再次批评了斯大林，认为他的整个“自治化”的想法是不对的，是根本不合时宜的。

在这种情况下，“退出联盟的自由”只是一纸空文，“它不能保护俄国境内的异族人，使他们不受典型的俄罗斯官僚这样的真正俄罗斯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实质上是恶棍和暴徒的侵害。”列宁指出，格鲁吉亚事件之所以发生，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对这一事件要负政治责任。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和奥尔忠尼启则都不是俄罗斯人，但他们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比俄罗斯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列宁所说：“俄罗斯化的异族人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总是做得过火”。

列宁在这封信中还提出一个重要论点，就是不能抽象地谈民族主义，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在沙皇时代，俄罗斯族欺压弱小民族。十月革命后，掌权的布尔什维克，应该以真正无产阶级态度来对待各少数民族，要非常谨慎，非常客气，在让步和宽容方面“做得过些比做得不够要好”。列宁在这里严厉批评斯大林随便给人加上“社会民族主义”的罪名，其实他自己是粗暴的大俄罗斯的警察，实质上破坏了无产阶级阶级团结的利益。

还有一点，就是列宁不仅从俄国，而且从整个民族解放运动的高度来看待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列宁指出，在世界史的明天，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民族将彻底觉醒，开始争取自身解放的战斗，“如果在东方登上历史前台的前夜，在它开始觉醒的时候，我们由于对我们本国的异族人采取哪怕极小的粗暴态度和不公正态度而损害了自己在东方的威信，那就是不可宽恕的机会主义。”

口授完这封信以后，在1923年初，列宁还专门指示他的秘书班子调查格鲁吉亚问题，列宁认为这封信具有指导意义，以后要作为论文发表。

1923年4月16日，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前夕，列宁的秘书福季耶娃把《关于民族或

“自治化”问题》一信送交政治局。可是，斯大林扣压了这一重要的文献，直到他去世以后，列宁的这篇力作才得以问世。

关于格鲁吉亚事件，列宁还口授了两封信。一封是1923年3月5日的给托洛茨基的信，信中说：

“我请您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那件事进行辩护。此事现在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进行‘调查’，而我不能指望他们会不偏不倚。甚至会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出面为这件事辩护，那我就可以放心了。”

可见，在格鲁吉亚事件上，列宁信任托洛茨基，而与斯大林的观点不一致。

列宁的另一封信是1923年3月6日写给格鲁吉亚的姆季瓦尼和马哈拉泽等人的。列宁在信中说：

尊敬的同志们：我专心致志地关注着你们的事。我对奥尔忠尼启则的粗暴，对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纵容感到愤慨。我正为你们准备信件和发言稿。致以敬意！”

这封信准确无误地表明，列宁是坚定地支持格鲁吉亚人关于各民族一律平等的要求的。这是列宁生前口授的最后一封信！

1922年12月的一天，列宁接见了西伯利亚制革工人代表团，代表团向列宁汇报了本地区的情况，并

向列宁赠送了一件羊皮袄。列宁请代表团向工人们转告，他们的问候使他很高兴，但最好不要给他送礼。

列宁在养病的日子里，经常阅读各种书籍，研究和考虑了一系列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列宁总结的成果体现在他最后的书信和文章中。这是列宁晚年留下的极其珍贵的政治遗产。

12月的一天，布哈林去看列宁，他发现列宁在看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论文集。布哈林感到很惊讶：

“怎么能看敌人的著作呢？”

然而列宁说：“这里面有真理”。

普列汉诺夫是第一个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可以说，他是列宁的老师。但他为十月革命的发生而“感到痛心”，因为他认为俄国“工人阶级还远远没有达到在对自己和对国家都有益的情况下来夺取全部政权的地步”。他在论文中这样写道：在我国，无产阶级不是多数，而是少数……农民需要的是土地，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俄国无产阶级不合时宜地夺取了政权，它就一定成不了社会革命，只能引起国内战争……。”

列宁一边读着普列汉诺夫的这部著作，一边回顾着这几年走过的道路。他感到一些问题需要再思

考，需要重新认识。

1923 年元旦，列宁口授《日记摘录》一文。文章的中心是加强国民教育，是当时列宁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列宁认为，要办好教育，就要提高教师的地位，“把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应有的高度，而不做到这一点，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应当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这是用不着证明的真理”。

要办好教育，拥有足够的教育经费是必备的条件。但当时俄国的经费是相应紧张的。列宁建议削减其他部门经费来增加教育经费，这是列宁的一贯思想，他早就对挤占教育经费的现象感到了气愤。1921 年 9 月 2 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克列斯延斯基向列宁报告：按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预算，剧院的经费支出达 290 亿，而高等学校的经费支出达 170 亿。列宁在报告上批道：“不成体统！！”他对办公厅主任哥尔布诺夫说：“来文所指出的这些不成体统的事，特别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在剧院上开支过大的事，怎么能够容忍到今天？”1922 年 11 月，在讨论海军舰只修建计划时，列宁建议把修建计划的预算从 1000 万削减到 700 万，剩余款项用来增加学校经费。

在《日记摘录》一文中，列宁根据居民识字状况

的统计，得出结论说：“我们距离普遍识字还远得很，甚至和沙皇时代 1897 年比，我们的进步也太慢。这里对那些一直沉湎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幻想之中的人的一个严厉警告和责难。这说明我们还要做多少非做不可的粗活才能达到西欧一个普通文明国家的水平。”

列宁还强调指出要对农民做适当让步：“在我们农村中奠定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之前，”决不能把“纯粹的和狭义的共产主义思想带到农村去。”

接着，列宁又用这种思想作指导，写了《论合作社》一文。这时，列宁已经放弃了以往那种被西方人称为“急性子哲学”的思想方法，而是根据俄国农村的实际，提出一条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923 年 1 月 4—6 日，列宁连续向秘书福季耶娃口授了《论合作社》一文，回顾和思索了对合作社和社会主义的看法。列宁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看法改变了，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表现在：首先，从前是把重心放在政治斗争等方面，现在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上。第二，从前，以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逐渐创造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条件，现在则要“重视自由工商业的原则”了。第三，从前认为合作社计划是幻

想，而现在则把合作社等于社会主义。第四，从前鄙视合作社，现在则认为合作社具有巨大意义。对于这一点，列宁说，从实质上讲，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使俄国居民合作化，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因为现在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合作社是建设社会主义所必经的途径。

1923年1月16日和17日，列宁向沃洛季切娃口授《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一文。列宁早就想评苏汉诺夫所代表的孟什维主义关于俄国革命的观点。苏汉诺夫是俄国经济学家，孟什维克，1918年7月至1921年8月写出7卷《革命札记》，该书以回忆录的形式记述了俄国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见闻，实质上提出了十月革命对不对的根本问题，如认为俄国缺乏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等。1922年12月24日，列宁请求给他取来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第3卷和第4卷阅读。

列宁批评苏汉诺夫等人，是因为他们不懂得革命辩证法这一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不懂得马克思所说的革命时期要有极大的灵活性，允许变更通常的历史发展顺序。他们只知道一条固定的道路，——发展生产力，无产阶级随之成为人口

的多数，然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然而历史发展到 20 世纪，爆发了世界大战。特殊的战争环境使俄国工农力量迅速增长，俄国无产阶级必须利用有利的时机去发动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但苏汉诺夫等人仍死抱着旧公式不放，用旧框框来反对革命。列宁在这篇书评里引用了拿破仑的一句名言：首先要投入战斗，“然后再看分晓”。

列宁质问苏汉诺夫等人，既然搞社会主义需要客观经济前提，需要文明，那么，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这个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呢？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本书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

列宁最后说：按考茨基思想编写的教科书在当时是有益处的。不过现在已经过时了。应该及时宣布，有这种想法的人简直就是傻瓜。

从这篇文章中人们可以看出，列宁在病魔缠身的情况下仍具有锐利的目光和敏捷的思考能力。他的判断是准确的，论据是充分的。他对自己的学生和战友敲起了警钟，要他们不要死抱着固有的教条不放，一切应该从实际出发。

列宁的学生中，唯一认真研究列宁晚期著作的

人是布哈林。他在列宁去世五周年时发表文章，高度评价列宁的这些思想。遗憾的是斯大林为此而更加憎恨布哈林了。

1923年1月23日中午12时至下午1时之间，列宁把沃洛季切娃叫去，对《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一文作出最后修订，然后把文章交给《真理报》发表。

列宁的《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中发挥了《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提出的改革政治制度的思想，并把它具体化。工农检查院是1920年2月由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改组而成的，由斯大林领导。十月革命五年多来，国家机关的状况不好，官僚主义严重，办事拖拉。而且越精简越多，仅人民委员会内就有120个委员会，列宁认为有16个就够了。负责监督和改善各国家机关的工农检查院办得最糟，没有丝毫威信，列宁因此提出了改组工农检查院的问题。

列宁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改革建议，但其出发点还是要加强对各级党政机关的监督，特别是对上层领导机关。列宁认为，中央委员会已经形成一个严格集中和威信很高的集体，但这个集体的工作条件与它的威信不相称，改革有助于改变这种状况。接着，列宁提出一项监督最高领导人的决策，他说：“有一定的人数必须出席政治局每次会议的中央监

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这是列宁为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监督机制留下的奠基之言。

但是，列宁的这篇文章遭到俄共（布）中央和苏维埃国家的一些领导人的反对，中央监委主席古比雪夫竟然建议单印一份刊载列宁文章的《真理报》，以应付列宁的要求。1月25日，《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终于发表了，但被作了删节，即删去“不管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等关键词句。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还给各个省委专门发了一封信，说什么此文是列宁病榻札记中的几页，是由于他不用脑子就受不了才允许他写的……直到60年代出版《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时这篇文章才恢复原样。列宁关于对党和国家最高级领导人进行有效监督的思想竟被封锁40年！

1923年2月1日至3月2日，列宁口授了《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这是列宁生前最后一篇力作，进一步发挥《给代表大会的信》和《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两篇文章中关于政治制度改革的设想，具体阐明国家机关该怎样进行改革。

在这篇文章中，列宁一再强调改善国家机关的必要性，他说：

“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况，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

“应当及时醒悟过来。应当采取解救的办法对任何冒进和说大话等一概不相信……这里最有害的就是急躁……就是自以为我们总还懂得一点什么，……

“我们往往太喜欢用热心和急于求成等等弥补（或者以为可以弥补）没有知识这种缺陷。”

文章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机关工作软弱无力和问题成堆的原因。列宁一向认为：

改革国家机关，克服官僚主义，需要高度的文化修养；没有文化，单靠优秀品质是无济于事的。所以，列宁指出：“为了革新我们的国家机关，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关于国家机关，列宁认为：“我们应该遵守一条准则：宁可数量少些，但要质量高些。”

列宁在这篇文章中还展望了世界革命形势，他指出，世界革命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个多数人口，非常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

这是列宁在他的最后一篇文章中留给我们的珍贵遗言。

1922年12月13日以来,由于列宁不断发病,医生让他全休。可是,列宁反而加紧工作,处理对外贸易垄断、建立苏联、格鲁吉亚事件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还口授了8篇重要文章和书信。最后一篇文章是1923年3月2日口授的,3月4日发表在《真理报》上。

在口授这篇文章时,列宁的身体已经极端虚弱。2月4日那天,秘书沃洛季切娃发觉列宁口授的速度比平常慢了,头上放着压布,面色苍白,看起来很疲倦。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列宁仍然坚持口授,并开列了一些新的书单。

2月12日,列宁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德国医生费尔斯特突然决定不许他看报、会见人和了解政党情况。为此,列宁很不高兴,气得连嘴唇都有些发抖。

1923年3月6日深夜和7日凌晨,列宁的健康状况又一次恶化。3月10日,列宁再次发病,并得了失语症,不能说话,右半边身体瘫痪加重了。从此,列宁再也没有过问政事。

3月13日,《消息报》发表政府公报,告诉人们列宁的健康状况明显恶化,为此,政府认为有必要发布关于列宁健康状况的公报。

3月21日下午2时，国内外医生给列宁会诊。经过全面和仔细研究，医生们认为列宁主要是脑血管有毛病，现在的治疗方案是正确的，这种病可以治愈，目前病情正在好转。

4月17日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列宁本来希望能出席这次大会，但令他终生遗憾的是他不能出席和发表讲话了。列宁有多少话要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说啊！但他丧失了说话的能力。列宁多么想去同工人、农民和党代会的代表们握手、拥抱啊！但他右半身瘫痪，不能走路了。这是十月革命后列宁第一次未能出席党代表大会。

俄共（布）中央某些领导人尽管对列宁晚年提出的观点有些不同意见，但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都贯彻了列宁的观点，如遵照列宁的指示，制定了《关于组织问题》、《关于工业问题》、《关于俄共在农村中的工作》、《关于民族问题》等决议，以及关于改组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提纲等。2月21日召开的中央全会在审议关于民族问题和组织问题决议时曾提出：在列宁审阅这两个决议之前不予公布，如列宁要求重新审议，就召开紧急全会。

代表大会通过了给列宁的信，信中说：

“代表大会向自己的领袖、无产阶级思想和革命行动的天才伊里奇致以衷心的敬意和热烈的问候，

在您身患重病和不能工作的日子里，你的精神仍像往常一样团结着代表大会和全党。”

列宁以坚强的毅力同病魔搏斗。5月上旬，列宁的病情略有好转。5月15日，天空晴朗，阳光明媚，列宁在医生们的陪同下，乘车前往莫斯科郊区的哥尔克疗养。

新鲜的空气，精心的治疗，对列宁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从7月下半月开始，列宁的健康状况逐渐好转，睡眠和食欲恢复，能站立起来，并且开始训练行走和讲话。克鲁普斯卡娅后来回忆说，列宁的心情变好了，他常常笑，并同别人开玩笑，有时甚至低声唱《国际歌》和其他革命歌曲。

全国都关注着列宁。苏联人民给列宁寄来充满诚挚、热爱之情的信件，提供了各种给列宁治病的处方，表示愿意为敬爱的领袖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医生们都说，列宁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病人，他凭着自己的意志和坚定信念顽强地与疾病作斗争，这是列宁病情好转的主要原因。病情好转后，列宁的主要目标是恢复说话、阅读和书写能力。他坚持用左手练写字，逐步提高朗读的声音。他的各种能力不断有所恢复，而每一个进步都给列宁带来很大的喜悦。

尽管病魔缠身，但列宁的全部思想仍然倾注于国家的政治生活、党的工作和劳动人民的斗争。他坚

持要给他送报纸，送《真理报》和《消息报》，由克鲁普斯卡娅坚持给他朗读。后来克鲁普斯卡娅写道：“我们每天读报，谈论报上的事情。”

列宁还关心书刊出版情况。他翻阅送来的书籍，把自己感兴趣的书挑选出来，如关于科学组织劳动的书、《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地图集等。每天晚上，克鲁普斯卡娅都给列宁大声朗读文学作品，她读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和高尔基的书。列宁兴致勃勃地倾听高尔基的小说《我的大学》，并询问高尔基的情况。当得知高尔基患病的消息后，心情非常焦急。

列宁还喜欢听诗歌朗诵，常让人给他读各种诗歌。克鲁普斯卡娅回忆说：“常常给他读诗听，他一面听，一面望着窗外的落日。我记得一首诗的结尾是这样‘公社战士永远、永远不做奴隶！’读着读着，就像向伊里奇宣誓一样，永远、永远不会放弃任何革命成果……”

这个时期列宁非常喜欢看新闻片，他对全俄农业展览会很感兴趣。根据他的请求，“哥尔克”国营农场场长前去参观展览会，回来后向他讲述了自己的观感及农场的工作。农场运来两辆拖拉机，让列宁观看拖拉机耕地。这使他很高兴，并微笑着同拖拉机手紧紧地握手。

1923 年 10 月 18 日，列宁决定到莫斯科走一趟。与列宁同行的有克鲁普斯卡娅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旅途中，列宁的情绪好极了，汽车驶进城时，他摘下帽子，挥动着与路人打起招呼来。来到克里姆林宫后，他上楼到自己的住所，打量一下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厅，然后来到自己的办公室。第二天，列宁在自己的图书馆里挑选几本黑格尔和普列汉诺夫的书，尔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下午 3 时左右，列宁乘车前往全俄农业和手工业展览会，由于下雨未能仔细参观。下午 4 时 30 分左右，回到克里姆林宫，晚上 7 时返回哥尔克。这是列宁最后一次回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和自己的办公室。此后，他再没有回来过。

列宁在哥尔克疗养，经常有国内外客人看望他。每逢这时，列宁的内心充满了喜悦之情。

1923 年 11 月 2 日，格卢霍夫纺织厂工人代表团前来看望列宁，向他赠送 18 棵樱桃树苗，转交一封工人们的问候信，并向他汇报工厂的生产、生活状况、党和工会的工作等。告别时，代表团全体成员热烈地亲吻列宁。库兹涅佐夫是一位 60 多岁的老工人，他最后一个走到列宁跟前，两位老人紧紧地互相拥抱，没有言语，然而表达了最诚挚的感情。临别时，库兹涅佐夫老人含着热泪反复地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是一个锻工，你指定

的东西，我们一定统统都打造出来。”

在病情十分严重的日子里，列宁同过去一样，仍然非常关心亲人及周围的人。他知道克鲁普斯卡娅有午饭后休息的习惯，就要求房间保持安静。他经常向医生和护理人员问寒问暖，关心他们的生活和身体。他甚至操心城里来的人是否吃过饭。

列宁一向喜欢孩子，把他们看作是人类的未来，对孩子关怀备至，和蔼可亲。新年晚上，他为哥尔克的孩子们举行了一个枞树晚会。列宁坐在大厅里，一直望着唧唧喳喳的孩子们，倾听孩子们讲的话和欢笑。列宁开心地笑了，好像自己也成了孩子！人们怕孩子们的喧闹声会使列宁疲乏，但他说：不要使孩子们在玩的时候感到拘束。

列宁在重病日子里，他的妻子、朋友和战友克鲁普斯卡娅日日夜夜守候在他的身旁。在这种时刻，列宁与克鲁普斯卡娅经过几十年考验的关系表现出特殊的力量。他们的爱情是那么深厚，精神是那么贴近，相互之间是那么理解默契。1923年5月，克鲁普斯卡娅写道：“每天早晨沃洛嘉见到我都很高兴，握着我的手，有时不用言语，默默地交流着思想感情。“列宁无言地注视着妻子，妻子的脸上刻着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从相识到相恋，再到长相厮守的共同生活，几多欢乐，几多艰辛！一个个难忘的温馨的生

活片断，时常浮现在列宁的眼前。

在流放地西伯利亚舒申斯克村，列宁每月有 8 卢布的补助金，他们租一间干净的屋子，雇了女佣人帮助洗衣做饭。当地东西很便宜，克鲁普斯卡娅总是想办法给列宁改善生活。

深秋，叶尼塞河上漂着块块浮冰，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到岛上打兔子。这时兔子的毛色显得特别白，像绵羊一样绕着圈跑。

流放结束。出国，到慕尼黑、伦敦、日内瓦、巴黎、克拉科夫、伯尔尼、苏黎世……

一幕幕与妻子风雨同舟、同患难共欢乐的情景，不时地展现出来。但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了。

1924 年 1 月。列宁自我感觉良好，他每天都要坐着雪橇到森林中去散步，无时无刻不在关心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情况。1 月 16 日，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开幕，列宁要求把会议的各种文件都读给他听。

几天来，列宁一直在认真地听克鲁普斯卡娅给他读文件，时常听得入了迷。列宁的健康状况似乎正在日益好转。

1924 年 1 月 19 日，全俄苏维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加里宁在大会开幕式上说，为列宁治病的专家们认为，列宁不久就可能重新从事国务活动和政

治活动了。对此，代表们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齐声欢呼“乌拉”。这表明，列宁的康复是全体人民的最大心愿。

尾声 列宁永生

我们的国家将永远感到骄傲，曾经有这样一个人在这里同我们一起生活、斗争和工作，并且还教导过我们，这个人的名字还在他生前就已经成为各国被压迫人民的传奇和希望，而且还将成为指引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指路明灯和旗帜，直到社会主义在各国取得完全的胜利。

——尤·拉林

1924年1月20日，白雪皑皑，寒风怒吼，好像要撕裂人们的心肺，吹到人的脸上，如同针刺一般疼痛。早晨起来，列宁感到身体有些不适，没吃早饭，没出去散步，说眼睛有点痛。经眼科专家检查，没有发现列宁的眼睛有任何病变。

1924年1月21日，是列宁生命的最后一天。

早上，像往常一样，服务人员给他端去了咖啡，他亲切地点了点头，就从桌旁走过去了。看来列宁不想喝咖啡，他轻轻地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躺下睡了。服务员知道列宁是想休息，于是没有打扰他。女服务员斯米尔诺娃回忆说：“我守着咖啡等到四点钟，总是想：他会醒来把咖啡喝掉的。但实际上他已经不行了。”

整整一天，列宁没吃一口东西！人们多么希望他能稍微吃一点、哪怕是仅仅喝一口咖啡也好！他这一生太清贫，太不注意关照自己了。他几乎没有参加过几次像样的宴会，更不要说在人民挨饿的战乱年代，他是怎样与人民同甘共苦的了。

整整一天列宁没有起床。人们多么希望他能起来走几步，哪怕是仅仅站一会儿也好啊！

列宁的一生太劳累，太忙碌了。健康时他最爱走动，甚至在夜间思考问题时，他也蹑着脚在房间里“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那是为了不打扰别人。工作中，列宁走起路来去匆匆，健步如飞。甚至在快步行走中他仍在集中精力思考问题。

整整一天，列宁没有与任何人交谈什么。

这些年，列宁为国家操劳的实在太多，他的大脑已经过于疲倦了。只有在这时，在生命垂危之际，他才有生以来第一次能够安静的“休息”。医生们竭尽

全力进行治疗和抢救，终不能阻止死神的脚步。

整整一天，人们都在焦急地期望着、等待着，希望奇迹突然降临。然而，钟摆在不停地滴答作响，似乎告诉人们：“伟人安息的时刻越来越迫近了。”在那最后的弥留之际，列宁有时清醒，有时昏迷，以往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对于他来说已经无所谓了。但有些事情，列宁是记得那么清晰，似乎永生难以忘怀：

那是六年前——1917年10月10日（23），列宁经过三个月的地下状态后，第一次参加中央全会。在全会上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举行武装起义的决议案，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七人中央政治局，对起义进行政治领导。

1917年10月16日（29日），在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列宁坚持采取立即准备武装起义的方针，严厉批驳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立即举行起义的理由。

1917年10月24日（11月6日）晚上，列宁给他们写信，力劝中央委员相信，现在正是千钧一发的关头，临时政府摇摇欲坠，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彻底击溃它！等待就会丧失一切！拖延发动等于自取灭亡！由于列宁的坚持，布尔什维克党领导无产阶级及时发动十月革命，夺取了政权，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当家作了主人，这真是开天辟

地的大事件！列宁怎么能忘记这件事呢？

列宁还有一件永远不能忘记的事情，那就是他领导社会主义国家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为什么这件事给他的印象那么深刻？因为这件事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也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件！马克思主义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生，而不是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列宁十月革命前一直坚信这一观点。但那时仅仅是理论设想和探讨，没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十月革命后，把理论付诸实践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除了战争环境以外，也受到了消灭商品货币关系思想的影响。但是，国内战争结束后战时共产主义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921年3月召开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改行新经济政策，确定了纳税后可以在市场上出售粮食的方针，是是一个历史的转折。但是，十大以后所允许的贸易自由还是很有限的。当时所说的“商品交换”这个概念包括一些什么内容呢？这个概念所设想的建设计划是怎样的呢？它设想，在全国范围内，或多或少要按照社会主义方式用工业品换取农产品，并通过这种商品交换来恢复作为社会主义结构唯一基础的大工业。“结果商品交换失败了，变成了商品买卖。所以，必须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

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要适应这种情况，就是要适应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国家要搞市场经济，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确是一个大突破。当然，对于这种突破还有些拿不准，不那么肯定。列宁脑子里经常闪烁着这样的问题：“是以市场、商业为基础还是反对这个基础？”但无论如何，列宁后来确实变得不那么急躁，不那么理想主义，而是越来越实际了。

看起来，列宁似乎有些倒退了。其实，列宁晚年的政治脉搏已经与历史车轮同步。可以想见，如果列宁再晚离去几年，整个俄国，乃至世界的东方将会是怎样一副模样。

晚 5 时 30 分，列宁的健康状态突然急剧恶化。

过度的操劳已使列宁的脑血管完全硬化，狠毒女人的“达姆弹”停留在列宁体内造成的慢性中毒，发生了严重的恶果。据卫生人民委员谢马什柯后来的回忆，列宁的其他器官里没有发现严重问题，但脑血管的硬化极为严重，几乎完全钙化了：血管壁很厚，脑栓塞物长得很严实，连一根纤细毛发都难以通过。这样，脑子的许多部位流不进新鲜血液，无法得到营养，任何先进的医疗技术也无能为力。

晚上 6 时，列宁的体温急剧升高，病症猛烈发作，全身肌肉剧烈痉挛，呼吸断断续续，并逐渐失去

了知觉。

1924年1月21日晚上6时50分，列宁撒下他所钟爱的事业，永远地睡着了。医生们和护士们痛哭流涕，他们已经竭尽了全力，但无力回天。克鲁普斯卡娅坐在床上轻轻地抚摩着逝者的一只手，她感到列宁的手同他整个身体一样，由热变温，变凉，最后变得像大理石一样冰冷。克鲁普斯卡娅的眼泪一滴滴落在列宁冰凉的手上。……

列宁走了，怀着对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的无限眷恋。

列宁追求什么？高尔基说得好：“列宁一生的基本目标就是全人类的幸福。”“从根本上消灭人们之间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为此，“他在俄国像一具大犁，不倦地在翻耕满目疮痍的贫瘠的土地。”

列宁理想中的新世界是怎样的？按照高尔基形象的说法，是这样一幅宏伟的图景：“一片经过自由人类的劳作变得像巨大的绿宝石一般苍翠欲滴的土地。所有的人都十分理智，每一个人都对他所创造的和他周围的一切怀有责任感，遍地都是花园城市，大厦林立，气象万千，到处为人工作着的都是被人的理智所证服和支配的自然力，而他自己终于（！）成了自然界的真正的主宰。人的体力再也不是用来从事粗笨而肮脏的劳动，体力变成了精神力量，全部用于

研究日常生活中的基本问题。”简而言之，就是全人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列宁的事业是马克思主义的事业，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神圣事业，她曾经轰轰烈烈地影响世界，今后还将不断在曲折中前进。

列宁堪称世纪伟人，他的影响将持续地传入下一个世纪，并将连绵不断……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说过：“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不久就会使人感觉到。”

对于列宁，这段话同样是适用的。

列宁年谱

1870年4月10日(22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诞生于俄国辛比尔斯克省比尔斯克市(现名乌里扬诺夫斯克市)。

1879年8月16日(28日)入辛比尔斯克中学学习。

1887年6月10日(22日)中学毕业。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异,曾获金质奖章。

1887年8月25日(9月16日)入喀山大学法律系学习。

1887年12月4日(16日)因参加学潮被捕。

1887年12月7日(19日)被喀山大学开除学籍,放逐到喀山省莱舍夫县科库什基诺村。

1888年秋—1889年5月以前参加尼·叶·费多谢耶夫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小组。

1889年5月初放逐期满,随全家迁往萨马拉。

1891年前往彼得堡,以校外生资格参加彼得堡

大学法律系课程的国家考试，获一级毕业证书。

1892 年 1 月 14 日（26 日）注册为律师助理。

1892 年组织并领导萨马拉马克思主义小组。

1893 年春撰写《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评弗·叶·波斯特尼柯夫〈南俄农民经济〉一书）》一文。

1893 年 8 月 20 日（9 月 1 日）前往彼得堡。

1893 年秋天撰写《论所谓市场》一文。

1894 年 1 月 9 日（21 日）在莫斯科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发言，批判民粹派分子观点。

1894 年 2 月底参加彼得堡马克思主义者在克拉松工程师家里的集会，第一次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见面。

1894 年春夏撰写《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书。

1894 年秋冬领导彼得堡的进步工人小组，给维堡、涅瓦关卡等地的工人小组讲课，并参加工人的集会。

1894 年底—1895 年初撰写《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文。

1895 年 4 月 25 日（5 月 7 日）为了同在国外的劳动解放社建立联系并考察西欧工人运动，由莫斯科启程出国。

1895 年 5 月 3 日和 27 日（5 月 15 日和 6 月 8

日)在瑞士访问劳动解放社的成员,商谈建立经常联系和在国外出版《工作者》文集等事宜。

1895年5月底—6月在巴黎访问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马克思的女婿保·拉法格。

1895年9月2日和7日(14日19日)之间在柏林访问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威·李卜克内西。

1895年9月29日(10月11日)以后,回国后主持彼得堡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会议。在会议上正式成立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组织。同年12月15日(27日),该组织定名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1895年12月8日(20日)被捕。

1895年底—1899年1月在监禁和流放期间撰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

1897年2月17日—5月8日(3月1日—5月20日)从彼得堡启程前往西伯利亚流放地舒申斯克村。

1898年7月10日(22日)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流放地舒申斯克村举行婚礼。

1893年8月20—22日(9月1日—3日)在叶尔马科夫斯克村召集在当地流放的马克思主义者开会,讨论经济派的《信条》。与会者一致通过列宁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

1900年1月29日(2月10日)流放期满,离开

舒申斯克村。

不晚于 1900 年 7 月 13 日（26 日）启程出国。

1900 年 12 月 11 日（24 日）列宁创办的全俄马克思主义秘密报纸《火星报》创刊号在慕尼黑出版。

1901 年秋—1902 年 2 月撰写《怎么办？（我们运动的迫切问题）》一书。

1903 年 7 月 17 日—8 月 10 日（7 月 30 日—8 月 23 日）参加先后在布鲁塞尔和伦敦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会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派。

1903 年 11 月 25 日（12 月 8 日）声明退出《火星报》编辑部。

1904 年 2 月—5 月 6 日（19 日）撰写《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一书。

1904 年 12 月 22 日—1905 年 5 月 5 日（1905 年 1 月 4 日—5 月 18 日）主持布尔什维克秘密报纸《前进报》的工作。

1905 年 1 月 10 日（23 日）在日内瓦得知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首都彼得堡爆发的消息后，写文章进行评述，号召准备武装起义。

1905 年 4 月 12 日（25 日）出席在伦敦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当选大会主席。

1905 年 4 月 27 日（5 月 10 日）在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被任命为《无产者报》的编辑。

1905 年 6—7 月撰写《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

1905 年 11 月 2—8 日（15 日—21 日）从日内瓦启程回到彼得堡。

1905 年 11 月 9 日和 12 月 3 日（11 月 22 日和 12 月 16 日）之间，主持《新生活报》编辑部的工作。

1905 年 12 月 12—17 日（25—30 日）领导在芬兰的塔墨尔福斯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工作。

1906 年 1 月从彼得堡到达莫斯科，了解莫斯科十二月起义后的形势。

1906 年 4 月 10—25 日（4 月 23 日—5 月 8 日）参加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工作，被选入大会主席团。

1906 年 11 月 3 日（16 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上被选入主席团。

1907 年 4 月 30 日—5 月 19 日（5 月 13 日—6 月 1 日）领导在伦敦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工作。

1907 年 7 月 21—23 日（8 月 3 日）5 日）出席在

芬兰的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

1907年8月5—11日（18—24日）参加在德国举行的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任大会主席团成员以及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决议起草委员会成员。第一次会见克·蔡特金。

1907年8月20日（9月2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

1907年11月5—12日（18日—25日）出席在芬兰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

1907年12月第二次流亡国外。由芬兰的奥布（图尔库）启程到纳古岛，后乘轮船前往斯德哥尔摩。

1908年1月初同克鲁普斯卡娅来到瑞士的日内瓦，主持布尔什维克秘密报纸《无产者报》。

1908年2—10月撰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

1908年4月10日和17日（23日和30日）间，应高尔基的邀请，去意大利的卡普里岛小住。同亚·亚·波格丹诺夫、弗·亚·巴扎罗夫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争论哲学问题。

1908年12月1日（14日）同克鲁普斯卡娅由日

内瓦迁居巴黎。

1908年12月21—27日（1909年1月3日—9日）出席在巴黎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

1909年6月8—17日（21日—30日）主持《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

1909年夏天同克鲁普斯卡娅到巴黎近郊拜访拉法格夫妇。

1911年春天到8月17日（30日）间创建和领导设在巴黎的隆瑞莫党校，并亲自授课。

1911年12月14—17日（27—30日）在巴黎主持布尔什维克国外小组会议。

1912年1月5—17日（18—30日）出席并主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

1912年4月22日（5月5日）创办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日报《真理报》。

1912年6月9日（22日）迁居波兰的加里西亚地区（当时属奥帝国），抵达克拉科夫。

1912年12月26日—1913年1月1日（1913年1月8—14日）在克拉科夫主持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

1913年9月23日—10月1日（10月6日—14日）在波罗宁主持召开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

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

1914年1月13—20日（1月26日—2月12日）参加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大会上作报告。

1914年7月19日（8月1日）得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914年7月26日—8月6日（8月8日—19日）被诬从事间谍活动，遭奥地利当局逮捕。

1914年8月23—24日（9月5—6日）出狱后去瑞士伯尔尼。撰写关于战争问题的提纲《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

1914年8月24—26日（9月6—8日）领导在伯尔尼举行的布尔什维克会议，作关于对战争的态度问题的报告。

1915年5月—8月撰写《第二国际的破产》、《社会主义与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论欧洲联邦口号》等著作。

1915年8月23—26日（9月5—8日）出席在瑞士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

1916年2月初由伯尔尼迁居苏黎世。

1916年4月11—17日（24—30日）出席在瑞士的昆塔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

1916年6月19日（7月2日）写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

1917年3月2日（15日）获悉俄国二月革命胜利，决定回国。

1917年3月7日（20日）开始为《真理报》撰写总标题为《远方来信》的一组文章。

1917年3月27日（4月9日）离开伯尔尼，取道德国、瑞典、芬兰回国。

1917年4月3日（16日）撰写《四月提纲》初稿。抵达彼得格勒芬兰车站，向欢迎群众发表演说。

1917年4月4日（17日）在塔夫利达宫作报告，逐条阐述《四月提纲》。

1917年4月24日—29日（5月7—12日）主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

1917年5月22日（6月4日）出席全俄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关于土地问题的演讲。

1917年6月3—24日（6月16日—7月7日）参加在彼得格勒举行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1917年7月10日（23日）撰写《政治形势》一文，明确提出布尔什维克党的准备武装起义以夺取政权的策略路线。

1917年7月26日—8月3日（8月8—16日）领

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工作，被选为大会的名誉主席和党中央委员。

1917年8月9日（22日）晚秘密前往芬兰。

1917年8—9月撰写《国家与革命》一书。

1917年9月中旬写小册子《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和《布尔什维克应当夺取政权》、《马克思主义和起义》两封信。

1917年10月7日（20日）从芬兰秘密回彼得格勒。

1917年10月10日（23日）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提出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案。会议上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中央政治局，领导起义。

1917年10月16日（29日）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就武装起义的方针问题作报告。会议上成立了起义领导机构——军事革命总部。

1917年10月24日（11月6日）写信给中央委员会，认为拖延武装起义等于自取灭亡。深夜来到斯莫尔尼宫，直接领导彼得格勒武装起义。

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以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起草《告俄国公民书》，宣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被推翻，政权转到军事委员会手中。

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会议。大会通过列宁起草的《和平方令》、《土地法令》和《关于成立工农政府的决定》，宣布组成世界上第一个工农政府——以列宁为首的人民委员会。

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主持人民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1917年11月2日15日—不早于1917年12月14日（27日）签署《俄国各民族权利宣言》，草拟《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其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

1917年12月24—27日（1918年1月6—9日），在同妻子和妹妹度假期间撰写《怎样组织竞赛？》等文章。

1918年1月10—18日（23—31日）领导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当选为名誉主席。

1918年1月15日（28日）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建立工农红军的法令。

1918年2月18日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主张立即接受德国提出的和约条件。

1918年2月21日起草《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

1918年3月6—8日出席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作《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提出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草案。

1918年3月10日由于迁都，离开彼得格勒前往莫斯科。

1918年3月11—16日参加并领导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批准布列斯特和约的决议。

1918年4—5月撰写《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等文章。

1918年5月1日在霍登卡广场检阅部队。

1918年5月8日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撰写《关于粮食专卖法令的要点》。

1918年6月4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工会联席会议上作《关于同饥荒作斗争的报告》的发言。

1918年7月5日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作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

1918年8月6日撰写号召书《工人同志们！大家都来进行最后的斗争！》。

1918年8月28日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

1918年8月30日在莫斯科河南岸区原米歇尔

逊工厂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遭社会革命党恐怖分子范·卡普兰枪击受重伤。

1918年8月30日—9月15日接受治疗。

1918年10—11月撰写《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

1918年11月6日出席全俄工人、农民、哥萨克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名誉主席，发表庆祝十月革命一周年的讲话。

1918年11月7日先后在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揭幕典礼和十月革命烈士纪念碑揭幕典礼上讲话。

1918年11月30日签署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成立工农国防委员会的决定。

1919年3月2日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列宁致开幕词，当选为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1919年3月18—23日出席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致开幕词并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报告。

1919年5月6日参加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并致贺词。

1919年6月28日写完小册子《伟大的创举（论后方工人的英雄主义。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1919年7月4日和7日之间代表俄共（布）中央

给各级党组织写《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一信。

1919年10月11日撰写《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一文。

1919年10月30日撰写《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文。

1919年12月2—4日领导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

1920年3月底—4月初领导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1920年4—5月撰写《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

1920年5月1日在克姆林宫院内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

1920年7月19日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会上作报告。

1920年9月下旬主持俄国(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

1920年10月2日出席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青年团的任务》的讲话。

1920年秋天接见苏俄红军中国团团长任辅臣烈士的遗属。

1920年11月14日参加莫斯科省沃洛科拉姆斯克县卡希诺村电站的落成典礼。

1920年12月22—29日（1921年1月28日和2月2日）之间领导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并接见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1921年2月8日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撰写《农民问题提纲初稿》，规划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

1921年3月8—16日领导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作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这次大会标志着苏俄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新经济政策。

1921年3月17日写信给美国实业家华·万德利普，表示苏俄愿意同美国建立贸易关系和事务关系。

1921年3月底—4月21日撰写《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一书。

1921年5月26—28日领导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工作。

1921年6月22日—7月12日领导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当选为大会名誉主席。

1921年10月14日撰写《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

1921年10月17日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

1921 年 10 月 22 日就租让谈判事宜接见美国实业家阿·哈默。

1921 年 10 月 29 日出席莫斯科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作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

1921 年 11 月 5 日撰写《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

1921 年 12 月 23—28 日领导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1921 年 12 月 28 日同美国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帕·克里斯坦森交谈。

1922 年 3 月 27 日—4 月 2 日领导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工作，被选入主席团，作政治报告。

1922 年 4 月 3 日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会通过关于设立党中央总书记的决定，任命约·维·斯大林为党中央总书记。

1922 年 5 月下旬—10 月初因健康状况不佳在莫斯科近郊的哥尔克村休养，仍坚持工作。

1922 年 10 月 3 日休养后第一次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

1922 年 10 月 5 日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

1922 年 11 月 13 日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

会的会议，作《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

1922年12月30日因病未参加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这次大会宣布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选举列宁为第一届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2年12月—1923年3月病中口授一生中最后的书信和文章：《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1923年3月上旬病情加重，丧失语言能力，半身瘫痪加重。

1923年4月17日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列宁因病未出席，被选为代表大会主席团委员。

1923年5月15日去哥尔克村疗养。

1923年7月6日苏联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选举列宁为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

1924年1月21日晚于哥尔克村逝世。

主要参考文献

1. 《列宁全集》第2版第1—60卷，人民出版社版。
2. 《列宁年谱》第1、2、3、4卷，三联书店1984年版。
3. 《回忆列宁》第1—5卷，人民出版社。
4.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著：《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5.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著：《论列宁》，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6.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集体编著：《列宁传》上下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
7. 普·凯尔任采夫著：《列宁传》，三联书店1975年版。
8. 路易斯·弗希尔著：《神奇的伟人列宁》上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9. 伊·阿·伊万斯基编：《列宁的青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版。

10. 尼古拉·格里戈里耶夫等著：《列宁的一家》，北京出版社 1987 年版。

11.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一、二分册，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

12. 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列宁研究》第 1—5 辑。

13. 刘凤舞：《列宁传》，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后 记

《四大革命导师——列宁》这本书是由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高敬增、中央编译局刘彦章和山东师大刘文涛联合编著的。高敬增撰写第一章至第三十八章，刘彦章撰写第三十九章至尾声，刘文涛补充资料并统改全书。列宁年谱由刘彦章编写。刘淑春、宋丽同志为本书编写提供了资料。吴力超、金蕴达同志对书稿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中央编译局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有关领导同志对本书编写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我们对上述同志表示感谢！由于资料不足和撰写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遗漏和不妥之处，敬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编著者

一九九七年六月于北京